中国史学史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日]内藤湖南 著
马 彪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藤湖南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例如，今天所谓"唐宋变革"的观点就是他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首唱的。这也是他所创立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说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唐宋变革"论即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学界所讨论的对象。

《中国史学史》在他的庞大著作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对于本书这种惊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说这与湖南对于中国学术出众的知识、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非凡见识是分不开的，进而应该加上一点，即还有他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特殊方式。他认为东方史（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在他那里是没有今日这种根据中国、日本等等近代主权国家进行划分的意识的。湖南自己也是将自己置身于东亚这种文化世界之中，进而对中国学的近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日］谷川道雄

上架建议：中国史

ISBN 978-7-5325-4869-9



定价：69.00元

中国史学史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日]内藤湖南 著
马彪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史/(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ISBN 978-7-5325-4869-9

Ⅰ.中... Ⅱ.①内...②马... Ⅲ.史学史—中国 Ⅳ.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3885号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中国史学史

[日]内藤湖南 著

马 彪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635×965 1/16 印张30 插页5 字数417,000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978—7—5325—4869—9

K·1074 定价:69.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本書據《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一卷（日本筑摩
書房1997年9月20日初版第三次印刷發行
ISBN4-480-75511-X）翻譯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总序

谷川道雄

2004年10月下旬我首次访问上海古籍出版社时，有幸会晤了王兴康社长、赵昌平总编、蒋维崧编审以及其他诸位先生。当时我是应华东师范大学牟发松教授的邀请，在该校逗留两周并进行授课和演讲的。因为那时正值拙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中译本（李济沧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才有了拜访该出版社的机缘。“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这一颇具规模的出版计划，正是由于那天的会谈而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我是在那年7月从承担拙著编审的蒋维崧先生的信中得知这一出版计划的。信中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以拙著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拓展范围，更广泛地向中国学界介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并希望我推荐一批能够代表日本研究水准的著作，尤其是能够选择那些在开阔视野下关注社会与人文，或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并在实证研究中取得成果的著作。在10月的会谈中，出版社又出于同样的旨趣，要求我予以全面的合作。

想来这的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有关中国史研究的中日两国学界交流，已经有着长久的历史，而且正呈现出日益兴旺的趋势。交流不仅限于人员的交往，还以相互之间论文、著作翻译的形式对双方发生着影响。但是，这还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即便那些在日本学界具有长久影响力的名著，几乎都没有中译本的出版。所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一计划，不能不说是打破现状、开创新局面的创举。就我个人而言，拙著中译本的刊行能够成为促成这一趋势的契机，更是倍感欣悦。出于如此的考虑，我也就不揣自陋地应允出版社，愿竭尽全

力协助此项计划的实施。

回到日本以后,我立即着手选定书目,其间还听取了我的同行、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森正夫先生的意见,最终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交了我的选目方案。经与出版社协商,决定首批出版十种左右。

非常巧的是,这里所选的学术著作,正好反映了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按照我个人的看法,这一过程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1868—1912)初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形成期。当时,虽然兰克(L. Ranke)的弟子李司(L. Riess)受聘于东京大学讲授历史学,传授实证主义方法,但那毕竟是以欧洲史为基础的史学。在日本学者之中当时出现了与欧洲史亦即西洋史相对应,设立东洋史(即亚州史)分野的举措,由此形成了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洋史,并且延续至今。这一情况一方面表明由于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出现了必须重新认识东亚各国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日本汉学素养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将中国作为近代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学问。最能够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史研究,而且影响至今的学者,即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他所主张的"唐宋变革"论,在这一阶段正在孕育成形。众所周知,他的这一观点是切合中国社会实态的,是对中国史发展所进行的逻辑性解释。作为本丛书之一的《中国史学史》,就是出自他对中国传统学问的广博知识以及对历史发展透彻逻辑分析的力著。

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第二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即所谓的"战间期"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有着密切注重社会与民众的特点,中国史研究亦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及全世界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也影响着日本的历史学界,作为具体的表现则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盛。而且,其中有着马克思主义直接、间接的影响是不可否定的。在我的先师、前辈的学者之中,有许多就是在这一时代新史学潮流中奠定了自身研究基础的,本丛书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属于这一辈的人物。

然而,作为上述新倾向顶点的20世纪30年代,又正是军国主义猖獗的时期。当时,不但不再可能进行自由的研究,军国主义国家还以各种形

式要求中国史研究者为战争提供合作。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那一严冬似的时代终告完结。由此也开始了中国史研究的第三阶段。

“二战”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课题，是如何将中国史作为发展的中国史进行重建的问题。即必须纠正被军国主义歪曲了的中国史观，按照世界史普遍逻辑对中国史作出理解。当时对此起到重大作用的，是从战时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按照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将中国史系统化的尝试亦由此开始。为此日本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参加讨论的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史的问题；另一个焦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构想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观点是否正确的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着长期、激烈的讨论，而且主要都是基于史料的实证观点之间的相互争论。其中虽说也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是毕竟应该说战后的中国史研究在当时有着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参加讨论的既有在上述第二阶段业有成绩的学者，也有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研究者。本丛书著者中，除了内藤湖南之外，都是为战后中国史研究做出了贡献的人物。

我在选择这套丛书的收录著作时，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的历史过程。然而，卓越的作品必定会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时代的代表性，所以很难说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现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与战后那二十几年相比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尽管如此，这些先学的著作在今天仍然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从而不断启发着后生学者。

作为日本人，中国史既是一种外国史，又不是单纯的外国史。两千年来，熏染了日本文化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过去的日本在向中国的不断学习之中发展着自己，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以说也是由过去形成了结构，至今仍在其延长线上运行的。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有着特别的亲近感，即尽管是外国史，但又有一半好像是在研究自己国家历史的感觉，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看待中国史的。其理由之一，也许就在于日本文化是在汉字文化

圈中培育成长形成的吧。无论如何,当这种感情作为近代历史学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和实证的结果,而将中国史总体按照世界史的普遍观点予以体系化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终极目标。

总之,也许可以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由传统与近代、日本与中国乃至世界这样综合的视野重合展开形成的。当然,这种特点亦有其利弊两端。不过,本丛书所收著作都是肩负重任、不倦攀登的卓越成果。我坚信本丛书对今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之国际交流的发展必将有着巨大的贡献,并对将此计划付诸实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马彪译)

《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是近代日本历史学界的巨匠,他的业绩在其歿后虽已经过了七十多年,于今日仍然璀璨辉煌,在世界学术界有着深刻的影响。湖南不仅限于中国史,即便在日本文化史方面亦留下了巨大的成果。他不仅精通传世的历史文献,还率先向世人介绍了甲骨文、敦煌文献、满洲史料等新发现的史料,对甲骨学、敦煌学、满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他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例如,今天所谓"唐宋变革"的观点就是他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首唱的。这也是他所创立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说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唐宋变革"论即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学界所讨论的对象。

《中国史学史》在他的庞大著作群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至于此书的成书始末,正如其嗣子内藤乾吉以及高足神田喜一郎在原著序、跋中所叙述的那样,是根据他在京都大学讲课的内容结集成书的。史学,是人类对自身经历的过去予以自觉认识的学问,湖南是将中国上古至清代这样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认识轨迹,作为一部庞大的史书著作史予以描述的。

当然,在上古时代的最初是不可能存在可称之为史学的学问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应该称为史学前史的时代,湖南是将其作为记录的起源进行寻求的。他在本书的开头曾说:"关于中国的历史即记录的起源,是可以将记录的起源与记录者即史官的起源同时予以考虑的。"即他对史学史的初源的认识是从考察记录的起源开始的。在此,他认为历史就是记录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当然,人类的生活在记录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但是,那毕竟是从人类自身被认识以后才成为有意义的事物。人类对过

去的认识，是通过口诵和记录流传于社会的；运用文字手段的记录，则可以自觉地、客观地表达人类对过去的认识。我认为内藤湖南将历史作为被记录下来的东西予以把握的情况，说明他认为历史开始于人类对过去的自觉认识。

随着记录的普及，出现了各种著作，其中关注过去—现在—未来之时间运行的叙述则是史书。进而，带着究竟应该怎样做出叙述的问题意识，对历史从内容、形式两方面进行考察的学问则是史学。这不仅限于撰述新的史书，而且能够产生对既成史书的评论，而这些评论又可以开辟出新的著作领域。

绵延久远之中国文明的持续性，必然地提出了究竟应该如何叙述过去时代的课题，而作为对此进行思维的结果，又产生了举世无双的、庞大的著作群。它不仅记载了过去的无数事象，及至现在之博大的世界知识，而且还表明了后人对于这些记载的态度和见识。这本《中国史学史》就是将这些史学著作、见解作为一部学术发展史所作的总括性著述。

本书不仅是著者赅博知识的产物，又加之原本有着一种讲述的形式，所以绝非容易读懂之作。著者殁后，内藤乾吉等虽对原著附以章、节目录，但也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些便利，至于探索本书的旨趣则仍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一边探索著者本意一边阅读此书的话，就能使人体会到著者对中国史学发展主线的清晰描述，以及对其背后存在之时代思潮史所作的深层阐述。我对本书的理解虽然肤浅，仍愿就此著作的思路发表一些感想，代为序。

首先，第一、二、三章是一个系列的内容，即对史书形成之前的记录与记录者的实体，所作的尽可能实证性的叙述。这一时代虽说尚未出现清晰而有意识地以过去、现在为时间轴的记录，但是那毕竟是不久之后所形成之史书的起源。由于内藤湖南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有着强烈的共鸣，所以在第四章《史书的渊源》中，他阐述了史官这种政府记录官所司掌的记录，从六经至诸子、诗赋、兵、术数、方技，再至《汉书·艺文志》所载六略诸书的发展过程。

以上诸书之总合性集大成者又数《史记》（第五章）。《史记》的记录

不仅明确地贯穿了从传说时代至现代的时间轴,而且能够以与大一统时代相称的空间视野为背景,对人类命运予以了丰富多彩的描述。这样,出现了真正具有史书价值的著作,而在这一过程中,类书型书籍的撰述也是不容忽视的。即在当时总合记录的形势下已经有了类书形式的诞生,而能够自成一家之言,予以统一记述的毕竟还是《史记》。

有关从类书发展到统一的、独创的史书的现象,在第八、九章中也有所叙述,这两章其实是在讲唐宋变革时期史学的变化。他指出这个时期政治上是贵族制社会的多元权力向君主独裁制的一元集权政治的转型期,此间发生了从类书体例的《册府元龟》到一家著述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变化,并认为这种变化具有帝王学的性质。内藤湖南在《中国上古史》(夏应元监译《中国史通论》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中,曾指出战国秦汉时期多少已经有了君主独裁政治的倾向,这种政治上的类似与史学史上的类似或许有着某种对应,《史记》与《资治通鉴》这两大高峰成为了各自时代的代表,颇为令人深思。

总之,像《史记》那样内容、体例均可称之为真正史书的著作出现了,《汉书》继续了这种史书撰述的潮流(第六章)。尽管两史之间有着通史与断代史的区别,但毕竟由此进入了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特别是《史记》、《汉书》构筑了正史编纂传统以后,以此为中心,史书的撰述开始带有了惯例的性质。《史》、《汉》两书创始的《纪》、《传》、《表》、《志》等编纂方式,又分别产生了各个独立领域的史书,如在《隋书·经籍志》所见的那样,史书中出现了更多的分野。在图书分类上,独立形成了"史部"的领域,经过六朝时代各种图书分类法的设计,最后出现了《隋志》那种"四部分类法"的结果。第七章"《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中就是这样叙述史部独立的情况的。同时著者也指出:在另一方面,史书的发展也出现了丧失《史》、《汉》那种历史家精神之形式主义的堕落倾向。而且其中具体的现象之一就是,在唐代出现的正史编纂从一家之著述变成为分纂的倾向。本章的时代背景是六朝、隋唐,即内藤湖南分期法中的中世贵族政治的时代,当时出现了作为家学修史的国家事业化的情况,完全是与门阀贵族制向官僚贵族制的推移的过程相互对应的。

在这一章记述中值得注目的是，著者加进了史注与史评这样新的分野。根据湖南的观点，史注是由于受到经书注疏学影响的产物；史评则是有关史书叙述法的议论，是后世对既成史书的反省。从六朝时代开始的史评，至唐代刘知幾的《史通》终于形成了史评的专著。史注、史评都是从当时史学中那种单纯写史的著作，进而发展为对既成史书加以解释、评论的产物，这显示出史学史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换言之，如果说包括目录学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史学产生于六朝、隋唐时期的话，亦不为言过其实。至少，我认为内藤湖南的本意看来正在于此。

湖南认为：史注是史书的训诂学，宋代以后虽然基本衰落，但是宋代开始发展起来的那种对旧史的修补、考订，其实就是那一系统的继续。这一分野作为考据学的一环在清代达到了极盛，对此湖南在本书的第十二章“清朝的史学”有着详细叙述。关于清朝的史评虽然也特别在这章中设置了一节，但却只有一些标题目录而没有具体内容。但是，如果说旧史的修补、考订中包含了史评的意义的话，则是不过分的。湖南还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在各章之中极其详细地介绍了清朝学者对清朝以前史书的意见。这一点是其他中国史学史著作中所见不到的独到之处，也是特别能够向读者传达中国历史学厚重传统的笔法。

就这样，中国历史学通过唐宋变革发生了飞跃的发展。湖南认为唐宋变革的先兆已见于六朝末唐初，其在史学史上也有所表现。第八章“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中，主要阐明了古文复兴与史学的关系。湖南很重视史书文体与其内容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从古文到骈体文的变化，曾经影响到正史叙述的文体；再度出现复归古文气运时，又带来了《旧唐书》、《旧五代史》到《新唐书》、《新五代史》，再到《资治通鉴》的史学发展（第九章“宋代史学的进展”）。这一变化的又一条路线就是前述那种从《册府元龟》到《资治通鉴》之帝王学的变化。

宋代史学又开拓了新的分野，即金石学与目录学的发展。复兴古代的气运促进了对金石资料的重视，出现了对古董器物汇集及解说的著作，这些著作不妨视为中国考古学的起源。目录学中出现了为书籍作题解的新倾向，这也可以说是后来书志学研究的萌芽。湖南指出的这两个学问

分野，使我们感到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历史学逐渐地带有了近代性的特征。

宋代又是周边游牧民族勃兴，甚至占据了中国部分地区，建立王朝的时代。这种形势最终导致了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出于这种时代背景，兴起了正统论这种史学争论，并且一直持续到了后代。从近代历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争论虽说并无多大意义，但是湖南将其作为了解中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予以了详细的介绍。进而值得注意的是，湖南是从宋代以前的正统论开始阐述的，由此可见他的视线经常是由古到今，又从今至古双向移动的。他认为与断代史相比，通史有着更大的价值，看来这与他的观察能力也是不无关系的。

正统论毋宁说盛行于元代，第十章"元代的史学"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论述。他虽然将元代作为史学成果的贫乏时代，但是对非汉族王朝之元朝独特的史料情况，仍给予了认真的叙述。

在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成熟的明、清时代，史学也有着格外的发展。专门论述明、清史学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两章，占据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开始于宋代的史学新潮流，不妨说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潮。简而言之，在经过长期积累的传统史学继续发展的同时，通向近代历史学特质之一的合理主义、实证主义的道路亦呈现于当时史学的内部。但是，这一道路又决非一条直线。大而言之，宋至明之间，明至清之间不得不经历了两次思潮的转换。例如，就掌故书而言，在宋代的掌故记载了有关朝廷的故事、仪礼的见闻；至明代时又采入了野史。这虽然可能有着扩大掌故学材料的效果，却不免事实正确性欠缺之憾。至明末又发生了一变，出现了以正式记录为本的学风，并一直发展至清朝。

历史叙述中是强调主观意志，还是重视事实客观性，这可以说是历史学所无法避免的课题。新旧《唐书》、《五代史》以来的这一课题，从宋至清这一时期曾以各式各样的形式交错展开着。大略而言，就是宋学与汉学两大潮流。湖南对在汉学优势潮流下展开的清朝史学的庞大成果予以了精细的探讨。这里虽说不可能对其逐一地进行介绍，但是就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本文已在清以前的史学中有所言及。而且，关于清朝史学的整

体内容,建议读者结合内藤湖南《清朝史通论》第五章“史学及文学”(前揭夏应元监译《中国史通论》下卷)一并阅读。

一言以蔽之,就清朝史学的领域来说,时间纵贯古今,空间涉及塞内塞外。另外,对那些史学家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史学成果,进一步加以细致检讨、批判的,还有以章学诚所代表的那样,对历史到底是什么这种根本问题所进行的思索。就这样,中国历史学以其实证性与追求原理的精神,明显地出现具有了近代学术的趋势,湖南的叙述使我们对此感到确信不疑。

以上,仅仅是对本书博大精深之叙述所作的简要勾勒而已,如有误解和偏见的话,请不吝指正。然而,对于本书这种惊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说这与湖南对于中国学术出众的知识,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非凡见识是分不开的,进而应该加上一点,即还有他本人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特殊方式。本书中他提到了历代中国学者的见解,并屡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时也批判以往的见解,这应该说正意味着他是把自己也置身于中国史学史之中的。他认为东洋史(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中国上古史》绪言,参见前揭夏应元监译本)。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在他那里是没有今日这种根据中国、日本等等近代主权国家进行划分的意识的。

一般说来,作为近代以前朝鲜、日本的学者来说,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不论是儒学还是艺术,在所有方面都是这样的。湖南也是将自己置身于东亚这种文化世界之中,进而对中国学的近代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本书的翻译者马彪教授,赴日以来一贯致力于内藤湖南史学的研究,这回又在他不同寻常的努力之下,使本书首次被翻译为了中文,为此我感到由衷的欣悦。我相信本译著的刊行,一定能够推动中日两国学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谷川道雄

2007 年 9 月 25 日

例　言

本书是根据著者在京都大学所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整理而成的。著者曾有意将自己在大学讲授的“中国史学史”和前些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亲自予以整理出版。对此尽管著者在生前有过出版的承诺,怎奈最终没能实现这一愿望。著者是带着这种遗憾去世的。从那以后已过了十五年,我那种尽早出版此书的愿望虽说从未泯灭过,但毕竟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很多,以至拖延至今。

著者在大学曾经前后三次讲授“中国史学史”。从京都大学现在尚存的授课题目来看,第一次讲授是在大正三年至四年(1914—1915),历时两年;不过我手头没有任何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那次授课内容的材料。第二次讲授是在大正八年、九年和十年(1919—1921),历时三年;这次是从古代一直通讲到现代的。第三次讲授是在大正十四学年度(1925);这次讲授的题目是“清朝的史学”。本书,就是以第二次、第三次的授课内容为底本整理而成的。

由于著者讲课从无准备讲稿的习惯,所以当著者有意将自己的讲义出书的时候,他采取了订正听讲者笔记的方法。因此,著者把上述第二次授课时两三人的听课笔记收集起来,于大正十二年(1923)利用大病初愈后在有马温泉疗养的两三个月,进行了修订。怎奈当时是在温泉旅馆疗养,案头一本参考书也没有,所以订正也只是大体上将两三种学生笔记进行对照,将这边出缺的部分用那边的笔记补上而已。当时他修订到了清朝的《考订旧史的史学》的部分。那以后,在大正十四年著者讲授《清朝的史学》时,他先是把从《史记》到清初的内容,以绪论的形式加以简略叙述,随后继续讲述在有马疗养时没有修订完的《考订旧史的史学》以后的

部分。不过,当时他又增补了相当多的内容,所增补内容的要项都记在了笔记上。著者为讲述中国史学史所做的准备,大致如以上所述。从那以后看不出作者对此书有过修改的痕迹。著者于大正十五年大学退休,隐居南山城的瓶原村(现在的京都府加茂町)以后,便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著作。虽然出版了《研几小录》、《读史丛录》、《(增订)日本文化史研究》等书,但是尚未来得及着手《中国史学史》、《中国上古史》的整理,就于昭和九年(1934)去世了。因此,本书一直是作为未定稿保留了下来,最终也没能补充进著者晚年的新见解。

著者去世后,本书很快就被列入了出版计划。但是,首先要做的是将著者本人未整理完的手稿继续做完。而这是一件相当繁琐的工作,幸好我们有一位最为合适的人选,即不仅是亲自聆听过本课程,而且谙熟著者学问的神田喜一郎教授。他承担了这一工作。由于当时神田教授正在台北大学任教,所以整理工作也是在台北进行的。其间又由于战争的爆发,本来就交通不便的台北几乎与日本断绝了联系,那段时间内本书的完成几近渺茫。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神田教授回到了京都,这才使本书的完成获得了转机。然而,回到京都后的教授却日渐繁忙。所以考虑到既然已经恢复与教授的正常联系,那么整理书稿的工作也可以由我来分担一部分了,于是稍稍改变了一下工作方针:采取了先由我做校对,再由教授进行校阅的方式。我当时正在京都府立图书馆任馆长,由于本来就有辞职的意向,加之公务之余又确实难于进行书稿的校订工作,更何况当时希望能够利用著者遗留在瓶原村的藏书,所以就借此机会辞去图书馆的工作,住到瓶原去了。那段时间里我得以专心致力于本书的校订工作。因为著者讲述中国史学史时所使用的参考书籍十有八九都在瓶原,所以当时这样做可说是最方便的办法了。在瓶原的校订工作历经数月终告完成。由于尚需由神田教授校阅,所以我经常与教授一起阅读原稿,并由我就有疑问的地方向教授提出问题,听取教授的意见,采取了随时有问题随时解决的方法。根据教授明快的判断,一般的问题都能马上予以解决。然而,即便是用这种最为节省时间的方法,在最终完成校订的一年里,我们还是花了二十天的时间才得

以截稿。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整理工作。大体上说这次我们所做的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除了著者曾经参照过的课堂笔记以外,我们又另外参照了两三部笔记,以求尽可能地再现当时授课的原形。这样的方法,往往比授课数年后著者凭借记忆进行的订正更加准确。不过,由于可参考的笔记毕竟有限,个别地方只有一种笔记可供参考。第二,尽可能地查对了我们认为是著者授课时参考过的材料,对于那些明显属于作者不慎或记忆有误的地方进行了订正。第三,将听课学生各式各样笔记的文字统一为口语文体。当然,这些都只不过是些枝节问题,可谓无关宏旨。只是担心由于自己的孤陋寡闻反而犯下意想不到的错误。另外,在此还有几点是有必要说明的:

如前所述,本书虽说是以第二次、第三次的授课内容为底本修订而成的,但其中所谓根据第三次授课只是指《考订旧史的史学》以后的部分。由于第三次授课是在第二次授课的基础上补充以这一部分而进行的,所以对这一部分的修订参照了著者本人订补的笔记和该年度的学生的笔记。只是,我手上这一年度的课堂笔记虽有三种,怎奈其中两种都缺少《西北地理之学》以后的部分,有一本虽然一直记到了最后,但又颇为简略。因此,《西北地理之学》以后的部分就多少显得有些遗憾。而且,特别是《金石之学》的后半部分,大都是那次增补的内容,可是这一增补的部分在著者修订的笔记中又仅仅列出了各条项目,而听课笔记又很简略,所以无法完整地再现当时的授课内容,也只好留作缺憾了。《官书》一节也是这一年度增补的部分,所以也存在着同样的遗憾。另外,在《金石之学》这一增补项目中,虽记曰:"波理欧特(Pelliot)的发现当另放到校勘学一节去讲。"但学生笔记中并没有"校勘之学"一项,所以在第三次授课时究章是否讲了这一节也不清楚。也许是著者讲述了敦煌遗书,而又未能补充上波理欧特的发现,亦未可知。《史评》一节也是由于学生笔记的不全,以致难以再现授课的原貌。上述几部分如果将来能够找到更为完整的学生笔记的话,希望有机会再一次

予以补订。另外,关于本书的《清朝的史学》部分,先有了神田教授在台北时对著者所订正学生笔记为底本的校订,这次又在此基础上根据第三次授课的学生笔记作了补充。

著者在授课时是不标明章节的。但是由于他写了授课的纲目,所以有些课程的纲目被保存了下来。可惜,中国史学史课的纲目却一个也没能保留下来。本书的标题都是我们后加上去的。然而,在授课内容上,按照适量的内容在形式上整齐划一毕竟是困难的,更何况那样做也未必就妥当。虽然我们根据内容加上了标题,但是有些内容原本就无法命名的情况恐怕也是有的。再有,本书中对内容的出处予以了少许夹注,那不过是我们在这次校订时作为备忘写上的,由于并没有经过逐一地仔细推敲,所以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另外,在书后本来打算附上索引,以求弥补标题的不准确。但是由于出版界的严重困难,为了减少篇幅也只好割爱,以待来日了。①

作为附录收入了三篇文章:《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昭和八年〈1933〉6月17日在支那学会大会上的演讲,载于《史林》第19卷、第1号),因为这是对《中国史学史》的补遗,本来是应该收入正文的,但由于是演讲体例,故而采取了附录的形式;《章学诚的史学》(昭和三年〈1928〉10月6日在大阪怀德堂的演讲,载于《怀德》第8号)是出于本书遗失《史评》一节,作为补充而附上的;《中国史学史概要》即前述大正十四年度(1925)讲授《清朝的史学》时开头的绪论部分,标题是我们加上的,由于与本书内容相互对应,故而附载于后。

为了本书的出版,在著者生前或去世之后提供了全部或一部分课堂笔记的有:梅原末治、鸳渊一、神田喜一郎、小牧实繁、杉本置治郎、内藤隽辅、宫崎市定各位,以及两三位不知尊名的先生。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并特别恳请佚名的几位先生能够告知尊姓大名。

对于为本书投注以极大精力的神田教授的感激之情,则更是难以言

---

① 这里提到的《索引》在1967年出版的《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即《中国史学史》卷)中已经补上,非常便于读者查阅。事实上,据译者考察:在日本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史词典的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如京都大学《东洋史辞典》)应该就是利用这一《索引》的产物。

表。没有教授的帮助,本书是无法问世的,在此谨志铭感!

昭和二十四年(1949)4 月

内藤乾吉[1]识

---

① 内藤乾吉(1899—1978):内藤湖南长子,曾任大阪市立大学教授,编修十四卷本《内藤湖南全集》(筑摩书房)。

目　录

第一章　史的起源

关于中国的历史[1]即记录的起源，是可以将记录的起源与记录者即史官的起源同时予以考虑的。据传说，黄帝的史官有仓颉、沮诵等人物（《史通・史官建置篇》）。关于仓颉的记载见于《世本》和其他各种古书，被认为是最初制作书契的人；有关沮诵的记载见于《风俗通》（《后汉书・献帝纪》注引）。当然，作为黄帝时的事情多属于传说。作为传说，虽有所谓仓颉作书契的说法，但是否可以认为他就是史官呢？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其实，在古时候作书契就是作记录，这被认为是史官的职务；所以仓颉作书契可以认为是对史官的传说。至于沮诵，虽然沮是姓诵是名，但是"诵"，在古时候是讲述、传授往事的意思。《国语・楚语》"矇不失诵"的"诵"就是这个意思。尤其是《庄子・大宗师》中有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这里的"副墨"是记录的意思，说的是洛诵口传之事。由于"诵"是口传的意思，所以黄帝时有关名叫沮诵之史官的传说，与其认为是有关记录官不如说是对口传官的传说。另外，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曰：夏时有孔甲、殷商有尹逸等史官。这也是极其含糊的说法，夏代有叫作孔甲的王，大概与此人物无关。也有记载说孔甲乃黄帝时的史官，当然也不是准确的说法。而所谓尹逸，说是殷代的人物，此说的根据已不得而知。刘知幾应该是有所根据的，但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了。又如《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说：夏代有太史令终古，夏

---

① 此处"历史"一词，根据上下文义可知有"史书"之意。至迟在明治年间，日本学者开始将"历史"这一汉语词有意识地从以往"历代史"的意思中剥离出来，赋予了近现代语义之"历史"的意思。但在当时"历史"一词包括了今天"历史"、"史学"、"史书"等多种含义，这也是近代以来汉语词语义变迁上的一大特点。译者在翻译时有意保持了当时"历史"用语的原貌。

亡时他抱上图法投奔了殷;又说殷的内史向挚也是在殷灭亡时抱着图法逃到了周。但是,这种说法却未见于其他的书籍。这种情况在著述《吕氏春秋》时代的作者来说,是常有的事。不管怎样的一件事,为了举出相关的实例来,作者不惜捏造出各种各样的古代传说来,这是当时的一种倾向,终古、向挚之说看来就是其中一例。

传说上的往事虽说是如此的不准确,但实际上"史"字的出现,从以往的经书上看是产生于周代,就《尚书》而言,最早出现在《周书》上。传世遗物也是从殷商开始的,在那些被认为是殷商的文物之中,有很多是铜器,那些铜器果真如同中国考古学者所鉴定的时代那样吗,有人曾提出了疑问,看来关于铜器是有讨论的。但是在以往所谓殷代铜器以外的文物上,明确出现有"史"字的,如周代的铜器上明确地出现了,在秦始皇的泰山刻石上也可见"御史大夫"用语的"史"字。无论如何,周秦之间已有"史"字是肯定的。近来,罗振玉氏又从殷墟出土的龟板兽骨上书写的文字中发现了这个"史"字。由此,可以肯定殷代已有"史",从而认为铜器上"史"字未必为殷代之物的话也就不太好说了。

如果"史"者在殷代开始已经存在的话,那么"史"最初究竟是何职务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对这一问题在日本也有人进行了研究。饭岛忠夫氏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2月的《史学杂志》发表题为《史——中国上古的文书之职》的论文。饭岛氏的论文虽说于研究上该注意到的事情都予以了相当的注意,可惜他的判断结论看来是错误的。这一点从罗氏和其他的学者的研究来看,应当是很清楚的。关于"史"最初究竟是怎样一种职务的问题,在中国解释古文字常用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史",写为"[illegible]"(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写为"[illegible]")。并解释为:"史,记事者也。手又持中。中,正也。"如此,史就是记录事情的。这个字是手([illegible])持"中"的形状。中,正也。就是说史官要做到"正",所以解释为保持中正的意思。但是,这样的解释在今天看来,是有疑问的。因为无法设想: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具有了保持中正这样的抽象意义。不仅如此,中国考古学者还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即吴大澂氏《说文古籀补》的观点。吴氏认为:"史"字见于铜器的字形为"[illegible]",而中正等字的"中",在铜器的

古文字为“中”，而不是“中”。所以《说文》的解释有误。吴氏将“史”解释为手中持简的形状。饭岛氏认为吴氏的看法近乎附会，还是《说文》的解释更为稳妥。他引以为证据的史料是《论语 · 尧曰篇》中尧对舜说的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认为很古的时代就有了中正意思的用语，所以“史”字具有持中正之意并非不可能，《说文》的观点未必有误。然而，最近罗振玉在其著作《殷墟书契考释》中，就有关“中”字和“史”字，举出殷墟龟板兽骨中所见文字作出解释。认为：中正的“中”的字形是“中”或“中”，“中”形的字仅用于伯仲的仲之意。而“史”字还是“史”的形状。作为解释，他进而引前人的观点为证，即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对“中”的解释，谓官府的簿书为“中”。古时有名为“治中”的职官，又有所谓“受中”的用语，其“中”字皆为簿书之意。《周礼 · 秋官 · 小司寇》之“断庶民狱讼之中”的“中”也是指簿书，用现在汉语说就是案卷的意思，这就是“中”的本意。所以，掌管文书者叫做“史”，而史字从又、从中，系手持簿书的形状；又如吏（吏）字、事（事）字，字形都含有“中”字，也是由此意而来。但吴大澂似乎没有注意到江氏的观点，罗氏是最开始注意到的。无论如何，将“史”字解释为手持簿书的形状，我认为是相当精彩的观点。

但是，对此还有必要进一步考虑的是，“中”何以就应该解为簿书的问题，我在大正三年（1914）的授课中初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王国维也和我持同样的看法，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在《学术丛编》发表了题为《释史》的论文（收于《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初集》，亦收于《观堂集林》）。我认为此原本产生于射箭的射礼，在这一点上王氏的看法也完全一致。《周礼 · 春官》关于大史的职掌曰：“凡射事饰中舍筭。”这里饰中而舍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在《仪礼》也有详细的叙述。据《仪礼 · 大射礼》记载：执掌射箭礼仪的“司射”，命“释获者”设置“中”，大史释获，小臣师手持“中”；然后大史将八筭置于“中”，再把剩余的筭横向摆放。所以“释获”，就是计算射箭所命中的数目的意思。对一次命中的计算叫做释一筭。总之，“中”是盛筭的器物。那么，这个“中”又是怎样做的呢？对于其形制在《仪礼 · 乡射记》有所记载。筭是什么样的呢？是像御签似的

竹棒。王国维氏认为：古时简和筭是同样的东西。古代书籍的简筴（策），最长二尺四寸，其次为其半，即一尺二寸，以下为八寸、六寸；射箭时计算命中次数的筭，长一尺二寸。“筭”不仅见于《乡射记》，在《礼记·投壶篇》里也记载了投壶的筭，长度为一尺二寸。《乡射记》记载矢数的箭筹是八十支，长度为“尺有握”。所谓“尺有握”即一尺加一握之意，一握之处仅以刀削而成，为素白无装饰的部分。由于“握”大体为四寸，所以“尺有握”为一尺四寸。看起来与投壶之筭的一尺二寸不同，其实周尺有八寸尺和十寸尺两种，这里说的尺或许是八寸尺，加上四寸正好是一尺二寸。另外他还指出，计算天文现象时，使用的是长度为六寸的筭。古时计算皆用筭，《仪礼·既夕礼》是有关丧礼的篇章，其中“主人之史请读赗，执筭从柩东”。这是有关计算奠仪的记载。如此看来，计算时都是用筭的。（筭与算，字虽相似，实则不同，筭是计算时使用的削竹所成之器。）王氏认为筹、筴、简、筭在制作方法上是相同的。因此，无论如何他认为“中”是盛筭的器皿，以中形来表示。而且，因为这种用于计算的筭与简筴的简本来是同样的东西，所以盛筭的“中”应当也可以用来盛简。简的数量多了就把它们编起来，称为“篇”，又称为“策”。总之，因为简也可以盛在“中”里，所以不妨认为“中”字既可以是盛有计算器之筭的形状，也可以是盛有简策之简的形状。

我认为，“史”大概最初还是手持射箭计数用计算器的形状。王氏认为从一开始就有盛放简策之意，所以把“史”解释为用来盛书的器皿。这似乎多少有些不妥，毕竟在古代与文事相比武事更重要。这一点从铜器的铭文也看得出来，只有一个字铭文的大体被认为是殷代的，而周代的铭文一般字数较多。我翻检了《擴古录金文》中六十五种只有一字的铭文，其中明确为武器形状的有十八种。总之，在古代以武器为铭文的情况很多，此外动物、祭器也很多，大体上说以武器为多。其中也有“史”字铭文，其字形为“史”，明显是手持“中”的形状。所以说“史”最终也应当看作是武器，直至殷代，史的主要职掌仍是射礼，是负责计算射箭命中次数的职务。如此，“史”虽说最初是指手持盛有筭的容器，但王氏根据筭与策是同样的东西，认为“史”的本义在于盛策的“中”，而盛筭的“中”是第

二层意义。我认为盛筭的“中”是本义，而盛策的“中”则应该是引申义。这是我与王氏观点的不同之处。[1]

① 关于“史”的本义，在日本目前最有权威的是白川静的“祝告器”的观点。参见《汉字》（《白川静著作集》第1卷p63，平凡社1999年）。

第二章 周代史官的发达

上述史官的职务，至周代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出现了职务上的分工。对于史官职务的划分情况虽说今天已经不甚明了，但是对其在当时十分发达的形态，根据现存的《周礼》还是可以知道的。关于史官的记载不仅见于《周礼》，也见于其他经书，其内容与《周礼》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无论如何，对于史官的各种职务最为概括，记载最全面的还是《周礼》。所以，这里就将《周礼》中所见有关“史”的记事加以整理，进行分析，并对周代“史”的形态作些考察。

《周礼》中对春官大宗伯的属官，记载了大史以下五史的官职。本来，《周礼》被认为是记载周代官制的书，书中将全部官制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是冢宰，“地官”是大司徒，“春官”是大宗伯，“夏官”是大司马，“秋官”是大司寇，最后的“冬官”按理应该是大司空，但在本书中却出现了缺文，后人就用《考工记》来补缺。各官职中“春官”大体是执掌礼仪的官，大史以下五史的职务在此都有记载。

在对此进行考察之前，有必要先来介绍一下《周礼》一书的形成。汉代经学中有今文和古文之分，《周礼》属于古文经。秦焚书之后，在汉代再度问世的经书中，先是今文经书，后来才出现了古文经书。所谓今文，是指用汉代普遍通行的隶书写的书，而古文则是用当时已不通用了的古文字写的书。然而，汉朝是开始奖励学问的时期，即便是从古时候留下来的书籍，人们也都是用当时的隶书重新抄写的，这些也都是今文。另一方面，后来到处发现的，即所谓出于山岩屋壁的那些书，则是使用当时已不通行的古文写成的。由此，从那时开始出现了今文与古文在学问上的斗

争,治今文经学的人不承认后起的古文经学。因为当时的官学博士是今文家,所以他们不承认古文。但是,由于后来做学问的人也都参考古文,因此古文学派也就发展了起来。《周礼》就属于古文。

大体上说,有关周代官制的著作,在此以前也是有的,比如《荀子·王制》。《礼记》里也有《王制》,这虽说是汉文帝命令博士们写的,但写的内容是周代的制度。此外,古书中多少涉及周代官制内容的,又如《国语》、《孟子》等。一般来说,《礼记》属于今文经书,由于其内容与《周礼》不同,在今文派和古文派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但由于今文派先活跃于世,所以此书也随着汉代经学的兴起而受到注视,且不论其可信程度如何,总之此书很早就受到了信任。古文经书后来在许多地方都有所发现,而且被认为其中也有不可信之处。就一般的经书来说,同一部经书既有古文本也有今文本,所不同的仅仅是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差别的问题。由于像《周礼》这样没有今文本,从一开始就只有古文本的情况很少,所以有关《周礼》也就成为中国学者议论纷纷的问题。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周礼》中记载的诸多官职,如果说都是伪造的,那是不可想像的。总之,就经书来说,尽管那些由孔子门人相续传承下来的著作在汉初仅有今文本,但是那些秦以前书籍的残存到了后代又相继被发现的情况,也未必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说将当时残存的书籍汇集起来,以至形成了今天这本《周礼》的话,也是不足为怪的。当然,将此书编成今天这样的体例,肯定是有着编修者的极大努力,同时在其中做了某些手脚的地方也是会有的。因此,认为《周礼》绝对是周初周公所著作品,而且原样不变地重现于世的看法,是对史料发现程序的无视,是不足取的。相反,只因为《周礼》晚出,就认为其中所载官职皆不可信,就认为只有先出的今文可信,《周礼》完全是伪书的话,不同样也是不妥当的吗?于是,对于以往人们认为《周礼》所载即周代最初的制度或周代中期制度的观点也应当予以重新认识。总之,应该说《周礼》是一部将残存至汉代的周代书籍予以拼凑,多少加入了当时人观点,进而编修而成的著作。所以,对书中所记载的事情逐一地予以分析,并与其他古书中可以确认的事情相互对照,那些相吻合的事情就可以作为可信的史料。关于史官的记事也是一样,如

果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分析的话，也是可以辨别出其中究竟有多少可信成分的。

下面是《周礼·春官》所记载的史官及其职掌：

大史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

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

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办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

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

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

大迁国，抱法以前。

大丧，执法以涖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小丧赐谥。

凡射事，饰中舍筭，执其礼事。

小史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

冯相氏

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

保章氏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

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

内史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

外史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御史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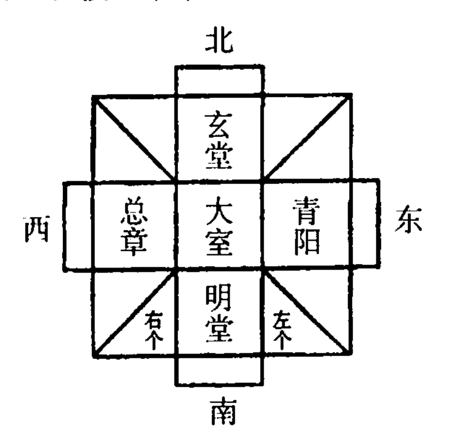
先来对以上记载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关于大史的职务，如果与天官冢宰的职掌一并考虑的话，“建邦之六典”，就是冢宰所谓的“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再分别配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与冢宰之职的“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相对应，其职掌范围虽然与冢宰相同，但是“逆”，是大史的特别职务。治理邦国是冢宰的职责，对应这一治理予以记录则是大史的职责。“邦国”一般解释为诸侯国。下面一句的“掌法”的“法”，就是冢宰的“以八法治官府”的“八法”，即官署、官职、官联、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等。大史负责保存与此有关的文件。“掌则”的“则”，是冢宰“以八则治都鄙”的“八则”，即祭祀、法则、废置、禄位、赋贡、礼俗、刑赏、田役等。“都鄙”，是天子或公卿大夫的

采地,采地各有城郭。有城郭的地方称为都,城郭以外的地方称为鄙。这些地方对王来说是间接的领地。大体上说,《周礼》的制度,是将天下三分为邦国、官府、都鄙,而进行治理的。对此治理作出记录并保存这一记录就是大史的职责。

第二,凡有关邦国、都鄙以及与万民的约定文书,由大史收藏保管。“以贰六官”,按照以往的解释:在六官有各种约定文书,这些文书的副本由大史来保管。

以上两条是有关政治的内容,第三条是历法。“序事”,是表示农事顺序的意思。颁布“告朔”,就是向诸侯颁布王朝所订立的正朔,诸侯将其藏于宗庙,每个月去宗庙进行报告。“闰月诏王居门终月”的意思是:根据《月令》,天子在明堂办理政事,须每个月更换场所。明堂的构造(见图):中央为“大室”,四边设有“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四堂,堂的左右有“个”。天子每月轮流在各处处理政事。但是,没有闰月的地方,闰月在门里。据说这是因为“闰”字从门、从王。郑玄认为:“门”是路寝之门;在明堂之外有天子寝室,那里有很大的寝即路寝的门。



第四条是关于祭祀的执掌。

第五条是关于会同、朝觐的职掌。“将币”(赠币)的币,即璧、帛等。

第六,“大师”,即大规模战争时候的职务,古时候按照天时的吉凶行事,带上这方面的书与大师一同出征。大师是盲人官,熟悉典故的人物。

第七,是说如果迁都的话,带上经营都城的法典。

第八,“大丧”,即天子之丧。带上与大丧有关的法典,亲临牵引棺柩绑绳的现场。然后在丧礼上宣读“诔”。诔,就是生前经历。“小丧”,是

指卿大夫以下之丧。

第九的“射礼”,前面已经讲过了。

小史,大体上说是大史的助手,而且也是特别的职务。执掌诸侯国的记录,制定系谱,论定昭穆即宗庙顺序。昭穆与系谱有关,系谱的顺序是按照昭穆来排序的,不允许出现任何紊乱,有着重大的意义。另外,在有祭祀活动的时候,事先考虑并告诫王哪些事情必须避讳等等,这些是小史的主要职责。

冯相氏是历法官,保章氏是占星官。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职官被夹在小史和内史之间出现。古时候,在周代以前所有的职官都是世袭的,历法、占星都是由世袭官职掌的。直至周代大体上说虽然仍是世官,但是这种周以前的世官在周代制度建立时,变为了新设职官的附属官。其存在形式在冯相、保章二氏的情况中也有所反映,这一点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很可能,在周以前的氏族制度时代就有了这种职官,到了大史、小史成为主要官吏的时候才成为附属于他们的职位。关于这个问题,后面我还要详细谈到。总之,由此可以证明我的一个看法,即史官曾经是职掌历法、占星的职官。

内史的职责是制作并保存国法、国令的副本,考察政事是否与之吻合。同时还掌管会计,以及受理自下而上送达天子的献言。后世任命官吏时的授予诰命,在古时是授予策命,这也是由内史职掌。另外,他还负责书写关于俸禄的命令。“方”是方版,百字以下的文章书于方版。

关于外史之职掌。“外令”是王对畿外下的命令。“三皇五帝之书”,是有关比周代更古王朝的记录。当时,把自己的王朝与前二朝合为三王,认为再往前有五帝,五帝以前是三皇。所以“三皇五帝”是古时的王朝。“达书名于四方”的“书名”,郑玄注认为有两种解释:或是《尧典》、《禹贡》等书名,或者仅指文字。我看这里大概仅仅指文字而言。那个时代各地方有各自的文字,而按照中国的理想,应该做到车同轨,书同文。所以“达书名于四方”,应该就是要让四方天下都知道共同的文字。另外,虽说“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但是在那个时代使者也未必就是“以书”出行,而主要是传达周王的口头命令。

关于御史，同外史一样也被认为是《周礼》中不可信的一部分，这一点后面我还要讲到。“掌赞书”，职掌为天子起草诏书之意。“凡数从政者”，计算与政治有关人数之意。

以上是“五史”，也就是史的主要职责。此外，《周礼》所载各官都有府、史、胥、徒，相当于近代中国官吏中的胥吏、差役之类。他们因为没有正式的官吏资格，仅仅是书记、小使（徒）一类人物。其中的“史”都是低级书记，他们都称为史。《周礼》中所记载的“史”大体就是以上这些。

那么，《周礼》所载“五史”究竟有多少内容是正确的呢？不用说，要对此进行论证仅凭《周礼》本身的记载是不够的，何况即便在《周礼》中，关于“五史”的记载又是相对失实的。所以有必要参照其他文献进行考证。就其他文献有关“史”的记载来看，虽然与《周礼》相一致的地方很多，但是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其中最为不同的就是《礼记·曲礼篇》中有关“大史”的记载。《曲礼》曰：

>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

这与《周礼》所述基本构造完全不同。《周礼》中把所有的职官分为六类，大史是作为春官大宗伯之属官的。但在《曲礼》中的大史则为天官“六大”之一，与大宰等有着同等的资格；而另外如司徒、司马等则是作为“天子之五官”记述的。所以在郑玄的注中，将此解释为殷代的制度。但是若作为殷代制度的话，则有很大的疑问。《尚书·周书》的《顾命篇》被认为记载了周成王驾崩时的情况，当然《尚书》的记载即便是成王时的事情，也未必就是当时写的。《顾命》等作为今文《尚书》被认为是可信的，但实际上究竟是否为当时的记录还是个疑问。但是不论如何，《顾命》属于对周代比较正确的记录，其中可见太保、太史、太宗的官名，而且这种太保、太史、太宗几乎都是具有同样资格的职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礼》的大宗伯，在《顾命》中与《曲礼》一样也记为“太宗”。郑玄注将不合于《周礼》的内容一律解释为殷代制度，对此朱子也认为颇有遁词之嫌。

总之,这样的结论是危险的。不仅如此,《礼记·王制》中也见"大史",据此也无法将此官解释为大宗伯的属官。可见,《周礼》所载"大史"一职的实际存在,根据《尚书》的《顾命》、《礼记》的《曲礼》、《王制》等的旁证,是很清楚的;但是有关大史的地位则说法各异,很不一致。所以今天我们对大史地位仍不甚明了。

其次,关于大史所掌的职务,也是必须将各种记载对照考证的。首先从"掌建邦之六典"到有关于"约剂"的部分,这在《周礼》是很重要的内容,可惜无法找到旁证来证明。不过,大史在当时掌管书记即简策的职务,是有各种证据可寻的。《周书·顾命》曰"太史秉书";《礼记·曲礼》曰"史载笔,士载言";《王制》曰"大史……执简记"。但是,这些简策是否就是《周礼》中所见"建邦之六典"那样的书籍则不得而知。当时,"六典"、"八法"、"八则"这类完整的文件均备于朝廷,六官持其正本,大史保存副本的记载颇为可疑。总之,《周礼》所载大史职掌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难以置信的。或许可以考虑《顾命》所说的"太史秉书"的"书"就是这类文件,但我看那恐怕还是策命之书的意思。

关于历法。在其他的书中类似的记载屡屡可见,如《国语》中所见的"史",有很多被认为就是职掌此职务的。比如《国语·周语》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另外有关"瞽史"的记载还有很多。虽说这些记载实际上是否肯定与历法有关系尚不明确,但认为史与历法有关应该基本上是不错的。然而,像"闰月诏王居门"那样来自《礼记·月令》、《吕氏春秋·月令》的内容则另当别论,由于《月令》是周代末才结集形成的,故认为在周初这已经是与大史有关的职掌,则不可信。关于历法本身也是,看来"历"的颁布,特别是"告朔"应该是存在的。但是,是否像《周礼》所说的那样,在周代就已经向官府、都鄙正确地予以颁布则是有疑问的。不过,像历法中的"正岁年,以序事",即向人民教授时令、告朔等情况则是可能的。

关于祭祀时与执事共同卜日的情况,由于也见于其他书籍,应该是可信的。《礼记·王制》也说:"大史典礼……奉讳恶。"郑玄注认为:"讳"是先王的名字,"恶"是禁忌的日子。所以可以认为占卜祭日的记载与

《王制》是一致的。至于祭祀的时间，即掌管行礼之程序的记载，与《王制》的“典礼”相比较来看，应该是可信的。

关于“大会同”、“朝觐”是有其他证据的，在《仪礼·觐礼》中也详细记载了其与大史的关系，所以说是可信的。

所谓“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是有关军旅的内容，这也是有各种证据的。《曲礼》的“史载笔”大体上也是有关征伐、大会同的事情：即离开都城前往某地时的情况，是带上笔前往的意思。此外，对于《国语·楚语》“临事有瞽史之道”，古注曰“事，戎祀也”。可见，与《周礼》“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相一致。

至于“大迁国，抱法以前”，是没有旁证的。对于所谓“大迁国”，或由于周初在洛阳建筑成周，或因平王东迁等原因，就认为由于对这些周初之事早有预见而设置了此职务，则不可信。

关于“丧”的内容亦不见于其他文献。

至于“射事”，由于像是概括仪礼的内容，所以与《仪礼》有很多相一致的地方。

从以上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周礼》究竟与其他文献有多少是一致的，而且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了。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周礼》就不可信，其他文献就可信。像《礼记·王制》，在编纂成书特点上与《周礼》是相同的，仅仅成书时期略早于《周礼》而已。仅仅由于《周礼》的编纂时期较晚，而且其中加进了编纂者的某些意图，所以引起了学者的厌恶。直至汉初的文献，其编纂多是无意识的（虽然《王制》的编纂难说绝对是无意识的），这一特点应该是可信的。由此而论，凡是与这些文献相一致的内容，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信的。

那么，通过以上的考察，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周礼》中的“史官”颇有些不明确的地方。不过，《左传》中也有关于史官的记载。如晋的韩宣子观书于鲁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昭公二年）虽然，近代今文家认为《左传》、《周礼》都是刘歆伪造的，但是《周礼》所言大史职掌中却不见《易象》、《春秋》，也就是说即使两书都是汉代人编纂的，也应当出于不同作者之手。按《周礼》的记载，“易象”为大卜所

掌,与大史没有关系。鲁大史氏掌“春秋”之事还多少可做推测,但《周礼》的大史职掌中不含“春秋”则属不可思议。但是,这也许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一种证据:即《周礼》仅在于单纯的史料汇集,而并未进行人为的加工。总之,《春秋》中有关告朔、日期吉凶的占卜、大会同、朝觐之类的记载,看来是很自然的记录汇集,而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史官有计划的写作。至春秋时代,大会同、朝觐等活动尤为频繁起来,相应的记录也自然地出现了,这些记录后来就成为了历史材料,即《春秋》一书的底本。所以说这并非从最开始就是史官有条不紊的写作。《左传》中有不少将史官神圣化的内容,例如有关晋国董狐、齐国大史氏的南史和北史的“直笔”的说法,都属于史官发达之后的创作。就这一点而言,不如说《周礼》的记载更为恬淡,几乎没有《春秋》那种创作的现象,这反而倒显示了其可信的程度。

关于小史的“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等内容,看上去在当时是可能的事,不过没有旁证。所谓“有事则诏王之忌讳”,由于与大史的卜日有关,因而可信。大祭祀时的宣读礼法,虽然也很可能是事实,可惜也是没有旁证。

关于冯相氏、保章氏,应该是反映当时口头传说的。虽然没有旁证,但是作为流传至晚周的传说应该是可信的。由于冯相与保章音近,可能二者本为同一事,只是后来被分别传诵而已。《周礼》说冯相与历法有关,保章与占星有关,看来原本可能就是一回事。原本就有这种职务,可从《尚书·洪范》有关“五纪”的记载作出推断。尽管《洪范》“五纪”是否在周初已经存在还是个疑问,但无论如何可以认为《洪范》“五纪”观念的存在应该与《周礼》中冯相、保章的传说属于同一时代,《周礼》也认为这是很古的事情。

内史也一样,《周礼》的记载虽颇为详细,却多无证据可寻。但是“内史”的名称是比较古老的。《尚书·酒诰》曰:“太史友,内史友。”可见,内史、太史之官自古有之。《大戴礼·盛德篇》曰:“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襄公十年等亦见“内史”。《尚书·酒诰》的“内史”究竟是怎样的职务虽然还不清楚,但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曰:

“王命内史……策命晋侯为侯伯。”这与《周礼》“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是一致的。但是，记载一致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可信。因为即便不相信《周礼》与《左传》是刘歆所作的话，这两处记载也同为古文经，而以古文经证明古文是危险的。《左传》襄公十年有由内史选择一族世嗣的记载，而《周礼》则没有与此吻合的职务。但是，名为“内史”的职官一直延续至汉代，特别在秦代是重要的职务。即《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汉代分置为左右内史。后来又更内史名为京兆尹。所以，此官至少可由汉代上溯至秦代治京师的职务。另外，秦代官有治粟内史，正如官名所示是掌管谷物货币的。总之，可以明确的是：以内史为名的职官，在秦代单称内史者为治京师之官，称治粟内史者职掌谷货。进一步上溯而考虑周代内史职掌的话，像《酒诰》那么久远时代的情况虽不知道，但是可以想像在史官中，那些与天道无关，关系到天子膝下的土地人民、财政方面的事情，应当归为内史的职掌。如果是这样的话，《周礼》大史职务中掌六典、八法、八则等文件的方面，我认为也有可能属于内史的职务。

关于外史，《周礼》的记载看来也不太可信。但是所谓“掌书外令”，即职掌对天子直辖以外地域下达命令，则是可能的。《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季孙召外史掌恶臣。”恶臣，即放逐于疆域之外者。由此，可推想“外史”当是职掌疆外的职官。不过，《左传》的这一记载是有关诸侯之事，而非天子之事。但是如果内史掌天子的畿内，那么外史则有可能掌畿外，郑玄注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事实上有没有这样的职官，最终还是不清楚。至于“掌四方之志”及“掌三皇五帝之书”的说法，都未必可信。对于“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为“《三坟》、《五典》”，他依照的是《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而，今文、纬书都不相信三皇时代已经有文字的说法。所以《周礼》的《疏》对此有所调停，引《孝经纬》“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肉刑”。解释说：三皇时虽没有文字，但到了黄帝时已经出现了文字，所以至后来就记为“三皇五帝之书”了。“掌达书名于四方”亦无其他证据。当然，“名”即文字之义，以此书写简册是明确的，但这是不是外史的职务则无法肯定。总之，

就连外史这一职务的有无实际上还不清楚。

再来看看“御史”，御史的名称出现于文献并不甚古。也是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这是延续于秦汉的重要职官。不过，这并不是说在此以前未见有“御史”官名。战国时期秦与赵在渑池会盟时秦王让赵王鼓瑟，并让御史记录下了此事；赵蔺相如则针锋相对要求秦王击缶，也让御史记录下了此事。《史记·蔺相如列传》中可见此“御史”。其职务在《周礼》中，与大史、小史是同样的。今文派经学者认为：由于御史始于秦，所以《周礼》中的“御史”是刘歆擅自将秦官植入周代的。但是，对此也可以有另外的考虑，即古时候有称为“御事”的官。“御事”之官很早就见于《尚书·牧誓》，虽然不能认为这就是最早写入记录的，但这也应该是古时候确实有过的传说。“御事”还见于《大诰》、《酒诰》，这被认为在《尚书》中也是当初的记录。在《梓材》、《文侯之命》中也可以见到。王国维氏认为：由于这种“御事”多被记载为“邦君御事”的表达形式，所以御事当为诸侯的执政官。据王国维氏说：殷墟遗文中可见“御事”之名，而且由于“事”字与“史”字关系密切，所以古时候御事与御史是同一事(《释史》)。总之，御史、御事如果确实见于殷代及周初的话，其职官应该是很古老的，而今文学者有关秦汉始出的主张就不能成立了。从《汉书·百官公卿表》掌天子“图籍秘书”来看，这应该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职官。即相当天子中枢机关中秘书的位置。如此，御史可以说是史官中最早与政治有关系的职务。

综上所述，史官最初只是计算射礼数目的简单职务，后来掌天道、历法成为大史，又成了作为天子秘书的御史，治理天子直辖地的内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上这些史官当出现于殷代中期至周代之间。另外，外史的存在与否尚属可疑，而御史职官又由于在《周礼》的记载过于简单，也难以确定是否属实。

以上，论述了在古书所见的“史”的情况，此外见于古书的记载还有一些，毕竟也都与后代史官有着重要关系。比如《礼记·玉藻》的“左史”、“右史”，即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由此，言事者有《春秋》，记言者有《尚书》，历史被划分为了记言史与记事史。这对后世

历史的划分方法亦有影响。但是这种左史、右史的职务划分其实又是极为模糊的，周代职官中是否存在这种官职的划分，在《玉藻》以外没有旁证。仅仅在《左传》、《国语》中可见楚国的“左史”。总之，这种职务的区别，很可能是后人理想化的添加成分。

关于与史职务相近的其他职务，饭岛氏在自己的论文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论述，认为巫或瞽与史有着相近的关系，这是事实；而且认为“巫”的兴盛在前，“史”的发达在后，也是事实。巫主要兴盛于殷代，当时被称为贤相的巫贤、巫咸都是巫，这从《尚书·君奭篇》的内容可以推知。不过“巫咸”之称究竟是不是人名，或许巫咸一词指的就是“巫”之意，对此尚不清楚。总之，殷代“巫”很盛行，至周代“史”很盛行。大体上说，殷代尚处于宗教时代，周代则对此多少有所摆脱，而进入了神人相互区别，而同时又带有几分武人政治色彩的时代。这一期间，似乎是由从武事发展而来的“史”形成势力的时代。关于周代“史”的势力，王国维氏在《释史》中有着重要的见解。他认为周代的“史”中主要是“内史”的存在，又称为“作册”，而且“作册”的首领称为“尹”。即“尹”（[illegible]）字本来是手持笔的形状。认为手持中为“史”，手持笔为“尹”。此“作册”之语，见于《尚书》的《洛诰》、《顾命》，也见于《书序》的《毕命》。以往《伪孔传》中将“作”读为动词，释为制作简册，那是误读。将“作册”读为官名是孙诒让的发现，孙氏认为“作册”是内史的异名。金文中有“作册内史”的连记，也有“内史尹”与“作册尹”的连记。可以认为最早在周初的“史佚”亦称“尹佚”。以上论述表明：从殷商到周代，巫的势力开始转化为史的势力，在史之中大史等继承了殷代巫的宗教职能。

瞽的职能与史类似，这在《国语》中可以得到证明。只不过对此问题的研究，饭岛氏的观点是错误的。《国语》曰：“瞽献曲，史献书。”饭岛氏依据有些书中“曲”字作“典”而改字。但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典”在古时候并无“典故”那种抽象的意义，而是册放在几上的形状。若理解为盲人持“典”行走，则于理不通。不过，对于《国语》中将“瞽”与“史”二者并举的用例，的确值得注意。不论殷商还是周代，瞽虽然仍继续着瞽的职务，但后来史官的职掌逐渐扩展，开始承担起其他的职务来了，例如也开

始了职掌巫、卜、祝的职务，这是在周代所逐渐发生的变化。对此，汪中在《述学》的《左氏春秋释疑》中有着详细的论述。总之，史官本是处理文件的职务，但是出于例举前代往事、说明道理的职务需要，而成为了像瞽那样通晓前代往事的人物，大概就是因为利用了这种便利的条件，史官就自然地兼任起了其他的职能。

史官还逐渐成为了世袭的职务。开始时"史"是否为世袭虽然还是个问题，但是在周代史官的确已经成为了世袭的职务。他们一旦固定为史官之家，其职业就成为了一种神圣的事业。例如齐国的大史氏直书了崔杼的事实，被崔氏杀害以后其兄弟仍然继续直书，直至听任他们直书为止。这一史话反映的就是史官世袭，以及被视为神圣职业的情况。

另外，饭岛氏的研究中称"史"为一种僧侣，这可能是受到了其他古老国家史之职掌管宗教的严重影响，他的看法恐怕不妥。史的职务类似僧侣的情况是在巫兴盛的殷代，周代的史只有大史包含了巫的职能。大体上说史是从武事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周代他们决非类似僧侣那样的存在。内史、御史则完全是执政者的秘书职能，当时的权力者大多重视军事，军事以外则重视农业，而对那些与宗教相关的事情则逐渐地不那么予以重视了。

第三章 记录的起源

在中国谈到记录的起源,通常虽然首推《河图》、《洛书》,但大体上说那是纬书的思想出现以后的说法。不过,像《论语》这种比较可靠的书里也说到《河图》的存在(《子罕篇》),《礼记·礼运》中也有《河图》。另外有一种看法认为《尚书·洪范》即《洛书》,但这种说法大概是纬书的思想出现以后才形成的,或者说是纬书的思想出现以后掺入的内容。

说到现存的古代记录,有龟板、彝器、刻石三种。若论其中最古者,确切可知的当为龟板。彝器之中,著录金石的书中有所谓"夏器";在刻石中也有所谓"禹碑"。"禹碑"完全是伪造,彝器中是否真有"夏器"也不清楚。确实可信的文物中,彝器是从殷代开始有的,龟板也同样是殷代的东西,不过龟板之中有比彝器更古的东西。龟板是最近发现的,仅仅是二十年前的事。这是古时候用于占卜的东西。这种占卜存在于古代的情况,在中国的记录中,明确可见于《尚书·洪范》,在《周礼》中对占卜的方法有着详细的记录。大体上说,是用墨在龟甲上做记号,然后灼烤龟甲,再根据灼出的裂纹进行占卜。这种裂纹叫做"兆"或"坼"。关于裂纹的种类见于《洪范》,分为五种:雨、霁、蒙、驿、克。《周礼》(《春官·太卜》)将这种兆分为玉兆、瓦兆、原兆的三兆,并且说兆"体"皆百二十,兆"颂"皆千二百。

注解《周礼》的人认为玉兆、瓦兆、原兆的不同在于卜兆时代的差别,玉兆是帝颛顼、瓦兆是帝尧、原兆是有周一代使用的方法。但是,在这各种方法中像殷商那样卜法全盛的时代却没有相当的位置,看来这不过是注释者的想像而已。当然,所谓玉兆、瓦兆、原兆,是各种兆纹与玉的裂纹、瓦的裂纹、土地裂纹相似的意思。《周礼》认为任何时代三兆都是

“体”一百二十，“颂”一千二百。注疏家为了将此内容与《洪范》的记载相调和，就把《洪范》的兆纹分为五种，即将一百二十做五等分，分为五个二十四。但是《周礼》中并没有记载《洪范》所记的五种兆纹，很可能当时有着各种不同的传说方式，不必强求一致。然而，从《周礼》所传我们可以知道卜法有两项：一是根据“兆”进行判断，一是不但有“兆”还有“颂”。

关于“颂”，注疏家曰：“颂，谓繇也。”所谓繇，就是对兆纹进行判断的语言。今天，具体记载这种“繇”的书已经没有了，但是从古书中残存的极少的繇辞来看，可能就是像《易》的彖辞、爻辞一类的文字。这种古繇辞曾见于多种书籍中，丛书《竹柏山房十五种》中的《古书拾遗》对这些古繇辞有所汇集。然而《古书拾遗》的古繇辞中并不都是卜法的古繇辞，比如混入了筮的文字，颇为杂驳。但其中确实有卜的繇辞，根据这些古繇辞可知，古繇辞大概是押韵的，像是很便于背诵的文字。今天我们看到的龟板文字中并没有这种古繇辞。占卜之际，将所命于龟的主旨刻在龟板上，刻上所求之事后烧灼龟板，于是出现兆纹，再对兆纹进行判断；此时掌卜的人也许是根据所记忆的繇辞做出判断的。按《周礼》的记载，掌卜的最主要官员是大卜，大卜不仅掌卜，也掌筮和占梦，其手下还有分别执掌具体事务的卜师、龟人、華氏、占人。

龟板文就是今天文字的起源，这一点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是对于这种文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目前还无从考证。但是大体而言，关于卜筮的记录可以说是以后所有记录、书籍的最大的根源。对此，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考虑：

一般来说，关于今日我们所知道的文字，古时候有称为大篆即籀文的文字和称为古文的文字。对此，王国维氏在《史籀篇疏证》及《汉代古文考》中有过精细的研究。按照王氏的观点，有关周代的籀文和古文，以往一般认为古文早于籀文，但实际上这看法是不对的。籀文是从周代通行至秦代，从而演变为今日之小篆的文字，而古文是通行齐鲁等山东各国的文字，二者是同时使用的文字。对于为何称为“籀文”，王氏也进行了缜密的考证。按照他的考证，关于“籀”，以往的说法认为，由于制作这种文

字的周宣王大史名叫“籀”而得名。这种观点早在《汉书·艺文志》已有记载,被认为可能是从刘向、刘歆开始的看法。《说文》的许慎《序文》中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然而,王国维氏推翻了这种说法,提出了“籀”并非人名的观点。即《汉书·艺文志》所载《史籀》一书,很可能是本书的开篇首句为“大史籀书”,因此采用来做了书名。至于“籀”字,《说文》曰:“籀,读也。”又曰:“读,籀书也。”古时籀、读二字同音同义。而此“籀”即“读”之义的观点,又并非始于王国维,是段玉裁首先提出来的。许慎《说文·序》曰:

(廷)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

段氏对句中“讽籀书九千字”,不是按以往学者那样读作讽诵“籀书九千字”,而是将“讽籀”联读,解为“讽诵”之意。认为此“籀”字在其他古书又写作“擂”、“抽”、“紬”。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中作“紬”。所以段玉裁也认为“籀”是读书,读不仅是读音而且有抽引意义进行查阅的意思。总之,王国维氏认为:“大史籀书”不是“大史籀”所作之“书”,而是“史”所应当读的书之意。王氏为了对此进行论证,还指出《周礼》的“大史”、“小史”等职掌中也有读书,而从《仪礼》的《聘礼》、《既夕礼》也可以看出读书确实是史的职务。

根据以上段玉裁、王国维的研究,可知“史籀”就是大史所读的书。然而,这种大史所读的书最初又是怎样的呢?王氏没有明确提到。但是,籀与读、繇同义同音这是一个线索。《左传》中对“卜”、“筮”都称为“繇”,但《说文》将“繇”写作“籀”。又《左传》的服虔注认为:“繇,抽也。抽出吉凶也。”总之,古卜法就像抽神签,根据龟板的裂纹,抽出吉凶叫做“繇”,由此可证“繇”与“籀”相同。对此,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证。如《逸周书·世俘解》:“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同书《尝麦解》:“作筴许诺,乃北向繇书于两楹之间。”(按王国维氏的解释“作策”是内史的异名。)这两条史料里的“繇书”都是读书或籀书的意思。如此看来,不仅可以明了繇、读、籀的意思相同,而且由于其中最初发展起来的是卜筮,所以

还可以知道卜筮的繇辞出现最早,抽出繇辞叫做“籀”,这是史官的职务,由此出现了最早的辞典《史籀篇》。大体上说,可以认为记录的起源是由卜筮的“繇”发展起来的。

但是,卜筮之繇最初并不是卜筮时的记录,而是一种讽诵的读物。由于后来这种读物中记录的内容多了起来,出现了卜筮以外的用途,最终形成了记录这些内容的《史籀篇》。因此,虽然可以说《史籀篇》是完整辞典的起源,但是又未必就是文字的起源。文字比这更早,在“繇”以前,是为了刻成命龟的语言而使用的,即今天的龟板文。总之,可以说繇辞是一种被背诵下来的文字,如同今天的《易》那样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使用的文字,但是由于命龟的事情每次都在变化,所以要把命龟之事记录下来,最后的判断就是依据所背诵的这些繇辞得出的。

综上所述,大体上可以断言文字记录在中国很可能产生于殷代,而且可以说这种文字记录的产生毕竟与“卜”关系密切。对此,《周礼》中有“菙氏掌燋契”的记载。关于“契”字的意思,《周礼》注中举出了两种解释:一是为了吹火而在龟甲上钻眼用的契龟之凿说;另一是认为灼龟时用木灼烧,所以契是灼龟之木。但是,无论哪种说法都是在龟甲上钻眼而用木灼烧之意,则是无疑问的(日本的卜法同样也是用波波迦木灼烧)。总之“契”字是灼烧龟甲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被认为是殷先祖的人,叫做“契”。古时候的种族有用代表自己文化的东西指代自己祖先的风气。周因为是重视农业的种族,所以称自己的祖先为“稷”。表示“年”的字,周代用从“禾”的“秊”(年)字;殷代由于重视祭祀,所以使用从“示”的“祀”字。可能是因为殷代重视宗教,所以用其中最重要之灼烧龟甲的“契”字命名自己的祖先。在日本也一样,卜部氏祭祀的神叫做“波波迦木”。这是由于使用波波迦木灼烧鹿骨进行占卜,所以要祭祀波波迦木。

不用说,周代之所以产生“大史”的职掌并不仅仅是出于卜筮的需要,《史籀》这类书适用于各种场合。从这种情况来看,此书无疑也包含了卜筮以外的内容。在文字中,就像史官由武事发展而来一样,产生于武事的字很多。而且当时是狩猎的时代,是畜牧的时代,所以在金文中表现

家畜的文字和表现武器的文字都是从很早就存在了的。《史籀》这类书很可能就是对这样一些内容的汇集。不过，原本《史籀》的文字大多还是应该看作是来自卜筮的内容。

此《史籀篇》形成之时，其中似乎已经包含了若干文字的解释。这一点由《说文》为解释籀文而引用的《史篇》（即《史籀篇》）中含有文字解释可知，总之《史篇》已经具有了辞典的体例。这些书在各种经书尚未问世之前业已存在，但是由于没能流传下来所以难得其详；对于那种书在今天可资想像的也只有《易》了。《易》大体上是筮书，而筮一般认为是继卜之后发展起来的，所以筮中使用了很多用于卜的文字。例如"贞"字就是卜与贝的组合；又如"悔"字，在《说文》所引《尚书・洪范》中作"𠧪"，也是从卜。此二字都是来自卜法的文字。所以，可以说《易》的彖辞、爻辞中也有借用卜之繇辞的情况。如同《史籀篇》乃由卜之繇辞发展为辞典那样，应该说《易》也有着筮的辞典的性质。拉克伯里[①]所谓《易》乃古代中国文字辞典的观点，看来不能轻视（日文版《古代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论》p19）。

彝器中现在所知道最早者为殷代的东西，据说有夏代的东西，但那不可信。至于彝器铭文也是，最早不过一字、二字，或者三字，也有介乎字与画之间者，稍稍有些文章体模样的恐怕已经是殷末的东西了。那么到底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彝器上留下了铭文，用此进行记录的呢？关于彝器的用途，阮元的《商周铜器说》（《揅经室三集》卷三）和龚自珍的《说宗彝》（《定盦续集》卷一）中有过详细的论述。后者，尤其对用法有着详密的论述。龚自珍将彝器按种类分为：祭器、养器、享器、藏器、陈器、好器、征器、旌器、约剂器、分器、赂器、献器、媵器、服器、抱器、殉器、乐器、儆器、瑞命等十九种。其中祭器不用说是祭祀之器，今日出土的铜器多数是祭器。养器是赡养老人所用之器。享器是燕享宾客时的用器。藏器是家族世代相传并藏于府库，用来表示门第的器物。陈器，平常藏于府库，有事时也

① 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T. de Lacoupérie，法国人）19 世纪末，出版《古代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论》一书，认为中华民族系由巴比伦之巴克族东迁而来。

就是在仪式的时候拿出来陈列之器。好器,有宾客时的馈赠器物。征器是外出时携带之器,与陈器、享器相对而言。旌器,是立功时为了将自己功劳传给子孙所作的刻上铭文的器物。约剂器,是诉讼时刻上有关事情并予以传达的器物。分器,封同一族的成员为诸侯时,作为一家的重宝分开的器物。赂器,春秋以后遇到战争,弱者向强者赠送的贿赂,重要事件之时送上一族的重器。献器也大致相同,小国送给大国、位低者送予位高者的器物。媵器,是嫁女时所带上的,作为与异姓誓约的器物。服器,随身携带之器,大者如车马具,小者如佩饰。抱器,亡国逃跑时所带上的祖先传下的重器。殉器,人死时一同埋葬的器物。乐器,八音中最贵重的金器,刻有铭文,今天仍有很多保存了下来。儆器,为对人进行告诫所制作,有以器形也有以铭文为告诫的。以上各种器物是制作者自身所使用的,但是瑞命则稍有不同,是古时的器物后来偶然获得,作为保有天下或保有国家之吉祥的象征的器物。以上的这种分类,到了后来与事实上的用途相脱离,成为了学术上调查研究的对象,这当然另当别论。

以上分类是对阮元观点进行推衍的结果,虽说区分细致,但其中也有缺少适当实例的。阮元在《商周铜器说》的内容都是举实例予以划分的,其中最先举出的是“分器”中的器物,虽说今天已找不到遗存,但在《书序》中有《分器篇》,曰:周武王分封诸侯时颁发彝器,于是作《分器篇》。此说虽然由于今天的《尚书》并没有《分器篇》所以不太清楚,但是在《左传》定公四年条中有周初向鲁、卫分发彝器的记载。而且阮元所举例子之中,有相当于龚自珍所谓的“享器”、“好器”的东西,即诸侯大夫等上朝受享时所赐予的重器。作为例子阮元还举出《左传》庄公二十一年周王向虢公赐爵,昭公七年晋侯向郑国子产赐鼎之事。其次阮元所记“赂器”,这一分类也包括了龚自珍的所谓“献器”,并举出了《左传》中很多关于赂器的例子:成公二年齐侯向晋赠予土地之前赠送铜器;襄公十九年鲁公向晋六卿赠鼎;成公十年郑国向晋赠钟;襄公二十五年齐人向晋赠宗器;同年陈侯向郑赠宗器;昭公七年燕人向齐国的赠送品;昭公十六年徐国人向齐赠铜器;襄公十一年与《国语·晋语》中郑伯向晋赠铜器。另外,还举了一些龚自珍的分类中没有包括的实例,如大国讨伐小国时,收

取对方国宝:《左传》襄公十二年鲁国讨伐郓时收取了那里的钟;《吕氏春秋》(《审己》)中所见齐国攻鲁国时的求岑鼎。此类情况还有一些阮元没有举出的,如《孟子》(《梁惠王下》)可见齐搬走燕的重器;《国策》(《燕策》)乐毅在对燕惠王的报告书中说获取了齐的重器。另外,阮元所举出的还有相当于龚自珍所谓“儆器”的器物,如《礼记·祭统篇》有孔悝的鼎铭、《左传》昭公三年谗鼎铭、昭公七年正考父鼎铭,以及《国语·晋语》所见史苏所言商衰之铭。然而,这一类的器物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阮元举出的例中都是有铭文的器物,其实还有些虽无铭文但可以由形制表现用途的器物。比如孔子至大庙所观欹器,此欹器在空虚时倾倒,注水至中位则端正立起,水满时亦倒伏,这是一种表示劝诫的器物(《孔子家语》、《荀子·宥坐篇》等)。另外,在《大戴礼》中有很多劝诫的铭文,他举例如书中《武王践阼篇》曰:武王平生所用器物、住房里全都刻有铭文、书写有训诫的警句。《大学》中的汤盘铭文也属于儆器一类。至于属于“旌器”类的,即关于铭刻功绩的器物,《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礼至杀国子时,将此事铭刻下来;襄公十九年季武子用从齐获得的兵器制钟,并将此事铭刻下来。再就是关于“约剂器”,他举例如《周礼·秋官》的司约将约剂书于宗彝,又举一实例如《左传》昭公六年及二十九年晋国、郑国将刑书铸于鼎之事。又举了关于天子社稷与铜器共存亡、共轻重的例子(这些可以说是“赂器”、“献器”没有发挥其作用的例子)。如武王灭殷时,迁九鼎于洛一事、《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问周鼎轻重一事、《战国策》所载秦举兵时向周要求传世九鼎等。阮元所举均为见于古书之例,此外今日遗存器物中也存在有龚自珍所举各类器物,龚自珍所述并非全是空论。而且也有一些古书作为重要器物而记载的,但是没有留传下来的器物。比如像约剂器,看来是古时重器,但并没有留存至今天。又如儆器,从古书上看有很多记载,但今天保存下来的却很少。罗振玉氏收集了两千种金文拓本,其中属于儆器的仅有“取佗人之善”一则而已。关于最后的“瑞命”,阮元也举出了很多例子。汉以后,铜器出土渐少,因此一旦有出土就被视为“瑞祥”。如汉代因汾阴得宝鼎,而改年号为“元鼎”,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种情况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唐代,至宋以后就成为了骨董收藏,并

且作为学术对象发展为考古学研究了。无论如何,铜器中虽然也有无铭文的用器,但毕竟因为铭文的存在而起到了记录的作用,而且遗存至今的器物,应该就是古代记录的有力证明。彝器被用作记录的起源大致即如以上所述。

下面再来谈谈刻石。现存的刻石中目前可以肯定为先秦文物的是石鼓。石鼓的发现是在唐代,出于岐阳。自那以后围绕石鼓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怀疑石鼓是否真的古已有之,其中最著名的是金人马定国的观点,认为石鼓是北周宇文周时期的东西。清代考古学者中也曾有人对此表示赞成,但现在很少有人相信这一观点。一般认为石鼓是周宣王时期的猎碣,而且对此又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或认为是周成王时期之物,或认为是秦文公时期的,虽有几种观点但大体上认为是三代时期的器物,这一点是一致而明确的。至于石鼓的文体、文句形式类于《诗经》,与《大雅》、《小雅》相似,按说其书体应当为籀文才是,但是由于与《说文》所载籀文不同,所以也有人对石鼓的真伪表示怀疑,但大体而言其字体为籀文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籀文也有书于竹简与刻于石料、铭于铜器之不同,这种不同多少也会造成笔意的差别,所以将《说文》那种书于竹简的文字与刻石文字相提并论是不妥的。石鼓文字的笔画相对端正,虽说更近似于秦的篆书,但如同前面谈到的罗振玉氏、王国维氏的观点那样,还与地方性有关。原来周的地区所使用文字是籀文,后来秦继承了这种籀文形成了篆书,可见周的金文从初期开始就有着文字端正的特征,近似于篆书。文字不规整的情况多发生在齐鲁即山东,亦即周地区以外的周边地域,不能将齐鲁出土的多数古文字看作是宗周的字体。石鼓文所以与篆书相似,因为这是宗周的器物。加之,唐初人们已经认为石鼓是非常古的器物了。这种观点可见于汪中的《石鼓文证》,他反对定石鼓为北周之物的看法,认为唐初与北周之间虽经过隋代但毕竟相去不远,断无将宇文周之器物误为古代器物之理。

石鼓之外,被认为是周以前刻石的还有坛山刻石,一说为周穆王时所刻,此刻石仅有"吉日癸巳"四字。但是,不论字体还是句型,是否为三代器物都很可疑。况且即便是真品,仅仅有四个字也缺乏作为记录的价值。

另外,据说云南地方有异形刻石,但所刻内容是否为文字也无法肯定。总之,先秦刻石可以说仅仅有石鼓一种。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发现了一种与彝器、刻石之类略有不同的器物,即鉨印。说起来,这是一种介乎于彝器与刻石之间的器物。大多为铜制,也有玉制的、陶制的。鉨印被认为可能在周代已经存在,其中甚至有殷代的东西,尚不明确。现存的鉨印即便是三代之物,大概也不过是周末的东西。此外还有封泥,就是封缄文书时,把泥弄成圆形用来粘贴,再在泥上盖印。这种鉨印、封泥虽没有很长的文句,但是在极少的字数中,可以判断其作何用途的情况却很多,由极少的文字判明其用途这一点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还有钱币,有文字的那些青铜货币,虽说称不上有彝器那种性质,但也可以说是与鉨印、封泥具有同样价值的一种记录的资料。

今天,从文物可以知道的古代记录的情况,大体不外以上这些,即龟板、彝器、刻石及鉨印、封泥、钱币等等。至于这些文物在当时是怎样成为记录的,在今天还有没有作为记录的价值呢?对此以下一段古语能够作出说明,即《毛诗·鄘风·定之方中》的《传》曰:

> 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这一段文字的出处并不明确,孔颖达《正义》也认为这原本可能是一段成文。然而,无论如何这段文字很好地说明了记录的起源,尤其是对记录来自于口传这一点是很好的说明。其实,对今日现存文物的说明,也不外乎这里所说的“九能”的范围。其中,“建邦能命龟”又见于《周礼》大卜的内容,现存龟板文中也多有这种命龟的文辞。“田能施命”很接近石鼓文,但石鼓文记录的是狩猎,而不是那时的命令。“作器能铭”,正与现存铜器中的多数情况相合。“使能造命”,作为实例可见于《左传》成公十三年,就是晋与秦绝交时,吕相的绝秦辞命那样的有名的文辞。众所周知,古时候重视的是使者的口头辞令,文书只不过是使者的备忘录而已,

使命是由口头传达的。“升高能赋”的实例不如说在日本更多些，就是神武帝登葛城之嗛间丘时宣诏的那种文辞，另外在《万叶集》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文辞。“师旅能誓”，多见于《尚书》等文献。“山川能说”，即今日《禹贡》、《山海经》、《周礼》中的“职方”一类。“丧纪能诔”，仍属于口述。“祭祀能语”，即祭祀时口述祀词、以及能够宣读程序之意。总之，对于那些尚存于今日的文物以及《六经》中所载古代的情况，由这“九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第四章　史书的渊源

一、史书的材料

以上所谈到的都是作为古时记录的存世实物，那么当时所记录下来的仅仅是这些吗？而且除了记录以外就没有可以成为历史材料的东西了吗？当然不是。可以说存世的大部分历史材料都是在此以外的。前述“九能”之中也是，属于现存材料的只有“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就其他几种而言，当时的材料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在那些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材料中有简策，此外还有讽诵等口头流传下来的材料。相对来说，最初由言语传下来的材料占了大部分，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简策材料。总之，流传至今的大部分历史材料，都属于对简策的传抄，或是将当时语言记载于简策上的材料。

可是，今天存世的、或由传世书籍传下来的原始材料，又是通过怎样的方法而成为今天书籍的问题，则是研究古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课题。对此，以往的学者如汪中、龚自珍、章学诚等也有过研究。汪中的观点在《左氏春秋释疑》中有所阐述，即通过对《左氏春秋》成书原因的探讨，阐述了书籍形成的历史。汪中认为《左氏春秋》一书，即是《礼记・玉藻》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中的左史所作成的。左史写的虽然是人事，但《左传》中也有人事以外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五类，即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这五个种类，本来是各有司掌的职官，按《周礼》的说法掌天道的有眡祲、冯相氏、保章氏，掌鬼神的有大祝、丧祝、甸祝、司巫、宗人，掌卜筮的有大卜、卜师、龟人、菙氏、筮人，掌梦的有占梦。如此，既然

分设有不同的职官,那么各种司掌为何都成为了史官的记录呢?汪中认为这是因为周东迁以后职官失守,特别是列国的职官都不齐备,于是就出现了史官兼司各职的结果。他还指出了这些职务与史官的关系,认为就这样各种职务在周东迁以后落入史官之手,后来又一变落入了儒官之手。也就是说,在原本有关以上各种职务的记录之外,还有着各种成为后来记录素材的职务。即《诗》、《书》、《礼》、《乐》这类按《周礼》所载属于大司乐的职务,以及《易象》、《春秋》这类按《左传》所载属于大史的职务。总之,后来形成的《六经》之中,有四种属于大司乐、两种属于大史的职务。再到后来职官衰微,此两种职官也都消亡了,《六艺》的学问也就都转入儒者的手中。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说《六艺》皆周公旧文,并且都是"史",这"史"就是记录的意思。他认为《六艺》是在孔子修订以后才形成为今天的样子,本来都是史的记录。但是他对于如何从出自各种职官而最终演变为"史"的过程没有明确的解释。

对汪中的观点进一步给以比较极端解释的是龚自珍,他在《古史钩沉论》(《定盦续集》卷二)中有所论述。他认为:史在周代世官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史外无语言,史外无文字,史外无人伦品目。史是周初史佚以来重要的官职,在流传至今的书籍中,《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诸子"是周史的小宗,或支孽。如此他对《六经》、"诸子"出于周史的情况逐一作了解释,根据《汉书・艺文志》所划分《六经》、"诸子"的名称,对于这些书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番论述。他的论述虽说过于简单,但是毕竟恰当地把书籍与"史"结合了起来。《汉书・艺文志》对直至西汉末出现的书籍作了总括和分类,是极为重要的著作,是以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为底本编纂的。刘向父子对古书进行校定,并作了各种改编。今天我们认为是自古传下来的那些书籍,虽然往往被视为三代以来的记录,其实没有早于西汉末刘向父子校定、改编以前的书籍。然而,无论如何对于直至西汉末出现的各种书籍,刘向父子都进行了分类,并且对哪些书本来是从哪一种类的记录演变而来的传承系统进行了论述。一般来说,我们也只是由此才能知道古代书籍的渊源。因此,龚自珍的观点毕竟也是根

据刘向父子的分类,将书籍与“史”予以了结合而已。刘向父子对书籍的分类方法以及对书籍源流的论述是极为慎重的,对于古代职官中出于史官者,他们认为在诸子中不外道家、数术两者,并未说其他书籍皆出于史官。本来,《汉书·艺文志》就是刘歆《七略》中的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略》、《术数略》、《方技略》的内容,其中只有《诸子略》的道家、术数两者出自史官。对此,龚自珍认为《六艺》、《诸子》皆出自史官,而刘向等仅以道家、术数两者出于史官的观点是狭隘的。然而尽管如此,毕竟这一观点与汪中等人的看法大体相同,认为其他各种记录及其他材料也都是出自史官之手而流传至今的。

值得考虑的是,古代官吏职掌的材料,在其成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各个种类书籍的过程之中,是有着各种变迁的。当然其中也有将原始材料直接载入“六略”的书籍,但是也有经过各种变化而形成的书籍,其中尤其是成为今天所谓历史的书到底经过了多少变迁就是个问题。不用说,刘向父子对历史尚未作为一种特殊类别的书籍予以足够的认识,因此今天所见到的“六略”中根本没有“历史”这一部类。到了《隋书·经籍志》的时候,在书籍的分类中已有了“史部”,不过这一分类并不始于《隋志》,而是形成于六朝时期。总之《别录》、《七略》的时期尚无“史部”,今天明显属于“史部”的,比如《史记》在《六艺略》中是归入《春秋》部的,《国语》、《战国策》等也同样列入《春秋》部。而近年来被学者们列入史部的《逸周书》那样的书籍,在《六艺略》中则归于《书》部。如此,当时刘向父子对“史部”书籍虽说并未予以充分的认识,但实际上当时已经出现了以“史部”为目的而写作的书籍即《史记》这样的作品。总之,今天我们考察书籍的出现,特别是“史部”书籍出现的经过,无非是对最初的材料,即从“九能”之士在三代时期创作的材料(也包括存世金石等之外的语言、简策等材料),是经过了怎样的阶段而发展成为出现了《史记》那样著作的过程,作出明确的解释。

然而,为了考察“史部”书籍的形成,首先有必要弄清“六略”所载书籍,特别是龚自珍也谈到的《六艺》、《诸子》的书籍究竟是按照怎样顺序汇集起来的问题。即使在“六略”之中,除《六艺》、《诸子》二略以外也还

有诸如《诗赋》，即“九能”所谓“升高能赋”那样的作品，又有《兵略》、《术数略》、《方技略》三类，大体上属于“术”类的书籍。总之，都是残留至今的古代专业职掌的书籍，说起来这些古代各种职官的材料，正如汪中等人所云，是由史、儒等未加润色原样不变地传承下的。只有《六艺》、《诸子》在传承之中是加进了著者意见而作过编修的。所以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就把《兵略》以下的三类材料放入八《书》中，记载了各官职掌“术”的大要以及“术”是以怎样方式实行的等等，而且在各著者的《传》中还时常记载有诗赋等。除此之外，其他作为历史最根本的、有关人事变迁的部分是与《六艺》、《诸子》相关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将《汉书·艺文志》对《六艺》之外的诸子所分的“九流”分为“六家”，对其要指作出了论述。此六家要指虽大体相当于《汉志》的《诸子略》，但合并了《六艺略》以及《诸子略》中的儒家部分。《史记》的作者也认为《史记》就是汇集以上诸家所使用的各种材料而成书的。因此，虽说有必要对太史公所云“六家”或者“六略”的《六艺略》、《诸子略》的形成由来进行考察，然而与其按照太史公的“六家”，不如像刘氏父子那样将《六艺》、《诸子》相区别予以论述更为方便。

二、《六艺》的形成

关于《六艺》历来有所争议，例如公羊学者，有认为《六艺》都是孔子所作，也有认为《六艺》皆周公所作，孔子只是恐其将亡而予以编纂保存而已。但是，无论主张周公者，还是主张孔子者，都认为《六艺》的作者出自一人，而且直至刘向父子时期，《六艺》的流传没有经过任何增删，不承认书籍形成的历史。例如，《六艺》中关于制度的内容，当然不都是周公、孔子所制定的，而是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形成的。即便认为周的制度大体是由周公所建立，那么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也不是原样不变的内容了。即使是经过孔子编纂的话，当然也不再是孔子当年编纂的样子了。所以，下面就来考察一下《六艺》各自不同的成书过程。

《易》

先来看看《易》，龚自珍等人认为这是卜筮之史，章学诚也认为是古代卜筮制度的遗存。关于《易》的作者也是，古来有说八卦是伏羲所作，又有说文王制作六十四卦的。大体上说，如果认为有卜筮之史的话，而从来认为比作为《易》成立缘由的“筮”更为重要的“卜”在当时没有保存下来，那么认为这是孔子的编纂物，就不能不说有很大失误了。当然存世的《易》是否为孔子编纂还是个疑问，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流传的筮书中，加入了当时新兴的数学，是作为一家之术创作的作品。至于没有形成卜类书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卜在当时作为官吏并未失其职守。由于卜受到极大的重视，所以直到汉代这一职官仍旧保存着。相比之下，很可能由于筮并不太受重视，而且较易附会于数学，所以反而流行于民间，成为了不再作为专门职官之儒者所玩弄的道理之术。《易》是作为一家之术附加了有关“卜”的事情，掺入了各种成分而完成的作品，已经不是从前筮法的原样了。“六略”的术数中可见到的仍然是有关卜筮的书，在刘向父子的时代这些书还见得到，但是今天已经失传了。这些都应该是三代职官所掌卜筮法的遗存，而《易》正是由其中一家之言改编而成的，因此大体上说是与诸子同样性质的作品。

《书》

关于《书》，也有着今文、古文等的议论。现在，学者认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作为经学来说是从孔子传下来的准确无误的作品，并认为是以《周礼》所谓“三皇五帝之书”所编纂而成的。其实，《书》也是经过变化而形成的。关于《书》的来历，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篇》中亦有所论及。根据他的看法，本来在史官那里有着完整的记录，抽出其中重要内容另编辑为一篇就成了《书》，因此他认为《书》乃深得历史编纂精髓之作。不过，这是他理想化的观点，《书》这种从古至今的成书形式也只不过是他的想像而已。现存《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典、谟、贡、范、训、命、誓、诰等几类，这与通常的“九能”种类相比照而言的话，“田能施命”当为训、

命,“师旅能誓”当为誓、诰。总之,九能之士所为虽说可以推测为《尚书》的材料,但很难说从最初就已经书于简策了。训、命、誓、诰之类,大体上可以说是“记言之史”的主要内容,就其中现存者而言:诰类的一部分或许可认为曾书于简策;誓类可认为既有书于简策者,也有口耳相传者;像训、命一类,今文《尚书》中只有《文侯之命》,《文侯之命》或许可认为曾书于简策。但是《书》的大部分都不是由简策而来的。何况像典、谟、贡、范之类,其实都是后代编纂的内容。其中像《禹贡》虽然可能相当于“九能”的“山川能说”,但是其他的篇章全都是后代编纂的。大体上说,虽然学者从来都认为《尚书》来自简策,实际不然。如果认为其中有出于简策的内容的话,充其量也只是训、命、誓、诰这些属于周代的一部分,即《尚书》中最初形成的那部分内容,此外的内容毕竟都是《尚书》学派为了自身的形成,附加各种周以前内容,或补充周以后的内容,有其编纂顺序的作品。总之,可以说《尚书》是儒家在与其他诸子对抗中为了显示自己有世传的系统而炮制的作品。

《尚书》与下面要介绍的《诗》,都是出于同样宗旨编纂而成的,在其编纂体例上这种主张也是一贯的。此二书都是由于儒家作为自立于诸子的一家,为了能够成为最重要的经典的目的,按照一贯主张而编纂的作品。现在的《尚书》,即便完全不采用伪古文,也都采用了今文以及《书序》,这在一般经学家来说是共同的做法,但对此历来是有所疑问的。而这又是与《尚书》最后的几篇有关,清朝公羊学家中有人曾明确地提出过这一疑问,即刘逢禄[1]在《书序述闻》、宋翔凤在《过庭录》中《尚书谱》等所论述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且《尚书谱》的观点又为庄绶甲所接受。刘逢禄对今文《尚书》中末尾的《费誓》、《文侯之命》、《秦誓》诸篇抱有疑问,认为由于《费誓》以后诸篇记有诸侯国之事,所以《费誓》乃为周代变风的开始。《费誓》是记载鲁国伯禽征伐徐淮夷的篇章,所记乃南方夷狄扰乱中国之事,认为这记载了春秋以后夷狄兴盛的萌芽,还特别指出:孟子曰

---

① 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一字申甫,号思误居士。庄存与之外孙,师从舅父庄述祖之学,以春秋公羊学闻名。

“《诗》亡然后《春秋》作”，刘逢禄自己则欲言《书》亡然后《春秋》作。关于《费誓》在《书序》中是位于《蔡仲之命》之后的情况，他认为由于蔡是被夷狄楚所灭之国，这就意味着《费誓》的写作是出于与《春秋》寓王于鲁具有同样的意思。关于今文《尚书》在《费誓》之后插入《吕刑》的情况，他认为吕乃姜姓本家，是齐国等的同姓。《吕刑》文中说制作刑罚者乃吕氏鼻祖伯夷。《吕刑》中记载的“三后”，即禹、稷、伯夷三人，而且这三者都是作为上古最初有功德之人而列举的。然而，一般认为“三后”是指禹、稷、皋陶三人，而创刑罚之鼻祖应当是皋陶；但《吕刑》中却举出伯夷，而不载皋陶。他认为这是由于姜姓乃周的外戚之家，其寓意在于代周王为政，而齐乃五霸之鼻祖，《吕刑》所反映的正是由齐开端的霸业兴盛及其演变过程。《吕刑》之后是《文侯之命》，记载的是周平王时晋之鼻祖文侯受封于天子的内容。他认为这毕竟反映的是晋国霸业的基本事实。关于最后一篇的《秦誓》，他认为这当然是穆公即夷狄之国成霸业的情况，反映了继承周王为政的情况。以上是刘逢禄的观点，宋翔凤《尚书谱》的观点亦大体与此相同，认为《费誓》以前是帝王之统，《费誓》之后是霸业之统。另外，公羊家魏源在《书古微》①中消除了《文侯之命》与《秦誓》两篇，而代之以《逸周书》中有关周穆王的《蔡公解》、《芮良夫解》。

总之，关于《尚书》末尾的各篇，一直存在着种种疑问。经学家虽然都认为今文《尚书》没有疑问，但从以上怀疑的目光予以审视的话，值得怀疑的地方仍然很多。而上述典、谟、贡、范的四种，又是最有疑问的。司马迁写《史记》时有关《尚书》的材料大体采用的是今文。然而，按照《汉书·儒林传》的观点，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所以《史记》所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采古文说，对此从未有人怀疑过。可见，如果说《尧典》、《禹贡》、《洪范》等在司马迁的时代却出人意料地都用今文作解释的话，则颇为牵强。而且，今天所见的《尧典》甚是可疑，孟子所见过的《尧典》的内容并不见于今日的《尧典》。由此可知《尧典》成为现在的样子明显是在孟子以后的事。而与《尧典》同

① 《书古微》，(清)魏源撰。十二卷。为阐发西汉今文《尚书》，批驳东汉古文《尚书》之作。

时,类似的篇章还有《禹贡》、《洪范》等,也都是同样的编纂作品。如《禹贡》中就出现了据认为很可能是战国至秦汉初的地名,《洪范》中也存在有被认为是经后人之手加入的内容。不用说《皋陶谟》则包含有更晚的内容。又如《甘誓》、《汤誓》也一样,其文辞决不可能是最初载于简策的形式,那种韵文体例所显示的是一种经过长期讽诵流传之后再被记录下来的痕迹。

经过以上推测进而再结合其他经书的形成进行推测的话,《尚书》形成的最初,应该是以《周书》的五诰为主,以有关周公的内容为中心的,即孔子或其门人为了复兴孔子作为理想的周公政治所考虑的结果。最初的编纂还是以五诰为主,但后来孔子一派的人就将其作为有关《春秋》的某种观点那样予以信任了,即孔子作《春秋》,其寓意在于尊鲁为王的观念在儒家内部开始形成,此时加入了《费誓》那种有关周公之子即鲁之鼻祖伯禽的内容,由此完成了《尚书》的最早一次编纂。接着,就《春秋》来说也形成了一种观点,即孔子作《春秋》,意在孔子自己为王的所谓"孔子素王"说。这时,由于孔子乃殷的末孙,于是《尚书》中又加进了以殷为主的内容。当时存在的有关殷的记录,可能就是今天所见到的从《盘庚》到《微子》、《洪范》之间的内容,这几篇看来是附加在前边的。再往后,到了儒家提倡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说的时代,又加进了《尧典》。由于当时正是儒家流浪列国求仕的时代,所以至齐国的时代又增加了《吕刑》;至晋国或以晋国为正统自居的魏国时代又加进了《文侯之命》;至秦的时代又加上了最后的《秦誓》。今天在《书序》可以见到的《书》的体例,大致可以认为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形成的。至于加进《皋陶谟》,毕竟是到了周末"三后说"流行的时代,特别是根据皋陶不仅是刑罚之鼻祖,又是秦之鼻祖的观点来看,可能出于与增加《秦誓》具有相同意义的考虑而同时加进了《皋陶谟》,我怀疑这两篇原来很有可能是同时加在前边的。当然,《尚书》不仅于儒家,也被《墨子》以及法家的《韩非子》等所引用,但是《墨子》所引《尚书》与今天的《尚书》颇有不同。《韩非子》时又正是秦始皇的时代,所以将《尚书》归入法家亦不足为怪。由此而论,根据《孟子》、《墨子》、《韩非子》,可以考证《尚书》之所以成为今天这种

形式所经历的过程。于是可知,最初所编纂的《周书》五诰,是孔子或其门人等在当时根据勉强残留下来的简策而记录下来的内容。以今天存世的彝器来考虑也是一样的,与从各种特征上认定为周初之物的毛公鼎、盂鼎等铭文相类似,从极为佶屈聱牙这一点而言,毛公鼎、盂鼎铭文与五诰之文可谓颇有共同点。《尚书》最后到了汉代,经伏生之手出现了今文的形式,由于伏生是秦的博士,所以他传授的已经是在秦所完成的《尚书》了。由于这种编纂的宗旨,所以《尚书》与其他经书有所不同,其中包含了齐鲁学风以外的,似乎承认霸道的意味。

《诗》

从"九能"来说,《诗》是出于"升高能赋,祭祀能语"的必要而出现的。当然,在"九能"以外,出于自然的必需而采取"诗"的形式也是事实。因此,《诗》分成了《风》、《雅》、《颂》三种体例。关于《诗》,以往学者认为《诗》有多种用途,诸如《诗》的创作者的意图、官府采集《诗》的意义、其在音乐上的作用、赋《诗》的意义即用于宴会等交际辞令的意义、后代编辑《诗》的意义等等。然而作为历史材料来说,最初创作《诗》的意图,以及编辑《诗》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关于《诗》的创作意图,郑玄在《诗谱》有着大体的论述。其中《雅》、《颂》原本是有目的的创作,其创作意图与实际使用的意义是一致的。即《颂》用于宗庙祭祀,《雅》用于宴会,都是按照既定目的创作的。但是《国风》的创作意图与使用目的则往往有所不同。按照自古以来的说法,《诗》最初是民间歌谣,官府为了了解民间风俗而将这些歌谣予以采集而成的。这还与礼有关系,古时天子巡狩或诸侯述职时,作为天子乐官的大师要收集诸侯领地的诗歌,考察那里的风俗。其政治完善、风俗良好,则歌谣所发亦得性情之正;而政治衰败,歌谣所表现的也只能是性情不正,或为淫声,或为讽刺。因此,《诗》的《周南》、《召南》称之为"正风",是周公、召公行教化时所创作的诗。此以下的《国风》皆为"变风",认为是各国衰微、教化不行之时创作的。就每一篇诗而言,如果说都与此原则相对应的话,那是很困难的,但至少说《国风》是当时歌谣的汇集,应该不会有大误。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即《诗》有其序,《诗序》又有《大序》、《小序》之别。关于《序》的作者,自古以来就有争论,另外还有此《序》到底有无必要的问题。现存《毛诗》有序,介绍了《诗》各篇创作的由来。此外,现已不存的齐、鲁、韩三家诗似乎也各有一序。然而,至宋代,郑樵抨击《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朱子则废弃所有的《诗序》,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他们认为《诗》是用来窥见人物性情的,至于为何而作《诗》则不必追问。但是,《诗序》毕竟是作为古时候作《诗》原因的传说而保存下来的,即便不全都是真实的内容,亦无全部抹煞的必要。假使今本《毛诗序》的记述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而无论如何在当时先有着某些关于《诗》之创作由来的传说,再根据这些传说写成了《诗序》,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既然如此,即使是为了了解中国古代传说,也不必将《诗序》全部抹煞。但是,也不能说现存的《序》和与之联系的《诗》有着完全可信的关系。不过,在《雅》、《颂》来说,即便没有《序》,诗句中也包含了许多史实,自然地反映了作品创作的缘由。无论如何,就《诗》的最初创作由来而言,大体就是以上这些,其中即使多少有些附会因素,但是除了郑玄《诗谱》、《毛诗序》、宋王应麟以及清朝学者所辑齐、鲁、韩《三家诗》以外,没有其他可以参考了。

至于《诗》究竟产生于何时的问题,这关系到《诗》的编纂意图,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颇为重要的。郑玄《诗谱》中指出了《国风》之“变风”的创作年代,并认为《雅》中亦有“变雅”,还指出某某以下为“变雅”。所谓“变风”大体以周的东迁前后为界,是由于周之教化不行而出现的作品;“变雅”也是由于《雅》在失去了《雅》的本质时产生的,同样是周之东迁前后的作品。但是,关于《诗》形成的时期,《三家诗》与《毛诗》的说法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例如对于《关雎篇》,《毛诗》认为由于内容是咏唱文王与太姒之德的,所以应当是文王当时的作品;但是《鲁诗》的看法却认为这是周康王时,为了讽刺君王沉溺于对后妃的爱而创作的。二说相差甚远。《诗》的结束时期,一般认为大约是在陈灵公之时,但是对此也有着各种相反的证据。不过,关于《诗》的结束期毕竟问题还不太大,倒是对《诗》的开始时期有着各种不同的议论。大体而言,《三家诗》与《毛

诗》的观点分歧在于:《三家诗》姑且不顾事实真伪,也要依据古代传说立说;《毛诗》则即便附会也尽可能进行合理的解释,以所谓“诗教”的圣人标准立论。《三家诗》多少也有着合理的解释,按照《三家诗》重视传说的观点,《诗》的形成年代不像《毛诗》认为的那样久远。今天从《诗》的修辞学来考虑的话,《诗》的形成年代也很难想像会早到文王时期。《诗》无疑应当是在周朝泰平时期的发达文化之后形成的。即便是《雅》、《颂》这类以往认为产生于周成王、康王等时代的作品,从诗的内容可知创作时期更晚。这从今天残存的彝器铭文也可以得到验证,周初成王、康王等时代的内容,多数文辞质朴,没有像《诗》那样流畅文体的作品。从那些被认为是周宣王前后的金文开始,则其字句整齐,类似今天所见《诗》的文辞。《国风》中古老的诗歌,认为是西周时形成的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即便是西周的作品也不会太早,可以说多数是在西周末年即夷、厉、宣、幽时期开始兴盛的作品。

关于《雅》中有关周的内容,如《大雅》的《生民篇》等可见周民开创的内容,往往认为起源古老。其实这也不过是在周文化兴盛时代,才开始追溯前代之事创作的,所以大多不外夷、厉、宣、幽前后形成的作品。特别是,不论哪个国家,追溯古事往往是在国家全盛期稍后;修史也一样,是在全盛期过后进入衰亡期的时候进行的。特别在西周,周宣王平息内乱,中兴攘夷。他在位的四十六年诸事复兴,正是追溯前代往事的最好时机,《雅》的大部分内容应当正是这个时代的作品。而《雅》中多载宣王之事,很可能是由于在幽王、平王时代周室衰微之际,追溯宣王全盛之事的作品才多了起来。这些作品都是史诗,既是诗歌又是历史。至近世,崔述《考信录》对于宣王前后史事的观点,就是依据《诗》的内容所得出的恰当见解。也就是说,当时是中国最初将传说的历史创作为诗歌的时代。而在此之前的作品只不过是偶然间记录于器物等残存下来的,可以说尚非出于历史编纂意识而形成的作品。

再来看看《颂》的情况,所谓《颂》多为祭祀祖先时的祝辞一类内容,有《周颂》、《鲁颂》、《商颂》等三类。《周颂》是歌颂周朝祖先之德的作品;至于《鲁颂》,由《诗谱》可知:鲁僖公作为中兴英主,意欲恢复伯禽之

政,所以创作了颂扬此人的诗歌。对此《周颂》、《鲁颂》虽然没有什么议论,但是对于《商颂》却有很大的争议。按照《诗谱》的观点:周宣王时宋大夫正考父向周太师请求商诗,得十二篇,至孔子之时仅残存有其中的五篇,于是以此为《商颂》。然而,按照《三家诗》的观点:这是正考父为歌颂宋襄公处乱世而有行仁义之志的作品。从字句体例来看,这可能是为宋襄公而创作的。无论如何,关于作品的创作年代是有争议的,也是不能不予以斟酌的。

关于《诗》的创作年代大致就是以上所介绍的情况,而对于《诗》的编纂也是自古就有争议的。一般认为最初的《诗》有三千篇,经孔子删节为三百零五篇,于是形成了今天的《诗经》。有认为孔子的编纂仅仅在于汇集,并无特别意图的观点;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孔子于编纂中寓意深刻。但是,不论《毛诗》还是《三家诗》,旧说都认为编纂之中有所寓意,而且这种寓意尤其反映在《国风》之中。《国风》中有《王风》,即东周的诗篇。东周在周室东迁之后虽然仍称王,为众诸侯之共主,但是势力已经衰微,事实上已降为与诸侯同等的地位,无法统治天下了。因此,《国风》本来是汇集各诸侯国诗篇的作品,此时东周的诗也与之同列作为《王风》编纂了,这一点是具有深刻意义的。范宁在《春秋穀梁传》序中有以下一段话曰:

> 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

就是说因为东周本来是王之国,如果是在王之政化普及的时代,其国诗本应该是列入《雅》的,但是由于当时没有能够成为《雅》的诗篇,孔子才在编纂《诗》时将《王风》列入了《国风》。也就说范宁承认以周之德等同于诸侯之德,这在《诗》的编纂来说寓意深刻。不过,对此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吴的季札周游列国时,在鲁国听乐后予以评论的记载。其中已经有"歌王"一事,而季札周游是在孔子之前,可见《王风》在孔子之前业已存在。但是,

毕竟对于有关季札的那些话应该看作是战国时的传闻,而这种传闻的形成已经是孔子删节《诗》之后的事了。文献中是会产生这种混杂情况的,这不足以成为季札时已经存在《王风》的证据。总之,《国风》中像《周南》、《召南》那种正风,与其他的变风是有区别的,其中将《王风》列入变风之中,明显地表示了编纂上的寓意。

此外,对于《周颂》、《鲁颂》、《商颂》这三颂的寓意,是没有争议的。而且这与将《春秋》和《尚书》并行创作具有相同的寓意。《周颂》的其次为《鲁颂》,再次为《商颂》的排列,很明显是有其编纂上之寓意的。对此,《纬书》(《乐纬动声仪》)中曰:“先鲁后殷,新周故宋。”而这又与《春秋》公羊家的“三统说”有关。公羊家称那个时代以及前二代为“王”,而再以前的时代为“帝”。于是,周的其次称鲁为王。因此在周来说,虽然周、殷、夏为王;但在春秋来说,不以夏为王,而以鲁、周、殷为王。这种《纬书》的观点即与“三统说”相关,认为孔子对《诗》的编纂中正是出于同样的寓意,而在《周颂》的其次置《鲁颂》,再次置《商颂》的。但是,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或许这在《春秋》的观点来看,因为有孔子乃“素王”之说,所以将孔子立为了王,作为孔子家族先祖的商就排在鲁之后合为三王了。如果以此与《春秋》的观点相对照的话,这种考虑是可以成立的。总之,由此可知《诗》的编纂与《春秋》的成书是有其相互关系的。即便认为孔子删定《诗》确有其事的话,他到底进行了怎样程度的删定也是不清楚的。《诗》之所以成为今天所见到的体例,是孔子以后儒家学派从以孔子为中心之道统的角度推演而成的,所以在《诗》的编纂中也表现了这种寓意。其实,单从今日《春秋》本文虽然还不明显,但是仅就《诗》而言,从编纂顺序上是不难明了其寓意的:即孔子的学问在成为学派系统之时被编纂成为了今天的这种形式,这一点还显示了《诗》与《尚书》有着同样的成书经过。

关于《诗》中所包含史料的价值,值得进一步考察。其价值在于《诗》是最早用语言编纂的历史,那时候又以《雅》、《颂》作为中心,特别是以《雅》中对宣王前后事实的吟诵是最为明确的,进一步上溯还有着关于周之起源的诗歌。《史记》编纂古代的历史时,对周的始祖和殷的始祖,就

是根据《诗》的《雅》、《颂》中所述事实写成的。这可以说与我们今日采取的是同样的方法。又如《考信录》对宣王时代的事实亦多取之于《诗》，也应当说是对《诗》之历史价值的肯定。

《诗》与《春秋》关系密切，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离娄》下)说的就是这种关系。当然，孟子所言不仅是我们今天所考虑的历史事实，他可能是从王者教化上的思考。然而孟子也是有其史论，有其推导之结论的，其观点与我们今天将古代经典作为历史材料的使用，是有其一致性的。孟子的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对《诗》之历史价值最早予以承认的观点。

《礼》

下面谈谈《礼》。《礼》现在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从古文、今文的不同来说，《仪礼》、《礼记》属于今文，《周礼》属于古文。对这些书籍的由来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关于《周礼》的争论最多。东汉以后的学者以古语"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为基础，认为《周礼》是"礼仪"，《仪礼》是"威仪"；《周礼》是纲，《仪礼》是目。大体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基本上是认为《礼》乃周公所制作，孔子又加以修订。近年来学者，特别是今文派学者对此颇持反对意见。然而，不论古文家还是今文家，都有一个既定的前提，即都试图对《三礼》一并做出解释。如果抛弃这一前提考虑的话，这三种书到底是按照怎样的顺序形成的呢？对此问题则几乎无人问津。虽然《周礼》往往被认为是刘歆伪造的，但是即便在经刘歆之手流传至今的《汉书·艺文志》中的《三礼》，也是将《仪礼》作为《礼经》排列在最前面，其次作为《记》列出的是《礼记》，再次是作为《周官经》列出的是《周礼》。总之，这可以说是按照《三礼》出现先后顺序的自然排列。《艺文志》的次序虽然并非全部按照书籍形成顺序先后排列的，不过《三礼》的顺序是可以如此看待的。

因此，假定《三礼》确实是按以上这种顺序形成的话，即《仪礼》形成最早，那么究竟此书是何时形成的呢？对此，今文家多认为《仪礼》乃孔子所作。其证据在于：今天所见的《仪礼》十七篇，在《礼记》出现时已经

就是现在这样的顺序了。而在《礼记·檀弓篇》中可以发现《仪礼·士丧礼》出于孔子之时的证据。又《仪礼·聘礼》的内容与《论语·乡党篇》的内容非常一致。虽然无法判断这究竟是《乡党篇》取之于《仪礼》,还是《仪礼》取之于《乡党篇》,但至少二者有关系这一点是明确的。也就是说这可以作为《仪礼》乃孔子之作的证据。当然,在这一今文家的观点中,是不承认《仪礼》为周公之作的。不过,在今天,一般的经学者中,也有人认为《仪礼》无疑是孔子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崔述等人已经有所考证,认为《仪礼》内容不仅相当繁琐而且多有晚周之礼,明显是春秋以后形成的,无法断定其确为孔子之作(《丰镐考信录》)。认为孔子以前就已经存在如此详备书籍的观点,在今天的历史学家看来几乎是不足为信的。《史记·儒林传》中也说《礼》在孔子时已经残缺不全了。朱子也认为《仪礼》并非一人一时所著。对此,今文家也是相信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今本《仪礼》又过于完整而没有残缺的痕迹,而且今文家也是将此作为完整作品来看待的。这就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总之,这一矛盾是因为没有考虑此记录实际上到底完成于何时所造成的,像《仪礼》这种繁琐的记录,无法想像它是铜器或简策那种记录方法不便时代的作品。的确,孔子曾以礼教授门人,但无法想像当时对于礼已经有着逐一的记录了。汉代以前虽已有学者专门研究礼的形式,但是最初的礼可能是专以形式为主的,以后才逐渐繁琐起来。又因为门人之间相互的记忆不同,看来这也是有必要予以记录的原因。这在其他宗教也是一样,如佛教等最初在释迦时并没有《三藏》的记录,但是教主殁后出现了种种不同说法,于是才有所谓“结集”而成的情况。按照佛教的传说,曾有过几次“结集”。孔子的门下也是,按照《论语》、《礼记》的《檀弓篇》等的记载可知,门人之间屡屡有着关于礼的争论,这应当就是《仪礼》得以结集的原因吧。而且这种结集应该至少是在孔子后百年、二百年才实现的。像《论语·乡党篇》那样,不如说就是最初有关“礼”的笔记,后来在此基础上才集大成为《仪礼》。所以,即便在《仪礼》形成之后,对其仍有作各种笔记的必要,于是产生了“记”。“记”也叫做“传”,今本《仪礼》中亦散见有既已属于“记”的内容。但是,由于初期的“记”是极少的,所以在《仪礼》中即便有一些

亦无大碍。到了汉代复兴礼的时期,学者之间形成了种种争论,这种争论一旦成为著作,学者就不再甘心把“记”作为《仪礼》本文的附属内容了,于是另外结集,“记”就独立成书了。这就是《汉书·艺文志》的“记”,其中包括了今日的《礼记》、《大戴礼》。附带说一下,一旦“记”多了起来,“记”家内部又分出派别,即出现了《大戴记》、《小戴记》,《小戴记》即今日的《礼记》。西汉人对大戴、小戴并不大予以区别,像司马迁就将《大戴记》作为经书看待。但是“记”一旦多了起来,对那些最早结集时遗漏的有关礼的笔记,例如像《乡党篇》那样的著作又逐渐予以发现,并收入了“记”中。因此,在今本《礼记》的本文中有时会夹杂有类似《仪礼》本文那种异样的古文词语。近年,邵懿辰在其所著《礼经通论》中论曰:“经中固自有记,记中亦自有经。”不过,对此朱子已有曰:“仪礼中亦自有变,变礼中又自有经,不可一律看也。”(《朱子语类》卷八十四)①邵氏的观点虽本于朱子之说,但他对什么样的内容为“经”中之“记”,什么样的内容为“记”中之“经”,在《礼经通论》中特别予以了论述。当然《仪礼》是较早成书的,这是事实,所以《大戴记》及《礼记》中所举礼的顺序,大体与今本《仪礼》的顺序是符合的,而且一般认为《仪礼》是在秦汉以前成书的。可以说,《仪礼》应当是第一次结集,《礼记》当为第二次结集。就佛教来说也是,最初是《律》的结集,然后逐渐出现了《论部》。

最后,是《周礼》即《周官经》形成的问题。当然此书最初是作为周公所作,经河间献王之手才得以问世的。这在当时就有争议,据说汉武帝等也斥之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公羊学者何休称其为“六国阴谋之书”(《周礼正义序》)。此书的编辑问世无疑是在《仪礼》之后。《礼记》中《王制篇》大体上与《周礼》结构相似,《周礼》是对《王制篇》所作进一步的铺张。今文家认为《王制》是周代的制度,《周礼》是对《王制》的扩展之作。如果按这种说法,将《礼记·王制》与《荀子·王制》比较来看的

---

① 《朱子语类·礼二》:“礼有经,有变。经者,常也;变者,常之变也。先儒以曲礼为变礼,看来全以为变礼,亦不可。盖曲者,委曲之义,故以曲礼为变礼。然‘毋不敬,安定辞,安民哉’此三句,岂可谓之变礼?先儒以仪礼为经礼。然仪礼中亦自有变,变礼中又自有经,不可一律看也。”

话，可以发现二者有着各种的不同，并不一致。从《礼记·王制》来看，已经有意识地将古代制度的记录作为一种著述的作品了，《月令》也具有着同样的性质；而《荀子·王制》则基本上没有编纂以往制度的意识，只是按照记忆予以记载罢了。至于孟子就更是坦率地承认，古时的制度由于诸侯都认为不便而统统予以破坏了，因而不得其详，只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来叙述了（《万章下》）。总之，从孟子以后将各种不确切的记忆加以润色，收集其他各类古代记忆，从而结集成为《荀子·王制》，进而形成了《礼记·王制》，再进一步形成了《周礼》。因此，即便《周礼》中多有《礼记·王制》所没有的内容，也不能一盖认为都是《周礼》作者所伪造的，现存《仪礼》与《礼记》亦有不合之处。可以这样认为：在这期间发现了各种从前的笔记，于是就将这些笔记加以汇总，在这些材料不能顺畅衔接的情况下，编纂者即进行了补缀。所以《周礼》中出现的那些《礼记》、《仪礼》所见不到的内容之中，也包含了有关周代制度的贵重史料。至于经学古文家的产生，就佛教来说如同本来只有小乘的《三藏》，从中一种接近于大乘的内容逐渐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结集”大乘部的必要。与此具有同样的形式，古文家是与早期儒家观点持异议最多的，他们持异议的原因多数虽然是出于对自身所在时代的思考，但是他们的依据中应该说是有着古代材料的。

总之，关于《礼》的编纂，可以认为是在孔子以后百年或二百年才开始的。就以往经学者的观点而言，周公曾创立了某些制度，而且从周初至周末的八百年间其创制无任何变化；以今文家来说，孔子撰“经书”也是直至汉初没有任何变化。这在研究方法上是非常大的错误。这一点以日本仅在一千二百年前出现的“令”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令”产生之后，先是出现了对“令”的“义解”，进而是对“令”的“集解”。看看现存“令”的“集解”就知道：其中既有本文，也有注，注中还掺杂有“集解”时代的注以外的，即后来镰仓时代加进去的内容，而加进刊本的内容又被混入了注文。但是，在旧抄本上，后代加进的内容与原有的注是分别抄写的。所以，对所有“经书”都不妨按照日本“令”的“集解”所经过的变化予以理解。特别是如同章学诚所说的那样，古人一旦有了自成一派的学说，就不

再将自己的观点与古人的观点相区别了(《文史通义·言公》)。今日我们所见经书说到底也不过是前汉末,即刘向、刘歆时的书籍,我们不能不注意在那之前的变化,即加入了各种内容,出现了残缺等等。而《礼》当然也不能例外。再举一个日本的例子,在古代氏族制度时代,各个氏族对各种职业是分别传授的。当一个氏族非常兴盛、自己的职守很完全的时候,他们是决不会写著作的。比如斋部氏在衰败时,从来所实行的那种即中国所说的"礼",在自家已经不十分通行的时候,为了述说这种不满,斋部氏就将所实行至今的"礼"作为记录编纂成了《古语拾遗》一书。所有的古代职官家族,其编纂著作之时,必定值其家业衰败之际,即当其回顾从前兴盛年代之时。这大概可以说是古代著作编纂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原则。当然,在孔子的时候他已经试图对残缺的礼予以复原,无疑他也为此进行了努力,但是他是否从一开始就有了将礼记录并保存下去的设想,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大体上可以说《礼》形成的经纬与佛教《三藏》的形成有着类似的情况。

以往的古文家、今文家都是要么取今文而排斥古文,要么取古文认为今文是完全不准确的。如上所述,所谓"经书"是逐渐发展,并且是经过多次编纂而成的。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对于今文、古文中所存在的各种疑问是应该可以得到解决的。

《春秋》

《春秋》在今天有《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三种,由此三传我们对《春秋》可以有个大体上的了解。至于这三传的成书,亦有许多形成史可言。今天若欲了解有关《春秋》本来观点的话,还是只有依靠《孟子》的记载了。关于《孟子》的成书年代虽然不太清楚,姑且考虑为战国末的话,由此也可以想见当时的《春秋》是怎样一部书。《孟子》中关于《春秋》有着各种描述,其中明确谈到《春秋》成书的有以下一段话:

> 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

对这段文字可解释为:当王者教化普遍通行,实行从各个地方采集诗歌做法的时候,也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这期间《诗》是代表那个时代的主要著作。然而,王者教化不行,则《诗》亡《春秋》起,即《春秋》代替天子行使礼乐征伐的职责了。这就是已经进入了《春秋》时代的意思。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都是同样的著作,其中记载了齐桓、晋文亦即霸者时代的内容,其文字是根据史官持有的文书而形成的。总之,材料虽是古昔的史官文书,孔子却对这些材料予以了微言大义的解释。后世公羊家的讨论大多与孟子这一观点相同,即认为《春秋》是孔子代天子所创作的。《孟子》赵岐注就认为"窃取之矣"即素王之事,①并非无稽之谈。《孟子》的其他地方也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滕文公》下)至少,在《孟子》的编纂时代,人们对《春秋》的意义是作这样解释的。《论语》中虽然没有关于《春秋》的话,但是其中毕竟还是有反映《春秋》意义的内容。在《宪问篇》中说:齐陈恒弑其君之后,孔子沐浴而朝,请求哀公予以征伐。② 这被认为是反映《春秋》意义的内容。另外,在《论语》的末尾也可见到与《春秋》相似的思想。《春秋》是否经过孔子笔削的问题虽然尚不清楚,但是至少在《论语》末尾部分形成时,以及在《孟子》编纂的时候,《春秋》与公羊家的观点很相似这一点是明确的。

然而,《春秋》一书的结构正如《孟子》所谓"其文则史"那样,是依据以往史职的文书,即是当时人的见解。但是有人曾以晋国韩宣子在鲁观《易象》及《鲁春秋》时曰"周礼尽在鲁矣"③一语作为《春秋》依据了以往史职文书的证据,那就不准确了。因为这话很可能是《易》、《春秋》流行

---

① 《孟子》卷八《离娄》下之赵岐《注》:"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窃,亦圣人之谦辞尔。"

② 《论语·宪问篇》:"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

③ 《左传》昭公二年(前540),晋韩宣子来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曰:'周礼尽在鲁矣!'"

于世以后制造出来的。那么,“其文则史”的“史”到底当做何解释呢？对此,上述汪中《左氏春秋释疑》在论述《左传》之成书时曰: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等,在古时虽皆有专门官执掌,但是后来皆总归于史官的执掌,而史官所执掌的记录再到后来就成为《六艺》,变为了儒者之业。所以《左传》中于人事之外,还有记载了与以上种种执掌相关的内容。这一观点特别是对解释《孟子》所谓“其文则史”是很恰当的。但是究竟是不是按照天道鬼神等执掌先是落入史官之手,进而落入儒者之手的顺序传承的呢？这还是个疑问。不如说《左传》中记载的如此种种内容,并非经过史官之手就成为了《左传》的材料了。就所谓经史官之手载入《春秋》的内容来看,其大部分是作为《春秋》本文的列国会同、朝聘等内容,此外还有关于历日的内容。那么,为什么会同、朝聘等占了大部分内容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那样:因为天子失去统一的能力,所以列国擅自进行会同、朝聘。比如建立同盟以便维持和平这种齐桓、晋文霸主之世的形成,这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事件。又如执掌历日的史官也是,很可能是因为在春秋时期他们的作用有着特别显著的发展所致。按照《周礼》等的内容来看,从前曾有过专门执掌历日的职官,后来需要对相当长时期内的过程做记载,所以很可能在春秋时变化为由史官执掌历日了。《论语》和《周礼》就有着告朔之礼的内容。这被认为是由天子向诸侯颁布的历日,诸侯将其藏于祖庙中,在将其取出时,则需要举行告朔之礼。这一礼仪在什么时候举行虽不太清楚,但周的懿亲诸侯由于与周使用同样的正朔,所以也按照历日进行每年所有定例的礼仪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此,今天从《吕氏春秋》、《礼记》、《逸周书》中所见《月令》来看,也可以知道天子是要进行每年定例礼仪的。所谓《月令》当然是战国末期才编纂形成的,但是无论如何按照历日举行每年定例礼仪,则是自古有之的。这一点,对照日本的例子也不难作出推测。用日本的例子特别有助于对《春秋》的理解。在日本执掌历日的贺茂氏,向天子和摄关大臣等颁发一种叫做“具注历”之记有每年定例礼仪的历日。于是,大家都有了在那上面写进日记的习惯。看来,在周代、春秋时期也是,由于告朔之礼的需要而颁发有历日,在这上面写进当时的主要事情,而这些材料积累起来就成为

了孟子所谓的旧史之文。尤其是从春秋开始,史官执掌历日和会同、朝聘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那些记录在孔子的时代仍有残存。很可能,当时孔子就是从史官那里得到了这些材料,而为了将这些材料流传下去,就将其编纂成书了。春秋以前虽然已经有了这类记录,可惜皆已遗失,所以仅仅残留下了春秋时代的记录。

从那以后,孔子一派在传承《春秋》的时候,又附之以“义”而形成了“传”,其中最古者当属《公羊传》。从今本来看,《公羊》、《穀梁》二传中《经》与《传》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有《左传》是《经》、《传》分离的。那是因为本来《经》书与《传》书是相互分开的,今本这样将每一年的《经》与《传》合并成为一书的做法始于晋人杜预。在那之前,本来《左传》是为了便于阅读《春秋》本文作为参考而汇集的史料集,与《公羊》、《穀梁》二传同样,也是附之以“义”所作的《传》,这被认为是刘歆的工作。他当时掌握了《公羊》、《穀梁》中所没有的古经书,以此为基础附加《左氏传》的内容成为一书。最初孔门一派所传授的《春秋》,是像《公羊》、《穀梁》二传那样经传合并的书。至汉初说到《春秋》的时候,总是与《公羊传》一并而论的,是将所谓《春秋》与《公羊传》作为同一书理解的。而《穀梁传》则是对《公羊传》中于义理难通的内容予以订正后的产物。《穀梁》的时候,历法等发达起来,到了汉代越发分明,于是写进了一些《公羊》时尚不知道的历法。例如,写进了庄公十八年夜里的日食一事等。由于《左传》更出于此之后,所以对于义理,与《公》、《穀》相比《左氏》更为完整,成书越晚越规整有序。这毕竟是为了与义理相合,而对文字进行了逐段订正的结果。所以,在成书顺序上应该是《公羊传》最早,其次《穀梁传》,再次《左传》。

那么,像《公羊传》、《穀梁传》这样的古传又是根据什么做出解释的呢?根据的是《礼》。像所谓《公羊》之礼、《穀梁》之礼,清朝学者都有过研究。因为二传中的礼与今本《周礼》、《仪礼》有所不合,所以才出现了有关的研究。大体上说,《公羊传》、《穀梁传》成书的时代,儒家之礼应该就是二书中所载的那样吧。而今日所见的《礼》,则应当是在那以后经过订正而发展起来的。残存于《公羊传》中礼看来就是从《孟子》开始对《春

秋》所做解释的那种情况。如此，根据《礼》形成的《传》，就是现在我们见到样子。看来，这也像日本的记载一样，也经历过一个后来写进去的内容，逐渐与原来的本文融为一体的过程。

此后，《春秋》学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穀梁传》，又出现了《左传》。相比之下《左传》叙事最详且长于义理，所以《左传》最为流行，却不能说其成书很早。毕竟最早的《传》应该是根据孔子素王说而创作的。当然，是否从最开始孔门就存在了孔子素王说的疑问虽然存在，但是为《春秋》作传确是出于孔子素王说的产物。至汉兴，天下统一时，适逢应用《公羊传》统一思想的好时机，于是，孔子为汉朝制作《春秋》之说受到欢迎，公羊学因此兴盛。在汉代出于政治上的统一、学问上的统一，以及记载的统一，各个方面都应用了公羊学，从而出现了统一的局面。就这样，汉代经学大体上就是由公羊学予以统一的学问。总之，即便从孔子一派对《六艺》的记载来说，也是先有《书》、《诗》，有《礼》，本来都是分别存在着的，可是由于《春秋》的出现，孔子一派的学问才被统一起来了，唯有《易》还是自成一体的学问。

孔子一派的学问一旦统一，对于圣人所作“经”，后人就以“传”或“记”进行解释。那些“传”、“记”的大部分内容主要虽是根据《礼》所作的解释，但也只是辞语的解释。《公羊传》的解释中就包括了辞语的解释，也就是说《传》中包括了《春秋》的字典。而与其他诸如《书经》、《诗经》相关联的，还出现了《尔雅》那种特别的字典，即解释经书的字典。不过，由于《礼》注重的是礼容，所以另当别论。《尔雅》大体上是为了解释《诗经》、《书经》而形成的，其中对《易》的解释不多。不过，《易》中已经是包含了对自身内容的解释。《易》的《说卦》、《杂卦》全都是对《易》文字的解释。在此之前作为“传”先是出现了《系辞》上下、《文言》等，后来像其他经书那样也出现了对字典的需要，这才产生了《说卦》、《杂卦》。《易》很可能本来是别家的书籍，后来才被儒家作为重要的著作采纳吸收的。本来，儒家的《诗》、《书》、《礼》等也并非其他诸子那样的哲学。可能是儒家在战国时为了与诸子对抗，因为需要有哲学所以吸收了《易》。再从经书的传授来看，至于其他经书的传授，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因而

传承难辨，唯有《易》从孔子开始，六传至汉初的田何。这反而令人生疑。从当时的系图来看，此间孔子家系传九代，虽然孔子家族并非代代长寿，但这九代人的每一代作为一代人来说也都不算短。可是，就《易》的传授而言，孔子至田何的六代中，平均每一代相当于五六十年。古时系图的相传代数是比较准确的，由此推算的话，可见《易》的传授并非直接继承于孔子。实际上从《六经》中《五经》的传承来看，很有可能《诗》、《书》在孔子时已存在并被编纂成书，但《春秋》或许在孔子晚年仅仅编纂了其本文，而对《春秋》另外附加以微言大义的义理则应该是在孟子时代以前逐渐形成的。此间，《礼》虽然施行于实际之中，但是就其记载的产生而论则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易》本是另外作为卜筮之书传承的，后来被儒家采纳吸收，于是《五经》终于在儒家之手得以汇集。章学诚认为《易》载于竹帛当在田何之时(《文史通义·公言上》)，其实其他书籍之载于竹帛又何尝不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间，毕竟战国以前还都未能载于竹帛。的确，在竹帛之书形成之后，出于对从前主张的修正，才形成了新的学派：按照何休《公羊传》乃汉初载入竹帛的观点来看的话(《公羊》隐二年《解诂》)，《穀梁传》等的形成很可能就更晚一些了。

《论语》

以上讲述了作为儒家主要著作的经书，这里再来谈谈《论语》。《论语》，说来是孔子的言行录，在尊重《五经》这类经书的同时，对于《五经》传人孔子经历的传授也变得很有必要了。从另一方面而言，《论语》也可以说是为了将经书作者准确无误的解释流传下去而产生的作品。直到汉初，《论语》是作为《六艺》总体上的“传记”而传授的，所以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是将其与《诸子》相区别，而列为《六艺》的。《艺文志》中将《尔雅》、《孝经》作为小学，亦即解释辞语的工具书，与《论语》一起附录于《六艺》的。《艺文志》的这一见解大体应该说是不错的。

《论语》的编纂也不一定就是一次完成的。大体而言，上论与下论就其中所包含思想来说亦有所不同。上论从《学而篇》开始至《乡党篇》，思想始终一贯。最开始是讲孔子学问的顺序；然后是孔子的理想人物，例如

对吴太伯那样有德而无位的人物的叙述;对于孔子工作的叙述,则是以其传授文王之文,即周代文化为宗旨的。在这一层意思上,《论语》与《春秋》那种极力置孔子与天子以同等地位、执掌征伐的观点有所不同。下论与上论不同,有着各种含义,其中与孔子初期的学徒重视礼学不同,表现出对礼有了某种轻视的意思(《先进篇》);而且有时还含有一些道家的味道:这是由于儒家在春秋末、战国初受到道家的影响;同时也像《春秋》那样表现孔子如何积极地行使素王的权力。如此,在最后的《尧曰篇》表达了孔子的道统。即由尧舜至成汤、文武、周公,传及孔子。总之,下论中多少有些轻视礼乐,而含有了哲学的思想,恰与孟子时代的儒家思想一致。

三、"诸子"的形成

儒家的书分为"经"与"传","传"中包括了对辞语的逻辑性解释。这种解释从孔子开始已经有了正名之论,至孟子则更加盛行。而且在"传"中还有将孔子作为素王的解释,即以孔子为有史以来的第一圣人,视其为道统继承人的思想。正名与道统论这两种论辩,从春秋末年至汉初对所有学问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易》可以认为是在其他诸子之学发展之后,为了与诸子对抗而吸收进儒家的,《书》、《诗》、《春秋》之学则是作为孔子学派而逐渐发展起来,并对其他诸子百家给予影响的学问。《汉书·艺文志》中是把《六艺》作为独立于"诸子"之外,并超越于"诸子"的文献而进行分类的;因为这是在汉代统一学术之后形成了分类方法,所以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六艺》,而在此以前《六艺》只是作为儒家主要经典来看待的。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指时,还是将儒家与其他诸子平等看待的。因此,儒家那种汇集自家信奉的经典的方法,也被其他诸家所汲取。即其他诸家也都推出了可称为经传的典籍。特别是《老子》,就其体例而言与儒家《春秋公羊传》大体相似,书中经与传一并存在。今本《老子》中哪是经哪是传虽然难以判断,但是那种用简洁辞语对"经"作出归纳的形式,正是经传一体的编纂方法。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观点,

《老子》本来出自古时的史官。这种史官不仅限于记录事件,即掌“记事”,还要记忆“前言往事”,而且由于向君主讲述“前言往事”也是他们的职务,所以其中最重要的有关“前言”的内容,都是老子所汇集的。比如鲁国等,即便认为是按照周法进行记录的,但不过是一个诸侯国,所以当然没有关于天子统治天下之术的文章。由于老子是周的史官,所以才会全部保存了这类用语。老子所说的道德并非出自被统治者的立场,而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立场的观点。其中主要是与其人道毋宁天道的劝训诫之辞。作为天子的训诫,天子自身谨慎言行的训诫,例如《大戴礼》的《武王践阼篇》中各种器物铭文之类,虽然无疑也同样是训诫,但毕竟与《老子》那种统治天下之法的训诫在意思上稍显不同。《汉书·艺文志》中作为道家,列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等书。这些书虽然已经失传,但像《列子》、《淮南子》等所引黄帝之书,估计与这些书应该属于同一类书籍。这些黄帝之书中的主张大体上与今天所见《老子》的思想类似。可是,根据《路史》及其他书所引《黄帝巾几之铭》,可以说《黄帝铭》中有的内容与《武王践阼篇》等大体类似。当然,有关黄帝的记载并非从黄帝时期流传下来的,应该是战国时期对古代帝王材料的汇集。《老子》也同样,作为周的史官老子将所保存之以往的训言进行汇集,并在其中加上了自己的意见,形成为一部经、传混淆的著作。在儒家,比起“前言”来说他们有着更重视传授“往行”的倾向,对于训言等也只是对那些某种器物或书籍中的具体的遗存内容而加以传授的。但是,《老子》则是作为周的史官,将世代记忆相传的那些可以成为君主之教的话,加以简单的解释而保存了下来。总之,先是经、传一体的形式,后来又加上了“传”。由《汉书·艺文志》可知:《老子》书中也像儒家那样,有着各种“传”。但是,这些“传”并没有流传至今。

此外,《艺文志》的“道家”中还列入了《管子》。此书被认为是管仲所著,但是对此在书的开头是很明确地以称为《经言》的部分予以区别的。这虽说是接近道家的著作,但更多地含有经世著作的味道。另外,《墨子》也有《经篇》。有《经说篇》就说明书中既有“经”又有“传”。这是一种类似逻辑学的,叙述词语解释方法的著作。后来,《韩非子》有《内储

说》,其中有“右经”一语,很明显地表示出既有“经”又有“传”的情况。看来,这里的“经”应当是特指法家的“经”。总之,与儒家将自古相传的记录立为“经”的做法相对应,其他诸家也都挑选出了代表自家学术主张的著作作为“经”,虽说与儒家的“经”不太一样,但就都存在“经”、“传”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但是在儒家那里,虽说将古代记录作为“经”,但“经”并非记录本身,在记录的编纂中有着所谓孔子的“微言大义”,这才是“经”。至于晚出的《吕氏春秋》等称为杂家的著作,是以怎样的部分作为“经”的则不太清楚。《吕氏春秋》似乎是天子以《月令》为基础,以这种治理天下之法作为“经”的部分。而此外,在《八览》、《六论》中也包含有可以成为“经”意思。无论如何,在儒家以外,诸子各自的书中也都是“经”、“传”具备的。到了后来,与儒家编纂解释“经”、“传”的著作同样,诸子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著作。《管子》一书的最开始有《牧民篇》和《形势篇》,后面就有《牧民解》和《形势解》;在《韩非子》中也混有《解老》、《喻老》等解释《老子》的篇章。可见,解释性著作的出现与儒家的发展是相互一致的。

由于儒家将记载尧舜以来事迹的《六经》定为经书的缘故,从而显现出了与其他诸家不同的特色,即“道统”的特色。《论语·尧曰篇》就表现了这一“道统”,《孟子》的末尾也明确叙述了从尧舜至孔子的“道统”:认为尧舜至汤五百余岁,汤至文王五百余岁,文王至孔子五百余岁,如此可划分为三个时代,然后传至他这里。这一观点是在《论语》成书之后对《论语》的模仿,还是出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的产物虽说不太清楚,但无论如何二者是有其一致性的。《荀子》的最后也是以《尧问篇》结尾的,在这《尧问篇》的最后有对荀子立场的说明:认为虽然有观点认为荀子不及孔子,但也未必然,孔子并非就胜于荀子。这种书写形式开后来很长一个时期内于书后载序言的先河。原来为书作序形式来自儒家对“道统”的表彰。《吕氏春秋》等杂家也与诸子同样,书中也是既有“经”也有“传”;不仅如此,也像儒家那样在《十二纪》的最后有《序意》。那以后的书,特别是太史公的《史记》有《自序》,自己表示承受“道统”之任。《太史公自序》兼收并蓄了《荀子》的《非十二子》

与《孟子》的“道统”论。以后直至六朝时期，书籍的作者都有着必于末尾附“序”的习惯。

如此，诸子百家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之间，以各不相同的言论表达了对改易天下的思考。而且各家都认为只要有了自己一家的学问，即使没有其他学问也足以治理天下。于是在诸家之间出现了一个共同点：即采他家之长补自家之短，竭力做得好像他家之长皆包含于自家之中似的，强调唯我一家兼备众家之长，力求抹煞他家存在的必要性。在《论语》中也是，“下论”中有关隐者的内容就是采用了道家之说；《荀子》等更是明显地搀入了道家之说。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度极盛的论辩家。《墨子》的“经”就出现于此时。据说，本来这是从孔子所谓“正名”开始的，《孟子》、《庄子》中也有这样的部分。如此这些就成为了各家都共有的特点。所以，晚出的各家还对以往诸家进行比较评论，从而竭力就自家的优势提出主张。孟子就有攻击杨、墨而建立自己学说的倾向；《荀子》中也有《非十二子》；《庄子》将其他诸家与庄子进行比较，而有了最后一篇的《天下篇》，这一篇同时也就成为了本书的“序”。总之，各家都主张以自家之学改易天下。最后出现了《吕氏春秋》这样综合各家的学派。《吕氏春秋》一书，虽说出自吕不韦这种并无自己学问的人之手，但是由此亦可见晚出的诸家都多少有些杂家的倾向。

顺便说一下，上述这些所谓诸子的九流百家，在后代被综合归纳为了一种有体系的史书，至于他们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在《汉书·艺文志》里早已有着非常详细的说明。《艺文志》认为这九流都是出自于古代的官职：道家出自史官，阴阳家出自羲和官，法家出自理官，名家出自礼官，墨家出自清庙之守，纵横家出自行人之官，杂家出自议官，农家出自农稷之官，小说家出自稗官。章学诚《文史通义》中还论述了这些官职之所以形成九流百家的原因。他认为在周王朝强盛时期，这些官职的执掌者都能各自坚守自己的职务，所以都通晓与自己职务相关的知识；但是春秋战国以来，随着一国的消亡，那个国的各种官职也就失去了各自的职务；况且一国如果致力于对外战争的话，就会使与战争相关的职务得以发展，这也使得其他官职受到压制以至难以坚持职守，于是官师失守，由此他们形成

为九流。这种情况联系到日本的例子来看,也是很明确的:日本从战国以来,特别是德川初期也可见到很典型的例子。战国末期,在职官员渐渐失去职务,从而出现了依靠以往官职的专门技能从事营业的倾向,有时还会出现侵犯其他职务的现象。例如吉田家,本来是卜部之家,但是由于仅仅依靠这一出身难以营业,于是侵入神祇的职务,以便借此维持自家的营业。尤其是在战国时,出现了很多武者周游各国锻炼武艺的现象,他们多数本是亡国的流浪武士,后来成为凭借自己才力、为了经营的目的而横行于世的人物。而且,在天下一统之后,亡国武士都在考虑自己的营业。德川初期,有很多兵学者就是在亡国之后起家的,例如武田流、北条流等就属于这种情况。其中也有些浪人出身的武士从事了商业,戏剧也靠很多亡国流浪武士才得以发展起来。中国那种小说家出自稗官的情况,与日本艺人出自武士的情况很是相似。日本虽然没有出现杂家这一家,但却有着形成杂家的因素,朝廷有大事时需要集合开会,例如改定年号时的关于吉凶所进行的引经据典的论难,就是相当于议官那样的职掌。但是,在日本这种情况并未发展成为单独的一家。

无论如何,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观点,诸家都是原来的家职在失去职守之后,将其作为一种营业而成为了一家之学的主张,于是产生了九流百家。即便家职未必都有书写的记录,但无疑也会有口耳相传的方式,这些都成为了后来的九流百家。《汉书・艺文志》中在《六艺》、“诸子”之外还分别载有“兵书”、“数术”、“方技”。这些书在“艺文志”中的分类顺序,来自刘向父子对儒家经书的尊崇,先记载《六艺》,其余书虽置于其后,但是作为九流则具有与儒家经典相当的地位。就像儒家将古代记录作为经典传授那样,九流是将“兵书”、“数术”、“方技”等书作为经典传授的。然而,儒家是将所谓微言大义反映在记录编纂法之中的,而九流由于“兵书”、“数术”、“方技”各书的性质,无法将微言大义反映于编纂法之中,所以就另外创造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因此,在《艺文志》中“兵书”、“数术”、“方技”等书与《六艺》、“诸子”是分别记载的。尤其是由于九流诸家出于孔子之后,《老子》等在问世后又很流行,而与往昔的记录相比作为“经”又更多地叙述了自己的主张,所以要将九流与“兵书”、“数

术”、“方技”分别记载。九流主要都是主张以自己的一家之言治天下的，而早已有之的“兵书”、“数术”、“方技”等又都是为了恪守昔日之法的，所以在此一律被分为了两个部分。大体上说，春秋战国时代就连儒家，虽说是保存记录，但也不单纯是对记录作原样地保存，而是有着依据这种记录经纶天下的意义，即孔子是以此作为教育、经纶工具的。其他诸家也都是以经纶天下为主的，那些作为典据的书籍并非就是作为记录予以尊重的，而都是为了用于经纶天下的。《汉书·艺文志》虽认为这九流本来皆为家职，到了龚自珍才认为各家职皆归一为“史”，在《古史钩沉论》中他认为九流皆史，《五经》乃史之大宗，“诸子”乃史之小宗。这里所说的“史”并非今日所谓“历史”的意思，而仅仅是作为记录予以保存的意思。

那么，今日儒家书籍、诸家书籍作为遗存史料的价值究竟如何呢？对此，汉以来的多数学者都是最为重视儒家《六艺》的。太史公亦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传》）他认为这是因为《六艺》乃雅驯的缘故，即具有合理性的意思。然而王充等对此有异议，《论衡·书解篇》中就说诸子不必劣于《六经》。太史公亦云：“《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史记·五帝本纪赞》）就是说诸子之书较少佚失，“经”之所缺可以诸子补遗。当时固然重视《六艺》，但也看不出《六艺》与诸家有着过于悬殊的差异。对此“经”之所缺、诸子所存的现象王充也有过论述，近来张之洞也在《辅轩语》有所涉及。《孟子》中有《尚书》的佚篇，《墨子》中也有被认为属于《尚书》佚篇的内容就是实例。总之，诸子都产生于往昔官职所传之典据，其中作为今日史料者并不亚于经书这一点当是事实。

四、《六艺》外传

在《汉书·艺文志》中有一种虽编入《六艺》，但又无法判别其为《六艺》本文，还是传记的书籍。这在《尚书》来说有《周书》，即通常所称的《逸周书》。这在《艺文志》中注为周之史记，颜师古注认为这是孔子所撰

《尚书》百篇之余。[①] 在此书中有着在体例上与《尚书》相似的部分，以致近代公羊学者魏源作《书古微》时竟取其中《祭公解》、《芮良夫解》二篇补《尚书》，可见其与《尚书》是何等的相似。此书最后有序，这也是与《书序》相似的体例。此书还列入了与战国时代诸子类似的书籍，以及有关月令、地理等各种各样的书籍。不仅如此，对各篇篇名都必有题解，犹如《管子·牧民解》、《韩非子·解老》等。看来，此书应该是将残存至秦汉之间的周代简策、金文等予以汇集，并加入当时儒家的杂说，宛如《礼记》之于礼那样，是作为对《尚书》的一种"记"而编纂成书的。不过，即便其中有与《尚书》相似之处，然而就行文体例来说毕竟较之《尚书》等而言，许多还是已经具有了后世的风格。总之，与《墨子》等所引用的《尚书》似乎属于同一种类，而不是从简策那种直接记录的，或许是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也未可知。司马迁撰写周代内容时，由于《尚书》的材料不足而采用此书的事实予以补充。总之，不能说其中被认为是正确的材料，比今日《尚书》中不正确的内容更没有价值，这毕竟也是混杂有传说的一种史料。

再就《诗》而言，残存至今的有《韩诗外传》。此书作为对《诗》的解释不过是一种断章取义作品而已，而这只能作为《三家诗》中《韩诗》是如何解释《诗》的参考。但是，书里作为例子而引用的事实中，毕竟有许多是对战国以后各种事实的传说，例如那些与《左传》、《国语》所载内容类似的佚事、杂说。

在"礼"中也有像《司马法》那样的书籍。今日残留下来的《司马法》是否为《艺文志》所见《司马法》的残篇虽然尚难以判断，但是今本《司马法》毕竟也是传至战国，有关军礼的记载，即便体例不尽完整，也可以作为对《周礼》中军礼亦即有关司马的内容进行研究的参考资料。

列入"春秋"部的多数是具有极重要史料价值的书籍。如《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世本》原本佚失，今本虽不过是从对古书中所引

---

① 《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用部分的辑佚而已，但由此对书的性质还是可略知大概的。其中，《国语》自古是作为《春秋》外传的，但其内容的时代上限起于周穆王，远早于春秋；下限正与《左传》结束的世代相合，即记录截至于由于晋国的三家发展，晋六卿中的知伯家灭亡一事。近代康有为出于攻击《左传》的目的，认为司马迁虽说过左丘明著《国语》，但未曾说过也著有《左传》；《左传》本不存在，是刘歆摘抄《国语》而附加于《春秋》的。他认为记载于《左传》的事实在《史记》中根本不存在，《史记》中与《左传》相同的事实是刘歆伪造《左传》时加进《春秋》的。这是一种过分附会的观点。《国语》即便与《左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文章、事实上都有相互的出入，亦有同事异文者，此书是否为同一人所著尚且是个疑问。总之，从此书止于以三家分晋成为诸侯之事来看，无疑有着某种对时世有感而发的内容。作为史家一般所采取的时代分期，认为战国时代起于从晋之三家被周威烈王承认为诸侯之时，以如此具有起源意义的重大事件结束记事，应该是有其理由的。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序赞曰"驰说者骋其辞"，这或许指的就是《国语》。这句话之前的"儒者断其义"是指《春秋传》，如此可明了《国语》的编纂旨趣。而且司马迁在同一序赞中又有"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云云。由此亦可推测《国语》著者究竟当为何许人也。也就是说，这是春秋末至战国初，儒家一派列举各种前代事实，为了以故事的形式来说服君主，所巧妙创作的一种体例，于是形成了一种文体。这种形式足可称为"国语"，当然最初开始主要就是为了讲故事，而不为书于简策，所以这毕竟应当是以口头传承为主的形式。而且在那以前应该还是以口头传承书籍的时代。《国语》记载的各种国家之事，其中被认为与《春秋》的意见相左之处，如将楚国、吴、越国的故事也都像《楚语》、《吴语》那样作为一种"语"而撰写。最详细的是《晋语》，几乎看不到秦的记载。后来成为秦始皇焚书动机之李斯的上奏中有曰："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这里所说的"语"应当正相当于《国语》之类。李斯所言是指：各国皆有故事，讲述往事，诽谤今日，那种故事逐渐随着讲述者的意识，成为了歪曲事实的创作。总之，《国

语》大体上说是儒家思想的说客们，为了陈述自家的某种主张而引用各种往事，《国语》即是对这种陈述故事的汇集。看来，这些内容的实际载入竹帛应该是后来的事，写入竹帛之前很可能是作为口头故事流传的，从书中多有晋国之事的内容来看，那应该是战国三晋人所讲述的内容。三晋从来就是说客辈出之地。这类将自己对时世有感而发的主张寄托于故事之中，并且最终集结成书的情况，从日本的《大镜》、《荣华物语》来看也有类似的情况。① 将《国语》作为史料时，要考虑到李斯所谓“饰虚言以乱实”的成分，注意其中“驰说者”的夸张之词，可以采用那些传说中的事实。

与《国语》相似，随后出现的书籍是《战国策》。所幸的是《战国策》中附录有刘向在校订时所撰写的类似题解的文章。由此可知，《战国策》又称《国策》、《国事》，或称《短长》、《事语》，或称《长书》或《修书》。刘向采用了《战国策》的书名，他说：因为这是一部汇集了战国时游说之士用来为国家出谋划策内容的书籍，所以可称《战国策》。按照这一说法这是一本战国谋策之书，然而，本来作为“国策”一词使用的原意究竟是不是“谋策”之意尚不清楚，或许是“简策”的意思也未可知。当然，“短长”一词看来是作为“纵横”之意使用的，而从“国事”、“事语”的词语来看，毕竟还是在各国间流传的一种故事的意思。而“长书”、“修书”则指的是很长的书，不见得就是“短长”的意思。看来《战国策》一书正是处在书籍从口头故事发展为载入竹帛之际，特别在载入帛书的开始阶段成书者，由于从来简策之书多数都极为简单，而《战国策》的篇幅却较长，很可能这是最初的长篇书籍。从这层意思来说，此书又称为《长书》、《修书》。当然此书与《国语》一样，也是驰说家出于游说的目的，根据需要编撰的书籍，内容无疑是出于游说的需要而有着对事实的改变。而且，本来就是出于记载游说用语的目的，所以此书从一开始就不重视对年月的记载。司马迁记载春秋时期年月依据的是《春秋》，而对战国时期年月的记载正如

① 《大镜》，成书于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的纪传体历史故事，作者不详。《荣华物语》乃平安时代的古典作品，是女性作家的编年体历史故事小说。

《史记·六国年表序》所言,依据的是《秦记》。特别是现存《战国策》是经过后世种种窜乱的,有的地方本是当初《史记》引用《战国策》的内容,相反今本《战国策》又从《史记》中引用回来了。从此书的史料价值上来说,利用时不能不考虑到这是游说家歪曲事实进行游说的作品。书中当然没有像《国语》那样出于儒家思想一定标准而立论的情况,应该认为其内容是站在纵横家的立场所叙述的事实。但是,由于《战国策》正好是承接了从《国语》的结束年代至秦汉之际的内容,无论如何这是当时游说的材料,所以人们一般所认为的事实就是由此获得的。

《世本》大体也是这一时代的书籍,而且应该是当时姓氏混乱的产物。本来在那以前姓氏到底有多重要还是个疑问,毕竟编写数十代系图的做法,本非春秋时代所言"姓氏"的本义。直至春秋时代,作为周代制度的宗庙制与姓氏是相关的。"姓",来自于婚姻关系,即产生于同姓不婚的必要性;"氏",则是在本宗之外分出支宗之家的情况,大抵上每至五世则须另外分出新氏,与此同时也须另立家庙。所以,不可能各个分支之家都撰有很长的系图,对这种系图上的祖宗是都要进行祭祀的。不过,《世本》可以说是记录长编系图的鼻祖。唐代的《宰相世系表》是六朝唐代系谱学的代表作,也代表了制作冗长系图的时代倾向。《世本》与此相似,即春秋以后出现了名家绝世的情况,这样的家族为了夸耀自家门地,逐渐形成撰写长编系图的情况,这大概就是编纂《世本》的理由。司马迁作《三代世表》主要就是依据了《世本》。而且战国时期人们普遍相信那些在古时对人民有功德的人物的子孙,在后世必定会再度统治天下的。《世本》就是基于当时的这种认识撰写的史料。

除以上各书之外,后来成书的还有《竹书纪年》。与《竹书纪年》同类的书籍在《艺文志》中也有收录,如《太古以来年纪》,今日已经不存。《竹书纪年》不见于《艺文志》,此书毕竟可以成为今日推测《太古以来年纪》一书内容的材料。今本《竹书纪年》虽是伪书,但是若认为真本《竹书纪年》可信的话,那么,由此足以肯定战国末以"纪年"为基础的历史编纂方式已经产生。当然,就该书的纪年本身来说并不可信。的确,有些《史记》未载的纪年却出现于《竹书纪年》,但那毕竟是战国末历算之学发展

的结果，仅仅是由推步得出的纪年而已。即便《竹书纪年》确有其书的话，也无法证明此书中的纪年就比《史记》更准确。但是从在史学史上来看，此书毕竟是将纪年与事实统一之史学体例诞生的时代标志。其中的事实有些与其他书籍，例如《山海经》、《楚辞·天问》的内容是一致的，而那些书反映的是那个时代被人们相信的传说。就史料价值而言，即便纪年上有些问题的话，亦可将其视为与《山海经》、《楚辞·天问》具有同等的价值记录。

以上所总结的是包含于《艺文志·六艺略》之中，而且又并非由那些所谓的传记、训诂而断定为具有史料价值的，可以称为外传的书籍。

五、《楚辞》及诸国之代表著述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录入的作品多达一百零六家的一千三百一十八篇，其中大部分是秦汉时期的作品，而在此之前者不过今日《楚辞》里的一些作品而已。今日《楚辞》中是以屈原、宋玉作品为主的，本来应该还有景差、唐勒的作品，现已失传。后汉王逸为《楚辞》作了注，而且在各篇篇首加序，叙述作品由来，其中也是屈原的遗作最多，载有二十五篇。王逸以前的《艺文志》中也是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是其中实际上有些作品是不是屈原之作还不太清楚。大概《离骚》可以作为屈原的原作，与此甚为相似调子的作品还有《九章》等其他一些；但是《九歌》等的调子就与此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可能是屈原对原来楚国祭神时巫祀等歌唱的删订。他作为楚国有代表性的文学者，相当于鲁国之孔子那样的人物，很可能像孔子删订《诗》那样，也删订了楚国古代诗歌。还有，《招魂》、《大招》两篇也是带有非常古老调子的作品。一般认为这是宋玉、景差等人在屈原将死时为其招魂求生的作品，恐怕这也是楚国一种招回死者灵魂风俗的遗存。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天问》，作品几乎与楚国没有关系，是中原自古以来传说的韵文表达形式。现存版本中看来有各种错简，总之是中国洪荒开辟时代以来的神话诗篇。按照王逸的观点，在楚国的先王庙、公卿祠堂里绘有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等，这是屈原面对壁画

发问以发泄自己愤懑的作品。但这毕竟是王逸从当时的后汉风俗的角度,即根据如同现存武梁石阙那样的祠堂墓阙上所绘各种图画对古代所做的解释。汉代人有按照当时之事实解释古书的风气,郑玄等就是这样,王逸看来也不能例外。即便按照祠堂自古以来也许就有绘画的情况来考虑的话,《天问》可能是祠堂的绘画作品,那么也不是有关楚国的诗歌,而应该是传至楚国的有关中原洪荒开辟说的诗歌吧。然而,由于这种关于古代的传说,与《竹书纪年》、《山海经》亦大体相同,兴起于战国时期,所以也可以认为《天问》是在楚国所流传的同类作品。与此不同,像《离骚》则是屈原作为楚的宗亲,从自己的出身说明自我位置的作品,以诗歌形式表达孔子曾实行于中原之主张,是颇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作品。本来《诗经》中虽没有楚国的诗,这是因为楚文化发展较晚,至屈原的时代才逐渐整理形成了这样的作品。所以,从一方面来说这只不过是诗赋而已,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正是楚的代表著作。如同鲁的代表作《诗》、《书》那样,可以说这是为了代表楚文化所进行的创作。《天问》等虽说是有关楚国的内容,但是其中偶然也有残留于楚的中原传说。

如同《楚辞》代表楚国的情况一样,《吕氏春秋》是代表秦的著作,战国末期出现了代表大国的各种著作。可以说《管子》是代表齐国、《墨子》是代表宋国的著述。所以,即便是表述同类事情,由于代表着不同的国家,也反映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例如同样是关于月令的内容,《管子》的《幼官》、《四时》、《五行》篇中记载的内容,由于是齐人有关月令的观点,与《礼记》、《吕氏春秋》的内容就有所不同。又如关于乡遂、六官的内容也与《周礼》不尽一致,都是根据本国传闻予以记载的。《韩非子》、《国语》、《国策》也可以视为三晋的代表作。如此,由于在这一时代的著述中都是以自己国家为中心的观点,所以即便是同一事情,也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记载。大体来说,有自古传承的大国、有文化的国家中,就有这种代表著作,这不仅仅是学派的代表作,也是反映了那个国家传承的著作。对此,从今天的角度,是应当将其作为各国的史料来看待的,而且就以某一国家的国人传说为主这一点来说,比被统一编撰的《左传》更具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了解当时各国国人思考方法颇

具参考意义。《管子》虽著述于田齐的时代，但即便是在田氏的时候，在齐国受崇拜的人物，如《孟子》所云："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至这一时代桓公和管仲仍然受到齐人的热忱崇拜。在《管子》中几乎是将桓公作为统一君主来看待的。

六、术数、方技之书

作为其他书籍，按《汉书·艺文志》的分类，还有术数、方技类书籍。说到术数的书籍，例如关于历法有《甘氏星经》、《石氏星经》。此书虽未载入《艺文志》，但大体上载入了《汉书·天文志》，此书关于星象的观点与司马迁《天官书》属于不同的学派。关于五行的著作，有《洪范五行传》，几乎原样不变地载入了《汉书·五行志》。这些书籍都是凭借《汉书》的记载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关于卜筮的书籍，很不幸没能流传至今。不过，《艺文志》关于卜筮一类的书籍是与《周易》分开，载入术数之蓍龟家的，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在汉代，《周易》是作为经书而不是术数书籍的，应该看到当时在《易》之外另有卜筮的书籍。朱子等人视《易》为卜筮书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山海经》在《艺文志》中是列入术数之形法家的。形法，即相人、相地的方法。后代有人将《山海经》列入地理类，清朝《四库全书》从此书汇集杂说的特点，将其列入小说家。汉代尚无对地理做单独分类的概念，像《尚书》的《禹贡》、《周礼》的《职方》都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书籍。在中国至今人们仍将地理与风水或曰堪舆即相地术一并考虑，可以说这是汉代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认识。关于《山海经》的成书，自古就是学者考虑的问题，朱子也有着特别的观点，即因宋人洪兴祖对王逸的《楚辞注》又作《补注》，其中多引《山海经》、《淮南子》解释《天问》，朱子据此认为以往所有对《楚辞·天问》的解说都是依据《山海经》、《淮南子》二书的，很可能此二书就是为解释《天问》而著也未可知（《楚辞辨证》、《直斋书录题解》之地理类《山海经》条）。事实上，《山海经》与《天问》多有相互符合之处，与《竹书纪年》也多有相符之处。无论如何，这是当时的地理类书

籍,中国人的地理概念,是与相地联系在一起的,亦即兼备后世的风水术的意义,所以《汉书·艺文志》将此列入形法家是很恰当的。解释地理、天文是战国时期的一种普遍倾向,当时属于地理的书籍有如《尚书》的《禹贡》、《尔雅》中有关地理的内容、《周礼》的《职方》,而在《吕氏春秋》的《有始览》中天文与地理看来是作为同一内容撰述的,《淮南子》中则是将《天文训》与《地形训》分开撰写的。这些书籍对地理的解释虽有详略的不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其中虽说又以《山海经》的记载最为详细,但书中地理的内容主要是集中在开头的《五藏山经》的五篇之中。这与其他书对地理的解释多少有所不同,虽然是以山脉为主的解释,但其解释方法毕竟有着战国时期各学派所共同的观点。虽说当时看来已经有了邹衍等人谈论天地的书籍,但今天已经失传。当时论及中国山川的内容仅存于以上各书之中。司马迁不相信《山海经》,认为各书记述九州山川者以《禹贡》是最正确的(《史记·大宛列传赞》)。但是,那是因为《禹贡》是最后被整理而成的,并且取代了其他书的缘故。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刘歆在校书时的上表中虽有所说明,但刘歆的学问与其父刘向不同,稍有些驳杂,他的说法几乎不能成为此书形成的证据。如同明代杨慎(升庵)对此书有云:禹作九鼎时曾铸上了各色各样的物形,为的是教导人民如何避开各种怪物(《山海经后序》,《升庵全集》卷二),很可能《山海经》在古时先有某种画或雕刻,然后才形成了此书。但是他所说的禹时如何如何,这只不过是中国人判断事物时有好古之癖而已。现存鼎上未见铸有怪物的,铜器中有怪物形象的亦属罕见。汉代至六朝时期的博山香炉上曾铸有山川怪物,古时候铜器上可能也铸有这类内容吧。《山海经》虽是记事文体,从其中多有押韵的部分来看,像是很早的作品。再从书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有一种以东周洛阳为中心而言及四方的感觉,由此来看这可能是周代史官的作品也未可知。《山海经》的观点后来被《纬书》所采用,但是后来又反过来有采《纬书》入《山海经》的,后汉以后还出现了将这些内容附加于《山海经》之后的情况。

《方技略》中收有医书,其中现存的有《黄帝内经》。所谓黄帝云云的书籍,正如《艺文志》注释所言多为战国时期的作品,此书也是战国医术

的遗存。另外有房中书，在六朝到唐的医书尚有遗留，今日却留存在于日本的古医书中。像《医心方》[1]就是这类书籍。总之很明确，这些都属于秦以前的记录。

七、《汉书·艺文志》未载之书

另外，还有《汉书·艺文志》未载的某些书籍，其中之一是《秦记》。《史记·秦始皇本纪》末尾有一段对秦襄公以来事迹的极为简单的记述，这被认为是《秦记》的遗存。恐怕像这样的记录在各国都有，比如鲁国的记录应该就是《春秋》。按照《孟子》的记载，虽然曾经有过晋的《乘》、楚的《梼杌》那样记载，但是现存者只有鲁的《春秋》、秦的《秦记》和《竹书纪年》等几种。《秦记》也许因为是文明程度低下的国家的书籍吧，内容颇为简单，不过记载了在位年数而已。司马迁作《六国年表》也不得不依据《秦记》，由此看来恐怕在其他国家，当时连这种有明确在位年数的史料也没有保留下来。司马迁并没有见过《竹书纪年》，书中虽然详细地记载了年数，但那是后来人用历术推步法推算得出的，自古传下来的记载大约只有《秦记》那样简单的记录。战国之际，冠以“春秋”名称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却不一定都是鲁国《春秋》那种以纪年为骨架的记录。孔子的《春秋》汇集了各种传说并给予了褒贬的判断，此书问世之后仿效者很多，但这还不是后代那种作为历史记录的、按照历日的年月顺序作出连贯记录的方法。像《公羊传》那样，由于本来《经》中就记有年月而形成了纪年体，但《传》中的年月也是从义理上考虑的年月，并不是根据历日的记载。这种情况直至战国末期都是普遍存在的。

《艺文志》未载书籍中另外还有纬书，关于纬书的形成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像《隋书·经籍志》的观点那样，认为纬书与经书同样都是孔子所著，因而其中包含有微言大义的；也有像后汉的张衡那种认为纬书产

---

① 《医心方》，公元982年由日本丹波康赖编撰，三十卷。选辑了中国唐以前二百余种医药养生典籍的理论与临床各科资料，并注明原文出处，间附编者按语。书中保存了不少已散佚的唐以前的医籍资料，对研究古代中医文献颇具参考价值。

生于前汉成、哀二帝以后的观点。近来学者中治今文学者由于今文与纬书关系密切,其观点多少总是有助于纬书的。对纬书一般多称之为谶纬,其实谶与纬是有区别的,有学者认为谶出现于前汉末期,纬书则在此以前就有了。然而,谶并非始于前汉末,而是早在此之前就已经产生了。顾炎武(《日知录》卷三〇《图谶》)认为:《史记·赵世家》中所载秦穆公睡醒后叙述上帝所语一事抑或可视为谶的开始;关于秦亡,《始皇本纪》(三十二年)"亡秦者胡也"的预言也可认为谶始于秦人;《始皇本纪》(三十六年)中还可见"今年祖龙死"这是对始皇之死的预言;《项羽本纪》可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也是当时的预言。至前汉末,王莽等人利用预言,倡导符命,为自己篡夺天子帝位作准备。后汉光武帝一方面消灭王莽,中兴汉室,一方面又是谶纬的忠实信仰者,他屏退不信谶的学者,起用信谶的学者。对谶与纬虽说无法作出绝对的区别,但是看来二者本来的发生是有所不同的,后来才合二为一的。虽说儒家中是否真的本来就有这种纬书是有疑问的,其实在古代术数非常兴盛的时候,即使是儒家,由于采用纬书对自家有利,所以也吸收纬书而发展自己,这是可以肯定的。对此,清代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纬书论》)曾有详细论述。此人认为:纬本是古时的史书,自古占卜的书、天文地理等书都保存在史官那里,纬就是其中的一种残存形式。本来孔子为了作《春秋》而读了百二十国之宝书才写成了《春秋》,当时读的就是纬书这类书籍。俞氏还解释了各种有关纬书的疑问。他解释了为什么纬书未载于《艺文志》的原因,认为这是由于刘向父子调查的是当时天子的秘书,而没有调查此外仅仅属于某些职官的书籍所造成的。例如,汉的律令由于归廷尉官保存,所以就没有载入《艺文志》。从《史记·始皇本纪》对"焚书"的记载来看,也是说非史官所掌《秦记》皆烧之,非博士所掌百家之书杂烧之。由此明确可见,博士官与史官是根本不相关的职官。所以,一直保存至汉代的术数书籍中还有并未载入《艺文志》的。《甘石星经》也属于这类书,此书虽然在《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中都有所引用,却未载于《艺文志》。这些书籍是由史官之家保存的,而朝廷的秘书中并没有。所以纬书即便不载于《艺文志》,也不能因此认为这类书最初并不存在。后汉人对纬书

抱怀疑态度,认为其成书于哀平之际,那是因为至此时纬书才流行于世成为一种书籍体例的缘故。又如后汉学者中不信谶纬的尹敏认为纬书并非圣人所作的,其理由是“多近鄙别之字,颇类世俗之辞”。俞氏认为这不过是因为史官不必都精通文字学,而且随着各个时代不同的通行文字而有所改写罢了。之所以命名为谶,是由于其经过了验证。记录已经过验证的事情,就成为史官的记载,其内容并非作为对未来的预言而予以记录的。以上就是俞正燮的观点。

本来,这种预言即使并没有明白地写成纬书,也可以认为流行于战国至汉初之间。像《洪范五行传》就是一例,此书被认为是对《洪范五行》的解释,内容是以五行为根据所作的预言方法,据说出自传授《尚书》的伏生。这已经是一种在体例上不易与纬书相区别的体例了。今存纬书大多残缺不全,其中完整保存下来的是《易纬》。不过《易纬》中也有像《乾凿度》并不都是怪异的内容,而是与《易大传》无太大差异的书籍。但是其他纬书则都是些文字怪诞,不知所云的内容。后汉时期流行的有七经纬:《易纬》、《书纬》、《诗纬》、《春秋纬》、《礼纬》、《乐纬》、《孝经纬》。此外还有与《河图》、《洛书》、《论语》相关的纬书。纬书中还有所谓“候”与“图”,候是预言的意思,后汉时期非常流行,被称为“内学”,经书则称为“外学”。纬书中被认为也传达了某些经书所未载的真实情况。所以后来在后汉末郑玄、宋均都相信纬书,并为其作注,还以纬书解释经书。从六朝时期开始,出现了不信纬书的君主,如北方石勒之子石虎,南方齐、梁时期也开始不信纬书,隋炀帝最终禁止了纬书。据说今日纬书的残缺与隋炀帝的禁纬有关。但是,看来直至唐代都是能见到纬书的。

认为纬书是古代史官记录遗存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总之,由于很可能术数家在起家时是凭借概括古代记录以成一家之言的,所以不能就说今存纬书并没有经过他们的加工。但是,其中确实既包含有古代的记录,也包含了直至汉代发达的天文、地理等新术数。其中亦有可以用于解释经书的内容,也有在经书形成之后发达起来的术数内容。其中有关天文、地理的观点比经书还要发达。在汉初,纬书同经书的《传》是一样的,看来与经书并没有截然的区别。《太史公自序》中“《易》曰‘失之毫厘,

差以千里'"一语不见于今本《易》,却见于《易纬》。《太史公自序》中还有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一句,则是出于《春秋纬》。直至太史公的时候,如同经与传不分那样,经与纬也是不分的。因此读经者不论是对纬书还是传记,都同样是作为对经的一种解释来看待的。后来,内容多了起来,成为了谶纬,才与经书分别开来。总之,纬书的起源应该说是在秦汉以前。

八、先秦著作的发达程度

关于秦汉以前的书籍,以上主要从《汉书·艺文志》所载和未载书籍两方面,予以大致的论述。如同俞正燮论及纬书时所言:史官和其他专门官司都保存有记录,至春秋战国时期则形成为各种著作,官司各失其职守,从而演变为一家之言。这就是经书、诸子百家和其他书籍的起源,而那些最初的官司记录,则不过是与其执掌相应的必要记录而已。就卜筮而言,则只是记载一些应验的内容,并非逐年逐月的记录;就天文而言,也只是记载些推步的成绩,并非由此为了说明人事关系,从年月上所整理的记录。总之,如同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赞》所云:不过是一些根据各自执掌需要所作的专业记录而已。而那些官司任职的官师也只是根据职务的需要有所记录的,所以后来这些记录演变为诸家时,才成立了诸家之术之最早的著作。就今日而言,像《春秋》那种按照年月顺序记载的书籍,虽然可以认为是以当时历史的观点所汇集有关人事内容的书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春秋》最初仅仅是治人之书即政治书籍,而叙述古代事实的书籍则被认为是《尚书》。《尚书》虽并不以年月顺序编纂,反而是叙述古代事实的,即历史书;《春秋》的内容虽说按照了年月顺序,却被认为是政治书籍。这是当时极为真实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了汉初。当时还没有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而编纂的史书。官师的记录虽是历史的材料,但是这种材料首先并不是利用来编纂史书,而是形成了儒家及诸子百家的著作。而且,随着这种趋势,各家都试图以自己的一家之言改变天下,并包容他家之长以提高自家地位,就像儒家吸取了纬书、道

家,道家也吸取了名家、阴阳家那样,战国时期各家就是这样在相互之间混杂相生的。当然,这期间还有本来并无所谓一家,进而形成为一家的农家、纵横家等。最后产生的则是《吕氏春秋》那样的杂家。诸子百家学说,由于各取他家之长,所以逐渐出现趋同趋势,而从一开始就以创作具有各家共同点作品为目的者,又属杂家的《吕氏春秋》。以春秋命名的作品虽然以前就有过,但那些书并非模仿《春秋》那种逐年逐月的记载方式,而是模仿了以义理进行判断的笔法。《吕氏春秋》也是一样,是以《月令》即天子每年的定例活动为纲,汇集了诸子百家的语言而成书的。这一点在著述方法上是一个进步,《吕氏春秋》对按年月记载之著述的发展是一部具有促进作用的作品。但是当时的著述还是以每年的定例活动为基础,不是以漫长岁月具体事实为基础的著述。

但是就这一点而言,《左传》就成为有疑问的著作了。对《左传》的成书自古就有各种议论。《汉书·楚元王传》也说《左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仅传其训诂,而引用传文解释经文的做法是从刘歆才开始的。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春秋左传书式考》认为:直至后汉时期,服虔的《左传》也只是有传无经的本子,经是另外刊行的;《汉书·艺文志》中所见《左氏传》也与经无关。对此,有一个问题是没有搞清楚的:即最初那种有传无经的《左传》,到底是像今天《左传》这种按年月顺序记述的呢,还是不拘年月,为了使本书成为具有像《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那样模仿孔子《春秋》经书的参考事项呢?如果从最初开始就是按照年月顺序记述的话,那么《左传》就应该是以年月为经的记载体例著述的开山鼻祖。《春秋》虽也是按照年月进行记载的,但其重视的不是年月,重视的是如何根据事实的义理做出判断。所以,究竟是从《吕氏春秋》的形式直接发展为《史记》的形式呢,还是二者之间经过了《左传》的形式呢?对此还不太清楚。但是司马迁有一句话是值得考虑的,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序》谈到《左氏春秋》时,只说其"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而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年月的情况。而且司马迁还指出:直至他撰《十二诸侯年表》之时,自古以来著述家虽然都只是为着贯彻各自专业的目的,却从未有人依照年月顺序进行过撰著。如此看来,即便最初的《左氏春秋》中多少有些年月的记载,也

不能说已经是以年月为历史的重要基础的著述了。综上所述，从春秋至战国之著作的发展进程，应该先是由官师记录形成了儒家和其他诸子百家的一家之言，出于倡导各自的主张而形成了著作；进而又发展形成为具有相互共同内容的著作；最后出现了《吕氏春秋》这类著作，虽说形成了一种以每年的定例活动为主的记载，但那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今日我们所说的历史著作。而我们所说的历史著作是从《史记》开始的。

对此，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书籍是从何时开始形成帛书即以墨书于绢帛的问题。这与书籍的广泛形成，特别是著作的兴盛有很大关系。因为书写的便利推动了著作的发展。原本，笔是否从最初就是毛笔还不太清楚，本来好像就有刀笔之类用来刻画的工具。然而，用竹管作为书写的工具，在古时已经出现。如《诗经·邶风·静女篇》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郑玄解释这彤管为赤色的管之笔，认为是"女"执掌记录时使用的工具。不过，对此多少是有所质疑的。由于郑玄经常以汉代所存器物解释古代，所以是否周代果真有此器物尚不清楚。刘向《新序》卷一中，周舍立晋国赵简子门外三日，简子问其原因，周舍答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随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从文中"墨笔"一词来看，可以肯定这不是漆书，不过此事是否为赵简子时期之事则是有疑问的，看来这应该是历史观相当发达之后的记载。但是在春秋末至战国初，看来已经出现了书写于绢帛的情况，《论语·卫灵公》曰："子张书诸绅。"虽然《论语》未写明此事的时代，但是此并非漆书是肯定的。《庄子》中的"副墨之子"、"洛诵之孙"，被认为是墨书产生之后的人物。以上记载的年代虽然都不甚明了，但是推测而言，以墨书于绢帛的情况大致在战国初期已经出现了。

本来，墨是用于文身和龟卜之墨兆的，后来才逐渐发展，用于文章的书写。与竹简漆书相比，竹简墨书是进步，至绢帛墨书则为又一进步，如此著述变得容易了，长篇书籍应运而生。在记录于铜器、竹简的时代，刻书是很困难的，所以书写文字就更有厉行节约的必要。因此，如果认为古代人可以将语言原样不变地进行书写的话，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像周初的铜器，就尽量将语言简省之后书写，有时以双声叠韵出现的词语，就

仅举其中一字来表示全意。自周宣王前后开始，语言也发展了，书写方法也发展了，与周初相比辞语得到了整顿。至战国时期把那些以往省略的助字也写进了文章，这应该就是帛书发达的时代，具体说很可能是在战国初期。到了秦始皇时期，出现了统一的国家，政治趋于复杂，特别是像始皇那样好刑名的天子，以至亲自批阅文书，文书的数量增加，书写亦需要提高速度，结果出现了隶书的使用。这虽然出自那些需要速记的狱吏的文字，但是由于十分方便，所以在汉代成为了一般通行的文字，即所谓今文。由此形成了著述的兴盛。以散文形式自由自在地书写，这种著述的发达形式的形成，应该说由于隶书的出现导致书写大大简便之后的结果。像《管子》那样，题为经言的辞句非常简捷，往往出现有韵文，这是以往传下来的；将此内容予以推广，并加以自由论辩的文字很可能就是隶书出现之后写作的。儒家等其他书籍也同样，像《礼记》大概就成书于秦汉之际。

九、史官的地位

在这里，附带谈谈春秋战国时期史官地位的问题，我想这是有必要的。关于史官的传说在这期间可谓各式各样，大体上是认为史官是一种应该直笔的神圣职务。本来，史官在周代看来是特别显赫的职务，那种在殷代地位显赫的巫职至周代已成为下等职务，民间也有了巫医的职业。殷代有许多出身于巫的贤人宰相，周代则不同，史官发布预言，或叙述前言往行，劝诫居住的故事多了起来。大体上，史官也是一种世官。春秋时期也是这样，这类官位的世袭情况又如卜祝，也是世官，例如《论语·雍也篇》所见祝鮀、孔子弟子卜商等就是这类人物。然而，大体在春秋时期，世官之中史官已成为最主要的职务。正如汪中等所指出的那样，天道以外的事情也逐渐纳入史官的职掌。尤其是当各种职务越来越有赖于记录才得以实行的时代，无疑史官的职务也越发显出其重要性。因此，有关史官直笔的记载，有如晋大史董狐，在谴责赵穿弑杀灵公时，赵穿的同族赵盾竟然不予讨伐，而做出赵盾弑其君的记录(《左传》宣公二年)；又如

由于齐国大史做了崔杼弑其君的记录，崔杼怒而杀大史，之后大史的弟弟又做了同样的记录也被杀，如此兄弟有三人被杀，他们的弟弟仍然做了同样的记载，崔杼也只好听之任之了。那时南史氏听说大史都被杀了，于是自己也带上写好的简前往，途中听说已经写罢，就回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类的记载究竟有多少是事实虽然不太清楚，无论如何，反映了春秋时期视史官为神圣职务的思想这一点是明确的。暴恶者也无法将大史一家全部杀绝，因为在习惯上，灭绝世官之家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于是当时史官具有了神圣的权利。

天子、诸侯都设有史官是肯定的，据记载诸侯的大夫家中也设有史官，晋国赵简子的周舍即一个例子（《新序》卷一）。至于战国时期，秦与赵在渑池会合时，各有御史一同前往，并相互记录了秦王、赵王的举止言行（《史记·蔺相如列传》）。这种御史在秦代执掌天子秘书，成为了枢密职务的御史大夫。刘知幾《史通》云：在古时，于男史之外有女史（《史官建置》）。即《诗·邶风·静女篇》中执彤管之职，彤管是女史为记事垂教所使用的工具。古时候，人君在外朝设国史，在内朝设女史。诸侯王等族内的记载应当就是由此而出现的吧。例如，晋献公迷恋骊姬时，闺房中谗言太子申生的记载（《晋语》及《列女传》）；楚昭王与蔡姬宴游时，蔡姬曾约定殉死，楚王让史官将此事记录下来的记载（《列女传》）。刘知幾认为这些内容都是女史所记录下来的。这种情况是可以想像的。在贵族政治时期，就连闺房中事也都要有记录，这种情况在后世也有。像北齐文宣帝那种淫乱狂暴君主的个人行为也多有记载，据认为这都是由于有了《起居注》的存在。在日本也是，德川时代的后宫之中，就有像目附①那样的老女②的存在。但是，如果说留存至今的这类记载皆出自女史之手，则是难以置信的。由于《国语》、《列女传》的内容很多本来都是口头传说，所以无法据此断言说一定存在过女子记录官。尤其是到了书籍成为简策时代，文字读写是件重要的大事，非专业职官是不能从事这一职业的，而且

---

① 目附，江户幕府的职名。本是战国时期监视将士和敌情，并向主君密告的职务。

② 老女，武家侍女长。

不可能是任何人都可以执笔的。即便史官留下了记录，也只是些很简单的文字，详细内容则大部分是作为故事流传下来的。这些都是由于到了战国时期，记录成为十分自由的事情以后，才被写入书中的。因此，关于这些史官直笔的故事，都只不过是当时对传说的记录而已。尤其那些记载，由于都属于同一流派继承人的作品，不乏故意夸大这一职务，颇有推崇之风气，所以应该认为他们都是特意保存了对自己有利内容的记载。晋国韩宣子来到鲁国，让大史观书时见到《易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尽在鲁国的记载也是这样，应当是在《易象》、《春秋》流行于世之后出现的传说，不可视为当时的实话。无论如何，由于历代都有史官，刘知幾也举秦取天下时太史令胡母敬撰写《博学章》之例，这是他依据《汉书·艺文志》的阐述，但事实上"史"只是执掌小学，即执掌文字的职官，而非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官职。所谓让史官负责保存记录，这意思是说：由于史官是懂文字之官，一旦有事情就要记录；像后世所说的"直笔"并不一定就是当时的实情。但是，看来当时确实存在世职受尊重的情况。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的时代，司马迁本人就是世袭了史官的职务，因此他对历代世袭执掌史官的职务感到自豪。

第五章 《史记》——史书的出现

一、思想及记录统一的趋势与《史记》的出现

以上大体讲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书籍的逐渐出现以及史官的情况，下面再来谈谈秦汉时期，特别是汉初众多著作的形成及其流传至今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是在汉初由传承各个流派的诸子百家，为了主张各自的一家之言，并附加以新的内容，而最终成为今日书籍的。看来，像儒家的《礼记》那种传记大部分内容也是在汉初写成的，即便"诸子"也是敷衍原著旨意加以解释的著作，大多也是汉初经过附加而形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在汉初也确实形成了一些特别的著作。例如像贾谊、晁错以及《淮南子》的作者们那样，就都是继承战国遗风而撰写了各种著作的。但是，大体上说贾谊等的著作，与《礼记》等是同样的著作，不过是为儒家学说张目，以便使其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已。不过，从贾谊、晁错于儒家之外，兼治名家、法家之说的情况来看，当时的儒家大多杂治其他学说，而非纯粹儒家，只有齐鲁之间的儒家还是纯粹的学派。另外，也有像《淮南子》那样，继承《吕氏春秋》学风，总括诸家学说的著作。无论如何，这期间是一个作为战国的延续，将战国的著述载入书籍的时代，也是一个盛行敷衍、解释战国学说的时代。另外，对各类诸子百家进行比较评论的著作大多亦当产生于这期间。在这类著作中有《庄子》、《荀子》中针对诸家的比较论，从《史记·太史公自序》来看，司马谈也论及过六家之要指。也可能这是自战国末兴起的一种风气吧，看来直至汉初这种风气一直极为流行。结果，刚刚一进入汉朝统一的时代，人们已经感到有必要对各种

思想予以统一了。《淮南子》就是用杂家思想所做的统一,这完全是对《吕氏春秋》系统的延续。另一部也往往被认为是受到《吕氏春秋》影响的著作,即实现了在事实上的杰出的思想统一和所有记录统一的司马迁的《史记》。

这种观念并非开始于司马迁的时代,在他父亲司马谈时业已形成。但是,司马迁的治学宗旨与其父有所不同,所以完成于司马迁之手的著作,与其父当初的设想已经是大相径庭了。这是因为司马迁曾致力于当时的种种学问,并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的结果。这种记录的统一,在形式上虽说继承了司马谈的事业,但在思想内容上则应该说是对董仲舒思想的完成。《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在此之前,过去那种出于种种目的的记录,即依据官师需要的记录,曾一变为诸子百家的著述,但《史记》则完全不同于以往著述的性质,事实上已经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历史著作了。当然,司马迁的著述目的与今天我们所要求的著史目的未必相同,但他所完成的这部著作在事实上已是我们所要求的历史著作了。总之,这是一部大著作,撰写这一大著作的司马迁具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可以说《史记》的著述首先离不开司马谈的计划和董仲舒的思想,但是毫无疑问完成这部不朽大作,则不能不说凭借的是司马迁其人的力量。

大体而言自战国末至汉初由于杂家得势,当时的记录体例也从以往诸子百家那种以自己一家之言压制诸家,以此变革天下的观念一路变化过来,渐渐地书籍编纂法也出现了类书体。此后,类书体书籍成为了必要,而且其势力由此历代经久不衰。其间虽有司马迁《史记》曾打破过类书体例,成为一种完整的形式,但那完全是司马迁个人的天才所致,而记录需要类书的出现则是时代的大势。在古时候史官是凭借记忆"前言往行"来告诫君主的;而记录出现以后,为了将记录能够应君主需要随时引用,从而进行了编纂。这种类书体书籍一直久远地延续于后世,无论刘向等人的著作,还是那些留存至今的著作,都是这种体例的著作。司马迁的《史记》则不是这种单纯为了君主所编制的参考书那样的类书,而是以一种具有继承孔子《春秋》、以自身天才树立著述系统之创作意图的著作;

所以应该说《史记》完全不是那种单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作品，而是应司马迁这一大天才的要求才得以诞生的。

自从《史记》问世以后，在中国几乎再没有出现超越其上的史书了。与诸子百家比肩的杂家，虽说是一大变化的最新体例，按理说已经成为了中国最为上乘的史书，但是评论《史记》则几乎与评论全部中国史书具有着同样的价值。

二、《史记》的著述目的

关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以及作为《史记》成书后的结果在史学史上所表现怎样的价值，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首先，关于司马迁本人对《史记》编纂旨趣的考虑，其中最主要的部分都写进了《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中既有编纂旨趣，也有自家的传记。按照司马迁的认识，历史编纂毕竟是一种世袭的职务，所以世世代代有编纂历史的义务。所谓自序的体例，虽然在以往的《经》、《传》、《诸子》中也都有自序，但是要说集大成者毕竟还是《史记》的《自序》。以往的自序或单纯记道统，或只是与诸家做比较评论，而司马迁则二者兼顾，其父已将六家之要指加入评论中，他又加上了对《六艺》目的的评论，明确表示自己是根据《春秋》的目的而著述的，而且阐明自周公至孔子五百岁，自孔子至自己又五百岁，自己是以著述这一道统之传承为旨趣的。《太史公自序》是值得精读的重要之作，其中应该注意的是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之间意见相左之处。司马谈相比较而言是道家的人物，其论六家要指也特为有助于道家的，这应该说是当时风潮所致。从汉文帝、景帝至武帝初年是道家的全盛时代。但是司马迁则根本不是道家而明显的是儒家，他继承了董仲舒的学问，以《春秋》的微言大义著述了大作。不过在《自序》中多少还是有着谦逊的意思，另外也是出于不触犯当时天子等忌讳的必要，他也确实没能对自己的目的给予足够的畅所欲言。对于司马迁继《春秋》以作《史记》一事，在当时似乎对此就有人持怀疑态度，这从《自序》所载上大夫壶遂之疑问是不难看出的，对此司马迁也谈到了自己意见。壶遂的疑问是：

《春秋》之所以问世是因为在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所以他作《春秋》,主要是为了留下空文以便对礼义有所判断,以此相当于一王之法。但是,如今司马迁的时代,上遇开明天子,下得职守,万事俱备。既然如此,又为何要著述呢?对此,司马迁回答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对当时人讥刺而已。自己之所以著述汉朝之事,是因为汉德兴盛,可喜可庆之事频出,为了普遍宣传之也是有必要予以著述的,更何况自己出生于史官之家,对此进行记述也是一种职责。自己只是讲述往事,整理世传史料;而并非用一己之见做出新的著述。将我的著述比之《春秋》是错误的。① 然而,事实上司马迁的著述并非仅仅叙述了汉代之事,他的目的是在于写作一部上启洪荒开辟,下至汉代,无所不贯通的宏大记录。以上与壶遂的答问中,稍显谦逊而且就汉代之事的种种评论也是尽可能予以了隐讳的表达的。这是由于正值写作《史记》之时,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获罪,所以在撰述《史记》时不得不对自己的意见隐讳其辞。在世间如此窘迫的压抑下,成就如此伟大的著述,这本身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惊人才华。

三、后代对《史记》的评论及邵晋涵的评论

自古以来,评论《史记》的人物就有各式各样,对此书的形成由来也有着各种评论,至于近代对于《史记》的评论则更是有着相当的发展。《史记》成书以后,很快又出现了《汉书》,之后的历代史书由于以因袭《汉书》体例为便利之途,以致这种体例得到了广泛地使用。至于《史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尤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记》所记上古之事，在晋代出现了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这是一部虽无见解但汇集博洽的书籍，由于其使用方便，像《史记》那种有见解的书则不再通行，当时对古代的了解主要是依靠《帝王世纪》的记载。于是，像刘知幾那样非凡的史论家，也是袒护《汉书》而非难《史记》。实际上仿效《史记》笔法书写历史者，开始于欧阳修的《五代史》；而通过评论发挥《史记》特征的则属郑樵的《通志》。但是事实上，还不能说郑樵等人就已经十分理解《史记》的思想了。直至清代才逐渐出现了对《史记》能够做出精密评论的人物。例如在古文家之中有方苞（望溪）的评论，虽说他做的还只是对各个局部的评论，但却是相当透彻的评论；又如能够从全盘把握上作出评论而且甚得要领的邵晋涵；还有就是能够从论及整个历史的角度发现《史记》长处的章学诚。邵晋涵和章学诚可称为乾隆末年的史学两大家。邵晋涵在当时就已经是公认的第一流史学家了，章学诚虽说在当时尚未受到广泛承认，但是如果从邵晋涵极力赞扬章学诚的事实来看，可见章学诚也很受有识之士重视的。邵晋涵对《史记》的论述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一论述本来是在《四库全书》成书时，作为《四库全书提要》的内容而阐发的。当时邵晋涵在编书馆中，撰写了很多有关正史的提要，他的提要虽然多被采用，但是他用力最多的《史记》提要却基本上没有被采用，那是由于他与总纂官纪昀（晓岚）意见不合所致。邵晋涵以其敏锐的见解论述了《史记》的由来，但纪昀似乎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已有价值论定的书，所以不应以一人之意见予以评论，因此，改为以古来《史记》的注释进行评论为主，而把对《史记》本身的评论全部删去。但是，看来邵晋涵是很有自信的，因为他将草稿保存了下来，因此今天仍然可以见到（作为《四库全书提要》分纂稿收入《绍兴先正遗书》第四集[①]）。这可以说是有关《史记》总体所进行近代式评论的权威之作。

邵晋涵对《史记》的评论大体可概括如下。他认为：其叙事多本于《左氏春秋》，即所谓古文；在此之外又增写了秦汉以来的故事。其义

① 《绍兴先正遗书》：徐树兰辑，清光绪年间会稽徐氏友兰铸学斋刊本。

取之于《公羊春秋》，辨析文家质家之异同，论定人物等多文而非实之意，皆公羊氏之法。司马迁曾受《春秋》于董仲舒，而董仲舒是公羊学者，所以司马迁亦特别申明公羊学义例。虽然未必尽如得圣经之传，但是由此可以了解汉人之经学各有师承的特点。其文章体例参照《吕氏春秋》，而稍加变通而为之：《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史记》则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立纲目之首尾贯通的方法也很相同。世人曾讥讽司马迁之义法有背经训，又称赞其文章为创古独制的看法有失公允。大体来说，以上的评论既有中肯得当之处，也有不妥之处。所谓叙事多本于《左氏春秋》，如果说这并不意味着是指今天的《左传》，而是原先的《左传》的话，可以说这一评论是得当的。所谓古文的评论也是对的，司马迁是信古文的。当时的经书大部分是今文，而《左氏春秋》则由于没有传授的经师，看来反而以古文的形式在流传。总之，司马迁应该是以古之书为可信的，但他采取了《公羊》之义法亦为事实。至于文章体例参《吕氏春秋》而稍加变通的观点，或许《史记》在整体结构上借鉴了《吕氏春秋》也未可知，但是在内容上却与《吕氏春秋》的写法截然不同。《史记》不是《吕氏春秋》那种有如类书体例的汇集，而是写出了自己对前后原因结果的认识，更何况以纪年为本的写法更应该说是司马迁的独创吧。邵晋涵针对世人曾讥讽司马迁之义法有背经训的观点，认为《史记》遵守了公羊学；针对所谓文章独创的观点，认为《史记》参照了《吕氏春秋》。前者虽说正确，后者却未必妥当。

四、《史记》编纂的体例

总之，无论是司马迁的写作方法还是体例，应该说在各个方面都是有其独创性的。关于《史记》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写作，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论及其大意。从中可知：《本纪》在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是对王者形迹所兴，作出原其始、察其终，见其盛、观其衰，论其行事的考察，而且是从三代开始上记黄帝，下至

于现在。其次关于十《表》,他说:即便按时间排列,区别世代也不明年代顺序者,则作十《表》。关于八《书》,他说:将礼乐律历的更新、兵权、山川、鬼神等天人之际、承袭通变的内容作成了八《书》。关于三十《世家》,是记载那些从辅弼王者的股肱之臣的,犹如二十八宿之环绕北辰,三十辐条之共一车毂的关系,故作三十《世家》。至于七十《列传》,是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而作的。司马迁就这样逐一叙述了《史记》编纂体例的精神。总之,就全体而言,《史记》是采取了孔子《春秋》之义法的。即由于《春秋》那种治人之法明确的经书意义并未为世人所明了,所以父子君臣关系紊乱。《春秋》是礼义之大宗。所谓礼与法,礼禁于未然之时,法施于已然之后。所以自己是为了弘扬《春秋》之义而著述的,暗中寓以褒贬之意,表达了劝诫世人的宗旨。也就是说他是为了留下公羊家所言天下大一统应有之教训而撰写《史记》的。因此,从《史记》的整体来说,全部都是他的独创。

关于司马迁本人的这段话,如果就其趣旨进行评论的话,首先就总体来说,以往虽然也有记录、著述,但那都是些一家的记录,或一家之说而已。司马迁则不然,他面对一统天下,能作出总括的记述,而且通过考察从前代直至当代的原因结果,观其盛衰,才首创了这样一部既是记录又是著述的宏大著述,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而且就《史记》的趣旨而言,暂且不说其已经包含了后世所谓历史的全部意思,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史记》既不仅仅是记录,也不仅仅是著述,而是记录与著述二者兼而有之。司马迁虽然自谦地说这只不过是记录而称不上著述,但实际上他在暗中还是从反面称其为著述。不仅如此,司马迁还以十《表》创立了年代学。事实上,在以往《春秋》等著作中已经有了按照年代的记载,但那毕竟不是有意识的年代学记述,可是司马迁却是明确而自觉地进行年代学记述的。另外所谓八《书》,在单纯的王者事迹和年代学之外,他明确承认自己所写的是有关天人之间学术、技艺的变迁。司马迁称之为"天人之际",意在指出这是一种自然文化,而其他则是以人的文化为主的内容。其次是《世家》,由于后来的正史中基本都没有袭用这一形式,所以有人曾非难司马迁设置《世家》体例是无用的,但毕竟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之

前还在实行封建制度,①《世家》正是反映这一历史的写作,对此妄加非难是不够妥当的。特别是他撰述的《列传》,更可谓出类拔萃创作思想的产物。《列传》的主要目的在于记载那些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这一点在《伯夷传》中是有明言的。② 司马迁认为:这些人物是春秋战国以后才出现的。本来,在古代实行的是世禄世官制,仅凭一个人的才力几乎是不可能有着特别举动的,那时单凭世族家庭的出身就可以得到职位。可是,在春秋战国以后出现了单凭个人才力也可以立有功名的现象。司马迁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写出了七十《列传》。如果单从史书体例而言,似乎没有必要为一人之事做详细的记载,但是《史记》的体例却是历史记述与传记兼得的,对他来说二者都是有必要的。

司马迁不仅在以上《太史公自序》中概括地表明了自己的著述目的,他还时时在《史记》本文之中阐述着可称之为他自己写作目的和著书凡例的内容。因此,将这些内容厘出,并进行前后对照考察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以往的《史记》评论家对此都没能予以注意。这里,试做一大致的说明。首先,是取材的方法。对此《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亦即综合各种经传之异,统一百家诸说之意,这就是大体的轮廓。就史料的精选方法而言,《五帝本纪》赞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见于《大戴礼》),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些话与《自序》的内容是相呼应的,讲明了《史记》的编纂方法。以其他书记的

① 内藤湖南这里所说的"封建制度",即诸侯王分封建国制度。

② 在《史记·伯夷列传》的结尾,太史公写道:"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内藤湖南这里所说的"明言",当即指此。

观点弥补经书之阙的这种方法，在后来王充的《论衡》中虽也有所论及，司马迁却早已经注意到了。即便近年，清朝的学者也是信奉这种编纂方法而进行研究的。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观点，作为历史编纂方法，纵然是诸子百家之说，只要是经书中所阙如的，也应该采用。但是对所谓不“雅驯”者不采用的观点，这在当时也许是个好方法，但却很难说就一定完全正确。同样的意思，他在《伯夷传》中也有所论及。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毕竟，在他看来不载于《六艺》的内容多不可信。又如，《大宛列传》赞中也有着同样的意思，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那种一切皆采用雅驯者的主旨，由此可见一斑。雅驯就是正确而且有教益的意思，即在逻辑上是合理的。这在当时虽然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认识，但是因此也产生了将古来怪诞传说予以合理解释的倾向。例如关于殷、周祖先出生的由来，在司马迁所学诗传中可能是无父之子的。褚少孙在补《史记》时也持此“无父而生”的观点（参见《三代世表》的篇末）。然而，司马迁却认为他们皆为帝喾之子。这与《毛传》的观点是相吻合的。当时，《毛传》之说业已存在，到底是司马迁采用所谓异传的产物，还是司马迁之说成为了《毛传》的依据，这就说不清楚了。无论如何，这一说法比三家诗传更具合理性，而与以往奇诞传说的原型有不同的地方。就这一点而言，在司马迁的判断方法中也显出一定的弊端，而且在司马迁以后的史家们越来越一味地助长了这一倾向，而没有哪怕很少的反省之处。这种必须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的观点，从今日进步的认识来考虑的话，虽说未必一定合理，但在当时则是进步的认识。

其次，司马迁思想中另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十《表》，特别是《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序文中所表达的主张。在《三代世表》序中，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

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这段话反映了司马迁的慎重态度,此后虽有不少人写过各种上古纪年,但司马迁最初所采用的这种不记载年数的方法则是最为可靠的。司马迁、郑樵这样明敏的史家,虽然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但是在那些掌握有今日知识的中国学者中,能够理解这一方法之可靠性的人却很少。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司马迁对自己的历史编纂方法,也阐述了可以称之为凡例的内容。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总之,以往的著述并非出于历史目的而成书的,从司马迁才开始了以历史为目的,即以逐时代、表盛衰为目的的著述。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但在司马迁来说则无疑是一项竭尽全力的工作。这是因为,虽然在古时候列国都曾有过记录,但是又都已经亡佚,当时保存下来的主要就是像《春秋》那种鲁国的记录,此外虽说还应该有周的记录,对其他国家也应该以各国为中心进行合理的记述,这对历史家来说是一种艰巨的工作。同样的良苦用心又见于《六国年表》。在《六国年表》中司马迁明确指出:作为六国时代的记录,《秦记》极为简略,可是此外其他各国的史书又皆毁灭无存。秦烧书时,特别烧掉了诸侯的记录,因为其中多有讥讽的内容。所谓讥讽当指秦乃兴起于野蛮,故在诸侯的记录中记载有对秦贬低的微词。这种情况在后世也有,如入清之后,明朝记录中有关清朝的记录也都被烧掉。《秦记》是仅记年代不载日月的简略记录,依此制作《六国年表》有着何等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依据《战国策》那种不注重年月记载书籍的内容,使其与《秦记》相合的工作无疑更是相当耗费精力的。对于此后的历史,司马迁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到秦楚之际事件颇多,他制作了《月表》。编制《月表》是后世历史家所难以做到的,对于事件众多的时期这是一个便利的方式。根据事件繁简、事迹的清晰程度,分别制成《世表》、《年表》、《月表》等不同用途之表,作为这种方法的最初发明者,实在不能

不说是用意周到。

关于《表》后世是有评论的，无论如何，正如郑樵所云，《表》的制作是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的杰出之处（《通志·总序》）。然而，在以上凡例所表示的方针中，司马迁治史的缺点也显现了出来。上述《十二诸侯年表》所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即在司马迁所采用的历史材料中，有论说义理的《春秋》，有游说者不顾事实的话语，有历家根据历法推算得出的年月，有数家依照五行说所建立的古代帝王顺序，还有谱谍。其中，按照今日观点来看，真正可以成为事实依据的材料，只有系谱，和作为《春秋》一书材料的记录，以及组成游说者、历家之家言的那些材料；其他的则都是不同时期出于各自不同理由的各家观点。由于《史记》是综合这些材料写作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史记》是由记录的部分和著述各家的观点综合而成的。由于在《史记》以前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综合能力，所以才使得一些材料能够原样地遗留了下来，而因为《史记》能够将它们进行了精巧的综合，反而形成了一种正确与不正确并存的历史。并且，由于存在着一个"雅驯"，即合理观点的标准，所以即便是古代传说，其中不雅驯者也一定被抛弃了。这种利用传说对记录尚不充分的时代所进行的研究方法，在今日来看则不能不说的确是个缺点。其实，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中，有关古代的记述肯定都是由这类形式而编纂的，只不过没有谁能像《史记》这样坦率地明示自己的取材方法而已。比如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也一样，只是未明言取材方法罢了。因此，司马迁的这一表白，反而成为了我们了解古史形成情况的依据。对于这些年表以往学者基本上未加注意，但的确是应该慎重研究的内容。总之，从今天的观点来说，即便是有着种种缺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那种对当时诸多材料的综合，是一种非凡的手法。

其次是八《书》，正如《太史公自序》所说的那样，这主要是讲制度文化变迁的。其中有一些本文的内容在今本中已经亡佚了，例如《律书》中就有这种情况：《太史公自序》说《律书》主要是记载军事的，但在今本《律书》中有关军事的内容已经没有了。不过，八《书》的写作方针是很明确的，尤其是有关文化变迁的记载，《史记》中有着可称之为凡例的表述。

这在《封禅书》赞中是可以见到的:"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由此可见,由于有司所掌之详细礼仪记录已经存放于官吏那里,所以自己在这里重点描述鬼神祭祀的表里关系。实际上,《封禅书》很巧妙地记述了封禅的表里:详细揭示了人君痴迷宗教而受方士欺骗的状态。八《书》的写作大体上采取与此同样的方针,即并不着重记述有司记录中已存在的内容,而是重点描述了促成实际变迁之原因的真相。而这一点在后世效仿他的史家来说基本都没有做到,后世的正史多数都仅仅是将有司的记录原封不动地予以抄录而已。

其次是《世家》,关于《世家》,《太史公自序》认为就整体而言写的是辅弼天子的那些人物,而从世家的各种记述,或者像《太史公自序》中各世家赞所述那样,司马迁当时对此是有自己主张的。那就是能够成为天子而永远存续,或者能够成为诸侯而使家族长远存续者,自有其内在的原因。他认为其家族的前代曾经对人民立有功绩是一个重要原因。在《陈杞世家》中他表述了这种观点,说:唐虞之际其家对人民有功德者十一人,其中五人的后代成为了帝王,其余者皆显为诸侯。认为对这些家族要各自立为《本纪》,或立为《世家》。例如他认为作为舜之后代的陈虽灭亡了,但陈的末孙则是齐的田氏;杞虽灭亡了,夏之禹的末孙勾践则成为了越王。总之,这些人物都是在前代有功德者的末孙,所以才得以长久存续。而另一方面,有功德的人也自然地因此被承认具有了可以成为世家的资格。例如孔子,他虽然并非诸侯而仅仅是个士大夫,但从孔子为天下制法,传《六艺》于后世的意义上司马迁写作了《孔子世家》。最不可思议的是《陈涉世家》,即秦乱之时由于陈涉首开反秦契机,诸侯起事才得以灭秦,所以将其列入《世家》。《太史公自序》曰:"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司马迁还特别将其与前代作了对比,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这是司马迁所引之公羊家观点,与之相比较他又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因此记载曰:陈涉虽然起事仅仅六个月而亡,但汉不绝其祀,续其血食。将孔子列入《世家》和把陈涉立为《世家》,在司马迁来说具有同等的意义。

总之因为承认了其对人民有功德这一点，所以即便是陈涉这种无后世存续者，也与有后继之人者同样对待。

然而，大体上不论周代诸侯还是汉代诸侯，由于司马迁的基本观点认为诸侯都应该是辅佐天子的势力，所以在《世家》的最后他设置了《五宗》和《三王世家》，意在表达他对诸侯制度变迁的感受。汉初诸侯由于封土过于广大，于是酿成吴楚七国反乱，本应当作为辅佐的诸侯反而成为天子的对立势力。五宗、三王的形成，意味着诸侯数量增加而封土减少，从此无力反抗天子，这是一种制度上的变迁。在《五宗》、《三王》之前还有《梁孝王世家》。将《梁孝王世家》与《五宗》、《三王世家》作一比较，从中可见司马迁的编纂意图。总之，对于封立诸侯的政策，司马迁是用写作《世家》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

其次是《列传》，关于《列传》，《文史通义》（《书教篇》下）认为：《伯夷列传》乃七十篇《列传》之序例，不单单是为伯夷所立的传记。这一说法很有见地。在《伯夷传》中，司马迁指出：那些没有天子或诸侯家世相续，仅仅凭借匹夫之身向世人显示一己之力而立有功德的人物，无论他们多么伟大，若无人为其立传的话，其事迹也无法流传于后世。所以，即便是对于那些公认的古代名人如许由、卞随、务光等，虽然自己到过他们活动的地方，听到过他们的事迹，看来这些人物实际上也确实存在过，但是由于孔子未提到他们，所以他们的事迹也都湮没了。而像伯夷、叔齐，则由于孔子曾经予以赞扬，以致其事迹至今仍在流传。① 总之，司马迁所表达的意思在于：由于只有名人的传授之后方可后世留名，所以自己作七十《列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传主的事迹能够流传于后世。司马迁所记《列传》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其写作方法亦各有不同，这并非后世《列传》那种单纯人物履历书似的记载，而是采取

---

① 《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了一种极为自由笔法。对此,《文史通义》(《书教篇》下)虽然已有所论述,除了《文史通义》提到的问题以外,看看《史记》,也有可以自然领悟的地方。《管晏列传》赞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即世上许多容易见到的事情,就放任而不记载了,这里仅记录些逸事而已。这一方法也同样运用于《孟子荀卿列传》。关于孟子、荀卿以及载入此传的其他诸子,正如章学诚所说,由于能够反映当时游说之士如何著述并推行自己思想的大致情况即可,所以那些已载于诸子之书的内容就不载了,这仍是他在《管晏列传》赞中所表示的主张。

五、后人对《史记》编纂法的评论

以上大致介绍了司马迁本人对自己著述思想的表述。司马迁的《史记》编纂法,曾经引起过后世的种种议论。在这些议论中既有深得司马迁真意者,亦有不了解其真意而予以非难者。若将那些非难中的一部分举例说明的话,首先发起非难的当数班固之父班彪了。他非难司马迁违背经学宗旨,宣扬道家主张;贬低政治直人,褒扬游侠、货殖之徒(《后汉书·班彪传》)。① 对《史记》给予了整体上的非难,这是由于他对所谓"实与而文不与"②的思想了解不够,以及对《史记》所显露之公羊学法则

① 《后汉书·班彪传》:"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② 《春秋公羊传》僖公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称子何?臣子一例也。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所谓"实与而文不与",是《春秋公羊传》在进行历史评价时通过"实"与"文"的关系,处理化解理想与现实、立德与立功发生矛盾时的一种殊途方法。其目的在于维护其历史评价系统在逻辑上的完整性。

的不理解而作的非难。《史通》等书中对《史记》进行局部非难的地方很多:例如,关于《本纪》,非难《周本纪》写进了文王以前,即一统以前的君主之事;《秦本纪》载入了始皇以前秦先祖至庄襄王之事;项羽不过是窃位一时而死,并未成为君主却写进了《本纪》等等。又如《文心雕龙》中非难《吕后本纪》把女人等同于天子载入《本纪》,这也是对司马迁编纂《本纪》的真意未能充分理解的评论。本来司马迁的《本纪》所表明的是那些在古代对人民有功德的人物及其子孙成为帝王的意义。在记载周、秦之事时,之所以要追述一统以前之事,是因为后世实现一统的天子的成功,是因袭其先人功德所致。所以像《史通》那样将《本纪》单纯视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观点是不可取的。《项羽本纪》也是一样,可以看出司马迁毕竟是在其中有所寓意的。为项羽立《本纪》的真意无疑一方面表现了司马迁对项羽起于匹夫,五年之间就在事实上统治天下历史的重视;但还有另一层意思还在于:他总怀疑如此一介匹夫之所以能够暴起,总应该是有些祖先功德吧,他在《本纪》的赞中对项羽可能是舜末孙的推测,就包含了这一层意思。① 至于汉高祖,由于当时尚未形成高祖乃尧之末孙的观点,所以对于高祖起于匹夫,是将其作为天之子,即如同殷、周的始祖那样,是作为感生帝出世进行解释的。至于《吕后本纪》的写作则更是一种有趣的笔法了,当时虽说有孝惠帝在位,但实权却在吕后手中,因此司马迁是为有实权者立《本纪》的,毕竟与为项羽立《本纪》有着同样的意义。司马迁的《本纪》与编年体史书那种单纯按照年代记史不同,其真意在于记载那些当时的真正掌权者,所以他将吕后也列入了《本纪》。这种笔法是后世史家所难以企及的,这应该说来自司马迁那伟大的判断能力的产物。就《世家》来说也一样,如前所述,司马迁立《陈涉世家》是受到《史通》非难的,但是司马迁本人对立《陈涉世家》的意义是有明言在先的,所以很难说《史通》的非难是正确的。对于司马迁的十《表》、八《书》,大体上没有什么非难。尤其是对《史记》的《表》,在很早就有人予以赞赏了。

---

① 《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

从后汉的桓谭开始就认为司马迁的《三代世表》很好地模仿了《周谱》的“旁行邪上”。所谓“旁行邪上”，就是以棋盘格子作表。[1] 他很佩服其可以同时看到一家之事与全体之事，又可以方便地进行比较。对此，遭非难的是班固的《古今人表》，郑樵本于桓谭的观点曾对其予以非难。总之，从来都认为《史记》的《表》是司马迁治史最为成功之处。不过，对其也还是多少有所非难的。例如《史通》认为：于帝王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而且还各有年历，那么再作表则有所不必。然而，也有为司马迁辩护的观点，认为《表》并非不必要的重复，毋宁说正是因为有了《表》，才使得其他的记事得以简略，比如够不上列入《世家》、《列传》的人物都可以收入《表》中以表示他们的存在，所以列《表》是很便利的方式（《史通通释·表历篇》按语）。又如《史通》中对《表》的非难还有，认为春秋、战国时可以说天下几乎没有一统之君主的情况，由于各国都有各自的年历，所以有必要将其列表进行对照，但是汉代这种一统君主之下王侯的《表》则无必要。这也属不熟悉汉代制度的非难。其实汉代的王侯恰如春秋时代，是有其各国年历的，这从现存金石文也是可以证明的。因此，在司马迁的时代，尚有必要将诸侯纪年与天子纪年同时予以记载。类似的非难还有各式各样，而且对《史记》的各篇也是既有非难也有称赞的，在此仅对其中涉及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大义的观点论述如下。

六、方苞及章学诚的评论

在有关《史记》的评论中，最为精彩者是方苞的观点。虽然他的写作体例是对《史记》进行一部分一部分的评论，但是其中亦不乏贯通全盘的观点。而在他所涉及全盘的评论中，主要又在于提出了所谓的“义法”的问题。他认为“义法”来自《春秋》，而这一《春秋》的“义法”在司马迁那

---

① 《新论·离事》：“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旁行邪上”似为一种表格，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为父谁为子，一目了然，叫做“邪上”。

里得到了发挥，而且在后世文章的深层也都具有这种“义法”。他说：“义法”是《易》的用语：“义”乃“言有物”，[1]“法”乃“言有序”[2]的意思。方苞虽是在评论《货殖传》时谈到这个问题的，但却是对《史记》整体的评论。总之，他认为司马迁发挥《春秋》的“义法”，并由此治史；但是班固以后的史家却对“义法”没有心得，于是导致了文章的衰败，史法的衰败。“言有物”是说所写作的内容要充实，“言有序”是指对内容的组织构建。这是自古以来对司马迁评论中最有见地的观点。比起《史通》的许多议论，方苞的评论则更有价值。那么，究竟什么地方是司马迁的“义法”，其他的史家就没有“义法”吗？对此有必要与其他书籍进行比较，恰好方苞在对《汉书・礼乐志》的评论中有所论及。对于《史记》的《礼书》、《乐书》，方苞曾多次予以绵密的评论，在他看来：司马迁的《礼书》、《乐书》并非像后世史家所著《志》那样，仅仅陷入所谓《仪注》即罗列当时制度的顺序表似的记录。他认为这正意味着史家之所以为史家的原因所在。而且，关于司马迁写作《礼书》、《乐书》的意义，他认为司马迁在书中对古礼废于秦始皇，在汉朝虽已历五代而终未复兴的叹息是有其寓意的，其意图在于指出汉之礼乐的实行既未能因袭古制，又不合于实际的乐律是不应当的，对古代礼乐的记述在当时虽已逐渐被发现，但却未得到足够恢复的情况。尤其是在《乐书》中记载了汲黯对汉武帝所兴之音乐的讽刺。即武帝喜于从中央亚西亚所得到的天马而作马之歌，并作为音乐荐于宗庙。而汲黯认为音乐荐于宗庙是为了教化百姓的，而这歌颂西域名马的音乐对先祖、百姓究竟意义何在呢？当时的宰相公孙弘为了迎合武帝，认为汲黯诽谤天朝制度当处族刑，司马迁以这一事件结束了《乐书》。今本《乐书》的最后虽附有《乐记》的内容，但太史公的原文却在记述汲黯之后就结束了。[3] 这些都是司马迁《史记》中非常绝妙的地方。秦二世皇帝时宰

---

① 《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② 《易・艮》：“艮其辅，言有序。”

③ 《史记・乐书》：“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

相李斯曾直谏郑声之害,而公孙弘却奉迎天子之意言汲黯当族,其实司马迁的寓意在于指出人臣道义甚是衰微的情况。《平准书》的最后,司马迁记述了卜式上奏武帝,要求烹紊乱财政的桑弘羊以求降雨一事就止笔了。其中虽没有一个字的议论,但司马迁的意思却是很明白的。方苞认为这正与《乐书》的笔法可为互见,都很好的体现了义法。方苞还认为司马迁虽然已经表明史家的任务并不在于单纯地按照官署录簿写出当时的流水账,但是到了《汉书·礼乐志》却与其相反,疏忽了义法。司马迁从不漫无目的地引用故事,总是用来与汉事互见发微的;而班固只不过是单纯地论及制度起源,列举往昔圣贤所言而已。若如此列举的话,恐怕做多少记载也是不够的。更何况汉代礼仪本有阙如,再多地列举故事也完全无补于汉代礼乐。班固那种单纯罗列事物,记载即可的思想,正是其疏于义法的表现。

又如《史记》的八《书》,方苞认为也都是有这类义法的著述。其写作笔法虽各有不同,但是除了《平准书》以外的七《书》,由于都是贯通古今之作,所以大体列举了古今制度,且寓意于议论之间。《平准书》由于是讲古代所未有之汉代制度,所以在最后的论赞中附以故事,以示古代并无此等制度。再如,《货殖传》是应该与《平准书》互为参见的。《平准书》未记入的内容,在《货殖传》中有着充分记载。写出了那个时代不仅仅人民之间相互争利,官亦与人民争利的情况。意在指出此乃自古以来财政之中最下等之政策。即《货殖传》所云富有三阶段:"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暗中给出官与人民争利乃下等政策的论断。方苞还说:记事之著中最成体例的是《左传》,后世则有韩退之,此二者之义法可谓明确易懂。然而,司马迁的《礼》、《乐》、《封禅》三书及《货殖》、《儒林》二传则以杂乱之词寓意于字里行间。这在《春秋》也是一样,所谓"定、哀微辞多",即孔子在自己那个时代也有难以明言之处,司马迁也是由于对与自己直接相关的时代难以直言,才使用了这种笔法的。以上这番话是方苞论述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此外,方苞在局部的评论上也很精彩。比如对于《儒林传》他有着深深的感慨,其论述即便在当今时代看来,仍不失为深邃之见。对《儒林

传》他写过两篇评论，认为其与《礼书》、《乐书》同等重要。《儒林传》中揭示了汉代的功令，即广开奖掖学官之路的布告，此乃来自公孙弘之策的产物。当然，这在表面上说是对学者的优待政策，但在司马迁看来，这意味着从此学者将学问作为了获取利禄的工具，实际上失去了学问的尊严。自秦代灭绝学问，直至汉初学问基本断绝，尽管如此齐鲁学者仍然在不遇之间不断地传授学问。所以说以前的学者被起用时，大者成为了天子诸侯的师傅卿相，小者也可以作为士大夫之友进行教诲，向孔子门人子夏学习的人物后来都成了王者之师。儒者若不见起用就隐而不出，纵令出世亦保持其不轻视己道的觉悟。然而，自公孙弘为学者开利禄之路，学者已失去了以传道维持教化的作用，而只剩下记忆古事以备为政君主参考的作用，不再是以其传道而被起用的了。这是使司马迁非常愤慨之处。而因为参加考试可以为官，所以出现了记忆的东西越多越好的情况。从战国至秦汉之际儒术虽不断地出现危机，但是卫道者却代不绝人，而如今却被公孙弘一言以断送。而且公孙弘政策的名目又是奖掖贤才，司马迁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之意。《儒林传》也是没有论赞的，而是搁笔于因做学问而成为高官的实例记载。这样的结尾是有其特定寓意的，并不是对汉代政策的赞美。以上方苞的见解，真可谓理解了司马迁《史记》的深意。

此外，方苞评论了《孟子荀卿列传》，认为虽将孟子、荀卿写入战国种种纵横家之间，但又仅仅将孟子作为其中特别的人物而暗中体现出来，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而后人认为司马迁是不闻道者则不妥。从汉代至唐代，庄子、列子被列入了学官，孟子却不受重视；韩退之虽推崇孟子，也只是将其比之于荀子、扬雄；司马迁却几乎将其与孔子比肩而论，虽然也将荀子与其他学者对比而描述其不为利禄云云，但是特别赞赏的是孟子。对于墨子只是在篇末极为简略地有所涉及，而未列传，其寓意仍在于尊重孟子。

关于《老子传》的笔法，自古以来就是个搞不清楚的问题。对此，方苞解释为：《老子传》中记载了国、邑、乡、里，而在其他列传中是没有这么详细的记载的。而且，记了氏，记了名，记了字，记了谥，记了官，还记了其

子孙。这也是不见于其他列传的方法。究其理由则在于当时老子被认为是神变不可思议的存在，怪诞的说法很多，所以《老子传》的表述无非为了表明老子是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司马迁在篇末断言老子是个隐君子。

又如对《刺客列传》，方苞认为本来司马迁虽然引用《尚书》、《左传》，但是由于他作了各种剪裁，甚至文字的改动，致使出现语义的不完整。在今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方苞的观点有欠妥之处。然而在引用《战国策》时，又写进了超过《战国策》本文记载的内容。对此，与今本《战国策》进行对比，从司马迁增减的痕迹可知，《战国策》原文是很疏漏的。方苞认为由于本来《战国策》是记言之书，而于叙事则较为简略。所以司马迁在引用时添写了从其他书中收集来的材料。尤其是荆轲刺秦始皇帝一条，今本《战国策》很可能反而是取材于《史记》的内容，对此只要看看《刺客传赞》就可以知道了。《刺客传赞》中司马迁清楚写明他曾采取了其他的材料，①很明显《刺客列传》并非仅仅依据《战国策》写成的。

关于汉高祖时期的《萧相国世家》，方苞认为司马迁所记萧何的实绩仅有四件事，而且省略了定汉律令与受遗命辅佐惠帝等。即仅记载了取秦时立即亲手收缴了律令图书一事；举荐韩信为汉大将一事；高祖与项羽交战期间守关中，转送兵、粮不绝一事；以及最后临终时的以曹参代己为宰相等四事。总之，仅记载对萧何之人物评价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事情，即那些可称为义法之处。柳宗元曾评价司马迁著文尚“洁”，本来司马迁的文粗杂而不洗炼，言其“洁”并非指其文辞，而是指其通达体要，所载不杂。所以，不论看上去笔法多么芜杂，其实内容十分简洁。《汉书·萧何传》中于司马迁所载之外又增入一事，方苞认为不如说这是多此一举。

关于《淮阴侯韩信传》，他认为司马迁所撰高祖部下诸将列传时，都是仅记其功，且尤以《曹参传》为甚，而不书其方略，因为他们大多只是些除了以功劳立身而别无所能的人物。然而《韩信传》例外，司马迁对其方略有着详细的描述。方苞认为原因在于韩信的方略与项羽、高祖的兴亡

---

① 《史记·刺客列传》：“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息息相关,何况其兵谋还成为了后世的兵法。关于韩信叛汉一事司马迁使用了非常微妙的笔法,其寓意在于韩信在汉成立之后并无谋反理由,而仅仅由于不够谦让而身亡;说他真不如早些推辞荣爵,还可以保全性命,暗示了汉无故杀功臣之意。这种笔法甚得要领,且多微妙之处。

以上是方苞对《史记》各个局部所作的评论,此外他还论述了《史记》中所见"太史公"的称呼。认为书有"太史公"者为父亲司马谈所言内容,司马迁自己撰写的内容则记为"余"。至于那些并非如此的大量"太史公"称呼,则为后来褚少孙补《史记》时所加。这还是个不清楚的问题。关于"太史公"的问题,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一曾有详论,但是,至今这仍然存在着种种疑问。

总之,方苞是以能够阐发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之优点而著称的。方苞认为文章之法即史法,著文必须合乎《春秋》义法。他所说的文之义法,与史法是同样的意思。这一点对清朝那些古文家评论《史记》有很大启发。然而,虽然清朝古文家认为方苞之论司马迁义法,与明朝归有光(震川)的《史记》评点是同一类研究,今日归、方评点的《史记》仍然很流行并受到尊重,其实二人的评论未必就属于同一类的研究。归有光虽然也在暗中理解古文笔法是有义法的,但是毕竟没有像方苞那样明确地论述史法。古文家这种将归、方二人等同看待观点,曾遭到章学诚的痛斥(《文史通义·文理篇》)。

章学诚对当时古文家有所不满,他对司马迁有着特别见解。他竭力为司马迁辩解,极力反对那种认为司马迁是出于"怨诽讥谤"而著《史记》的荒谬观点(《文史通义·史德篇》)。这正是以往学者在评论司马迁时每每陷入误区的所在。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自己为李陵而获罪受刑,以致"发愤"写作的话,①所以他所说的"发愤"被误解为了"怨诽讥谤"。总之,司马迁就像以《诗》之六义比兴的主旨研究《春秋》那样

① 司马迁《报任安书》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书·司马迁传》)

而写作《史记》的,这不是什么以诽谤当代人为目的的著述。认为他仅仅出于诽谤目的而著《史记》的观点,是对司马迁写作动机的误解。章学诚的这一观点表达了司马迁著述的本意。而《报任安书》由于是司马迁颇为愤激的写作,多少夸张了自己的思想。司马迁对自己著《史记》的主旨从他的《自序》中应该可以是了解的,绝非所谓单纯的"发愤"所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以上方苞、章学诚二人的评论,都是阐明司马迁本意的有力观点。即便在中国也尚未见有超乎其右的评论。

七、以往评论的不充分之处

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史记》,以上这些评论中既有十分确切之处,也有不够充分的地方,甚至还有与司马迁本意不相吻合的情况。《刺客传》、《游侠传》就是这样的例子,尤其是对《游侠传》以往都是抨击司马迁不该建立此传的观点。其实,《游侠传》是司马迁笔法中最为巧妙的作品,其意义在于承认了在那种政府制度不完善的时期,在民间所运行的某种代替政府而施行事实上社会制裁的职能。这有些类似于日本德川时代末期的情况。将《史记》与《汉书》的《游侠传》、《货殖传》作比较的话,就不难看出司马迁与班固对此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差异性。《史记·货殖传》记述了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中,由于政府管理的不健全,每个人都不遗余力地发奋竞争,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状。《游侠传》则描述了作为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结果,产生了以个人力量制裁不平等之游侠人物的情况。然而,至汉代中期,宣帝严肃了政令,那种民间的个人行为也变成了对政治的妨害。所以,《汉书》对此是从政府管理的立场出发,视游侠为有害于社会安定的人物。不过,也不能因此就一味指责班固治史不问义法,毕竟是不同时代之间观点上的差异而已。大体上说,司马迁作为历史所撰述的列传,有着承认个人能力的特色。这是因为毕竟自春秋末直至汉初,是一个凭借个人能力而自由竞争的时代。司马迁一面承认个人能力的社会作用,一面又针对大一统时代的天子应

当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考察古今制度，并提出了采用最为正确有益于教化的要素，他是意在表达那种不应以君主好恶改变制度，制订礼乐、封禅、平准并非真正意义上治理天下的方法。为此，他参考古今，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大体而言，在司马迁本人来看，《史记》是一家之言的著述，特点在于表达了这一主旨，而不仅仅是历代事实的罗列。《史记》是有在编纂上的微妙意图和论断中体现出自己一家之言的特色。当然，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根据一己方针撰写历史的做法还有个是否正确的问题，但是由此而总结出贯通古今沿革的真理这一点，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虽然就其撰述目的而言，自有其继承《春秋》之意，但是就《史记》这部著作来说，已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著作没有多大差别了。

今天，《史记》不仅在司马迁著述的主旨上，而且在其他方面对我们也都是颇有教益的。例如经学家可以在《史记》中窥知汉初经学的遗迹，即《公羊》学、《诗》的《三家诗》、《尚书》中的今文被保留了下来。另一方面，在司马迁所采用的诸子百家之书中，有着可以用来辨别今本诸子百家书籍哪些部分可信的材料。比如，就像方苞根据《史记》研究《战国策》那样。但是，这些都不是司马迁所能预期的，而是偶然的产物。作为历史的本体，由于《史记》在真正的记录之外，还包括了从当时的传说和学问研究成果推断之历法，所以在当时已经是非常科学的著作，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仍有很多缺点。尤其是书中采用了许多口头传说的材料这一点，从今天以事实考证为主的历史学来看，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缺点。尽管如此，我们又确实无法片面地认为在古代口头传说的价值就一定不如文字记录。虽然口头传说无疑是随着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但是口头传说毕竟是沿着各自途径，为了各自目的才传授下来的，而不考虑其他流派。似乎与书写文书的人一样为着自己的目的，而不顾其还有别的意义这一点确实存在。将各种出于不同目的所形成的口头传说予以汇集，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从中找出真相，司马迁就特别注意了这一点。虽然在他的写作中，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有一些不可能不记载的事情却没有记载。但司马迁汇集各种材料进行判断，选取自认为最为雅驯者，这在当时的历史编纂法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最佳的判断了。正如郑樵、章

学诚所云，司马迁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综合史家，而且在他之后再未出现过这样的综合史家了；不仅如此，就连其著述的真意长期以来也未能被人所理解。虽然，这在宋以后才逐渐变得分明起来，至清朝基本得到理解，但是即便在今天也很难说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理解。尤其在日本，学者对《史记》的意见更是浅薄而不足取的。

八、史部书籍的发端

如上所述，司马迁的《史记》无疑是当时非常伟大的著作，而且在后世一直都受到尊崇。以至于为其作续篇，或做补篇者大有人在，最终形成了书籍部类之一的史部，至今《史记》仍然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伟大著作。然而就当时来说，《史记》是司马迁凭借自身天才所创作的特殊著作，是与当时一般著作风格迥异的作品，其时最为盛行的著述是辞赋。这种辞赋虽然盛行战国末至汉代，但大体上说从战国时期开始，所有的学问中都已经渗入了辞赋的倾向。这种排列故事等各种事情予以形容的风气，亦流行于辞赋以外的其他著述之中，例纵横家的游说之中必然罗列有形形色色故事的形容词；而且在当时的书信中也出现了这种倾向，例如乐毅的《报燕惠王书》、李斯的《上秦王书》等皆有辞赋倾向。不仅如此，在经书中也是一样，铃木博士曾论述《尧典》中也有辞赋倾向，[①]这是很正确的。其实不仅《尧典》，《禹贡》也有此倾向，《尔雅》的一部分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此外，《吕氏春秋》、《礼记·月令》、《逸周书·王会》等亦可见这种情况，常有排比故事、事物的体例。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与《楚辞》那样带有诗人感情的文体融合，汉代辞赋也得以兴盛，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毕竟也有类似辞赋的文句。这是当时的流行趋势，历史知识、古今沿革的知识、以及成为《史记》八《书》材料的那些专门学术等，就是这些对事物进行排列的研究也不例外，在当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着将此应用

① 谷川道雄先生提示此处内藤湖南所指可能是铃木虎雄氏的《论骚赋的生成》（收于《支那文学研究》）。

于辞赋。而这种情况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了类书的形式。这种著述的类书形式在杂家的著作中已经出现，比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就已经采取了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方针。这也是在战国末就开始萌芽的，这种情况与辞赋的流行相互结合就逐渐具备了类书的体例。一方面作为创作辞赋的材料出现了类书，一方面辞赋也以其列举种种事实的内容起到了增强记忆的作用。例如，在历史上的那些事实中，有些成为了人君的教导，也是可以载入辞赋，或是写入类书的，这些都是当时人们最喜好的形式。在辞赋体作品中，有些是特意写给人君倾听的，如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以及后来扬雄的作品。作为类书体而记录事物与故事的，有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这类作品的兴起正可谓应当时人们要求而产生的著述。但是，像司马迁《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则完全是游离于当时要求、风尚之外的，出自其自身卓越天才的，总括古今而成一家之言的作品。在这一点上说，《史记》尤其显示了司马迁的卓越见识。

司马迁的《史记》在当时是一部与众不同的著作，所以看来当时人们曾感到很难将其归入某一既定的书籍种类之中的。当然，那时已经有了逐年记载的著作，也有了按照事情顺序记述的著作，但是像《史记》这种统一编排古今的大著作还从未有过的。所以，在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将所有著作予以分类，撰写《别录》、《七略》时只好把司马迁的著作归入《六艺》中的《春秋》部类。话虽如此，归入《春秋》部类也未必不妥，因为司马迁作《史记》本是效法《春秋》的。不过，虽说司马迁依照了《春秋》之法，却并未采用其体例，效法的仅仅是其精神，而在体例上则与《春秋》截然不同。《史记》没有像《春秋》那样以一言一句论褒贬，司马迁认为论断事物的笔法，只有孔子那种圣人能为之，而他自己则直书事情，于叙事之间自然地表现善恶，也自然地表达褒贬。因此他虽然采取了《春秋》的精神，却一改其形式。此外，他还采取了《春秋》中所没有的体例，即撰写了八《书》、十《表》，统括了自古以来各自不同的学问，心境虽说在《春秋》，体例则迥异，是完全不同于《春秋》的著作。然而，刘向、刘歆父子作《别录》、《七略》时，《史记》还是独一不二的体例，所以他们不可能单独为此设立科目，就将其归入了“春秋家”。在当时属于历史的著作都是分别编

入不同科目的。看一下《汉书·艺文志》就可以知道,除《史记》之外将那些记载年代的书籍归入"春秋"部是理所当然的,而将秦时大臣奏事的汇集归入"春秋"之部,另一方面将议奏归入了《尚书》部,刘向的《新序》、《说苑》等归入了儒家部。总之,在当时像《史记》这种综括古今的著述体例由于尚未流行为一般化,所以直至《汉书·艺文志》的时代,还没有人充分考虑过将"史部"也作为书籍的一个分类。于是,类似史书的书籍就被分散在了各自不同的部类之中。但是,后来效仿《史记》的书籍逐渐出现了,班固的《汉书》以后,历代正史皆仿效之;那些并非效仿《史记》整体,而只是取其局部体例的特殊著作,如传记、制度等方面的著作也逐渐问世,而且随着其数量的不断增加,出现了将这类著作集中为一个部类的必要:从晋代开始出现了将书籍分为四部的习惯,其中的一部就是史部。在正史之中,至《隋书·经籍志》开始将书籍分为四部,史部已经是其中的一大部门了。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正相当于史部的发端之作,就这样当初这样一部难以划分归属的一家言之作,在后世竟成为了将史书发展为史部书籍的奠基之作了。

第六章 《汉 书》

司马迁的《史记》在当时无疑是一部奇特的著作，因此出现了不少《史记》的爱好者，似乎为其撰述续篇的人也不断出现。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就截至了，所以在前汉就有人开始为《史记》做续了。褚少孙就是其中一人，他的补篇今天仍混载于《史记》之中。此外，据《汉书·艺文志》载：冯商曾有续《史记》七篇。另外，据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可知，续《史记》的人还有许多，如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或殷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续写《史记》的情况还可参见《后汉书·班彪传》。后来班彪也起了续写《史记》的动念，他认为当时虽然有着各种对《史记》的续写，但是多为鄙俗之作，缺乏继承太史公的文才，所以他要亲自续写《史记》。然而，到了他儿子班固的时候，开始那种续写《史记》后篇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最终写出了《汉书》。即班彪的时候确实是希望接着写《史记》的续篇，但是班固则上自汉高祖下至前汉结束，将这二百三十年间事情撰述成了《汉书》。《汉书》虽说大体沿袭了《史记》体例，但是最大的不同在于：与《史记》的通史体例相反，《汉书》是断代史。

《汉书》本是班彪、班固作为家学开始编纂的，这一点虽说与《史记》作为司马谈、司马迁的家学创作而成书是同样的，但是半途中《汉书》又变为按照朝廷敕令所撰的著作了。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正在班固继承父亲续写《史记》的工作时，有人向朝廷告发班固私下改作国史，因此班固下狱，所撰写的书也被官府没收。可是，汉明帝看了此书大感兴趣，命令他将其完成。以后历经二十年而成书。然而，班固人生坎坷，后来又因他事入狱，据说班固其实并未完成此书，或者是虽然完成了，但由于死在狱

中致使此书散失了。因此,班固死后汉和帝又令其妹班昭(曹大家)续写,这才补上了当时班固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但是由于班昭还是未完成,又有后人继续撰述。据说,经学家马融曾从班昭读《汉书》,其兄马续才最终补充并完成了《汉书》的写作。虽说《汉书》是经众手成书的,但大体上都是依照班固所定方针写作的,所以也不妨认为是班固的著作。

《汉书》大体上沿袭了《史记》的体例,武帝及其以前的内容基本照抄了《史记》原文,就连论赞也是根据《史记》写的。虽然如此模仿了《史记》,但在变通史为断代史这一点上与《史记》意见是不同的。不仅如此,由于在其他方面也与《史记》不尽相同,所以对其优劣自古议论颇多。关于体例,由于《史记》有尚未十分完备之处,对此早在班彪就开始发觉,并认为应当予以订正,班固也继承父亲遗志。所以,对体例完备以及作为断代史《汉书》确实成为了后代史家的楷模等方面,受人称赞。刘知幾就认为:所谓纪传体虽说是始于《史记》的体例,并成为了后代正史的模范;但是断代史却开始于班固,后代的史书大体都继承了班固的体例。在这一点上刘知幾虽称许了班固,可是郑樵却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史书就应该以通史为正常体例,他排斥断代史,斥责班固无学,不明《史记》本意。他认为班彪从通史的角度意在续写《史记》,所以是知道历史本意的;而班固的治断代史,没有明白历史自有其古今沿革相因的意义(《通志·总序》)。不过,刘知幾也对班固之书表示了不满。如《汉书》在《古今人表》中汇集了古今名人,并根据人物的品位将其划分为九等,其中收集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刘知幾认为此表无甚意义,因为《汉书》既然是写汉一代之事,像《古今人表》那样从上古开始记载是无义的。郑樵对此表的抨击最为激烈,认为表本来是作成"旁行邪上"形式,在其间按照时代、年代,按照国家、事件填入事实,以便一目了然的方法。但是班固不通"旁行邪上",像《古今人表》那样将人物划分等级的表格没有任何意义。《古今人表》也许是班固书中受抨击最多的,而从史书体例而言,也确实是应该受到抨击的。但是到了近代,章学诚对《古今人表》却提出了几分辩解,他认为,的确此表从史书体例来讲并不得当,不过作为材料是有利

用价值的。但是这很可能并非班固所撰，他怀疑这本来流传于汉代《春秋》的经师之间，后来传到了刘向父子，又因为班固所传为刘向父子之学，所以就将此表原样收入《汉书》了。他认为史书虽然是记事的，但是任何事情皆在人为，人名乃史学的要纲。所以《古今人表》可能是治《春秋》学经师所传的一部人名辞典的遗存（《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本来，章学诚对历史就有一种考虑，主张“史篇别录”的必要性，即他认为史书中索引是有必要的，而且人名索引也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古今人表》还是有用的，但是他对此表之写入《汉书》并未作任何辩解。总之，自古以来在史论家中为《古今人表》作辩护者仅章学诚一人而已。

关于《史记》、《汉书》成果的评论自古以来从未间断过，无论怎么说《汉书》不及《史记》是没有疑问的。虽说有人因为赞扬《史记》者论述中存在不足而为《汉书》进行辩护，但也都是些不足取的观点。就连刘知幾那种为《汉书》作辩护的人，也在重要问题上不得不抨击《汉书》。刘知幾在《史通·总序篇》中抨击班固的《序传》不得体例，他认为，《汉书》虽然仅记前汉二百年事，班固写自家传，却从其祖先楚令尹子文写起，与汉代关系过远；近处又涉及自作之《答宾戏》一事，从前汉以前一直写至后汉。由于从班固开始了这种与《汉书》整体的体例无关的《序传》笔法，后代的《序传》则统统予以效仿。这种做法如果是写一家之家谱的话则没有问题，但是将其载入国家史书则有显失态。不过，刘知幾之论也未必就妥当。刘知幾指出，一般来说，自序体例发端于屈原的《离骚经》，至司马相如则以自序为传。他认为司马相如的《自序》传从少时写到成人，亲自写入窃他人寡妇之事乃不知耻也。又如王充《论衡》的《自纪篇》中说自己出身于不肖祖先，并说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就如同舜之父为恶人一样。刘知幾责难他这样抬高自己是在羞辱祖先。总之，这种写自序的情况在诸子也有，是当时的一般倾向，原来写自序是写明自己著作的由来，这才是本义，而写自序传并不是本义。家族的历史只不过是为了叙述著作主旨才加上的。所以，刘知幾的批评是对自序本意的误解。从这一点来看，班固叙述祖先之事，从汉以前一直写至汉以后的代代之事也未尝不可。但

是，即便不考虑这一点的话，若以《汉书》的《序传》与司马迁《史记》的《自序》相比，是有不合体例之处。比如他把自己的作品《幽通赋》、《答宾戏》这些与著述《汉书》毫无关系的辞赋写入了《序传》，相反对其父班彪以来作为家学的史学主张则没有予以充分表示。因此，从今日的立场来看，《后汉书・班彪传》的记载比班固的《序传》其实更能反映《汉书》的著述主旨。班固的《序传》在这一点来说，仅仅是一种装饰，没有充分地表达自己著作的宗旨。在这一点上远远不及《太史公自序》。在其他方面也是，自古论及《汉书》缺点者很多，其实那都不仅仅是班固的问题，而应该说是后代史家的通病。要言之，后代的史家始终都没能充分理解司马迁治史的主张。

对《汉书》批评最为酷烈的要算是郑樵的观点(《通志・总序》)，他的抨击主要集中在《汉书》所开始的断代史这一点上。他认为由于断代史的出现，使得史书的每次写作都要屡屡重复着那些不必要的内容。例如，像天文这种内容虽然不经常变化，但是每一代都要撰述《天文志》。又如《五行志》也是，《汉书・五行志》来自《洪范五行传》，而《五行传》仅是一家之言的书，没有任何关于历史沿革的内容。然而，自从《汉书》的先例一开，历代都设置《五行志》。再有，由于是断代史，所以事物发展前后不能相接。例如地理，都是只记各自时代的郡县，究竟有着怎样的沿革却搞不清。这与班固记载地理不以重要的山川为主，而是以郡县为主的方法有关。另外，关于国家分裂的时代，例如三国时期魏国人记载吴、蜀为“寇”，南北朝时期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则称南朝为“岛夷”。还有，在《南齐书》里，称灭南齐的梁军为“义军”，《隋书》里称灭隋的唐军为“义兵”，在当时来说对谋反军统称“义”，这样的记录方法出现于揭示古今沿革的史书中是不适宜的。他抨击这些问题都是由断代史而产生的，其根源又出自班固。

非常推崇《史记》的方苞对《汉书》也很不满，他批评了《汉书・礼乐志》，认为班固疏于义法过甚。最开始记载汉代礼乐的司马迁，他之所以没有逐条地、按顺序地进行记载，是由于他认为汉的礼仪皆因袭了秦制，不合于古代圣人之制，所以无记载之价值。像郊庙祭祀的乐章等皆非雅

声，所以他仅仅例举了武帝所作天马之歌，而且只是记载了当此歌在用于郊庙祭祀时，曾受到直言家汲黯的讽刺一事，此外几乎未记任何内容。大概是因为他认为没有记载的价值吧。然而，班固是从制作礼乐的根本主张立论的，记载一些与汉代完全无关的事情，即便所记与汉有关者也几乎都是些不必要的内容。他还批评认为，如果写汉事的话，像叔孙通制订汉礼的情况那种本应该记载的内容班固却没有记载，没有记载汉制原貌的内容，反而记入些不属于汉代制度的，基本没有必要的内容。又如写《萧何传》，虽然增加了《史记》未载的内容，但又都是些对认识萧何为何种人物无足轻重的事情，况且是否为事实也不明确，即便认为是萧何原话的内容也颇粗鄙，很难相信是萧何的语言。柳宗元评价司马迁之文章简洁，不是指其用词简洁，而是指其记事时体要明确，所载不杂驳；而班固对司马迁的简洁则并不理解。

方苞认为《汉书》中写得最好的是《霍光传》，将霍光侍奉武帝二十余年概括以“为人谨慎”的结论；而对其为昭帝相的经历，仅概括为“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寥寥数语，记述不及琐事，笔法颇得不书常事之义。对霍光死后的宣帝时，霍氏一族虽蒙难而亡，则详细写出了其遭遇祸难的原因。他认为，虽然这种记载详略得宜相当出色，但是与《史记》相比尚有不十分理解义法之处，比如昭帝之后霍光虽立昌邑王为帝，后来又因其失德而废之。当时霍光给皇太后的上奏，有助于了解霍光心事，所以详细记载此上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像霍光葬礼的奢侈，以及宣帝为惩罚霍氏而剥夺其亲族权力地位等记载，则有必要再简明些，不必如此详记。也就是说，就连《霍光传》也未能充分理解义法。《王莽传》可谓班固用力最深者，其中对王莽阴谋篡位之始末的巧妙记述，可比拟司马迁的笔法。然而，本来仅记载其阴谋的主要内容已足够，而连其制度、诏敕也予以详细记载是不必要的。这些记载不过是后人的笑料，与小说家的文章没有什么差异。一般来说，班固对汉代朝廷制度、仪式是不予详细记载的，但对王莽设立的官制、地名却如此详载，实属不必。方苞认为对于恶人所行恶事的言行没有必要详细记载。与此相反的例子，他举出了欧阳修《五代史》的笔法，冯道侍奉四姓十君而窃位，无疑其间会有不适宜的言行。但

是欧阳修不但对此一无记载,反而仅仅记载了冯道直言美行,以及其本人的自述和当时人皆称誉冯道可比拟于孔子的事情。但是,由此更可见冯道是如何欺世盗名的,可谓用意妙远难测。方苞认为史家就应该如此,进而在这一点上抨击了班固。

一般来说,班彪以后人们由于注意到了司马迁写作的杂芜,而力图做到字句简洁,班固也为此做出了努力。但是,在记事的取舍方法与直书事实之间自然地流露善恶的笔法上,班固远不如司马迁。而且,班固以后的史家又尚不及班固。不过,《后汉书》、《三国志》中或许还有些不亚于班固的名笔,那时多少还有些可称为史家的人物,但从那以后都是依照班固的蓝本写史,所以都不及班固。其原因在于:司马迁的通史变为了班固的断代史,史书的撰写方法亦为之一变;又加上都依照了班固模式,也防碍了史家自身特点的发挥。就在《史记》与《汉书》之间不长的期间,出现了明显的时代划分,就这样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了空前绝后的作品,而班固的《汉书》也为后代著史提供了典范。这种在体例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可参见赵翼《廿二史劄记》的详细例举,此不赘述。赵翼此书是十分重要的。

第七章　《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

一、纪传、编年二体的并行

自从司马迁、班固二人建立了纪传体的基础，中国史书体例才开始有了固定的形式。另外，与班固纪传体史书相对立的一种编年体史书也出现了。荀悦的《汉纪》就是这种体例，它虽然在内容上大体以班固《汉书》的记事为主，但是在体例上却模仿了《左传》的编年体。与班固的纪传体相对的荀悦的编年体一出，汉以后的史书体例基本流行着这两种形式，即刘知幾也称"班荀二体角力争先"，以二者并存为时代趋势。晋代的史书也是，王隐、虞预撰纪传体，干宝写编年体；刘宋史书则有徐爰、沈约的纪传体和裴子野的编年体，各个朝代都是只要有纪传体的存在，同时就会出现编年体。编年史书继承了《左传》的系统，司马迁以前已经有了《左传》的编年体史书编纂法已经大略形成，之后出现了《史记》纪传体这种不同的编纂方法。这种两大体例并立的情况，在汉代以后一直延续不断。因此，在刘知幾《史通》中对此有着所谓"二体"的论述，那是在古代"二体"时期的思想。后来，在宋代产生纪事本末体以后，才形成了"三体"。总之，在古代只有"二体"的存在。

二、由书籍分类法变迁所见之史部书籍的发展

从两汉到三国六朝，史书不但数量增多，而且种类也在增加。看看今天《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载各项著作种类，即可了解当时史书体例的

发展。对于这些历史著作,《隋书·经籍志》与刘知幾《史通》有着不同的分类方法。《隋书·经籍志》将所有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第二类是史部: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等,共分为十三种;《史通》则将史家的体例分为六家。《隋书·经籍志》是按照当时现存材料的分类;《史通》则是根据史书笔法的由来进行分类的,所谓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而按照《隋书·经籍志》的分类,《史记》家、《汉书》家相当于正史,《国语》家相当于杂史、霸史,《左传》家则相当于以编年体为主的古史,而后代史书中基本不存之《春秋》家也只能说相当于古史。但是,刘知幾将《春秋》家与《左传》家分开的理由在于,《左传》不仅仅是编年体,而且是在编年基础上详细地记述了种种事实,在这一点上与《春秋》那种既有编年又有褒贬之意是不同的笔法。总之,刘知幾在《春秋》中抛开《公羊》、《穀梁》,而仅以《左传》为一家的分类法可见:他认为《公羊》、《穀梁》相当于《春秋》家,是以义理为主的;而与此不同,《左传》则主要是记载事实的著作。所谓《尚书》家,确实在其后世发展成为了《纪事本末》,尤其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在汉代以后还多少存在,所以有必要将其也分立为一类。总之,刘知幾是根据史书的由来进行分类,《隋书·经籍志》则是按照现存史书分类的。当然,刘知幾也使用过"正史"一词(《古今正史篇》),他所谓的"正史"与《隋书·经籍志》的"正史"不同,其中不仅有纪传体,有时还包括编年体。《隋书·经籍志》与《史通》的成书年代虽说相差不远,但是二者的分类法却有着如此的不同。当时恰好是史书内容分类定型的时期,大体上说《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成为了后代分类的典范。以《隋书·经籍志》的分类与此前《汉书·艺文志》的分类相比较来看的话,可以很自然地看出此间史书体例的发展变化。

《汉书·艺文志》以后,直至《隋书·经籍志》成书,这期间看来的确有过各种书籍目录,如果它们都能保存下来的话,本当更加详密地反映当时史书发展的情况,可惜多数散失而不传了。其中,仅存概要的有梁朝阮孝绪作为藏书家对书籍进行分类的《七录》,在佛教文集《广弘明集》中仅

存其序言了。但是，其他也还有一些，其实要想知道在《汉书·艺文志》以后，出现过怎样的目录，其分类法究竟是怎样的，还是有一些线索的。《汉书·艺文志》虽说依据了刘歆的《七略》，但在《艺文志》中仅存六《略》而缺《辑略》。其六《略》是：

《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略》、《术数略》、《方技略》。

按照这一系统分类法形成的书籍目录，不仅有上述阮孝绪《七录》，还有早于《七录》的刘宋时王俭所作名为《七志》的目录。《七志》的分类为：

《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

大体与《艺文志》的六《略》相合，仅加上了图谱而成为《七志》。后来阮孝绪的《七录》是：

《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仙道录》。

至《七录》开始将《纪传》从《经典》分离出来；《子兵》是《七志》的《诸子》、《军书》的合并，这已经与《隋书·经籍志》在"子部"中列入"诸子"、"兵书"是同样的意思了；《文集》是由《七志》的《文翰》变化而来的；将《术数》、《方技》合二为一，可见也在逐渐接近《隋志》的分类方式；《佛法》、《仙道》是新加的内容。这大体可以归入刘向、刘歆之流的目录，而在这些目录中《纪传》即史书已经独立出来了，《诸子》有着合并的倾向，最终在《隋书·经籍志》形成了"四部"。但在另一方面来看，"四部"的分类又不始于《隋书·经籍志》。早在此前三国的魏至晋时，荀勖就作有《新簿》。此书是在魏时郑默《中经》的基础之上，按照甲、乙、丙、丁四部分类的，即甲是经书，乙是子类，丙是史，丁是集的分类方法。这到了《隋书·经籍志》，其顺序变为了甲经、乙史、丙子、丁集。从这一条线索来看，也可以知道"史部"独立的倾向很早就出现了。不过到了后来《七志》、《七录》成书时，像《七录》在外观上看虽然还是《艺文志》风格的七类划分，但其内容已经呈现出"四部"的倾向，若将《子兵》、《术技》、《佛法》、《仙道》都作为"子"的话，即为"四部"。所以说，虽然形式近似《艺文志》，内容则已接近《经籍志》了。在以上目录的变迁中，不难看出其间

"史部"确是逐渐独立发展起来了。总之,"史部"虽然在《汉书·艺文志》时尚未成为一个单独的部类,但是从《汉志》到《隋志》之间,却出现了能够成为一大部类的大发展。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对此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宗刘第二》)中有过论述。他认为就书籍分类来说,在"四部"以外再返回到《七略》已经不可能了。对此他论述了许多理由:他看到史书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主流。章学诚的观点在于,从《七略》流变为"四部"是一种自然趋势。"史部"在后来的确有着大量的出现,将这些书都收入"春秋家"已经不可能了,这是不可能从"四部"再回到《七略》的第一个理由。名家、墨家等诸家书籍,在后世没能再成为学派,所以诸子部类在逐渐缩小,这是第二个理由。"文集"虽然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文集庞杂,而且其中包含了百家九流,二者难以区别乃第三个理由。出现了"抄辑"这种既非丛书亦非类书的体例,这是第四个理由。出现了评点诗文的著作,例如《苏批孟子》,为第五个理由。如此种种书籍已经不可能收入《七略》的分类,也就是说已经不可能像《七略》那样,明确地按照著作内容进行分类了,于是出现了大体按"四部"划分,用以涵盖所有书籍的分类方法。章氏所云虽说是针对一般书籍发展而言的,但其中史书和文集是主流,并揭示了史书在《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之间显著发展的情况。《隋书·经籍志》的"史部"更是将内容细分为十三项,成为了后世分类的原型。

三、正史编纂法的变迁

如前所述,《隋志》与《史通》关于史书分类法是不同的,由于汉唐之间关于历史的书越来越多,在概括史书这一点上《隋志》是很可取的。看看《隋志》就能知道当时"史部"书籍是怎样增加,其内容是怎样发展的,而且对当时所谓"史"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也可略知大概。但是,关于"正史",《隋志》是仅取纪传体,而把编年体归入"古史"的;《史通》的《古今正史篇》中则是二体并取的。在这一点上,看来《史通》优于《隋志》,因为"正史"不必仅限于纪传体。但是,后世分类皆从《隋志》,仅以纪传体为

“正史”，而是将编年作为古史列在正史之外的。无论如何，由于直至后世，“二体”都是史书编纂的主体，所以下面就来谈谈他们的发展。

1. 史料处理方式的变化

最先有必要考虑的是史料的取舍问题。大体上，在纪传、编年二体中，汉以后的历代著史书，通常都是先写有纪传，然后再以此为材料做成编年体史书的，所以最初对材料进行选择并作出记载的是纪传体。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汉唐之间多少是有变化的。《史记》取舍材料的标准，虽然司马迁自己说主要是以“雅驯”为标准，但后世的评论却认为《史记》取材并非雅驯。《史通》(《六家》)评曰：太史公“多聚旧记，时采杂言”。郑樵的评述中也说“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对于这类评论，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史通》的评论也有其正确的地方，《史记》确实混有旧记杂说。《史通》所谓“旧记”，在其自注中明确说是指《国语》、《世本》、《国策》等，此外还混有“杂言”。司马迁所谓的“雅驯”与刘知幾、郑樵对“雅驯”的认识有着不同的标准。这是如何看待材料的观点问题，司马迁常常根据《诗经》而采用上古传说，例如记述殷祖先时，采用了玄鸟堕卵的传说；关于周的起源也是写进了姜嫄履巨人足迹的传说。不仅如此，还有其他各种类似情况，这些大概就是刘知幾、郑樵等所说荒唐不稽的“杂言”。但是，司马迁认为当时经书是“雅驯”的，因而将附于经书的传记，也都一并予以考虑了。如前所述，《春秋》包括《公羊传》，《书经》包括伏生的《传》，《诗经》包括《鲁诗》等，都是一并考虑的。特别是《礼》的《大戴记》、《小戴记》也是作为经书同样考虑的。这些著作中虽然都混有各种传说，时有荒诞不稽的成分，且与经文一并传承。到了刘知幾、郑樵的时代，这样的内容在常识上是被区别开的。例如，关于《史记》的纪年始于“共和”的做法，郑樵认为可信的纪年仅在春秋以后，刘知幾也认为《左传》可信，所以于此相左者均不可信。不论哪种观点都是基于自身所在时代常识的考虑，司马迁与刘知幾之间相差已经有八九百年，特别是郑樵就更是后代人了，各自具有不同的常识，出于不同的标准，他们认为《史记》不雅驯。但大体上说，司马迁的观点与刘知幾、郑樵的观点是没有太

大差异的。

当时对历史材料的使用方法，都是尽可能不对材料做过分的润色和订正。这不仅是历史家，也是一般著述家所遵循的原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史记》的确混有种种杂说，《汉书》确实只收史料而很少有传说，因此在这一点上说，《汉书》是更可信的。这是由于所使用材料的有所不同所造成的，《汉书》的时代仍然存在有很多前汉时期的基本史料，但是《史记》由于是从长期的传说中取材，所以乍一看会感觉到两史之间的差异，其实作为材料取舍的标准并无大的差异。《史记》使用《尚书》史料时，大体是照录原文的。但是，今本《史记》中所引《尚书》的内容与今本《尚书》有不同之处，一是因为《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有差异，《史记》所取基本是《今文尚书》，其中还特别取材于《欧阳尚书》。再就是因为有时还会有以训诂辞代替本辞的地方；还有避汉朝天子名讳的字，当然这也许是在《尚书》原文中就已经存在的情况了。不过，《史记》也有取材于《古文尚书》的地方，这在《汉书·儒林传》是能看出来的。但那只是特殊部分，即仅限于《儒林传》中所引篇章，大体而言，还是依据《今文尚书》的。关于以训诂辞代替本辞的情况，这在治史者来说是常有的事，只是没有人太注意此事罢了。日本史书中也一样，即便与《日本书纪》所载相同的内容，例如在后世写作《水镜》[①]时代的文体，与《神皇正统记》中的文体就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对于同样的内容，人们也都在用自己时代通用的词汇不断地改写着。即便是《史记》以训诂辞代替本辞的情况，应该也只限于当时通用的词汇。此外，像《国语》、《国策》的史料则无疑是照录原文的，特别是秦汉以后，尤其是始皇以后的事情由于尚存正确的记录，所以基本上是照录的。比如秦的刻石文就是原样照载的。但是，像《史记》这样大手笔的编纂物，其中当然也有司马迁本人采集所闻，亲自记录的内容。《荆轲传》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例子，《荆轲传》虽取材于《战国策》，但又比原文详细，就是因为司马迁加入了采集到的口碑材料。不过，由于今

① 《水镜》，日本历史故事书。推测成书于镰仓时代初期（约1195年），作者不详，内容多取材于古代。

本《战国策》中反而有取《史记》内容作补充的部分，所以《国策》中被认为存在有本不该有的文体。《游侠传》中有关郭解的事迹，据说就因为是司马迁耳闻的材料，所以文章写得很活泼。然而，虽说有着这样一些写作手法在内，司马迁在采用以往材料时，还是力求尽量保存其本来面貌的。尽管这样会影响自己写作手法的发挥，甚至会有剽窃他人文章之嫌，但这正相当于章学诚所谓的“言公”之意。总之，在《史记》整体的编纂方法上，是有着司马迁的本意和微言大义的，他本人在书中也不时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着总括的论述，其中主要的主张在编纂法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这与孔子编纂经书的主张是一致的。

这种对材料的取舍方法在以后的史书中也有，像《汉书》等就是从《史记》相同的趣旨出发编纂的。赵翼《廿二史劄记》也认为《汉书》中多载有用之文，像诏令、奏议等属此。载入这些文章时虽然多少会有所删繁就简，但是大体上是以保存原文为宗旨的。陈寿《三国志》也基本上是对原始材料不加改变就使用的，在《三国志》成书时甚至还留有痕迹。例如《三国志》曾多采鱼豢《魏略》的材料，其中像“今云”的用语，本是鱼豢《魏略》时代的“今”，并非陈寿《三国志》时代的“今”，却也残留了下来。又如，当时文章已经出现了骈体文，使用对仗句型。这种对句不适合作为史书文章的地方在书中亦时有存在。但也有与此采取不同的做法，即对原有材料多加润色，改动原文的。这种方法被认为大致起于范晔的《后汉书》。原因之一是编纂方法上的问题。不论《汉书》还是《三国志》，可以说大部分是根据当时基本史料撰写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汉书》、《三国志》以前的记录中经过编辑的并不多，更多的还是那些基本史料。然而，范晔的《后汉书》是各种《后汉书》中成书最晚的，在此之前曾经有过七八种《后汉书》存在，而且都是经过编纂的著作，今日作为那些书断篇的汇集还出版了《七家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将这些书消化之后编纂而成的。就是在范晔将以往编纂物作为材料使用时，出现了改写文章的必要。不仅如此，范晔还是颇有名气的文学家，毕竟有着经过自己头脑考虑而著述历史的抱负，他应该还有不满意前人著作所以要改写的原因吧。总之，将《三国志》、《后汉书》所载同样事例加以对比的

话,就会发现《后汉书》有很多地方改动了原文。尽管如此,《后汉书》在史书体例的根本上,还是坚持了《史记》以来的宗旨,而且也像《史记》、《汉书》那样,在传记中详细记载了传主著作,甚至辞赋等作品。从这一点上说,范晔继承了重视材料的传统学风。但是,无论如何《后汉书》在不忠实载录材料原文的作法上,应该说是始作俑者。此后,唐初的《晋书》由于是根据十八家《晋书》编纂而成的,所以其作法更甚于《后汉书》。尤其是从《南史》、《北史》开始,就更是为了尽量简化记事,而屡屡删减原文了。其中最为甚者,又当数宋代编纂的《新唐书》。此书由于有着作者既定的写作主张与喜好,甚至将他人的文章全部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改写,致使最终成为难以窥知原文面目的史书了。不仅如此,就连书中所载诏令、奏议的骈文体也都变得面目全非了。

总之,这是一种变化,即取材不再照录原始资料作法的变化,它最初开始于《后汉书》。而几乎与《后汉书》同时代之沈约的《宋书》,由于仍然墨守了保持材料原文的原则,所以尽管所记载时代甚短,书的部头却很大,以致于在《南史》编纂时据说《宋书》是被削减最多的。这样,至后世史书当然就显得记事过多而繁杂,同样的年数,册数却多得多,因此为了压缩其内容,就出现了《南史》、《北史》那种方法,甚至出现了像《新唐书》那样过于订正原文的作法。不过,沈约的《宋书》与范晔的《后汉书》相比,虽然在内容详略以及材料取舍方针上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出于六朝中期风气的影响,在文章华丽的特点上却很相似。总之,虽然在材料的取舍方法上有着上述逐渐形成的变化,但是以《晋书》、《南史》、《北史》成书的唐初为中心,在此以前和以后是有着显著差异的。而且,由于后世史书更加以古文编纂,记载变得更加难以了解实情了。这种情况虽说开始于《后汉书》,但是即便在那以后毕竟《史记》、《汉书》、《三国志》的流绪尚存。然而大约从唐初开始,编纂方法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从一家著述到分纂的变化

唐以后与唐以前有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唐以前的史书多为私人著述,是专门的学问,其中家学又是特别显著的倾向。司马迁《史记》也是从

司马谈开始两代人相继完成的。特别是在当时还存在官职世袭的倾向，司马迁就是继承其父的官职成为太史公的，当时作为历史材料的记录，其正本送太史公，副本送丞相。司马迁自己就说过:所有的记录都集中于太史公，依此进行编纂。但是，司马迁时代的史官职务与三代有所不同，三代的史官多通晓故事，其职务主要是以此劝诫君主;到了司马迁的时候那种劝诫职责已经淡漠，按他本人的话说，其执掌在于文史星历，近似于卜祝，天子也是将其作为倡优蓄之。就像日本的“话家”那种角色。① 虽然这曾是一种世袭的职务，但是至司马迁以后，已不再世袭，而是仅仅作为史学研究者的家学而二代、三代地相继传承了。例如班固的《汉书》就是继承了父班彪，再由其妹班昭补充遗漏，从而成为了家学。因为是家学，所以不向其家人问学的话，是很难了解其中微言大义的。当时即便马融这样的大儒为了读懂《汉书》也要去向班昭请教。此后以家学撰写史书的情况，从六朝中期直至唐初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六朝人注重族姓，在学问上的家学继承也很受到重视。《梁书》、《陈书》成于姚察、姚思廉父子之手，《北齐书》的作者是李德林、李百药父子，《南史》、《北史》则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的作品。这类作为家学的史书，无疑本来都是私家著述。班固的《汉书》虽然后来变为接受敕命所进行的撰述，但此书仍是继承父班彪之志的一家著述，后来得到公认的。陈寿的《三国志》实际上也是私人的著述。范晔的《后汉书》更是根据自身明确治史主张的著述，而且特别用力于史论。像这样不仅是私人著述，而且大部分是出自家学的作品，这在史学编纂上是非常大的优点。也就是说，由于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而形成的著作，所以也是出于一贯主张，没有矛盾的成果。还有一个优点在于，即便从编纂主旨来看，也由于从写作的最初开始就有着既定的主张，所以史家才能够不改变史法。这种在历史著述中坚持一贯精神的做法，是很出色的。

至唐代，这种治史方法在编纂《晋书》、《隋书》的时候发生很大变化，而《晋书》又被认为是治史堕落的开始。《晋书》既不是私家著述也不是

---

① “话家”，日本的一种表演说话艺术的滑稽演员。亦称“咄家”、“落语家”。

家学，而是奉天子之命，经多人之手，按照分纂方法编纂的。不过，作为馆局分纂史书的肇始，还得首推后汉时期在东观由众多学者成书的《东观汉记》。《晋书》由于曾获唐太宗亲自指示，又称《太宗御撰晋书》，太宗本人还亲自撰写了其中一部分。《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的四篇论赞就是太宗亲自撰写。这样，第一，开启了按天子指示编纂史书之恶例；第二，由于是众人分纂，所以没有一贯的主张和方针，导致众说纷纭的弊害。虽说为此还设立编纂义例，要求务必严守；但结果却只是对义例的机械应用，丧失了以往那种自《太史公自序》以后所形成的，按照自序体例进行记载的生动写作方针。这种自序最有名的是《太史公自序》，其次是《汉书・序传》，之后还有沈约《宋书》的《志序》等，即写明有关《志》的序例。萧子显的《南齐书》中，也有形迹表明本来是有序录的，只不过今天已经遗失了。还有一本魏澹的《魏书》，此书的序例因为载入了《隋书・魏澹传》，以致保留至今。不过，这些都是一人著作的序例，由于是总括自己的编纂主旨，所以序例意思得以贯穿于全书的。此种义例至《晋书》发生了变化，由于实行了分纂，这就有必要机械地约束众多的作者，因此当时的学者敬播、令狐德棻等就制定了义例。虽说这也是一种首创，但结果是分纂者很难通盘贯彻编纂的主旨精神，司马迁以来那种已经成为历代史书主旨的，即史书乃一家之言的精神完全泯灭了。因此，从那以后，史书成为了一种单纯的编纂物，变得难以称为著述了。当时成书的《隋书》也是因为是众手成书，所以在编纂者中聚集了当时的许多学者，特别是经学者孔颖达、颜师古也参与其中，总裁是魏徵。当然，在编纂者中有通晓历史的颜师古等人，《晋书》的编纂者中也有令狐德棻等史学家，所以唐初即便采取了分纂法，编纂者中多少仍旧有一些史学专家在内的。但是到了后来，编纂者的人选越来越混杂，总裁仅仅让当时的大官挂名，编纂者中也只起用些不通史学的一般文士，中国史书渐渐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编纂物了。

不过，这时期也还是有着以往史法的遗存，尚有一些《史记》以来的精神，而这种情况主要又遗留在了《志》之中。本来，《志》被认为是史书编纂中最难的工作，就连班固的《志》也遭到非难，可见不是所有人都能

修好《志》的。如《后汉书》也是,范晔的《后汉书》最终没有写成《志》,今本《后汉书》中所附的是司马彪《续汉书》的《志》。那么,一旦具有写《志》才能的人物出现,就将前代史书中所缺《志》补齐了。最初做到这一点的是沈约的《宋书》,由于《三国志》、《晋书》都没有《志》,所以虽然《纪》、《传》中仅载刘宋之事,但是《志》的内容则从后汉以后一直写到宋为止。至于北朝的历史,虽然魏收的《魏书》中有《志》,但在以后的史书中则没有《志》。至唐太宗时才为梁、陈、北齐、北周、隋修了《五代史志》,这在今天是《隋书》的《志》,但本来是《五代史志》。此《志》的撰著用力颇深,基本为当时专家所为:《天文志》为李淳风所书,其他还有李延寿、令狐德棻等当时的史学专家也参加了撰写,所以此《志》被认为是上乘之作。从这一点上看,《纪》、《传》在《汉书》以后虽然成为了断代史,但是《志》在唐初以前则基本上保留了通史的意义,留下了超越历代记述制度沿革的方法。在这些《志》中质量最差,最无意义的要算《晋书》的《志》了。《晋书》的《志》的内容都是包含于沈约《宋书》中的那些内容,除此之外没有加入什么重要的新内容。大概正是由于《晋书》的《志》仅仅具备了敕撰史书的体例,所以作为著作可以说是完全重复而无用的。

正如郑樵已经在《通志》序中所责难的那样,本来史书应该是通史性质的,应该是作为一种家学事业的,对史法有所心得的著述。但是到了《晋》、《隋》二书以后,随着分纂法的兴起,史书开始堕落。像范晔那种优秀的史学人材,也已经不再能够忠实当时的基本史料;至《晋》、《隋》二书时,就完全变为一种机械地编纂了。六朝时期传统史法的消灭意味着史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

3. 正史体例及内容的变化

正史的编纂体例在各个时代虽然都大体依照了《史记》,但是其中也多少也有些出入。例如,《史记》、《汉书》的为吕后设《本纪》的做法,在后世消失了,至《后汉书》设立了《皇后纪》,而这种《皇后纪》与《吕后本纪》在设立主旨上是不同的。再者,《史记》以后《世家》大体没有了,后来在《新五代史》、《宋史》中虽又有设立,但那种设立《世家》的意义与《史

记》已经不同。《史记》写入《世家》的内容，至《汉书》都收入了《列传》。对于《汉书》废止《世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认为与体例不合。其实，从《汉书》的时代来看的话，当时的所谓诸侯，已经与从三代至汉初的诸侯不同，他们在分封国中已经没有主权。实际政权在天子派遣的官吏手中，事实上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世家的意义，所以《汉书》应该是出于当时的考虑而取消《世家》的。

《表》、《志》之类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设立与时代相应之目标的。由《表》、《志》的目标，可以得知某一时代的时代情况。例如，《汉书》的《表》只不过是《史记》的《表》中汉代之事，再予以续写的。除此之外像《外戚恩泽侯表》则是《史记》所没有的，这应该是由于前汉中期以后外戚势力强盛，自然地出现了写作此表的必要。在官职方面，《汉书》设有《百官公卿表》，以后的正史则皆将官职记载为《志》，出现了《百官志》、《职官志》，这应该仅仅是出于对当时具体情况的考虑吧。《志》本出自《史记》的《书》，对此正如许多评论家已经讲过的那样，《史记》的《书》与《汉书》的《志》在写作意义上是有所不同的。就《史记》的《书》来说，对于当时那些仪注即官府所使用的典礼，由于皆有官府记录可查，所以不予记载，而是重点记载了那些事情在实际中如何发生的精神背景。至《汉书》，虽然记载了汉代的礼乐刑政，也对其从前的起源作了追溯，但是对此沿革是在怎样一种精神背景下发生变迁的情况却没能下功夫去写，以致成为了类似罗列官府记录那样的体例。当然，此后正史的《志》中，大部分还没有出于《汉书》以上者。后来只有《新唐书》还是效仿了《史记》精神的。总之，唐以前的《志》大体没有超出《汉书》范围的，大部分都不过类似抄写官府记录的内容。此间，还有一些在后世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内容，比如《宋书》以后出现的《符瑞志》、《祥瑞志》，这在当时也许是很重要的，但是毕竟算不上可以成为正史一个组成部分的重大事情。如果司马迁也如此做的话，则也许会像《封禅书》那样注意其中与事实互为表里的背景。当然后世的《符瑞志》、《祥瑞志》等并非如此。但是像《魏书》的《官氏志》、《释老志》那种以往史书中所没有的内容，可以说是适应当时实际情况的记载。尤其是《释老志》，应该是出于当时一种宗教兴盛

而有必要总结其始末原委的需要，而且没有单纯根据列传体一个人一个人地记载，这才写成了《志》。当然如果使用司马迁列传体例也是可以描述当时宗教情况的，但是当时的《列传》毕竟只是记载一人之事，所以没有考虑用列传记述这一新出现之文化现象，而是采取了《志》的形式。

关于《列传》。司马迁撰写《列传》的主旨与后世史家撰写《列传》的主旨是完全不同的。就连与司马迁采取相同题目的班固，他撰写《货殖传》、《儒林传》的方法也已经与司马迁的主旨不同了。总之，在班固以后虽然传记变成了单独为一人立传的情况，但还是有《汉书·元后传》和《后汉书·宦者传》那种多少残留有一些司马迁《列传》主旨之影响的情况。《元后传》中叙述外戚倾轧帝室的原委，并由此描述了时势的情况；《宦者传》则选取了后汉时期与政治关系最密切的题目，其中范晔对宦者的有关论述多有与司马迁相似之处。在此以后，《列传》的题目虽然没有变化，但在六朝时代，尤其在《南史》、《北史》所开在个人传中加以子孙附传的先例，这与以往史书可说有所不同。当然，此前也不能说就一定没有类似的情况。例如《汉书·楚元王传》就附有其末孙刘向、刘歆传就是这种情况，其他的例子也还有一些。在《后汉书》中也是，史学家班彪、班固就是同传；出征西域的班超、班勇父子也是同传。《三国志》也有如诸葛亮的传中记入其子孙的情况。但是，这些毕竟都不是定例，就连父子关系也有分别立传的情况。然而，在《南史》、《北史》中，只要是一家数代相传者必定集中记述，不论其子孙兄弟是否为官，都要记载。因此，《廿二史劄记》认为，这可以说好像是在为人做家谱，而且这种做法并非开始于《南史》、《北史》，而是肇端于魏收的《魏书》，《南史》、《北史》不过是效仿而已。在魏收的认识中，虽说有着当时重视门第的一方面，同时由于中原丧乱以后谱牒散失殆尽，也有其意在保存此类材料而予以详录的原因。特别是《魏书》只记北魏一朝中相继不断的家族，而《南史》、《北史》则对那些绵延各朝代的家族，不拘朝代区别地予以了连续的记载，其中还有一些本来供职南朝，后来到了北方，跨越南北两朝的人。对这些家族也都不问其所归属的朝廷，仅仅按照其家族系统做记载，因此有时会出现不明确传中人物属于何朝代的情况。总之，对这一笔法虽也有人提出非难，但毕

竟在当时的情况下,《魏书》、《南史》、《北史》这种体例还是有必要的,可说是对此间时势的一种表现。当时的名族都是只重视自己的家族,不关心朝代的变化的,都是主要站在自己门第立场的,于是《南史》、《北史》也就自然地形成了这种笔法。对此,若按照中国以往那种史书评论标准,即将断代史也定为正史的标准,而以与此标准是否相符评论史法的话,虽然可以认为是体例不当,但是按照今日立场来看,这种笔法又不能不说与当时的情况是相互吻合的。

如上所述,正史的内容虽说在各代是有所变化的,但是大体上说《史记》那种对当时事情予以表里之正确表达的方法已经丧失,单纯依据官府日常记录进行史书编纂的方法逐渐形成,而且若非特别出色的史家已经很难摆脱这种束缚了。

四、编年史、通史、类书体的历史

以上所述只是《隋书·经籍志》所说的"正史"体例,而在《史通》所说的"正史"中还另外包括有编年体在内。对此,《隋书·经籍志》则称之为"古史"。编年体史书在荀悦的《汉纪》、袁宏的《后汉纪》以后虽然没有间断过,但是毕竟没能像纪传体那样盛行,而且也没能像纪传体那样利用当时原始资料进行撰述。荀悦、袁宏也只是在纪传体史书成书之后,将其改写为编年体而已。不过据《隋书·经籍志》可知,在唐以前编年体史书本来是相当多的,只是《汉纪》、《后汉纪》以外者已散失殆尽而已。然而,虽说是编年但都是写断代,几乎没有贯通各代的。其间曾经有一部试图贯通各代的,可惜今天已经完全散失了的著作,即被认为梁武帝时期所著的叫做《通史》的书,此书与后世郑樵一样,因为是继《史记》之后写至南齐,所以其中秦以前的部分基本依照《史记》而补充以其他观点;两汉及其以后的部分则基本因袭各代的纪传史书,但是却有其贯通各代著史的主旨,即有着与郑樵所论所谓史书若非通史则不成其为史书观点相似的主旨。据《史通》的记载,此外还有北魏济阴王晖业所著《科录》。但据《史通通释》所云,济阴王晖业乃常山王遵之曾孙晖之误。此书起自上

古,而终于南朝的宋代,其编纂多依照梁武帝时的《通史》,而取其各时代行事中类似者为一科,故以《科录》为书名。在《史通》中是将此书列入《史记》家,是作为通史部类的。其实若按《史通》所云,与其说是通史不如说是类书的体例,我认为这可以说是后世的《册府元龟》一类将历史用类书体例予以编纂的开端,其目的与类书完全相同,只是为了便于查找具体的事例而已。当然《史记》、《汉书》中已经立有《货殖传》、《儒林传》、《循吏传》、《酷吏传》的项目,但是《史记》的主旨与类书那种便于查找不同,司马迁是通过对当时社会情况中存在着的某一类人物的记述,进而对这类社会情况做出说明,其目的是不同的。后来,盛行于唐宋时代的以类书记载历史的做法,如前所述早在刘向时期已露端倪,至《科录》又以各代正史为材料做出了新的尝试,无论如何在正史之外另行创作大部头类书体史书的历史,应该认为是开始于《科录》的,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

五、正史以外史部书的发展

正史以外种种史部书的发展情况,从前述《隋书·经籍志》所列目录亦可有所知其大略;《史通》也注意到正史以外记录的发展,但是《史通》对这些著作的分类方法与《隋志》多少有些不同。《史通》(《杂述篇》)将正史以外的史书分为了如下十种:

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

由于分类法的不同,所以对书籍的归类也与《隋志》大不相同。例如,在《史通》中作为“偏纪”的《楚汉春秋》,在《隋志》中则是收入“杂史”部类的;又如“偏纪”中的《梁后略》在《隋志》中则是收入“古史”即编年体的。“小录”基本是传记,但这类书在《隋志》中是连同《史通》的“家史”、“别传”等书一起多被作为杂传的,如《史通》“小录”所收《汉末英雄记》,在《隋志》中是收入“杂史”部的。可见,不论在分类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史通》与《隋志》都是不同的。总之,《隋志》史部的范围很宽泛,《史通》中是没有《隋志》那些“职官”、“仪注”、“刑法”、“谱系”、“簿录”等种类的。大体上说,《史通》虽然论述了“六家”、“二体”,以及正史以外的十种记

录，但是主要还是认为史书最初是从“六家”的种类逐渐分支形成的，是将记录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给予考虑的。这种考虑在《隋志》中是没有的，由于把当时存在的记录分为了经、史、子、集，所以就把未归入经、子、集部类的书籍放入了史部，而且都是作为对现在书籍的分类的。可以说，《隋志》是从簿录家的立场出发进行实际分类的，而《史通》则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分类的，二者是不同的。但是，无论是《隋志》对正史以外的分类，还是《史通》的十种分类的书籍，都不过是从两汉至六朝之间史部发展的结果，由此可知这期间出于各种各样目的确实产生了众多书籍。

伴随着这样的发展，司马迁写《史记》时作为目的的那种史书，在性质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六朝末年，即便是有司马迁那种天才出世的话，面对如此复杂的记录，也很难再像《史记》归纳汉初记录那样形成统一的记述，并由此建立一家之言了。后世正史的内容逐渐局限于了一种固定的范围，以后的历史仅仅靠正史予以理解已经很困难了，使人感到在正史之外还需要有更多种记录形式。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有着撰写正史的人中再也没有出现司马迁、班固那样人才的原因，然而毕竟由于时势的变化，记录的发展也自然而然地繁杂起来，已经很难再期望单纯凭借一两个天才来统括所有记录了。总之，在《史通》、《隋志》时期的历史的内涵，尽管在正史已经以《纪》、《传》、《表》、《志》网罗了种种记事，但同时也反映于正史以外不断出现的种种特别记录之中。尤其是此时“志”一类的记录多了起来，例如《隋志》的“职官”、“刑法”、“仪注”都是作为正史《志》的分野而发展的。后世正史的《志》，并不是像《史记》那样旨在记载沿革精神，与单纯“职官”、“刑法”、“仪注”的撰述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详略差异而已。不仅于此，由于正史的《志》中有不够完备之处，这类记录另外发展了起来。特别是有关地理的书籍，更是有着长足的发展，《隋志》“地理家”虽收入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但六朝所出现的地理书籍绝不仅仅这些。近代章宗源撰写《隋书经籍志考证》时，记录了《隋志》未著录书籍，其中有关地理的书籍就很多。同样，别传的种类也多了起来，《隋志》中的关乎这类书是归入“杂传”、“谱系”

的,《史通》中则有"家史"、"别传"。这类书籍尽管在《隋志》已多有著录,但是尚未著录者仍很多,《隋书经籍志考证》依据《太平御览》的引用书目就多有补充。

就这样,从《史记》、《汉书》直到唐代,史部书籍发生了明显的变迁。其中正史不仅在内容,而且在编纂体例和主旨上都发生了变化,从一家著述变为了多人分纂。而在正史发生变化的同时,其他形式的记录也呈现了极大的发展趋势,其著作的数量之多正可谓汗牛充栋。

六、史注的发展

如上所述,在史部书籍的发展中,史注的写作,在两汉六朝时期也兴盛了起来。这在《隋书·经籍志》中几乎完全未予注意,《史通》的《补注篇》中已经有所注意,到了后世宋人高似孙《史略》中才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当然,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史家,在经书方面也盛行注疏,为其他各种书籍作音义、作注释也是当时的流行趋势。在史书也盛行着由文字训诂作音义,或根据事实作补注的风气。最初,是对《史记》、《汉书》作音义,像经书那样,《史记》、《汉书》成为了一家专门的学问,由于不以口授则难以读懂,所以有了作音义的必要。特别是对《汉书》作音义的情况最多。《史通》中也说,在史注类中当时大体可分两个种类:其中一类是以非常华丽的词藻描绘本文,仅仅对事物加以概括,并对末微之处予以细致记述的方法。作为例子列举出的有今日尚可见到《三辅决录》、《华阳国志》。但是这些虽说是注,可又是分纲目写作的,而不是那种对古书的注释。真正注的写法,就像徐广《史记音义》那类如同经书音义的著述,作为这类著作举出的例子可见于高似孙的《史略》。此外还出现了第三类注的方法,《史通》没有注意此类注。裴松之《三国志》的注就属于这一类,还有刘昭《续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注也属于此类,主要目的在于汇集本文未载事例以广异闻,并补本书的缺文。这种注在六朝时期非常兴盛,郦道元《水经注》就是这类中最大型者。这种方式到了唐初,又出现了《文选》的李善注。《文选》的本来目的,并不在于以事实为主,而主要是选编一

些优秀的诗文。所以作为它的注,像五臣注那样以注释本文为主的解释本应是最合乎原著主旨的,但是像李善注那种大量汇集历史事实的注,在后世反而成为了名著。这类注释当然在当时作为补充原文之缺是能够方便读者的,这虽说未必与原著者的取舍一致,但是能够补充些使话题更有趣味,这一类的注在当时很盛行。《史通》中还称赞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本文与注释分别写出的做法,这与上述《华阳国志》多少还有些不同。《华阳国志》是以本文华丽为目的的,而《洛阳伽蓝记》却是以本文简洁为目的的。总之,二者大体上还是一致的。

以上就是史注发展在当时的主要特色。当然,在《汉书》中就已经有了自注,后来随着经书注等的兴盛,在史书方面注的种类也逐渐发展起来,这还与六朝人特别喜欢制造谈资的风气有关。在《隋书·经籍志》中,注都是附于本书的,不认为注应该单独归入另一个部类。但毕竟还是应该视其为记录发展之外的另一种产物为宜。

作为史部大发展的结果,在唐初还出现了将那些史部书予以综合评论的史评家。刘知幾就是这种人物,所著《史通》应该说就是史评的代表著作。

七、史评的发达

随着各种史书的盛行,也出现了史书评论的专家。像汉代的刘向、刘歆,他们曾评论过所有的书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史书,不过由于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中的《辑略》遗失了,所以大部分书评已经见不到了。残留至今的仅有刘向对《战国策》、《晏子春秋》的评论和刘歆对《山海经》的评论。就其评论方法来看,刘向侧重从道德观念上评论书籍的善恶;相比之下,刘歆评论《山海经》时则带有几分好奇心而收集了一些杂说的资料。恐怕他们对司马迁《史记》也应该是有所评论的,可惜今已不存。但是,司马迁《史记》以及刘向的各种著作成书以后,也引起了其他人对这些书的评论。关于《史记》的评论在扬雄的《法言》和王充的《论衡》里有几处可见。当然那也只不过是些极为简单的评语,

所说最多不过一两句话，但是从中还是能够看出原著性质的。扬雄也曾将《史记》与《淮南子》做比较，(《法言·君子》："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也将《左传》与《史记》做比较。(《法言·重黎》："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总之，都是对其长处的简短赞扬。王充的《论衡》(《案书篇》等)中也有对司马迁、刘向的评论，虽然都是些简短的评语，但从中可知当时已经有了学者对这些著作的评论。从班彪开始对司马迁著述予以了详细的评论，这在今本《后汉书·班彪传》还可以见到。《汉书·司马迁传赞》的内容基本依据了其父班彪的评论。所以可以说这是最初对《史记》做出详细评论的。班固在《典引》的序(《文选》卷四十八)中，曾记载了当时天子即后汉明帝对司马迁的评论，可见当时就连天子也对著述家的情况感兴趣。今本高似孙的《史略》也抄录了诸家对《史记》的评论，从中可见就连晋代张辅那样评论司马迁与班固优劣的人物也已经出现了。其后，还出现了谯周的《古史考》。谯周是蜀亡国时，自蜀降魏及至晋代的人物，其《古史考》今天虽已不存，但根据《史通》(《古今正史篇》)及《晋书·司马彪传》可知，此书大体上是出于非难《史记》的目的写作的，即因为《史记》或采诸子百家杂说，不纯用正确经书，故而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据经书以纠《史记》之谬。但是，此后司马彪又举出《古史考》不正确之处多达一百二十二条，当时《史记》评论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后汉书》作者范晔，他连自己的著述也有了自我评论。而且评论得相当详细，还颇有自吹自擂的地方。曰："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曰：于各传之末，"论"之外又有"赞"，亦为得意之处。还说："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自诩了各种赞美之词。这段自述见于《宋书》及《南史》的《范晔传》，虽说自古以来就有自序，而如此自负的自评实

属少见。

随着史评的如此盛行,史评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门专业。但是作为不限于某一史书,而是论及各代史书的评论,其最早者还应该说是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关史传的论述。《文心雕龙》一方面论及诗文的各种体例,另一方面论述了修辞的原则,而史传也主要是作为一种文体论述的。对此虽说没有特别详密地进行论述,但是通晓各体史书的缺点与长处,且不乏贯穿史书著者内情的论述。大体而言,《文心雕龙》的《史传篇》并不为学者称道,纪昀也说刘勰虽通晓文理,但毕竟不专治史学,《史传》可谓长篇但没有可以称道的高论,认为说到史论还得数《史通》(纪昀《评〈文心雕龙〉》)。尽管如此,《文心雕龙》有的地方还是相当出色的。例如:"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由此可以说刘勰的观察还是很有见地的,而并非纪昀所贬低的那样。这种见解看来应该是当时对在实地所见书籍之有感而发的议论吧。在此之前成书的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其记古事详于《史记》,以至于在古代史书中曾经取代了《史记》的经典地位,然而,此书之弊又恰被刘勰的非难所言中。又如记载同时代之事所每每出现的曲笔问题,不也正是六朝门阀盛行时期所常有的情况吗?

在此种时代风潮中,历史评论得以发展,出现了对历代史学进行比较的通论。这其中最为集大成,而且最有见地者,毕竟还得数唐初刘知幾的《史通》。纪昀说,论述史学源流者未有超出《史通》以上的,给予此书高度的赞扬。关于《史通》,自古以来早有定评,刘知幾本人也相信这部煞费苦心的作品堪称名著,当时的人也都承认此书的名著地位。然而,中国著作家感慨自己的著作不为世人所认可的情况也是常有的,《史通》(《自叙》)也说,就像扬雄作《太玄》被世人嘲笑一样,自己也被俗人耻笑为愚蠢,其实不然。《史通》分为《内篇》、《外篇》,《四库提要》说应该是《外

篇》先出,《内篇》后出。刘知幾很喜欢骂人,他的评论中常有痛骂之词。而且书中既有自信之处,也有不那么严密的地方。例如,他依据《左传》的记事证明《尚书》的记事之不足,还常常根据《竹书纪年》等非难经书,都是弄错了判断标准的批评。又如,评论史书时也有着重体例而轻精神的倾向。看来在当时确实已经出现过对此书的各种评论,但是早期的评论今已无存。明代中叶以来此书为人所好,出现了效仿的著作和为其做注解的著作,至清代此书已很流行了。刘知幾的儿子刘悚曾做过史官,据说曾著《史例》三卷,其书已不传。可见这也是个史学世家。

在对《史通》的所有评论中,纪昀的《史通削繁》尤为世人看重。此书中纪氏删去了他认为《史通》中不必要的内容,还随处加有短评。其实,纪昀本人也很难说是史学的专家,他的评论也并非全部正确。在他所删《史通》的本文中包括了十分重要的内容:例如被纪昀全文删掉的《载言篇》,本是刘知幾认为非常重要的部分,他第一篇论"六家",第二篇论"二体",第三篇论述的就是"载言"。刘知幾认为治史者于《表》、《志》之外,还当立一《书》,即君主的制册诏令及臣下的章表移檄等这些可以称为史料的公文,也应该像以往纪传体史书中的《礼乐志》、《刑法志》那样,集中进行编辑。他认为古时《诗经》的诗由于自成一家,所以像《春秋三传》那样的历史书中是不取诗为材料的。后来,诗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文章。后世的历史传记中也就记载诗文了,例如韦孟的讽谏诗、扬雄的《出师颂》(《出师颂》乃史岑之作,《史通》误以为扬雄之作)、司马相如的《封禅文》、贾谊的《过秦论》等都载入了纪传。他认为可以像古诗例那样,把这些都归入《书》中。但是,从后世纪传体史书的角度来看,若实施刘知幾这一方案的话,将是相当繁杂的事情,所以纪昀可能就此删除了《载言》。为《史通》写《通释》的浦起龙也认为,由于后世著述很多,所以《载言》之论难以行得通。但是,后世还是有人坚持此论的,即章学诚《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所论:撰写方志须作三种类的书,第一,以纪传体风格作"志";第二,是"律令典例",集中记载地方掌故;第三,作"文征",用以收集有关地方文学的作品。此三者中第二、第三项,相当于刘知幾《载言》的内容。其实,这毕竟是很自然地发展而来的体例,《隋书·经籍志》

的“史部”中也有“旧事篇”这种关于掌故的内容,后来“史部”有“诏令奏议”之目,这也相当于刘知幾的《载言》。刘知幾的观点经过自然地发展,至近代则更是出现了明清《经世文编》那种历史材料的汇编,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汇集史料的必要性了。然而,这是刘知幾最早提出的思想。另外,《史通》中还有《载文》篇,其中非难了仅仅将华而不实的文章而载入史书的做法。当然,这种情况从《史记》、《汉书》开始已经多少存在了,比如列传中载入长赋等的做法,就有些类似的倾向。但是《史记》、《汉书》仅仅是将那些以辞赋为自己性命的人的作品载入列传;到了六朝时代,则将那些与史实无关,纯属虚饰的长文也都载入了史书。例如,当时大臣窃夺天子权位之前,必然要做九锡文。史书中这类内容很多,刘知幾认为这些都是些不合事实的虚伪内容,没有必要载入史书。又因为汉天子是亲自起草诏敕的,所以语气中反映了天子本人的心情;但是后代都是代笔,无道君主的诏敕中也显示出名君的样子。他认为像这类非历史的虚伪内容则没有必要记载。因此,刘知幾的《载言》认为史书最应该记载的内容,即章学诚所谓的掌故。章氏所谓“文征”,即便诗人文章家的作品,因为可以反映当时的文化,所以应该予以征集。就像六朝时代的《文选》那样,记载当时有代表性的文章,以便由此反映当时的文化。纪昀则认为这些都无必要,因为满足于后世纪传史书那种枯燥无味所表达的意见;这反映出他没有刘知幾那种由于有所不满,而开辟新领域的思想。

刘知幾对“书”、“志”也是有其新颖观点的,《史通·书志篇》中认为在以往已有的“书”、“志”之外,还应该建立新型的“书”、“志”,如《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等。然而,纪昀却把《书志篇》中这一段对新型书志的论述删掉了。大体上,刘知幾认为有必要设立《都邑志》,是出于当时文化上的考虑,即他认为都邑制度可以反映国家因俭约而兴旺,由奢侈而衰亡的情况,所以《都邑志》应该列于《舆服志》(《后汉书》有此志)之前,这是卓越的见解。《方物志》也是出于古来有必要记载方物的考虑,《尚书》有《禹贡》,《逸周书》有《王会》,《山海经》也与此有关,特别是汉代开通西域交通以来,输入了种种方物,所以应该在《食货志》之前设置《方物志》。他认为《食货志》是有关人口、租税的记载,《方物志》则应

该记载贡品、土特产的内容。关于《氏族志》他感到从六朝至唐代氏族兴盛、谱学发展之后有必要设立此志。特别是东晋以后氏族迁徙频繁。例如狼邪王氏本居山东，渡江南之后成为大族；又如北魏时期，代北名族增加，他认为由于这些事实关系到国家的势力、风俗，所以宜在《百官志》之后设《氏族志》。实际上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没有这方面可以依据的材料确实很不方便。例如，要想了解古时都邑生活的话，像《长安志》对汉代的记载粗略而不得其详，《西京杂记》近乎小说难以为凭。由单纯文学作品的《两都赋》、《三都赋》等也只能了解一些当时都市的繁华。而今天多少可以作为依据的《洛阳伽蓝记》那样有关寺院的记录，也只能是得到一些推测而已。至于方物，在唐代虽有《唐六典》的简单记载，但是毕竟没有关于历代方物的记载。又如氏族，后来《新唐书》有《宰相世系表》，这是类似刘知幾所考虑那种记载，而对氏族多有记载的《元和姓纂》那样的著作，却没有能够完整地流传至今。当然，六朝的地方志很发达，无疑其中也记载了方物，可惜这些地方志今天多已经不传，而《太平御览》、《水经注》中也只是残存了一些名称而已。这种情况毕竟还在于正史中有所阙如，而刘知幾之论并非不可采纳。特别是对于这新三志的设立，后来在郑樵撰述《通志》二十略时似乎得到了采纳，设有《都邑略》、《氏族略》和相当于《方物志》的《昆虫草木略》。但是，他的笔法又并不是刘知幾所期望的形式。因此，直至今日这仍然是残留于中国史学的一个缺点。

刘知幾《史通》文中恶语甚多，甚至经书也在中伤之内，所以到了清朝那种尊重经书的时代，《史通》就很难得到称赞了。《四库提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都指出了他的这一缺点。但是，钱大昕是在承认刘知幾见解的同时，对其先贬而后称赞的。他认为刘知幾的意见在后来《新唐书》以降的史书中得到了采用。即《新唐书》不载受禅的诏策和代言的制诏，不录五行灾异，不言占验，记诸臣籍贯而不取其旧望，废弃韵文的赞语，改为四六体论等等，这些都是对刘知幾观点的实施。而《宰相世系表》相当于《氏族志》，《地理志》所述“土贡”则相当于《方物志》，这也都是与刘知幾所论相合之处。他认为以上这些虽然在刘知幾的时代没能实现，但是在后代却得以实施了；他还提出了史评并非无用之物的论述。大

体而言，刘知幾因为重视体例，所以重《汉书》而轻《史记》，因此不尊重《史记》的微言。但是，在他以后郑樵、章学诚等史论家的出现，则有着他所给予的刺激力量，堪称贯通古今的史论大家。

第八章　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

从六朝末至唐中叶是中国文化的过渡期，此间经学、史学、诗文等都在发生着变化。不管怎么说，比经学更早发生变化的是史学，这种史学的变化又是随着文章的变化而变化的。此外，史学之中也出现了伴随文章的变化而发生的史书类的显著变化。其他类书籍也应该从这一时期开始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史书类的更显著变化则尚在此以后。先来谈谈那些不太明显的变化。

一、类书史学所受到的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了将史实编纂为类书体的形式。从六朝到唐中叶，类书与史书以及其他诸子类的区别逐渐明显起来。本来，类书一直未能成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则渐渐成为了其中的一类。但是，在类书中那些编纂史实的著作也不被认可为是史书，这些书被分类为类书的过程，与其说在有唐一代，不如说前后经历了六朝末至宋初的漫长年月。本来六朝末至唐初是类书的全盛期，但是，那并不都是作为记载史实的类书。作为类书编纂的目的，不在于获得有关史实的知识，所以类书不必以史实为基础，但是无论如何史书编纂中也开始出现了类书体的情况。正史的情况另当别论，上面谈到的只是实用史书的情况。

最早在中国出现的类书萌芽可以追溯到前汉末期。当然那时的目录家并没有类书这一概念，但是类书体的著述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尤其反映在了刘向的著作中，他的《新序》、《说苑》、《列女传》都多少有着类书编纂倾向。《说苑》中将自古以来种种史实，古人的嘉言善行，按照“君

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等二十个标题分类。《新序》的分目也与此相似，只不过项目较少而已。《列女传》是按《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等进行分类记载的。总之，这些都是为着使古人的嘉言善行能够成为君主心得、令人教训而编纂的著作，所以不是那种以类书形式通观古今变迁而表达史家见解的产物。无论如何，当时已经产生了对这类书的需求。不过说到类书的始祖，一般认为还是魏时成书的缪卜的《皇览》，有所谓“类事之书始《皇览》”[①]之称。此书据说有一百二十卷，是篇数达千余篇的大部头著作，字数有八百余万字。关于编纂者有种种说法。这部大型的类书今天已经不传，残留下来的仅仅是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冢墓记》。此后类书逐渐发展的情况，看看《隋书·经籍志》的“杂家”就清楚了，《玉海》中也可以见到很多类书。其中成为今天类书原型者多为六朝末至唐初的著作，现存者虽以唐初著作为最早，但是作为其前身者则是六朝末的著作，即北齐祖珽（孝徵）的《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据说此前尚有北齐的《圣寿堂御览》，惜无传，或许后来成为了《修文殿御览》，其实二者本一物也未可知。因为有传闻《圣寿堂御览》在中国仍有遗存，然而经多年留意，查明毕竟已经不存，但是其中有极少的一部分保留在了敦煌出土的书籍中了。至唐初，出现了至今尚存的欧阳询的《艺文类聚》、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徐坚的《初学记》，后来又有白居易的《六帖》。此四书合称唐代四大类书。此外唐代还有大型类书《文思博要》，今已不存。此书在唐太宗时，由魏徵、房玄龄等参与而成书，据说有一千二百卷之多。至宋初，将上述类书予以集大成者是《太平御览》，有一千卷。

补说：

本来，冠以《御览》书名的著作都是出于阅览古代帝王言行之需要而编纂的书籍，例如魏的《皇览》。《修文殿御览》据说就是出自魏的《皇览》。关于其成书的直接原因，据记载魏、齐、周之事的《三国典略》

---

① （宋）王应麟《玉海》：“类事之书，始于《皇览》。”

(《太平御览》卷六百一所引)可知,北齐武成帝将宋士素所著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置于案头,称为《御览》。此书后来经阳休之进一步扩充,取《芳林遍略》,加进《十六国春秋》、《六经拾遗录》、《魏史》成为了《玄洲苑御览》,后来又改为《圣寿堂御览》,最后由祖珽改为了《修文殿御览》。这种将他人著作改了又改的著作,据说在当时曾被抨击为"床上之床,屋下之屋"。[①] 然而,上述的《芳林遍略》这本书多少有些可疑。因梁武帝之命所著类书中有《华林遍略》六百卷,或曰六百二十卷,或曰七百卷,很可能即指此,"芳"当为"华"之误。据《北齐书》(卷三十九)、《北史》(卷四十七)《祖珽传》载:当时有人欲卖《华林遍略》时,北齐文襄帝迅速遣人抄毕而送还其书,其间祖珽曾用此书作过典当品。另外,由《北齐书》卷四十二及《北史》卷四十七《阳休之传》所载休之曾劝祖珽作《修文殿御览》一事,亦可见二者是有关系的。即最初开始于梁武帝的《华林遍略》,然后有了《修文殿御览》,再后来此书又成为了《太平御览》。不论哪种,都可看出今日最大类书《太平御览》之渊源长久。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太平御览》中引用了一些今日已经不存的六朝书籍的原因所在。

至于这种类书出现的必要性,其实就在于六朝、唐代人写文章尤为喜用骈体文之中,即有必要了解典故,了解创作对仗句时所需华丽文句的材料。从这种对类书要求中的通晓文章辞藻、典故,又兴起为了一门学问,而且这与后世中国学问的发展又不无关系;它不仅对于文学,同时为经学、史学奠定了新的研究基础。这一点很重要,后面再予以详细阐述。作文必须通晓典故、辞藻,比如作为天子秘书的中书、翰林,负责起草天子诏敕,书写天子批文,或书写上表一类公文,即便单从六朝至唐代骈体文流行的需要来说,当时对于文章华丽不仅是社会一般的要求,也是朝廷官职上的实际需要。后来到了宋代则称此为辞学或词学,王应麟的《玉海》就是这类著作的典型。

---

① 《太平御览》卷六〇一引《三国典略》曰:"祖珽上《修文殿御览》,徐之才谓人曰:'此可谓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

在这样的风气下,看来当时人们已经感到有必要汇集史实编纂类书了。而其中最重要的,则莫过于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北魏时期的《科录》了。此书现虽已不存,但《史通》是将其列入六家中之"史记家"的,视为梁武帝时成书的通史一类著作。如上所述,《史通》认为此书为北魏济阴王晖业所作,其实是常山王遵的曾孙晖之误,而实际上的执笔人据说又是《十六国春秋》的著者崔鸿等人。此书乃二百七十卷的大著作,被称为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而编纂的。《史通》之所以将其归入"史记家",以为与通史同类,是因为在《史通》的时代尚未明确出现"类书"的概念。《隋书·经籍志》也是将类书归入"子部"之"杂家"的。《史通》成书的时期,尚没有出现汇集史料、编纂类书那种发达的分类思想。但是,《科录》就其内容来看则完全是关于史实的类书了。《科录》在《隋书·经籍志》中归入"杂家",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归入了"杂传记"。《隋志》中没有类书的概念,《唐志》中虽有"类书"条目,但由于《科录》仅是史书,不涉及其他内容,所以列入了"杂传记"类。从《南史·齐纪》可知,与《科录》前后成书的还有南齐太祖建元四年依敕命编纂的《史林》三十篇,据《南史·齐纪》说这是魏文帝所作《皇览》一类著作,所以很可能也是与《科录》同样以史实为主的著作。《科录》、《史林》二书可以说是南北两朝各自以史实分类的最初的类书。刘向《新序》、《说苑》以后,一直没有出现单纯以史实为材料而汇集的著作,至此二书则是以史实为材料所编纂的类书。其次,隋朝时在今日所见《隋书》出现之前,据说曾经有过王劭的《隋书》八十卷。据《史通》(《古今正史篇》)及《隋书·王劭传》可知,王劭的《隋书》似乎既不是纪传体也不是编年体,而是以类相从设立篇目,完全就是类书体的著作。此外,据《隋书·经籍志》("杂史")可知在汉代已有卫飒撰著《史要》一书(《新唐书·艺文志》作《史记要传》),此书概括了《史记》的要言,也是以类相从的编纂,今已不存。所以,此书究竟是史抄还是类书,不清楚。尤其是其内容仅仅限于《史记》,所以很难说是广泛汇集各种书籍,按类编纂的著作。

至唐代,类书出现了堪比前代的大型著述,可以说这是类书在编纂当代事实方面的应用,现存《贞观政要》就是其中之一。其书设立有四

十个篇目，是对于唐太宗政事中善事的分类编纂，成书于唐开元时期。据《玉海》可知，在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此类体例的书籍，如《开元政要》一类属此，今已不传。这一类著作在唐宋时代逐渐流行起来，如《时政记》的成书，特别是到了宋代更有《宝训》、《圣训》之类的盛行。此《宝训》、《圣训》之类著作，大体从宋代开始一直流行至明清；在明代称《宝训》，在清代称《圣训》，都是对天子诏敕中最优秀内容的类编。

此外，史书中，特别是正史中属于《书》、《志》部类的内容，即政治上主要事件，从唐代被编入类书开始，这种体例一直持续到了后代，唐杜佑《通典》以及继其后而起的《会要》就是这种书籍。《通典》是大著作，而不是单纯作为类事之书的编纂。虽然也区别为部类，但著述目的却在于阐明历史古今变迁原因结果的著作。这种编纂方法虽与类书有些相似，在主旨上却不能说是类书。宋以后《通典》体例盛行起来，姑且不论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是完全依照了《通典》体例的，不过，其目的与《通典》各异。《通典》不论其目的还是内容都不能说是类书，但《文献通考》则不仅目的与类书接近，其内容亦非《通典》那样贯彻着著者的主张，也可说是相当于类书的。那以后，按照这一体例成书的著作，都已经成为纯粹的类书了。由于这种编纂类书的方法很便利，所以在宋以后越发盛行起来。

再来谈谈《会要》，现存《会要》中虽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唐会要》、《五代会要》等各种，实际上其中最古的是《唐会要》。《唐会要》和《五代会要》成书之后，又上溯而成两汉《会要》。这种体例的内容若按照《隋书·经籍志》的分类的话，应该归入“旧事”或“故事”部类，其中收集了政治上的古例。因此，《玉海》把《会要》归入“典故”部。大体而言，从官制以及其他制度上对典故进行分类编纂的著作以前就有，像《唐六典》、《通典》就是作为此类著作，被《玉海》收入“典故”部的。在后来，这种故事类别进一步扩大，不再只是单纯记载制度的内容，还将与制度相关的法令以及实行情况汇集并分类编纂，而形成了《会要》。《唐会要》成书后，由于这类书很便于天子秘书在起草诏敕时用来查找故事，所以又不断

出现了其他的《会要》。《五代会要》以后虽然出了《宋会要》,但是明以后开始衰败,《明会要》以后再没有优秀的著作问世了。《会要》在唐宋之间,特别是在宋代最为盛行。这在诏敕的写作风格上,也反映了各个时代的不同风气;但是明以后的诏敕中,列举故事的情况的减少,乃《会要》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真正对史实进行分类的著作之中,至宋代出现了一部非常大型的书籍,即《册府元龟》。这应该是从《科录》发展而来的,完全是一部将史实分类编纂的书籍。大体上可以说《册府元龟》是依据正史中的《纪》、《传》,亦即按照个人行事所编纂的类书;《通典》、《文献通考》则与此不同,是从正史《书》、《志》发展而来的一类书籍。宋以后以《册府元龟》为终结,按《纪》、《传》分类的类书衰败了,而以《书》、《志》分类的类书发展了起来。这其中是有其原因的,是当时史学精神所造成的。关于这个问题待以后讲述宋代史学时再详细阐述。这种由《书》、《志》进行分类的编纂,后来发展成了策学,成为与辞学相对的中国学术发展的又一潮流。即史书虽说伴随着当时类书的流行,而形成了类书体,但其中还产生了策学与辞学两个支流,对此是有必要加以注意的。

六朝末至唐中叶类书对史学的影响,就大体介绍如上。

二、史体的渐变

1. 史学的古文复兴

除上述之外,史体的变化主要还与文章有关,即关系到史体之中古文复兴的问题。其中首先有着一种编纂上的需要,如前所述,像《后汉书》那样隐括前代史书时,为了使之适合于作者的思路而对文章进行了改写,即史学编纂上也出现了对文才的需要。这是较远的原因。至南朝宋齐时期,史学文体中骈体文流行;六朝末至唐初之间又有了古文的复兴。

大体上关于古文的复兴,从文章家的立场来说,唐中叶的中心人物是

韩愈、柳宗元,苏东坡评价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①]《新唐书·文艺传》也说,古文兴起于韩、柳。其实,古文的开启当略早于此,由《旧唐书·韩愈传》可知,当起自韩愈所师从的前辈的时期,即大历(代宗)、贞元(德宗)时期。当时曾掀起对古学的崇尚,独孤及、梁肃等人仿效前汉扬雄、董仲舒文章写作古文,韩愈向这些人学习,有志于古文。与独孤及等人同时代的元结是主要人物。本来大历、贞元年间古文的兴起,从文章家的立场来看,这是个文章变迁的时期。但是从史学来说,古文的兴起还要更早些。

南朝史书中《梁书》、《陈书》成书于姚察、姚思廉父子之手。姚察从陈朝开始就作为史家独自编纂史书了,思廉则一直生存至唐初,并完成了父亲的事业。此父子二人写史时,改变了迄《宋》、《齐》二书为止所使用的骈体文体例,而改用了散文的体例。六朝时骈体倍受推崇,以至叙事文也要使用四字句而很少使用散文。姚察是最初运用古文娴熟撰写《梁书》的,特别是纪传的论赞,在骈体未兴的古时还愿意用四字句撰写,但是他还是用散文撰述了论赞。《梁书》的总论是魏徵写的,使用的几乎都是骈体文,但姚氏父子还是断然放弃了骈体文的使用。他们可以说是史学中古文复兴的鼻祖,实际上是领先于文章家的。在另一方面,像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则出于对以往史书进行简化文章的需要,竭力将其改写,带有趋近散文的倾向。但是,这毕竟是出于简单易行的目的,而不是像姚氏父子那样从一开始就以散文为目的的。如此看来,史书的发展又是与古文的发展有其相互关系的。即伴随着古文的发展,使用司马迁、班固那种史书撰述方法,即使用古文义法的做法,与将以往繁杂资料予以简单缩写的做法发生了合流,从而迎来了唐以后史体的一大变化。关于改写史书是否妥当的问题,后代史论家曾议论纷纷。史论家中虽说有人并没有理解改写的真正意义,但是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仍可以说那是一种具有各自编纂主张的议论。对此,成为议论问题的是李延寿的《南史》、《北

---

① 北宋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史》。其实,这本来也并非《南史》、《北史》的问题,只是因为李延寿受到了《新唐书》的褒扬;而《新唐书》又是出于对古文与史体关系之自觉意识而撰著的,因此也是明确划分了史体时代的著作,所以《南史》、《北史》就成为了后代讨论的对象。

2.《南史》、《北史》

如上所述,《南史》、《北史》在史学家中之所以成为问题,原因在于《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褒扬。据《李延寿传》可知,《南史》、《北史》本非李延寿一人所成,在其父李大师时已经着手撰述了。李大师已经看到,南北朝的史书中都有不适宜之处,如南北之间都是详记自国而省略他国,褒扬自国而贬低他国;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呼南方为"岛夷",所以希望有所改变。于是他按照《春秋》的编年体例,将南北朝进行对照研究,惜未完成而身先死。李延寿是继承其父的方针的,他因为在唐初参与过《隋书》的编纂,有机会了解种种资料,最终成就了《南史》、《北史》。《南史》、《北史》统括了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和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隋四朝。《新唐书》推崇该书,认为颇有条理,删减得当,超过本书甚远;还惋惜当时人因李延寿年少位低而未能重视该书。至近代清朝史学家大多反感《新唐书》,因为《新唐书》过于偏重古文风格,采韩、柳文章笔法,材料也多取之韩、柳,因此于经学反对朱子学的同时也反对古文,进而反感于《新唐书》,以至殃及李延寿。像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就是反对李延寿的主要倡导者,认为虽说《新唐书》云"其书颇有条理",[①]实则甚少条理;又云"删落酿辞",然其所削皆为不当,使用了不适当的删节方式;云"过本书甚远"更是大误。不仅攻击该书撰著的效果,进而对李延寿其人也加以了无谓的攻击。王鸣盛的攻击虽然多带有感情色彩,但此外也有着得当的批评。赵翼《廿二史劄记》对《南史》、《北史》的所长、所短都有所论述。

《南史》、《北史》大体是对原有史书的简化,当然会有着种种改编,因

---

① 《新唐书·李延寿传》。

此自然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对其有过种种议论亦不足为怪。然而，一般都是抨击《南史》、《北史》中《传》的写作方法。即由于《南史》是贯通南朝，《北史》是贯通北朝的记载，所以《传》的写法就不是以个人为主，而采取了家族连续的家传体例，在家传之中才是个人的本传。这是受到攻击最多的地方，但是这种笔法其实并非始于《南史》、《北史》，在《汉书》中就有。例如《楚元王传》中列有其末孙刘向、刘歆的传。但是，刘向、刘歆并非由于是名家末孙才得以列传，而是凭借自己与先祖无关的才能成为伟人的，所以本无必要附录于《楚元王传》。这种笔法虽有为人做家传之嫌，但在《南史》、《北史》中却得到了极端的应用。所以，齐、梁的那些名人也不是单立传的，反而被作为了先祖传的附录。本为了看一人之传，却不免翻阅其家传之烦。王鸣盛也说，对一家人从先祖开始记述，虽乃史家恒例，但那仅仅是记录一朝之事，并无贯通数朝之法。虽说这只不过是他为了便于抨击而找的借口，但是在作者的立场来说也是有其理由的。《史通》将《南史》、《北史》归入了“通史”部，是因为看到李延寿有着撰述通史的主张。作者的意图，或作者曾有过的意图，在唐初刘知幾的理解上，是一种通史的意图。果真如此的话，在六朝那种重门阀，重先祖的时代，个人并不重要，天子是何姓都关系不大，值得夸耀的只是自己那崇高的门阀。这种风气自六朝延至唐初，其结果之一就是撰写家传之法的形成。所以说，从后代史家那种以《汉书》为典范，视断代史为史书主旨的观点出发的话，《南史》、《北史》的方法是有所不妥；但是若从轻视天子、夸耀门阀的当时观念来考虑的话，《南史》、《北史》又应该说是很能够如实反映当时时代风貌的。从今日立场平心而论，应该说这是适合当时实情的笔法，所以像《南史》、《北史》这种写作方法应该说是很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社会风气的。虽然不能不说《南史》、《北史》是有其忽视杰出人物，一律列入家传之偏见的，但是毕竟那种跨越天子朝代，重视数代连贯的笔法，在当时观念来看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所以很难说这就是体例上的有所失当。

在当时《南史》、《北史》显然是尤为世人所瞩目的。当时对于南北朝虽说是有其各代正史的，但是自《南史》、《北史》成书，世人皆读此书，而

不读正史了。因此，由于宋初《魏》、《齐》二书残阙不全，而将其校合之时，甚至出现了反而取《北史》的材料进行补充的现象。后来，又由于《南史》、《北史》有着实用方便利的特点，更是得以进一步的流行，甚至比各朝正史更为人们所利用。当然，单纯以是否便于使用，并不能构成判断此书的标准；但毕竟从此书如此受到当时人青睐这一点，也还是可以看出其所具有之相应价值的。不论有多少缺点，此书至少并不像王鸣盛所说得那么糟糕是肯定的。

总之，《南史》、《北史》虽说并未刻意地将骈体文史书改写为古文，但是在删节简约原书内容的过程中，又确实自然地出现了不再墨守骈体文的情况。在《梁》、《陈》二书已经开始使用古文之后，《南史》、《北史》的成书更加助长了摆脱骈体文趋势的兴盛则是很明确的。

3. 古文复兴与经学新研究对史学的影响

从唐中叶起无论文章还是学问上都迎来了一个革命的时代。历来关于古文一般都认为兴起于姚察、姚思廉将古文应用于史学，和独孤及在韩愈以前对古文的使用。其实，另外还必须看到，在后周时期产生于政治上及文章上的一种复古的趋势。后周曾经有在制度上力图实行理想政治的时期，在后周高祖宇文泰还是西魏宰相的时候，他已经任用苏绰改革制度。苏绰改革了以往因循秦汉以来自然发展形成的制度，按照《周礼》的官制建立了新型制度。在自然发展的官制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产生了冗官，存在有名无实的部分，对此有必要根据理想官制加以整理。与此同时，他又出于对《周礼》的喜好而偏爱古典学问，并且废弃诏敕骈体文那种浮词的使用，开始仿效《尚书》文体。这种政治与文章上的革命，是王莽以来的第一次。王莽因复古主义失败了，苏绰的方法却很适合当时。这是因为随着政治的自然发展，弊害不断增多，因而有必要进行整理。但是，他的理想未能被继续下去，从隋至唐代又再度兴起骈体文制诏的情况。无论如何，复古思想的产生、以往自然发展的唐代官制与依据理想建立的官制形成了一种融合，于是产生了新思想，同时这种思想使文章也出现了新的倾向。在诗歌方面早在唐初，六朝

诗风已经出现了变化的倾向。文章方面也是，肃宗时元结的《大唐中兴颂序》明显的是古文体。他的《文集》大体都是古文，尽管当时古文尚未盛行。后来到了代宗的大历、德宗的贞元时期，则逐渐迎来古文之盛，其中心人物乃韩、柳，特别是韩愈。清朝古文大家方苞也说，韩愈的古文乃得古文义法之古文。方苞虽认为义法为司马迁所创，其实司马迁是否真的具有方苞所谓的思想还不清楚。他还认为真正能够继承义法的只有韩愈。暂且不论此观点的正确与否，韩愈的作品中多少有着作为史家义法的用意是可以肯定的。他所著史书仅有《顺宗实录》五卷，虽然很难说他的这一著作有多么优秀，但是其记事有所取舍，笔削严谨是受到后代称赞的，大体上可以说是能得义法的。此外还有据说是他所撰写的碑文，例如《平淮西碑》就是其中尤获盛誉者，方苞认为《平淮西碑》中将序与铭文分别撰写，体现了义法。从另一方面看，碑文过于模仿《尚书》，而对所记当时的真正事情的记载却没有太大意思。然而，古文如此兴盛，其标准由于为前汉司马迁、扬雄所置，所以无论如何其文章较之骈体文很少赘述，于简洁的文句之中进行了活泼的叙事，这一点确是事实。

与此同时，在经学方面也发生了一场革命。《春秋》的新研究就是这种情况。这方面的研究者有啖助和他的门人赵匡、陆淳。他们一反以往研究《春秋》仅注重"三传"的方法，对"三传"提出怀疑，自主做出判断。从现存陆淳的著作来看，其方法优劣兼备，难以一概赞成。当然，这在当时已经有所议论，吸收新史学方法之《新唐书》在《啖助传》中基本也不赞成他们的方法。啖助抨击了以往的《春秋》各传，自己对各传没有任何继承，但却以自己的观点为孔子观点的做法，被攻击为诬世者。此乃《新唐书》列传作者宋祁的观点，钱大昕甚至以此称赞宋祁具有胜过欧阳修的见识。总之，唐中叶在经学上有过此种风气却是实事。如果进一步探索的话，其实在更早以前此等新方法已露端倪，只不过明白地表现出来，而且至今尚存的则是啖、陆对《春秋》的新研究。这种《春秋》新研究的兴起，在促成思想新风气的同时，也引起了对《春秋》义法的重新考虑，而这一过程又与古文的复兴相互关联，至唐以后

更是达到了兴盛。

毫无疑问在当时社会上一般是通行骈体文的，但是毕竟古文之势逐渐强盛，晚唐古文写作已日渐增多。当时的古文，由于人们追随韩愈反抗世间，倡导古文，而出现了刻意不均衡的写作风格。而且当时人又多少都乐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像韩愈的门人李翱所作《复性书》就被认为是开宋学之初的作品。其他很多作品也多有立一家之言的风气，皇甫湜、孙可之等虽说仍是韩愈的风格，但皮日休、陆龟蒙等则在作古文的同时，亦写作类似子书的作品。韩愈作《原道》是当时的儒学中表现自己的一家之言，上述这些著作自然属于韩愈流派。另外还形成了包括韩愈本人也致力做到的，力求使文章具有个性的倾向，即便记述他人之事，也争取写出那人的个性来，这在当时已成为了一般的风气。此风气影响于史学，又成为了兴起宋代新史体的趋势。

以上这种出现于经学、文学、史学上的新倾向与建立一家之言的写作风气，至宋代则成为了新史体诞生的起源。但是，就一般而言，在唐代基本还是守旧的风格，发挥个性的文章家毕竟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正如赵翼《陔馀丛考》所论，当时毕竟盛行谱学，而且这种谱学不仅流行于唐代，即便在作为宋代新史体的《新唐书》中的《宰相世系表》也不外一种谱学的迹象。

补说：

直至六朝，几乎还没有出现史学评论这一类书籍，本来在目录上是没有这一部类的。但是到了唐代由于《史通》的问世，这类书籍多了起来。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同样的书籍，以致形成为了一个专门的部类。前面已经谈到，《史通》作者刘知幾之子刘餗撰写《史例》，继承其父史学，继续进行史学评论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此类书籍，如《新唐书·艺文志》设有“文史类”，所谓“文史类”就是对那些论述文章之法与史书之法书籍的汇集。大体上，写文章与著史书在古时候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在日本也一样。钻研文章的人也就是“纪传道”的人，由此出身者就成为文章博士。修经学的人是以记忆为主的，而以著述为主的人是学史的。从那时

起著史与文章就是有关系的。

三、史书的注及其变迁

唐代经学著作《五经正义》是继承前代注疏学发展的集大成者。同样的情况亦见之于史学,即出现了对以往那些重要史书的完整的注。而其中最有名者是有关《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注。在《史记》的注中有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汉书》有颜师古的注,《后汉书》有章怀太子李贤的注。由于司马贞、张守节二人在《新唐书》无传,所以不明其履历。但是,由张守节《正义》序文中,记明于开元二十四年八月写毕。钱大昕推测司马贞应当较张守节年长,可能是唐中宗、睿宗至开元时期的人物。在这一时代,由于刘知幾《史通》的问世,出现了历史评论的兴盛,作注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依据前人之说,而是能够发表各种对所注释书籍本身的意见了。司马贞《索隐》对《史记》这等大著作也似乎有着种种的不满,在单行本《索隐》的末尾,附有他的意见。比如他认为《史记》中虽有《五帝本纪》却无《三皇本纪》,因此补上了《三皇本纪》;又认为《史记》有《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但是《秦本纪》所载乃即帝位之前的内容,宜做《秦系家》(系家即世家,乃避唐太宗名讳);《项羽本纪》亦不尽意,当作系家;《吕后本纪》应该像《汉书》那样将吕后与孝惠帝分别作为两个《本纪》。其他如《世家》中有的也可以分开记载,又《陈涉世家》应以《列传》为宜,此外他还提出了种种意见。然而,对将孔子列入世家则认为无可指摘。司马贞的批评中也有没能理解《史记》本旨的地方,例如认为不应当在《西南夷传》之后列《司马相如传》,其实《史记》正是认为开拓西南夷乃司马相如等人努力的结果,所以如此关联上记载的。可见司马贞的抨击是不妥的。他的评论中虽说有可取也有不可取之处,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出作注多少有了史学批评精神的倾向。

大体上,从六朝至唐初,自皇甫谧《帝王世纪》成书,考察古代事迹者就多利用此书,《史记》的作用渐渐失去。《史记》中与《汉书》重复的部分,不如说《汉书》更便于使用;而在古代史方面则利用《帝王世纪》更为

方便。由于当时尚无人考虑《史记》的义法问题，所以人们自然只是注意那些便于使用的书籍。《修文殿御览》的情况虽说不太明确，但是从今天尚存唐初的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中对帝王的记录可见，其中极少引用《史记》，而多是依照《帝王世纪》的内容。当时的人并不考虑书籍的真伪、资料的正确与否，只注重那些编辑完整的书籍在使用上的方便性。比如对于《尚书》，也是只重视后出的编辑完整的《古文尚书》。像这种书籍，尽管从开始就有其真伪的问题，但是后来还是很流行。总之，由于这样的原因，《史记》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对《史记》的注释也少于《汉书》的注。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史记》研究的复兴。

这个时期的注中最为人称道者是颜师古的《汉书注》，此注还非常注重忠实原著，关于此注的写作意图，在南监本《汉书》中留存的叙例中有所论述。按此叙可知，他认为他所在的时代人注史书，为了显示渊博而多引杂说攻击原著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注并不是为了展示古人错误的体例，要在务求忠实原著。大体上说，从唐代开始《汉书》已经非常流行，刘知幾也对此书表示钦佩，赵翼《廿二史劄记》中也指出，在唐初盛行《三礼》、《汉书》、《文选》之学。因此，在唐初为《汉书》作注释者非常多，前述姚察、姚思廉也有过关于《汉书》的著述。而其中颜师古的《汉书》注在当时就已经被称许为上乘之作了。特别是，颜师古的叔父就已研究《汉书》，他继承了叔父的研究。所以从那时起就有了对颜师古的称赞，甚至称他为班固的忠臣。虽然也有人批评颜师古的注有些过于繁琐，但是无疑颜注是最恳切、最优秀的。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今日多数《汉书》注都已经佚失，唯独此注尚存的原因。

章怀太子的《后汉书注》，成于颜师古注出现之后的唐高宗之世。他是高宗的太子。虽说一般称为章怀太子注，其实是召集当时学者所作的注释。本来，范晔的《后汉书》是将以往多家《后汉书》汇集而写作的，而其他家的《后汉书》现今皆散失，仅存范晔的《后汉书》。在章怀太子注写作的年代，由于尚存多家《后汉书》，所以注中随处有所引用，保留了那些《后汉书》的痕迹是此注的价值。但是，就全体而言，尚不及颜师古的注。

特别是《后汉书》的注，仅有对范晔《后汉书》的《本纪》、《列传》的注，而没有对志类的注。今本《后汉书》的志类是取晋人司马彪《续汉书》的志补上的，有梁朝刘昭的注，而章怀太子没有写这一部分的注。

总之，《汉书》、《后汉书》的注在唐太宗、高宗时期都已出现。对《三国志》因为已经有了裴松之的杰出的注，所以未见还有什么人做注。大体而言，《后汉书》注采取了此前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而颜师古的注毋宁说根据了当时经学注疏家的方法，不仅在于补充逸事，还注意了对文字的训诂。当然这也是由于《汉书》中的材料有必要进行训诂，尤其是因为《汉书》中喜好使用古文字，所以就更必要进行文字的训诂了。以上各书中《史记》注最晚问世，《索隐》还算好，至于张守节的《正义》则被认为质量不佳。而且由于《史记》注问世略晚，不免受到当时那种唐代批评精神的影响，所以出现了像《索隐》那样批评原著的倾向。

为史书作注的情况基本上仅限于唐代。后来在宋代虽说也有《五代史》注，但已经不再有唐代那种优秀的注了，而且也没有作注的必要了。宋以后的学者，与作注相比更重视古书校正、史事订误。对《汉书》也出现了既非纯粹注释，亦非纯粹评论的注释，大体是侧重于评论了。忠实原著作注的情况，盖终于唐代。

四、史官的变迁

从汉代到唐代史官的职务是怎样的呢？刘知幾《史通》的《史官建置篇》记载了唐以前历代的史官之事，同书的《辨职篇》也论述了唐代的情况。后者还涉及了设官得失的问题。根据《史通》的记载，汉代设置太史公，其职务是在执掌史书的同时，还掌管天文的占候等工作。由《汉书·律历志》可见，司马迁在写《史记》的同时，还掌管修改历法的工作。从汉宣帝开始，史官的职务颇为减轻，太史公也改名为太史令。在司马迁的时代，太史公的职位还在丞相之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官职的重要，就像日本神祇官在太政官之上，不过是在朝廷坐席的位置靠上的意思而已。似乎后来其职务越来越轻，以致难于保持其位置了。大体说来，太史

公的时代虽然仍旧实行世官制，但是后来此制不再继续了；当时撰写史书人的不一定就是太史令，太史令也不必一定撰写史书。从汉代开始已经就是这样了，褚少孙、扬雄、刘向虽都撰写了史书，但他们却都不是史官。后汉时代的张衡、单飏，魏的高堂隆等虽都是太史令，但又都仅仅执掌天文推步，与史书无关。后汉时代执掌史书的职官又如何呢？班固出任的兰台令史即其一。此职务原来是御史大夫的属官，在当时是掌管天子手头文件的官员。从这一时期开始史书转至天子秘书的监督机构，以往那种由独立于天子的天文官掌管修史的情况完全消失，史书的撰写与世官也分离开了。此后，由于图书都集中在了东观，在此还编纂了《东观汉记》，此书是由众手成书的。这是集中多数人集体写作史书的开始，唐太宗的时候编纂《晋书》就是依照此例行事的。从那以后的修史，已经与一家专门之家学分离，成为了一种等同于作为工作的集体编辑文书的情况。从那以后作为魏曹至唐代的一种倾向，编纂史书转为了处理天子秘书之官吏的工作，从那一方面来说，虽说不再是一家的专业了，但却转为了一种职务上的专业工作。如魏时所设隶属中书省的著作郎，晋时隶属秘书省的官职。从那时起本官称为大著作，协助者初称佐著作郎，后改称著作佐郎。著作佐郎负责搜集材料，由大著作负责起草草稿，尚有不当时由秘书省长官秘书监予以订正。如此，著作作为官职成为了一种专门职务，无论如何，魏晋之间出现了众多的著作家。南朝齐、梁的情况也有着相同的情况，设有修史学士。至唐代，秘书省中有著作局，设著作郎，且分为著作正郎、佐郎，佐郎搜集材料，正郎依据这些材料进行编纂。

然而，从北朝开始，后来一直到唐代之间出现了一种变化，即在各种史书的编纂中，因为编纂是由著作郎负责，又因为著作郎官职低微，致使其著作不受重视，所以在实际的修史工作中，就出现了以大臣领其事的情况，于是产生了作为大臣副职的监修国史。而在唐代又有了变化，太宗贞观年间在秘书省著作局之外又另外于禁中门下省设史馆，开元以后又移至中书省。史馆掌修史，宰相成为监修国史，史官多取在著作以外的其他官员，秘书省的著作局成为了虚设机构。对于宰相兼任监修国史，刘知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认为任何官职都需要有相当于那一职称的知识，

他例举自古各种以高官监修史书编纂，而论述其弊。但是，这仅仅是他的个人意见而已，最终宰相监修国史成为了惯例，修史不再是独立的职掌了。

这其间只有搜集历史材料的官员，至唐代还保持着独立的地位，即记录《起居注》的官员。记《起居注》的官员在古时为左史、右史，所谓记录天子言动者，在天子身边，负责将天子与宰相有关政治的谈话，以及天子的行为以见闻的形式照实记录。负责记《起居注》的官职起自六朝时期，是古史官的遗存，不受天子约束，成为了一种一直延续至唐初的自由记事风气。记《起居注》的官员虽然有时由给事中或谏议大夫兼任，但是给事中、谏议大夫隶属于门下省，乃进谏天子之非的职务，可以说是监督天子缺点的官职。天子出御殿时，由起居郎忠实地记录见闻。然而，唐贞观时期，太宗曾经提出想要看《起居注》的记录。当时的谏议大夫朱子奢说：天子若无过错的话，史臣之述亦无不宜。陛下也无须过目。且若开此天子观看《起居注》之风，会出现凡庸君主为掩饰己非而做手脚的情况，以致史官直笔之风靡坏，所以拒绝了太宗的要求。后来褚遂良作为谏议大夫掌《起居注》时，对太宗有关人君是否可以看《起居注》的问题，回答说：今之起居乃古之左史右史之官。善恶皆书，劝诫人君，防止非法之职。所以人君本人不当观看。太宗说如果那样，朕有不善的话，卿必定记录吗？褚遂良说：守道莫若守官，臣乃载笔之职，凡天子举动必书。刘洎说即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恐怕也会记住的。在如此风气之下，掌《起居注》之官员当时仍是坚守自己职责的。后来唐文宗时，也还是要求看《起居注》，当时郑朗答曰：故事，天子是不看史的。但是此时文宗特别向宰相发命令，以如果自己有过错则可以改正为由，终于看到了《起居注》。其后，如魏謩任此职时文宗又以此为前例要求看《起居注》，他没有允许。文宗说自己曾经看过一次了，他答曰那是前任史官的失职，仍是不许。如此，作为唐一代之法，《起居注》是不许天子看的，但是后来到了宋代就完全不同了，《起居注》的记事编纂之后要呈天子过目，然后再送交史官，最终失去了记录《起居注》本来的意义。这不能不说是在可信史料之形成上的一个重要变化。由于直至唐代都是贵族政治，所以史官也是即便仅

限于一代为官，忠于职守之风仍然强盛；但是毕竟史学却在逐渐衰败，作为世袭、家学的史学已经不复存在，记史转为由宰相监督，作史不再是史官的自由了，《起居注》也失去了意义，正确史料的形成在唐代已经失去了保障，史学成为了权力者摆布的对象。这表明，在中国向君主专制政治转变的同时，历史著作也发生了变化，应该说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变化。

第九章　宋代史学的进展

一、《新唐书》、《旧唐书》—— 史体的变化

从五代至宋初的时期，是历史编纂法上的一个变化期。而且这一变化又明显地反映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同样是写唐代的史书，《旧唐书》的笔法与《新唐书》在主旨上迥然不同，这反映了当时史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对此二书的比较论在当时就已经出现，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成为了史学议论的主题。

《旧唐书》成书于五代的唐晋之间，对于其编纂始末《廿二史劄记》有所详论。撰者虽是刘昫但做实际纂修的是赵莹和其他的一些人。如前所述，此时沿用唐的惯例，由于宰相是监修国史，所以真正撰者的名字是不标出来的。关于《旧唐书》的成书，一直就有各种评论，其中最重要者当数《四库提要》负责撰写正史部的邵晋涵的评论了。《四库提要》中删节很多，当依据邵晋涵《四库全书提要分纂稿》。邵晋涵评论《旧唐书》为"善于相因"，意思是说能够采前人著述的长处。邵晋涵认为，唐初史家辈出，历史编纂法的研究亦得以发展。当时参与修史的有温大雅、令狐德棻、姚思廉、吴兢、徐坚等，都是优秀的史学人才；另外还有刘知幾，对历史编纂法有着深厚的研究。而且以往可称为《唐书》的著作已经有过几部了，如吴兢就著有《唐书》，继其后韦述也著有《唐书》。韦述曾长期任职史官，其书的质量曾为人称道。不用说，这些都只是唐初的史书，唐中叶以后虽然不再见有这类史书，但是仍然有韩愈等所撰《顺宗实录》，蒋系等所撰宪宗一代事迹。照原样使用这些材料是《旧唐书》的优点。而且

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不仅文章，就连论赞也照录了，像《顺宗本纪》的论用了韩愈的，《宪宗本纪》的论则用了蒋系的。总之，唐初至唐中叶的部分由于大体采用了当时史家的著作，所以质量很好；但是长庆以降的部分，由于实录材料的不全而收集了各种材料，所以写作质量不如前面的部分。邵晋涵还举例指出了这种情况，如《文宗本纪》中记载天子好诗，曾据杜甫《曲江行》说昔日曲江池边曾有楼船的内容，宛如以诗话入史书的体例；又如《文宗本纪》中在记载王彦威上书一事的同时，还载了上书的序文；在《武宗本纪》中无名人物的结婚文书也照录，宛如以官署文书入史书的形式；又如《宣宗本纪》照录了某人犯罪的调查审讯文书等，这些内容都不能算是史书的写作体例。又如《列传》中很多仅仅罗列了宦途的履历，而未载形成人物历史的事迹。但是，由于作者能够对史料阙如的部分苦心收集材料，即便笔法笨拙，如果从中细心追寻事实脉络的话，对当时的历史还是可以得到大致了解的。此书中也有比较成功的部分，即列传的组合方式，如将唐初对经学作出贡献的颜师古、孔颖达合为一传，《韩愈传》中载入了受韩愈启发而撰写古文的人物等等，邵氏认为这些都是优点。不过，《旧唐书》毕竟是依据了唐初的那种历史编纂法理论而成书的，而不是唐中叶兴起之古文与史书相关联的新型理论的代表作。当然这种编纂法中也有着极大的缺点，这些在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及《陔馀丛考》中都有着详细的列举。

《新唐书》成书于宋代，出自欧阳修与宋祁二人之手。虽然是由曾公亮作为代表者将此书上呈朝廷的，但实际上此人与编纂完全无关。欧阳修、宋祁都仰慕韩愈，其学问、文章皆有韩愈的风格，所以能够应用韩愈以来古文复兴的意见，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主张，有着与以往史书完全不同的创新。所以在成书时曾公亮的上表中，介绍此书特征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①由于这种对自己笔法的自夸，在当时就已经招致了评论家的恶感。总之，这虽然是《新唐书》的特征，但是对以前的史书进行改写，本属当然之事，像《后汉书》、《南史》、《北史》都是如此。所

① 见中华书局《新唐书》所附《进唐书表》。

以，由此夸耀此书虽属不必，以此讥讽此书也并非妥当。然而，正如邵晋涵指出的，此书确有增不必增之事、省不当省之事的地方，此乃本书之失态之处。此增减不当的缺点在《廿二史劄记》、《陔馀丛考》也有详述。

此外，《新唐书》与《旧唐书》最主要的不同还在于以古文写史这一特点。《旧唐书》由于照用了骈体文全盛时期的史料，所以多使用骈体文；这在《新唐书》几乎全都改写为了古文，诏、令、表、奏等也不仅限于删改，而是全部用古文重写。再就搜集史料来说，《旧唐书》主要是依靠《实录》等官方的材料；《新唐书》则不同，多取小说的材料，当然这种小说并不是虚构的作品，而是那些逸事和论事之类无人负责任的著述。这一点是两《唐书》主要的区别。关于《新唐书》文章简约的例子在《十七史商榷》已经提到，以此与《汉书》比较的话，虽然西汉十三帝不过二百年，《帝纪》却有十二卷，其中一卷又分为上下卷，所以实际为十三卷（百三十二页）；然而，《新唐书》的《本纪》含二十帝、三百年，才十卷（百五十页）。越是后世事情越繁多，本当尽量详记才是，却反而出现了强加省略的倾向。《汉书》采用《史记》内容时对文章论赞多依旧不改的；可是《新唐书》却对《旧唐书》的论赞一句未录，另外对《旧唐书》的《本纪》中多有记载的诏敕也一概删除。三百年间的诏敕当然不可能都与世无关，可《新唐书》却完全不载，未免极端过甚。不仅《本纪》，《传》里也几乎不载诏敕，结果《新唐书》基本就完全没有载入诏敕。因此，就连著名的《德宗奉天诏》亦不见于《新唐书》。另如则天武后夺唐时，骆宾王代举义兵的徐敬业作“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的檄文，武后见此文也很佩服，就连这么有名的文章也未载入。又由于删节过于性急，还出现于文章的蹩脚之处。例如，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中记段秀实镇服军队哗变时，亲自前往曰：“君戴吾头来矣。”《新唐书》误为“吾戴头来矣”，闹出语意不通的笑话。因此《新唐书》中宋祁所写文章竟有“涩体”之称。

正因为如此，在《新唐书》成书的当时编纂者之间已有异议。力图发挥《新唐书》优点的编纂者之一的吕夏卿曾撰著《唐书直笔新例》，其中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新唐书》成书后不久，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此后司马光著《通鉴》时，写唐代部分全用《旧唐书》的材料，几乎未采用《新

唐书》。如此,《新唐书》自问世的当时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顾炎武《日知录》也将两《唐书》进行比较,有不合之处则以《新唐书》为劣。就这样虽然批评家皆反对《新唐书》而称赞《旧唐书》,但实际上史家的编纂法在《新唐书》以后却多摹仿之。所以写作《四库提要》的时候,正值《新唐书》经历了所有的攻击之后,作为一种反动倾向,《提要》反而褒扬了《新唐书》。邵晋涵已经有所称许,纪昀则更有甚者。纪昀还全部改写了邵晋涵所批评的《新唐书》不载诏敕,制度典章不载于《志》,以及取材于小说以求笔法新奇等处。纪昀辩护道:唐代多诏敕,仅宋敏求的《唐大诏令集》就有百三十卷,无法将其全部收入《纪》、《传》。在各种评论之中,无论如何最后出现的《廿二史劄记》、《陔馀丛考》是最为公平的观察。《十七史商榷》中也是,本来就王鸣盛的学风而言,是不会欣赏《新唐书》的,但是他也多少予以了肯定,毕竟由于时代进入了对恶评的反驳时期。

《新唐书》的《纪》、《传》与《旧唐书》相比,最为不同之处在于,不再像《旧唐书》那样仅取《实录》为材料,而是喜欢采用小说,而且这并不是由于编纂《新唐书》时唐代《实录》已经不存。当然,唐末是缺乏《实录》的时期,这在两《唐书》来说同样都是有必要另外依据其他资料的。《新唐书》编纂的时候西京洛阳官署的府库里尚残存有唐至五代的奏牍案簿(《史略》卷二《欧阳修等〈唐书〉》),两书方针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编者的指导思想不同,而不在于所据材料的如何。无论如何,《新唐书》在编纂时搜集的材料更多。由于《新唐书》百五十卷《列传》的作者宋祁偏好韩愈、柳宗元文风,所以《列传》中不但采用了韩柳笔法,即便韩柳文章的内容也有采入的情况。《廿二史劄记》中谈到了这种情况。韩愈文章出于《史记》,《史记》的笔法,巧妙地运用逸事、目睹记使事实活泼起来,以仅次于小说的风格予以表述。这是史家的手法,宋祁对此看来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由于单纯依靠《实录》那种奏牍案簿来记载的人物很死板,所以《新唐书》对此是下了功夫的。对此,虽说以往也有过议论,但是从写史作者的才能来说,毕竟是最适当的做法。像《旧唐书》那样的笔法可说是史家的堕落。但是,《新唐书》与《史记》的不同在于,《史记》即便照用当时材料,因为当时的口语与书面语差别不大,所以不必改写材料也

就自然地采用古文了;但是到了《新唐书》的时代,如果照用口语的话,是不会成为古文的,将会成为唐人的小说或比小说还要低下的通俗文,而宋祁因为好古文,所以都要改写为古文。不过,唐代小说一般很接近古文,普通人很难区别唐代小说与古文的不同。《新唐书》的方法虽受到当时的攻击,但是后世却大都仿效这种方法,最终即便是记《实录》、《起居注》的时候也已经将口语改为书面语或古文,避免照录奏牍案簿,而是用心隐括材料进行写作。至后世由于史实逐渐繁杂,所以在编纂时有必要删节,而且口语虽然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但是史书应该写成《史记》、《汉书》那种体例,毕竟不能写成口语,于是自然地采用了《新唐书》的方法。《新唐书》创造出了史书体例上的新形式,这是其最显著的特点,可以说具有正史编纂上划时代的意义。因而,近来大体上说《新唐书》的体例是受到肯定的。

不过,《新唐书》中既有无法掩盖的缺点,也有应该承认的优点。此书的《纪》、《表》、《志》三者虽说为欧阳修所撰,但也有吕夏卿写的部分。其优点被认为是设有许多《表》。《史记》、《汉书》虽然已有多置《表》、《志》的特点,但是从《三国志》开始史书多缺《表》、《志》,所以说《表》、《志》是欧阳氏复兴的。《宗室世系表》、《宰相表》的设置,省去了为那些事迹不多的人物立传的篇幅,有着文字简明的优点,其中的《宰相世系表》尤为重要。由于当时的宰相多出自名家,所以此表就是写他们的系谱,而且其中多少有着《南史》、《北史》之《列传》那种为人立家传,而力求简洁的旨趣。当然像系谱这类作品,在任何国家都会有伪造,《新唐书》中也难免这种情况。尽管如此,因为由此可以窥见六朝、唐代谱学的遗存,所以即便今日此《表》也是很有价值的。谱学的书在今日多已亡逸,像《元和姓纂》也不过是从各种引文中收集而来的,所以其本来的体例究竟如何已不得而知。宋代的这类书籍多少还有所残存。特别是像《姓解》这样的书,虽然在中国已经亡逸,但在日本尚传有宋版,《古逸丛书》中有覆刻本,此外还残存有《古今姓氏书辩证》一书。但是,由于宋代已是谱学衰败时期,所以对记载姓氏的笔法并不热心,《姓解》不过姓氏字典一类的书籍。所以由《宰相世系表》可窥知唐代谱学的真实形态,并

由此了解古代、唐代、宋代各代在对待姓氏态度的差异。本来在中国,古时候是以根据宗法制定系谱为主体的,并没有几十代那么长的系谱;至唐代修长谱的风气盛行;至宋代欧阳修、苏洵所制族谱又回到了古代短谱的做法;而至近代再次兴起崇尚修长谱之风。若无《宰相世系表》的话,那个时期谱学的体例也许就不得其详了,可见这是谱学上的一个珍贵资料。

此外,就《志》类来看也被认为是《新唐书》更胜一筹,《食货志》就胜于《旧唐书》,还增加了《旧唐书》所没有的《兵志》。当然,也有非难《兵志》多发无根据之感慨的观点。但是,《志》类中值得注意的是,与《旧唐书·经籍志》所不同的《新唐书·艺文志》的编纂法。两《志》不仅在编纂体例上不同,而且《新志》在丧失了设《志》的意义这一点上来,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邵晋涵认为《艺文志》多少注明了撰著人出处这一点是优于《经籍志》的,但是对其丧失了《志》的编纂精神这一点却很少有人谴责。正史中记载艺文始于《汉书》,《汉书·艺文志》依据的是刘向父子的《别录》、《七略》,所以本来是秘府的书籍目录,还有一些是本来秘府没有,后经刘向等人重新校订而收藏的书籍之目录。因此,《艺文志》所载大体为汉朝秘府所藏书籍。此外,班固做《艺文志》时又增减了一些书籍,其中所出、所入都有记录和判别,皆为亲眼所见书籍。后来《隋书·经籍志》也是收载了隋朝秘府所藏书籍。在唐取代隋时,将这些书籍运往长安途中由于船只沉没,多有丧失或因水浸泡而残缺者,其残存者都有记录。然而据载,价值不大者被简省了,又加上了一些有价值的书。总之,也是当时史家所直接见到的书籍。此后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与《汉志》、《隋志》相比虽说相当粗糙,但毕竟是开元时期政府藏书的目录,在收录现存书这一点上仍然未改历来的做法。当然,开元以后的书籍没有载入《志》中,但是那些被收入了各自作者的《传》中,这就清楚地表明书中仅仅记载了开元的目录。所以,虽说其中不免缺憾,但由于区别明确,所以是对研究有用的史料。然而,《新唐书·艺文志》则由于对这一点未加顾及,以致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新志》虽然增加了《旧志》之后,特别天宝以后的内容,但是《新志》作者自己也说"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这种不负责任地记载那些未亲眼见到的书籍的

书目，不过是一个当时人传闻的书目，算不上是一种藏书目录。从这一点来说是对古来《艺文》、《经籍志》体例的破坏。中国评论家几乎对此没有注意。邵晋涵等虽然认为《隋志》撰写经书源流时并无见识，但是从今日立场来看，《隋志》的记述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相同，是能够使人了解当时关于书籍的传世、源流方面的重要材料。《隋志》是很出色的，不仅是一部当时的现存书目，还能够对比梁代阮孝绪《七录》所录列举存佚，从而也使《七录》得以复活。虽然《新唐书・艺文志》中也记录了书籍存佚，但在其中记为“卷亡”书籍中，有些却存于《崇文总目》。总之，《新唐书》写作的当时正处革新的时代，虽然一切立足于复兴，但是由于这种精神又不够彻底，所以也往往出现错误。

《旧唐书》成书于五代的石晋时期，《新唐书》成书于宋仁宗庆历至于嘉祐的十七年间，二书相距有百年之遥。这期间可以说是史书编纂上，从古代进入近代[①]的分界。此间形成的作品或是古代体例，或是近代体例，但是从那以后《旧唐书》的风格则基本上消失了。

二、《新五代史》、《旧五代史》

欧阳修所著书中另外还有《五代史记》，这是与《旧五代史》相对应的著作。《旧五代史》是宋太祖开宝年中由薛居正监修，历时一年有余而成书的。大体照录了五代的《实录》，是详于史实记载的史书。此书虽长久失传，但在乾隆年间将《永乐大典》和其他书中的佚文辑出，作了重新编纂。《旧五代史》在宋代是作为官书的，与之相对产生的欧阳修所作《五代史记》，在后世称为《新五代史》。由于此书最初是私人撰述，所以在欧阳修生前并未问世，在他死后天子得知了这部遗著，将其出版并列入了官书。由于是作为私人撰述的自由写作，所以是一部能够巧妙地将《史记》文章与《春秋》笔法相结合，使用古文写成的著作。此书在当时已经受到

① 这里所说的“近代”，亦称“近世”，是内藤湖南历史分期方法的重要概念，大致指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时期。详见小林义广《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论与人物论》（三秦出版社《内藤湖南的世界》，2005 年）。

非难,非难《新唐书》的吴缜著有《五代史记纂误》,王安石也上奏言此书不合义理(《史略》卷二《欧阳修〈五代史〉》)。但是,此书实非《旧五代史》可比。王鸣盛也认为不看《旧五代史》的话,就看不到《新五代史》的长处,无论如何《新五代史》被认为是很出色的。王鸣盛对《新五代史》也有批评,认为将五代作为一个阶段撰著,采取与《南史》、《北史》同样的体例是不妥的。但是,他又认为断代史是作为后世史书不可变更的体例,并从这一观点出发非难了《新五代史》。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将五代史事作为一个阶段撰述也未尝不可。《新五代史》仿效《春秋》,字里行间皆有寓意。例如,关于战争分别使用了"攻"、"伐"、"讨"、"征"等字眼,认为"攻"为双方相互攻击;"伐"为以大加害于小;"讨"为惩罚罪恶;"征"为天子亲往。这种写作风格不见于《史记》,乃《春秋》笔法。对于《春秋》欧阳修继承了唐代啖助、赵匡等学派的观点,不信"三传"而努力模仿《春秋》本文。所以,《新五代史》的分量不及《旧五代史》的一半,记载极为简明。另外,《赞》中均有用意,寓以感慨,并且与自己所处时代相应地做出了适合时世的写作。另外,作者对于历史重要事件的因果关系也是有着深刻考虑的。《赞》的开头使用了"呜呼",而不是"赞曰"。《新五代史》的一个特色在于与《新唐书》同样,多采小说逸事。方苞所大加赞扬的,如将那些曾供职于各朝的人物归入"杂传"中《冯道传》的笔法,认为这是一个名篇。如此笔法都反映了欧阳公的用意。不仅限于《表》、《志》,对于《传》他也运用了各种构造。例如类似《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那种创新形式,在《新五代史》他又建立了《义儿传》、《伶官传》,这些都是就那个时代特点而设置的,以此反映时代的特色。只是《新五代史》的《志》、《表》之类太简单,仅有天文、地理(《司天考》、《职方考》),被批评为过于简单。抨击的意见如:即便认为五代制度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值得撰著的价值,但毕竟是从唐制度崩溃向宋制的转变时期,有其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却没有记载。在钱大昕对此书的评论中,认为凭周世宗的才略,本应当统一海内的。对于他为何早死家绝的缘故,洪迈《容斋随笔》中认为是杀人太多所致,并举出了《旧五代史》所见事实,可是《新五代史》对此却省略了。又说关于朱全忠以盗贼出身而最终有国的理由,洪迈认为在

于他减轻了赋税,《新五代史》却未载此事。所以洪氏的史眼优于欧氏。我认为单凭这两条进行批评,未免言重。就连钱氏这样公平的人,也如此嫌忌欧阳氏擅自改写史书的方法,采用《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史书编纂主旨,偏好照录材料方法,因此他才做出了如此的酷评,这是很难让人接受。

另外,对于《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前的史书即便有作注的,那也是成书之后后人为进行解释而作的。然而,从此二书开始,作注的趣旨有了变化。《新唐书》的音注虽还只限于文字的解释,附属《新唐书》而出现的《唐书直笔新例》却是对《新唐书》笔法义理的自我吹嘘。徐无党对《新五代史》的注,据说是由欧阳修口授撰述的,仍是为辨明自己笔法而撰著的。由此出现了由史书作者或其朋友撰写自吹自擂书评的现象。

三、《册府元龟》与《资治通鉴》——帝王学的变化

《旧唐书》、《新唐书》之间是史书编纂法上出现大变迁的时代。此间,在属于《旧唐书》的一派中,虽然没有出现其他特别伟大的著述,但是还是有着出现于这个时代,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对前后时代进行划分的代表著作,即作为前代代表作的《册府元龟》和作为后代代表作的《资治通鉴》。当然,由于二书的体例不同而不能比较,但是从其著述目的都是供帝王参考这一点来说,又有一致性。二者不但在体例上不同,作为史书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宋初太宗、真宗时期出现了各种大型类书。太宗时期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都是出于同样意义的创作。《太平御览》是真正的类书,是六朝以来至唐代类书的集大成者,《太平广记》是野史、稗史的集大成者,《文苑英华》是诗文的集大成者。当然,这些都是为提供帝王参考而作的。《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各有一千卷,《太平广记》也有五百卷,都是大部头书籍。在如此大型编纂物之后,至真宗时期又编成了《册府元龟》。此书是历史事实的集大成之作,是以类书体例列项,将史实予以类聚的。总之,将史书作为帝王必要的参考书进行编纂,使得

汉以来流行之类聚方法在此得以集其大成了。除以上类书之外，在当时还有各种各样诸如医书集大成、经书之疏集大成、关于历史、古文的，关于道教、佛教书籍的汇集等，形成了一种综合所有事物的态势。而在方法来看，这又是汉以来为了实际应用的便利，而兴起之类聚方法所获得的广泛应用。然而，此后经过仁宗一代之后出现的《资治通鉴》，虽说同样出于为帝王提供参考而作，但是体例却一变为了编年史。这也是由于当时学风变化而出现的情况，逆反于前代学问那种注重多闻多识的学风，新派学问，追求《春秋》之法那样确实具有的规范、鉴戒之类的东西，出现了追求贯通古今沿革的思想。前代流行的是辞学即将诏敕、奏议等朝廷应用文章也都进行为仪式的、艺术的修饰的学问，而新时期则出现了那种较外形更加重视内涵鉴戒意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天子的生活已经从中世贵族的生活转变为了新型的独裁君主生活，因而出现君主应当具备特别修养的需要。

四、《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问世也像《新唐书》、《新五代史》的问世同样，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新唐书》、《新五代史》是正史上的变化。大体而言，唐初的《晋书》、《隋书》由于应用了分纂法，以致史书失去了一家著述的意义，又变为了像《南史》、《北史》那样的著述。然而，至《新唐书》、《新五代史》进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化的结果，又复旧为了一家的著述了，《新唐书》虽为二人合著，但在各自分担的范围内都是根据一家之见的著述，所以从部分来看仍是一家著述，至《新五代史》就分明是一家著述了。这些作者撰写史书，不仅在文字上模仿《史记》、《汉书》，在成一家之言方面也复兴了旧风。《新唐书》、《新五代史》的笔法也应用于《通鉴》。当然，作为《通鉴》本来的目的只是希望作为帝王的学问，并无形成史家之一家著述的企图。只是由于当时的时代风气，以及作者司马光其人，反映于著作上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帝王所需要的备忘录，而是成为了一部具有自己史家见解的优秀著作。此书不仅在体例上复兴了编年史，在

帝王学的编修上它还具有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同样的意义，亦即作为传承《春秋》之意，具有一家之见著述这一点上，有着重大意义。多数史家都看重《通鉴》对于复兴编年史的重要意义，其实宋代人却相反地更注意其他的方面。高似孙的《史略》中在与《册府元龟》进行比较后，认为此书明确表现了帝王学的变化；王应麟《玉海》也注意到此书作为帝王学的成书意义。

《资治通鉴》乃英宗治平年间司马光受命编修的，为此他还获准随意任用适合人选作为部下，直至下一代皇帝神宗时期终于完成。当然，虽说此书复兴了编年史，但并不是说编年体例史书至此已经断绝很久了，这从《玉海》所罗列的古代以来逐渐出现的编年体书籍中是可以看出的，不过《通鉴》主要是作为通史的复兴之作，不是用纪传体而是用编年体写作的。以前梁武帝虽作有《通史》，但那是纪传体，后来至南宋还成为了形成郑樵《通志》的因素。《通鉴》则不同，是编年体史书。《通鉴》的书名最初曾考虑为《通志》，完成之后由天子赐名《资治通鉴》，这一书名尤其能够表现帝王学的意思。总之，这是受到当时《春秋》学的影响，试图恢复比纪传体更古史体的产物。本来在隋唐以来，从称编年体为“古史”的情况来看，有可能当时认为这是比纪传体更古的体例，所以希望予以复兴。然而，像《春秋》经文那样寓意于一字一句的笔法，对后世人来说已经很难做到，而且也不适于后世的情况。所以说《通鉴》并非效法了《春秋》经文，而是效法了《左传》体例。对此，与《史记》同样，由于很难像圣人那样以一字论褒贬，所以只是尽力直书史实，自然地加以褒贬。这与欧阳修《五代史记》那种不取《春秋》之传，而仿效《春秋》之经的做法多少有些不同，若论对当时情况的适当与否，则司马光的笔法更为可取。

《通鉴》所载内容起于周威烈王立晋之三卿为诸侯，没有直接承继《左传》，其中有其寓意的，即用意于托始。内容记载了此后直至五代末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史事。此书的编纂费时十九年，撰著者除司马光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得力助手，都是适当的人选，即古代至东汉部分的作者刘攽（贡父）、三国南北朝时代的作者刘恕（道原）、唐五代的作者范祖禹（纯甫）等人。刘贡父曾以“欧九不读书”嘲笑欧阳修，他是相当博学多

识的人，其他二人也是优秀的学者，作为此书编修的副产品还留有其他名著。《通鉴》于编纂法亦颇为绵密，开始先作丛目，次其作长编，然后再对长编依次作简约。长编就像今日的《大日本史料》的方法，对从《实录》到野史、小说等有关某一时代的所有史料，进行收集并排列而做成的。当时的这一情况，可见于《文献通考·经籍考》及高似孙的《史略》。《史略》还列举了作为《通鉴》参考书的《通鉴》引用书目。由此可知，其所参考的资料于正史及其他书籍之外，还有墓志、碑文、行状、别传、谱录等。并且在处理这些材料上很下了功夫，例如据说将唐代的长编六百卷，简约为八十卷。又如《通鉴》的纪事部分就有二百九十四卷，那么其长编将是如何庞大的材料也是可以想像的。司马光在致宋次道的书信中说，在此书着手后的八年间，终于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的部分，唐代部分还要费很大功夫，从他说草稿每四丈一卷，共有六七百卷的话来看，可见数量庞大。还说工作量是每三天一卷，如果遇有事故休息一天的话，事后要补上那一天的工作。即便如此，唐代部分也要花费三、四年时间，而且看来唐代最终得有数十卷。《通鉴》于正史之外的参考书就有二百二十二种之多，这些书不仅有战争、政治等内容，还注意到了天文、律历、地理等方面。如此大工程，由于编纂者都是著名学者，所以司马光几乎没有把《新唐书》、《新五代史》放在眼里，并未采取此二书材料，而是独立编纂的。而且，与《新唐书》做法不同，作为史家《通鉴》作者胜人一筹之处在于，没有像《新唐书》那样过分追求简洁，例如《唐纪》就有《汉纪》的八九倍，比《周纪》的分量自然更大。可见，作者并非把单纯地简省文字作为史家之能事。关于此书的编纂，曾有过各种传闻，比如，关于其编纂严谨的故事说：《通鉴》留下的草稿就有两库房，黄山谷曾见过其中的数百卷，草稿中没有一字书写潦草。总之，正如《四库提要》所明言的那样，《通鉴》是古来罕见之优秀著作。

在《通鉴》本书二百九十四卷之外还有副产品。即《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释例》一卷；此外，还有司马光稍后所作《稽古录》。其中，《通鉴考异》是对材料取舍理由所作的说明。无论如何，像《通鉴》这样的大著述，在编纂中会遇到种种的材料，即便正史中也

有不真实的内容,《考异》明示了其选择材料的标准。此书虽说出于当时的时代风气,不免有些对自己著述自夸的倾向,但也并非单纯的自夸,而的确明示了自身的方法,由于将其写入本文会造成混乱,所以才另立为三十卷。因此,这不能说是空论的吹嘘,而是对史家应如何取舍选择史实的阐释,乃十分灵活有效的方法,惜后世无人仿效。再看《通鉴目录》,大体可说是年表,其中收录了全书的大纲。这成为了后来朱子《通鉴纲目》的基础。《四库提要》中曾认为《通鉴》是纪志传之总会,《通鉴目录》更是《通鉴》之总会,也就是说其具有年表与索引兼顾的便利。《释例》是介绍编修体例的。《稽古录》是稍后才成书的。《通鉴》成于元丰年间,《稽古录》成于元祐年间,《稽古录》简洁地记载了上古至宋代治平年间的史事。此外,据说还作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今不存。

至于《通鉴》的优点,即便不考虑前人评价,也是可以看出很多的。首先,且不论其优劣,仅就其选择材料的见识而言就是应当重视的。特别是对那些战国纪年的不明之处,就连《史记》亦感困惑,《通鉴》却没有满足于《史记》的年表,有些地方根据《竹书纪年》提出与《史记》不同的结论。对于此后的时代也是,像前汉时代以《汉书》最完备,此外再无更好材料,所以没有胜过《汉书》之处。但是后汉以后的材料由于有多种多样,所以在取舍上颇费苦心。对于六朝南北朝时期,由于《通鉴》在取材上胜于正史,所以《通鉴》中保存了正确的材料,这是由于能够认真分析并采用《十六国春秋》原本的材料所致。今本《十六国春秋》是一度亡佚之后由明人再修的,所以质量不佳;今日的《竹书纪年》是伪书,但在当时二书都存有真本。因此,在《晋书》的载记中没有的内容,《通鉴》中有所记载,而且很明显记载有今本《十六国春秋》中没有的事情。关于唐五代时期,作者未把《新唐书》、《新五代史》放在眼中,由于采用了很多《旧唐书》以及其他的唐代史料,所载事实与《旧唐书》、《册府元龟》是一致的。总之,与欧阳修那种试图依据义法修史的著作不同,这是重视对历史事实作出忠实记载的著作。因而,今天特别是研究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的历史,仅仅依靠正史是不够的,此外还必须参考《通鉴》。

《通鉴》在成书的当时就受到了好评,甚至被认为只要有此书,正史

就不必要了，我认为此书的确是具有这样价值的。总之，其特色不仅在于复活了编年史体例，虽说此书出于编制古今通史的目的而采取了编年体，但是既有其照应记事始末，而充分具备了贯通历史的体例的特点；又有比编纂讲究义法更为注重史实的特点，而这一点又是与宋祁、欧阳修所不同的。而且这一点后来成为了后世史家的范例。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与欧阳修等的主张即当时史学风尚相似之处。《史略》中也说，《册府元龟》虽是内容杂然的类聚书籍，但是取材严谨，主要用《正史》、《实录》，而根本不采野史、小说；与此特色相反，《通鉴》却巧妙地利用了野史、小说，特别是较近时期的唐代野史、小说很多，所以多加采用。总之，这与《新唐书》、《新五代史》是同一倾向。有一种观点认为史书是不可等同于案牍、文书之罗列，它可以是以象征主义为主的，在《通鉴》、《新唐书》中更是颇有这样的倾向。当然，《通鉴》中在这一点上有时也会有败笔。例如，汉成帝诏赵飞燕姊妹入宫，倍加宠爱时，宫中披书博士淖方成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此事载入了《通鉴》。然而，此事所取材之《飞燕外传》却是六朝时代的小说。小说内容若是正确的也可以，"灭火必矣"之言乃以汉为火德的思想，成帝时尚流行水德说，还没有这种思想。可见此小说乃假作，取之入史书可谓败笔。但是，无论如何在实录、案牍一类表面材料之外，由野史、小说材料表现当代的内面生活，这在《通鉴》、《新唐书》都是一致的。

《通鉴》的注释书

如前所述，《通鉴》从成书之初就受到好评，甚至有着自《通鉴》出，其他正史可废的美誉。正由于这是一部被广泛使用的著作，所以出现过各种注释及其副产品。注释中出现最早的是史炤的《通鉴释文》，成书于《通鉴》之后不到百年之间。作者是司马光殁后出生的人物。据说本来的释文是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做的，但史炤的《释文》却不是沿袭之作，这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著作，有三十卷。此书虽很快亡佚，但至清朝又得以重现于世。编修《四库全书》时，此书尚未复出，但王鸣盛持有其写本。那以后还出现了此书的宋板，今日已出了复刻本。对于《释文》中存在的错

误,后来著名的《通鉴》注的作者胡三省写了《释文辨误》。由于当时《释文》亡佚未出,只有《辨误》流传于世,所以《通鉴》注以胡三省最为权威。但是,王鸣盛见到《释文》,分析了《释文》与《辨误》的关系,发现胡三省仅仅举出《释文》的弱点,而悄悄地将其中优秀的部分用在了自己的注中(《十七史商榷》卷一百)。然而,大体上说《释文》是以往《音义》一类的著述,主要是作训诂,虽然偶尔也涉及史实,但那毕竟不是主要的内容。由于这种体例,虽说没有胡三省注那么作用于后世,但确是胡三省之前的一部力作,并且成为了后来胡三省注的基础。此书的序文由冯时行撰写于南宋初年,序云:若有疑于文字则求于本史,本史无可据者则涉猎六经诸子的《释音》、《说文》、《尔雅》,及古今小学家的训诂、地理、姓氏方面的书籍、逸事小说,费十年而成书。

那以后胡三省的注问世。胡三省是宋末元初人,中年开始努力为《通鉴》作注,为此几乎花费了一生的时间。这部好不容易写成的书曾一度在动乱中佚失,后来又重写而成。此书最初打算用《经典释文》那种体例,著九十七卷,将注文与本文分别成书。后来重写的时候放弃了最初的方法,将注释分散加入了本文。此注在历代史书的注中是最著名的,虽说吸取了史氏的《释文》,但那只是一部分内容,就整体而言这是很优秀的注释。胡三省的经历虽说不甚清楚,但出于这部著作,也是一个值得留名后世的人物。此注中最优秀的部分当属对地理的考证,当然不仅仅限于地理,还有着对制度、天文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就连以撰述《四书释地》而知名的清初阎若璩,也专门对胡三省的著述大加推荐。总之,一般认为若要读《通鉴》,就不可能不读胡三省的注。胡三省的历史地理研究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日本学者亦颇具影响。日本人对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视,就是从研究《通鉴》开始的。大体上说日本人对中国书籍,尤其是史书,仅局限于了解事实,而未曾作为史学进行研究。像赖山阳、古贺侗庵等人甚至说中国书中最乏味的是有关地理的部分。不过,伊势的土井聱牙已经开始重视历史地理了。此人在伊势的津藩出版《通鉴》时,做了校订,那时他由胡三省的注而产生了重视历史地理的思想。

另外，与胡三省同时还有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虽说是《通鉴》地理，但又是一部完整的古今沿革地理的书籍。王应麟还有《通鉴答问》，是针对事实进行答问的书。

朱子的《通鉴》评论

朱子也很重视《通鉴》，而他认为司马温公是不好权谋的人，对史书中有关权谋的内容大都削去了。虽然有可能因为这是让天子看的书才如此的，但朱子反对这种作法，认为事实是应该作为事实作记载的，只要在论说中作出不可如此的论述即可。朱子还认为司马温公有对自己所嫌恶内容就舍弃的做法。例如《史记》中记载：在汉惠帝为高祖太子时，高祖曾一度有意更换太子，太子依张良之计避免了危机。但温公不信此事，认为高祖太子地位的安全，乃由于叔孙通对高祖的进谏。若张良设计的话，则是教子胁父，张良做事不可能如此。因此，不采《史记》。但是，朱子认为张良是能够做出此事的人，所以此事当真。又如吴楚七国之乱时，在周亚父征伐之际，曾找到当时侠客剧孟，还说这就如同取得了一个敌国。对此温公也不信，认为侠客断无如此重大作用之理。朱子说此皆温公以好恶取舍之例。的确，司马光有着因人物而选择材料的倾向，但是这在作为自己著作写史时任何人都会有的情况，材料取舍也只有听凭各自见解了。朱子还举出当时胡寅（致堂）《读史管见》的观点，有人诽谤《通鉴》之所以编修时间过长，原因在于温公将编修补贴挪作私用所至；又由于温公仓促结束了编修，以致唐至五代的内容颇为繁杂。这是朱子的评论，皆见于《语类》。大体上说，即便在朱子时期《通鉴》之所以仍然很受重视，是因为其具有高质量的编修和善于发挥真价的特点。

五、《通鉴》的影响

《通鉴》的成书曾给予当时史学界以极大的影响。由于《通鉴》是史学上的复古主义改革，此体例即通览古今沿革的风气，对史学有着极大的影响。

作为《通鉴》的副产品,除了《目录》、《考异》、《稽古录》等之外,还有其他编修者的一些著作。像刘恕的《通鉴外纪》就是其中一部,从这书的序言中可知,此人在参与《通鉴》的编修中,曾认为有必要在《通鉴》成书以后,撰写《通鉴》以前从太古至周威烈王的《前纪》,和《通鉴》以后即宋太祖至英宗四宗的《后纪》,并且着手开始写作。但是,由于他在编修《通鉴》时患上中风,加之任职边远的地方官等原因,虽勉强向孩子口授而成《前纪》,但还是放弃了《后纪》,于是将《前纪》定名为《通鉴外纪》。他在《通鉴》未成书之前,四十七岁就死了。此书取材丰富,而且不限于经书,也兼采诸子百家,其中有些荒唐无稽的内容,后来都被撰著《通鉴前编》的金履祥(仁山)删除了。但是,这是因为此书大体上还只是像《长编》那样停留在汇集长编史料、有待整理的草稿阶段,尚未充分加以取舍所致。此书在收集材料上是很下功夫的,参考了大量今日已不存而宋代尚存的书籍,那些都是珍贵的史料。这是一部将《长编》的编纂方法应用于上古的著作。由于此书的问世,后来出现的罗泌的《路史》则更是大量采用了荒唐无稽的纬书。但是,无论如何就古代史研究而言,此书对当时的影响是肯定的。此后,上述金履祥撰著《通鉴前编》,大体就是根据了《外纪》的思想。金履祥是有些见识的人物,是朱子门下王柏(鲁斋)的门人,而对经书凡是有疑问之处都能比王柏更加不客气地写出来。《通鉴前编》也是这样,是出自《通鉴外纪》与朱子学派常识论的著作;不过,在今日作为古代史的史料毋宁说《外纪》更有价值。

另外,还有范祖禹的《唐鉴》。他是负责编纂《通鉴》唐、五代部分的作者,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在此书中极为简单地记述了唐一代的历史。此书在当时已经很有名了,受到广泛的好评。由于写作目的在于以唐事作为历史之鉴,所以他并未单纯地论及事实,而是写出了对当时时世的思考。在他的论中曰:政治在于人为,而不在于法度。[1] 另外,此书还成为了后来正统论的根据,朱子的《通鉴纲目》就是受此书潜在影响而编撰,即《唐鉴》依照《春秋》笔法,不承认则天武后为天子,而将其作为唐中宗

---

① 这种思想来源于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

时代的连续。《春秋》中,鲁昭公被三桓追放而逃奔乾侯,没有执行实际的政务,尚在每年年初记录为"公在乾侯"。《唐鉴》仿效于此,在记载中宗的时候曰:"帝在房州。"《纲目》也仿效了此笔法。这种认识亦影响到日本史学,水户的栗山潜峯的《保建大记》[①]即颇受此风影响的作品。顺便说一下,在论及唐代的著作中还有早于《通鉴》成书的孙甫的《唐史论断》,朱子等认为此书在议论上优于《唐鉴》。此书是在《旧唐书》的刺激下成书的,书中认为《旧唐书》的写作不合史法。

《通鉴》的成书促进了史论的兴盛。史论中较苛酷的是胡寅的《读史管见》。他是个任何事都要从道德上予以论述的人,这一缺点受到了人们的非难。这是因为当时史论受到来自《春秋》影响的缘故。此人的父亲是胡安国,他排斥《春秋》的"三传",亲自根据《经》撰写了《春秋胡氏传》,朱子派学者取此《胡氏传》而不用"三传"。这种观点亦波及到《读史管见》,这是根据《通鉴》所载事实而论史的著作。与此有着同一方针,但多少变得稳健了的著作是朱子的《通鉴纲目》。《通鉴》作为编年史这一点,是对《左传》的复古,它是对《左传》的模仿,而不是对《春秋》本文的模仿,就其所记载的事情来说,主要是于直笔之中自然地显露褒贬,而没有进行笔削。《纲目》则企图写成《春秋》本文那样的著作,不过此书并非全部成于朱子之手,据说他大体上给出凡例之后,由门人赵师渊写毕的,是根据朱子遗言完成的。此书从凡例开始,笔法就很严谨,例如凡例有"凡纂贼之臣书死,范增、王舜、扬雄之类"一句,本文在写扬雄之死时记为"莽大夫扬雄死",以示笔削。这些对后世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既有模仿此例的,也有持反对论的。日本的水户史论正是在《纲目》的影响下形成的。后来,对于《纲目》,有论其笔法的,也有论其发明的论著,论笔法的是刘友益,论发明的是尹起莘;前者有褒贬之意,后者乃笔诛之意。《通鉴纲目》可谓复古主义发展至此时期的顶点。

受《通鉴》影响而出现的种种体例的史书之中,还有南宋李焘的《续

---

① 栗山潜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儒者。名愿,水户藩的儒官。山城淀人。精通日本史,著有《保建大记》,1卷,1700年成书。此书从感慨皇室衰退的立场,记述了从保元之乱(1156)至建久3年(1192)源赖朝幕府开设的政治变动。

资治通鉴长编》。此书是分为若干部分编辑而成的,记载了宋太祖至钦宗之间九朝之事。徽宗、钦宗二朝的部分已经亡佚,现在尚存者是将原本和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内容合成的,包括起自宋初的七朝的部分,五百二十卷。此书不用说正如书名所示是一部《长编》,仅仅罗列材料而并不进行概括性叙述,这是它的一个特色。写这一百六十八年间的事情竟用了四十年,由于所汇集的材料从实录、正史、官府文书直至野史,很便于比较材料作出选择。当然,由于没有对材料进行判断致使真伪混淆,所以不能说全都是正确的。但是,无论如何欲知北宋之事,没有比这更好的材料了。尤其是在历代正史中,《宋史》被认为是编纂较差的,所以说若研究宋史,此《长编》是绝对必要的史料。此书并非是受《通鉴》本文影响而形成的,但其收集材料的方法却是模仿了《通鉴》。作为李焘著作之续的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体例亦如李焘的《长编》。此书被认为也是了解南宋初期之事的最有益者,以《实录》及其他日历(朝廷日记)为主,参考了野史、文书、家传等而成书的。与此并列而值得注意的是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此书虽被列入了纪事本末部,但也是汇集了种种材料的书籍,很便于针对某事的专题研究。此书汇集了宋徽宗、钦宗、高宗三代间与金的和、战事例。以上这些书因为都没有夹杂作者个人的观点,所以作为史料的使用来说要比正史要方便得多。这些书都是仿效司马光所制《长编》而作,其中也有像《系年要录》那样被认为不亚于李焘之著的作品。

还有一部在《通鉴》影响下形成的书籍,即对后世史书体例给予颇大影响的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形成的原由,在有名的杨万里(诚斋)为此书所撰序文中有所述:“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云云。当然,著者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即此书将《通鉴》所载内容按照事目划分,将《通鉴》全文仅仅概括为四十二卷。《四库提要》及《简明目录》中皆注意到此书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认为古来史体唯编年、纪传二体,其中纪传体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正史体例,

而宋时的《通鉴》又复活了编年体，在此基础之上出现的此书，创造了对事实本末可以一目了然的新体例，成为了史书上不可或缺一种体例。当然，这是为了使《通鉴》的事实容易阅读的著作，为了使事实便于阅读的书籍在以前还有类书体，《册府元龟》则是其中理想的作品。然而，那种单纯以为保存公文的往事记忆为主的类书体虽然一度受到推崇，但是在北宋中叶以后著史者的认识却发生了一个变化：即认为历史事实不仅仅是往事的经历，而是可以了解历史全体之治乱兴亡因果关系的事情。因此，对历史事实有必要从历史上一贯连续的因果关系上予以记述。于是，《通鉴》将断代史书改变为贯通古今的通史体史书，进而又出现了将索引式的类书改变为按照事件类别导出因果关系的纪事本末体。所以这种体例在后世一直作为方便恰当的形式而被采用，就史书而言这是一种认识上进步。《四库简明目录》中认为这一体例出自于《尚书》，与《尚书》每每以事情作篇名而记述其始末的方法相同。特别对此予以议论的是章学诚。他比《简明目录》作出了更加深入于著者内心的认识，曰：袁氏初无复活《尚书》体例之意，且学术见识亦未足与此，其书若依古代史体而言乃属杂史、纂录体。然其书便观览耳。其文省于纪传，记事明于编年。袁枢本无此意，然无意中却使《尚书》精神重现。作者虽无此意，读者不妨予以出色的理解。总之，正如庄子所谓"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篇》）。① 即便在今日来看这也是最为进步的、适当的著史方法，不受人物传记、年历的束缚，是以人的社会所发生事件为中心的撰述。章学诚的评论是很恰当的。这是在《通鉴》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具有出人意料之先进水平的史书。

在这一时代，吕祖谦（东莱）的《大事记》是由《通鉴》体出发，论述一种理想的著作，今日理解其书意图是非常困难的。《通鉴》虽起于周威烈王，《大事记》却出于继《春秋》之后的考虑，起笔于《春秋》结尾的"获

---

① 《文史通义·书教篇》："在袁氏初无此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麟”,本来打算写到五代为止,但因患病的原因,实际上仅仅写至汉武帝。《四库提要》认为,此书是根据司马迁年表而撰写的,所以是祖述司马迁著作的。吕东莱的学风与朱子很不同,朱子对他曾有过多次抨击。当时,反对朱子的学者有吕东莱和陆九渊,朱子说前者过于粗杂,而后者过于绵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朱子也很佩服《大事记》。此书由《大事记》十二卷、《大事记通释》三卷、《大事记解题》十二卷组成。《大事记》相当于《春秋》的《经》,《解题》相当于《传》,《通释》则汇集了本文以外可供参考的资料。朱子也说:《解题》在题目的制作上甚下工夫,每一句都包括了一段意思。当然,以此书与根据朱子旨意而成书的《通鉴纲目》进行比较的话,更是别有一番味道。《纲目》一味加以褒贬,甚为浅薄;《大事记》中表达东莱之意之处虽较难理解,但又都是有所寓意的。此书虽多少有些像《春秋传》那样的记事,但在此外还载有地理考证、事件始末,并能写出对那些隐微原因的判断;不仅记载一时的事实,还能写出了与此相关的古代往事。另外,在材料的选择上也不仅限于《史记》,而是巧妙地利用了其他古今书籍。即便是新书,如果其中含有正确判断的话,也作为材料采用。可以说这是一部指导思想相当进步的著作。《通释》是与本文分离开的,汇集了反映古今沿革微妙原因的事例和史料。但是由于写作方法混杂而难于读懂,其中似乎有着作者的某些考虑。总之,作为一部以宋代常识为主的产物,这是很有意义的著作。

以上大体是一些直接受《通鉴》影响而成书的著作,另外还有可以说是受到《通鉴》及其副产物间接影响的作品。它们是北宋至南宋古史研究兴盛时代的作品。其中位居第一的是苏辙的《古史》。由于作者是与司马光同时代的人物,所以无法判断其是否受到《通鉴》的影响,但是根据他的年谱:他是在徽宗绍圣二年撰写序文的,因此可知此书成书较晚。另外一部书中记述他在许州时撰成此书,这已经是相当晚年的事了。他的序文中说:鉴于司马迁《史记》多有不妥而与圣人所述未合之处,而撰此书。此书为纪传体,起于三皇而止于秦始皇。认为司马迁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自称此书为竭尽劳苦之作。但是《四库提要》中说:《史记》如诗之李、杜,书之钟、王,画之顾、陆,细微之处即便有缺点,亦无须一一

指摘，应当予以整体看待，非苏辙等所改之作。① 我认为《四库提要》的意见是妥当的。苏辙是个常识家，对不合于常识之事则予以省略；又因崇尚《老子》，认为帝王之道在于《老子》，因此遭到了后世史家非难。实际上此书在今天看来，几乎就是无用之作，与《通鉴外纪》等相比没有什么价值。此外，罗泌的《路史》是很有特色的。此书的做法与《古史》正相反，汇集新奇资料，多引纬书撰述三皇以前之事。在其序文中说：以往虽有皇甫谧《帝王世纪》、谯周《古史考》、张愔《系谱》、马总《通历》、诸葛耽《帝录》、姚恭年《历帝纪》、小司马《补史记》、刘恕《通鉴外纪》等，但是这些都是学术狭浅不足取信者，在此之上比这些书更多地汇集材料的苏辙《古史》也只不过是实践《史记索隐》主张的著作而已。本书意在收集材料这一点的确是事实。《路史》之"路"乃"大"之意。此书的特色在于注释，注中多引纬书和后世的道教书籍，所有新奇之事都写进了书中。注释虽称为他儿子所作，但很可能是他本人做的注。此书中可称为史论的有《发挥》六卷、《余论》十卷，都是常识性的公平之论。但是，这也是来自程朱理学观点的判断。《四库提要》中说：引用纬书也是不得已的，其广泛引用纬书是很新奇的，这也使得本书的文章显得华丽。《文心雕龙》批评纬书时，就认为纬书无益于经典，却有助于文章。《路史》也正是这样的一部书籍。此书的史论是比较公平有益的。这完全是与《古史》相反的著作。总之，这应该可以作为宋代乃所有史体都得以大发展的时期的一个证明。另外，还有胡宏的《皇王大记》，是撰写古代内容的。其特色在于书的纪年使用的是邵雍（康节）《皇极经世书》的纪年。中国古代的纪年来自一种开辟说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撰述的最后一部著作是《经世书》，《皇王大记》正是利用了此书。其意在撰写古代之事，无疑是受到了《通鉴外纪》的影响，此书近似于《路史》，从盘古一直记至周末。与《路史》相比，多少显得有些常识性；比起《古史》则多少汇集了一些荒诞不稽的材料。虽说没有多大的用处，但是从中很容易看出宋代史学编纂者的

---

① 《四库提要》："平心而论，史至于司马迁，犹诗至于李、杜，书至于钟、王，画至于顾、陆，非可以一支一节比拟其长短者也。辙乃欲点定其书，殆不免于轻妄。"

思想。近来此书业已罕见,马骕《绎史》也没有引用此书。在以上各书之中,《通鉴外纪》和《路史》应当是最有用的。

六、正 统 论

欧阳修以及他之后朱子等人的观点是一种正统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当时很兴盛。大体上,这种思想的起源是从五行的五运说开始的,在汉代就有了相关的理论。五运论虽始于战国,但将其作为正统论使用则兴起于秦汉时期,即秦鉴于周为火德,而水可克火,因而自称得水德。这是基于五行相克说的思想。汉初的思想家也持五行相克的观点,认为秦毕竟年代短暂,不是正统而只是闰统,无法按照五德计算,因此他们以汉为水德。后来出现了五行相生说,在汉朝来说认为自己的祖先出自于尧,因为尧属火德所以又兴起了汉乃火德的观点。后来,在王莽代汉的时候,又根据火生土的相生说,自称属土德。但是,王莽朝也由于年数短暂而被视为非正统,所以魏在代汉的时候也自称属土德,因此取土德的初代君主之意而建元黄初。吴国孙权称帝时的建元黄龙,毕竟也是出于继承于汉之意。这些虽说都是五运论,但又都包含着一种正统论的思想。

后来,正统论与五运说分离,成为以《春秋》的"大一统"论为依据的思想。这种情况在司马晋的时代已经出现。这是因为有过三国并列难以统一的时代,所以才出现了一种正统论。陈寿《三国志》一书名为《三国志》,虽说是未统一的列国,但他将魏天子列为本纪;蜀不作为天子所以未入本纪,也不明确地用天子的名称,而称之为"先主"、"后主",此并非不承认其为天子;只有对吴从孙权以下都是直接称其名字,而不承认其为天子的。这是出于实际情况的处理,即此书由于写作于继承魏之后的司马晋时期,所以不能不以魏为正统;而又因为陈寿是蜀人,所以书中又有意在重视蜀的倾向,因此出现了这种写作的方式。对此笔法从当时开始就有议论,晋人习凿齿写《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由此正统论成为了议论的话题。南北朝之间相互贬斥,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是

“岛夷”。《魏书》中将宋武帝作为岛夷刘裕、齐天子作为岛夷萧道成而立传。就这样，相互之间进行着正统之争。至唐代，延续魏晋以来的做法，按照接受前代天子的让位，将各代夺位的事例解释为：唐受隋位，隋受宇文周位，宇文周受北魏位。《南史》、《北史》所反映的，无论如何也是比较以北方为正统的思想。隋代王通①的《元经》虽被认为是宋代的伪书，但也是以北魏为正统的。

正统论之盛，始于欧阳修。他作《正统论》及《或问》一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这又是出于他撰写《五代史》的需要。他的《五代史》中，尽管五代君主无一人统一过天下，却都被列入了本纪。虽然好像承认了五代君主的正统地位，但是他的正统论观点中多少有些出于异论的辩白。尤其是他对梁与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来，梁朝乃起于盗贼而夺了唐的天下，此已经是手段不当，及其失败又多出于盗贼性情，于是梁朝特别遭人憎恶。宋太祖尝令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作为《旧五代史》虽然承认了梁、唐、晋、汉、周，但是在太宗令李昉等制作年表时，又以梁为伪。如果以梁为伪的话，《五代史》就不宜将其列为《帝纪》。同样，宋代成书的《崇天历》中也未使用梁所建号。又如，由于石晋是由契丹所建立的，所以在宋代对其多予以贬低。由于有着如此种种原因，所以出现了所谓的正统论。

欧阳修认为，“正统”之“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② 所以说由于有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得以出现。就这一点而言，三代以前的正统是不论自明的，但从秦昭襄王（东周灭亡时投降了昭襄王）至五代结束，则是有必要论其正统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居其正而不能统一天下者，周平王以后的东周是也；有能统一天下而不得居其正者，秦即如是，前世谓之为闰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自汉而

① 王通，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隋河东郡龙门县人。出生在官宦世家，曾出任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不久“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潜心钻研“六经”，模仿孔子作《续六经》。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被断为伪造。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② 《正统论》，收入《居士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内藤湖南本节所述欧阳修的观点多出于此《正统论》。

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隋、周，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夷狄。由是产生疑问，而学者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五代之终，大抵其可疑之际有三：第一，周、秦之际也；第二，东晋、后魏之际也；第三，五代之际也。其中，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虽无异禹、汤，而论者以其为闰统而非正统，其可疑者一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隋承后魏则无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国者虽异，然同归于贼乱也，而前世议者独以梁为伪，其可疑者三也。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欧阳修不相信"五运"乃圣人之说，所以也不由此进行解释。他认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统而不绝，是以其论不通也。正统不必其统继续，只要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就是正统了。由此而论，尧、舜、夏、商、周、秦、汉、唐乃正统也。另外，就其统一的手段而言，其统一就不得不为正统者有晋、隋。然而，不幸而两立不能统一天下者，二者皆为正，而难以确定谁为正统者有东晋、后魏。还有既不得其正，又不能统一天下的情况是三国之魏及五代。可见，正统有时是断绝的。所以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正统有绝也有续者，自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其恶秦而黜之以为闰者乃汉人之私论。秦之所以得天下者，并非有别于三代天子，古代帝王之末流，永年之后得天下者不可以之为正统。又以东晋为正统之论者，认为既然东周为正统，所以东晋亦不可不为正统。然而，东晋与东周迥异，东周将周的礼制全部予以东迁，东晋并非西晋之正统，与后汉之刘备何异？刘备未尝为正统，同样东晋也称不得正统。以后魏为正统之论者，不过曰功多而国强耳。但是，春秋之时，齐桓、晋文可谓有功，而非正统，吴、楚之强而非正统。五胡十六国以来，夷狄轮番自立，皆不过夷狄中强者而已，却非正统。后魏不过略胜于苻秦，无法称之为正统。五代皆为贼乱之君，而独以梁为伪者，所论不妥。当然，不可以梁为非正统，同时也不可以唐、晋、汉、周为正统。自己虽将其列入《五代史》的《本纪》，这与正统论当分别对待。这可能是有些矛盾，但这在孔子开始就已存在了。《春秋》虽以东周为天王，《诗经》却视其为列国，把《王风》列入《国风》。故《五代史》将五代之君列入《本纪》，而不承认其为正统，这并非矛盾。

司马光的《通鉴》也遇到了正统论，他不以蜀为正统，而以魏为正统，后来也成为了问题。关于《通鉴》中的这种情况，在司马光的《文集》的《答郭长官纯书》有着详细论述。在信中他认为：与欧阳修作《正统论》相反，章表民作《明统论》以非难欧阳修。在欧阳修作《正统论》时，自己认为没有更多可以论述的了，但是自《明统论》一出，又觉得尚有些议论的余地。他说：他主张正统有时也会断绝的观点是可取的。然而，说秦得天下无异于禹、汤，又说始皇虽为暴君，但与桀、纣为暴君未废夏、商之统是同样的，又将魏置于汉、晋之间等等，这些都引起了章表民的疑问。他说：章表民认为秦、晋、隋三朝不得与二帝、三王并列，无法称为正统；魏未兼得天下，故而无统可言。这是正确的。然而，五代与魏同样也未兼得天下，却不以其为无统，反而与秦、晋、隋一同都称为霸统，这是不对的。而且司马光论述了霸与闰的意义，认为章表民以霸替代闰是不对的。又说自己在《通鉴》之所以回避了正闰的论述，是因为正闰论自古以来就没有一个明白的观点，而由于《通鉴》的目的是以为表现国家盛衰、人民休戚，为世人作鉴戒的，不是《春秋》那种寓意褒贬之作，而自己也关心正闰论。顺便说一句，苏东坡为了批判欧阳修、章表民的观点曾作《正统辩论》。司马光的观点在于：周、秦、汉、晋、隋、唐皆统一天下，并传位于后世，即便其子孙衰弱，逐渐逃遁边地，也有着承受祖先之业，恢复天下的希望，所以应该承认其正统地位。反之，如果是四方的独立国家，由于他们本来是臣下，所以无法承认其为正统。但是，无论如何即便是天下分裂时期，纂著编年史时也必须以岁时月日为主线记载事之原委，由此，从汉述及魏、晋、宋、齐、梁、陈。而不得不以魏、宋、齐、梁、陈以及五代的年号为主记录诸国事实。如此一来，记年号者尊，不记年号者卑，二者之间出现了正闰的差别。蜀汉的昭烈帝之所以未作为正统，是因为此人虽可能是汉之末绪，但毕竟过于疏远，而祖先的代数不明；南朝宋刘裕号称汉楚元王之末绪，南唐烈祖亦称唐吴王恪之末绪，同样是真伪不明；虽说蜀乃汉之中兴，毕竟不得与后汉光武、东晋元帝那种有明确遗统者同日而语。司马光如此辩解了以魏为正统的理由。《朱子语类》讽刺司马温公以魏为正统一事说：如果他生在三国时代的话，就会入仕曹魏了吧！这是将实际与理论相

混淆的看法。

自朱子的《纲目》一出，正统论的基调亦定。朱子以后皆以此为准，自元、明至清朝，正统论与朱子学同样在世人心中具有权威地位。顺便介绍一本《古今正统大论》(《国粹学报》戊申第八册)，这是根据宋末郑思肖[①]华夷之论的著述。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杨维桢（铁崖)，为了论述宋、辽、金三史之正统而撰著了《正统辨》(《辍耕录》卷三)，书中祖述朱子之论，依此论定。杨维桢认为：朱子以前正统论否认蜀为正统，乃《春秋》之罪人；以北魏为帝而否认南方也是违背《春秋》的。朱子《通鉴纲目》出，而予以正误。朱子作《纲目》意在正统。所以《纲目》于三国则以蜀为正；于南北朝则以东晋为正；不以秦昭襄、唐则天武后为正统，始皇二十六年以后、汉高祖五年以后为正统；自蜀为魏所灭直至司马晋夺魏的两年不为正统，唐平定隋末割据群雄，开始成为了正统。他认为这是来自《春秋》大一统主义的。他还认为对宋、辽、金三史不别正统，不了了之的做法是史官的过错，元之统来自辽、金还是来自宋的问题虽不明确，但元应该承受于南宋而不当承受于辽、金。后来，即便辽、金，在金世宗时期文化发展时也兴起了正统论：以南宋为伪朝，将金作为北宋正统的直接继承。杨维桢认为这是不对的，元世祖继承的是宋，而不是辽、金。他对此还提出了道统、治统论，他的观点体现了朱子学的本色。认为道统绝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至周茂淑、二程而继续，又至杨龟山，由此移至南方，及至朱子，然后又至元的许文正公。道统所在亦即治统所在，治统亦由北宋移至南宋，又至于元。他的观点主要在于批评元代修宋、辽、金三史时没有正统之论。他的观点在后世成为了一般的定论。

到了清朝又出现离奇的观点。其中突出者有黄文旸(《曲海》的作者)，[②]他发表的《通史发凡》之说见于方东树《汉学商兑》一书朱雅的《题

① 郑思肖(1241—1318)，字忆翁，号所南，福建连江人，是南宋末年著名诗人，兼擅绘事。曾为宋太学生，应博学弘词科。宋亡后，便隐居苏州寺庙，终生不仕，过着隐士般的“遗民”生活。

② 黄文旸生于乾隆二年(1737)，嘉庆十三年(1808)尚在世，卒年不详。字时若，一字秋平，号焕亭。江苏甘泉(今扬州)人。工诗词，通声律之学，尤雄于文，为里中耆宿，以贡生终。撰《曲海》二十卷，散佚，今仅见《扬州画舫录》著录。另存《曲海总目》一卷。

辞》。他认为汉、魏、西晋、后魏、北周、隋、唐、辽、金、元十代为正统，宋从北宋开始则不为正统，记宋太祖为“汴州盗赵匡胤”，这是与朱子《纲目》有“汴州盗朱温”、“广州盗刘隐”相对而言的，是附在《辽纪》之后的；南宋高宗被记为“降将赵构”，与“降将刘豫、张邦昌”同列，附于《金纪》之后。这是出于憎恶朱子学，而对宋朝天子也要给予恶评的观点。[①] 这也是混同治统与道统，其所本就在朱子学之中。这是戏谈之类的观点。在清朝最为稳妥的是乾隆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方法，大体采用朱子《纲目》之说，以蜀、东晋为正；将宋、齐、梁、陈与北朝相对立，在干支之下分注两朝的年号；亦不以五代为正，在干支之下分注诸国年号；宋元像杨铁崖一样，不承认辽、金为正统，以北宋、南宋、元为相继关系。

《读通鉴论》的作者王夫之认为此乃无谓的争论，所以《读通鉴论》中对正统论未置一词，作者只是在卷末解释了自己为何不言正统论的理由。他说：“统之为言，合而并之之谓也，因而续之之谓也。而天下之不合与不续也多矣！”天下乃一合一离之局，而此局面又经常变化。“夫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离矣，而恶乎统之？绝矣，而固不相承以为统。”由民间崛起而统一天下者，有必要承接谁的系统吗？出于对正统的轻率制作，有人竟找出南北朝之梁亡后，其一族之萧岿降宇文周一事为由，将梁作为正统。又如，后唐庄宗李存勗虽称为唐，原本却出于沙陀夷族。南唐徐知诰冒称李唐后裔，将其作为正统亦为不必。如此这些均为无谓之论，“一治一乱，天也。犹日之有昼夜，月之有朔、弦、望、晦也”。他认为亡国之臣在情义上的不屈守节乃私事，而非天下之公论也。[②] 作为中国学者这是很罕见的通达之论，可惜在中国人中并不太通行。像正统论那样的观点虽说有嫌多余，但是中国人即便今日仍然为其所束缚，这是了解中国人思想时最应当引起注意的。

---

① 《汉学商兑》卷上《题辞》：“后见黄文旸所著《通史发凡》以汉及曹魏、西晋、后魏、北周、隋、唐、辽、金、元十代系以正统。于北宋书‘汴州盗赵匡允’，与‘汴州盗朱温’、‘广州盗刘隐’并附于《辽纪》之后；于南宋书‘降将赵构’，与‘降将刘豫、张邦昌’并附于《金纪》之后。由其恶程朱而并及其代，其肆妄如此。”（浙江书局刊《汉学商兑》卷上）

② 这里引述王夫之的观点，均见于《读通鉴论》的《叙论》。

七、郑樵的《通志》

唐宋之间是中国史学大变化的时期，作为史论家，最初有《史通》的作者刘知幾，最终则有郑樵的出现。郑樵关于史学的论述，主要见于所著《通志》之《总序》。所论虽说极为简单，却多发前人所未发，时有超出《史通》的见解。郑樵最强调历史应该以通史为主，断代史并非历史本旨；因而他贬《汉书》而褒《史记》。而他的这一主张又是与《史通》最为不同的。由于《史通》作者在评论自身所在时代的史书时，认为从方便的角度来说是最为适当的体例，所以认为断代史是最适当的。对此，郑樵的观点则完全相反。郑樵在攻击班固时虽有言过其实的情况，但是他认为：由于历史有着各个时代之间相互的因果关系，所以写史应该贯通古今，但是班固不辨此理，而仅仅进行了一个时代的记录。孔子曾说：殷因于夏，周因于殷，其损益可知也。这是讲相因关系，这种所谓相因就是历史的重要之处。由此，他抨击断代史有失相因之义，可说是极为得当的。即便从今日之史学来看，仅仅以天子世系为中心所编纂的历代记录，只不过是史料的整理而已，而非真正的史学。《汉书》以下的正史大体都堕为了这种史料的整理。郑樵这种历史之本义在于通史的观点，不能不说是真知灼见。

《通志》就是以这种目的而撰写的，此书虽与《通典》、《文献通考》一同有“三通”之称，但是由此将其视为类书则有失作者的本意。《四库提要》将其作为“别史”，与其他“二通”区别开来是很得当的。然而就《通志》本身而言，也并非完全如作者所论那样而写作的。《四库提要》也指出了这一缺点。特别是其传记，不过是对以往史书稍加删录的抄写而已。其年谱虽说不乏可取之处，但总体上并没有彻底贯彻其主旨。其上古部分仿效了《史记》的“世表”而作“世谱”，是有其不轻信《史记》以后所出上古纪年之见地的。他认为《史记》年表虽起于周之共和，但毕竟不明其根据，所以他记年谱起自春秋时期。从现存材料的角度来看，他的做法也许是可取的，但是没有确认《史记》的史料依据

就删节了其中的年表，则不免过于独断。与他所制年谱相比，他对史书需要年表的论述更有意义。他的观点是研究《史记》各表的结果，其主旨在于：认为表并非是排列人物、事件的目录，而应该是可以按年代来表述事件因果的。而就这一点来说，班固不明列表之意，所以他以后的史家皆有失制表之传统的意义。

在《通志》中，相当于《史记》八《书》以及诸史《志》类的是二十《略》。论者虽对《通志》褒贬不一，但对二十《略》都赞扬其是成功的，《四库提要》也说：其平生精力、全帙精华皆在此二十《略》。二十《略》不但比八《书》以及其他各正史《志》类的项目多，而且其中还有着以往正史中从未有过的项目，即《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都邑略》、《校雠略》、《草木昆虫略》等。其中，由于《氏族》、《都邑》、《草木昆虫》大体依照了《史通》的论述，看来，《史通・书志篇》认为有必要列"氏族"、"都邑"、"方物"为志，可以说郑樵正是实行了这一观点。但就他的实行方法而言，又有与刘知幾观点不完全吻合之处。例如，《氏族略》是刘知幾在氏族兴盛时期的观点，所以像《唐书》的《宰相世系表》那样，目的在于将谱学作为一门学问。而在郑樵的时代，由于氏族势力业已衰败，所以他仅仅是像宋人所撰氏族字典，即以撰写索引为目的罢了。实际上，《氏族略》即便连今日已残缺的《元和姓纂》的效果也不具备。《都邑略》中仅仅记述了都邑所在地的变迁，而没有记载都邑的内容，即与各时代制度、文物相关的内容。这与刘知幾的目的有所不同。关于《草木昆虫略》，《四库提要》虽认为仅仅汇集合纂了《诗经》、《尔雅》之注疏，且未能详核。但是，其实有的地方还是扩大了引用文献的范围，按照本草书进行记载。但是，刘知幾的"方物"是犹如《禹贡》那种为着获得各地物产的明确记录，《草木昆虫略》则没有如此的目的。《四库提要》认为，二十《略》中的《谥略》、《器服略》乃《礼》的子目；《图谱略》、《金石略》乃《艺文》的子目，将此各立为一类则有些过于繁冗。我认为《天文略》甚是疏略，仅仅收载了最近时代的天文书，十分简略。但是《地理略》中有着颇为有益的论述，即他认为虽然州县的设置时有变化，但是山川形势却千古不易，所以《禹贡》中划分州是以山川来定界的，应该依据此方法撰写地理书。他认为

真正的地理学应该与单纯的制度沿革相分开来研究。他自己的写作方法，就是先从水道写起，而后记载历代疆域。不过，其写作手法很疏略，并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主张。但是，以往各代史书仅仅以记载行政区划为主，特别是从其省略了《汉书》、《后汉书》中所注意到的水道一事来看，多少也有些复古的特点，以《禹贡》的方法为基准写作的主旨是值得采取的。就《谥略》而言，他的议论也是颇有可取之处的。谥本始于周代，但历来有人说尧、舜、禹、汤也是谥，郑樵则认为那只是名号而不是谥；他还认为对于有恶名的天子，谥以幽、厉、桓、灵等字，确实表达了不好的意思，但是由于本来谥的目的在于讳名，因而作为谥来说并无制造恶名之理，所以说幽、厉、桓、灵亦无恶意。姑且不论其观点的得失，总之不失为一种新观点。

虽然《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被《提要》认为是多余的篇目，其实《校雠略》是很有创见的。本来目录之学在《汉书·艺文志》已经明显地出现了，至《隋书·经籍志》则更有着充分地阐述；但是继承这些成果最终成为批评之学的真正形成其实是在此《校雠略》。郑樵的观点在于，认为目录编纂要在慎重考虑类例，即重视正确的分类；又指出了记录亡书的必要性，因为即便书散失了，如果将其著录的话，今后还是有可能将其寻找出来的，所以《隋书·经籍志》著录亡书的做法是可取的；又如有些书名亡而实存，其书虽亡但却保存在了其他书中。这些都是他对建立目录学基础的贡献，清朝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就是由此发展而成的。他在《校雠略》中还写了"秦不绝儒学论"，反对那种认为始皇烧掉所有书的观点。近来，康有为的"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论"也是由此而来的。当然，《校雠略》中也有不可取之处。他在《艺文略》中著录书籍时仅仅记载书名、卷数，而未记载解题，对于这种主张，他在《校雠略》中有所论及，他认为北宋成书的《崇文总目》中所附解题是没有意义的。虽说由于他意在复活《汉志》、《隋志》之旧而出此风格，但是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毕竟还是有解题为好，清朝的《四库提要》就是这类书籍。但是，他对《崇文总目》解题的评论也是有其道理的。他认为书中内容有的应该解释，有的不必解释，如《崇文总目》中对所录唐《实录》一一注明为唐人所撰，就是

没有必要。因为唐《实录》为唐人所著是很明确的，不必注释为唐人所撰。又如《崇文总目》对任何书名都一定要解释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例如《百中伤寒论》一书，一见其书名就明确其含义，没有必要再解释“百中”乃必定治愈之义。这种情况在最近出版的解题中其实也不乏其例吧。《校雠略》正如《四库提要》所云，以其为一个部类也许是不必要的，但其能够对目录学加以评论、总结则是颇为有益，而不无可取之处的。此外的各略则大体是对各种正史的照录，并无特别显著之处。总之，就总体而言作者是能够提出新见解的人物。《四库提要》也承认此书的长处，认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富于创见之义）。”说将此书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是有道理的。康有为说：不应当将此书与《文献通考》对比，司马迁以后懂得历史本义的人只有郑樵了。

以《通典》与《通志》作比较的话，《通典》中是有经世的观点的，并非单纯作为类书而编纂的。虽然朱子评论杜佑《理道要诀》为《通典》简约本（今已不存），是一部是古非今的著作；但是大体上说《通典》并不是认为只有古代才好，而是具有从沿革上予以考察的、具有进步见解的著作，杜佑是能够充分理解现行制度的，这一点从《杜佑传》是不难了解的。《通志》则没有如此的经世见解，而是单纯从学术立场出发的，但是其不拘泥既存的正史，对历史编纂法有自己独到新见解这一点上，是超出刘知幾《史通》之上的。当然，《通志》原本又是受到《史通》启发的。此书与《通鉴》那种以编年体进行历史复古的观点不同，是以纪传体进行历史复古的著作。《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志》三书，实际上可以说都是宋代史学给予后世有益影响的著作。

八、经学的变化

在北宋与南宋之际，伴随着史学的重要发展的同时，有关经学的观点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其中尤其那些作为古代史史料的经书即《书经》、《诗经》等，更是有着特别重大的观点变化。其中有关《书经》，一是出现了关于古文今文的疑问，一是不论对古文今文都提出了各种疑问。

而首先出现的是后一种疑问:这主要是从《东坡书传》[1]而来的,书中推测《皋陶谟》中有脱简,又订正了《洪范》的错简。所谓《洪范》的错简是有关"五纪"文句的订正,他认为"曰王者惟岁"以下的文字是"五纪"文句的错简。持同样观点者在当时还有其他人。余焘也为了纠正《洪范》的错简而上书朝廷,但未能奏效,此事见于《中吴纪闻》。此事与东坡的观点是否为巧合虽不清楚,总之这种观点流行于当时是明确的。他们可谓是向经书质疑的先驱。

继而又出现了有关古文今文的疑问。最先对此质疑的是吴棫(字才老)。[2] 此人认为:孔安国所增加的《古文尚书》皆文从字顺,简单明了;而原来伏生的《尚书》则佶屈聱牙,难于理解,此乃二者之异。本来虞、夏、商、周四代之书虽因作者不同而各有差异,但是从成书的情况来看,伏生本与孔安国本截然分为两种不同的体例,这于理不通。此抑或怀疑古文为伪书的先声。此后继之又有朱子提出的各种疑问,大体而言其出发点虽说与吴才老相同,但朱子对此勉强赋予了解释。认为那些简单明了的文本是最初在朝廷上做成的,而佶屈聱牙的文本其实可能是当时用方言写成的,由此他提出了调停的观点。无论如何他有所疑问是肯定的,《朱子语类》收录了朱子的有关议论。朱子还特别明确地指出:《古文尚书》孔安国的《传》和《序》都不像孔安国所撰,其文章不似西汉人手笔,恐为魏晋文人所为,托名孔安国而已。而且,还推测《孔丛子》也是此时人所作。朱子所提出的疑问,对后来的古文今文研究者有着种种的影响,很多人从朱子的观点出发进行了探索《古文尚书》为伪书的研究。但是,朱子虽然的确表示过怀疑,但他本人又时常提出自我解疑的观点,并未得出固定的结论。而且他本人也没有撰写过传注的工作。朱子一派学者中

---

① 《东坡书传》是苏轼自己颇为重视的《易传》、《书传》、《诗集传》三部经学著作之一,历代《尚书》学者亦多有称引,对前人之说有纠误,也有立新,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颇受朱熹称赞。

② 吴棫,字才老,宋代建安人(即今建瓯),著名的音韵训诂学家。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南宋绍兴间曾任太常丞。著述甚丰,人称"通儒"。有《书稗传》、《诗补音》、《论语指掌》、《考异语解》、《考异续解》、《楚辞释音》、《字学补韵》、《韵补》等行世。朱熹对其评价很高,认为"近代考订训释之学,唯才老及洪庆善为优"。

蔡沈撰有《尚书》的《书集传》。其中对古文、今文都作了注释,也注意到了二者差别,并对《尚书》各篇之下究竟是今文古文皆有,还是今文无、古文有,都一一作出了判断。

但是这一问题在宋代也只是停留于此,此后朱子学派的研究者又回到了与苏东坡同样的倾向,即不论古文、今文一律予以质疑。像宋末的王柏①就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尧典》有脱简,并将《论语·尧曰篇》中"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数句,与《孟子滕文公篇》的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数句皆作为《尧典》之脱简而作为弥补。当然,有关《洪范》中多有错简的观点,他提出的问题比东坡更多。出于这一观点,王柏大胆予以了订正,并撰著了《书疑》。《书疑》除以上观点之外,还提出了各种疑问,即便对于《尚书》各篇的顺序,也提出了应该订正《尧典》之下为《禹贡》的顺序错误。其门下有撰著《通鉴前编》的金履祥,此人也传承师说,对《尚书》本文有所怀疑。从他的观点出发,对《洪范》,特别是"五纪"文句提出质疑的学者,于东坡之外还有洪迈(容斋)、叶适(石林)、张九成(无垢)等人(见《尚书表注》)。总之,对《尚书》本文持有怀疑的学者大有人在是肯定的。

此后,有关古文今文的议论大体到了元代,从吴澄(文正公)开始出现了集大成的研究。吴澄取吴才老、朱子之说,断然不信古文二十五篇,在其所著的《书纂言》中只有今文之注而未作古文之注。至此,对于古文、今文真伪的问题大体已经有了定论。后来此项研究又不断发展,从明代梅鷟《尚书考异》开始,更进一步研究了《伪古文尚书》的伪作出处,最终至清代阎若璩、惠栋则对其伪作的形成给以了全面的揭示。总之,对《尚书》的疑问起于宋代,吴才老是宣和六年的进士,乃北宋末南宋初之人,由此时已开始了对《古文尚书》的质疑,朱子就是继承了他的观点。

① 王柏(1197—1274),字会之,金华(今属浙江)人。生于宋宁宗庆元三年,卒于度宗咸淳十年,年七十八岁。少慕诸葛亮为人,自号长啸,后更号鲁斋。从何基游,质实坚苦。卒,谥文宪。柏工诗善画,著述甚富,《四库总目》又有《读易记》、《书疑》、《诗疑》、《研几图》等,多已佚。明正统间六世孙王迪裒辑有《王文宪公文集》二十卷。事见《续金华丛书》本卷末附《王文宪公圹志》,《宋史》卷四三八有传。

对《诗经》也是有议论的。对于从来都以《毛传》为主的观点提出了各种疑问。一种看法认为以往的对《诗》的传，误解了《诗》作为歌谣的真意，提出《诗序》不可信的观点。另一方面，有些学者从对内容的研究发展为音韵的研究。对于《诗》韵的研究毕竟还属吴才老为鼻祖，他发明的叶韵对《诗》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推动。本来，对于《诗》韵以前就是有疑问的，从唐代开始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疑问，而且由于有所怀疑，时有改动经书文字，使之合于当时音韵的情况。这类改字现象也存在于《诗经》以外的其他经书，如唐开元十四年就因《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句中"颇"与"义"不合韵，而下诏将"颇"改为"陂"。在这种情况下，才有着卫包对《书经》文字的多处改动，至吴才老重新研究了音韵，而提出了叶韵的主张。由此，才有了"颇"与"陂"合韵的证明。这是他在《韵补》一书中的主张，《韵补》对后代音韵研究影响极大。朱子作《诗传》时就依据了吴才老的观点。总之，当时学者认为音韵研究是有必要懂得《诗经》真意的。

《诗序》不可信的观点起于郑樵。他的观点在于：《风》、《雅》、《颂》之中，《颂》是朝廷制作的，所以应该有序；但是《风》、《雅》是从民间采集的诗，本来因何作诗的原因不明，所以不当有序。以往四家之《诗》以序解释《诗》的做法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不应该是以义理解释《诗》，而应是以音声作解释。像"六笙诗"那样，认为辞已佚而不载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此诗从最初就没有辞。朱子的《诗传》就采用了这一观点，主张《诗序》产生于东汉时期，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这种将《诗》作为古代历史材料的观点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朱子所持与《毛传》那种合理解释相比，更重视传说的观点，又回到了《郑笺》中所出现的神怪观点。朱子对于《诗》的整体编纂方法也提出看法，认为孔子删诗之说不可信，总之是汇集了当时所有的诗歌；另外，以往观点虽然认为《诗经》的"王风"乃东周王国之风，即应当属于《周南》、《召南》那种"正风"，但"王风"属于"变风"，将周王贬为与列国同样的地位的观点也不可信，而《诗经》只是将东周"王风"的这种情况照实编纂的作品，并无贬义。当然，对于朱子的这些看法在当时就有反对意见，吕东莱就是认为《诗序》可信一派的，不用

说他的《读诗记》、《大事记》也是引用《诗序》的。但是，像朱子那样推翻原有观点，将《诗》作为古代材料予以理解，由此提出不同见解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都成为了后来对《诗》进行各种议论的基本观点，尽管后代《诗》学者还是认为《诗序》可信，但是朱子的解释确有其不容忽视的一面。从《朱子语类》中还可见，朱子的观点中有继承郑樵思想的情况。《诗经》的研究，至朱子出于《诗序》不可信的观点，以及音韵的研究而有了《诗传》的成书，由此迎来了对古代事实及有关语言研究的变化。

当然，朱子的观点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产物，郑樵《通志》之《略》中的《六书略》、《七音略》就与此研究有关。他对"六书"的研究有着各种创新，其"古今殊文"、"一代殊文"、"诸国殊文"等观点，对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文字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一代之中也有异字，春秋战国各国文字各异；并认为古来学者勉强以义理解说文字，而不考虑文字是在变化中得以使用的情况是不可取的。此外，他还提出了有关音韵变化的意见，论述了由本字生成假借字的多种情况，尤其是论述了关于音韵的华梵相异，认为梵字是音韵字，梵字之传入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进步；还指出这种音韵研究对古代音韵研究的必要性。能够进行如此广泛研究的，后来再没有出现继承者，所以他的研究此后也就原地踏步了。尽管如此，宋代有着如此的学术进步，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朱子对于其他经书也有着见识丰富的观点，对后人影响极大。特别是他对《春秋》的观点，从《朱子语类》来看，他有着颇为稳妥的思想。大体而论，他认为尽管承认《春秋》之中有斥责乱臣贼子、内中国而外夷狄、贵王贱霸等大义可言，但似乎并不相信每一字均寓以褒贬之意。孔子不过是尊重事实的撰写，不会有轻率夹杂私意的企图。像来自诸国的各种赴告都是照实记录的内容。所以对于《春秋》应该作为历史书来看，而不必作为经书严格地对待。尤其是从将《春秋》作为史书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他认为《左传》中常载有卜筮，其中虽然有预知数世之后的内容，但是那是子孙为着僭窃目的而编造的欺人之谈。又如汉高祖斩蛇等内容亦不足信，陈涉六月而亡，故符瑞本不存在，那只不过是对高祖成功所附会的谎言。《语类》中的这一观点与《通鉴纲目》有着很大的矛

盾,就这一点而言《纲目》是否反映了朱子的真意,是值得怀疑的。替《纲目》作辩护者,甚至连《纲目》是朱子晚年未订之书的观点也要反对,虽然他们认为是朱子年轻时的作品,而因为这是论述《纲目》笔法一派人的观点,相反更让人感到有怀疑的必要。总之,即使《纲目》不是朱子思想,也是接受了他思想的著作这一点是明确的。并非仅仅一字褒贬的观点是朱子本人的思想。《通鉴》尊崇《左传》,《纲目》向往《春秋》的情况是十分可能的。朱子对《春秋》所作平易之论可谓那个时代有关经书认识的一大发展。

对于《礼》,朱子也有自己观点。他认为《礼记》有信不得处,只有《周礼》、《仪礼》可信。特别是他还亲自以《仪礼》为经,以《周礼》为传,撰著了《仪礼经传通解》。尽管如此他仍对《仪礼》有着深刻的、历史学的认识,认为《仪礼》并非古人早先就写成了这样一书,最初仅仅有个大义,逐渐展开之后,因为觉得很有用,所以又逐渐附加内容才形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尤其能说明古书形成的渐进过程。朱子对《周礼》没有特别的质疑,当时虽有怀疑其为刘歆所著的看法,但他仍然认为是周公的遗典。但是他认为,此书并非周公所著,而是根据周代法则的遗存而成书的,明确说此书并非周公亲笔著成。而且,认为此书恐是当时如今日编修官之类为之。另外,对此书所出现的官名与其他书中官名有异的问题,他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恐是当时此书作成时,见设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时本不曾用。又笑曰:"禁治虾蟆,已专设一官,岂不酷耶!"①可见朱子对《周礼》一书内容乃理想主义思想产物,并未付诸实行这一点是有其充分理解的。总之,他认为《周礼》一书,乃圣人姑且作为一代之法则而设置的。到不可用法之处,圣人须别有通变之道,并非一切拘泥于此。朱子对此书进行了常识性的解释。由于朱子的解释是对经书所做常识性的见解,所以对于后人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经书有着许多潜在的影响。后来能像他这样以常识对待经书、头脑敏锐的人就很少了。从《朱子语类》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以历史的观点看待经书的发展是十分

① 《朱子语类》卷八六《周礼》。

先进的。

九、金石学的发达

在宋代,有关史料研究中最为发达者要属金石之学。本来,将金石用为史料在宋以前并非没有。比如,出于山川的铜器等,在汉代虽然已经引起了注意,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已经被用来进行史料的考证了。《史记》中多载秦代碑文,但也只是照录史料而已,并无与其他史料做比较进行考证的意思。重视汇集碑文的作法始于南朝梁元帝,《四库提要》曰:元帝汇集碑刻文,作《碑英》百二十卷,此为金石学之祖。还说:这从元帝所著《金楼子》可以看出。现存《金楼子》的残本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没有《碑英》一书,只有《碑集十帙》百卷以及同一作者的《诗英》十卷。由此看来,《提要》可能是将二书搞混了。但是,这可能只是些写文章时备用的参考资料,从后来唐代的《文馆词林》中也多载碑文的情况来看,二者也许有着同样的作用。但是,当时似乎已经有了汇集金石文的做法,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也引用了碑文。《隋书·经籍志》也将"碑集"列入了"总集",将"石经"作为文字学列入了"小学"部。

当时最为明确地将金石文用于史料考证的例子,是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的《书证篇》,颜之推利用秦权证明了《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八年条的丞相隗林名字的"林"字为错字。后来,在隋开皇二年五月长安出土秦权,铭文有始皇二十六年"诏丞相状、绾"等文字;《史记》也有始皇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记载,可知当时确实有此二位丞相,也就是说《史记》的"林"字当为"状"字之误。此一字之误随着隋代当时的史家李德林对秦权的释读得以判明。今天存世的秦权有很多,均与颜之推的结论相符。唐司马贞写《史记索引》时就采用了颜之推的考证,而且还提到八十卷《隋书》的作者王劭也持同样的观点。唐初石鼓受到世人注目,从那时开始对石鼓进行各种考证的人也多了起来。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金石学的产生则是到了宋代的事情了。不过,五代时郭忠恕撰著《汗简》而汇集古文时,已经引用了大量碑文。作为小学的研究,在当时金石文字看

来是很受重视的。在《汗简》之后，北宋宰相夏竦著《古文四声韵》，基本上使用了与《汗简》相同的材料，其中也引用了古代碑文，是对《汗简》的研究进行声韵分类的研究。

将金石文统统作为史料使用者，首先开始于欧阳修的《集古录》。他汇集了金石文千卷，据说其中附跋文以表达已见者有四百余篇。此书出于北宋仁宗时期，其季子欧阳棐还撮其大要，著《集古录目》十卷。《集古录》后来亡佚，今本由诸书辑佚而成。此《集古录》并收金石文字，是从历史上进行考证的著述，本来是随笔的写作，并未编排顺序，今本《集古录》则进行了时代顺序的编排。此后，在北宋至南宋之间，有赵明诚所著《金石录》三十卷。作者身为宰相赵抃之子是个贵公子，其妻李清照乃学者李格非之女，是号为易安居士的著名女学者，夫妻二人汇集了二千卷金石文。后来，北宋遭金人进攻时，由于战乱中携书稿四处奔波，逐渐散失，最后有题跋的只剩有五百二卷。明诚死后，由易安居士完稿的时间是绍兴二年（见易安居士的《序文》）。这些都是当初考证金石之最早的专著。

此外，当时与上述属于同类著作的还有一些，如金文学的《考古图》、《博古图》。《考古图》乃吕大临所著，内容不仅限于文字，还有插图，并且从发掘地至收藏者名字都有记录，同时也是考证之作。比如其中有关于榭（射）字的考证，胡安国作《春秋胡氏传》时就是利用这一考证理解《春秋》中“宣榭火”，这一考证被认为是很有学术见地的。《博古图》是对徽宗时宣和殿中汇集之古铜器文、图的考证，据说是以画家李公麟所绘铜器图为基础而成。考证中多有附会，比如见到古器上有古人名时，就无边际地牵涉上历史人物，轻率地将古书附会于古物，被认为难以置信。总之，其考古价值不及《考古图》是肯定的。此外还有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以及王厚之的《王复斋钟鼎款识》。据说后者所收器物大部分都是秦桧之子秦熺所藏古物，前者所收器物中有些不明真伪。但是这些古图录对后代偶然发现的材料有着相互对照的参考价值。例如，罗振玉氏就认为《博古图》中殷墟的遗物有五件，很是贵重。可见此时殷墟已经出土了古器物。

无论如何，当时还有一些虽无专著，但对金石感兴趣的研究者，像北

宋末黄长睿的《东观余论》、董逌的《广川书跋》，虽然都是对题跋的汇集，但有许多关于金石的内容，在碑文、书籍之外就金文也作了考古学的研究，有着超出《博古图》的论述。《东观余论》中有《汉简辨》，当时在关右即陕西地方出土的古瓶中发现了竹简（或木简），其中有后汉永初二年的“讨羌符”，文字是很清晰的章草字体。黄长睿根据《后汉书》进行考证，认为文中的“车骑将军”当为邓骘，羌乃先零之羌，又指出《后汉书》对月日的记载有误。两书中有着如此正确的论述，其价值均在《博古图》以上。

至南宋，对金文具有系统研究的著作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此书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法帖体例。此人很有学问，对《博古图》等的错谬多所订正。对于当时古文字研究的发展情况，只要看一下当时人翟耆年《籀史》（上下二卷，仅存上卷）有关当时这类研究著作的解题即可略见一斑。另外，在碑文方面有洪适的《隶释》及《隶续》，这是以汉碑为主的研究。不过，作为结果却使学术走向了歧途，即出现了对《古文尚书》文字复古的尝试，出现了薛季宣的《书古文训》那样的书，这是金石文研究误入歧途的产物。无论如何，在宋代金石研究正式成为了一门学问，此后元明时期基本没有什么进步，至清朝则达到了极盛。在元代出现的《古玉图》是当时在铜器之外对玉器的研究，《考古图》、《博古图》之外又加上了这本《古玉图》，合称“三古图”。此外还有《古玉图谱》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但被（《四库提要》）怀疑是伪书。虽然这本伪书并非成书于宋代，无论如何关于玉的研究起于宋元应该是肯定的。

以上所述都是有关实物研究的论著。还有一本说不清是否以实物对象的，关于经学研究的著作，即聂宗义的《三礼图》。作者为五代末宋初之人，此书应当是一部以传世观点和图为基础的研究著作。虽说其中错谬之图很多，但毕竟是使用图进行古代研究方面的著述。后来郑樵在《二十略》中对古器物形状就是从这方面入手进行研究的。郑樵《二十略》中到处都有这类研究，他在《金石略》的序文中指出：凭借书籍所做古代的研究依据的是经过数千万传抄的文献，而凭借金石的研究由于依据的是原始材料，所以是十分有益的。《金石略》虽只是简单的目录，但已

经注意到从古代金文变至秦石鼓文、再至碑刻的变迁，是懂得金石研究思想的。

金石学中有关古钱研究的有洪遵的《泉志》。由于此书是在没有实物条件下凭借想像的著述，所以被认为没有考证的意义，虽说有缺点但在古钱的分类上，他的方法一直被后人沿用，可以说是他开创了古钱研究的先例。他把钱分类为："正用品"（实际流通的货币）、"伪品"（僭伪国的私铸货币）、"不知年代品"、"天品"（如道教货币之类）、"刀布品"、"外国品"、"奇品"、"神品"、"压胜品"。

总之，以上就是宋代发达的金石研究方法的大概情况。

十、目　录　学

作为有助于史学进步的另一个分野是目录学。宋代的目录学分为两派，而且都延续至后世。目录学的鼻祖当推刘向、刘歆，向、歆的《别录》、《七略》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无人再为书籍写解题，直至宋代的《崇文总目》问世，书籍解题才得以复兴。《崇文总目》是北宋时期朝廷的文库目录，其成书于仁宗庆历年间，参与编辑本书的有欧阳修等人。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此书是否仍旧得以完整保存，不太清楚：有人认为南宋时仅存书目，也有人认为仍以附加解题的形式存在着。虽说情况不明，但无论如何南宋以后解题已经亡佚。至近代，清朝学者曾试图将此体例予以恢复，从欧阳修《文集》、《文献通考》和其他书籍中做了辑佚，使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原著或是本来六十卷、或六十六卷、或六十七卷的大部书籍，复原之后却只剩有五卷，可见是如何的不完整。无论如何，我们由此还是可以知道原书的大致体例。特别是欧阳修的《文集》中的佚文是各部门之中，经、史以及子的一半中的所属部门之序，由这些序可知自古以来的目录编排方法在此时仍然沿用。此目录写有各种书籍解题这一点是一个杰出的贡献，这对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修有着很大影响。在宋代目录学来说，这是做解题派的代表。

与此相反，主张不做目录解题的代表，是郑樵《通志》的《艺文略》，

《四库提要》甚至说,郑樵《艺文略》及《校雠略》是一味攻击《崇文总目》的产物。郑樵认为写解题既繁琐又无用,所以《艺文略》中完全不做解题。后来,这也成为无解题目录派的核心之作。《四库提要》是依靠前者成书的,所以主张解题是有用的,认为郑樵发起的不做解题的原因在于:做解题必须要看原书,而郑樵是乡下的穷人,无法见到所有的朝廷秘书,而且又是那种很气盛的人,以至主张不做解题才是目录的本意。《提要》的这一说法过于带有贬意了。不仅如此,《提要》还说,此后成书的《宋史·艺文志》非常粗制滥造,乃正史中最无价值的《艺文志》,原因就在于南宋高宗用郑樵之言,删除《崇文总目》中的解题所致。

这两派的影响在南宋已经出现。当时就出现了私家的藏书目录,而且流传至今,这对于治目录学的人是很重要的资料。这类目录中也出现了两派。一派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他们属于《崇文总目》一派,书中附有各书的解题。另一种是藏书家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属于不做解题一派。《郡斋读书志》可以说真正是私家藏书目录的鼻祖。晁公武、陈振孙的书目一直流传至今,极便于查阅宋代存在的书籍。当然,不是说此书目不载书籍当时就不存在,就连朝廷的《崇文总目》对当时确实存在的某些书也有未记载的情况,但是此二书的确对查阅当时存在的书籍的卷数,了解其内容是很有帮助的。《遂初堂书目》虽然仅仅记载了书名和卷数,其特色在于详细记录了同一种书籍中存在几种不同版本的情况。所以说以往的书目,特别是那些有解题的书目,是以书籍内容为主的,而《遂初堂书目》对现存书籍逐一予以片段地记录,对于内容相同但体例各异的书籍均予以收录,真可谓书籍的簿录。作为私家目录,此书虽说已经具备了簿录的体例,但是就目录学来看不如说是一种倒退。

以上所述还只是以目录编纂为主的情况,此外在南宋还出现了一些虽不以目录编纂为目的,但在目录学来说又是很重要的著作。即高似孙的《史略》、《子略》和王应麟《玉海》中的《艺文》。这些都不是对当时所存书籍的目录。高似孙的书除了今日尚存《史略》、《子略》之外,应该还有《经略》、《集略》,似乎还应该有《诗略》,都佚失而不存了。此外,虽然

现存的还有《纬略》和《骚略》,但都与目录学无关,《骚略》是模仿《离骚》的作品,但《纬略》还多少与目录学有点关系,大体是各种考证的随笔。《史略》、《子略》都与目录学相关。在中国《子略》尚有流传,但《史略》已经亡佚;不过《史略》在日本仍残存,近年又收录于黎庶昌的《古逸丛书》中。此二书基本上是列举自古以来的史书、子书的书名,将其编纂情况、内容评价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从古书中抄录并汇编。对大部分书籍并不加入编者自己的意见,偶尔也写出有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史略》中将与自己有关的书,一直收录到最新的著作。如关于宋代《实录》就记述了与自己有关的部分,对于自己写的《秦桧传》曰:史馆虽索取,却不欲录报。《史略》的抄录方式是足可称道的,基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古书中的评语也仅仅抄录其最恰当的部分,由此达到概括全书的效果。这部《史略》的成书虽然仅仅用了二十七天,但确实是一部成功之作。对于那些已经亡佚的书籍,作者就从其他书中引用的部分抄出,虽说形式简略但是后来王应麟那种写作方法,在他这里已经有了一次尝试。杨守敬曾说,《史略》远不及《子略》、《纬略》,往往记入异名同书者。对《史略》有所微词。其实,此书没有杨守敬评价的那么差,偶然残存至今的这部书,还是很有价值的。例如,此书收载了《通鉴》参考书的目录,其中甚至有《崇文总目》不载书目。《四库提要》著录有高似孙的地志著作《剡录》,《提要》说此书作者人品盖无足道,但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曰:高似孙的著作虽略嫌难懂乏味,但《剡录》却简洁古雅、序述有法,迥在明代最佳地志之上。由于作者为人口碑不佳,殃及此书遭贬,这可能也影响到了近来杨守敬对此书的批评。不过此著作的确写得很好,就现存《子略》来看,不如《史略》。杨守敬认为《子略》出于《史略》之上的看法是完全不恰当的。《子略》没能搞清诸子类的真正变迁、沿革,有时还抄入了无用之事。《纬略》作为考证著作是很出色的,《四库提要》虽列举了书中的错误,但又说其言笃实无赝托,较明代杨升庵《丹铅总录》可信。其中也有与目录学有关的内容,例如列出《世说》引用书目,就是作为目录学的有益的尝试。总之,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人出于弄清书籍沿革的目的,开始考虑目录学的必要性了。尽管人品低下,高似孙确实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这从其著作

是不难看出的。遗憾的是至今学者对此尚未加以重视。《四库提要》虽收录了《子略》,但也是仅仅历数了其中的缺点,而对作者出于了解学问变迁之目的所做的尝试则未置一词。这可能是由于《史略》在中国的亡佚,导致了人们不清楚其企图的情况。如果《史略》能够流传于中国的话,可能对他的主旨会给予更高的评价。

其次还有《玉海・艺文》。王应麟乃宋末学者,从各方面看此人都是学术上的重要人物。对此,我在后面还要讲到,即便从《玉海・艺文》的部分来看,也可以了解其学问的方法。此书与同时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那种单纯摘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列举书目、解题的方法不同,《艺文》分为许多部门,各部门中列举了古来的重要书籍,这与高似孙的方法基本相同,主要是对古人著作的成书情况、评论予以了恰当的采取。对所收录书籍虽说没有什么明确的论断,但不仅使人可以了解各书的大概、内容、性质,而且能够做到使人根据《艺文》所载书籍的顺序,也可以自然地了解各部门的变迁沿革。不附加自己意见而自然地通过编纂方法表述己见,这是非常需要技巧的方法,非有深厚学术功底者难以为之的。单纯叙述一己之见是容易的,而不写出自己意见,就能通过古人书籍表达见解的做法是很困难的,同时也是最为巧妙的方式。虽与高似孙《史略》有相似之处,但因为这部《艺文》是阐述学问全貌的著作,所以有着《史略》所无法比拟的价值。高似孙、王应麟的方法,若非学识渊博、见识深广者,是不能充分理解其编纂意义的,有时会有人认为《玉海》是像《通考》那样的单纯的类书,即便是作为类书写作的,后世的学者也务必注意其所表达的类书目的以外的观点。看看《艺文》,就会知道学问所发展沿革的大要;尤其在历史学问中,如哪些书籍作为历史材料或者作为历史评论的,其发展情况都可以自然地从中有所了解。因为王应麟是著名学者,所以其有成功之作亦非不可思议,但像高似孙这样名声不好的人也能有如此的认识,尤其应该承认其书所具有的价值。

在《玉海》的附录中有一篇《汉艺文志考证》,将那些见于《汉书・艺文志》而在宋末已不存的书籍,从古书的引用文中予以辑佚,从而反映了当时古书的大体情况。这种编纂方法与《艺文》的目的虽然有所不同,但

是到了清朝却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史略》中也多少存在着这种倾向,曾尝试着汇集了各种《晋书》的逸文、《东观汉记》的逸文,《汉艺文志考证》是完全贯彻了这种主旨,并成为了后世逸书研究的鼻祖。就这一点而言,与王应麟同样的方法在高似孙这里更早就已经意识到了,所以不能不承认其伟大的意义。

十一、《实录》与《起居注》

作为史料,《实录》与《起居注》的写作与构思是很值得注意的。从《玉海》来看,《实录》在六朝的梁朝业已存在,至唐看来已经出现了正式的编纂。但是唐的《实录》又由于当时战乱频仍而多有缺佚。《实录》在宋以后一直不断编纂,直至清朝没有间断,占据着历代史料中最重要的部分。宋的《实录》虽然曾经被认为全部亡佚了,但是近年在中国的内阁文库发现了一部分,基本体例已经明了,与近年的《实录》没有太大差别。《唐书》等史书乃依据《实录》编纂成书的情况虽说是肯定的,怎奈其《本纪》部分在《新唐书》、《旧唐书》中都被省略过甚,所以已经很难从中看出能够反映《实录》情况的材料了。但是韩退之的《顺宗实录》虽仅仅五卷,篇幅不大,却足以反映唐代《实录》的体例了。当然,这一《实录》由于已经加进了韩退之个人的史学义法,所以是否可以说所有《实录》都是这个样子则不清楚。此书虽是每天的日记体,但在记载宰相和其他名人逝世之处,既载以传记概要,也伴随有编年的记载,所以说多少可以视其为纪传的史料。这种体例在现存《明实录》中多少还保留了一些遗风,虽说是编年体,但又不仅限于每天的日记。唐代《实录》的写作方式,看来其中颇有些史官的心得,以及对详略取舍的考虑。宋代《实录》与唐《实录》相比,看来没有什么新的变化。由于《宋史》的编辑很粗糙,反而多少可以从中看出原来《实录》的体例。总之,六朝《实录》的体例虽尚不清楚,但唐《实录》的体例一直延续至最近时期的情况是清楚的。

《起居注》之例自古有之,或有目录将《穆天子传》亦列入其中,可那毕竟应该归入小说类。汉代开始已有《起居注》是很清楚的,武帝的《禁

中起居注》后代还有流传。后汉明帝的《起居注》据说是由他的皇后马皇后亲自书写的，从那时起禁中内部的事情都详记于《起居注》，据说此事归女官职掌，详记宫中之事。《起居注》作为史料当然是重要的，至唐代《起居注》一直都是不给天子看的，但是从宋代开始天子也可以亲见《起居注》了，其作为史料的机能被认为亦随之丧失。总之，由某种官员职掌《起居注》，按照古代理想那样由史官职掌，即按照左史、右史记言行的理想予以实行的情况，在唐代及其以后的情况是较清楚的。在唐代是由起居郎、起居舍人负责书写《起居注》的。有可能起居郎是负责记录行动，起居舍人是记录言论的。由于二者都是微官，当然天子与宰相在朝堂对话时，是不能在近旁记录的，他们只在紫宸殿阶下记录一切。总之，殿上之事姑且可以记录，但朝政结束、百官退朝后，对于天子与宰相之间的特别对话，根据何种方法记录则是有所规定的。唐代的《起居注》固然很优秀，但从现存的《起居注》来看却又难以令人满意。现存《大唐创业起居注》由于是唐高祖成为天子之前的记录，当时未设《起居注》的职掌官，所以并不是按照定法撰写而成的。后来，又出现了《时政记》，这主要是由起居郎、起居舍人在退殿之后记录的。这两种体例的史料虽然都延续到了宋代，但是后来则仅仅流行《时政记》体了，而且随着天子本人可以亲览《起居注》情况的出现，这一体例似乎也不太实行了。其后，至明清时期，记录《起居注》的官职就更是徒有虚名，而无实际职掌了。

大体上说自宋代开始，由于天子权力的扩大，作为史料已经无法写入天子的恶行了。有唐一代由于实行的是贵族政治，官员是有自主的官职权限的，所以《起居注》基本上是记录完整的，但是宋以后就仅仅记录天子之善行。除以上两种体例之外，在唐代还有《贞观政要》，至宋代有《宝训》，至明代仍称为《宝训》，清代则叫做《圣训》，这其中仅仅记录天子发言中好的内容。从这一史料的变化，可以很自然地看出那个时代权力演进的情况。

以上所述是史料的大概种类。史料是不受学者特别思想的影响，自然而然地演进的。但是由于除了元代之外，宋以后直至明、清都没有附加什么特别的成分，所以就史料来看，亦可见史学的自然发展情况是至宋而

止了。

十二、《玉海》与《文献通考》

在宋末的著作中与遥远的后代中国史学联系极为密切者主要有两种,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王应麟的《玉海》。此二书虽然同样被视为类书体,但就其编修目的来看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至后代由此二书而演进生成的史学种类亦完全有别。大体上说,《文献通考》是应那个时代的新生需要出现的一种体例,而《玉海》则是将旧有体例适应当时政治需要而著述的。尽管如此,由于王应麟具有特殊的天才,其书不论在著述精神,还是在体例上都是有所变化的。王应麟的著述不仅《玉海》,就连《困学纪闻》也贯穿有同样的精神。《玉海》是有其辞学上需要的,王应麟是出于这一目的而著述的。这种辞学上的需要起于唐代,唐代以后的类书都是为着辞学而著述的。辞学又称宏词,后来也称为博学宏词,是为天子撰写诏敕所需要的工具书籍,即出于唐朝那种代作内制、外制的需要的产物。但是,与唐代类书那种以辞为主,事实零碎不成脉络的情况相反,《玉海》虽也是类书体的汇集,却具有系统撰著的特点。并且在每章末尾必附加以如何将各章内容应用于辞学的归纳方法,或以词组合为文章的方式。对于辞学的情况,在《四库提要》中亦有提及,从北宋末开始即已将此作为一门考试科目,至南宋则更加兴盛,所以据说南宋学者多有出自辞学者。《玉海》亦是出于这种需要的作品,将世间吉祥、善事予以汇集,其他恶劣之事由于不在需要之列而不予记载。总之,虽说是一种书写诏敕的蓝本,但王应麟的天才在于,即便撰写这类著作亦能将其赋予学问的性质。出于以上目的而形成博学的,他自然地考虑到对经学、史学与其他一切学问进行考证。可以说从王应麟开始考证才具有了学问的形式,而这并非出于当时时代的需要,而是来自于王应麟个人的构想。

《玉海》中还有作为附录的书籍,其中虽说只是些类书,但有些却是已经超出其体例的注入了深刻学问考证的著作。尤其是王应麟在考证方法上很有特色,他汇集了可以探明佚书本来面貌的足够材料,《汉艺文志

考证》就是这样的。此外又如《诗考》，在当时仅残存有《毛诗》，他就将亡佚的三家诗内容从古代材料辑出，使其古代体例得以复苏。对于《周易》郑注也使用过同样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于研究古代是非常必要的方法，也是他颇为自命不凡的方法，可谓不合时代的产物。因此至元明时期这一方法没有继续下去，直至清朝才逐渐施行了起来。清朝一代的考据学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来自王应麟的。不过，说到清朝，初期的考据学源起朱子，乾隆以后则出自王应麟。钱大昕处于敬仰之心，以致撰著有王应麟的年谱。当然，王应麟的方法与清朝学者亦有不同，他并非对研究的项目逐一给出结论，也并非博览众书进行分析后明确得出考证的结论。《玉海》是广泛汇集材料而并不给出结论的方法；《困学纪闻》则相反，并非经过考证，而仅仅简单地提出结论。由于他不直接论事而给出判断，所以读他的书时会感到费解，但清朝人正是从这种暧昧的方法中产生了精密的学问。

《文献通考》的渊源可追溯至杜佑的《通典》，其体例虽亦依据了《通典》，但是其目的又是不同的。《通典》是为掌握当时政治的贵族阶级提供经世策而撰著的，《文献通考》则是为了应用于王安石以来所实行策论考试而撰著的。但是作为出于这种目的的书，虽然由于其杰出的成书而与《玉海》一样都未被列入类书，而是与《通典》一同归入政书（《四库提要》也是同样），但实际上本来是作为类书撰写的。像《文献通考》这种作为考试（决科）用书的，在此稍早些时候已经有《古今源流至论》。在当时此书明显地是为了论策之学（策学）而撰著的，这种体例的书籍在明清时代仍多有撰著。这些书与其说是书写论策的材料，不如说是作为蓝本而撰著的，《通考》并非作为蓝本，而是作为材料成书的，其中有着作者自己的见解，是可以用于策论的著作。所以，认真阅读的人，认为应将此与《通典》一同作为具有经世思想的优秀政书，但也有人认为此书只不过是类书而已。目的当然在于类书，但是作为类书无疑又有着超过其本来目的以上的价值。与《玉海》是出于辞学目的而著述一样，此书应该说是出于策学的目的而撰著的，但是都有着超出其当初目的以上的成果，实乃作者的杰出贡献。

此外,南宋时期虽然出现了许多类书,其撰著目的究竟是为着辞学还是为着策学则不太清楚。其中被认为优秀者有章如愚的《山堂考索》,此外还有《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等。这些书中有时可见一些今日不存书籍的佚文,在这方面是有价值的。大体上是近乎于辞学一类的著作,当时与真正的辞学相比,那些作为兴趣爱好以备检索的坊刻书籍逐渐增多。只有《玉海》、《文献通考》虽然也是类书体,但又是与其有所不同的成功之作。《通考》体例的书籍从明代开始多了起来,并且有益于策学。章学诚也将乾隆时兴起的史学作为一个类别,称其是对马端临一派进行整齐类比的史学,在《读礼通考》、《五礼通考》等书中称其为"整齐类比"一派;称王应麟一派为"考逸搜遗"的史学,并说这两派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期的学者之间很盛行。作为从宋末至元初之宋学最后的杰出著作,不仅限于那个时代,即使对后世也是有其重要影响的。

第十章　元代的史学

一、《宋史》、《辽史》、《金史》的编纂及正统论

元、明时代可以说是正史编纂的衰落时期。元代末年《宋史》、《辽史》、《金史》三史虽皆已修成，但却是非常粗杂的。此三史从顺宗至正三年三月——至正五年十月的短时期内成书，而且是大部头著作，仅《宋史》就有四百余卷，自古以来无有《宋史》这么大部头的正史，这是由编纂官分工撰写的。当然，使用的材料大部分已经成形，仅仅是将这些材料进行改写而已，总之不是对实际记录的编纂，所以才能够如此迅速地成书。

其中《辽史》被认为过于简略，二百余年的历史却不及《隋书》分量的一半。此书是以辽代耶律俨所著《辽史》和金代陈大任的《辽史》为底本撰著的。辽起于夷狄，本是没有历史记录的国家，辽国记载历史是从兴宗时期记载《实录》开始的，此以前的记载都是那时追述的。此后，《实录》经过了一两次编纂。耶律俨《辽史》七十卷的撰著是在辽灭亡之前不久的事，辽代成书的国史仅有此书而已。金代对《辽史》的编纂有过两次修正，第一次修正是在熙宗时期，第二次是在章宗时期，陈大任的《辽史》即这第二次修正的产物。今本《辽史》是根据耶律俨与陈大任书为基础的，并没有特别地汇集其他材料，但那不是因为没有材料。后来至清朝厉鄂著《辽史拾遗》时，为此曾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但是今本《辽史》并没有利用那些材料，由于是短时期内的编纂，加之主要是利用本国撰写的史书等原因，所以没有进行大量材料的考证分析。由于仅凭少量材料勉强编纂，

所以同一材料用于《本纪》,又用于各《表》,如此只不过保持了历史体例的风格。例如《本纪》中屡见有关辽天子游幸的记载。辽代的都城称为“四楼”(东西南北),辽语称之为“捺钵”。按照季节游幸四楼,由此制有《游幸表》。尽管此《表》很不错,但同样的事情两见于《本纪》和《表》,则不免重复。又如,关于部族也是既有《部族表》又有《营卫志》,二者有着相同的内容。又关于属国的贡使,《属国表》与《本纪》都有记载。而且对于极其重要的国号,辽代有时称“大辽”,有时称“大契丹”,可对于这一国号在《辽史》中竟没有记载。又如年号中有“寿昌”,《辽史》却记为“寿隆”。如此种种不拘体例的记载方式,不免粗略过甚。

《金史》被认为是三史中编纂最好的。因为编纂者中有金末元初著名学者、诗人元好问(遗山),此人在金亡之后,不仕元朝,建造“野史亭”编纂史书,此时著有《壬辰杂编》。金末学者刘祁著有《归潜志》,此书据说也成为了《金史》的材料。但是,《金史》的质量并不仅仅在于利用了此二人的著作。金亡时,金都汴京的《实录》由大将张柔携至北京,元遗山曾欲据此编纂金朝史未果,而只好另行编纂。此《实录》据说也成为后来编纂《金史》的材料。本来,金人在金初开始已经重视写史了,金贵族宗翰(女真名为粘罕或粘没喝)已经向本国老人请教,开始记录开国时代的历史,至二代天子金太宗时已经形成了编纂物。其中详细记载了有关金兴起时的部落,即今日满洲地区的情况,例如记载了某部、某水、某乡、某村人等云云。这可能是因为女真人并非游牧民族,而是土著民,所以部落都有详细记录。《金史》看来依据了此书,其中有的地名、部落名记载得非常详细,即使今日对地名进行研究的话,应该也可以证明其大体是正确的吧。《金史》的撰写方式,是将太祖以前的事记为《世纪》,内容一直追溯到了几代之前,是完全的一卷,十分详细,与《辽史》仅仅在《太祖本纪赞》中对太祖以前事迹所做数行记载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应该说这是因为有着太宗时的成书为依据所致。当然《金史·世纪》中的记事是传说的内容,虽然年数不明但内容详细,是可以作为研究材料的。例如女真最初臣属于契丹,后来却灭掉了契丹。这一过程中有着各式各样的阴谋诡计,而且《金史·世纪》对此都能毫无忌讳地直书其事。作为起步于

野蛮国家而后修国史的例子，前有北魏，后有元朝。北魏记载了太祖以前几十代的情况，元朝也将太祖之前十代之事写进了《元史》，在其他书中就追溯得更远了。与《金史》相比较，《魏书》由于修饰过多，已经难以想像北狄之素朴风俗；《元史》则好在另有《元朝秘史》那样用蒙古语所做的质朴记录。《金史》由于是古文写作的，即使多少有所修饰，事实内容还是质朴的记载，在这方面编纂者是予以了相当注意的。即便对后代内容的记述，《金史》也是比较注意记录方式。特别是金世宗，他不但能够注意保存自古以来金朝的记录，而且还借鉴了唐《贞观政要》的做法，采取了即便是天子与宰相之间的密议，也允许记录官本人侍候侧旁的制度。

《宋史》的卷数之多、内容之详是以往正史所无法比拟的，三百余年的历史写了四百余卷。唐朝虽仅比宋朝短四五十年，但卷数却只是《宋史》的一半。本来宋代史料就多是一方面原因，编纂时对史料未曾经过取舍筛选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宋代是历史记述长足发展的时期，此间的记录大量出现，有利用《时政记》、《起居注》编纂的日历，然后又由此形成《实录》，于《实录》之外又做成国史。此书看来是由国史馆编纂的，这种编纂方法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廿二史劄记》对宋代出现的史料有着详细的考证。后来学者对形成于这时期的史料予以了巧妙的编纂，如李焘的《续通鉴长编》中用编年体记载了北宋历史，又如王偁的《东都事略》中将北宋之事予以了正史那种纪传体的记载。以后又陆续有一些类似的著作问世，只有宋末贾似道的时候没有什么太成系统的著作。宋代就像今日中国一样，产生了许多个人传记、碑文、墓志、行状等，致使编纂《宋史》难以处理非常丰裕的材料。将这些相当长的时代、丰富的材料进行分工编纂，而各自的撰写者之间又没有时间做相互对照的研究，以至出现了这部矛盾频出、冗长繁杂的史书。大体说来，《宋史》所据的材料都是对那些宋代已经形成的国史重新进行编纂而成的，所以其中明显可见不妥之处。例如岳飞有部下张宪，此人与岳飞是分传记载的，但是《张宪传》一开头就说“飞爱将也”，这是因为《张宪传》本是《岳飞传》的附传所致。同样是岳飞部下的《牛皋传》的最后不仅牛皋，就连岳飞的功绩也多有记载，这也是因为《牛皋传》本来是附录于《岳飞传》

的，牛皋的功绩记在了最后，一同记载的还有岳飞之功，这样的材料被原样不变地用于分别立传时才产生了这种现象。总之，《宋史》被认为是典型的芜杂史书，直至近代一直遭到非难，甚至有人企图对其重新编纂。

担任以上三史编纂总裁的本来是脱脱，成书时上表的人又是阿鲁图，而真正的编纂总裁是元代学者、文章家欧阳玄，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参加了共同撰著。最初对于撰写三史，在元初就已策划，元世祖时着手编修。关于编修是有种种议论的，出于正统论思想，出现了应该立为三史还是一史的问题。在元初，正当金朝虽已亡，但宋朝尚未亡之时，有个名叫修端的人撰著了一篇关于三国的正统论载于《元文类》（卷四十五）。对于是否应该立辽、金史的问题，修端提出当立的观点，对此他认为可以将辽、金立为“北史”，对于宋朝则立北宋为“宋史”，将南宋另立为“南宋史”。围绕正统的议论在当时看来是有着各种观点的，但是最终宋、辽、金各史独立成书，正统论没能成为气候。后来至明代，柯维骐撰《宋史新编》，将辽、金列入《外国传》，这是出于正统论观点的著作，但是在元代这种思想尚未流行。

关于史料的取舍也是为元代学者所注意的。例如，宋末元初学者、文人袁桷《清容居士集》中有《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此人供职史馆二十年，曾向史官提出已见。他详细陈述了有关宋史的材料，而且说自己是南方人不谙辽金之事，但是由于其先祖代代从事史学，所以对于宋代之事较熟悉。他提出了在使用这些材料时所应注意的问题，其中有些提醒是非常有见地的，例如指出宋《实录》中哪些可信而哪些不可信。指出宋太祖的《实录》有两种，起初一部由于太宗认为有对自己不利于的内容而予以了改写。还指出后来成书的《太祖实录》中太祖企图夺取周幼君权位时，其弟太宗曾有所劝谏的内容在前一部《实录》中是没有的，认为这或许是后来编造的内容。又如太宗的兄弟曾根据其母杜太后的遗言传位给了兄弟，但由于太宗的任性，导致了其弟及太祖之子的自杀，这虽出于赵普的计谋，但在《宋史·赵普列传》中对此却未置一词。李焘《续通鉴长编》虽亦未载此事，但据说他在另外撰著的《赵普传》中记述说：赵普死时，太宗之弟秦王廷美的亡灵显现，与赵普有过激烈的争吵。在李焘名

为《巽岩集》的文集中，说应该就此进行调查。袁桷还详细举出了徽宗、钦宗以后正史以外的杂书、野史可以补充正史不足者的目录。另外他还根据记忆例举了有关宋代各类记事：像有关年表、长编的书、可以用于志的材料的书、碑传行状类一切有关的材料，他注意到了这些材料的参考价值。这些在今日仍然是有使用价值的，对于研究不完整的《宋史》，是有必要参考袁桷所列举各书的。当然，他所列举的书在今天有的已经亡佚，也有尚存的。因此，直至清朝乾隆时期，史家邵晋涵、章学诚尚有重修《宋史》之志，特别是邵晋涵能够清楚地记忆所有的材料。

此外，还有一位稍晚于袁桷的苏天爵，他不但编纂过《元文类》，还有文集《滋溪文稿》，文集中一篇《三史质疑》记述了有关“三史”的评论，是很有价值的论述。欧阳玄为了编纂“三史”而受招聘时，苏天爵曾希望将这些内容直接告诉欧阳玄，但由于欧阳玄繁忙而没有时间，所以只好写出来寄给欧本人。看来欧阳玄对此应该是有所参考的，因为欧阳玄也是文章家，只要有时间的话按说完全可以做出类似评论的，但他却未能做到，实属遗憾。然而编纂“三史”史官的思想，虽说简单但在现存“三史”凡例中还有所体现，其中多少记述了他们所留意的一些地方有：“三史”各自的笔法，以《史记》、《汉书》、《新唐书》为标准的地方，各国称号以《南史》、《北史》为标准的情况等等；此外还记述有关《志》、《表》、《传》的情况。大致方针虽然依据了《新唐书》的方针，但由于没能像《新唐书》那样有充分的时间对史料进行认真的取舍，致使篇幅未能得到适当的控制。

这是官撰的“三史”。但是前述杨维桢的《正统论》则反对分别撰著“三史”，认为应该独立编纂《宋史》。当时已经出现了反对编纂“三史”的论调，柯维骐《宋史新编》就是这种论调的产物。那时正统论很喧嚣，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讲正统论的书，即便对以前的《三国志》在宋元之间也出现有各种著作。宋代萧常、元代郝经都有《续后汉书》之作，是以蜀为汉代后续作为正统的论调。明代谢陛的《季汉书》也是以蜀为正统，这些都是类似的例子。历史编纂的倾向经常是受到那个时代学问流派所支配的。关于“三史”也是，虽然议论编纂“三史”的观点是很平稳、公平的，而后世对“三史”还是议论纷纷。《四库提要》对“三史”的评论是邵晋涵起

草，纪昀订正的，邵晋涵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因为纪昀对《宋史》不满，他的评论就成为了后来史家议论的起点。即《宋史》中除了《儒林传》之外立有《道学传》的问题，立《道学传》伤害了反对宋学的清朝汉学派学者的感情，所以认为这是《宋史》画蛇添足的败笔。对于是否有必要立《道学传》的问题，在《明史》编纂时已经有激烈的讨论了，《明史》最终就没有建立《道学传》。上述情况都从学派门户的主张涉及到各种问题，即便以宋代为正统，也还是出现了应当如何定义正统范围的议论。纪昀认为《宋史》也有妥当的地方，即至宋末德裕帝（后称瀛国公）降元元为正统，那以后的二幼帝不算正统的观点（《宋史新编提要》）。这说明从那时开始已经承认了元朝的正统地位了。总之，学者流派之争是涉及正统论的，元人所著《宋史》当然不承认德裕帝以后的二幼帝，对此后来却得到了清朝汉人学者的称赞，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二、元代的史书及史料

元代由于年代较短，而且蒙古人不太重视文学，所以史学著作也较少。不过，还是有蒙古语的《元朝秘史》即《脱必赤颜》，还有元中叶以后兼叙制度、历史之《经世大典》那样的大型著作。《元朝秘史》的底本是在太宗时编纂的，撰著中采用当时许多古老的传说。《廿二史劄记》中虽认为蒙古人对先代的记载不如金人完善，但那是因为赵翼没有见到《脱必赤颜》，不能说完全没有记载。据说《脱必赤颜》在元仁宗时曾被翻译为《圣武开天记》，此书又被认为即今日尚存的《皇元圣武亲征录》。可是《亲征录》与《秘史》内容相异，尤其是《亲征录》只有太祖一代的内容，仅仅与《秘史》记事的一部分相当，而且与太祖相关的内容又时有相左之处，这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则不太清楚。无论如何，像那珂博士所认为的那样，《秘史》应该就是《脱必赤颜》。本来此书似乎是用出自畏兀文字[1]之蒙古字写成的，现存版都已经将蒙古语表现为汉字了，这恐怕是在明代初

---

① 畏兀文字即维吾尔文字。

年以此书作为蒙古语口译教科书时改写的，畏兀文字的原版书的情况已不得而知。有人认为此书在元代已经用汉字作了音译，而此书的译文也是在元代附上的，但是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其他有关蒙古国语的书也是，因为都与洪武年间成书的是同样体例，无疑是同时做的工作。犹如日本长崎通事①将荷兰语用日语假名书写以便于记忆的做法是同样。《脱必赤颜》仅以记年贯穿，而没有月日的详细记录，但这并不说明蒙古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很疏忽。

还有元初有一位特别不可思议的人物，即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他著有一部《双溪醉隐集》。这个集子现在残留的部分以诗为主也有少量的赋，从中可以看出此人对历史尤其古代地理很有兴趣。可能由于他本人生长于漠北那种汉人罕至环境的原因，在文集中自然有很多关于地理的内容，诗里有着各种关于地理考证的注释。如果有了此人文集的话，这些历史上的考证也就能保存下来了，可惜此文集今已不传。其诗中有一首叫做《涿邪山》的乐府，在他的自注中有《处月说粹》一文，而且注明"处月"即"朱邪"，都来自"涿邪"，予以了绵密的注释。由于此时正值元世祖灭宋之后，一般认为当时宋的史料大多归于元人，由这个集子的内容也可以明显地得到证明。如乐府的《凯歌乐词九首》序的注中所引用史料有：宋《宁宗实录》第四百六十一、《理宗实录》第八十三、《理宗日历》第三百九十五及第百五十一、宋《四朝国史列传》第七十七等，可见当时宋朝国史、实录、日历都送入了北京，所以这些人才得以自由阅读。这是元初的情况，说明他们本是很注意历史的。耶律铸的赋中也可见金朝海陵王、章宗的逸事以及宫室制度等情况。今天残存下来的虽说只是些诗和赋，但又是些颇为有价值的史料，近年在调查和林蒙古人所造万安宫遗址时，此书就成为了重要的材料。

世祖以后，元朝看来也开始用汉文写《实录》了。但是，即便如此，从明初徐一夔在给《元史》编纂者王祎的信中可知：元代既无日历也无起居

① 长崎通事，即江户时代的外语翻译人员。江户时代的日本对外贸易仅限于对中国、朝鲜、荷兰几国，而且只对外开放长崎一港，所以设此外语翻译人员。

注，实录材料是由中书省之时政科的小官吏记录事情，然后送交史馆，而且是代代如此书写《实录》的。一般认为元代本来是缺乏史料的，不过从其他各种实例来看，当时的记录方法十分素朴，与中国自古以来日历、起居注的写法虽说不相吻合，但无论如何每日朝廷当值的大臣与天子的对话，都有用当时的国语照实予以记录的材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世祖以后尤其是元代中叶以后相对来说记录很多，元十三朝《实录》看来也是十分浩瀚的著作。

此外，有一部近乎史料编纂物的《经世大典》。这部书的编纂是当时的一大事业，关系到当时的各种人物，实际上的编纂者是元代第一诗人、文人虞集。此书卷数庞大，几乎有九百卷。此书近日虽已不传，但其中大部分内容都被《元史》采用，《元史》的某些记事仅仅记述到《经世大典》记有年代之处而止，对于其以后则没有任何记载的情况很多。《经世大典》的部分体例可见于《元文类》的“杂著”部，《元文类》中有三卷全都是来自《经世大典》的摘抄。由此可知，此书分为十篇，其中君事四篇、臣事六篇。君事四篇是“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是由蒙古局撰写的。臣事六篇基本是《唐六典》的笔法，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分类撰写的。即“治典（吏）”、“赋典（户）”、“礼典（礼）”、“政典（兵）”、“宪典（刑）”、“工典（工）”六项。从天历二年开始到至顺二年五月完成了草稿。载入《元文类》的虽然大部分只不过是各项目的序文，但也能知道其制度的大概情况。尤其是“政典”是记述军事内容的，对元代有关征伐的记事予以了各种详细的记载。《元文类》是用笔画极细的文字书写的，若用普通字体书写的话，《经世大典》仅载入《元文类》的部分也是一部相当气派的著作。所以后世有人将其中一部分摘出予以了特别的命名，看起来犹如一部专著，即《至元征缅录》和《招捕总录》一类著作。由此可见，不仅现存《经世大典》有着相当的史料价值，这本来就是一部气派的大型著作。从虞集的序文还可以知道，这不仅是制度方面的书籍，而且是为了能在撰著国史以备采用的著述。在实际中应该说也是一部达到了撰著目的的著作，尽管《元史》被认为是粗制滥造的，但其在内容上的整然有序又是与以上材料的存在分不开的。

此外，在元代还有各种法制方面的著作，如有《大元通制》八十八卷，今已不传。其他也是有传有不传的。我们今日可见者有《元典章》，此书原名为《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记载了从世祖中统到仁宗延祐年间的事情，还以《新集至治条例》为题附录了至治年间的内容。其基本采用了吏牍的体例，材料是未经学者文人整理的原始状态，由此可大致看出与元代制度相关的细微部分，在今日来说是很贵重的史料。直至近年还是很受注目的珍本，我在中国时曾经让人抄写了此书，但不久后此书在中国得到了出版。此书是内容全面的著作，还有很多是部分记载元代制度的著作，例如《秘书监志》记载了有关元代著作局的情况，《宪台通纪》记载了有关御史台的情况。有些《经世大典》的残篇也被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予以出版，还有一些没有出版的也都是有关某一方面制度的。

除了以上与官府相关的著作之外，另外还有民间撰著的像随笔一类的著作，即“说部”书籍，其中有如陶宗仪的《辍耕录》。此书大体上是根据耳闻而对元代事情的记录，多少具有些史料的价值。陶宗仪编辑的《说郛》，作为“说部”书籍其中汇集了大量古来的内容，但今日刊行的《说郛》已不是他当年汇集的原貌了，是经过后人擅自删节过的，所以依此已经不明其原来的体例了。原本看来是对古今著作照旧收录，未作太多删节的体例。今版《说郛》中虽没有现存的《皇元圣武亲征录》，但是根据明代写本《说郛》的残本可知此书曾是其中一部分的内容。但是由于《说郛》连内容也被删节过了，所以说与原书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另外，由于元初版图的扩大，当时的旅行家记述了前所未有的大型游记。在现存著作中有长春真人的《西游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刘郁的《西使纪》、张德辉的《塞北纪行》等都记载了从蒙古至西域的事情。这类地理记载上不同以往的著作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关于南方诸岛的记载，当然从宋代开始已经多少有所记载，如赵汝适的《诸蕃志》即这类著作；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则内容尤为丰富。元代还编纂了作为官府书籍的《大元一统志》一千卷的大作，今日也仅残存一部分了。所幸在

《永乐大典》中所载内容被收集进了莫里森文库,[1]由此尚可窥见其体例情况。如此种种大型编纂物的成书,在年数不长的元代可谓相当出色。这些书籍虽然没能全部流传至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其大致情况的。虽说在史学史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瞩目的新见解,无论如何大规模编纂的实现是当时的一个特色。

元代的文集对当时人的碑传行状类多有记载。这类记载从宋代开始已很盛行,由于元代尤为尊尚门阀,所以出现了记载各家的长篇行状,作为文章虽显拙劣,但作为记事材料则是相当有价值的。其中著名者有:虞集的《道园学古录》、袁桷的《清容居士集》、姚燧的《牧庵集》、欧阳玄的《圭斋集》、许有壬的《至正集》、苏天爵的《滋溪文稿》及其所编《元文类》等。当时许多文人的专集今日虽已不存,但在《元文类》中却保留了许多他们的文章,其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有关蒙古人、色目人先祖的记载,对于研究塞外是很有价值的,像欧阳玄的《高昌偰氏家传》则是有关西域土耳其民族家世的重要史料。苏天爵还著有《国朝名臣事略》,此书是从碑传行状中汇集得出当时名士传记材料的著作。以上都是些作为元代史料的重要著述。

① 莫里森文库,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英国记者。生于澳大利亚。泰晤士驻北京特派员,日俄战争时从军。后成为中华民国政治顾问。他在任期间收集的远东文献称为《毛瑞森文库》,现藏于日本东京的东洋文库。

第十一章　明代的史学

一、《元史》的编纂

元亡入明,立刻编纂了《元史》。其着手之迅速虽说是一个特色,却被《四库提要》认为未免过早。而且成书也早,洪武二年开局,同年八月成书。但是由于最后的顺帝一朝史犹不备,而派遣使臣去北京收集材料,于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又用六个月终于完成了《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卷大部头著作。当然,如此着手仓促也造成了作品的粗略,这在当时已有非难,明太祖晚年甚至打算重新进行编纂。当时还出现了有非难《元史》的著作。总之,《元史》被认为是历代正史中最为芜杂的。参与编修的人是以宋濂、王祎为首的当时的许多大家。他们在撰写的凡例中宣称:一是《本纪》,依照两《汉书》体例,事实与言辞并载,兼有《尚书》、《春秋》之义,不取《唐书》那种全仿《春秋》仅述事实的方法。一是《志》,历代史志的方法并不相同。《唐书》之志悉以事实组织成篇,难以从根本上考核。由于《宋史》所志,条分件列,览者易见,所以《志》的编写以《宋史》之《志》为准。一是《表》,以《汉书》、《唐书》各《表》为详,而《三国志》、《五代史》则无之,唯《辽史》、《金史》则不计详略一概记入。《元史》之《表》以《辽史》、《金史》为准。一是《列传》,以历代史为准,无特别之处不予立传。一是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寓意于文章之间,既以《春秋》为准又遵奉圣旨方针。然而,无论如何由于是短时间内的编纂,仅仅只是完成了其框架结构是肯定的。从洪武元

年十二月发出编纂《元史》诏敕开始，其准备迅速的确是惊人的。而且如上述所述，此书是分两次编著而成的，由于二者之间的衔接不够严密，像《列传》中不自然的记载，就反映了两次编纂的痕迹。如《列传》第三十一、三十二中已经记载了元末殉死元廷者的事情，在第三十三以后又从耶律楚材开始写起，这是因为将第二次编修的内容没有很好地进行缀合就予以增添所造成的。如前所述，元代虽有实录，但却没有顺帝一代的实录，况且元代实录也不是根据日历、起居注作成的，所以，本来就有史料不足的无奈，又加之编修时间甚短，以致受到空前的批评。像顾炎武《日知录》就属恶评的代表之作。

《元史》受到攻击的地方很多，例如《赵子昂传》中对碑传行状的材料就有照原始状况使用的痕迹，即连其先祖被赠官也予以记载，实属多余。又如在元代吏牍文中有耿参政、田司徒之类的称呼，记官名于姓之下，而在史书中当记为参政某、司徒某，《元史》却一仍吏牍的文句。又如同一人物的《列传》竟出现了两次，像雪不台与速不台，完者都与完者拔都，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即是，类似的错误相当多。还有，作为蒙古时代特征之一是部族众多，如《辍耕录》中举出的就有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而《元史》对其源流却未作任何考察。更有甚者，《姚燧传》中记载姚燧谈论文章的话时，竟然将问答的语言记反了。这些都是缺点。但是也有优点的一面，如依据了《经世大典》这类出色的材料，又如记载河流利用了郭守敬的记录，又如欧阳玄《河防记》内容详备，也作为了基础材料，以及利用了郭守敬有关天文的记录等等都可说是《元史》的长处。又如地理方面，虽然利用了《元一统志》这样的大型著作，但说不上很好地进行了编辑，但《地理志》所附载的潘昂霄的《河源考》，在今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此书是将朱思本翻译的梵文著述作为注释的。就整体而言《元史》是杂芜的，连天子诏敕也照原始的口语来记载而未作任何改写，以致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故意贬低元代如何粗鄙的恶作剧。不过，正由于这种仅仅作为史料，而不做加工的记录，在今日来说作为史料利用又不能不说是有益的。

二、大规模的编纂物

明代初期尚存元代遗风，盛行编纂大型著作。大体上说，不论元代还是明代，其朝代的推移与文化的推移多少是有其不一致的地方的：虽然改朝换代了，但文化却是一脉相承的。从元代至明代成化、弘治期间，在学问上是朱子之学的全盛时期，而且编纂之风盛行。自宋末《玉海》、《文献通考》以来，元代有《经世大典》的问世，入明以后此风未断。于经学有永乐年间成书的《四书五经大全》，当然，像《大全》这种大型编纂不会是一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不过是对此前成书所进行的补充，而且对其成就亦颇有非难，主要是指责其名为"大全"，实为大不全。无论如何当时是盛行编纂之风的。作为明代的大型编纂物首屈一指的当属《永乐大典》，这是适应当时风气的产物。明代初期的太祖不仅仅是单纯地将中国领土从蒙古人手里收复，在文化上也利用了阿拉伯历法，设置蒙古通译与之交通，又设置四夷馆以交通四方，这类对外交往和扩张在永乐、宣德年间日益兴盛，永乐年间成祖还再次征伐了蒙古。另外，当时还派使者出使西洋，如郑和前往阿拉伯直至非洲，以及陈诚前往中亚地区，这类活动一直持续至宣德年间。总之，大型编纂物也是当时这种气势使之然也。

《永乐大典》的编纂是因为以往按照音韵检索的类书颇为简略，出于企图将其予以扩充的目的，于永乐元年朝廷命解缙等人所编纂的。当时诏敕说：凡书契以来，自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辑于一书，不厌浩繁。当初解缙等人编辑的书命名为《文献大成》，由于不够详备，所以又召集学者重新编修，于永乐五年上奏《重修文献大成》二万二千二百十一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赐名为《永乐大典》附有御制序。参与编修者据说达二千百六十九人。最初有写本一部，其后在嘉靖、隆庆年间又作一部写本，前一部置于文楼，后一部置于翰林院。当然此书也是按照音韵检索的类书，并不单纯是历史的内容。不过其中由于网罗了所有的书籍，所以包含了大部头的史料。此书留存至清朝，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从中收集很多当时已经亡佚的书籍。《武英殿聚

珍版本》主要是这些书。《永乐大典》成书时虽然不过仅仅是一大类书，但是后来有着各种用途，从中辑佚出了各种内容，例如《旧五代史》曾经失传，由此辑出今版百五十卷；《经世大典》亦完全亡佚，也是由此辑出，并对清朝学问影响甚大。此书也像《太平御览》一样本是为了便于天子检索而编修的，但与《太平御览》仅仅收集以往类书相反，《永乐大典》收集的都是原本，这也是此书的一个特色，所以此书的编纂确是一大事业。此书由于被利用来编纂《四库全书》而多有散佚，但据文廷式相告，在北清事变[①]之前尚存八九百册。但是根据《双溪醉隐集》李文田的跋可知，此书从那时起出现了逐渐散逸的倾向，即因北清事变此书就越发散逸，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不过六十余册而已。不过，由于此书从某些方面变换了一下形式，又出现在了康熙的《图书集成》及乾隆的《四库全书》中，所以其书编纂的效果并不能说已经完全泯灭了。

永乐年间另外还有一些大型图书的编纂，除属于经学的《四书五经大全》之外，历史书籍方面有《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其最初的版本已属罕见。此书并非单纯奏议的汇集，还依照《尚书》体例记载了奏议前后的情况。明末张溥另作有略本，但由于仅录奏议的内容而失去了此书最初的本意。英宗时期编纂了模仿《大元一统志》的《大明一统志》，但前者有千卷之多，后者仅是九十卷的小型著作。此外，礼仪、政治方面有《大明集礼》、《大明会典》。《大明集礼》成书于太祖时期，后来有所补正，现存者为嘉靖版。《大明会典》成书于弘治、正德之间，初为百八十卷，明末增补为二百二十八卷，现存者以后者居多。这些也与元《经世大典》相比乃微乎其微之作，可视为宣德以后明代已经丧失元代以来雄大气势的结果。

三、掌故学之一变

通观有明一代的史学，其掌故学问之盛就连清朝学者也是予以承认

① 北清事变即义和团运动。

的。这类书籍至今存留很多，论其种类，从明末焦竑《国史经籍志·纪注时政》项所汇集的明代掌故书籍，可以一目了然；另外，明末朱荃宰的《文通》一书中作为大明史材，也列举了明代掌故书目。不仅仅限于掌故项目，也有关于明代政治、仪礼方面的书目，明末还有很多人将此类书作为丛书出版。如《纪录汇编》就是这种书，又如《国朝典汇》也是以这种类书为人所知的。明代掌故学问之盛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一学问在宋代已经流行，比如有丛书鼻祖之称的《百川学海》中一半以上是宋代掌故的书籍。但是明代的掌故书籍与宋代掌故书籍多少有所不同，明代的掌故带有野史的体例，宋代则真正是朝廷有关故事、仪礼的见闻。所谓野史风格，是指在正式记录之中不仅记入自己直接参予的职务故实，还记述了传闻以及其他新奇事物，有时还有将之编纂成书之风。因此，在明代书籍中哪些是掌故哪些是野史是很难作出区别的，总之野史风格比较浓郁的著作很多。特别是直至嘉靖时期，只要是掌故书籍即多少带有野史的味道，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郑晓的《吾学编》、薛应旂的《宪章录》等，前者有些正史体例的纪传风格，后者则完全编年体书籍。这些是带有野史风格的掌故书籍。而纯粹野史的书则有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此书成书于嘉靖年间，虽说真伪混淆，但由于简便易读而十分流行。后来又有了此书的续纂，同类的书籍当时很多。这种书也在朝鲜及日本出版，流行很广。这类书的种类很多，这里举出的只是明中叶以前的代表作。以上书籍对于我们了解正确的事实虽说并没有什么作用，但却能帮助我们了解哪些是明代人所认为的事实，即便是伪造之事，当时的人们也会相信是真的。这类情况即使在相对准确的书籍《吾学编》中也是可以见到的，此书记载了建文帝事迹，说建文帝虽一度失踪，但后来出现于云南，又回到明朝宫廷，成为僧侣作为老佛修养至死。此事本来真伪不明，郑晓却作为事实予以记载。然而，不论此事之真伪，以此作为当时存在有关明代宫廷的传说则是事实。

掌故之学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宋以后的一大历史变化时期，此一变化倾向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所以说嘉靖至万历之间是史学史上的重要时期。此间的代表人物有王世贞、焦竑等，他们都是促使掌故

之学发生变化的人物。他们将以往风闻本位的记述一变为力求依据正确史料编纂掌故书籍的做法。其中作为第一材料的是《实录》,在明代,实录是在官署中经常让人看的,所以似乎官署中备有几种《实录》的抄本提供阅览。其中有些还附有目录,现在日本内阁文库还收藏有这些目录。当然,《实录》是否就是正确史料,这本身也是有疑问的,特别是由于曾发生过靖难之师,建文时编纂的《太祖实录》在永乐年间不能照用了,因此有所改纂。因而明初的《实录》被认为是不可信的,但是那毕竟只涉及关于革除的内部纠纷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涉及所有实录。《明实录》颇受唐韩退之《顺宗实录》影响,不仅仅是对官报的转载,宰相的死亡,及其传记等也被简略地记录下来,另外对一些事件的始末,也根据需要有所记载,在其编纂中有着作为史家的取舍方法。今日大部分的《明实录》还有所保存,其中明中叶世宗(嘉靖)、穆宗(隆庆)二代的《实录》,据说是万历初年著名宰相张居正时撰著,乃上乘之作。恰恰在这个时期,兴起了王世贞新掌故之学,他将野史风格的掌故之学一变成为了实录本位的掌故之学。他所著《弇州史料》就多是依据《实录》对事实所作的编辑和辩证,是明代掌故学的重要著作。后来,焦竑的《国朝献征录》百二十卷,则是对明代名臣碑传类的汇集,乃明代掌故编纂物的杰出大作。清朝的《碑传集》就是对此书的仿效。此二人乃明代掌故学大家,由于此二人的出现,明代史学才从野史本位转变为实录本位的著作。不用说在当时这种征候尚不十分明显,至清朝编纂《明史》时,《新唐书》以后延续下来的历史编纂方针才最终为之一变。以往修史取材时比起吏牍记录更注重取材于小说逸事,但是自此二人一出,这种以说部为主的著述方针发生了变化,变为了以吏牍、记录为主的风格。至明末,野史的种类多了起来,当时的野史一般主要是以记录为主的作品,留存至今的《皇明从信录》仍是野史风格,但在仅次于其后成书的《两朝从信录》虽然写的是泰昌、天启二代之事,但已经是《实录》的抄录本了。又如还有当时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可说完全就是对吏牍的抄录。又如明末何乔远的《名山藏》,内容是对事件的概括,基本是正史体例,在《明史》问世之前,此书是其代用书。这些基本都是实录风格的书籍,文章虽与实录不同,总之是依据确实记录

撰著的。

以上例举之外,论及政治和研究事实的材料还有明末的邸报(邸抄),这完全是以吏牍为材料的。所谓邸报就是摘引朝廷文书,发给相关部门的官报。其中《京报》从明朝直至清朝光绪末年延续了数百年之久,是世界最古老的报纸之一。邸报在明末已经有了活版,顾炎武的书信中认为邸报在崇祯十一年开始有了活板,在此以前则都是写本(《亭林文集》卷三《与公肃甥书》)。另外,在各官府中根据其需要也编纂像邸报这类的文书,如《礼部志稿》即著名的一种。总之,嘉靖、万历以后兴起的将正确记录编纂成书之风,乃是明代史学上重要现象。

四、李贽的史论

明代史学家中作为阳明学流行的结果,有一位提倡非常极端主张的人物,即李贽(卓吾),这是明末一位过激的思想家。万历时期他是著名的阳明学者,由于本来喜好禅学所以其思想是以禅学为基础,而加以儒学的产物,因此即便对孔子也有着苛刻轻蔑的评语。初时曾为知府官,接受上司辞官的劝告而辞去了此职。因为辞官之前曾像出家人那样削发,因此被建议辞官。一般来说在明末讲学之风很是盛行。所谓讲学不单纯是研究学问的意思,是朱子学派、阳明学派的学者所热衷的行为,是他们在自己门下招揽许多门人,进行学问的问答和讲演的一种学风,这种讲学特别流行于阳明学者之间。李贽则是当时这种讲学中最负盛名的人物。

万历三十年他来到北京附近,曾遭到礼科给事中官张问达的弹劾,从他的弹劾文尤能了解当时的情况。这份弹劾文对李贽虽不免憎恶言词,但从中还是可了解作为过激思想家李贽的大体情形。这份弹劾文的大意是:李贽近又刻《藏书》、《焚书》等书,流行海内,书中多有紊乱古来礼教的言论。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另外,他还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他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中者,一境若狂。又作《观音问》一书,对观音所问作答。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

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恤。迩来缙绅大夫亦有受他感化,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 ,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尊孔子家法,而溺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必招致蛊惑无疑。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李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以上是张问达上奏弹劾文的大意。按照上奏,下达了调查李贽罪行的命令,且令将其书不论既刻未刻一律烧毁。如此,李贽被捕下狱,绝食自杀。但是李贽的著作后来大多流行,不仅遗著得以出版,由于颇为著名,其著作甚至出现有伪书。按照弹劾文来看,信奉其说的都是无聊之辈,也就是说尽是些新女性;其实当时的著名学者也有醉心于其说的。其中如当时以阳明学者而享有硕学盛名的焦竑(弱侯)就推崇李贽为圣人再生,拥戴其为说法教主。焦竑著有《国史经籍志》是对目录学有极大贡献的大作,还著有《国朝献征录》,堪称清朝《碑传集》、《耆献类征》的先驱学者,乃与王世贞并存的史学功臣。也有观点认为,李贽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的观点奇特而受到当权者的信用,人们唯恐遭其攻击,才如此重视他。李贽外出时,犹如大臣一样,带有随从队列,自己乘车,侍者前呼后拥,地方官也对其十分优待。他不仅限于历史书,还批点诸书。由于当时只要说是李卓吾的批点的书,就会大为流行,所以即便实际不是他批点的,书林中也有妄称李卓吾批点以谋利的书籍。在中国像李贽这样的人物时有出现。例如六朝清谈之徒、清朝佛教信徒中的某些人物,都是这类时有出现的过激思想家。

李贽的学术主张大体见于《焚书》,上述《观音问》亦在其中。《焚书》中的《卓吾论略》记述了其学术主张的大略和履历,其写法怪诞,宛如他人所为。甚至有着李贽之死,以及其居于云南等奇妙的记载。而且《续焚书》中有《卓吾遗言》,记述了自己死时当如何埋葬等,其中写有与当时社会秩序相抵触的内容,即与中国重视葬礼习俗完全抵触的内容。其大意为:今春以来我自己患病而厌世,觉得要死了。如果死了如何挖墓穴,墓穴中铺上五领芦席,放上遗骸埋葬,自己能够安心,就是乐土了。遗骸应当按照怎样顺序如何放入墓穴,埋葬遗骸之后再放上芦席五领,盖上

土，其上立碑，嘱焦竑写上“李卓吾先生之墓”。他果然在那一年获罪，按照遗言所述，以芦席埋葬。这虽说是偶然，他的信徒却扬言是其本人的先见。

《藏书》是他写的历史书。此书序文、目录、编纂体例都是有其本人主张的，实为极端之作。所谓《藏书》，搁置于死后之书的意思，虽说决不可示人，但却在生前出版终招致灾祸。此书从战国写至元亡，是纪传体例。而且时有论赞，但并非精彩之论。目录的前面有总论，大意为：迄今咸以孔子《春秋》为历史之是非标准，而人之是非本无定质，自己本当有自己的是非。孔子定是非以来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真正的是非于是消失。是非来自各人的思想，也来自某一个时代。昨日之是也许为今日之非，今日之非可能是后日之是。虽使孔子复生于今日，也不一定以旧日之是非为是非也。《藏书》的意思是，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出于友人的请求方才示人。一任诸君观览，但无以孔子之定本为判断，则善也。这就是总论的大意。

另外，书中有一篇有关天子的《世纪总论》，认为作为天子，汉高祖乃尧以后第一继承人，汉文帝之用柔乃文王囚于羑里以后一人，项羽乃古时与黄帝作对的蚩尤之后的兴霸者，汉武帝乃继黄帝之后开拓国家者。此四人皆千古大圣，不可轻易批评。列传亦有总论，论及列传分类，即第一大臣，第二名臣，第三儒臣，第四武臣，第五贼臣，第六亲臣，第七近臣，第八外臣。外臣类的设置很奇特，是其真心的反映。

看一看《藏书》目录就更能了解他的主张了。他认为当初战国时期虽有七国，但七国之外尚有宋、卫，故列为“九国分争”。因为此时周分为东西，都没有王的资格，所以他都不承认其为王。其次以秦始皇为混一诸侯的“吕秦始皇帝”，将二世皇帝仅以“二世胡亥”附录于始皇，而不承认其为帝。他认为始皇是“千古一帝”，胡亥若不附于始皇则不得传世。其次置“匹夫首倡”，列举了陈王胜。曰：所谓“匹夫首倡”乃古所未有，所以立为一目。其次列项羽为“英雄草创”，列有西楚霸王，认为此乃“千古英雄”，因其未成帝，故书名。此间还以“乘时复国”的标题列举了齐王田横，予以赞赏。列汉高祖以“神圣开基”的标题，并附录以惠帝；又对文帝

题以“明圣继统”,附录以景帝;对武帝标题以“英雄继创”,昭帝为“守成明辟”,宣帝为“守成令主”,将元、成、哀、平附录于宣帝,叹其不足以称帝。对王莽题为“篡弑盗窃”,后汉光武帝为“圣主重兴”,明帝为“守成明辟”,章帝以后各帝均附录于明帝。至三国,则列入“三国兵争”条目。对此以下基本无所褒奖。仅仅对北魏文帝,尽管称北魏为“索头虏”,仍记为“圣主文帝”。另也称北周武帝为“圣主武帝”。不称隋文帝为帝,仅称其为“隋杨坚”,附录以炀帝,称为帝而称杨广,曰:由于胜于胡亥故称其为帝。然后是隋、唐之间的李密、窦建德,因为是杰出人物而立有标题。唐太宗是“英主肇兴”,对其子孙仅仅附录,不设标题。至于五代,给朱温的题目是“篡弑巨盗”,后唐庄宗是“讨逆正位”,于其附录中称明宗为“贤主明宗”, 周世宗虽仅附录于太祖,但称为“圣主柴世宗”。至宋代对太祖、太宗、仁宗皆立有美目,将起用王安石的神宗题为“求治真主”。对元代仅称“元”,立“华夷一统”题目。以上是他在君主褒贬方面的主张。

他还将臣下划分为各类予以褒贬,把大臣分为“因时大臣”、“忍辱大臣”、“结主大臣”、“容人大臣”、“忠诚大臣”等。“因时大臣”中列入汉叔孙通、曹参、丙吉,虽然列入晋的王导实属当然,但在附录中列入了王夷甫则属古怪。“忍辱大臣”中有唐娄师德、狄仁杰。“结主大臣”中有萧何属当然,也列入了公孙弘。“忠诚大臣”有乐毅、蔺相如、诸葛亮等。在名臣方面也很有意思,划分的各类有“强主名臣”、“才力名臣”等,其中有评判为恶人的,“强主”中有商鞅、韩非、申不害、寇准等;“才力”则既有秦的李斯,也有黄霸。“智谋名臣”中有苏秦、张仪、张良等。最奇特的是“外臣”,其中分为四类“时隐”、“身隐”、“心隐”、“吏隐”。所谓“时隐”是真的隐身而不出世人;“身隐”大体与“时隐”一样;“心隐”中有晋的阮籍、刘伶以及李白,这还不算是不可思议;“吏隐”所集人物则属古怪,列入了东方朔、扬雄、胡广、谯周,“吏隐”中他最得意的应该说是冯道。对于冯道虽有着各种议论的,这正反映了卓吾的主张。他这一主张不仅在他生前受到攻击,死后也受到顾炎武《日知录》的攻击。《四库提要》亦云他非圣无法,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尤为罪不容诛。至今犹有尊信不移者。故特存其目,以深报其罪焉。死后还出有《说书》

和《续藏书》等书，然而最出人意料的还是《焚书》和《藏书》，乃旷古未有之过激思想史论。

五、杨慎的学问

明代学者在阳明学派之外，有一位激烈反对朱子学的有名学者，即杨慎（升庵）。此人非常博识且具有辩驳之才，他与遍猎学问所有方面的王应麟很相似。他之所以反对朱子，似乎多少有些地域性关系。他是蜀人，而蜀是苏东坡的故乡，由于朱子不喜欢苏东坡，所以他在各方面自然地就反对朱子，而这又进而影响到他对宋代学者文人产生了反感。因此他有着推翻一切旧说，提出新论，而且很善于为此提出证据的特点，其重视考证的特点在明代可谓是唯一的学者。但是有时他的博识也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证据，以至有人认为他是伪造证据而予以质疑。其著作在《杨升庵全集》和《外集》之外，还有《丹铅总录》等，其中考证以及日本所说的随笔一类著作，在《全集》、《外集》、《丹铅总录》之间有重复。最初他将考证类收入了《总录》，后来又载入了《全集》，进而由于散见于诸书不便阅读，后人又将其考证类汇总出版了《外集》，如此就造成了重复。此人的学问不仅限于历史，亦精通经学及小学。特别是在小学方面，他是明代音韵研究的鼻祖，从他注重古韵开始，明代才出现了音韵学研究者。由于博识，他读过许多说部书籍，其著述的大部分也都是相当于说部的内容，是他将宋代以来的说部著作多少予以了学问上的汇总。

他还有些直接有关史学的观点，例如《新唐书》、《旧唐书》的比较就是其重要的观点，他是最早提出《旧唐书》优于《新唐书》观点的人。他认为《新唐书》由宋代著名文人编纂，却不如在文章方面无名之辈所著的《旧唐书》，作为证据举出了玄宗宰相姚崇十事为例，将双方文章并列进行了比较。另外，对于《宋史》他指出此书由于是众手编纂而成，所以有着很多矛盾之处。又说：众手编纂的史书虽始于《东观汉记》，但从《宋史》开始这成为了一种普通的编纂法则令人叹息。关于野史不可信的观点，他在嘉靖年间已有论及，也许比王世贞更早。杨慎不信野史不仅限于

明代著作，而是认为自古以来的野史对人多有诽谤，不足为信。对明代著作则明确地举出书名和事实指出野史不足信。他举出的例证有《孤树裒谈》、《灼艾集》、《皇明通纪》等。这些看法都是当时人所没能充分考虑的，而他却能够予以注意则属难能可贵。

此人很注重小学，又因为注意金石文字，所以对石鼓文也有研究。他虽然没有太多的金石研究，但是努力从难处入手研究那些人所不知的内容。这诚然是优点，但他对与石鼓文齐名的伪作，所谓由禹所建立的《岣嵝碑》也做释文则属多余。有人认为《岣嵝碑》是杨慎的伪作，但是此碑无疑在他以前已经存在了。另外他还很注意汉以来的石经，曾著有简单的《石经考》。

此人在史学方面一直予以关心的两部书是《文心雕龙》和《史通》。不过这种重视并不起于杨慎，宋代黄山谷曾说：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此二书不可不看。杨慎实际上对此二书究竟有多少研究虽然不太清楚，但至少可知从这时起，重视这两本书已经是一种风气了。除了他之外也还有重视此二书的学者，有一位稍早于杨慎，但大体在时代上是相衔接的人物陆深。此人的《俨山外集》是对其杂著的汇集，其中有《史通会要》。不过这也是仅有三卷简单的著作，而且没有什么著述手法，有些地方就是单纯对《史通》的引用而已，有些内容还继《史通》之后有所增加，看来是一些自己的备忘录。总之，很明显此书具有由《史通》了解史学要领，继续史学批评的观点。至于《文心雕龙》，万历以后出了杨慎的评点本。万历以后原本就是评点本流行的时代，李卓吾从某种意义说也是评点的专家。杨慎对《文心雕龙》的评点本可以说是开明代评点本风气的著作，只可惜此书是否为他的著作仍是个不明确的问题。无论如何，从那时起研究《文心雕龙》的人多了起来，而且治《文心雕龙》的学者又必然研究《史通》也是常事。而将二书一并研究的奠基人则是王惟俭。当然，王惟俭之前已经有过研究《史通》的出版物，今日仍屡有所见的有郭孔延、李维桢合作的《史通评释》，由此书开始了对《史通》的订误，然而由于王惟俭与此书意见相左，所以另为开端，这在王惟俭的书中是可以看得出的。王惟俭也是有感于黄山谷所言，先由《文心雕龙》开始进而研究了

《史通》,著有《文心雕龙训诂》与《史通训诂》。这些都是万历年间人。此外,于《史通》还有明末著名的陈继儒(眉公)的《史通注》二十卷。日本内阁文库有此书,我本人尚未见到。

从这些人的方法来看,是有些不同于明代治学方法倾向的。一般来说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是盛行评点风气的,作者争相评点自己喜欢的著作,但是王惟俭却不同于此。他认为以往学者作注的书中最为善者,在经书之外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刘孝标的《世说注》最为著名,说自己虽无法将此二书更加详备,但也要用心去作,于是不作评点专心列举出典。这在明末学者来说是很罕见的。他的训诂一出,直至清朝凡对此二书的训诂无不以其为基础。同时,《文心雕龙》则以杨慎评点本为流行,二者相得益彰。而就他的评点本而言,大体上说其注释毕竟是以王氏的《文心雕龙训诂》为据而成的。此二书的研究对后来清朝史学史是有其影响的,虽说这并非杨慎一人之力所为,而是有其机遇可言的,由于博识之士杨慎的重视,进而使研究得以兴盛则是肯定的。

接受这种影响在明末出现了一部奇妙的著作,即朱荃宰的《文通》。虽然有着与《史通》很相似的名字,但其体例则基本是《文心雕龙》体。这虽不能说是上乘的著述,但作为杂录则又是首尾完整的。书中有时完全是引用别人的文章,也有自己创作的优秀文章,体例虽嫌驳杂却能够注重史学内容,详细列举了哪些可以作为明代史料的书目,于史书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著作。作者无疑是位博识之士,而就作品而言则是一部结构并不十分严谨、有缺陷的著作。

就杨慎的研究方法而言,在其他方面对清朝学问有所影响的还有其重视诸子的一方面。他对古书很有鉴别能力,他既有对文章类似性的概括能力,又极有学术上的眼力,就《关尹子》、《鬻子》二书,他将古书中引用的内容与现存版书进行比较,提出了现存版不可信的观点。可以说是他将当时史学研究法推向了兴盛。总的来看,此人所采用的方法,可以说是顾炎武那样杰出学者的先驱,此人不再像宋代学者的那种单纯地读古书记杂录,而是能够做到在考证之后经过归纳的思考,这种研究倾向于此人已见端倪。

六、归有光的《史记》评点

一方面,这一时代流行的评点,虽说并没有学术价值,却一直盛行至于后代。顾炎武在批判李卓吾的同时,还批评了钟惺,这个钟惺就是明代的评点家。其方法是极其轻薄的,虽然对文章本身都不能十分读懂,但一见到有趣的文字就予以评点,为了引起他人的兴趣,大多予以了出版。钟惺著有《诗归》,是非常流行的著作。这些人都是称杨慎为鼻祖的。杨慎对《文心雕龙》、《史通》虽然只是有着很少的著述,但是从《升庵集》的序文可见,他对于《山海经》和《水经注》,已经着手研究了。钟惺对这些书籍进行了评点,对《水经注》这种地理学名著做了无益的评点,出版有文字游戏那样的作品。但是杨慎不仅于《文心雕龙》、《史通》,同时还重视《山海经》、《水经注》,所以直至清朝形成了读《文心雕龙》、《史通》者,必读其余二书的风气。杨慎虽说没有什么明确而有系统的观点,但确实制造了以此人为中心的学风。即在对古书进行缜密研究的同时,又有以兴趣本位而读古书的风气。这些都对清朝学风有着不小的影响。

其次,就评点而言,在钟惺一派轻薄方法之外,稍有深刻意义而且对清朝古文学派有奠基之功者是归有光(震川),他评点了《史记》。归有光是与王世贞同时代的文人,与王世贞所谓古文即必须是用秦汉时代古语进行的写作主张有所不同,他主张唐宋八家特别是欧阳修、曾巩的古文写作方法。后来他成为了清朝所谓桐城派古文家所祖述的鼻祖。他的《史记》评点不单在古文即文章的研究上,而且在史学观点上得到了继承。即桐城派学者祖述此人所称为的文章义法,考虑了如何将文章笔法与史学笔法缜密结合的方法。在归有光的著作中虽说尚未明确地提出这一主张,但这种方法是原本来自于此人的观点则是肯定的。归有光的思想是极为稳健的,既没有李卓吾那种破除以往一切的过激思想,又没有钟惺那种一切从兴趣出发而无视义理的做法,是以学问为根底的主张。所以清朝的古文家与朱子学是有其相互联系的。

七、胡应麟的《笔丛》

此外，明末王世贞一派还有胡应麟。从王世贞时代开始很流行“七才子”的称呼，胡应麟是后来的“七才子”之一。[①] “七才子”中除了王世贞之外，像胡应麟这样博览而留下杰出著述者没有第二个人了。他的著述称为《少室山房笔丛》，这是一部贯通经史子集道佛说部，网罗所有部类，总是尝试着撰写饶有兴味的短评，颇能收集趣味逸事的著作，虽然没有像杨慎那样的学术考证，却是多有深刻见解的。《笔丛》中关于史学的内容有《史书占毕》，专写史评。分为内篇、外篇、冗篇、杂篇。内篇是历史的总评，其他各篇是有关历史事实并附加自己观点的评论。但是由于是出自文人的见解，行文中多使用有警句。例如使用“《春秋》以字褒贬，《左传》以词褒贬，马、班以事褒贬”一类的表达。又如“《尚书》、《春秋》圣人之史也，《檀弓》、《左传》贤人之史也，《史记》、《汉书》文人之史也，《后汉》、《宋书》乱人之史也，《三国》、《元魏》小人之史也，《赵宋》、《辽》、《金》夷人之史也”等评论。然而，徒有大量警句，作为史评则多无价值。大体上，作为史书的笔法他厌恶繁杂，推崇简洁。例如有着褒奖李延寿《南史》、《北史》和《新唐书》、《新五代史》，而卑视《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倾向。另外，他认为对《史记》、《汉书》的议论自古有之，魏晋以后多褒班固，唐代从韩柳开始褒司马迁，宋代郑樵、刘辰翁（会孟）也将马、班进行比较，但其褒贬皆不足为信。他还认为唐以前史学乃专门之学，由于是以一人观点进行的汇集，所以有好的作品；但是唐以后由于成为了多数人的共同编纂，实为不宜。他还对《史通》有着比较详细的评论，曾说出见《史通》批评历史之处，可知《史通》作者并非治史之人那样的警句。还说《史通》之文与《文心雕龙》的著者刘勰相似，其文之美不及；其见识与王充《论衡》相似，且其轻率诽谤人物方面又过于《论衡》。

---

① 明有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以李、何为代表。后七子是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以李、王为代表。胡应麟不在“七子”之列。此或为作者误记。——编者注

胡应麟认为《史通》攻击他人虽多是针对其短处,但攻击的对象主要是文义粗浅、体例简陋等。这些虽说都是很简单的评语,但还是可以看出胡应麟思想的。总之,轻视文义、体例,重视文章的巧拙,具有"七才子"轻薄学问的色彩。大体上说,《笔丛》是博览众书而后下笔的作品,对于开阔视野很有意义,在学问上来说并无很大的价值。代表了看重细微末节的明末风气。此书在日本也是刺激着徂徕①以后学者的流行著作。

八、正 统 论

明代的正统论有明初方孝孺的《释统》三篇、《后正统论》。此人不满朱子《通鉴纲目》而另发议论,提出"正统"与"变统"。其正统指三代、汉、唐、宋,变统指晋、宋、齐、梁。夷狄、女后不列入其中,就连有治的苻坚和有才的武氏也未列入二统。按照他的这种笔法,对于正统君主建立之时代要大书其国号、谥号、纪年号,其后宫要书皇后,其太子要书皇太子。非正统时代只书甲子,其下分注某帝某元年予以区别。这是因为明朝是驱逐夷狄出身之元朝而统一天下的,所以才有了如此排除夷狄的论述。以上是《释统》的基本主张。《后正统论》中主张正统之名应当基于《春秋》,而《春秋》是讲攘夷的,所以像元代即便统治了百年之久亦当排除之。杨慎对此也著有《广正统论》,大体上赞同方孝孺观点,认为夷狄入主是由篡弑而成为天子的,也同意摒弃女主的观点,主张即使由此出现统绪中绝但也无妨。还特别非难了王通以北魏为正统的观点。对于方孝孺正统之说起于《春秋》的说法,他补充说《易传》已有此说,认为所谓伏羲氏没神农作,神农没黄帝氏作,黄帝既没尧舜氏作即正统论。又说万代之统犹如一代之宗,古时对天子附以"宗"字的情况仅限于一个朝代中那些优秀的君主,就像殷代称宗者不过三人,前汉也只有三人。而与唐以来皆称宗一样,国统论出现了混乱,夷狄、篡杀、女主才被列入了统绪。还说国

---

① 徂徕,即荻生徂徕(1666—1728),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思想家、文献学者。本名双松,字茂卿,号徂徕(一说徂来)。本姓为物部氏,其父为幕府将军德川纲吉侍医。对日本朱子学派观点的古典解释采取批判态度,确立了作为古代中国古典读解方法论的古文辞学(萱园学派)。

统如同道统，道统不得轻易授于人的话，国统又何尝不是如此。明代正统论主要就是这些。

九、王光鲁的沿革地图

其次简单谈谈明代的地理、地图，特别是沿革地理、沿革地图的有关情况。就普通地图而言，除了在明代仍在使用的元代朱思本的地图之外，没有太多特别之处，此不赘言。沿革地理、沿革地图在明末出现了独创的形式，即王光鲁的《阅史约书》。此书可见两种版本，日本翻刻的是初版，乃明末崇祯七年版；初版本后来又有增补，于崇祯十六年附以王光鲁的序而予以再版。此书的特点在于使用了套板（二重版），创造了现代地名套红色，古代地名用墨的印刷方法。书籍使用套板是从万历年间湖州即吴兴地方的闵氏、凌氏的刻板开始的，称为朱墨套板，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沿革地图的是《阅史约书》。此书的初版与二版有很大不同，初版沿革图十七幅，二版增补至三十五幅。以此书为基础，在清朝由李兆洛设计，其门人六严制作成朱墨套板沿革地图，近时杨守敬的沿革图也引进了其系统。不过，在此以前也并非没有沿革图。南宋时曾有过《历代地理指掌图》，但由于古地名与今地名都是墨字而难以区分，朱墨两色分明易辨的最早沿革地图是《阅史约书》。

这本《阅史约书》中还有一部《地理直音》。这是一部历代地理的沿革对照，按时代划分为“秦地理直音”、“汉地理直音”，举出当时地名，在其下注以今日府县。后来这也成为李兆洛制作《地理志韵编》的范本。二者的不同仅在于李氏是以韵别，王氏是以代别。在《阅史约书》初版本目录的末尾列有《虏名备忘录》，虽是嗣刻但再版本是作为《元史备忘录》出现的。由此观之，再版本的成书虽在王光鲁序文中所记之崇祯十六年，出版看来应该是在进入清朝之后的事。因为清初忌讳夷、虏一类用语所以将“虏名”改为了“元史”。王光鲁之甥的跋中说二版未成之前王光鲁已死，由此推知进入清朝之后才出了二版。《阅史约书》中另外还制有历代系谱、职官沿革表等，宛如后代清朝出版的《历代职官表》的简明本。

可见此人对历史抱有各方面的兴趣,其名声虽说从不显赫,但是他留下的工作,久后成为了史家的范本。

王光鲁的沿革地图还几乎未加改变地出了一种盗版,即一本叫做《纲鉴历朝捷录》的考试用书的俗本中收录的沿革地图。此书虽然题为名人黄道周的增补版,但那时书肆中借黄道周名字出版的书很多,此书大概也属于这一类,很可能是福建的书肆制作的。此书中的沿革图是在《阅史约书》的初版中加入《明一统图》而成。但是在朱板的原图中,搞乱了王光鲁的地图以现代地名为基础的方法,而像《历代地理指掌图》那样以古地名为本,拟定历代地名,最后将《大明一统图》也以朱墨板形式加了进去。由此可见,这一定是那些不懂沿革图本意的书肆之妄作。此书大致出版于清朝顺治二年,当时王光鲁二版是否已经流传虽不太清楚,想来应该是对初版本的盗版。书尾附载有《中兴伟略》,由于这是有关北京明朝亡后,南京福王弘光帝、福建唐王隆武帝政权的记载,所以由此可知此文必为不晓北方事情之南方人所作。但是,无论如何由此可知,王光鲁的《阅史约书》很是流行,就连福建的书肆也将其制作了盗版。

十、焦竑的目录学

另外,有关明代史学值得注意的还有目录学,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属此类著作。此书在日本也有古版。焦竑乃万历年间以博学知名的学者,此人受命编修国史,曾撰写《经籍志》而未完成,稿本则作为《国史经籍志》留了下来。此《国史经籍志》作为目录学乃郑樵以来值得注目的著述。此书有很多优点,《四库提要》虽仅仅攻击此书的缺点,但那是因为此书尚未完成所致。《提要》说:此书抄录古时旧书目,滥载当时存逸不明的书籍,如此扰乱目录之例,古来目录书中惟是书最不足凭。然而,单纯依据以往所有目录制作目录,不考虑书之存亡的做法并不始于焦氏,自《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即已如此。当然这并非优点,但是将目录学上的不谨慎全部归罪于焦竑是不对的。此书的优点在于复兴了以《隋书·经籍志》为终结,自《旧唐书》以来所断绝之各部类之序(总说)。

又如此书作为附录写有《纠缪》，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唐四库书目》、《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郑樵《艺文略》、《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之分类的缺点有所指摘，并写出了他的新分类，可以说是对郑樵《校雠略》的继承之作。

书中各部类的总说中往往有着值得注目的见识。例如对于《尚书》伪古文的议论，他采纳了元代吴澄的观点反对伪古文，同时他还写入赵子昂、归熙浦(有光)的赞成观点，对朱子以来的观点表示赞成。对于《周礼》他也明确提出了意见。古来的观点认为《周礼》本当分为六官，由于其中冬官内容亡佚，所以用《考工记》补足。但是对此宋以来有所异议，宋代俞庭椿著有《周礼复古篇》，认为并非《周礼》有缺文，而是有错简而已，即《周礼》每一官本应该都有六十个属官，然而今本《周礼》中的属官数字是：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若将六十以上的余数抽出来加给冬官的话，就不能以冬官为不足了。这一观点在宋代已相当流行，至明代也颇为盛行。《国史经籍志》也是赞成《复古篇》中这一观点的。此观点后来在清朝虽受到学者非常强烈的反对，但无论如何在当时赞成者是很多的。就其他方面来说，他还论及谱系的问题，也注意到了六朝以来直至唐代门第强盛的问题，论及了簿录即目录的情况，关于老释二家书籍亡佚较少的原因，他归结为此类书籍分类讲究，而且世代予以重视和保护。还说对于古今的目录郑樵虽有过严厉的论述，自己也另外著有《纠缪》予以了论述。他对复兴目录学的考虑，从他的论述中是可以看到的。

其次，在对道家的总论中，此人也有值得注意的见识。他认为，道家原本以清静无为为主，而且原来并没有炼养服食之类，后来才出现了炼养之说；而对炼养的提倡本与清静无为之说无关；后来又出现服食之说，这与炼养说也无关；又到后来出现了对符录的唱导，这与炼养服食亦无关系；再到后来发展至于倡导经典科教，已经完全不是当初的道家之说了，又发展为不问炼养服食，以至诸说皆归于了道家。这是非常精到的论述，《四库提要》的道家总论基本采纳了他的这一意见。对于释家他持宽大的态度，没有排斥的观点。他认为释家本来的思想与儒家无异，儒家本身

因无后继而失其所传以后，仅仅拘泥于形器见闻，对于超出此以上的妙理皆作为异端之说予以排斥，所以也排斥释家。但是今日寺院、佛经遍天下，无法将其灭亡，故而采录其书籍。焦竑与李卓吾一样是不排斥佛教的人物。

总之，可以说此书复兴了宋以来的目录学，这是清朝《四库提要》的所本，《四库提要》是以此书和《崇文总目》为基础构思形成的。

十一、金 石 书

在金石方面有杨慎所著《金石古文》。论明代研究金石者，虽说杨慎是不可忽视的人物，但另外在金石研究上有特别著述的著名学者还有两三人。首先是都穆的《金薤琳琅》二十卷，此书在金石学者最为贫弱的明代来说是相当杰出的著作了。此书笔法仿效宋代洪适《隶释》、《隶续》的方法，收录了所有碑文，并写出了自己的见解。与《隶释》、《隶续》有重复之处，或许是仅靠读此二书，而没有依据当时新出拓本的缘故吧，但无论如何这是明代最完备的金石著作。

还有仅著部分内容的著作，如赵崡的《石墨镌华》，是收集关中即陕西地方碑文的著作。此书并未载碑的原文，仅仅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四库提要》也说此人注重的是书法方面，没太注意金石作为历史考证基础的问题。之所以未载碑的本文，据作者本人说是出于财力不足的原因，《四库提要》说，其所载古碑数量不多，由其为乡下贫乏学者，故应当谅解。在基本不载原文的情况下，也偶尔载有原文。如由女真大字书写的《金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和以八思巴文字书写的《元蒙古字碑》，著录金元文字碑者这还是第一次。看得出著者对此有着相当的兴趣，连碑文的汉字部分也一同记载了下来。特别是蒙古字的碑他说虽有五六种，但作为标本仅举出一种。可笑的是，蒙古字虽也是纵读，但著者却把本应从左向右读的内容，从右向左读而逆着书写了，且不留行间距地书写也造成了混乱，不过文字本身还是比较忠实地记了下来。

另外，还有与他出身于同一地的郭宗昌所著《金石史》。此书不但所

著录的金石数量不如《石墨镌华》，而且也谈不上是有功力的著作，但是在明代少有的金石书中又的确是无法舍弃的著作。总之，明代的金石研究尚未形成真正的学问，只不过是从宋朝到清朝之间的衔接而已。

十二、经世文的编辑

除以上所述之外，明代著作方面与清朝学术相关的还有大量对政治文章的编辑。永乐年间已有《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的敕撰，汇集了历代的奏议类文章。从那以后明代名臣奏议数量越发庞大，而且多收载于个人文集中，至明末这些文章还汇编成了总集体例的《皇明经济文辑》、《皇明经济文录》，最后形成了《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卷。此书日本内阁存有一部。此《皇明经世文编》虽由陈子龙等四人编辑，也可以视为以陈氏为代表的作品。此书因为是根据个人文集网罗的有明一代奏议、论文，尤其是当时正值明末清人崛起之际，所以有关于明、清二者关系方面的正确材料，作为史料来说也是相当有分量的。清朝还效仿此书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不仅抄录于个人的文集，还下功夫进行了分门别类，虽然编辑体例有所进步，但是就其收录范围广泛以及作为史料的优点来说，则不及《皇明经世文编》。这些都是在明代将文章作为史料予以汇集的代表性著作。

十三、类　　书

最后，明代的类书中也有很值得注意的著作，其中包括来自唐以来的辞学和宋以后的策学这两部分。来自辞学，且可以称得上名著的是陈耀文的《天中记》。此书说起来作为类书是有其明显根据的，但是作为明代史学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与清朝的类书相比，其引用部分更加可靠而已。来自策学的著作以章潢的《图书编》最为著名。万历时期随着讲学之风的盛行，既有谈性命空理的人，也有注重经世实用学问，致力于策学材料著作的人，章潢即其代表者。这些人并非单纯地从以往文献中收集

材料而分门别类，还建立出系统，自然地编纂为著作，所以他们在书中加进自己的意见，有着可以说已经形成为著作的倾向。其中最成功的可以说是《图书编》。当时与此书并称的还有王圻的《三才图会》，王圻还著有《续文献通考》。《四库提要》认为，《三才图会》在今日来看虽有其有益的一面，但从经世实用的角度来看记载了一些并非重要的娱乐性的内容，在这一点上说《图书编》无论在材料的选择还是编纂方法上都略胜一筹。这些明代类书的代表作，后来还成为了顾炎武《日知录》的前驱。一方面是杨升庵的考证之风，一方面就是这里所说的经世实用类书的编辑方法，这两方面都是清朝考证学得以形成的动力。

其次，还有一部可以称为类书的一种，且在后世很实用的书籍，即凌迪知《万姓统谱》这样的人名词典。有关姓氏的书自唐代《元和姓纂》以来逐渐出现，宋元之际这种书成为俗书。元代的《排韵氏族大全》完全就是一本俗书，是无法作为学问之根据的。《万姓统谱》人名词典的撰著则可以作为《元和姓纂》接替性著作，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但是，《元和姓纂》是宣传族望的书，宋以来这种意思淡薄了，至《万姓统谱》则已经成为一部个人索引了，不再具有族望的意思，而且也脱离了与系谱的关系。这实际上表现出中国已经脱离族望而形成个人形态社会的情况。《万姓统谱》在日本也是一部非常实用的书籍。

第十二章　清朝的史学

一、《明史》的编纂

清初实施的一大事业是《明史》的编纂。明亡，清人入北京后虽很快就意识到了编纂《明史》一事，但实际着手则是在康熙十八年，从那时起至乾隆年间此书的完成共用了六十年之久。历代正史编纂中，与《元史》耗时最短相反此书费时最长。而与宋、辽、金、元各史相比，此书被认为质量最高。近年清朝灭亡，为了编纂清朝史，作为参考，有人还收集了编纂《明史》时各位学者的意见书，汇集成了《明史例案》。由此书可知编纂《明史》时的各种议论。当初康熙帝器重的学者徐乾学撰有《修史条议》六十一条凡例，这无疑是有关编纂《明史》的有力意见。此外撰著《明史》最初稿本《明史稿》的王鸿绪的《史例议》中也载有撰写《明史稿》期间的议论，这是实际中出现的意见。《明史》编纂开始时，最有力的意见书，且成为喧哗一时问题的，是有名的朱彝尊的意见书，就是上书明史馆总裁的第一至第七书。从那时起直至《明史》的最后成书，又有著名的全祖望意见书，也是很有分量的。在如此众多的意见下，《明史》的编纂得以完成。

大体而言，《明史》编纂之前议论的几个中心问题之中，从王鸿绪《史例议》中涉及的问题来看，最主要的有：（一）正史编纂是否应该按照《通鉴纲目》笔法撰写的问题。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倾向于认为正史无须按照《纲目》笔法的意见，即《通鉴纲目》仅是朱子一家之书，而非史家之书。史家之书是以承继前代以来史料，予以笔削为任务的，而朱子《纲目》则是在史书成书后加以赏罚评价的撰述，所以基本方针是不同的。另外，虽

然有意见认为正史的本纪不妨使用《纲目》体撰写，但本纪毕竟仅仅记载一个时代天子之事，并非对一时代所有事情的记载，一时代之事应该在志、传中去写。如此分开撰写乃纪传体笔法，《纲目》则将一个时代之事全都记入，并且是以褒贬为主的。另外，《纲目》的主旨在于阐明正统，然而普通的正史应当是以一个时代的天子为中心的记载，是考虑那一时代的实际而撰写的，而不是像《纲目》那样以正统论为主的著述。例如《史记》将项羽载入了《本纪》，《汉书》则列入了《列传》。可见，正史不应当是像《纲目》那样以正统为本的撰著。这是王鸿绪的意见。这类意见出现于《明史稿》时期是值得注意的，这是史学逐渐从宋学支配倾向得以解脱的证据。

当然，有关这一点朱彝尊更加明白地提出了反对宋学的意见。朱彝尊的意见中明显被采用的，即（二）不立《道学传》的问题。这在当时是颇为轰动的问题。这一议论的影响虽然关系到了后来汉学的勃兴，但是就当时学者的认识来说，并非完全出自尊重汉学的意图。不过，朱彝尊著有《经义考》，是意欲打破宋学那种偏狭学问的，当然，他有尊重汉学之意，但就其他人而言，不立《道学传》的意见往往是出于尊崇阳明学所发的议论。如同当时有名的汤斌一样，他反对设立《道学传》，提出意见认为，如果立此传的话，可以将其中的阳明学者与朱子学者分别记载。结果由于当时多数人认为不可专为朱子学立《道学传》，所以未立《道学传》，决定将其都合并于《儒林传》之中。另外，作为朱彝尊、王鸿绪二人的共同意见，同时又是《明史》编纂的一个方针，即（三）摒弃野史材料，采用实录材料。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逊国、建文革除之事。建文帝被燕王逐出之后，去向不明，一时间被认为已经死去，然而三四十年之后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其实建文帝已返回宫中并死在那里。出于当时的风气人们都有相信此说法的倾向，例如认为即便野史类中也有记事较为确实的郑晓的《吾学篇》、《今言》也采用了这一说法。然而朱彝尊、王鸿绪却极言此事不可能是事实。由此出现了关于建文革除的议论，即虽然有成祖即位时除去了建文一代，废止其年号等的说法，但是《明史》的编者予以反对，认为建文革除并非事实。这虽说仅仅是建文之事，却可以证明《明史》有着主张史

料以实录为本位的倾向，这在历史的主张上与以往有着显著的变化。大体而言，自从北宋以来大力提倡古文，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开始，无论《宋史》还是司马温公《通鉴》，均采用野史小说，喜欢将史书赋予趣味性的色彩。然而从明中叶起，杨慎、王世贞等提出对明代史料的意见，作为其议论变化的结果体现在《明史》，就出现《明史》取材于正式官府记录的情况。此时，由于顾炎武与史馆无关，所以没有他的大篇幅意见书，但是他曾说，编纂《明史》用《旧唐书》笔法为宜，即编纂出正确的史料，给后人留下研究资料，让后人去撰写(《与公肃甥书》)。但是这一议论没有得到彻底实行，《明史》还是仿效《新唐书》编纂的史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多少可以从中看到当时史论的倾向。

以上是着手编纂《明史》阶段出现的意见，而在成书之后的意见则是以全祖望最为典型。他的主要意见即(四)关于《艺文志》的意见。王鸿绪撰《明史》草稿时仅作成了明代书籍的目录。然而以往《艺文志》的成例都是将古来所有书籍全部列出的，所以全祖望对王氏稿本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如此，他的意见最终未被采纳。

就《明史》的撰写而言，最初的稿本虽然说由王鸿绪总其成，但实际上万斯同是最重要的起草者。此人乃黄宗羲的门人，因精于明代史事而成为了中心人物。黄宗羲是由阳明学转为到史学派的学者，由于万斯同是他的门下，所以《明史》特别体现了黄宗羲的思想。

如此，《明史》在乾隆年间得以完成，对此书的评判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有认为《明史稿》较好，后出之《明史》则略逊一筹的观点。但礼亲王昭梿认为其实也不一定如此，《啸亭杂录》中就曾举例指出《明史》中后来改写的记事就有优于《明史稿》的地方。有人认为王鸿绪与徐乾学虽然都是康熙帝器重的学者，但是由于学阀的关系而互相攻击。也有非难认为由于清朝帝室的关系，《明史》中被加进了私意。礼亲王还认为王鸿绪作出对建文帝不利、对成祖有利的记述是有原因的，即在康熙帝诸子间的宫廷骚动中太子被罢免了，而王鸿绪又是太子的反对派，所以他才存心如此记载的。还说王鸿绪为自己同乡立传时很下功夫。另外，魏源在有关《明史稿》的文章中引用礼亲王的话说，也对王鸿绪因私著史提出了指

责，不过他们到底有多少事实根据则不太清楚。另外，后来桐城派的陈用锡还非难《明史》不立《道学传》，论述不当如此，但这是因为桐城派来自朱子学派的缘故，《明史》的编纂者继承了王阳明学派，在即将新兴之汉学的气氛下，是出于反对朱子学的观念而不立《道学传》的。总之，反对朱子学的风气、尊重实录的风气、否定朱子《纲目》笔法等等实际上都是编纂《明史》时的主要意见，此时是北宋以来数百年间史论一变的时期。另外，《明史》中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设立了一些新传，即《阉党传》、《流贼传》、《土司传》等。这些虽是《明史》所新置的，但并非出自其史论的考虑，只不过是出于传达当时实情的需要而已。

二、黄宗羲与浙东学派

清朝的学问不论经学、史学都是以明代遗老顾炎武、黄宗羲为鼻祖的。黄宗羲乃阳明学派学者，浙江余姚人，本出自名家，尤其是曾就学于阳明学派的刘宗周。明亡时曾举兵抵抗清朝，甚至为此向日本请求援兵，明白自己计划最终难以实现时，罢兵。其后一直在自己家乡，寿命很长，活到康熙年间八十六岁的高龄。就此人的著述来说，于历史方面并不多，仅仅是记述一些自身经历、明末事情的内容，作为史学并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但是，由于此人门下出现了有名的史家，所以使人感到他对史学似乎也有着某些见解。后来，《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论述浙东学派时，就说这一派很重视史学。章学诚自己也是浙东人，曾论及浙东学派的渊源，由他的议论可知浙东学派原本出自阳明学，即陆王学，虽说本与朱子学不合，但也未必就攻击朱子学。而且，章学诚还提出与浙东学派相对之浙西学派的存在，认为顾炎武乃浙西学派鼻祖。他论及两学派，认为有一种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的特色，说浙东学派既宗阳明学，又不空谈性命而入史学的特点是这一学派最宝贵之处。他还论述认为，浙东学派史学中无空言之著述，他们基于《春秋》，以将孔子所言见之于行动为真意，还仅仅是整辑排比的史纂、参互搜讨的史考而已，尚非真正的史学。

但事实上，章学诚所谓的真正史学，也不是从最初就存在于浙东学派

的。而且虽说黄宗羲并没有如此的见解，但无论如何黄宗羲关于史学的见解在他的文章中还是时常有所体现的，这从他的文章中是可以有所了解的。他为门人万斯同《历代史表》所撰序文中的见解是值得注意的。其中他论及了史表的重要，还说史书中不仅是表，志表都很重要，称赞了万斯同针对《后汉书》、《三国志》以下无表的情况，制作补表的做法。由此可推知，黄宗羲对史学的看法与明代及其以前的史学已有所不同，不再像《通鉴纲目》那样以褒贬为主，而已经是以制度等其他实用研究为主了。

黄宗羲对经学也已经感到有进行历史研究的必要，从而重新开辟了《礼》的学问。对此，虽然黄宗羲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著述，但经学研究中应该重视名物度数则是他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他的文集中有所体现。总之，他的经学研究与以往那种单纯谈论性命的方法有所不同，重视考证的研究方法确是从此人开始才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这种倾向是以往阳明学者所不具备的。其门人万斯同之兄万斯大专治经学，尤为研究《三礼》、《春秋》之学。万斯大曾向黄宗羲询问过《礼》的研究方法：万斯大问曰：学习《礼》时，一旦有疑即求诸先人注疏，若不得解则求诸唐宋以来诸儒，尚不得解则以经说《礼》，如何？黄宗羲回答他：然也。又问：研究《礼》时，对照《易》、《书》、《诗》、《春秋》、《左传》、《国语》、《公羊》、《穀梁》如何？黄宗羲也答曰：然也。由此看来，黄宗羲应该说是将以往注疏与宋以来学者观点相互区别，发起新研究的学者。而且他在应该是属稿于此时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序文中也称赞了他的研究法。另外，对于《易》他自己撰有《易学象数论》，针对王弼以来学者轻视《易》象数而未作研究的情况，认为必须对此有所研究而著此书。不过他并非轻信象数，而是考虑象数究竟是怎样的，他认为这决不是什么隐微而不可思议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与后来复兴《汉易》的学者是不同的，而是尝试了对《易》进行合理的解释。他对以往的象数论也有不满，但又不赞成对其完全予以排斥的观点，无论如何他树立了一家之言。总之，在经学方面他也是不拘泥以往的议论，而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予以研究。当然他与后来清朝的汉学派有所不同，当时尚未出现汉学派学者那种注重师法的风气，从他开始

兴起了对以往学问推陈出新的新气象。特别由于他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所以他在民间对学问的传播，对清朝新型学问的兴起是很大的推动力。大体上说，此间的学问是以经世观点为主的，他著有名为《明夷待访录》一书，这也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对政治改革所发表的见解，主要是以明代政治弊害为鉴的新的政治改革见解。其学问之完全出现史学倾向是从其门人万斯同、万斯大开始的。

万斯大是主治经学的学者，著有《经学五书》。此人谢世早于黄宗羲，又因身在南方，所以其学问流传并不广泛，尽管如此他在经学研究上采取了新方法是很明显的。而万斯同则与清朝史学有着相当的关系。此人本来就记忆超群，尤其以谙熟明代故事闻名。《明史》编纂时受到清朝招聘，因不喜入仕而以布衣不受俸禄就职于《明史》馆。虽说《明史》初以徐乾学着手编纂，后由鸿绪成《明史稿》，但被认为大体是由万斯同一手成书的。万斯同是知道正史编纂中官局分纂法缺点的，他说正史最初是专门的学问，司马迁、班固都不仅本人才华出众，而且继承父业，才有了《史记》、《汉书》这样杰出的著作，但是后世正史成为官修，正史才变得杂乱起来。自己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谢绝与史馆普通编纂官共事，而仅作为史馆总裁顾问执笔的。这样他将各编纂官分担起草的原稿由自己统一，避免了以往官修正史因分担而产生的弊害。与前代正史不同，《明史》记事中之不出龃龉，全在于万斯同的以上用意。

本来万斯同是绝无入仕清朝之意的。他之所以入《明史》馆也仅仅是由于南方难以见到许多书籍，愿意借此机会浏览众书，从而完成《明史》。他在入《明史》馆前已经读过历朝《实录》，也阅读过其他种种史料文书，所以对于如何参考《实录》以及其他史料以了解事实的方法是有所心得的。仅仅撰著《明史》底本已经看出他是一位杰出学者了，另外他还撰有《历代史表》，于经学方面特别精通《礼》学，因此徐乾学编纂《读礼通考》时主要就是依靠了万斯同的协助。在当时北京的史学界，万斯同基本就是中心人物了。此外，他于金石之学亦多少有所留意，也认真研究过石经、石鼓文等，关于石经还有专著。作为整体史学方面，复兴了制表的学问当是其主要功绩。

以上就是黄宗羲派史学兴起之初的情况，在当时的阳明学派中，浙东还有一位叫毛奇龄的有名学者，是一位博学但又因博学而论辩偏颇的学者，他针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写有《古文尚书冤词》予以反驳。此人学问虽亦出于阳明学，但与黄宗羲另为一派，章学诚也是由于所论偏颇而不得列入浙东学派正统的。关于《古文尚书》常有接受并继承此人观点的，在史学方面则没有任何可以传承之处。浙东学派即使在阳明学派中也因其研究方法稳健，而对学问没有门户之见，但毛奇龄是有门户偏见的，看来他对朱子学是全面反对的。

三、顾　炎　武

章学诚所谓的浙西学派开山祖顾炎武，是与清朝学问之大成有着极大关系的学者，甚至可以说凡是清朝学问几乎没有不以其为渊源的。他本来属于朱子学派，虽然曾经反对阳明学特别是其末派，但由于没有门户之见，所以与黄宗羲也有书信往来，二人看来还是相互推服的。明末虽然盛行讲学，但顾炎武、黄宗羲二人却憎恶讲学而不参与。当时讲学者南北都有，北方像孙奇逢、李中孚等都是明末以来的讲学者，因为富有盛名而受到清朝的招聘，由于拒绝应召而身陷困境；明末举兵与清朝战斗，很早就被杀的黄道周则是南方有名的讲学者。顾炎武没有参与讲学，也没有给自己找麻烦。顾炎武的学问，既有作为朱子学即宋学派的宋代王应麟的学风，又有着明代杨慎的方法。如前所述，明代那种来自策学的类书体书籍，渐次变化为像《图书编》那种不再限于单纯的纂集，而出现了研究考证的倾向，到了顾炎武这里则已经形成为真正的研究，也就是说他是以著作取代了以往的讲学。

顾炎武的学问是涉及经学、史学的，而其最为得意的著述则是《日知录》。此书三十二卷，本来没有表示各卷内容的标题，《四库提要》对其分述如下：

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

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古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

其中，有关历史的内容非常之多，而且不是单纯叙述事实沿革，也有经世的意见。其观点大抵是以历史为根据的。其中卷八至十七全部论述的是历史上的事实，卷十八至二十一的艺文中也是关于历史的内容，特别卷二十还有史论，卷二十二至二十四的杂论名义中也是关于历史的内容，卷二十五的论古事真妄是论古代史的内容，卷二十六当然是史论，卷二十七也是有关历史的，卷二十九以下的各卷也大抵是史论。可以说《日知录》大部分是由史论构成的。此外，在顾炎武的著述中，像《山东考古录》、《营平二州地名记》、《历代帝王宅京记》都是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内容，另外他的文集、随笔中的史论也很多。

他关于历史的议论特色是以考证为主的。虽说这当然是继承王应麟学风所致，但王应麟并没有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论断的风格，仅仅列举可供参考的材料，再写出有关考证材料的思考而已；顾炎武则与此相反，逐一进行考据，作出论辩考证。《四库提要》也说他的治学方法，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明代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必举出种种证据，作出确实之考证。总之，顾炎武开启了清朝一代的学风，或许这还不是章学诚所说的那种史学，但确实是开启了他所谓的参互搜讨学风，即可以说史考之学是由顾炎武开辟的。虽然顾炎武没有关于历史的特别的大著，但其观点却多开后世史学研究之风。例如，在《唐书》研究中当重视《旧唐书》，《元史》之粗陋以致《速不台传》重出等问题都是由顾氏的发现而开后人研究之先河的。另外，有关金石的学问至明代虽已衰退，但也因顾炎武而得以再开，并最终成为了清朝学问的一大特色。将金石之学应用于经学、史学之考证也是由他开始的。他在这方面的著述有《金石文字记》。当然，从后来兴盛的金石学来看，他所见金石之数量尚少，但其将金石应用于考证之学的创

业之功则不能否认。又如在顾炎武的研究中，与后来有极大关系者还有音韵的研究。虽说这是对明代杨慎、陈第等人古韵研究所做之学术上的总结，总之以往的古韵研究虽有着偶有所得的成就，但毕竟尚未建立起原则，至顾炎武才有了原则的建立。因为不知古音就不明经书古义，他开始了经书语言学的这种音韵研究，此研究中还有着他对金石利用的考虑。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音学五书》。就这五书之一的《唐韵正》来看，他是将唐音与古代音一字一字地进行研究的，其中就使用了汉碑的材料。从《金石文字记》的序可知，这种研究法虽然受到欧阳修《集古录》的启发，但他也说自己是发《集古录》著者欧阳修、《金石录》著者赵明诚所未发的。

顾炎武还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作为研究成果他留下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前者很是流行，后者还仅是草稿没有出版。[①] 据他自己说自明末举人考试落第之后就开始阅读地理书籍了。此二书虽是地理书，但又完全是编纂物，《肇域志》叙述了地理，《天下郡国利病书》是讲地方政治的，编纂所涉及的书籍达千余部之多。其引用书中有些原著今日已经亡佚，被称为清代屈指可数的大地理书籍。不过，当时除他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地理学的学者，例如撰写《大明名胜志》的曹学佺、撰著《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等，都是与他同时代的有名学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地理学出现了即将兴盛的倾向。顾炎武也可以说是清代地理学的有力开创者之一。

综上所述，顾炎武在各方面都据有清朝学问之开山鼻祖的位置。总之，这是他开拓历史研究、兴起考证学风的结果。他甚至说过与其空谈性命，不如去做书籍摘抄。顾炎武的家族，原本就是学问之家，祖父也是相当有学问的人，即在他来说是有其学问渊源的。他说孩提时祖父曾教导他，治史学不宜读《通鉴纲目》等书，得明人书百卷，不如得宋人书一卷。新古两种书载同一事时，新书不如古书，班固之改《史记》，必不如《史

① 《肇域志》已经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2004 年 4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记》;《新唐书》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朱子之改《通鉴》(即著《通鉴纲目》——译者注),必不如《通鉴》也。与其将他人著书改成为无聊之著,不如去抄书更好。祖父是这样教导他的,所以他或是自己抄书,或是雇人抄书。无论如何他的学问的确扎实,其中是有其家学根基的。清朝的学术可以说大抵是在这种顾炎武学风的引导下形成的。

四、王夫之与胡承诺

与顾炎武、黄宗羲同时代,特别对历史持有己见而值得注意的其他学者,还有湖南的王夫之(船山)和湖北的胡承诺。此二人的著述当时都未问世,很久以后才开始为世人所知。

王夫之在明末著名的张献忠之乱时,曾因为拒绝张献忠的招聘而导致其父被捕,他为此自伤而请求豁免父亲,最终以其至诚父子皆得到豁免。由于他对明朝为夷狄清朝所灭抱有终身的遗憾,所以在其著作中亦有所反映。其著作曾经一直是作为草稿被埋没的,其最终得以出版是在湖南地方学者辈出、文运勃兴的时代,当时他是作为湖南学者的先驱受到崇拜的。而且在其著作出版问世时,由于湖南学者对其著作中不够完善之处进行了补充,这反而使人难以了解此人学问之真实价值了。今日他的著书被汇集为《船山遗书》,大部分是由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版的。先是保存着王夫之著书的是著名学者邹汉勋,此人不仅精通经学,还擅长数学。后来校正《船山遗书》的刘毓崧明言邹汉勋对王夫之著书有过加笔的情况。例如王夫之为古经书作注时,读前人注疏而进行取舍,但有时不注明出处,所以书中有着邹汉勋的补充;又如考证地名时王夫之欠考虑之处也予以了附加。邹汉勋虽然是杰出的学者,但他自己并没有太多著作。因此刘毓崧不无讽刺地批评说,他不如将附加于王夫之著作的部分剥离开来作为自己的著书,这样对二者都好。因此,王夫之的著书尽管多少有些出于后人的原因而出现的紊乱,但由于大抵还是王夫之所撰著的原样,所以根据今日《船山遗书》并非无法窥见其人于学问上的主张和见解的。只不过与其实际所撰述内容相比有些过于完善而已。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学者中特别对历史有所见解的人物。在这方面有着著名而有系统的著作，即《读通鉴论》、《宋论》。其中《读通鉴论》论及了《通鉴》中出现的事实，与史法无关，完全是论史事的。此论被认为是多有卓见的。关于写作《读通鉴论》的主旨在该书最后的叙论中有所阐述。叙论分为四篇，《叙论一》中叙述了正统论。然而此人的正统论，是不论正统的议论。由于本来此人对明亡于夷狄就非常感慨，《读通鉴论》中亦多流露此意向，不论正统也是由此主旨而来的。不论正统，是因为他认为正统至宋代已经断绝了，在这里言宋朝实际是在说明朝。由于公开地讲明朝会触怒清朝，所以仅仅说到宋朝。言正统至宋中绝，意即明亡于夷狄之清朝乃中国正统之中绝。所谓“统”有二义，一是国之统一，二是国之相续。用今日的语言来说就是从空间与时间上予以论述。而且此人的论述中有着各种卓见，尤其是在叙论中，对上古的论述虽说简单，却提出了卓越的见解。认为三代时有万国，各有其国君，天子不过是其头领而已，于王畿即天子直辖部分之外既不行赏罚，亦非直接收取赋税，所谓天下之合，实则不合。这些都是认真考察古代实情的结论。对于建立正统之困难，他也是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立论的。汉亡之后三国分立，名义上虽说以蜀为正，但灭蜀的是魏，取代魏是晋，而且晋并不接续蜀而是继承了魏。故而正统之建立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亡国之后，旧臣出于君臣情谊追慕前代故主是不错的，但从正统论上说义理与事实相左之处屡有所见，以历史上实际情况为根据进行了论述。但是他的本意在于提出由于至宋代正统已经中绝，以此作为夷狄君主本无正统可言的根据。

其次，在《叙论二》中论述了史论应该主要涉及哪些问题。《叙论三》中所论述的主要也还在于此。《叙论二》的主旨在于：以往的史书是以人物褒贬为主，以古来论为善的人物为善，论为恶的人物为恶，如此同义反复没有什么意义。善人无论如何褒奖也不会更善，恶人亦然，故以往有定论者可以略而不论。要有自己的主张，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所不尽然之实。皆为善人亦有醇疵之分，均为恶人也有轻重之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这才是自己的主张，不能只会褒奖和讥讽。还说自己与胡致堂那样苛酷的史论家的意见是不同的。

在《叙论三》中他抨击了标新立异的轻薄史论。他所抨击的对象有明末李贽、钟惺那种好出新史论的人物，这些人于谋略尚其诈，于进谏尚其谲，为求功名而冒险，为了名誉而违道，为乖戾中庸之事，发非常乖巧之论，浮摇人之精神，喜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枉；这些人于世教与民生，可谓灾愈于洪水，恶烈于猛兽。

在《叙论四》中谈到自己著作是在推本得失之原，旨在力求合于圣人之意，但是由于须符合于实际的事实，所以即便圣贤所言之事亦不勉强尽用。古时学者由于每每欲将政治返于三代，而主张恢复井田、封建、乡举里选，寓兵于农，舍笞杖而行肉刑，但由于这些皆与后世实际不合，所以自己不做那样的论述。以上即可称为《读通鉴论》的凡例。

另外，在《宋论》的最后也写有作者自己的撰述主张，也是感慨于宋为夷狄所亡的寄语，文章的开头写道："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对于宋何以亡国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在于宋制度只对内部有猜疑心，而没有去考虑外部夷狄所致。宋统一天下时，忌嫌地方兵权，而收归中央。这是宋灭亡的原因。古来中国统一时受夷狄侵略，分裂时不受夷狄侵略。战国时，与夷狄接壤的有燕、赵、秦国，都能成功地击退夷狄，秦更不用说是扩大了领土。然而，前汉却受到夷狄侵略，饱受其苦；后汉国势虽减弱，所遇夷狄之苦却不似前汉，这是因为地方上设置了屯田士兵所致。唐安禄山之乱后，国势虽衰，反而未受夷狄侵略，因为与夷境接壤地方的节度使都是当地的出身者，是他们守卫了一方土地。这些节度使亲自挑选兵马，筹备食草，守卫要害，自己制作武器。总之，在天下分裂的时候，没有中央政府的干预，没有会计检查，也没有进退的指令，一方土地的居民不得不自己守卫自己的土地，所以能更成功地进行守卫。然而天下一旦统一，中央政府势力增强，对边境地方行使命令，就会使地方受到衰弱。这虽是王夫之的见解，但又不仅限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也持同样的见解。顾炎武认为由于地方官作恶才导致天下混乱，所以不如像古代封建那样，予以地方官土地为宜。黄宗羲也对边境制度提出设置重兵委以守卫责任为宜的意见，认为明之灭亡在于在中央掌权宦官的命令下，有力将校不得施展才能，因此不论对外敌，

还是对内乱都很软弱。王夫之也以同样主旨在《宋论》的末尾处进行论述说:若宋朝在平天下时,十分备兵于北方,选用人才任之以责,而且君主无猜疑心的话,无疑会阻止契丹侵略,不由女真蹂躏,避免来自蒙古的灭亡。就中国内部而言,不论谁为君主,谁为臣下都是出生于同一的声名文化之地;此地若为夷狄所占取,则一切均化为乌有。由于宋对内之猜疑心,反被外国夺取了天下。王夫之的这种意见,因为是对明亡抱有深刻的感慨,而借过去的历史来议论当时时局的。当时的学者,如顾、黄、王诸氏都是出于对时局的深刻感慨而著书立说的,可以说他们的史论即时势论。

王夫之还另著有《黄书》、《噩梦》,都是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一样,论述经世之策的,因而很有些特别的见识。黄宗羲论明之亡于君主权力过于强大,王夫之也从土地、人民乃国家之根本的角度,阐述了与黄宗羲主旨相同的意见。这应该是当时学者共同的意见。

胡承诺也是一位其著作长久未得问世的学者,是道光年间史学大家李兆洛才使其著作得以出版的,其中最著名者为《绎志》。此书乃子书体例,立有种种篇目,是一部论及世上所有事物的著作。其文章的写作虽是明末的策学文体,但是在整体上看,又颇有回归古籍体例的色彩。书后写有《自叙》,总括了各篇大要,是取法于汉至六朝书籍体例的著作。我最初读此书时,甚至怀疑这是否是李兆洛的伪作,但是观其整体论述,毕竟还是明末的思想,是很稳健的著作。不过,可能也像王夫之著作那样,在出版时经过了后人的稍许添加。但是要想了解此人的见解除了今日所存这部书之外,我们没有其他依据。

《绎志》凡六十一篇,其第五十四篇是《史学篇》。其所谓史学与王夫之所论及的史事不同,是对史法的论述。他首先引用《文中子》之言:“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以此为文章的开端,并说作史之法宗以班固之“慎核其事,整齐其文”;读史之法宗以吕祖谦之“先识统体,后求机活”。他认为:班固修史时,汉代天汉以前的内容皆依照《史记》的文本,天汉以后则依照了刘向以下值得信用的著作。后来的修史者则应当以国家实录为主,并辅以名臣奏疏论议、礼官谥议、正人君子所书行状以及受表彰的人物等,像野史那种材料,唯恐多有不实所以不可

信,应当像《明史》编纂那样,以实录那种正确材料特别是公文为主,而摒弃野史材料。其中他还特别对实录的正确程度究竟如何有着细致的论述。他说,至唐代即使天子本人提出要看《起居注》也是不可的。唐太宗提出要看《起居注》时褚遂良曾予以拒绝,但由于太宗一定要看,宰相只好另将《起居注》修改后让他看了,所以让太宗看的那天的文字是有微隐的。那天的《起居注》后来应该是编入《实录》中去了,可见《实录》中自然是有微词的。再者,后世人对实录也是有所附加改正的。如韩愈的《顺宗实录》后来就被修改过了。宋代《真宗实录》则由于当时的史官后来蒙咎,也被修改了。像明太祖的《实录》更是三度被修改,最终连当初的记录也被烧掉了。所以《实录》也不可一概相信。奏疏看起来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所谓的"留中",即天子留在自己手上不予公开的,而这些是不入《实录》的。因此,议论重大事情的奏疏反而会被埋没。行状、论议的作者也不会都是正人君子,况且文人还有着凭借感情兴趣予以夸张的习气,所以其对人物的褒贬必不可信。在古代的春秋、战国各国分裂的时期,各国有各国的史书,即便一方面亡佚了,还可以用另一方面补上,或者一方面出现了曲笔,也会有另一方面直笔的记录,所以可以对事实真相有相当的了解。然而中国统一之后,那些史料悉归中央史官,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材料可供参考。因此,当时官位卑下、节义高者的事迹多数得不到记载流传,程子也哀叹那些地方官中优秀的循良事迹不传于世。可见,即便依据了正确的史料,仍然弊害难免。而且史家之所以重视者在于经制,即政治制度。然而,后世史书却详于个人形迹,略于经制。像李延寿《南》、《北史》那样不设《志》,为此司马温公甚至深感遗憾。另外,就《起居注》而言,写《起居注》是史官的特权,《起居注》直至唐代也是不给天子看的。但是至宋代破除了这一特权,《起居注》首先要拿给天子看。此乃史官失职之一。大抵记《起居注》的官员本是站在天子御座的阶下螭头之处,可以亲聆玉音的,但是后来被逐至正殿的东间,不得亲聆玉音了。此乃史官失职之二。天子有时在前殿有时在后殿,然而史官却只有天子在后殿时才能接近,在前殿时则不得接近。此乃史官失职之三。天子在日常的居室时,史官是不得入内的。若有事入内的话,须预先出牒通知,

而一旦出牒又多被拒绝。此乃史官失职之四。史官的如此失职始于宋代。而且作史之法在于体现帝王之道，沟通天人之心，都应该合于道理，所论议者当以经古今、明大略为主，不当依私意擅自记些无关大事者；避讳国恶时也须微其言而不害于义理。如果这些全都隐没无存的话，就成为了野史的流传。如此，后世人就会视小恶为大恶，本欲掩盖真实反而欲盖弥彰。另外，关于司马迁的制表，胡承诺认为这是根据孔子《春秋》、《尚书》制作的，作为史家，并无太多无前例可据的独创。大体上说，史书的记载当以治乱兴衰以及言行大节为主，所谓善做文章也是为着使其记述合于事情始末。此与为个人写家传不同。此乃作史之法。

然后，胡承诺还就读史之法有所议论。认为大凡一代之事有宽有严。若一代之体为宽，则一二事严，亦不失其宽；若一君之体为严，则一二事宽，亦不害于严，这就叫做“统体”。另外，大凡国之盛衰、事之成败、人之邪正，每在含糊之机微之间，而察其所以然者叫做“机活”。“统体”乃治事之法，若察其偏胜与流弊则可以立于大中。所谓“偏胜”乃有关某一时代中哪些可认为是过胜的议论，例如《文选》中《六代论》那样的议论。知道了“偏胜”则可以立于大中。“机活”乃补救之方，补救了前史就可以惩戒后代的君主。此乃读史之法。仅仅摘取史书的一言一句来议论全盘，就想推翻前代以来之议论的想法是很可笑的。真正的史家主要应该依据史实了解偏胜、流弊，根据前事惩戒后世。此外，关于作史之弊，他论述了修前代史之弊与治同时代史之弊害。认为从唐代开始设局修史，由于多置编修官修史，所以一旦各人因爱憎不同而对笔削产生异论的话，举一方之说不可，双方之说并举亦不妥，于是只好作出妥协而暧昧的结论。史官之中也是老实人褒人，挖苦人者贬人。尤其是设史馆以后，即便是全部史料集中于史馆，其情况在古今之间也是有很大不同的。古时在史馆收集史料之后，再由此材料编纂史书，后世则先设史馆而后收集材料，这就自然难免有遗漏。而且即便有善行之人亦不向史馆提出其行状，而一旦其子孙微弱，有隐德者亦终不向世人表露其事迹。尤其在中国，因前代灭亡之后为了修史，史料是很难被拿出来的，因此常有真正史料被埋没之患。这些都是修前代历史的弊

害。另外，关于修现代史，例如欲撰写某人祖父之事的话，在其子孙如果与自己同为朝廷官职的情况下，如果记载了其恶事的话必招致怨恨。于是就会落得魏收《魏书》那样受“秽史”之诽谤的下场。何况史官还有因遭人恨而被杀的情况。又如，近代历史因为是由大官监修，监修官与实际执笔史官之间也存在有推诿责任的现象。这些都是编纂现代史时所应该注意的事项。对此，刘知幾《史通》四十九篇是最为有用之书，史家刘知幾所谓才、学、识三长的标准依然是很必要的。

以上就是《绎志》第五十四《史学篇》中的大致主张。胡承诺另外还有着关于经学的论述和关于著作的论述，关于历史内容的就是这一篇。胡承诺还很讨嫌那种偏颇的学问，并希望对纯良中正的学问作出集中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阳明学的偏颇是持反对意见的。上述王夫之、胡承诺二人的议论，在他们生前几乎都没能发挥什么效应。这是因为二人都是隐者，又都居住于湖南、湖北那种乡下的地方，而且又都与学者士大夫没有交往，所以与顾炎武、黄宗羲那种居于江苏、浙江，即便有一篇论文问世也会受到称赞的情况有所不同。然而最近三四十年以来，此二人的议论却对学界有着相当的影响。从二人著作问世的时间来看，《绎志》稍早一些，是在道光年间，王夫之的著作是在咸丰、同治时期。大体上说，此二人的议论与顾炎武、黄宗羲的议论是有相同之处的，史论也有其共通之处的。由此可见，虽说清朝初期另有一些阳明学者那样的讲学人物，但是在有识之士中亦流行着顾黄二氏那样的见解。王夫之、胡承诺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并没有表露出来，但是其在清朝史学史上的价值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五、徐乾学及其门下(一)

顾炎武有子侄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兄弟三人，三人皆有着进士出身的体面身份。徐元文乃顺治十六年的状元及第，徐乾学乃康熙九年的探花及第，二人皆为明史馆总裁，直至后世仍与史学有关联。与当时学问关系密切的是徐乾学，此人与当时所有学术上的重要事业皆有关系。当

然，徐乾学之学大体上是出自顾炎武的。顾炎武有名的《钱粮论》是一篇主要以反对地租纳银，而主张纳米谷的文章，乾学的进士对策据说就是基于这篇文章而撰写的。徐乾学还参与过《明史》、清朝的《一统志》、《会典》等的编纂。此人还是有名的藏书家，其藏书目录称为《传是楼书目》，今日仍有流传。此人于学问史上的特别地位在于，他能成为聚集当时学者的中心人物，另一方面还在于他受到了康熙帝的极大信任。清廷编纂《明史》的一个目的就在于试图通过委于学者这项事业，而聚集明末学者，为此还特意下发了召集学者的诏敕。在被召学者中也有顾炎武、黄宗羲，他们都未应召。但是与明朝无直接关系的人多有应召者，也有像万斯同那样以布衣入《明史》馆的人物，而聚集于《明史》馆的学者的中心人物则是在后学中有很高地位的徐乾学。徐乾学由于受到康熙帝的信用，在《明史》馆中敌友都很多，甚至曾经被弹劾罢官，但很快又被康熙帝召回，受命编纂《御制文集》。乾学官至尚书，元文进升至大学士，二人都非常荣达。乾学中年辞官归南方时，曾仿效宋司马光于受命编纂《通鉴》期间，以本务官职就外任时曾特许于赴任地开设编纂书局的先例，获准与《一统志》编纂官同行，在太湖的洞庭山开设《一统志》局，聚集了南方的学者。此间就连以往不仕清朝的学者也有聚集此者。乾学特别善于关照人，是那种友谊深厚的人物。此人在著作方面，虽然于经学有《读礼通考》，于史学有《资治通鉴后编》，但都是借其周围学者之手而成书的，究竟哪些部分出自于此人之手则不太清楚。但是，无论如何至少此人具有成为学者领袖的力量是可以肯定的。不过，顾炎武很讨嫌乾学靠做学者领袖以博取虚名，他还将这种担心写了下来。顾炎武大体上是个独身者，虽然按照中国的习惯有时有妾，但是没有孩子，因此其晚年时徐氏兄弟曾希望由他们赡养，但顾炎武不但不听，还尽量不与其接近，最终客死旅途之中。

聚集于北京明史馆的学者当然不会都是由乾学一手召集来的，但是由于乾学长期担任《明史》馆总裁的关系，那些人宛如乾学的幕僚一般。其中著名的学者很多，比如历史方面有倪灿，此人补做过《宋史》的《艺文志》；又如吴任臣，此人著有《十国春秋》，还有《山海经广注》；又如黄虞

稷,此人特别是藏书家,他的《千顷堂书目》甚至成为了《明史·艺文志》的基础资料;还有并无史学著作的吴兆骞,此人后来被贬谪宁古塔时撰有著名的诗集《秋笳集》,此诗集是记载满族事迹的旧史料之一,在当时极负盛名。这些学者中还有死时因家境困难,而由徐乾学代为安葬的情况。如以骈文大家知名的陈维崧死时,就得到了徐乾学的照顾。徐乾学与顾炎武不同,顾炎武在学问上是当时学者的中心,徐乾学则在对学者关照上成为了学者的中心。清朝时有这类学者文人的领袖人物出现,徐乾学则可说是其嚆矢。

徐乾学的著述虽然不一定都是出自其本人之手,但确实都是与清朝学问密切相关的。《读礼通考》成为了后来秦蕙田《五礼通考》的基础,此二书长期并行,被认为是"三通"(《通典》、《通志》、《通考》)以来贯通编纂物的佳作。还有《资治通鉴后编》,后来由毕沅校正增补为了《续资治通鉴》,而且徐乾学的书长时期并未得到出版,曾经只有毕沅书的出版,近年乾学的书也出版了,于是两书得以并行。不过,秦蕙田、毕沅也是在幕僚中聚集众多学者,从而成此二书的。作为徐乾学的最大部头的编纂物是《通志堂经解》。此书表面上是由纳兰性德署名的,纳兰性德是满人明珠的儿子,是年仅十七岁就成为进士的天才。他最为杰出的是词,被称为清朝第一。但是,即便再天才也无法独力完成这一规模宏大的编纂,完全是将乾学汇集的书以性德之名出版的。虽说徐乾学本来就爱惜此年轻秀才这一点是无疑问的,但是也被认为是有意采用满人以进一步巩固天子对自己的宠信。《通志堂经解》是一部非常奢侈的书籍,全部模仿了宋版版式,在当时的出版物中是最为豪华的。

徐乾学在江南开设《一统志》局以后召集的学者之中,多有一直隐世不出者。其中也有堪称明末志士的人物,甚至还有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对清朝高举叛旗的人物。也有人认为乾学是受康熙帝之命来此进行侦探的。这些学者之中著名者有顾祖禹、阎若璩、胡渭、黄仪等,由于是《一统志》局的学者,所以不用说他们都在地理学方面多有研究的集结。其中只有黄仪没有传下著作,不过有人说他曾为《水经注》制图,但究竟如何不太清楚,其他三人都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著作。

六、徐乾学及其门下(二)

顾祖禹著有《读史方舆纪要》百三十卷。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作为一人之著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著作了。此书初述历代州域形势,次述各省地理,最后论及川渎异同。州域形势、各省地理是按行政区划的叙述,川渎是依当时山川状态的叙述,即自然地理。一般来说,明末清初的地理学特别注重探讨明清兴亡关系,学者之间为此多有关于南北形势的议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就有关于首都的论述,主张都金陵(南京)的优势,顾炎武则主张都关中的优势。另有计东所著《筹南论》,论述据南方亦不足悲的观点。可见当时类似的议论颇为流行。另外,于沿革地理方面有曹学佺的《大明舆地名胜志》的大著作,虽是古来的沿革地理的集大成之作,但多是表达对《大明一统志》不满的内容。《大明一统志》是明中叶以前完成的,对于其中不完整的情况顾祖禹也有所指摘。他认为:此书对山川脉络记述不明确,沿革始末判别不清,刺激了那些明末地理书的问世。然而《大明舆地名胜志》仅限于对古书的抄录,没有任何编纂上的主张。到了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则首次不仅在总论,而且在各论中均论及沿革。又对山川脉络多有考究,在当时的地理学研究中这是很全面的著作了。此书著者顾祖禹,家境并不富裕,自然也无法旅行,全凭书桌上的编纂而成此书,尽管如此由于他极富读古书之见识,所论之准确性就连那些有过旅行见闻的人亦不得不为之惊讶。另外,在对沿革的叙述上也是,颇有识别前人著述而后思考的能力,他最注意的著述有杜预的《左传注》、王应麟《玉海》所引的地理书、胡三省《通鉴注》等,他不但采用了这些有力的材料,还出色地采用了经书历史主要著作的注释。尤其致力从古书引文中查找出那些业已散佚的古书,然后加以利用。这在后来成为了具有清朝学问特色而盛行的一种方法。另外,他还对古代史书所载地理发表了看法,说:由于五代以前的正史记载地理的方法皆是正确的,所以根据史书还可以得到正确的地志;但是五代以后的史书则大抵是未经实地核实的记载,因此史书必须是根据地志予以正确记载的,五代以

后地志还算有些可依据的，而史书则基本是无稽的记载。可以说他揭示了古代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方针。另外，他还对古来有名的地志逐一作出了判断：说在唐代地志中，除了像《括地志》那样今日已不存之外，现存《元和郡县志》对当时之事、当时的兵戎虽有详尽的记载，但对古代之事的考虑却很粗疏。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虽自称出于唐代地理学家贾耽、李吉甫之手，但所引用的书中不仅有不准确之处，而且错误很多，而且根据此书是无法考虑攻守利害的。《舆地广记》虽然详于沿革，可惜不明险要。以上各书本来还是作为地理书而撰著的，但是《舆地胜览》以下则不过是为诗文而编纂的作品，没有地理书的价值。明代以后的地理书仅仅是些依据《太平寰宇记》、《舆地胜览》的作品，没有出于其上者。这就是顾祖禹对以往地志的判断，与这些地志相比，《读史方舆纪要》确是结构严谨，主张明确的杰作。日本的历史地理学成果尚处于远不及顾祖禹的现状。

在这部书的总序中，顾祖禹叙述了本书产生的由来。说自己先祖中，自梁顾野王以来就有撰写地志的人了。自己的父亲曾因明末骚乱而隐世，父亲还说过，这场骚乱是因为不研究地志，不了解地理，而政治、兵备无秩序所引起的。故而自己是依照父亲所言而撰著此书的。顾祖禹在总论中主要就有关攻守形势进行了论述。这在后来竟成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将《读史方舆纪要》列入兵书的理由，那是对此书未作全面了解所产生的误解。顾祖禹的确是主要依据孙子“地利说”撰著此书的，但这并不是兵学的著作，就整体而言还是地理学的著作。此书在当时已经受到了重视，著名的文章家魏禧在为本书所撰序文中对此书推崇备至，并举出书中最为精彩者有二：“一以为天下之形势，视乎建都。故边与腹无定所，有在此为要害而彼为散地，此为散地彼为要害者。一以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者不择地。”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上看，确实如此。例如金陵确实是根据地，但却非起事之地。明太祖起事也是在其他地方，后来才以南京根据地的；太平军也是在广西起事，然后才进入南京的。

《读史方舆纪要》在中国与古时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同时代顾炎武

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并称为地理三大书。顾祖禹入《一统志》馆之后,他的意见是多被采纳的。但是《一统志》与《读史方舆纪要》在议论上是有所不同的,《一统志》应该是采纳众多学者意见成书的。而且有时《一统志》与《读史方舆纪要》相比更为绵密,尽管因此,亦丝毫无损于《读史方舆纪要》的价值。如果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相比较的话,《天下郡国利病书》不过是单纯对材料特别是政治地志材料的汇集,若论具有完整编纂主张的话,是不及《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的著作留传于后世者虽然只有此一部书,但又确实是一部不朽的名著。

至于阎若璩,他在经学方面也是有名的学者,曾提出了《尚书》伪古文的问题,当时虽遭到毛奇龄的反对,但无论如何他是这一观点的奠基人。此人亦精通地理学,著有《四书释地》。此书虽然不仅仅写地理,但大体上是以撰述地理为主而知名的著述。至于此著作成书的由来,在《续编》的卷头有所陈述,说昔日读《孟子》时,见滕定公死时其子文公遣人向孟子询问丧礼一事,觉得相隔那么远的距离,竟能迅速成行很是不可思议。后来调查一下地理才发现滕与孟子家乡邹非常之近,所以很快就可以往返两地,由此方知地理学之必要。此人的确受到毛奇龄的反对,但此人又确实很喜欢吵架,特别爱骂人。康熙帝时开博学鸿词科,将那些在普通进士考试中落榜,但又有真学问的优秀学者由地方推荐,通过别试予以登用。阎若璩对这些人则一概骂倒,幸免者唯有吴任臣等数人而已。阎若璩见到过顾炎武,也见到过黄宗羲,虽然佩服他们的学问,但也发现《日知录》的错误而面诘顾炎武,还曾订正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此人的学问与顾炎武、黄宗羲那种经世之学不同,完全是考据之学,顾、黄等的经世之学至阎若璩则已经成为单纯学究的学问了。

胡渭是著名的《禹贡锥指》的著者。此人对《禹贡》有过精密的研究,指摘了《尚书孔传》,以及为其写《正义》的孔颖达、宋人蔡沈等在《禹贡》地理方面的错误,还提出了《禹贡》中最困难的三江问题当以郑玄观点为是的主张。他在徐乾学那里得以依据大量书籍,所以能够有此精密的研究。此书还绘制有地图。这是一部对史学、经学都有重大贡献的著作。此人的著作和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一样,由于写书没有体例,基本

是像自己的备忘录那样杂乱无章，与后代学者那种严整的著述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长处在于后人可以在直接目的之外，由此拓广见闻。此书作为清朝的学问可以说是属于启蒙时代的著作，由于仅仅是清朝学问刚刚萌芽的作品，故具有尚未充分形成体系的特点。

另外还有一位出入于《一统志》馆的学者刘献廷，可惜今日没有留下他的著作，但无疑这是一位非比寻常的学者。此人对音韵学亦造诣深厚，不仅依靠中国书籍，据说还对梵语、拉丁、西藏、阿拉伯、蒙古、满语文字有所研究，发现了音韵的真正原则，惜其著述没有传下来，今日可见者仅有其随笔《广阳杂记》，但是仅凭此书是不足见其学问之修养的。似乎刘献廷与万斯同有深交，经常互访，看来很是投机。据说万斯同是从文献上，刘献廷是从实地踏勘经验上相互切磋研究成果的。刘献廷还与王夫之有交情，敬服他的学问。此人踪迹颇为隐秘，可能他反感清朝，其友人中有梁份、王源那样的学者。梁份精于西北边境地理，所著《秦边纪略》被认为在西北边境地理方面胜于《读史方舆纪要》；王源是当时的文章家，他们是一些被认为依然心系明朝，以万斯同为中心，时常出入于徐乾学那里的一伙踪迹不明的学者，而且其中许多人都是潜心于历史地理之学的。

总之，在当时以徐乾学为中心而集结一处的学者之中，既有阎若璩那样纯粹的学究，也有伺机雄飞的学者，所以这正是一种天下形势尚未安定之康熙时代的学风。

七、修补旧史的史学

如前所述，章学诚曾批判过清朝史学，说整辑排比是史纂，参互搜讨是史考，二者都不是史学。整辑排比的兴盛不用说是在乾隆时期，大抵上是对作为古来史书的参考资料大量收集的学风，此风萌芽于明末，持续至乾隆中期。而在乾隆时期伴随着经学考据的同时，史学也不再是单纯地纂辑材料，而兴起了考订之风，此间史学为之一变，出现了进步。即在乾隆中期以前的学风，与其说是整辑排比，毋宁说是修补旧史更确切，而从乾隆中期开始则可说是考订旧史的时期。这种修补旧史之学既包括以万

斯同为中心的时期，也包括在《一统志》馆以顾祖禹、阎若璩、胡渭等为中心的时期。以上所介绍的学者，主要是传承顾炎武、黄宗羲一脉的人物，另外在此系统以外也还有些撰有名著的学者。

明末至清初有一位叫做严衍的学者。此人著有《资治通鉴补》，准确地说此书是严衍与其门人谈允厚共同的著述，大体上是由严衍提出大纲之后，再由谈允厚从博识的角度对其师之说予以补遗。此书在当时虽然已经被一部分人评价为名著，但是由于一直没有出版，所以长期以来并不为一般人所知。由于此书写作于明清过渡时期，所以其编纂方式亦为过渡时期思想所左右。也就是说有着《通鉴纲目》正统论那种指导思想，比如以蜀为正统，不承认则天武后的即位等都是来自《通鉴纲目》的主张。但是，在其他方面由于勤于收集而占有广泛的材料，所以能够纠正《通鉴》的错误，整齐其错杂，削减其重复，而且还能打破一些拘泥的观点。不仅补充注释而且补充了本文，此书中，对《通鉴》于事实所缺者，《通鉴》行文因为过于简单而前后关系不明者都在各段中补出；还将《通鉴》所未载事实中具有重大关系者，特别予以了补充。作为补注还有一个附录，对那些因所举事例过于琐碎而难以写入本文的记事也特设了附录。对《通鉴》与他书记事有出入之处，究竟孰是孰非而难以断定者还另外设有一个备考。此书还订正了胡三省注的错误，弥补其不足的文字都归入了补注。一般来说，《资治通鉴》由于是以资治为目的，所以其记事详于政治而略于个人之家和系图，多记用世之人而省略不为世人所知者，记载正经人而不载所谓古怪之人，多记男人而省略女人。《资治通鉴补》中将这些在《通鉴》中省略掉的内容都予以了补充。谈允厚还写了一篇将《通鉴》错误逐一指摘的序文，这些都是根据相应材料的论述，一字一句亦无苟且。可以说这正是后来钱大昕史学的起源。钱大昕十分佩服此人，甚至为此人立传，说此二人之学乃实事求是之学。大体而言，明代的史学是与明代一般学风相互关联的。明代的学问中，有着意欲总括并知晓世间一切事物的学风。所以出现了《大学衍义补》那种总括并传播世间一切的著作。为此，史学也曾以博识为主，自然出现过类书体例的著作；但是自严衍开始，产生了狭窄缜密的研究风气，此风在清朝达到了兴盛。严衍实

际上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一境界的学者。

还有一位顺治至康熙初年有名的马骕。是名著《绎史》的著者。马骕精通三代，当时人甚至送其“马三代”的绰号。此人于《绎史》之外虽尚有《左传事纬》，但以《绎史》为有名。此书乃记载至三代之事的大部头著作，主要分为“太古”、“三代”、“春秋”、“战国”、“外录”五部。最后的“外录”是有关古代名物制度的内容。作为材料采用了《五经》的全部内容。不限于历史著作，还采用经书以及经书的传、《老子》、《庄子》诸子等所有的材料。其中即便传承有疑问的材料中只要文义古旧者就无所遗漏，如《神农本草经》、黄帝《素问》、《山海经》、《周髀算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竹书纪年》等无所不利用，而于《鬼谷子》、《尉缭子》、《孔子家语》、《孔丛子》一类真赝错杂者则用其部分，对于完全是伪书者则存其大略。另外，还采用了汉魏以后书籍中对古代的记载。还有一些虽然书本身已经亡佚但其文尚传者，纬书类的材料也从其他书的注或类书中辑出使用。如遇古书中有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者，则二者兼采。他认为这样可以以疑存疑，以广见闻。因此，不仅以史书为材料而且采用一切可作为史料的材料的方法乃《绎史》的特色所在，这种方法对以往的成例是有所突破的。

当时有名的史家李清还为此书作有序文。其中说道：对于此书的材料使用方法或许有人会有所异议，然而大抵以史书为历史材料容易，以经为史难，而与以经为史相比，以子书、传注为史更难，若非有相当功力是做不到的。李清认为自古以来，史学就有一个逐渐开辟新方法的过程。如汉代刘歆的《七略》就开辟了前所未有之新方法，又如晋代开创的书籍的四部分类法也是空前的新方法，又如唐代的《通典》、宋代的《崇文总目》、元代《文献通考》、明代《大学衍义补》都是新方法的发明，而《绎史》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新方法的诞生。这是因为《绎史》采用了一种古人所没有做过的新方法。李清还举出了《绎史》的四点主要的特色：（一）体制之别创。即不采编年之法而从纪事本末体，以事为经作叙述。（二）谱牒之咸具。即与司马迁年表月表相对应，谱、牒具备。（三）记述之靡舛。（四）论次之最核。总之，是《绎史》开始了古代史的纪事本末体的撰著，具有

汇集一切材料而后做出论断的特点，不能不说是非常精心的著作，而且是具有一百六十卷的大部头著作。此人的《左传事纬》可以说是《左传》的纪事本末体例著作，后来高士奇所作《左传纪事本末》主要就是以马骕这部书为基础的。《绎史》在今日的观点来说，其取舍材料的方法是不无非难之处的。例如由于当时《尚书》古文、今文尚无定论，所以一概同样予以采用的情况，虽然有这种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缺点，但在当时来说则是付出了相当努力的。此书问世之后，又有李锴《尚史》的成书。这是将马骕纪事本末改写为纪传体的古代史书，所使用的材料看来也是来自《绎史》，没有收集到优于《绎史》的材料，其质量到底不如《绎史》。《绎史》成书于康熙初年，《尚史》成书于乾隆初年。以上这些书都是自康熙至乾隆年间执修补旧史学风之先鞭者，《通鉴补》虽不太为人所知，《绎史》则是给予当时学界深刻影响的著作。

另外，在当时还有一部曾一度对学界予以影响的，但是后来由于触犯了清朝忌讳而消失了的李清的《南北史合注》。此书最初曾载入了旧《四库简明目录》，由于李清后来在其他书中触犯了清朝忌讳，此书亦从《简明目录》中撤除，全部焚毁。今日虽再难以见到此书，但是此书以《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四书参定《南史》，以《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四书参定《北史》，并旁采诸书，考证异同，以为注释。尽管李清用意极为周到是应当肯定的，但也确有改写《南史》、《北史》本文的地方。因此，《四库简明目录》批评此书既非《南史》、《北史》原文，又非李清之新撰，变得有些不伦不类了。但是此书与《读史方舆纪要》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著作，可谓收集各种书籍进行异同的考订之后世学风的肇始者，此书的亡佚实在十分遗憾。

与《南北史合注》类似的书当时还有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写的是五代时期分裂为十国的内容。此书的编纂利用了大量的材料，这从本书凡例所收众多参考书目可知。但是，尽管使用了大量材料，此书的本文究竟以何种书为根据却难以明确。而且本文中还有大量的注释，就引文的整体而言出典也是不太清楚的。直到这个时代，尚无引用古书时必注明出处的情况，吴任臣的情况亦不足怪，乾隆以后考据学兴盛时才开始对以往

著述方法的不满。关于五代十国的著作,例如后来吴兰修的《南汉纪》、梁廷枏的《南汉书》,都对所利用材料逐一说明出处。这虽说不上是史学笔法的进步,但在尊重史料,重视取舍上来说,学问方法精密可以说就是一种进步。其他关于五代的著述,还有乾隆末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不但博引旁搜,而且一一注明出处。这些虽都是修补旧史的著作,但大体以乾隆中叶即《四库全书》编纂时期为中心,在此以前的方法尚属草率;此以后的方法则渐趋精密,虽说仍然是修补旧史,但已加上了考订。与经学的发展相一致,史学也发生了变化。

另外,这类书还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此人的先祖是明代的邵经邦,著有《弘简录》,这是以纪传体记载宋、辽、金历史的著作,此书在日本也一直是作为《宋史》、《辽史》、《金史》的代用书而流行的,以至于汲古阁《十七史》加上这本《弘简录》合为二十一史①使用已经成为了通例。《元史类编》是邵远平作为《弘简录》续编而记载元代史的著作,对芜杂的元朝史予以简明叙述是应该称赞的优点,而且写出了种种引用书也是很明了的,我们甚至也根据此书发现了一些研究元史的参考材料。但按照当时学风,著作中并不注明每一事实是依据何书的情况。尽管如此,《元史类编》的质量还是出于《十国春秋》之上的,订正《元史》错误之处也是其优点。《十国春秋》所利用的材料虽多,但其中混杂有小说,在材料的取舍上吴任臣并没有显示出过人的能力。

这个时期的著述中能与《绎史》成功收集古代史料特点相媲美的还有厉鹗的《辽史拾遗》。此书是针对《辽史》本文,所作类似史料的汇集,可以说参考了裴松之《三国志注》体例的著作,针对《辽史》简单的本文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而且其收集材料的方法亦是巧妙,并不另外加以自己的论断,仅仅作为参考资料,比起那些加些低劣论断的做法高明得多。与此书同时期的著述还有杭世骏的《金史补》,其成书质量不及《辽史拾遗》。两书都具有对辽金当时著述广泛浏览,然后从中汇集出可以用于

---

① 谷川道雄先生提示:此"二十一史"指汲古阁《十七史》加上《弘简录》的三史,再加上《弘简续录》(《元史类编》)。

正史之大量参考材料的特点。但是《金史补》在收集材料方面不仅颇为芜杂，而且没有全部完成。这类的著作后来还有人写过补遗甚至重著那样的作品，但毕竟未见有超出《辽史拾遗》之上者。顺便说一句，《金史补》并没有版本而只有抄本的流传。

以上列举的大体是直至乾隆初年的主要著作。而乾隆以后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予以史学以极大的影响，即便同样是对旧史的修补，也主要成为了考据学的研究。与《南北史合注》相类的有沈炳震的《新旧唐书合钞》，极便用于新旧《唐书》的对比研究。此间彭元瑞《五代史记注》的成书，也完全是由于《四库全书》的影响。《四库全书》编纂之前，《旧五代史》是收于《永乐大典》之中的，没有几人能够见到，但是《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就逐渐容易见到了。随着《旧五代史》的出现，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得以成书。其他如毕沅《续资治通鉴》也是随着乾隆以后大量古书的出现才得以策划成书的。此前虽已有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但那时尚未见到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熊克的《中兴小纪》。然而毕沅则在这些新材料出现之后，将其利用来著述了《续资治通鉴》。在这个时代考证学也有着很大的进展，与《续资治通鉴》编纂有关系的还有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等人。此书不仅是对旧史的修补，也是加以考订的著作，与明以来以《通鉴纲目》为标准的著作不同，完全没有正统论与人物的褒贬，而只是以事实考证为主的著述。如此，史学逐渐出现了考证学的倾向。

以上叙述的主要是修补旧史学问中有关注释的著作，另外还有一些专门补充志、表类的著作。在万斯同《历代史表》五十三卷问世之后，一段时期之间未曾见到过类似著作的问世。《历代史表》是对《后汉书》以下直至《五代史》各正史中缺表的补充，大抵是依据《汉书》、《新唐书》各表的题目进行的补作，唯有《宦者侯表》、《大事年表》是万斯同的新创。此书材料的来源，于正史之外还搜集了《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诸书及其他杂史编纂而成，是非常有利于史学研究的著作。乾隆中叶以后又兴起了这类书的撰著，不仅补表，还有很多人补志。这可以说都是受到了万斯同学问的影响。

八、天文历算学的发达

以上所述,就是康熙年间史学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在其他方面对史学产生影响的还有天文历算的学问。这一学问自明末利玛窦渡来之后,西方新法得以实行,明时已有徐光启、李之藻等对利玛窦所传书籍的翻译,并由徐光启完成。明末清初出现了一些进一步研究西方新法的学者,其中最有名的是王锡阐、梅文鼎等。王锡阐著有《晓庵新法》等书,梅文鼎著有名著《梅氏历算全书》。此二人之后还有薛凤祚,此人主要是翻译,被认为没有什么自己的发明。与薛凤祚比较而言,王锡阐是很有自己独创实力的。然而由于王锡阐较早去世,死时才五十五岁,其门人或子孙中又没有学问的继承者,所以其学问基本没有得到延续。而梅文鼎则不同,不仅其兄弟,尤其是他的孙子继承了他的学问,而且他本人活到八十九岁的高龄,晚年还谒见了康熙帝,所以其学问影响很大。此人为着推进天文历算研究,而研究了历代正史所见天文历算当否的问题。由于这一研究实际上是从天文观测及推步术角度所作的尝试,所以是比较正确的。大体而言,以往学者一般认为汉代以前的历法即自古相传之所谓黄帝、颛顼、虞、夏、殷、周、鲁的七种历书均为伪作,王锡阐也认为那些都是汉代人的伪托,因此以《太初历》为真正历书的始祖。其研究中对历代历法的观点,在年代学上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梅文鼎的历法,不仅在当时受到康熙帝的推荐,而且其孙梅瑴成还接受康熙帝指导,完成了祖父的学问,由此出现了古来无以伦比的精密历法,进而对历法改正予以了相当的影响。梅文鼎著作的流行还与康熙帝本人喜欢天文历算有关,据说康熙帝本人就通晓实际的算术运算。当时还有一位受康熙帝宠信的宰相李光地。他虽是有名的朱子学者,但与明代学者不同,他是个不空论性理而研究实际的人。此人也对历算感兴趣,梅文鼎能够谒见康熙帝,实际上都是他从中斡旋促成的。康熙帝会见梅文鼎时,很关心其学问,还因为他年事已高,而令其推荐亲戚中能够明历算的人物。于是梅瑴成被召出,与经过考试者同

样被起用,他参与了《明史·历志》的编写。当时此人认为历志中应该有图,提出《明史·历志》有必要加入图的主张。当时虽遭到了反对,但表明当时已有了图与表同样必要的主张。这恰如太史公最先在《史记》中列表的新尝试一样,后来列表就成为了后代史书的必要内容了。梅瑴成也很长寿,乾隆年间《明史》成书时仍然健在。因此梅氏历算学广外流传于天下。

梅氏一派历算中还出现了有名的门下生,其中与经学、史学最为关系密切的是江永。此人在经学方面也很有名,是清初学问从朱子学向汉学过渡时期的学者。其学问主张大抵为朱子学,也像李光地那样重视《礼》学研究。梅氏门下出现的这位有名的汉学泰斗,其著作《数学》(《翼梅》)是主张西方数学历法的著作。书中有《冬至权度》一篇,是对春秋以来冬至所进行的研究,主要依据了梅文鼎的主张对以往观点的错误一一进行了判断。大抵此人的数学与梅文鼎那种混同中西数学的观点不同,有着全盘西化的风格,这是实际中数学研究者所自然达到的境界。江永还以数学知识加强史学,从此清朝学者于数学方面越发精密起来,这是与清朝以前史学者、经学者有所不同的。

梅氏门下最有名的学者是刘湘煃。此人是能够发梅文鼎所未发之非常聪明的人物,其著书不仅纵贯数学、天文、历算,亦有对历法与史学关系的观点。以往的中国历学在五星运行方面的研究是很粗浅的,由于这方面研究的不确定而发展成为了星占术。元代郭守敬开始对此有所推步,但还只是停留在对天球经度的研究,尚未涉及纬度的研究。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西方历法较先进,刘湘煃对此也是有所研究的。此外,他对地理也多有研究,著有《秦边纪略异同考》。他的著述今日皆已失传,非常可惜。只是其著述的大致目录,尚可见于章学诚《湖北通志》草稿的本传中。可知其著作以地理、历算方面为多。

以上介绍了梅氏门下的有名学者,其后还有一位由李光地推荐,为康熙帝所起用的陈厚耀。此人据说曾经由康熙帝手把手地教过数学,最终依据历算之学著有《春秋长历》。本来《春秋长历》一书是《左传注》的作者杜预的作品,此书是对杜预书的补作,自此书一出春秋时代的历法也越

发精密了。因为此人是扬州地方人士,所以后来扬州的数学得以发展。于是,至乾隆嘉庆时期,学界越发流行历算之学了。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三代相承的惠氏家学首先开始注意数学,并最终成为乾隆以后以历算学入汉学的一个原因。不过惠士奇并不属于梅氏一派,看来是受到了李光地奖励历算学的影响。

另外在清朝初期王氏、梅氏之外也还有其他一些数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前述的黄宗羲。黄宗羲在历算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不但凭借历算学知识考察了孔子的生卒年月,而且对《明史》编纂中的历算问题的意见也令人瞩目。此人站在相信西方历算的立场,认为以往中国的历算学是很无聊的,所以《明史·历志》应该详细附加有关西洋历算的部分。当时就有人反对他的这一意见,像吕用晦就是其中一人,其反对意见从史家的见地来看是正确的。他认为即便引进西方历算,因为那也不是在实际中所采用的方法,所以在《明史》编纂中尽管以往历算是错的,也应该照原样记载。但是由于清朝历代天子喜好西方历算,所以认为将错误的结果载入《明史》毕竟不妥,以致《明史·天文志》最终还是使用了西方的历算。

此外还有一位另类系统的学者徐发,此人著有《天元历理》。此书编纂于明末,问世于清初。大体分为"原理"、"考古"、"订法"三部分。"原理"是写历算学的原理;"订法"是将明代制度的历法对照新知识予以的修正;"考古"是根据《竹书纪年》纠正《汉书》的年代错误。又提出了"斗建"即北斗之尾的方位与古来观点不同的见解,对星野也提出了以往诸说各不同的问题,指出其中错谬的意见。这些都是与历史紧密相关的观点。此书是研究古历法所必备的书籍。现在有的学者就在根据此书研究《竹书纪年》的年代。

以上大体是康熙年间历算学盛行时代的学风,乾隆以后由于全面了实行西方历法,所以康熙年间那种议论也就消失了。关于任命西方人为钦天监一事也是,直至康熙年间还是有所议论,但是在那以后再无议论,一律采用西方人了。但是就数学而言,在中国数学与西方数学之间还是有各种议论的,而且这还与清朝史学、经学产生了关系。

九、考订旧史的史学(一)

乾隆中叶以后,经学方面兴起的考证学风看来也波及到了史学方面。这是史学对经学考证方法的模仿,在一方面来说意味着对当时考证仅偏颇于经学的弊端是一种拯救。在当时作为史学第一人的钱大昕曾说:"自惠(栋)戴(震)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由此,一种新史学应运而生,即考订旧史的一派,与此同时前已存在之万斯同以来的修补旧史一派亦呈现出考证学风。若论考订旧史的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的话,当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此三人尚有专门补助历史考证一类的著述,即王鸣盛的《蛾术篇》、赵翼的《陔馀丛考》、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此三书的内容于历史考证之外多有涉及,足见作者之学风。三人在年龄上也很相近,王鸣盛最年长,嘉庆二年殁时七十八岁,这一年赵翼七十二岁,钱大昕七十岁。王鸣盛是乾隆十九年的进士第二人,钱大昕也是同年的进士。钱大昕又是王鸣盛的妹婿,二人同为江苏嘉定县人。赵翼成为进士是在乾隆二十六年,为进士第三人,然而在此之前做举人时已经因诗文而颇为有名了。赵翼是江苏阳湖人。

王鸣盛是当时治所谓汉学学风的正统派人物。其研究态度在《十七史商榷》序文有着明确的阐述,曰:"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譬若人欲食甘,操钱入市,问物有名甘者乎?无有也。买饴食之,甘在焉。人欲食咸,问物有名咸者乎?买盐食之,咸在焉。读史者不必以义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也。若夫异者,则有矣。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针而砭之。此其异也。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

而不敢他从。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针砭,何论裴骃、颜师古一辈乎?其当则善而从,无庸偏徇固不待言矣。故曰异也。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这大体就是王鸣盛的观点,由此基本可以窥知此人的研究态度。而且他还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史学就在于能够研究制度、地理、事实的错谬,而决非发议论以示法戒以及擅自褒贬人物。但是,这只是原则而已,实际上他时常以旧有的方式对人物有所议论。在这一点上,钱大昕完全摆脱了旧式,成为了纯粹学术的研究。

王鸣盛的史学研究按照他自己所说,在材料上不仅取材于正史,杂史、小说、地志、系谱、目录、诸子百家、诗文集,以及佛教、道教书籍直至金石文皆予以采用,就其结果来看,为了确定历史事实,要在博览。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凡百卷,从始卷到九十八卷都是论及各时代正史的,最后两卷论述了史家的义例。此人热心著述,意欲模仿明代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即贯穿经史子集的著述,且在各方面都留有名著。经学方面著有《尚书后案》、《周礼军赋说》,史学方面有《十七史商榷》,子部书有《蛾术编》,集部有自己的文集。《蛾术编》是在王鸣盛死后数十年才得以付梓的,初版内容分为八类:1.《说录》,2.《说字》,3.《说地》,4.《说人》,5.《说物》,6.《说制》,7.《说集》,8.《说通》。本来还另有《说刻》、《说系》。凡十类、九十五卷,出版时省去《说刻》十卷、《说系》三卷,为八十二卷。《说刻》是对历代金石的研究,出版的当时已被王昶的《金石萃编》所采录故而省略;《说系》是自己的家乘,写作主旨可能在于仿照汉魏六朝著述家载自序于书最后的做法,写明著述缘由,因为觉得他人看来无兴趣而省略,今日已不得而见了。八类之中:1.《说录》中包括了经、史两方面内容,也列入有关诸子的内容。2.《说字》是关于文字的。此人治学原本宗于许、郑之学,所以文字方面是以许慎的《说文》为主,经学则是以郑玄的注为主进行研究的。《说字》即出于此主旨的著述。3.《说地》是地理的研究。4.《说人》是不涉及褒贬的人物事实考察。5.《说物》是对经书中出现事物的研究。6.《说制》是关于制度的研究。7.《说集》有关诗文集的研究。8.《说通》是不人以上各类的内容,特别是关于经书的内容。全书结构虽以顾炎武《日知录》为范本,同样也研究了制度的沿革,但仅限

于研究，相对《日知录》而言其中作者自己的经纶已逐渐减少。上述八类中，特别是《说地》、《说人》、《说物》、《说制》几乎都是纯粹的史学。

就此人的人物品行来说，由于为其写传记、逸事作者的立场不同，得出的评价也截然相反。江藩的《汉学师承记》说：他在罢光禄寺卿官之后的三十余年中很是贫乏，靠卖文谀墓即为人写墓碑铭谋生，看来江藩对其不无袒护之词。然而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则说他有非常大的贪欲，在进士未及第时，曾在有钱人家做过家庭教师，去人家家时总是两手做出要东西的样子。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这样可以将有钱人的财气拢入自己怀中。做官吏以后也是如此，大量没收人民的财产。有人问他：先生那么有学问，何以如此贪财？就不怕世人的评论吗？他答道：说贪污不过是一时人的评价，而学问因为可将著作流芳千载，文字一旦传之于世，议论就会消失，剩下来的只有著述，贪污等评价亦不再为人所知。礼亲王说他的著作中多有慷慨激昂之语，这不过是用来掩盖贪欲而已。无论如何，可以认为此人名誉心很强，著述也是为着流传于世的目的而尽快写作。治经史之学也是虽然有夸耀博览的一方面，但是大体是采取了某种程序，选择最容易成功的方法，专门用心于如何及早成书。治汉学也是，尊重家法，按照合于家法的路数去做学问。史学研究虽然相当博览，但不是对各种研究都抱有兴趣，从而自然地得出结论，而是从最初开始就先设定目的，再考虑如何利用史料。故而如此形成的著书，虽然也都是些有价值的内容，却并不具有开拓新型学问途径的实力。例如即便也对金石有所研究，但后来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果。在这方面就不具备钱大昕那种对任何事物皆抱有兴趣，并在这种兴趣之中自然地形成一代家法，进而开创史学新纪元的实力。

其次是赵翼，此人的著述主要有《廿二史劄记》和《陔馀丛考》二书。另外他还有一部自己编纂的《皇朝武功纪盛》，但较以上二书就显得逊色些。此人的著述方法与王鸣盛相反，王鸣盛是先完成了《十七史商榷》，至晚年才有《蛾术编》；赵翼则是先有《陔馀丛考》，随后才有《廿二史劄记》的成书。《陔馀丛考》的内容纵贯经史子集各类，包括经学以及种种历史上的细致研究，而大部分还是史学的内容。此人年轻时曾以诗文有

名气，是与袁枚(随园)、蒋士铨(心余)并列而被称为乾隆三大家的诗文名家。他还具有诗文批评的眼力，也有诗评方面的优秀著述。他很有作诗的才气，诗句巧妙若玄言。此人直至中年沉溺于文学，而未曾有过经学、史学方面的观点，当然也没有这方面的著述，至晚年才感到应当有所著述以流传于后世，于是著此二书。由于没有经学学问的根底，所以即便是《陔馀丛考》，其有关经学的研究连王鸣盛尚不及。写《廿二史劄记》时，甚至在自序中也说自己不能研究经学，由于史学"事显而义浅"才有所著述。钱大昕在《廿二史劄记》序文中说他这是自谦，但看来也未必。《陔馀丛考》从各个方面研究了某一时代的当时人是如何追究事物起源的问题，总之，是一部利用引经据典整理以往研究的方法的敏锐著作。日本德川末年江户的商人学者中也流行着撰写随笔，考察当时事物起源的学风，这种学风曾经影响过马琴、[1]种彦[2]等学者，与赵翼的治学方法相似。就《陔馀丛考》的内容来看虽说没有十分确定的分类，但是乍看上去有些类似百科辞典那样的著作。而其中关于史学，特别是正史的研究后来进一步扩展，就形成了《廿二史劄记》。因此两书之间有重复的内容。

此人的研究态度与王鸣盛不同，是那种无须博览多识之精明的方法。采取了将廿二史中相互矛盾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虽然偶尔也参照正史以外的书籍，但是毕竟不甚广泛。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家里藏书很少，自然没有很多书可供参照。他对这种方法辩解说：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因为发现稗史小说中有与正史相左之处就引来纠正史。这些稗史小说在编纂正史时，曾一度汇集于史局，由于信用度很低才未被采用，所以有其不可信之处，以此来驳正史之误则不免遭有识者耻笑。故而还是以正史中的事实相互参合对照研究为宜。说自己著述的意图即在于此。这是对未见到许多书籍而进行撰述的一种借口。此人没有王鸣盛那种对学问所抱有之炽烈的名誉心，由于撰写《廿二史劄记》是在作者的晚年，所以

---

① 马琴，即曲亭马琴(1767—1848)，江户时代后期的通俗小说家。原名泷泽兴邦，笔名曲亭马琴，后代亦有称其为泷泽马琴的。

② 种彦，即柳亭种彦(1783—1842)，江户时代后期的通俗小说家。原名高屋彦四郎知久，别号偐紫楼、足薪翁等。

他希望尽可能不太辛苦而写得有趣味些。然而由于他通达世故所以有着相当敏锐的议论，在他的议论中多数是与《通鉴纲目》尊名分主张相反的自然大势顺应论，作为历史的观察很少有勉强的观点。总之，即便除去《廿二史劄记》中关于考证的内容，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的大体是很方便的著作，以至近年张之洞曾说过无法通读正史的人，应该大略读一读《廿二史劄记》这样意思的话。

由于赵翼并非王鸣盛那种激动治学的人，所以尽管其学力不及王鸣盛，但毕竟其笔触机敏，读起来很耐人寻味。而且在其通论中蕴含着一种创新的见识，这一点上不妨说是他超出王鸣盛的长处。钱大昕虽然在《廿二史劄记》序文中说赵翼不以稗史小说材料反驳正史，是因为赵翼论古有其特别的见识，但是钱大昕的史学功底远比赵翼深厚得多，其实他不见得就佩服赵翼那种迅速敏捷的著述方法。我看他这只不过是一种恭维的话而已。钱大昕与赵翼在反对《通鉴纲目》宋学风气这一点上虽是共通的，但钱大昕没有那种极为机敏的议论，赵翼则在这一点上显得很突出。钱大昕还多少赞扬了赵翼对历史大势的通论，说他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其实，赵翼明显是有立异之心的，况且立异是这个时代的一般风气，就连钱大昕自身也是意在颠覆宋学而立异的。这一点是王鸣盛、赵翼、钱大昕三人的共同之处。总的来说，中国的史学家多数是主张不服输的，所以在对外国的关系上也多是主张强硬为上策的，所以以往多认为宋朝是因和议而国破的。但是赵翼持相反意见，认为是和议破而国破的。这一点在一定意义上虽然是事实，但其中也有着勉强否认前人观点而标新立异的倾向。只是在以正史为主而不取稗史小说的主张上，看来虽说赵翼有着特别见识，但也不过是从明代王世贞至康熙编纂《明史》时期，以实录为史料的作风对既成正史进行批判的程度。然而，由此而论的话，对于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对许多异闻的记载，按说赵翼也应当认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他却没有予以排斥，而仅仅是以陈寿、裴松之所采用书籍以外的流传书籍来攻击二氏而已。无论如何，由此可知直至乾隆年间的史学中仍然流行着康熙以来反对宋学而重视正当记录的主张。

钱大昕在清朝学问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于史学，他是清朝特色

史学的创立者,将具有当时学风的考证方法应用于史学,确立了清朝一代的史学研究法,另外还开辟了以往人们所未能注意到的新领域,使史学学风从此为之一变。他不仅于史学,而且精通各个领域的学问,作为学者几乎可以说是个典型的人物。此人很早就是进士出身了,虽然也受到乾隆帝的厚意,怎奈他本人生性淡泊于官爵,敬慕汉代邴曼容的人品,说官至四品当可归田。但他又不完全厌恶官爵,本人曾经一度就官位,而且看来还是羡慕仕官家风的。他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还特意引用过《梁溪漫录》中何道夫"官不必高,颈(?)衣冠不绝世为善士;家不必富,愿衣食常足可以及人"一语,由此可知此人之志。五十几岁辞职归乡后称疾不再复出,治学直至终生。他做学问也是悠闲自在,对任何事情都抱有兴趣,在任何领域都能做出某种研究特色来。因为没有王鸣盛那种欲以学问扬名的野心,所以也不追求急功近利,也不曾考虑像赵翼那样靠发些机敏论断而令人佩服。因此,他的研究中没有牵强的内容。虽说作为当时的学风在反对宋学时稍有些偏颇倾向,但大体说可是一位公平的学者。此人年轻时既以诗文显赫于世,是与王鸣盛同年的进士,在北京为官时就以博学闻名。当时有名的喇嘛学者章嘉胡图克图,是将藏经翻译为满文的译者,精通满蒙藏学。在他翻译元代蒙古碑文时,钱大昕发现其译文有误,指出此碑的译文以往已有,而且他自己就有所保存,拿出来看时果然章嘉国师有错,令众人惊讶不已。此事见于礼亲王的《啸亭杂录》。

他的《廿二史考异》乍读起来,似乎仅仅是文字校正方面的著作,而且从今日来看他的文字校正也是有不准确之处的,这是因为当时没能见到宋板,所以在所难免。无论如何他做如此迂回的研究是出于对史学基础的重视。就他的研究法来看:

第一,需要正确的定本。这是他校订正史的目的。这与当时逐渐兴起的校勘学有关,他是最早将校勘学应用于史学的人物。校勘学是文本校订的学问,主要在于收集最好的善本而制定准确的文本。校勘学在当时虽然有所形成,但也仅限于古书古板本的研究而已。校勘学的全盛毋宁说是在钱大昕稍后的时代,是钱大昕开始有意识地将校勘学利用于史学的。钱氏自身在这方面的成果虽然说不上很完整,但他开始将校勘学

应用于史学的做法确是一大功绩。

第二,选择可以成为史料的书籍。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及《文集》中多有题跋,其目的在于选择史料,他尽量以题跋的形式对那些可以成为史料的书籍给以正确的题解。而且像此人这样具有精密地调查史料,判断哪些材料可作为有益史料之确实知识的人,在当时是没有第二个的。因此,由于他注意了选择史料,结果使得以往许多不为人知的书籍重新得以发现,如《蒙文元朝秘史》、《元圣武亲征录》等,这些蒙古史研究的必要书籍都是由此人最先开始注意的。这些书在实际中被利用于研究是在此人之后,但最早注意到此史料的是钱大昕。

第三,将金石文利用于史学。这种方法虽说以前已有,但在史学出现考证学风之后首先将金石文利用于史学的是此人。其著述中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是他开始了将金石文作为史料进行利用的研究。

第四,将经学知识应用于史学。此人不仅于以往的史学,亦精通经学,于经学中的小学,尤其是音韵方面多有发现。如对双声叠韵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像古时没有轻唇音的观点,研究了以往几乎不为学者所注意的子音变化。如此将经学知识积极地应用于史学的做法,都是其他学者所难以做到的。

第五,注意沿革地理的学问。由于钱大昕精于此领域的研究,多有不亚于王鸣盛的卓著研究。

第六,作为史学家他还有着精通数学、天文学的特点。例如,他关于超辰法的观点,就是一大特点。所谓超辰法以往也有,以干支为循环,六十年还原为一个甲子,古历法的干支每经历一百四十四年,为一个干支。古代应用此干支相合法计算年数。汉代产生了刘歆的三统术历法,而在此以前则使用干支相合的超辰法。例如汉武帝太初元年,按照通常算法为丁丑年,但按照超辰法则为早一年的丙子年。钱大昕在中书时曾根据梅文鼎的著作研究过数学。他入翰林时,与父亲同样以精通数学闻名的何国宗曾特意访问过他,还叹息说如今翰林中已无精通此学问的人了。何国宗在天文历算事业上卓有贡献,曾经确定了中国各地的经纬度。在乾隆时期的历书《时宪书》中开始记载经纬度了,而调查得出了偌大中国

之时间差,而为此奠定基础的就是何国宗。当然,当时此人是有西方传教士帮助的,主持并亲自到全国各地方去测量经纬度的。就连此人也敬服钱大昕的天文学问,可见其造诣之深。钱大昕的史学中是经常利用天文知识的。与以往研究历法的学者仅仅于纸上写作长历不同,他是根据确实的推步奠定了年代学基础的。

钱大昕的著述大部分虽然已经出版,但是其晚年用力最深的研究却是《元史》。由于《元史》很粗杂,在钱大昕以前就一直有人希望予以重修。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就是出于这一目的的著作。虽然看来钱大昕对《元史》研究是相当精密的,但仅仅完成了其中一部分的《氏族表》和《艺文志》。据说全部改订过的《元史》稿本既经完成,或说今日也有所流传,情况究竟如何则不太清楚。有一种说法认为:大体的研究虽然已经完成,但是重修《元史》的话,在当时朝廷已在钦定二十四史中列入了《元史》的情况下,于钦定本之外另做《元史》属违法行为,所以最终形成的是《元诗纪事》一书,然而此书今日亦不得见。

总之,就此人的学问根底是宋代王应麟的学问,其人物性格也与之相似,作为学者是具备充分素质的。王应麟出于宋末元初,其治学方法仅限于其本人,而没有继承者;至钱大昕则不但复兴了其学风,而且还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学派。钱大昕是对史学给予了一个坚实基础的人物。当时在经学方面奠定基础的大体是惠栋、戴震两人。惠栋因为出身于苏州一带文化先进地方,又继承三代家学,十分博览,所以最终热心于考证学。他的经学是以汉学为主,以汉代的传、注为学问基础的所谓“许、郑之学”。与此相反,戴震出身于安徽山区,所以并非以博览为主,而是事先确立学问的方式,然后进行研究,即以小学、数学为基础的经学研究方法。此二人成为了清朝经学的中心人物。钱大昕则基本上兼采二人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史学的。而在数学上钱大昕的造诣又在戴震之上,与戴震墨守其师江永的西方数学不同,钱大昕同时还研究中国传统的数学,有着广泛的研究,甚至建立了自己独自的组织。于史学的主张上,自明代王世贞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实录”为主,而摆脱《通鉴纲目》那种以人物褒贬为主的研究,甄别史料的研究虽然已经成为一般学风,但其确实的方法尚未得

到树立。然而自钱大昕一出,这种方法终于完备并鲜明起来了。其对史料的探求,不似康熙年间修《明史》时那样,单纯依靠《实录》,而是调查一切具有史料价值的材料,鉴别其具有怎样的史料性质,同时还注意到了对金石材料的选择。如此这些史学研究法可以说都是在钱大昕这里才得以确定的。

钱大昕虽然对自己的史学研究法并没有撰写什么特别的意见,但是从他的《文集》来看,曾经为那些应该是他尊敬的人物写作过传记或年谱,其中暗示了他本人学问的由来。钱大昕曾为宋代洪适、洪迈、王应麟和明代王世贞写过年谱。这宋代的三人中,像王应麟是奠定了校勘学基础、洪适是奠定了金石学基础的学者。王世贞则是创立了以实录为基础研究学风的学者。另外,钱大昕还为严衍(《资治通鉴补》的作者,以其博览而补古史)、阎若璩(著名古代地理及经学家)、胡渭(研究《禹贡》的专家)、万斯同(《明史》的编纂者)、王懋竑(对朱子学进行史学研究的学者,采取了与以往对朱子学所做性理,即哲学研究不同的方法)、惠士奇、惠栋(父子皆为清朝汉学的奠基人)、江永(礼学、西方数学)、戴震等学者写过传记。这些传记都不是没有目的的撰写,意味着与他本人学问之间的相关性。钱大昕在当时是被评价为第一流的学者的,但他本人是那种谦逊而温藉的人物。虽然当时人汪中评价说:经学数戴震、程瑶田,史学数钱大昕、邵晋涵,小学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不过当时一般的评价是经学首推戴震,史学首推钱大昕为大家。但是,与戴震早死而未能在史学方面显露才华不同,钱大昕于史学之外还在经学上也很有造诣。大体上说,钱大昕的学风不是那种从一开始先制定研究方式,然后依此尽早出成果的治学方法;而是收集各种材料,然后由此自然形成结果的方法。与此相反,戴震则直接进行归纳,而且凭借着扩张门户,而及早成名于世的。二人学风的不同,很可能是因为戴震是乡下出身的学者,钱大昕是出身于江苏那种文化发展地区的学者,二人境遇不同所致。总之,钱大昕在清朝史学中的位置在于,他使得清朝学风得以在史学上定型,并由此出现各个方面的分类研究,进而迎来了清末分类研究的发达。总之,他是奠基人。

钱大昕的家族都是学者,儿子钱东壁、钱东塾,弟钱大昭,族子钱塘、

钱坫、钱东垣、钱绎、钱侗等都是学者。其中虽说以治经学者居多,但又都是基于钱大昕学风,做考证学问的。其中,钱大昭、钱坫有着史学以及地理方面的著述,钱侗不仅有补辑钱大昕《四史朔闰考》遗稿之功,还协助王昶编纂了《金石萃编》。

十、考订旧史的史学(二)

对于钱大昕的治学方法,虽然章学诚认为还只是史考之学,尚非真正的史学,但是至少从钱大昕开始才第一次有了这种史学研究法的完成。王鸣盛、赵翼虽说也有着同样的学风,但毕竟由于没能有明确的研究方法,所以二人都没有继承者,与他们这种在学问上未引起强烈影响不同,钱大昕的学风直至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在钱大昕同时的学者中,也有人尝试过与钱大昕同样的学问,而且在钱大昕以前也并非没有类似的学者,惠栋就是其中一个。如前所述,此人是以经学为基础的学者,于经学之外还广泛涉猎各个方面,即便文学方面也曾有所撰述,还为当时的大家王士禛(渔洋)的诗集《精华录》写有训纂,一一举出其中的典故,显示出其十分的博学;在历史方面著有《后汉书补注》,但是由于此书在其生前并没有出版,所以此人的方法在学界的影响不及钱大昕。但是,看来钱大昕对他是有所了解的。无论如何,惠栋年长于钱大昕,将考证学风应用于史学亦早于钱大昕,只是影响范围不够广大而已。还有一位王元启,他研究了《史记》中历来认为难解的《律书》、《历书》、《天官书》三书。他也是早于钱大昕而注重历史上数学、天文的学者。由于这些书历来错误很多而难以读解,为此他下了大力气予以订正。王元启的书在当时无疑是多少为人所知的,至后来较钱氏为晚辈的梁玉绳写《史记志疑》时多引用王元启书,更使他的书为人所知,近来元启的原著又有了再版。梁玉绳在乾隆末年著《史记志疑》,还著有《汉书人表考》,这些都因为有了钱大昕的序文而多流传于世的。当时校勘学著作的问世几乎没有不经钱大昕做序文的,可见他对校勘学的重视。可以说梁玉绳那种研究是对钱大昕学问中一部分的深化研究,但

是,他有时会出错。如《史记志疑》中有以其时现存的其他史料来错误地批判《史记》的,又如他以他所处时代的常识为据,批判《史记》所载开辟说的荒谬等等,这些虽说都是梁玉绳的学识不深厚之处,但是从其根据种种材料对《史记》进行精密研究这一点来说,确是唐以来所见的上乘之作。关于他《汉书・古今人表》的研究,钱大昕向世人介绍曰:"此表用章儒学,有功名教。观其尊仲尼于上圣,颜、闵、思、孟于大贤,弟子居上等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列诸家,咸置中等。"梁玉绳的研究与此《人表》的制作意图无关,他只是认为《汉书・古今人表》有助于对古书中人物的研究,同时对《汉书・古今人表》所载人物还逐一指出了出处。对于《汉书・古今人表》,某些史学者如宋人郑樵甚至以此作为班固不懂史学的证据而予以过低评价,但是对此予以考证学风那种扎实研究的是梁氏的《人表考》。以上是与钱大昕具有同样学风的学者,而且都是留下有相当出色著述的学者。

此时还有一位章宗源,著有《隋书经籍志考证》。不过此书仅是对《隋书・经籍志》史部书籍的考证,而对于《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籍,虽然对其时现存书籍只是注意其存在,但是对失传的书籍却尽量从其他书的引文中摘引出章句来,使其大致模样可知;不仅如此,对那些《隋书・经籍志》未著录书籍也用同时代书予以了补充。这种方法是宋代王应麟在《汉艺文志考证》中所使用过的方法,是一种局部复原今日不存书籍的方法。梁启超曾指出辑佚是清朝史学的特长,而作为史学辑佚的书籍,这些都是显著的例子。如果此书全部完成了的话,应该是非常杰出的著作,或许草稿已经完成,但是作者最终由于信仰了无聊的宗教而晚年未能善终,未能完成此书。此书在钱大昕也没能着手的领域,显示出了特别的能力。

在以上所举各例之外,如果再稍稍举出一些属于旧史考订派的人物中最著名学者的话,还有与钱大昕同时代的洪颐煊。此人著有《诸史考异》,此书虽与《廿二史考异》相似,但《廿二史考异》是构筑钱氏学问的基础,而《诸史考异》则仅仅是洪氏自身学问的全部。此外,钱大昕之弟钱大昭也有着种种的著作,对《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书予以了各

种辨误。还有沈钦韩的《两汉书疏证》。这些著作都是倾注了作者毕生精力的著述,而且都是以考订为主的研究,此学风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年,或是对书籍的全面考订,或进行部分的考订,形式各种各样。这种旧史考订之学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种学问方法简单,是一种引证不同版本进行校正的学问。清朝学者虽然批判明代理学的空疏,但是即便空疏,毕竟不懂理论就不懂得理学。如果说只要有了考证就是学问的话,即使没有什么学问素养的人,比如那些富豪子弟只要有闲读书的话,校正古书也可以成为学者,所以这一学问延续了很久。因此,这些著述即便校正过了,也不能说都是正确的。毕竟是由校正者的意志论定的校正,所以还是有甄别的必要。大体这类著述在学问上虽不能说完全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也不能说作者都是杰出的学者。其中特别著名而且有价值的,比如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沈炳震的《新旧唐书合抄》。由于这些都是注入了相当精力,所以也是非常便于后人阅读的著述。近年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因为也是受此学风影响,参照古类书如《太平御览》而订正原文错误的有益之作。

在旧史校订中,还有万斯同以来补做表志学者的研究方法,其中也有些相当有趣的著述。而对这种研究注入乾隆年间考证学风的是洪亮吉,他著有《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这些都是对各代所缺《地理志》所做的补作,而且是就其中特别困难之处着手的撰著。中国大体从三国时期开始,由于天下分裂,所以郡县设置有所出入,还出现了郡县的侨置。这是原有土地为敌方所占领之后,以其地名寄留于其他土地的情况,即地名的寄寓。因此,三国以来至南北朝时期地名逐渐混杂起来。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地理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洪亮吉的研究则着手于此。他是个天才文人,写书本也是粗而快,所以在考证上并非十分的绵密。杨守敬虽贬斥洪亮吉的研究于地理学并无裨益,但无论如何是有其从如此困难之处着手之功的。洪亮吉自身是以考证为其治学宗旨的,因此他讥讽顾祖禹那种历史理论,即讲求大势论的那种研究乃明代的遗风,于学问则是无用的,认为地理学仅仅调查沿革就足够了。但是杨守敬却批评洪亮吉地理学甚至连模仿顾祖禹都没能做到。这些虽说都是苛刻

的酷评,但从中也是能够看出清初学风与乾隆学风之不同的。对此,在戴震等人那里也有着与洪亮吉相同的议论,戴震有一本《汾州志》的地志著作。在清朝,大学者写这种地志是有其原因的,有着他们年轻时出于苦学而去业余兼职的原因。因此,戴震对地志多少也是有见解的。这在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章氏写出了自己对戴氏与地志的议论:戴氏认为撰地志只要写明沿革即可,而章氏则提出地志乃小型国史之学,所以其编纂也是需要有各种方法的杰出论述。总之,当时的经学家和名人中认为地志只不过是历史地理沿革之学的大有人在的。在有关三国时代疆域的著述中还有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这本是不太为人所知的书,由于杨守敬说此书出于洪氏著作之上,并为其作出补正而为世人所知。三国时代与十六国时代相比并不复杂,尽管如此洪亮吉的著作尚有错谬之处,恐怕有关十六国的著述中错谬会更多。另外,洪亮吉之子洪齮孙撰有《补梁疆域志》。梁武帝晚年时,由于其国土外遭侵略,内逢分裂,所以疆域极为复杂,本书对此做出了研究。如此对困难而费力的事物进行研究的做法,逐渐地成为了历史学家的一种得意,由洪亮吉开始的这种研究不仅使人惊叹,而且也对当时学者予以了很大的刺激。钱大昕虽为洪亮吉的《东晋疆域志》写序文并表示了赞赏,但那是一般的客套话而已。

其次,在地理学研究之外还盛行着制度的研究,即职官、刑法、食货等的研究,但是由于这也是比地理更难于驾驭的研究,所以没有出现什么杰出的学者。从那时起对《艺文志》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对《汉书·艺文志》以后至《隋书·经籍志》之间中断的书籍目录进行补作的研究很是流行,其中对某一时代甚至有数人研究同一问题的情况。这也是相当耗费精力,但又是仅仅便于读者的研究。大体上说主要是从正史的列传中抽出某人的著述,又从古类书或书籍的笺注中抽出所引用的书籍的一种抄录而已。其中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等是很特别的著作。不过,这并不是说在此方法之外就没有其他对《艺文志》、《经籍志》的研究方法了,从《汉书》到《隋书》之间,书籍分类法也是在变化的,而且书籍的种类也是在增加的,所以说这门学问研究的发展余地还是相当大的。清朝学者多数只是限于抄录,甚至为自己能够搜寻出珍贵材料而自得,可惜能够

促进目录学进步的著作并未出现。

补表在当时是很盛行的，前述钱大昭著有《后汉书补表》，周嘉猷作有《南史》、《北史》的《世系表》和《年表》。此《世系表》对于《南史》、《北史》是相当重要的。由于南北朝时期非常重视系谱，《南史》、《北史》本身甚至被认为是为人立家传。因为当时世族十分重要，所以作为这个时期的史书，撰写《世系表》具有重要意义。周嘉猷写作此表很可能是受到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启发。此表极为便于利用，南北朝时期名姓，如南朝的王氏、谢氏，北朝的崔氏、范氏等，其家族分散于各处，同一王氏就有琅邪王氏、太原王氏，他们并不仅居住在自己原籍故乡，而且是到处分散居住，由于都自称先祖郡望，所以在读史书时很难了解其系谱。而根据《世系表》则可谓一目了然了。说是“南北朝”实则起于西晋，颇便于了解六朝时期世族的情况。

在表志类中还有贯穿历代的著作。于年表有齐召南的《历代帝王年表》，颇便利用。同样方便的著作，在地志方面则有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此书将历代正史中所见地名按韵编为字典体例，虽说仅仅是应用载有《地理志》的正史，而未能应用其他材料而不无遗憾，但仅此已经是很方便的著作了，要想了解历代正史《地理志》中出现的地方今天在何处，一查便知。此人的门人中有一位叫做六严的人，他还为《历代地理志韵编》制作了《沿革图》。他采用了前面提到的明末王光鲁的方法，以朱墨套板印刷，可以对照新古地名，极便利用。这些书与李兆洛的《纪元篇》、《年表》等合刊，题为《李氏五种》流传于世。不过，《李氏五种》的原板已烧毁，今日一般通行的是李鸿章幕中的再刻板。再刻时曾有过一些订正，乃出自李鸿章的幕僚马征麟之手。李氏原著虽说可能多少有误，但对读史的确很方便。顺便一提的是，马征麟著有《长江图说》一书，这是在平定长发贼（即太平军，以下均译为太平军——译者注）时他作为长江水师提督的幕下而撰著的。原本是作为长江水师用的警备地图制作的，为此马氏在沿革之外，还记入了主要的战绩，形成为一种历史地图。乍一看江川与陆地的绘制比例较粗杂，好像不准确，其实大体上是准确的。以方格绘图，一格为十里见方，里数相当准确。在此前后虽有西方人作的水

路图，与之几乎没有差异，由于他研究了这里的水路，所以对长江的形势有着独到的观点。不过，有时也会出现偏见，最显著的是他在订正六严所制地图时有关赤壁的观点。本来赤壁据说有五处之多，而曹操败北之处与苏东坡巡游之处完全是两个地方，这已经有定论了，前者在嘉鱼县，后者在黄州；但是马氏却提出两赤壁为同一处的观点。

在沿革地理方面最近有杨守敬的历代地理的沿革图非常精细，对李兆洛未注意的地方深入追究，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成果。除了《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这种总括性地图之外，他还另外制有各个时代地理沿革方面的地图。不过，《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初版与改版的内容是有出入的。初版中的大胆臆测后来被削除了。此人另外还有对《水经注》的研究，以及文集《晦明轩稿》，其中也多是地理方面的论述。杨守敬在《沿革险要图》的改版序文中说：日本人一面剽窃其疆域沿革图而作中国的历史地图，一面又非难他的地图疏略，真是岂有此理！他的沿革图是在不断改订、进步的，而日本的图却没有进步。塞外地区姑且另当别论，中国内地直至朝鲜地区，是很难达到像杨守敬制图的那种程度的。但是他的地图在中国卖不动，流到日本的却很多。杨守敬的地图虽被非难为不够科学，但那可能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采取西方的制图方式而已。总之，杨守敬的地理学是顾祖禹以来，与顾祖禹那种以形势为主相对，作为以考证为主的地理学者的成果，杨守敬可称之为清朝一代的大地理学家。

另一方面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即便是著名学者的著作，其中也会有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作品。例如以研究西北地理学知名的徐松，其名著《汉书西域传补注》至今仍是很有价值的，另外此人的《西域水道记》也是出色的著作。但是此人对钱大昕之族亲钱坫的《新斠注地理志》所作《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却出乎意料地没有价值。关于《汉书·地理志》的研究，由于另外还有杰出的著作，所以后面还将另加论述。

就这样，到后来旧史修补与旧史考订逐渐地合在了一起。于是，出现了或对古史书作全面的注释，或对其一部分，或者对某一时期的历史给予补充而使之完整的研究。在这类著作中，有成书于乾隆末嘉庆初的名著《五代史记注》，此书最初是由彭元瑞着手，而最后是由刘凤诰完成的。

这是对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注释，乃非常浩瀚的著作，虽说大体仿效了以往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但在翔实方面却远远超出于其上。此书关于五代的史事，可以说是基本网罗殆尽了。作注的笔法亦颇得要领，作者无疑见过所有关于五代的著述，而在采用这些材料时的方针却是不用宋以后的材料。对《五代史记》本文中出现的错误，均以正确的材料予以订正，这在今天来看也是符合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此书可谓乾隆以后的史学名著，即便与近年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相比，也是远超出于其上的。此书不是像王氏那样仅仅限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利用，而对《五代史记》所有问题几乎都有其独到的研究，乃综合大量杰出研究成果的产物。虽说由于选择了短暂的一个时期为对象，而多少有其易于成功的一方面原因；但无论如何，这是应用乾隆以后新兴考证学进行著述的成功标本。

另外还有一部的确与此具有同样方法，但又有着不同编纂方式的著作，即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此书虽署名毕沅，但是确立撰写方针的看来是邵晋涵，这是一部对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作进一步订正的著作。两者相比，毕沅之书使用了新材料，可以说更加准确，但是对所用新材料并未列出其出典。本来在《通鉴》中有《考异》，对同一问题有了相异的史料时，讲出了进行取舍的理由；毕沅的书中却没有这种《考异》。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毕沅在此书未完成时就死去，而其家门不幸没有继承其业的学者所致。这种情况正与近来柯劭忞《新元史》的情况相似。《新元史》也是虽然汇集了正确的史料，但是由于没有《考异》而不知其所据。

即便是这一时期也还是有一些历史学家撰述了带有古风议论的著作，由此可知同样在乾隆时期也存在具有各种观点的学者。其中有一部可称为名著的是谢启昆的《西魏书》，此书在材料的使用方法上虽说带有乾隆时期旧史考订的学风，但在全书的主旨上依据的却是中国传统的正统论，与魏收《魏书》以东魏为正统不同，是以西魏为正统的立论。其编纂方法与宋明人那种仅仅将以往史书同样的材料用正统论予以改写的做法不同，而是采取了金石文等新材料，形成的具有考证结果的著作，但在著述的主旨上则是在当时已趋古旧的史论。自此书形成伊始，谢启昆与赵翼之间就展开了有关历史断限的讨论。在中国成为这种断限的一个问

题,就是在中国的改朝换代时期,应该将生活于前朝末至新朝初的人物归入哪一朝,这是个大义名分上的问题。从春秋以来关于大义名分论就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钱大昕时候的史学学风尚属于旧式思想。所以,谢启昆自信心很强地与赵翼论争,其意见并未被采纳。以正统论撰写的著作还有陈鳣的《续唐书》。此书目的在于以南唐为正统,所以在后唐之后以南唐接续。此书虽然也是作为正统论的论述,但作者博学多识,广泛收集材料,所著也很有价值,但也是没注明出处,就后人来说多有不便。

至于道光年间的著作,作为史家的著作对各个方面都开始加以注意了,也能够注明材料的出处了,甚至还有举出参考材料的严密著作,如梁廷枏的《南汉书》。因为他是广东人,所以写了这部史书。与此几乎同时期另外也有人以同样的方法写了南汉的历史,即吴兰修的《南汉纪》。《南汉书》是纪传体,《南汉纪》则是编年体,在二书中都渗透着钱大昕那种绵密考证的学风。《南汉书》的本文有十八卷,《考异》也有十八卷,将事实的考证记入了《考异》部分。另将那些虽不必写入本文或《考异》,但又弃之可惜的材料收入了《丛录》。还将作为材料的金石文,以及其他文章与本文有关系但又无法在本文引用的长篇另外编成了一部《南汉文字略》。总之,这是一部将所著史书与撰述此书所利用之材料,以及可以作为参考的知识等融会一体的、非常得要领的著作。其中《考异》是由《资治通鉴》而来,《丛录》则与吕东莱《大事记》的体例相仿。这虽然是一部记载极短时期之偏僻地区的史书,但是作中国史来说确实又是体例最为完备的著作。《南汉纪》的体例则多少有些不同,并未另写《考异》,而只是在本文之下详细写出所依据的材料。体例与《大日本史》相同,但比《大日本史》详细。此外还写有《南汉地理志》和《南汉金石志》。此《地理志》是梁廷枏书所没有的,《金石志》则相当于梁书的《南汉文字略》。《金石志》中有着逐一的考证,也有与梁氏书有出入之处,二书都很有价值。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仅仅是对南汉的史书,在旧史考订学派中就出现了如此精彩地利用其方法而撰成的杰出的著作,而且看来二人是在并不相识的情况下分别撰写成书的。近年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也是像《南汉纪》一样将考证写在本文下面的。这种方法虽说很好,但是若将中国

的正史都按照此方法作一遍的话,将会是今天正史的几十倍,是非常不得了的著作。这还只是对撰写某一时期史书的方法,而且体现了乾隆年间的学风,此后还出现了对某一特别历史从史书中摘录材料进行汇编的人物。章学诚称此为搜索遗佚的学风,这种做法来自王应麟,是一种保存史料的方法。例如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就是这类撰著。《后汉书》在范晔书之前已有过几家,今日可知的就有七家,此书是将其佚文从各种著作中抽出所做的汇编。乾隆年间朝廷编纂的书籍中也是如此。编纂《四库全书》时,就汇辑了《旧五代史》和《东观汉记》的佚文。黄奭《汉学堂丛书》的历史部中也汇集了今日已不存之《后汉书》的佚文。这些实在都不是什么具有著述才能的人,只是些喜好学问的有钱人的纂著。黄奭是扬州富家之子,虽然没有什么大学问,但他从各种书籍中将今日已不存的书进行辑佚著成了《汉学堂丛书》。

在以上这种乾隆以后的学风中,核心人物是钱大昕。然而钱大昕看来并不认为仅仅在史料学问上下功夫就可以完成学问了,在他的《文集》中的"答问"中就记有一般史论的内容,由此可知与顾炎武同样,他是准备研究各时期制度及其沿革之大势变迁的。如果他的设想得以实现的话,则已经就是今天历史学的学问了。他是个治学严谨的人,而且由于对于著述不急于求成,所以在精选材料的准备上花费自己的一生。而这一特点又受到了误解,那些认为仅仅进行材料选择就是学问的他的追随者中,还因此出现了以那种单纯考证为学问的风潮。

十一、浙东学派的史学

以上所述大体为浙西学派史学家的情况。与此相应的属于浙东学派的史学家又是怎样的呢?就浙东学派来说,章学诚极力强调其学问系统自宋开始,且从明代王阳明以来一直得到继承,黄宗羲就是以王氏方法治史学的。按照章学诚的说法,乾隆以前浙东已有杰出人物出现了,即邵廷采。此人于史学上的著述只有篇幅极小的《东南纪事》、《西南纪事》,而且都是有关明末的内容。历来浙东人多有谙熟明末历史的倾向,这与黄

宗羲于明末的抵抗清朝之举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由于浙东地方为了明朝坚持抗清直至很晚，所以明末遗老的言论亦多有遗留。但是，章学诚之佩服邵廷采却并不是由于他精于明末历史，而是佩服他能够了解著述的真正意义。章学诚认为任何著作都不能没有其真正的意义，自己必须有独特的见解，又必须有独特的体例。他认为在这一点上邵廷采是很出色的。邵廷采在记述史事时多少是有错误的，这一点受到了后来浙东史学第一人全祖望的攻击，章学诚虽然也承认这一点，但认为其长处在于他懂得作为著述应该如何写作的标准。他的文集名为《思复堂文集》，这并不单纯是平生所著文章之杂乱的汇总，名为文集实际上这部文集从总体上说就是一部著作，是子书那种写作方式。章氏认为这部《思复堂文集》全书就像是一篇文章，而每一篇文章就像一句话，著述的精神贯通全书，正由于作者有着非常的见识，所以才能开创这样的著述。他的学问属于王阳明一派，曾师从黄宗羲受《易纬算法》，请教明代逸事。但是就其大体学风来看，还是接受了黄宗羲师刘宗周的学风。《东南纪事》、《西南纪事》之外，他还写过明末人物的传记，其了解著书之法的特点对后来的浙东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人殁于康熙五十年。

至乾隆年间，浙东史学的代表人物是全祖望，此人相当于浙西学派中钱大昕那样的人物。治学涉及史学的所有方面，他所做的工作多是有助于史学发展的。他是浙东宁波人，乾隆初年被推荐为博学鸿词科，进士出身。其长处在于精通明末历史，撰写了许多明末人物的碑铭、传记。不过，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其碑铭未必就是实际的石刻，也并非应某人子孙的委托，而仅仅为了传播某人事迹而模拟碑铭而作的。这种做法在中国早已有之。原来，碑铭自唐宋以后受到古文写作者的重视，为名人撰写碑铭成为了一种名誉。从明代开始流行着不受委托而写碑铭，并将其载入自己文集的风气。明清人是将碑铭作为一种创作看待的。章学诚虽然非难了这种风气，但是从中国文化来讲，这说明如此借他人之事写自己的文章的方式，已发展至视其为一种娱乐的地步。

全祖望的学才自幼就是被公认的，康熙年间见到著名诗文大家查慎行的时候，曾被评价为有宋代刘原父之风；在参加举人考试时，考官李绂

曾赞誉他为深宁(王应麟)、东发(黄震)以后第一人。他喜好买书、写书,住北京时曾汇集书籍二万多册,回乡时难以保管而不得不典当。就这样,此人极为博学。后来开始注意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起过重要作用的《永乐大典》,据说阅读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每日达二十卷。此人著有《鲒埼亭集》和《经史问答》,其中有些有着关于史学的意见,写过很多碑铭、题跋,在撰写历史书籍题跋时,多有所评论,还研究过金石文。虽说是浙东人,但其学问方法却接近浙西学派风格,具有重视广泛汇集材料,逐渐积累研究的特点。看来,由于不是章学诚那样开始先建立理论,再由此出发写书的风格,这也许是章学诚对他不满的原因吧。总之,他是乾隆前半期浙东学派的代表学者。

关于此人还有一点虽说不上是其学风的最大长处,但对后世又确有影响的,是其对《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的校正。由于他多少还是有着浙东学风重视理论性、总括性的意识,所以并不像浙西学派那样单纯作校订。对《地理志》也是,不仅限于做部分的校订和沿革的探讨,所进行的是对《地理志》全面的研究。例如关于郡国,就从总体角度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方针与钱大昕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比钱大昕研究要早。只是由于其与作为学问中心的浙西关系稀少,所以他的方法不太为世人所知。他的《水经注》校正是用力很深的。对《水经注》的研究虽然从明末开始已经兴盛起来,但是若论对本文的校正全祖望则是最早的,而能够集其大成的又是赵一清和戴震。赵一清是与全祖望同时期的人,对全氏的观点多有采用。但是,与全祖望相比赵一清、戴震虽然着手较晚,著作却较早问世。另外,全祖望所做的工作中值得注意者还有对"学案"的著述。"学案"的撰著始于黄宗羲,黄氏著有《明儒学案》,对《宋元学案》虽然已经有了大致轮廓的构思,但并未完成,全祖望完成了《宋元学案》。"学案"这一体例是由浙东学派开创的,研究学术史不单纯局限于集结传记,而是能够辨明学派区别、授受由来,整理出便于读者了解各派特色的系统,形成了一种思想史的著作。作为中国学者的方法,虽然编纂者的评论不太多,但在编纂体例、学派划分的方法之中,体现了编纂者的观点。"学案"的创立是黄宗羲,其大成者则是全祖望。

全祖望有着作为史家的敏锐头脑，还有过讽刺性的评论。他对王应麟《困学纪闻》也写过类似注和评那样的文章。为《困学纪闻》写注、写评的人很多，以阎若璩、何焯（义门）、全祖望的著述最为有名，其中尤以全祖望所著最为优秀。阎若璩所著多是列举出典，全祖望、何焯则时常加以评论，且全祖望的评论又较何焯尖锐。在当时能以文章精巧，且词科、史学、经学三才兼备者当数全祖望。全祖望传承黄宗羲的学问，详于明末故事，与浙东人的反抗清朝的思想有着自然的关系。他自己虽没有反对清朝的观点，但是在传播浙东反清人物、事迹这一点上是有关系的。以上所述是浙东在乾隆中期出现的一些代表人物。

乾隆中期以后，当浙西史学盛行考证之风时，在浙东与之相对应的有名家邵晋涵，此人是邵廷采的族孙。他曾为会试第一人，不久在开《四库全书》馆时被召，是与戴震齐名的人物，有所谓经学戴震，史学邵晋涵之称。然而他不仅治史学，也治经学。在《四库全书》馆时就作有《尔雅正义》，被称为名著。在史学方面，也许是因为其计划过于庞大，终未有特别值得注目的著述。他于史学最突出的贡献在今天得见者特别是其《四库全书提要》中对正史的解题，正史的提要几乎全部都是出自邵晋涵之手。不过，今天《四库提要》所载者是经过《四库全书》馆总纂纪昀改动过的，其中甚至有与邵晋涵意见相反的地方，但是毕竟其中的八成还是邵晋涵所撰的原样。《提要》中对正史的评论都是非常精彩的。此外，他在《四库全书》馆编修的著作还有《旧五代史》。此书当时全部散佚，他把散佚的内容从《永乐大典》和其他类书中抽出来予以汇集，基本恢复了原书旧貌，并编入了正史类。

然而，此人最为得意、又最为用力的大著述则是他对《宋史》的重修。一般认为，元代所修《宋》、《辽》、《金》三史质量都不高，其中特别是《宋史》的质量最差而芜杂。对此钱大昕已经有过意见：即《宋史》中南宋时期的质量特别差，北宋部分由于先有了王偁的《东都事略》，因为以此为基础所以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南宋部分是没有类似书籍可以依据的。再就南宋部分来说，最初的高宗、孝宗、光宗三朝之事实一直就比较清楚，也有书籍可供参考；但那以后的部分则是质量最差的，所以，有必要

重修。这是钱大昕的观点,邵晋涵认为这是正确的意见。本来邵晋涵对钱大昕来说是晚辈,于史学亦多受钱大昕的影响,而且通过考试发现邵晋涵的也是钱大昕。邵晋涵早先打算与《东都事略》对应著一部《南都事略》,之后又打算重修《宋史》,但最终就连《南都事略》也没能完成。就《宋史》一事他与章学诚有过反复的讨论。此二人同是浙东人,关系很好,章学诚曾经受到过邵晋涵的多方照顾。邵晋涵很精通宋代史实,特别熟悉那些仅限于浙东学者之间传承的、而于普通史书所不载史实,就这一特点而言几乎无人与之相比。因此,章学诚屡屡劝他着手《宋史》的编纂。但是,由于他所做成不多的草稿后来也散佚了,我们已难以由此了解其人的知识程度和用力程度了。邵晋涵虽较章学诚年少却早早没世,章学诚对此非常惋惜。另外,据说毕沅《续资治通鉴》的大部分都是经邵晋涵修改过的,但是按照章学诚的说法,今日刊行本中并没有经邵氏修改的地方。因为毕沅非常信任邵晋涵,所以将草稿全部交给他,请他订正。然而,在二人死后毕沅家人出版的刊本却只是毕沅的草稿,并不是邵晋涵的修改本。所以我们无法由此见到此人的史才,很是遗憾。由于此人也是浙东人,所以精于明末历史,特别了解经刘宗周、黄宗羲所传的事实,随着邵晋涵的去世,这些事实亦多湮灭无存了。

正如章学诚所言,由于邵晋涵长期居住北京,又处在汉学全盛时期,所以曾治考证之学,论其博识在当时已具有一流学者的程度,但是,其真正的学术精神并非汉学,而是宋学。他说:宋学者大方品行端正,决不可舍。凡士大夫者虽以博学能文杰出当时,但品行恶则不可。[1] 邵晋涵长期于《四库全书》馆,位终不过四品官,但在当时的评价来说,于史学邵晋涵是第一流的。他与章学诚虽说私交甚好,但于学问喜好又非常不同,邵晋涵属于博识学者,章学诚则毋宁是尊崇学问法则,而非博识学者。邵晋涵对于族祖邵廷采著述深刻意义的了解是来自章学诚的见告,本来邵晋

① 章学诚曾与邵晋涵讨论重修《宋史》:"因请君立言宗旨。君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章氏遗书》卷18《邵与桐别传》)

涵把邵廷采视为普通的乡下学者而未加注意，经章学诚介绍才注意到邵廷采是如何懂得著书方法的，重读其书之后始知邵廷采之深刻。虽然章学诚《文史通义》出版以前，其文章已在学者之间流传，但是将此书广为宣传使之问世则有赖于邵晋涵之力。

章学诚既是浙东史学的完成者，又是建设清朝真正史学的有功之人。不论浙东史学的特色，还是清朝史学的特色，都是因为此人而愈加鲜明起来。章学诚最擅长的是史法，史法即便在清朝史学中也是很特别的，而且由于在章氏以前也有，所以我将另外论述，在此先讲述一下史法以外的内容。

此人于史法以外的著述主要是地方志，不过，今天几乎一部也见不到了。只有《湖北通志》尚存，据说此书是由章学诚起草的，但是从其文集来看现在出版的这部书，并非来自章学诚的原稿。但是由于此书的“义例”和原稿的一部分尚散见于《文集》，所以由此可知章氏著述原则的大致情况。于此之外，章学诚年轻时还写过几种地方志，然均已不存，仅仅在《文史通义·外篇》中记载了一些有关地方志的“义例”而已。

他对撰写地方志有过一种主张，这一主张可见于《文史通义·外篇》开头的《方志立三书议》。他认为写地方志有三点很重要：(一)仿纪传体而作“志”；(二)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三)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提出了以此三项总汇某一地方之文献的观点。这一观点又见于《湖北通志》的序文。此虽是他代替当时总督毕沅而撰写的，但其文章是保存于章学诚《文集》中的。大体而言，他认为将地方志单纯认为是地理图经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认识，他主张地方志必须是一地方的真正史书。而且他认为自古《周礼》有所谓“外史掌四方之志”，所掌的就是地方志，《孟子》中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等都是地方志。古时“六经皆史”，后世因袭于此形成了《春秋》、《诗》、《礼》三家流派。《春秋》中有包括了《书》，这是因为《书》与《春秋》本是一家之学，具有同样的关系。纪传体正史属于《春秋》的流派，地方志则来自于《春秋》。其次，掌故是《礼》的流派，以后世之书而言，杜佑《通典》等属于此类。后来，于唐有《唐会要》，于宋有《宋会要》，于元有《元典章》，于明有

《明会典》。再次，文征是《诗》的流派，即《文选》、《文苑英华》之类，至后世从宋人吕东莱《宋文鉴》、元人苏天爵《元文类》，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征。关于文征，以往的地方志也曾设置《艺文》一类，这并非《汉书·艺文志》那样列举书目，而是列举有关该地方的诗文。这种称为《艺文》的部类存在于以往的地方志中是有其理由的，史书是记事记言的，地方志作为地方的志是记事的，但也要将地方之言记载于《艺文》部类。不过像《文选》、《文苑英华》、《唐文萃》等属于文征中的古老作品，是以文藻为主的作品，并没有将其作为事实证据而做记载的意图；但吕东莱的《宋文鉴》则记载了与政治相关的内容，至《元文类》就更是有着汇编有关往事的目的了。这是后来的进步。总之，章学诚认为地方志的"志"是《春秋》之学，"掌故"是《礼》之学，"文征"是《诗》之学，具备了此三类始可为地方志。而且如果撰写这种地方志的话，此后在修国史时还可以作为国史的材料。以往国史不采用地方志作为材料，那是因为地方志编纂不得当所致。要之，地方志应当包括"志"、"掌故"、"文征"这三部分，"志"是按时间顺序对一代事情的记载，"掌故"是对实际施行之政治法令公文等的记载，"文征"是有关政治及其他事项文章的汇集。此外，他还谈到了有关"丛谈"的撰写。这虽不是真正作为地方志材料所必须的，但是从保存地方逸事来看还是有必要，所以不能废弃。这就是章学诚所考虑的地方志，他所说的地方志是规模庞大的，将撰写地方志视为一种学派那样行为是此人的本意主张。

但是，当时对他的这一观点是有反对意见的，正如前面已稍稍提到的那样，他在《文史通义》中写了与戴震的讨论。戴震的意见是：地方志不必如此铺张。他自己也写过地方志，按照当今习惯仅仅写出地理沿革就是很好的地方志了。章学诚记录了有关此事与戴震的直接会话。戴震见到章学诚所著地方志序例，说这很古雅，然而地方志不必要古雅，也不必有一定的义例，只要写出地理沿革就可以了。说如果沿革搞错了全部都错，其他事情再详备也没有用，体例如何也是无所谓的。章学诚的看法与此相反，他认为以往地方志以沿革为主，是因为前代没有完备的地方志，而不依据前代地方志进行重新撰述的话，当然有必要考证；但是如果有了

像样的地方志,在此基础上修撰的地方志长则百年,短则三四十年连续进行编纂,以前的已经完备,所以只需编纂那些新发生的事情即可。于是古代地理沿革的内容也就不必要记述了。所以,有必要写出几十年间的事实,叙述当时的法令,并作为旁证举出可列入"文征"的诗文。而不应当一开始就从前代所编纂地方志质量不好的角度出发,来制定撰修地方志的方针。章学诚记录了自己的说法。戴震还说:以往,地方志中还记载名僧,由于那是僧侣的内容自己曾经想过予以删除,但那是事实,又是不得删除的。话虽如此,但因为僧并非常人,所以无法将其列入人物传中。自己由于名僧必居古寺,而古寺属于古迹,所以就将其列入了古迹。这样的情况以往没有过。戴震是如此自诩其本人之创见的。章学诚则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僧不是常人。正史中奸臣叛贼也是与忠良人物并举,而载入人物传的,并没有人为认为奸臣叛贼不是人就将其列入《地理志》的。不过,非常的伟人是不载入地方志的,如会稽有禹穴而《会稽志》不载禹事,偃师有汤墓而《偃师志》不载汤事。同样《曲阜志》也是虽然有孔子墓但不载孔子传。由此他嘲弄说,不以僧侣入地方志人物传,也许是像对禹汤同样而尊敬僧侣,所以才十分慎重行事的吧!原本,章学诚是认为著述必须有义例,尽管是琐碎的著述也必须建立法则的学风;与此相反,戴震则是那种一旦发现某种可以进行古史研究的情况,就特别穿凿附会的学风,两者的学风是完全不同的。章学诚虽然对戴震的学问很敬服,但又讨嫌戴震那种对自己不懂的事情也顺嘴胡说的作风。不过,不论戴氏还是章氏在当时都撰写过地方志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大体上这一时期的地方志与其说是地方自发的需要,毋宁说是出于写作者的需要。那些朴学者出于生计的需要,而寻求在地方为官的友人帮助,地方官作为帮助手段就嘱托他们编纂地方志。在章学诚文集中可见这种情况。像章学诚这样从一开始就对地方志感兴趣而考虑各种理论,并进行撰写的人是很例外的。大抵上,撰写地方志的学者是常将序例收入自己文集的。像戴震那种对地方志没有兴趣的人,仅仅是将此作为一种比作家庭教师有优厚收入而写方志的。就地方志的真正意义而言,章学诚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其不仅于地方志即便对全体史书的编纂也是有其相当参考价值的。像梁廷枏

的《南汉书》,虽然不是作为地方志而是作为一个时期的历史著述,但其用意方法与章学诚的见解是一致的。

另外,章学诚还考虑了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应该撰写哪些内容的问题。他也与邵晋涵同样有意撰修《宋史》。邵晋涵博学多识掌握有丰富的材料,因此,章学诚相信邵晋涵所著《宋史》应该是史实精确的著作,然而邵晋涵不是像章学诚那样从史法着手进行撰著的人,他是那种经过考证从而详细撰述事实的人。所以,章学诚希望以邵氏著作为底本,而仅用其三分之一的分量按照自己独特史法撰著《宋史略》,因此屡屡劝说邵晋涵撰述《宋史》。章学诚大体是希望以郑樵《通志》体例为基础,进而在纪传体中加入纪事本末体。于编年体中加入纪事本末体是《通鉴》的方法,而于纪传体中加入纪事本末体则是章学诚最早想到的。如果章学诚以这种方法完成了《宋史》的话,可以说相当于近代西方历史书那样的著作。关于此书,他主张按照郑樵的观点,减少书志而增加图谱。当然,关于《宋史》的义例,不论邵氏《宋史》是否成书他都是准备自己撰写的,不过最终就连此义例也没有完成。由于邵晋涵五十几岁就没世了,章学诚的预期亦未实现,而章学诚本人晚年亦患眼疾不能执笔,所以我们也只能根据文集了解他的一些观点的片断而已。

章学诚在做毕沅的门客时就曾撰写《史籍考》,但没有完成。今天也只能从文集见到序录一部分,及其大体方针。此书是仿效朱彝尊《经义考》体例的作品,即一种史籍的解题。其方针在于:(一)存古逸。他认为古时在经书问世之前一定有作为经书材料的那些书籍。即在《六经》、《左传》、《国语》及其他著作中残存的古史逸文,如《左传》所引用的《军志》、《周志》,《大戴礼》所引之丹书、青史之类。章学诚取王应麟《玉海·艺文门》之意,力图揭示到底有过哪些书籍。(二)辨家法。即汉刘向、刘歆所作的那种校雠学。在史书有通史、断代史、国别的书、众人官修著作,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书籍,不仅有各种笔法,家法亦各异,所以他要对此用校雠法予以辨别。(三)立剪裁之法。撰写《史籍考》希望避免无用冗文,仅仅阐明各种史书的重要之处而已。(四)采集逸篇。此处所指并非古逸文那种上古书籍,而是辑佚那些现今亡佚之隋以前的书籍,基本

是《隋书经籍志考证》的那种思路。(五)辨嫌名。例如《史记》的书名在太史公的时候并不存在,是后来出现的。《旧五代史》当时仅称《五代史》,后来《五代史记》成书后被叫做《新五代史》,与此相对才有了《旧五代史》的叫法。试图对这些难以分辨的名称作出辨析。(六)通晓经部。古时经史不分,后世才分开为二。所以今日经书中也有应该作为史料看待的。因此,即便朱彝尊《经义考》所举出的内容中,也有史学所必要的,所以也打算用于《史籍考》之中。(七)选择子部。这也是意在将子书之中有关历史的内容载入《史籍考》。(八)裁剪集部。也是因为古人文集中有许多有关历史的内容,所以有意予以采用。(九)选择方志。即地方志。(十)选择谱牒。(十一)详撰考异。(十二)详述板刻。即阐明板刻源流。(十三)重视制书。即重视历代天子《实录》、《宝训》、《方略》那类钦定书籍。(十四)明确禁例。阐明那些被禁止的书籍。(十五)可作详细采摭。摘出现存书籍中的叙目、凡例,将亡逸书籍从群书的记载中辑出,尽可能详细地汇集材料撰写《长编》,然后再进行适当删节,用来撰写《史籍考》。章学诚是打算按照以上方针撰写《史籍考》的,此乃一大事业。另外,章学诚所做如此分类是否得当是有疑问的。而且章学诚毕竟说不上博识,考证学也并非其长项,所以他即便撰写这一著作,能否就像搞考证学的人那样顺利取得成功也是个问题。结果仅仅形成了序录、分类,而没有完成本文,这也许是件好事。总之,这是一项大计划,因为其中有毕沅之死,以及章学诚未能长期居住湖北等原因而中止了此书的撰著。当然,后世学者如果依此书的义例,要做的话也是可能的,但若非有阅读大量书籍之便利条件的话,则又是不可能的。

章学诚的主要观点及其工作大体如上所述。章氏也是具有浙东学者所共同的思想倾向的,而且特别注意浙东地方的文献。阮元出任浙江学政时曾搜寻过浙东的遗书,章学诚在一封致阮元的信中,已注意过在浙东向哪些家借书为好的情况。大体上说,浙东的史料很丰富,如前所述《宋史》成书时浙东人袁桷就曾就史料的搜寻提出过种种意见,对于《明史》的编纂浙东人万斯同也有功,章学诚在这方面看来也曾提醒过阮元的注意。

说到章学诚与当时史学大家钱大昕的关系，在他的文集中有致钱大昕的信，还有在毕沅撰成《续通鉴》时，曾替毕沅因相商该书体例而致函钱大昕。钱大昕大体上也是承认章氏治学方法的，而且看来还曾经规劝他公开发表一些著述，章氏在信中说自己的学问不合时宜，可能成为各种攻击的靶子云云。总之，在乾隆至嘉庆年间的所有史学都是以钱大昕为中心的，其中与钱氏学风最接近的是浙西学派的人物，而最远者当属章学诚。大体上是以钱大昕为中心，进而再由钱氏之学出现了分科进展的趋势。

十二、《汉志》、《水经》之学

乾隆、嘉庆以后史学兴盛，自然地形成了各种分科，其中有一门可称之为《汉志》、《水经》之学的分科，即作为《汉书·地理志》中主要内容的水道部分和《水经注》的研究。就《汉书·地理志》而言，如前所述由全祖望开始的此项研究，钱大昕等亦有研究，但毕竟主要以对郡国及其他行政区划沿革的研究为多。然而，后来逐渐出现的水道研究倾向，很有利于对《水经注》研究的开拓。地理学在康熙时期以《禹贡》研究为盛，乾隆时期又兴起了《水经注》的研究。因此，《汉书·地理志》特别是水道的研究就成为了必要。而且其中大体是以《水经注》研究为根本问题的，所以有必要进行以水道为主的研究。

关于《水经注》的研究，即便在清朝也有着激烈争论的。大体上说，争论主要围绕着作为这门学问三大家的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研究究竟谁先谁后进行的问题，在清朝对《水经注》研究的争论几乎全在于此。但是，大体看来由全祖望最早着手研究应该是事实。当然，此学问自明末开始已逐渐流行，其基础是由明代朱谋玮开始的研究，他的校正研究在万历年间已以《水经注笺》出版发行。至清朝，据说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的黄仪在康熙年间曾制作过《水经注》的图，但是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仅有此人做校正的一部分内容。全祖望则有《水经注》五校本、七校本等，如果这些书早一些出版问世的话，则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然而他的最初校正

本在三大家的著作中最后而且是最近才问世的。全祖望与赵一清是同时代人，二人也相互认识。赵一清将全祖望的观点大多写进了自己的著作，而且此事是得到全祖望同意的。赵一清有一本名为《水经注释》的名著，但此书在赵一清生前并没有出版，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然而，赵一清活着的时候看来戴震已开始了《水经注》的校正，尚未完成就应召入《四库全书》馆而见到《永乐大典》的《水经注》，他依此作出校正的即武英殿聚珍版《水经注》（收入《四部丛刊》）。此书在全祖望、赵一清的研究成果之前，最先得以出版；戴震所校《水经注》出版之后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才出版，二者之间在校正方式上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由此曾引起了谁抄袭谁的议论。梁玉绳是与赵一清书出版有关系的人物，戴震的门人段玉裁在给梁玉绳的信中，曾为戴震辩护说戴震的书是其独立研究的成果，决非见到其他书之后的所作。戴震与赵一清之间不仅有《水经注》的问题，另外还有其他微妙的关系。《直隶河渠书》一书是赵一清受直隶总督委托编辑而成的，在此书基本完成之时，戴震受委托代赵一清进行编辑。因此戴震基本使用了赵一清汇集好的材料，而用自己名字发表，只有一条是作为赵一清观点记载的。这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了问题。关于《水经注》也是，不但在当时曾经成为喧哗一时的问题，而且争论一直留至后来。对此事的经纬做出详细调查的是张穆，他断定说无疑是戴震剽窃了赵一清的著作：戴震自称是根据《永乐大典》订正而出版了《水经注》，又说对每一条河流的记录都从分散在《永乐大典》中的材料中收集出来进行了研究。这是说谎。《永乐大典》的《水经注》部分是编集为八册的别本，戴震见到的是此书。《永乐大典》的各河流条中并没有引用《水经注》。所谓依据《永乐大典》作出的订正，实际是他根据自己考虑进行的订正。《永乐大典》的《水经注》是恶本，基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戴震本来在江南时就见过赵一清著作的草稿，他是依此进行订正的。他所谓依据《永乐大典》所做的订正，基本都只是赵一清所订正过的地方；赵一清没有订正，但本可以依据《永乐大典》作出订正的地方，戴震却没有订正。总之是戴震剽窃了赵一清的著作，而且以《永乐大典》乃世人未得见之书为借口抢先出版，是欺世之作。这就是张穆的观点。当时魏源也讲过与张穆

同样的话，这在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中有所记载。

总之，无论如何对此问题是有过激烈争论的，而在其起因中赵一清书出版者也有失策的地方，即因为赵一清书出版是在戴震书之后，所以又吸取了先出版的戴震书中的优点，这就给予段玉裁那种戴震派人物以口实。这是出版者的失策。但就整体内容来看，赵一清方面剽窃得少，戴震一方剽窃得多。全祖望的著作虽是最早着手的，却是最晚出版的。也有人说这是伪书。因为是最晚出版的，所以对赵一清、戴震书都有采取，但有着明确的事先说明，所以完全与伪书无涉。要之，乾隆的前半期是全祖望、赵一清开始了《水经注》研究，后半期有戴震的研究，自古以来由于错误很多而读不通的这部书终于得到了解读这一点是确实的。其后孙星衍做过一些校合，顾千里等虽对其大加褒奖，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非常没有价值的。本来《水经注》有一个问题，是将经与注混杂，至此予以了认真的改正和还原；而且弄清了《水经注》中对河川流经之处使用“过”或“迳”字的区别；也弄清了某县与某县古城的区别。如此，《水经注》的主旨得以明确了。戴震校正的《水经注》有两版，即武英殿聚珍版本和孔继函所刻《戴氏遗书》，仅仅前者是有价值的。赵一清的书也是后来有过几种复刻本，但被认为不是原刻本。

此后，治《水经注》者有董祐诚。此人应该是原本有过作图和图说意图的，但是由于死得早，而未完成。但是已经完成的部分做得很好，《董方立遗书》中收入了其完成的部分。另外，近年来王先谦著有《合校水经注》，汇集当时可见到所有版本进行了校合。虽说在对书的取舍和对书的认真校对都是其长处，但是没有自己的创造。由于这是现今很容易得到的书，所以很是流行。但是，近年真正研究《水经注》的还是杨守敬。他本来有撰写《水经注疏》计划的，尚未付刻就去世了，仅有《水经注疏要删》及其《补遗》，以及《水经注图》的问世。杨守敬之前的汪士铎虽然也作有《水经注图》但并不太好，当然不及杨守敬的著作，杨守敬对《水经注》的研究从年轻时开始倾注了五十年的精力，而他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撰著《水经注疏要删》又有其特别的考虑。按照他的话来说：关于《水经注》研究曾有过全、赵、戴的三氏之争。自己虽有门人熊会贞，但他是个

没有钱的人,所以即便特意作《水经注疏》的话,能否出版也未可知。而将自己的原稿交至他人之手的话,势必又惹起一场骚动。所以趁自己之说尚未被他人剽窃,先将自己独自的观点中最不愿被人剽窃的部分予以结集,著成《要删》及《要删补遗》。杨守敬关于《水经注》有着各种创新,其主要的功绩有:首先,作为《水经注》的校正材料,他利用了明末清初曹学佺的《大明舆地名胜志》,这是很重要的设想。《大明名胜志》成书于明末,其中对《水经注》多有引用,而且都是相当好的《水经注》,足以订正今日的《水经注》诸本。杨守敬发现并很好地加以了利用。杨守敬对以往研究《水经注》的人给予了各种评论,对自己能有集大成之作很有自信。现在其《水经注疏》的原稿,正在经其门人熊会贞之手陆续整理。杨守敬晚年时,由于将自己在日本收集的藏书卖给了袁世凯而有了财力,由于其遗族也并不贫困,所以《水经注》的遗书也应该可以由其遗族出版了。近年研究《水经注》者还有尝试撰著《水经注释地》的张匡学、著《水经注汇校》的杨闵之等人,但他们的书都是些不足取的著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以及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虽然都举出了张匡学的《释地》,但恐怕是并没有看过此书吧。

以上所述只是有关《水经注》的注释或校正,除此之外还有虽以《水经注》为主,但又参考他书而对水道进行的研究。如阮元的《浙江图考》就是其佼佼者。此著没有单行本而仅仅见于《揅经室集》,尽管如此,这却是足够出单行本分量的著作。主要是对《禹贡》中"三江"的考证,是为了证明其中"南江"就是浙江的观点而做的。这是一种论文的体例,大体本于《水经注》,绘图并进行研究,不仅仅限于对本文进行注释是其特色。另外,仅仅对《水经注》的一部分进行研究的,如近年广东著名学者、《东塾读书记》著者陈沣的《水经注西南诸水考》。此人原来曾研究过《汉书·地理志》的水道,这次采取的还是以往的体例,是既参考今日地理,也参考《汉书·地理志》而撰著的。这也不是单纯的注释,也订正了本文中的错误。大体是举出《水经注》的本文,并在其下写出注释,但不是阮元那种近代式论文的体例。

与《水经注》研究相互关联,还出现了有关《汉书·地理志》中水道的

研究。对此有一部特别的著述,即洪颐煊的《汉志水道疏证》。此书虽完成于嘉庆初年,却长期未得出版,近年才在广东开始出版。洪颐煊的想法在于:《汉书·地理志》正好夹在《禹贡》和《水经注》之间,其与《禹贡》虽说多有出入,但与《水经注》却相当一致。另外,许慎的《说文》和郑玄的《尚书》、《周礼》注所引地理也大体合于《汉书·地理志》。所以《汉志》大体正确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洪颐煊出于这一考虑,引用了那些可供参考的古书作《汉志水道疏证》。另外还有陈沣对《汉志》进行研究的专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他没有见过洪颐煊的《疏证》,是很大的遗憾,其著述方式与洪颐煊基本不同。此《水道图说》是按照今日地理情况所做的研究,不是洪氏那种引用古书与《汉书·地理志》参照校合的著作。陈沣非常仔细地用清朝内府的地图与《汉书·地理志》进行了相互对照,此乃其独特的优点。洪颐煊的著述则与实际的地理无关,所以错误很多,在这一点上陈沣的著述中错误较少。不过陈沣也不是没有错误,如满洲、朝鲜方面就有很多错误。陈沣书中还依据清朝《一统图》皆附有图,这很方便。近年,杨守敬注意了《汉志》的水道,他对此虽没有什么特别的著述,但在其《历代沿革图》中是有创见的。在迄今的研究中,他的地图作为《汉书·地理志》的实地研究可说是最正确的了。

作为《水经注》等有关水道研究兴盛的结果,在古地志研究之外,还出现了记述现代水道的著作。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就是这种著作。记述现在水道实际情况的尝试,在清朝初期已经有了,黄宗羲就著有名为《今水经》的著作。他在读《水经注》时曾试图将书中的记述与今日的水道对照,而实际上多不相合,所以想到与其关注于这样的古书,不如撰著一部有关水道的全新著作,这是读古《水经注》的结果。《今水经》是一部极为简单的书,其分量甚至仅仅相当于《水经》的本文。对此书曾有过疑问,即后来曾以别人的名字被出版过,至于那是否就是对黄宗羲书的剽窃虽然不清楚,但至少《知不足斋丛书》是将其作为黄宗羲的著作,看来这是正确的吧。是否由于黄宗羲书的出版而引起了联想虽不太清楚,乾隆以后齐召南写了《水道提纲》。齐召南作翰林时参与过《一统志》的编纂,因为主要是分担编纂外藩的部分,所以进而对塞外水道感兴趣,为了得到

确实的材料,他翻阅了康熙时的内府地图。此图(内府图)记有经纬度,北至蒙古北端,西至西藏之端,东至黑龙江,齐氏欲以此为根据进行撰述。但是齐召南究竟具有多少真正的地理知识还是有些可疑的,这从他在序文以经度占节气先后,以纬度测北极星高低的话就可以知道。本来康熙的内府地图是杰苏伊特(Jesuit)传教士所制,其中有的有经纬度有的没有。其中有经纬度者是最上乘的地图,然而流传很少。但是这绘有经纬度的地图又是成为今日世界所通行之中国地图原型的唐维尔①(d'Anville)地图的基础。这就是齐召南《水道提纲》的基础,以纬度测北极星的高低是可以,以经度占季节之先后就很可笑了。无论如何,《内府地图》原本是用满语写作,而又很可能是以满语、蒙古语、西藏语、土耳其语出版的,而齐召南所依据的则可能是翻译为汉字的版本。也许绘制此地图时的记录存于内府,齐氏将其与地图一同作为参考的,总之他仔细地看过那些地图是肯定的。据说由于内府地图很大,所以看的时候需要在院子里展开来看。以《水道提纲》与唐维尔的地图相对照是相当吻合的,有时还可以用来订正唐维尔图。由此可见,如果对照那些标有经纬度之内府地图的话,应该与此是十分符合的。以此与我在奉天故宫中拍照的满文《盛京图》对照就十分吻合。总之,此书与以往各种地志相比,在文献上确实是准确的,虽说还有个是否真的与实际相符的问题,但实际上看来也是准确的。几年前才去世的宗方小太郎氏曾说:中国人制作的地志多不准确,但只有《水道提纲》是准确的。他当然并不知道此书是依据了内府地图而来,而且内府地图又是出自西方人实测的结果。即使与《水道提纲》以后修撰的中国地志中被认为比较准确的《吉林通志》等相比,可以说也是《水道提纲》较为准确。总之,作为中国有关水道的著述,自古以来如此准确的著作是很少的。齐召南在《一统志》馆时起草此书,因病从《一统志》馆退职,回到江南之后完成。完成后,他将此书献给了天

① 唐维尔(d'Anville),18世纪法国海军军官、地图学家。将由传教士带回欧洲之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本增补修订成《中国、蒙古与西藏新地图集》(Nouvelle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s Chinosis et du Thibet),于1737年在巴黎用法文印制出版,这内容详尽精确的地图成为大多数欧洲制图商印制亚洲地图的蓝本。

子。因为齐召南在翰林时偶尔负伤，当时是乾隆帝遣蒙古名医为他治愈的。他感皇恩而有意献此书，可惜其志未果身先死，于是到了他的儿子始得献上，也因此得以列入了《四库全书》之中。此书在江南出版有豪华板本，收藏于《四库全书》馆以后又在北方有了刻板。光绪年间出版的书是根据南方板重刻而成的。此书对中国内地水道以及塞外部分的记载都很准确，与其后中国的学者为了赚取生活费而编纂的地志相比较也更准确。但是多少有些错误。就我所知，如关于图们江（豆满江）的记载就有误，然而认为是内府地图原有的错误是不可能的，或许是附录于内府地图的原稿有误，或是齐召南处理原稿时致误，乃一页纸的前后错页。但此书仍不失为名著。《四库提要》也引用了齐召南的带有讽刺的语言：古来由于记述地理者多以此作为"艺文"对待，所以或以记述地方名所为主，或有如写仙人怪异、撰写《山海经》一样，或写些道观、寺院的内容，记述些不可思议的异常现象。多是些作为真正的地理学所不必要的内容，和供词赋之用的内容。[①] 认为这种情况在地理学名著《水经注》等也是存在的。还评价说，由于《水道提纲》确实是地理上的记录，所以从一开始就与《水经注》的思想有所不同。因此，此书当然不具备文学的趣味性，唯此才可谓精确。

还有就是关于某一地方水道的记载，在此后也有着各种著作的问世，这里仅例举其中一两部名著。如刘文淇的《扬州水道记》。此书也有制图，而其中的记事则首先是将古来地志与史书中出现的记事作为本文，再对此从各种书籍中举出其他材料所进行的考证。作为扬州水道的记录，这是最为绵密的著述了。然而，此书不用说也是以沿革为主，而没有以扬州最重要的水利为主。关于水利的著作还有一部《浙西水利备考》。此书编纂于道光年间，由浙江巡抚帅承瀛策划，命各府县制图，而后将其汇集而成的。这是以现在水利为主的著述，是官府编纂物的体例。但是在考古方面比较疏略。对当地议论纷纷的关于《禹贡》三江的观点，也是依

① 《四库提要》卷六十九、《史部》二十五、《地理类》二："其自序讥古来记地理者志在《艺文》，情侈观览。或于神仙荒怪，遥续《山海》；或于洞天梵宇，揄扬仙佛；或于游踪偶及，逞异炫奇。形容文饰，只以供词赋之用。"

据了旧说，就连近代胡、阮、程诸氏的观点也未加利用，这一缺点是受到非难的。此书由于具有使用价值而在光绪初年得以重修。其中有趣的是，浙西地方的水道大部分是为了水利而形成的，都是人工开凿的。从江苏地方至浙江即浙西地方，今日已不见天然水道。水路都是人工开凿的，如同运河一样。在这样的地区，需要的是水利的书，而不需要关于天然水道的著作。在中国这样的地方，自然会有与当地相应的著作问世。直隶地方也有着关于直隶水利的丛书问世。在黄河以北至渤海湾地区都是运河发达的地区，那里的天然水道也大抵是作为运河而被开发利用的。虽说其他地方也会有这类著述，但看一看中国地方上所编纂的地志便可知：按其体例来说都是很自然地分为或以天然地理为主，或以人工地理为主的情况。

还有一部道光年间的《蜀水考》。内容是写蜀地方川河水系的，著者是福建人陈登龙。此人虽仅写了本文和简单的原注，但同时有人写了补注（朱锡谷）和分疏（陈一津），是体例完备的著述。然而，实际上作为水路的地志，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的内容我尚未予以研究。作为近年的著述，有马征麟的《长江图说》，这是一部有关长江本流及其附近水路基本正确的著述。虽然原本是关于兵备的著述，而作为水路记述也是可信的，只是作为历史地理多少有些需要斟酌的地方。还有一部连贯黄河下流之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三省黄河全图》也是近年之著，地图等都很精密，是可信之作。其他还有黄河上流、塞外水道方面特别的名著，留待另为一派的“西北地理之学”中去讨论。

十三、古迹的研究

在清朝作为一种分科还兴起了古迹研究的学问。关于古迹的名著在康熙年间已有朱彝尊记述北京的《日下旧闻》，乾隆时天子进而作了补订，成为《钦定日下旧闻考》，这些古迹地志中有一半是由官撰而成名的。在乾隆年间考证盛行之后的名著还有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这是乾隆末年成书的。不过在此之前的乾隆初年还有一部古迹地志的书，即周城

的《宋东京考》。这是写汴京即今日开封的书,此书的宝贵之处在于:写地理之后,还附记了从传奇、小说、野史中扒梳整理出的所有关于该地的材料。此书不是那种对沿革地理的研究,但其汇集有关该地各种可供参考的材料的做法很有新意。其中虽然没有勉强因考证而得出论断,但对于了解古来对该地有着怎样的认识,以及有着哪些因缘沿革还是较方便的。部头有二十卷之多,可称是乾隆初年的名著。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则与之不同,是真正的沿革地理研究,乃用力很深的著作。本来关中地方,在很长时期内是都城所在地,有许多与之相关的记载古迹的地志,毕沅则是其集大成者。对关中历史地理的材料他大多见过,并予以了充分地利用,有的地方还有自己的创见。此书被认为是古迹地理著作中最为上乘者。有的地方还举出古人的诗文以供参考,也列举了一些文牍类的材料。其对材料的取舍以及汇集方法作为中国地志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最初虽添有古迹地图,不过是极为简略的;此外的图多数完全就是绘画,有时则完全是属于想像图,没有实用价值;但关于水路的方面,则绘有鸟瞰图,制作得相当仔细;汉代、唐代的宫殿图等虽亦出自想像而成,但由于是根据古文献所绘,所以是相当可信的。这些著作都可以说是对古迹地志进行考证的典范。

在这类书籍中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也是名著,内容是写长安和洛阳的。所使用的材料虽然以通行的《长安志》等为基础,但由于他仔细地读过《永乐大典》,所以多能选取其中的材料,这些材料中还有大极宫图等。他还利用了金石文。由于使用了其他各种可作为依据的古代材料,所以作为撰述沿革地志来说是最新的写作方法了。此书巧妙地利用了作为清朝学问发展到兴盛的校勘及金石学的著述,其中还适当地利用了唐人的诗文等材料。

另外,在地志中还有一部笔法别致的著作,即汪中的《广陵通典》。记述广陵即扬州之事,只写到了唐代而并未全部完结。汪中的文集中有《广陵对》一文,这是对朱珪所寻问扬州故事的对答,是《文选》风格的文章。汪中本来能文,此文更是以其雄篇大作著称的作品。撰此文之后而有了撰述《广陵通典》之意。《广陵通典》是编年体,本来还打算制有

《志》、《表》等。将丰富的扬州材料汇编为编年体,不分部门全部仅为一篇文章,是非常显示作者手腕的著述。其中当然包括有各种考证,但并未像专以考证撰述沿革地理的学者那样繁琐地一一列举材料,而是希望将考证撰述为大文章的一部分。他去世之后,其子喜孙出版此书时顾千里在序文中评价其为"全收檃括之功,悉泯弥缝之迹"。可谓对其书特征的透彻概括。这是考证与词章完全合一的作品,其中既记载人物,又描写山水,文章之优美足以感染所有读者。这种程度的作品应该说是中国式文化的结晶吧。虽尚未完成,但却作为汪中的名著流传了下来。

总的来说,清朝编修的地方志很多。各省的通志至少编修过二次,很多地方编过三次以上。府志、县志的成书则太多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还仅仅是举出了其主要的一些,这些当然不是读过全部内容之后举出的,看来只是按照著者名字的排列而已。他举出了章学诚的《湖北通志》和其他一些县志,其中也有今日已不存的书籍,决不是都能见到的。就通志来说,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各省都编纂过一次,嘉庆至道光之间又有一次。最初一次与明代地志用的是同一方法,第二次是考证兴盛之后的编纂,设置金石部门情况等多了起来。另外,还出现了有关塞外的地志,这方面内容我们留待西北地理的部分去讲。这里仅举一个可称为模范地方志,且成书最晚而又可作为地方志编纂思想标本的例子,即光绪年间成书的《顺天府志》。此书基本是经张之洞指使,由缪荃孙实际撰写的。其中有张之洞所书《修书略例》。此《略例》写出了地方志编纂考证方法的根本原则,其中所列主要有如下事项:

(一) 宜典核(有根据而确实者)。(摘录材料或要点,或抄写全部内容,或予以分类抄写,或从一开始就将应该作为本文和可以作为注释的部分,按照预定方案进行书写。将那些必须按年代编排的部分简要列出。不能仅仅编制成为排比抄录的史料长编。)

(二) 宜征实。(尽可能多地举出可作为依据的材料。不发无用的编者空论。)

(三) 以地为主。(以写该地方土地为主,省略与此无关的内容。)

(四) 以官文书为据。

（五）多备古事，今事可详于有关土地、人民者，余可略之。

（六）（七）（略）

（八）引书依古雅者。（古老、正确而雅驯材料之意，而非文学作品之意。像《广舆记》那种类似导游手册作品等明代陋书则不为据。）

（九）引书用最初者。（不依据辗转引书。但仅有类书不得引用，原书亡佚者不在此例，如《太平御览》中引用的原书亡佚者。）

（十）群书互异者，宜考订。（应该将经过考订的意见列入注释。）

（十一）一人一事书写两处以上者宜考证，不得依错误置。

（十二）采用顺天府旧志及其他各书，需再次检查所引原书。

（十三）引书必示卷数。

（十四）由于地志是分部门的，凡关涉两门以上者，不妨分别载入，但要有详略之区。（此用郑樵《通志》之例。）

（十五）引用多数材料者、或做辩证者、或牵连旁及者，宜多用夹注。（此采用《史通》观点。由于公牍繁复，必录时列入注释。）

（十六）纪事须有首尾，具年月。

（十七）（略）

（十八）典礼则例非仅与顺天府有关者不录。（如"文庙祭器"、"乐章"之类各处皆有者则不录。）

（十九）生存人姓名、事实、著述不录。然奏疏公牍例外。

（二十）文章写作宜古雅，而不宜过于僻涩险怪。

（二十一）褒贬不宜主张一己之见，当从众议。

（二十二）国朝经制事例（地方制度）中有空缺而难以判断者，宜写明至何年之事。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略）

（二十六）每卷主要编纂者的名字应在卷的大标题之后标出。（当记为"某县某人纂"。）

（二十七）（略）

以上是《通例》，此外还设有《特例》。由此可以了解张之洞等清末学者对地方志编纂的基本思想。如前所述，章学诚曾试图将地方志大规模

地按照文化史材料那种风格进行制作，但是没能完成。实际中使用的基本还是戴震那种以沿革为主的编纂方法，不过这也是作为清朝一般学风，即考证是学术主流所造成的。大体而言，戴震的主张在于将地方志作为一种学问的研究，章学诚则由于是将地方志作为文化史料来对待的，所以他主张即便今日见不到结果，他日也一定有所结果。但是历史之学在近年都是作为个人著述而体现的，于是都是以自然考证为主，而考证又势必以沿革为主，所以戴震之风普遍流行。而对此最为完整吸取，且同时多少能够接受章学诚观点，从而考虑了地方志编纂总论的著述，则是《顺天府志》中张之洞的《通例》。

本来古地方志，例如明代康海所撰的地志、还有清朝陆陇其的地方志虽然也受重视，但所注意的只是尊其简洁而重其文章。不过到了清朝，修地方志时重视确实的考证已成为了主流，这是近代的变化，实际上就地方志来说真正有实用价值的还是清朝风格的地方志，这是地方志的进步。其中汪中那种文章洗练的著述虽说在清朝也不过是特例，但这种风气在清末越发流行。吴汝纶著有《深州风土记》，其写作方法以清朝式考证为主，于汇集金石材料之外，亦重视文章的华美，仿效了《汉书》的文章。但是，这种方法基本在大地方的地方志是行不通的。因为那都是由多人撰写，所以很难统一文章风格。不过清朝近年的倾向是在确实的考证之上，重视文章的写作，所以对地方志也是意在既作为史学，同时又作为文学而精心编修。

作为重视地方志写作之文学性的结果，又产生了以文学手法撰写地方志的体例。历史地理的研究或记述都出现了以赋或诗为表述形式的作品。这虽应该说是清朝才形成的新方法，但也是有其渊源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左思的《三都赋》等，《文选》前面所载的赋大多与地理有关。但是《文选》仅本文是本人所作，注皆为后人所作。后来南宋王十朋的《会稽三赋》虽然当时马上就有人为之作注，但毕竟是别人的注。但是到了元代耶律铸的《龙和宫赋》等，则开了自注的先例。本文以及注都出自一人的写作方法在清朝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特别是写塞外的新奇风土、新鲜物产，由于利用了这种形式而颇为流行。乾隆

帝还亲自作《盛京赋》,不过其注是臣下的学者们做成的。此赋仅本文据说就有三千三百余言,其注更是极力博引旁搜,是为帮助天子以学问而自得所做的注。其中网罗了新奇之风土、禽兽草木之奇巧、地方逸事等等内容,虽说基本是为着显示学问的所作,也确是一种趣味之作。这类作品中著名者如:纪昀的《乌鲁木齐赋》、英和(旗人)的《卜魁城赋》(卜魁乃齐齐哈尔旧名)、徐松的《新疆赋》、和宁(旗人)的《西藏赋》等,其中虽多为贬谪边地时的消磨时间之作,但和宁却不是贬谪西藏,而是为官赴任时的作品。这些多为自注的作品,以此形式既是文学之赋,同时又弄清了当地的历史地理,其中还包括有考证。这些也是体现中国地理学文学化倾向的著述。

在此类著述中还有专为写历史事实的诗作。其最早虽可以追溯到唐人孟棨所作《本事诗》,但《本事诗》是专写男女之间事情的。不过后来由此产生了咏唱历史故事的体例,问世较早的有《南宋杂事诗》,这是康熙年间以厉鹗为首的杭州七位诗人每人写作百首关于南宋故事的绝句的作品,其中附有注,还举出了典据。虽说本来是为了显示博览而作,而并非考证之作,但确是很有意思的作品。材料不仅限于正史,亦采说部。不仅以历史逸事遗闻以诗来表述,而且是以诗见史的构思,实在可说是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产物。读此诗似乎可见当年南宋临安(杭州)的繁荣景象。还有对某一时代之事完全以诗的形式写作的史书,有一部汤运泰的《金源纪事诗》,已有刊本,基本是乐府体例的作品。咏史乐府体例以往已有,元末明初杨维桢的《咏史乐府》就很有名。明代李东阳也有《咏史乐府》。汤运泰所咏的是辽、金之事,但辽的部分由于无人作注而不传。《金源纪事诗》序曰:诗注分为本事注与古事注两种。所谓"本事"是对作诗材料之事实的注;"古事"则是对其文句出处的溯源。杨维桢于二者都有注,而清尤侗撰《明史乐府》时却只有对"本事"作注,所以,《金源纪事诗》仿此书而仅注"本事"。不过,以往《咏史乐府》即便有"本事"注,也并非出于考证学之史学研究法的著述,汤运泰的《金源纪事诗》则是考证学的著述。总之,就连《咏史乐府》也渗入了考证学的研究。从实用的角度上看,《金源纪事诗》可以说是一种金史的纪事本末,有着史书价值的

著作。

以上是有关某一时代的著述,在关于古迹的著作中还有一部陈文述(碧城)的《秣陵集》。“秣陵”即南京的古名,此书所咏为南京故事。自序亦曰,此乃就种种古迹加以考证、正误,加以论断之著,不仅限于词章,亦可称为史论。

总之,乾隆以后的历史学、地理学,在出现了考证化的同时,又有着文学化的倾向,这些著作所显示的是一种试图将学问予以艺术化的趋势。

十四、古史的研究

乾隆以后古史研究日趋兴盛。不过,古史研究于乾隆以前已经开始,清初马骕的《绎史》已很有名,但那是纪事本末体的写作。马骕还著有《左传事纬》将《左传》记为了纪事本末体。然后将此再改写为纪传体的是李锴的《尚史》。这些都是乾隆以前出自补修古史方法的著作,由于当时尚处于考证之风未兴盛的时期,考证上是有不严谨之处的。《绎史》甚至原样取材于《伪古文尚书》而未加实证,其议论亦多为明代那种大体论,而非精密的议论。《尚史》则以其对古书的网罗见长。后来兴起了《竹书纪年》的研究。乾隆初年虽有过徐文靖的《竹书纪年统笺》,也还不是乾隆后半期那种考证学的研究。但是由于多方引用了可作为旁证的事实,所以作为材料对后人的研究是很有用的。那以后,出现过几部研究《竹书纪年》著作,其中主要有雷学淇的《考订竹书纪年》。不仅限于对本文进行考订,而且对有关《竹书纪年》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从那以后才认识到现存《竹书纪年》并非晋时汲郡冢所发现的原本《竹书纪年》,因为发现六朝唐宋时期人所见《竹书纪年》与现存《竹书纪年》之间有所不合。本来,《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魏由晋分离出来,而由于晋又是周的分家,所以作为这部史书的性质,周宣王以后之事用曲沃纪年,即最初晋有本宗与曲沃分家,由于后来作为其分家的曲沃又并掉了本宗,所以宣王以后使用的是曲沃的纪年。战国时期,晋亡之后据说又使用的是魏的纪年,可是现存《竹书纪年》在幽王以后仍然用的是周的纪年。

而且《春秋》用的是周正，据说《竹书纪年》用的却是夏正，可是现存《竹书纪年》用的又是周正。雷学淇由此认为这是现存《竹书纪年》并非原本的证据。而且原本《竹书纪年》中据说有刘宋沈约的注，可现存《竹书纪年》注文中却多为对沈约《宋书·符瑞志》内容的照搬，当然这也是难以信用的。雷学淇作辨误、考证，不仅订正了《竹书纪年》的错误，还根据《竹书纪年》辨析了他书之误。另外，他还对《竹书纪年》的发现做出了辨析，也研究了《竹书纪年》中经学与史学关系上的种种异同，甚至研究了其中的历法。雷学淇还制作了表和图，所谓图是指根据《竹书纪年》所绘的天文图、地理图、历代系图等，是经过相当绵密考证的制作。还有一位也许与雷学淇基本为同时期的赵绍祖也著有《竹书纪年校补》。其观点基本与雷氏相同的，由于主要是对《竹书纪年》本文的研究，所以没有像雷学淇那样涉及天文、地理，是比较简单的著述。

对《竹书纪年》用力最深的是陈逢衡。此人本是扬州富豪，看来是个为了学问而倾家荡产的人物。他不仅是对《竹书纪年》，而对汲冢三书都有研究的兴趣，研究了《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对此三书，以前明代胡应麟曾有过研究，此事见于其《笔丛》，[①]陈逢衡在此影响下也试图有所研究。在见到雷学淇的《考订竹书纪年》后正式着手，从二十七岁开始的近四十年中都致力于此三书的研究。他曾说：自己对《竹书纪年》的研究是最年轻时作的也是最差的，对《逸周书》的研究稍好些，对《穆天子传》的研究较好。他似乎还为《山海经》、《博物志》、《续博物志》等作过注，但没有传下来。对《竹书纪年》虽著有《竹书纪年集证》的大部头著作，但并无学问的头脑，基本上是出于扬州富豪子弟那一程度的著作。仅仅是很方便之作，特点是不论什么都作为材料予以汇集，但是对其汇集的方法却不敢恭维，其论断就更是没有价值了。他的《逸周书补注》序文也表现出没有学问的头脑，即相信《伪古文尚书》。这与毛奇龄既博学又有学问头脑那种特意标新立异而为《伪古文》辩护有所不同，他使用的是一种完全相信《伪古文尚书》的笔法，大有唯恐孔壁之书将亡的忧

① 当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

虑。此人之父陈本礼曾为《楚辞》和汉的《铙歌》作注，倒是比陈逢衡有几分学问头脑的人。此陈逢衡的三书研究，与黄奭所作《汉学堂丛书》都是扬州商人模仿学问之著述的标本，也是愚书的标本。《逸周书补注》、《穆天子传注补正》及其研究与《竹书纪年》的研究相比渐趋简单，但看来那是由于晚年家贫，已无力收集书籍所致，质量也不高。

就古史研究而言，与《竹书纪年》研究相并行的还有《世本》的研究。这是一种汇集亡佚古书佚文而复旧的方法。秦嘉谟著有《世本辑补》，认为《世本》虽亡，但由于汉的司马迁，吴的韦昭、晋的杜预都最为经常利用《世本》，而既然这三人的观点都保存了下来，那么如果汇集这三人著述的话，基本是可以了解《世本》体例的。然而，此三人所利用者是否的确仅限于《世本》则不清楚。不过即便有着是否采摭于他书的暧昧之处，也不忍将其全部舍弃，所以也一并予以辑出。① 此书参照了孙星衍、洪饴孙的研究成果。不过，也利用了其他种种注疏类的材料。此书虽网罗了被认为来自《世本》的材料，但由于他有不忍割舍所集材料之处，有时不免有混入非《世本》内容之嫌，作为《世本》的复旧则有些粗糙。

此外，于《世本》辑佚付出极大努力者尚有一人，即茆泮林，在其《十种古逸书》中辑录了《世本》的佚文。他说见到过秦嘉谟书，那是以孙星衍所藏《淡生堂抄辑本》与洪饴孙之书为基础的著作。而且自己的书虽与秦嘉谟书同时著成，但见到秦书业已出版，才决定自己的书暂不出版。但是后来又有因为书很相似而失其真相之恐，所以予以出版了。还说前人著作中有钱大昭所辑《世本》的《作篇》、《居篇》，接下来又有孙冯翼《问经堂丛书》中对钱书的补充，他对其余不足的部分则有着更多的补充内容。

其他，还有辑录《帝王世纪》佚文的人，也有辑录《古史考》佚文的人，做这种古史辑佚的人很多，一时间古史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盛况。最后也是最为用力的古史佚文辑录是《竹柏山房十五种》，这是林春溥的著作。此人虽为福州人，写书却主要是在北京。此书作为古史的研究有

① 秦嘉谟《世本辑补·序》中引刘子骏语曰："与其过而弃之，毋宁过而存之。"

着各种特长,观此书则可知所有古代史的大要。另外还有一部以历史研究头脑撰述古史研究的书,即崔述的《考信录》。

崔述的《考信录》是一部几乎不受当时盛行之汉学,即许、郑之学影响的著述,虽说并非对汉学全然不知,但其研究方法中确与其没有任何类似之处,或说更像是受到了宋学、朱子学著作的启发。不过,关于《尚书》,看来他见过《四库提要》,知道《提要》的观点,通过《提要》也知道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还知道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等。但是并没有像当时治汉学的许、郑之学学者那样,治小学且在注疏上倾注精力。其原因之一,大概在于此人身为乡下知事,而见不到很多书籍所致吧。虽有不够博学的缺点,但是头脑很敏锐。其学问方法据他说是从三十岁左右才开始想到的,作为其思想的基础是:首先相信那些经书中确实的部分。即在经书中,《尚书》今文、《诗》、《春秋左传》、《论语》可信,三《礼》中《仪礼》的某些部分可信,说是周公之作则不可信,不看重《周礼》、《礼记》,战国以来诸子杂说更不采用。他认为越是随着世纪越下移,越是有种种学说的产生,汉魏以后出现伪书,事实真相就越发不清。至南宋出现了各种经义之书,其中空理道学流行,动辄像禅学那样不注意事实的真相,他就是以这种观点作为研究根底的。在读唐宋以后的史书或野史小说时,他一定对真正的事实在世传之间出现了哪些错误,从后世的事实对其路径进行了思考,将此应用于古史事实并作出了判断。《考信录》全部为三十六卷,其范围起自上古、三代,以《洙泗考信录》、《孟子事实录》论及孔、孟事迹,在此基础上加以可作为参考者,以成三十六卷。书的最前面是《考信录提要》二卷,上卷即《释例》,其中主要记述了研究法的原则。这实在是显示了此人的头脑敏锐,最值得参考。

《释例》中,首先总论了读书当考信之意。提出自古以来随着学问的变迁事实也在受到不断地误解的主张。认为大体来说,见得多则错误少,见得少则错误多。所以那种一见某种事实就由于自己所见甚少而勉强套用在自己所知道的某个被认为存在于当时的人物身上,而认定其就是那一事实之中心人物的做法是最应当排斥的。还说,不见于经书且又不似其人者不可信。例如凡圣人贤人之事中若有不类圣人贤人的话,即便有

所流传亦不必信。其次，又说不宜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此即导致其不信战国秦汉以来杂说的原因。盖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之中多流行借物喻事之风，而其所喻又不必就是事实。误以此为事实的情况出现于汉晋以后。还有，就是虽然确有其事，但有传承之误者亦不可信。又如纬书之所述亦不可信。很多人因为秦汉书籍近古，就认为其说必有所据而信其为真，其实秦汉书籍中互为矛盾者颇多，所以并不能认为一定就是事实。因此，殷周以前之事以《诗》、《书》为据，秦汉以后的书则不足为据，对于汉晋以后的观点要看其根据，若其根据确实的话则可信。另外，传记中由于传闻的不确实，或记忆的不准确是会有误的。例如“九州”之名在《禹贡》里很详细，但在《周礼》中却有所不同，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周人改变了夏时的九州。再如，由于《尔雅》的“九州”又与以上这些说法不同，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指殷的制度。但对此问题，他认为《禹贡》的“九州”是正确的，其他皆误。郑玄注《礼》时，遇有《经》与《记》相异，以及两《记》相异者，就注一是周礼，一是殷礼，或者就注一是士之礼，一是大夫之礼。然而，在一方有误的情况下，由于对双方都希望有所肯定，最终反而是自己出错。还有一种由于传记文中的传闻相异，最终错将双方的传闻一同载入的情况。例如，一说周公代武王祈死，一说周公代成王祈死。前说出自《尚书・金縢》，后说来自《战国策》，其实这本是一件事而误为两件事。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观点虽是崔述依据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的阐述，但是崔述并没有作为宋人的观点明确引用。这种以一事载为两事的情况往往存在于传记中，而且有时还会有所载双方都非事实的情况。另外，还有后人的书中希望为前人小的错误作辩护，更加重了错误的情况。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吾犹及史之缺文也。一般来说，对于战国时期的异端思想，因为是异端，根据正确经典的观点是可以区别的，所以还容易辨别。然而战国以后，由于异端之说与经典混杂而难以辨别，所以有必要区分这两种观点。至后世则附会各种异说以为古书的观点，这是有害于圣人之道的。王安石以《周礼》之法向人民课以重税的做法就属于这种情况。又如，经传文中也往往有言过其实的地方，《孟子》批评《尚书・武成》，认为圣人以至仁讨伐不仁时，像“血流漂杵”

那样的事是不可能的。《孟子》中往往有这类话。说舜浚井建廪,未禀告父母而娶女,虽然这也许是有所依据的,但毕竟还是在流传之中被加上了修饰的结果吧。还说《孟子》七篇是其弟子撰写的,未必就是孟子的原话。还说《传》虽美不可与《经》合,《记》虽美不可齐于《经》。此人是将《诗》、《书》与《礼记》予以明确区别的。另外,他还很反对宋学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等同的做法。在其他方面,他的议论中还有着相当有趣的譬喻。燕的乐毅讨伐齐时,五年间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剩下的只有莒和即墨二城,这是事实。但是对这一事实,后世有的学者却褒奖他一口气攻陷七十余城之后,五年不战而拟以仁义降服齐国;又有人认为停止五年间战争不再攻击,而留下此二城乃乐毅之罪;更有人说乐毅从一开始就未考虑过仁义,因为攻陷七十余城以胜利自豪,用了五年尚未得二城而归于失败。这些观点都是不了解基本事实所发的议论。就好比说有两个近视眼的人,互相夸耀自己的视力。一次偶然的机会,某人欲挂匾额于门上,二人相约次日一同去看匾额之字,验证谁的眼力好。可二人唯恐自己看不见,所以都预先使人去看过那些字了。于是,二人前往那门,甲说匾额上写着哪些哪些字,乙也说是怎样怎样的字。主人说二人所云虽然都是事实,但是那匾额实际上尚未挂出呢。像这样对并非事实的问题大加议论的情况很多。首先是要搞清楚事实的虚实,然后再议论其得失。古之帝王圣贤的情况也如此,由于流传之中有信有伪,所以有必要进行判断。于是他自己著《考信录》。以上就是《释例》的大要。

但是,崔述的研究法,由于是根据现在的常识去推论古代的传说,所以也常有判断失当之处。例如,尧的时代有“羲和”,崔述认为羲和乃尧的日官这是最初真正的事实,由于又称为“日御”所以应该是日官。而后世出现了误解,将“御”理解为御车之意,《离骚》等就有羲和止车的记载;也有理解为御日,即浴日的,《山海经》中就有这个意思。他认为这些都是误解,本来羲和是占日之官,常娥是占月之官。然而,后世误以为常娥是妇人,这才出现了认为她是羿之妻,盗得不死之药逃奔入月的说法。这是因为崔述有着凡《尚书》所载都是正确事实的观点,所以认为羲和乃官职是根本,后来才对此因误解而出现了各种说法。但他没有考虑到,这本

来是传说而后来才被当作了史实的情况。这是他对古代传说时代的事情用后世常识予以考虑所造成的结果。对于《孟子》中有关舜的话，他也出于与上述相同的意思认为是对事实的误解，也是没能考虑古代传说所致。此人也像以往司马迁考虑的那样，认为言必雅驯。认为《尚书》中今文部分都是确实可信的事实，还相信《左传》的记载最初也是属于记录的事实，所以当《论语》与《左传》有所不同时，他以《左传》为准。从这一点上看，崔述虽也有判断的失误，但大体上，他那种考虑古代之事应尽量依据确实的书籍纠正其他杂说之误的思想是出色的。不过，他对确实可信书籍产生的根本却没能予以更充分地考虑。而且将《经》与《传》相区别，认为《经》可信而《传》不可信的观点也是有不充分之处的。对于《经》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崔述尚未进行研究。但是，自古以来中国研究古代之事的学者中，像他这样有着明快议论的人还没有过。总之，这可以说是古代史研究的启蒙时代的人物，他将宋代学者所考虑过的问题予以了更加精密的思考。无论如何，这是以一种既非史学方法，亦非汉学的方法所进行的思考，其中有着相当可取的理论。虽说他以《左传》为可信，但又能很有头脑地指出《左传》中所存在的矛盾和重复之处。例如《左传》中记载鄢陵之战时晋的韩厥追赶郑伯，曰不可再度羞辱国君而停止追赶；当时晋的郤至也同样追赶郑伯，曰伤国君则如施刑罚而停止了追赶。记载了二人类似的情况，他认为这是同一件事分为了二人之事，所以可以判断其中必有一方是传闻有误，他的判断致密而得当。

关于崔述的情况，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虽说是久居乡村的官吏，但在当时还是有人信服他的。崔述虽是直隶大名人，但其门人中有云南陈履和这样笃志之人。此人仅仅在北京与崔述见过一面，此后直至崔述没世的二十余年间未得谋面，陈履和佩服崔述所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汇集了崔述的著述予以出版。即《崔东壁先生遗书》。为此陈履和在南方为官任上死时尚有借债，以致其家属无法回归乡里，地方上的有志者为醵资将此书的印刷板留在了任职之地，使其家属得以返回故乡。为陈履和所出版崔述书作序的人叫汪廷珍，此人为高官，因为见到陈履和编的书而感服崔述，故而为之作序。汪廷珍在序中写道：本来自己就认为殷汤、周

武讨伐君主桀、纣,发动革命是不合理的,因为封建之世与郡县之世不同,汤、武毕竟不是桀、纣的臣下。现在见到《考信录》中也有同样的观点,非常欣喜,由衷地佩服。他这不是从史学上,而是出自大义上的钦佩。无论如何,在中国虽然读其书、信其书的人都很少,但是一旦相信就信得非常强烈。即便在日本,地方大学者中也有崔述的崇拜者。他之所以在日本也得到信服,主要是因为《国朝先正事略》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他的情况,而且大体摘要了他的观点,因而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从德川时代起就有这种热心的信服者,他的书在日本有很多抄本。据我所知内藤耻叟先生就因为从《先正事略》知道了《考信录》而寻得,很早就读过此书。狩野博士将在北京得到的《崔东壁遗书》残本出示于那珂①博士之后,那珂博士终于得到完整本并予以出版。那珂博士曾专注于崔述之说。最近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了,现在崇拜者也很多。崔述殁于嘉庆十一年。他是并非杂治博览,但能以有限的知识利用较好的研究法治古史的学者。②

有一位稍晚于崔述的林春溥,③他著有丛书《竹柏山房十五种》,十五种都是对古代史的集中研究。此人治学方法与崔述不同:崔述完全不采清朝以后兴起的学问方法,即从各种引用书中对佚书予以辑佚复旧的方

---

① 那珂通世(1851—1908),日本明治时期的史学家。"东洋史"(东方史)概念的创始人。明治维新之后入庆应义塾学习英语英国文学。曾任中学教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东京帝国大学讲师。以对日本、朝鲜、中国的历史进行实证研究见称。代表作有《支那通史》(中国通史)、《上世年纪考》(日本纪年研究)、《成吉思汗实录》(《元朝秘史》的日文译著)等。他校点的《崔东壁先生遗书十九种》2007年5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② 崔述(1775—1862),河北大名人,字东壁。虽与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为同时代人,但学风不同。主要著有《考信录提要》、《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孟子事实录》等,其著述曾长期不为人所重视。20世纪初年,《考信录》首先受到日本学者的褒扬,即这里提到的那珂通世读到《东壁遗书》一事。他将全书校点出版,并撰文评价:"中国学者拘守汉儒之训诂,耽于宋儒之空理,其弊固不待言。尚古之念既深,对于古书皆如宗教徒之崇拜经文。……崔氏处于群迷之中,独能建树己说","识古通今,考据辨析高出于汉宋诸儒之上"(《考信录解题》,载于日本《史学杂志》)。国内最早重视此书的是刘师培,他从日本带回了上述信息,并撰《崔述传》介绍其生平和著作。此后,《考信录》引起胡适、钱玄同、顾颉刚、洪业等学者的研究兴趣。

③ 林春溥(1775—1862),福建闽县(今属福州)人,字立源,号鉴塘。嘉庆进士。初授庶吉士,曾任教习庶吉士,派修国史。道光元年(1821)充文渊阁校理。以父老归养,先后讲学南浦、鹅湖及鳌峰诸书院。治中国古史,编撰有《竹书纪年补证》、《战国纪年》、《古史纪年》等。

法，完全与一般学风无关；林春溥则利用了清朝兴起的所有学问。最初著有《开辟传疑》一书，是研究中国开辟传说这种极为上古内容的著述。与崔述不同，他从常识出发，对不可信之古老传说予以了巧妙的利用。像《三坟》这种书在今日虽然尚存，但这是后世才出现的，上古时是否有此书还不清楚。孔安国《尚书序》中虽出现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但这是一本最不可信的书。即便是这类的书籍他也乐于采用，从那些被认为是伪造的内容中，提取某些有用的素材。这类内容多出自纬书，与崔述不信纬书相反，林春溥则予以采用，认为《三坟》并不完全是伪书。结果他得出了有趣的观点，即对古代各种天子名字不可认为是纵向连接的，所谓“某氏某氏”，这些不过是诸方分置而同时存在者，是古代那种国家不统一的存在形式而已。他认为对于这类情况的古代传说不妨认为有几分是可信的，不过那些年代是不可信的。以上是他对黄帝以前情况的观点，对黄帝以后的情况他认为应当基于《竹书纪年》，认为对《竹书纪年》少许举出一些缺点就怀疑其全书是不妥的。并说现存《竹书纪年》虽然多有脱落，但不能说全是伪作，于是著《古史纪年》。此书大体以《竹书纪年》作为基础，内容写到了春秋之前，他对此列举了各种传记杂说进行比较研究，获得了很好的结果。而且，还制有年表，此年表称为《古史考年异同表》，对有关古代史的所有书籍全都进行了比较研究，即《竹书纪年》、《史记》、《帝王世纪》、由三统术推算出的《纪年》、《大衍历》、郑樵的《通志》、杂见（其他的断片史料）、金履祥的《通鉴前篇》等，由于这些著作都按照自己的史法编订了年代，所以他对各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其次，对春秋时代他著有《春秋经传比事》，说自己意在对《左传》的繁杂之处予以简化，用《国语》、《史记》等进行补充，在其间谨慎取舍。另外，对《竹书纪年》同时代的史事，他还另著有《武王克殷日纪》。《汉书·律历志》所载逸《武成篇》中记有武王克殷的日期，由此可推知当时的历日，所以他参考《逸周书》等撰写了此书。对于战国时代他著有《战国纪年》，也是用力颇深之作。关于战国纪年《史记》中也有不准确之处。司马迁因为列国记录皆亡，只得依据《秦记》确定纪年，所以与《竹书纪年》的年数有所不合。自古以来关于此二书的差异虽然有所议论，但是为了使二者吻合

就必须将《史记》中各国君主的年数延长或缩短。大体上在战国，于秦以外说是六国实有九国，就得考虑如何使各国年数皆能吻合。本书就是考虑了如何弥合此差异的著述，他对《竹书纪年》记载的年代以《竹书纪年》为依据制作年表附于本书。孟子的时代很难与《纪年》吻合，《通鉴》对此未采《史记》而依据了《竹书纪年》，此书虽也是基于《竹书纪年》的撰著，但却纠正了《通鉴》的错误。此外，他还撰有《竹书纪年补证》。本来，对于古史纪年他虽然以《竹书纪年》为主，但《竹书纪年补正》却并不是为了确定古史的纪年而著，而是对《竹书纪年》本文的研究。还有《孔门师弟年表》和《孟子时事年表》，尤以后者为佳。《孟子》中的疑问在于关于齐伐燕一事，《孟子》记为齐宣王，《史记》则记为齐湣王，《孟子时事年表》为正确地解决年数不合的疑问下了很大功夫。另外，还著有《孔子世家补订》、《孟子列传纂》，从各种书籍中举出许多可作为旁证的材料，充分收集了孔孟传记的史料。还著有《四书拾遗》、《古书拾遗》，后者更有意思，收集了今日散佚古书的断片。甚至对古卜筮方面的书籍、古谚、古歌等亦有所分类汇集。这些虽说是作为古史研究的副产物撰著的，但对后人来说的确是很便于利用的著作。另外，还有一部古书札记《开卷偶得》。大体上，是按经书、史书顺序的内容，比如考察了《史记》的逸文。此书对有些本非《史记》中的佚文，却被误作为《史记》逸文使用了古书的情况作出了辨证。比如，《史记》对共和以前之事是不立年代的，尽管如此作为《史记》逸文中却有记有古代年数的内容，他论证认为这些多是对《帝王世纪》的引用文。

大体而言，林春溥在古史研究方面有着对古代传说的理解，这一点与崔述不同，他经过复杂的整理、巧妙的利用而做出了判断。作为古代史研究法，比之启蒙时代的崔述，林春溥有着很大的进步。这是与清朝学风相应的古史研究法。此人殁于咸丰末年。总之，以上二人都是中国研究古史的大家。

此外，作为屈指可数的古史研究家还有胡克家。他虽没有特别的著述，但对宋人刘恕《通鉴外记》的《补注》，是在方法上相当下功夫的著述。刘恕采用宋代尚存的所有材料，撰写了《通鉴》内容以前史事。其书虽也

有自注,但没有说明材料的来源。因此,胡克家在弄清其材料出处上下了很大功夫。由于宋代尚存书籍已逐渐丧失,所以查明其出处已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其对出处的列举方式也很严谨,出于哪一篇的篇名,或类书的卷数,像今日人的做法一样,很详细地为研究者提供了材料。其用力方式与治《隋书·经籍志》的章宗源很相似。

胡克家另外还出版了《文选》李善注的宋版,对此精心校勘,写有《考异》。他还曾复刻再版了《胡三省注》的元版。当然,由于此人是地方大官,所以撰著亦非其一人之力,而是有其幕僚协助的。虽说其本人没有什么自己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作为考证古史材料的人物他是用力很深的。

十五、西北地理之学(一)

在乾隆以后史学的各分科中,直至清朝末年持续不断而又最为发展、学者最为倾注精力的是有关塞外的研究,清人称之为西北地理之学。这是一门与地理、历史都有关系的学问。这种有关塞外的研究之所以发展的原因,是清朝版图的扩大,其中包括了塞外地方;而随着版图的扩大,进而又兼有了各种民族,于是逐渐地了解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和风俗,以至出现了对这些现象需要进行比较研究的情况。这是有关塞外研究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与塞外的关系最早开始于康熙年间的准噶尔征伐,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由此出现许多关于蒙古地方的"纪行",殷化行的《西征纪略》、钱良择的《出塞纪略》属此。尤其到了图理琛的《异域录》,甚至注意到并记录了俄国的情况。而最作为官书形式的,则是《平定朔漠方略》。在满洲方面,有着康熙二十二、二十三年在黑龙江地区与俄国的冲突,由此出现了《罗刹方略》一书。其他,在顺治至康熙初年,有许多迁谪者被送到了满洲,其中也有文人、学者,他们撰写了记述满洲的书籍。吴兆骞是在顺治年间被流放宁古塔的,他是诗人,有诗集《秋笳集》,其子吴振臣著有《宁古塔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方式济的《龙沙纪略》等皆记述了满洲地方的土地风俗。还有回疆(后来的新疆)地方,从乾隆年间征伐并平定此地开始,也出现了

许多相关的著述。而且自乾隆中期开始更加多了起来，著名的有满洲人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最为流行，在日本也有翻刻。早在此前也有过几种纪行类书籍。西藏地方也是在康熙年间有过纷争，自清朝以武力平定那里以后，也出现了记事的书。另外，关于塞外地理方面，尤为显著的是康熙帝派遣之杰苏伊特(Jesuit)传教士所测量的地图，凡是所到之处都测量过了天度，对于山川也有着比较准确的记载。由此，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精密地图，直至现在尤其是塞外的地图，还是依靠那时的地图。与这次测量前后的地图相比较，在精密程度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因此，塞外的地方志记事越发绵密了，尤其是满洲地方，在康熙中期还出现了《盛京通志》。这是包括了今日东三省的地方志，开始时只有三十二卷还比较简单，后来有所增补，乾隆中最后形成的《钦定盛京通志》已有一百三十卷。其他方面还有乾隆年间乾隆帝敕撰的《满洲源流考》，这是关于地理以及当地兴起的各国、种族、风俗等的研究著作。从今日来看虽不能说准确，但是关于满洲这是迄今为止最出色的著作。对于新疆地方作为官撰著作有《皇舆西域图志》。

此外还有些对极小一部分情况的特别记述、研究的著作。例如，康熙年间派遣至长白山的使者对当时情况的记录。尤其是关于黄河河源，康熙、乾隆二朝都进行了调查，乾隆四十七年成书的《钦定河源纪略》即此调查的结果。有关长白山的记述，虽然只是单纯按照古礼举行封山之礼使者的简单纪行，但是关于河源的记述，却是乾隆时特意派遣使者探险而成的三十五卷大著述。此书有图，有水路表，在“质实”项目之下列举出了地理上的实际情况，“证古”项中列举了古来书籍中所见情况，“辨讹”中纠正了前书的错误，“纪事”中记载了其他事情，另外还有“杂录”。这部书为了夸张，说河源是在清朝特别是在乾隆时期才开始探明成书的，其实，河源在元代已有过对星宿海①的探险而予以判明了。乾隆帝希望比

① 星宿海，位于黄河源头地区的湖泊。东与扎陵湖相邻，西与黄河源流玛曲相接。星宿海地区海拔4000余米。星宿海，藏语称为“错岔”，意思是“花海子”。这里的地形是一个狭长的盆地，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黄河之水行至此，因地势平缓，河面骤然展宽，流速也变缓，四处流淌的河水，使这里形成大片沼泽和众多的湖泊。

前代了解得更多,进而向上流进行了探险,吹嘘流入星宿海的小河才是真正的河源。本来关于河源的问题,不仅朝廷,民间也从很早就开始注意了,早先就有万斯同所著《昆仑河源考》,他举出上起《尚书》下至明代有关河源的记事予以辨证,汇集了在康熙的河源探险以前材料,订正了那些材料中的错误,选取其正确内容,是对这一问题最好的研究成果。作为文献上的材料,此书后来成为了《河源纪略》成书的素材。

以上是地理研究发展的情况,另外还有语言上的研究。自满人统治中国开始,由于有必要使用满洲语而刊行了满洲语辞典。康熙年间已出现了民间学者编纂的满洲语字典,而官撰的字典是在康熙四十七年刊行的《清文鉴》这种有词有翻译的满洲语书籍。此后至康熙五十六年之间又出现了满蒙对译的字典。另外,满汉对译的字典至少至乾隆初年已经出现,此前的情况不清。满汉对译的《增订清文鉴》的出版是在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四十五年出版了满蒙汉对译的《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后来加上了西藏语又有了《四体清文鉴》。其后又加之回语(土耳其语)为《五体清文鉴》,但是没有刊行。我们曾对奉天宫殿里的这部书拍了照片,大英博物馆里也有。《四体》以前的几种书都已刊行。总之,作为领土扩大的结果,逐渐出现了统治领域内通行语言的对译字典,由此又将比较语言学开始应用于史学,出于乾隆帝的规划,还作成了《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以往的《辽史》、《金史》中虽附有国语解,契丹语、女真语也都用汉字书写,但《三史国语解》是用满洲字按照发音书写的,对其用语的意思也加以了说明,还对以往三史所用音译的错误进行了考证。乾隆末年基于《三史国语解》的研究,将三史中出现的国语文字一律改为了音译字。这种改译不仅限于三史,辽、金、元时代凡是使用国语的书,在编纂《四库全书》时都进行了改译。虽说这在学问上是没有价值的工作,损失了原书的面貌,为研究带来了不便,但又确是花了很大力气的大型著作。乾隆的后半期翻译事业迅速发展,就翻译佛经来说,以汉译藏经及西藏藏经为底本编纂了满洲藏经。像《钦定同文韵统》这种乾隆初年的成书,就是出于当时这种需要的书籍,是将各种文字发音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

如此,作为塞外研究发展的结果,这一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因此,像钱大昕那样的史学大家,也注意到了蒙古语的史料。钱大昕从蒙古现存的碑文已经开始注意蒙古语了,那时出现了像《元朝秘史》那样的蒙文材料。钱大昕将《四库全书》编纂时从《永乐大典》中抽出的书,与作为原有《元朝秘史》最初版抄本而流传的书,两方面相比较而开始了研究。《元朝秘史》是以蒙古文记载的蒙古古代史,而且蒙文被绵密地音译成汉字。钱大昕断言此书是作为蒙古开国时代史料的有力著作,还与《元史》进行比较,举出了此书的诸多优点。由于这一材料很珍贵,他多少有些对《秘史》过于相信的倾向,虽然他将凡是《秘史》比《元史》详细的地方统统归结为《元史》的粗漏,但是看来《元史》也有因某些认识予以简略的情况,所以说是不是一定如钱氏所云则不太清楚。但是,无论如何能够注意这一珍贵史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此外,他还注意到了一部虽非蒙古文,但是出自蒙古文材料而成书的《皇元圣武亲征录》。此书较之《秘史》更接近《元史》,而且也接近于拉施德的《蒙古史》。此书虽然很早在元代已经翻译成了汉文,但是将其作为元史研究的有力史料进行介绍的是钱大昕;此书虽载入了《四库全书》中,但介绍其贵重价值的是钱大昕。对于其他有关元的史料,如《元名臣事略》(《国朝名臣事略》)、《元典章》等也都是由钱大昕开始予以注意的。另如有名的长春真人的《西游记》,本来是《道藏》中书籍,以往几乎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也是钱大昕开始注意的。特别是由于他通晓天文历算,所以注意了《西游记》中的阿拉伯历,并予以了研究。如此,钱大昕收集了种种材料,而有了重修《元史》的考虑。据说他作有稿本《元史稿》,但那是不确切的。已故岛田翰氏说他见过此书,①但也不肯定。有一些被认为是《元史稿》局部的内容已有刻本,即《氏族表》和《艺文志》,虽然分量很少,质量却很好,是研究本来的蒙古氏族之外,中亚各种族即色目人的著作。最近成书的柯劭忞的《新元史》的《氏族表》就是照原样采用钱大昕原作的。除了这种完整著作之外,关

① 此事见于(日)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所附《访馀录》(中华书局《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2006版)。

于蒙古史料，在《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中也有着各种像史料解题之类的记载，由此是可以得到大致了解的。至此，开拓西北历史学新领域的钱氏的方针，大体可以有所了解了。

此外，还有一位乾隆中叶至道光初期的蒙古旗人大臣松筠，此人曾给于塞外研究以极大的影响。他本是一位既懂学问，又有政治才干的边疆高官。先任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后派遣为伊犁将军，又派遣到了西藏。他著有关于伊犁、西藏的著作，不过，其中既有出自幕僚之手的内容也有其本人的撰著。此人的著作虽多为政治意义的内容，但也自然有助于边疆地理研究。关于西藏的著述虽嫌简单，但确是有关西藏地理的著作。在叙述伊犁地方地理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当然，这与当时该地方的贬谪官吏中有着可以撰述此书的合适人选也有关系，即有着祁韵士、徐松那样的人物，松筠曾委托这些人撰著伊犁新疆地方的著作。而且，祁韵士还于嘉庆初年撰有《伊犁总统事略》，[①]后来此书由徐松订正，献给天子后，由天子赐名为《新疆识略》。此书成于道光年间。作为这些书实际作者的祁韵士、徐松，因为是贬谪的身份，所以不得署名，但的确是这些人的著述。祁韵士在此之外还撰有《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一类新疆地方见闻记。松筠虽然并非历史、地理学者，但正是由于在边疆有了像他这样理解学问的人物，这些在西北地理学上有价值的著作才得以问世则是事实。祁韵士既有史家之才，又有史家之识，而且在实际上对塞外历史地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除了上述书之外，还著有《西陲要略》。但是，此人最重要的著述还不是这些。他在北京时就曾有过对蒙古、西藏做特别调查的机会，乾隆年间他在任时，曾编纂了《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王公传》，这些虽主要是作为当时实录及方略那种官撰文书而编纂的，但都是以祁韵士为主执笔的。这些书在编纂时，虽然需要懂蒙古语、土耳其语，或是不得不向懂蒙古语、土耳其语的人请教，总之祁韵士完成了这一工

---

① 《伊犁总统事略》，又名《西陲总统事略》。嘉庆七年(1802)伊犁将军松筠命戍员汪廷楷始编，十年命因事谪戍伊犁之祁韵士增辑补纂，十三年成书，凡十二卷，13 万字。徐松在此基础上增纂成 28 万字，1820 年，松筠作序，并附有赓宁所绘舆图 19 幅，并进呈道光皇帝。有道光年间多种刻本、民国石印本、近年影印本等。

作。执笔这种官撰书籍对他是一种好机会,这些作为官书虽然不过是些规整的撰写,但他以这种官撰为基础又写成了自己的著述,《皇朝藩部要略》就是这种著作。此书由于依据了正确的史料,而不取任何不确之传闻,所以可称之为塞外史书最初的名著。此书虽是他最为用力的著述,可惜还仅在草稿尚未付梓的阶段祁韵士就去世了。将此书整理出版的是张穆。祁韵士、张穆相继撰著此书的情况,显示了塞外研究学者中已出现了一种系统,作为此系统的人物直至清朝末年都在不断进行着研究。祁韵士的研究还多限于对官署文书材料的编纂,尚未做到像钱大昕那样调查材料,使之成为元明以来史书与学问上的一部分。然而,到了张穆的时候,则已不再单纯局限于官署材料,而是汇集元代以来材料,即结合了钱大昕开创学问的研究和祁韵士从官署文书出发的研究的两个方面,使塞外史的研究有着相当的发展。

张穆与祁韵士同为山西人,他在科举考试方面虽然不走运,但由于学问出色而在北京很有名。当时在北京有一个可以称得上学问团体的同伙,他与徐松等都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因此,西北地理学有着很大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人物,在无聊的考试中失败了。在北京参加举人考试时,竟然把酒带入了考场,遭监考官斥责时他即座将酒一饮而尽。因为考试要写四书文,所以当时有事先写好草稿而隐藏于考场的现象。于是,张穆也被抽查,衣服被撕开也没有发现什么。那时张穆口出豪言说:书在我腹中,不会连自己腹中的书也要搜查吧。然而从他的笔袋中一张纸上发现了一行字,当场监考官将其作为夹带(怀带),把他送入牢房,又因查无证据获释。虽是这样的人物,却在学者同伙中颇有人望。祁韵士之子祁寯藻虽然官至道光、咸丰的大学士,但此人对张穆却多有照顾。张穆著有《蒙古游牧记》。祁韵士的《藩部要略》是蒙古各旗的编年史一类的著述,《蒙古游牧记》则是与之相应,撰述了各旗的地理。此书的质量很高,虽是写现在地理,注释中却汇集了所有关于蒙古古代以来的文献,而且对这些史料有着考证批判,是历史地理的著作。作为蒙古历史地理书,如此质量的著述还是前所未有的。此书有十六卷,在研究上是相当下功夫的。由于张穆死得较早,此书在他生前未能完成,他的晚辈后学福

建人何秋涛整理、校正了张穆的草稿。我手头有何秋涛掌握的草稿的一部分,看来张穆的草稿大体已经完成,何秋涛进行整理,也只是稍稍有所补订而已。张穆殁于道光末年。大体上,张穆的学问看来是出于祁韵士之上的。祁韵士于《藩部要略》之外也还有著作,但由于多为见闻记之类,所以并非汇集古来材料的研究著作。此外,也未见有何才能,而张穆则于经学、诗文都有所见长。他也研究了元史,并开始了《皇元圣武亲征录》的校正。这是一部因前后错落,误字甚多而难以读通的书,所以他着手开始进行了校正。虽然最早注意此书的是钱大昕,但他对此书究竟下了多大功夫则不太清楚。着手下工夫开始阅读的确是张穆,进而最终完成此著的则是何秋涛。所以说,张穆之学传承了两方面的学问:即一方面继承了祁韵士以来的系统而又连续传至何秋涛的,出自西北地理事实上的研究;一方面又承接了钱大昕以来兴起的从古史料上研究的塞外史学。此人在构筑清朝西北地理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亲征录》经张穆、何秋涛二人之手,至近代又有沈曾植也作了校正。在日本那珂通世博士也精心地做了研究。在这些人努力之下,此书虽大部分可以读通,但是由于原本质量很差,即便经过如此诸多学者的努力仍然有错误。七八年前出现了好的原本,傅增湘氏得到了此书。他将此书与何秋涛书相互校合并寄给了我,看得出经过他们的研究,已经使的质量不佳的原本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善本而易于阅读了,本来无论如何读不通的地方,在此书中得以读解之处确实不少。在其他方面,张穆还研究过《魏延昌地形志》,不过其书已不传。[①] 这是对《魏书·地形志》的研究。张穆还著有《顾亭林年谱》、《阎潜丘年谱》。顾炎武是清朝经学、史学的鼻祖,至于阎若璩大概因为同为山西人的原因吧。另外,张穆还与何绍基等人于道光末年在北京外城建顾亭林祠堂,每年春秋以及亭林的生日都聚集学者去祭奠,如此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每次集会还有题名于卷轴的惯例,其中初期的作品,在近年还得以出版。这都是些重视清朝经史之学系统而治学的学者。张穆

① 谷川道雄先生提示:对此《北魏延昌年间地形志》有人做过复原,原稿残存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还有诗文集,名为《月斋集》。何秋涛虽是适于校订、注释古书的学者,却于同治元年三十九岁就英年早逝。他虽为张穆完成了《蒙古游牧记》,但此人用力最深的是《圣武亲征录》。何秋涛此外还著有《王会篇笺释》。《逸周书》中有《王会解》一篇,虽是有关周成王一统天下时来自四方之国贡物的记录,但其中有塞外夷狄之名,由此可知实际上这无疑是汉初成书的。在何秋涛以前宋人王应麟虽已经注意并着手研究了此书,但由于难于进行而未能完成,至何秋涛则对其完成了绵密的研究。何秋涛于经学亦有造诣,有《一镫精舍甲部稿》,虽然仅仅一册,却足以见其学力。

此人作为自己一生事业而最希望完成的是《北徼汇编》。咸丰年间因为与俄国发生了边界问题,所以这是带有几分政治意图而策划的著述,书中详细撰述了有关与俄国交涉情况。由于他为官不过刑部主事这样的低职,所以此书是由陈孚恩等献给咸丰帝天览的,天子赐名为《朔方备乘》。然而,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所进呈的这部书恐怕是在火烧圆明园时烧毁了。天子曾询问此书可有副本,黄宗汉说用何秋涛的草稿应该是可以誊清的,但又因黄宗汉的家也被烧毁,所以其书全部毁灭了。而且又由于何秋涛的去世,终未得成书。今日此书草稿的一部分被冠以《北徼汇编》在北京仅存一部粗制版。后来,在李鸿章作直隶总督时期,幕僚根据何秋涛的目录再次进行了编纂,即今日的《朔方备乘》。这虽是依据何秋涛的方针所作,但由于是重新编纂的,所以无法由此得知何秋涛所作的详细研究。此书是李鸿章幕下黄彭年为主所编纂的,由于近年黄彭年文集的出版,其中的原委亦为世人所知,但毕竟黄不是专家,所以可以说他没能撰成何秋涛那样的著作。

如此,在张穆、何秋涛两代之间,钱大昕开创之学风与祁韵士等人依据官署文书之研究,这两方面都得到了集大成的发展,以致这几乎成为了一门单独的学问。

大体在这期间,北京成为了学问的中心。乾隆后半期北京开《四库全书》馆时,由于编纂此书而聚集了很多学者,虽然也曾使北京成为了学问的中心,但是后来奖励学问发展的高官去了南方,继毕沅之后有阮元,他所到任之地聚集学者,学问兴盛。阮元由于是扬州盐商之子,而有财

力。居山东时，毕沅为巡抚，阮元为学政。阮元为浙江学政时也聚集了学者；作广东总督时，《皇清经解》问世。当时很多学者曾聚集南方，但是从道光年间开始，学者又再次聚集北京。程恩泽成为照顾这些学者的中心人物，祁寯藻当时也在北京。这些学者之中既有治宋学者，也有治汉学者，有着各方面的人物，此时迎来了西北地理学兴盛的机运。张穆、何秋涛也在祁寯藻的门下，是兼治西北地理与汉学的人物。

嘉庆、道光之间，与张穆同样作西北地理研究的有徐松、沈垚二人。徐松是北京人，嘉庆十七年他三十二岁，作湖南学政时因行为不端（据说双亲收取贿赂）而贬谪伊犁。他二十五岁中进士，而且为二甲进士第一人。年轻时开始有志于史学，为翰林时开始抄录《永乐大典》。贬谪伊犁之后，利用这次机会研究了西域地方的金石文。在伊犁七八年后赦归，其间撰著了可称为不朽之作的名著《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还作有《新疆赋》。当时恰值松筠任伊犁将军之时，松筠将嘱祁韵士所编纂《伊犁总统事略》委托徐松再度修改，为此徐松得以调查这方面的地理。此人为此进行了实地的踏勘。他所到之处随身携带棋盘格（方孔）的小册子，配戴罗盘，就地详细绘图，还从士兵、土著民那里了解当地情况予以记录，所以此人的撰著是没有空洞之言的。《西域水道记》也是以当时现存水路为基础，根据古来文献所进行的考证。《汉书西域传补注》则是以古代记事为基础，将其与今日地理做对照的研究。《新疆赋》也是有关地理历史的内容。他因为研究过金石，所以著述中往往使用金石文。此时，他所拓的金石拓本在金石家之间流传并被秘藏。就连敦煌石窟此人亦已见过，但是由于此时石窟中的书籍尚未外露，所以他只注意并研究了石窟外部的碑。由于他完成了松筠委托的《新疆识略》，所以天子也信任他，因此又回到北京为官，官职并未迁升，道光末年去世。此人还注意到了长春真人的《西游记》，对其内容进行了研究。今日所传《西游记》版本的跋中，最初一篇是发现此书的钱大昕的跋，然后是徐松的跋，其次是程同文的跋。此书是张穆将其收入山西地方富豪杨氏所作《连筠簃丛书》中得以出版的。

较徐松为晚辈后学的南方湖州出身的沈垚，也是一位可称为对西北

地理之学具有天才的人物。早在湖州乡下时已经著有《新疆私议》,因此受到徐松重视。但他是个在考试上不走运的人,因而未得及第。其遗著中著名者有《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此书对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特别是金山(阿尔泰山)以东的纪行所见地理,利用所有文献进行了研究,可谓《西游记》研究中最为详尽的力作。他的著述虽也由张穆作为《落帆楼文稿》四卷收入《连筠簃丛书》予以出版,不过那仅是其著述的一部分。后来,民国七年他的遗稿大部分都作为《落帆楼文集》得以出版。他于道光二十年,四十三岁时去世。据说徐松等人后来还整理了此人的遗业。

徐松、沈垚、张穆等人在北京从事西北地理学研究的时候,是这一学问的全盛时期。此外,还有一位姚元之,虽没有什么大著作,但是个高官人物。据说这些人物相互交往、聚会,讨论了共同感兴趣的西北地理学的话题。

当时在北京由于与这些人交往而治西北地理之学的还有龚自珍,虽然对此没有留下专门的著述,但是对此是有其思想的,这一点从他的文集不难看出。从文集来看,他曾经打算进行蒙古问题的著述,叫做《蒙古图表》,而且目录已经完成,其中的《蒙古象教志》(佛教的内容)、《蒙古水地志》、《蒙古台卡志》(宿驿的内容)、《蒙古声类表》的序录都收入了文集。这些并不是像《蒙古游牧记》那样研究古来的历史地理,看来应该是意在详细记述当时蒙古现状的,也注意到了蒙古的音声,《声类表》的序文中,记有蒙古文的使用方法。作为汉人著述虽然可能是很有特色的,可惜没能成书。对于其他方面,看来他还曾经打算撰述《青海志》、《乌梁海表》,其序文也收入了文集。他虽是个在各方面都有其创见的人物,不过在都还只是设想的阶段,尚未形成著述时他就去世了。

如上所述,由于西北地理之学的兴起,塞外研究的发展,而出现了由此再进一步,涉及到外国地理研究的自然趋势。康熙年间,虽出现了撰写俄国事情的《异域录》,可是那以后再没有出现研究外国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魏源是注意到了这方面情况的。此人有名著《海国图志》,最初仅六十卷,后来增补至一百卷。此人非常具有史家的研究兴趣,他的史学并未局限于单纯的事实考证,而能够注意世间大势的变化推移,他是抱着

对国家盛衰的兴趣而撰写地理著作，以及历史著作的。《海国图志》就是详细著述海外事情的著作，成书于道光末年。由于当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这就更加刺激了他的研究兴趣，此书不仅是地理书，一方面是他对世界所作出思考的经世之策，一方面又是具有丰富研究兴趣的历史书籍。此时，徐继畬著有《瀛寰志略》，虽然也是写世界地理的，但那只是地理书，而不是魏源那种包含经世论、史论的著作。无论如何，这些著作确实都不仅教给了中国人有关海外的知识，即便对日本人也给予了很大的影响，是由汉语了解海外知识的方便之著。

魏源在此之外，还撰写了可称为清代现代史的《圣武记》。此书从鸦片战争前开始着手，曾经改写过多次，而且鸦片战争的内容是后来加上的。魏源认识到从乾隆的全盛时期至嘉庆道光之间清朝在逐渐转向衰运，注意到兵制、财政的逐渐恶化，对此他抱以极大的历史研究兴趣予以了撰述。因此，虽有些地方在事实考证上有嫌粗略，这一点上不如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精确。但是《皇朝藩部要略》并不是能够唤起任何兴趣的读物，而《圣武记》则是足以唤起读者一种莫大的历史兴趣的著作。魏源与龚自珍虽有着亲密的交往，但他的文章却没有龚自珍那种天才的文气，而多是那种过于激烈的土包子文章，不过《圣武记》却有着诗一般的写作风格，有着对读者的感染力，即使在日本亦多有读者。魏源以这种笔触还撰写了《元史新编》，此书在他生前没有出版，十几年前终于得以出版。此书与钱大昕以来元史研究家的考证研究不同，书中有些考证也不够正确，其中作为史论有些地方虽有见地，但若与事实对照的话又不正确。无论怎么说，《元史新编》的分量虽然很大，质量却不够好。另外，他还有《诗古微》、《书古微》等经学上的著述，其中有口若悬河的议论，而且大部分内容议论过多，而作为学问又总有其不确切之处。

不论魏源还是龚自珍，他们治西北地理之学，都代表了当时一种旨在别开生面进行独具一格研究的倾向。作为经学家来说，二人都是公羊学者，所以自然与徐松、张穆、何秋涛那种绵密考证家不同，都是总论式的思想。龚自珍是非常天才的人物，此人能够做到借前人下功夫考证之文作为自己材料进行著述，而写出比前人更为人看好的著作来，将乾隆以后的

学者的考证成果改写为理论是他所擅长的。魏源虽没有龚自珍那么有天才，却非常争胜好强，而且总是勉为其难地努力建立独创见解。凭借此二人之力，南方兴起了公羊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成为了近代中国危险思想的源头。魏源的著作特别以总括性史论见长，像《圣武记》的《余记》那样鲜明地写出了清朝盛衰的变迁。收入他文集中的有关明代的议论中进行总括性论述的部分是很精彩的，将明代与清代的相互比较也是相当的卓见。

这些人物不仅是学者，同时也是经世家，魏源就更有这种倾向。他还编纂了《皇朝经世文编》。此书署名虽然是湖南巡抚贺长龄，但实际是魏源编纂的。像钱大昕亲自为自己所敬慕的史学家立传那样，魏源也著有《李申耆(兆洛)传》、《周保绪(济)传》。李兆洛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同时又是古文家，又治公羊学，特别反对许郑之学，他像对待敌人那样诋毁郑玄这一点可能是魏源感到称心的原因吧。周济即《晋略》的著者，此人是根据自己的一种史法和自己能属文的特点而撰著此书的，很可能因此而受到了魏源的欣赏。魏源与周济的文章风格是不同的，与魏源文章中那种乡下风格的邋遢相反，周济的文章有着都会人士的洗炼。魏源写《圣武记》时虽在北京，但后来去南方出任官吏，殁于咸丰年间。道光末年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经世家、学者都发生着动摇，此时在北京曾经消沉一时的宋学得以复活，公羊学者再度活跃起来。南方尤其以公羊学为盛，考证学风衰退。西北地理之学亦藉此机会发展，不再满足于地理历史的考证，开始注目世界的大势，意在研究前人尚未着手的学问领域。学问虽变得粗杂，风气确实可观。

这一时期，与上述学者团体完全隔离开的，有一位博览众书从事稳健研究的学者俞浩。此人著有《西域考古录》，是成书于道光末年的著作。他是调查了有关甘肃、新疆、伊犁、西藏、廓尔喀(尼泊尔的部分地区)、俄国的资料而写作此书的。他虽然详细调查了古文献，但看来基本不具备当时新兴之西北地理学的知识。但他在写作时，对徐松《西域水道记》、祁筠士《西陲要略》、《西域释地》，魏源《海国图志》都是见到过的。虽然没有新材料，但的确是调查了大量著述之后写成的著作。

此人究竟具有怎样的学术地位，在当时北京、南方的学者团体中是不为人所知的。而其他学者则都是结为互相交流的同伙，从徐松到魏源是形成了一种团体的。

十六、西北地理之学（二）

西北地理研究在清朝末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是由那些经常出入于宗室盛昱府上的人们所一手促成的。盛昱本人，在这方面的著述不过对《阙特勤碑》的考证而已。他之所以注意到蒙古呼舒河畔的这一碑文，是因为受到了俄国人研究的影响，即拉德洛夫（Radlov）出版了有关呼舒碑文研究的结果。盛昱委托志锐制作了蒙古地方碑文的拓本，由此，盛昱周围的人们开始了对此碑文的研究，李文田等人还作有关于和林古碑的诗句。虽说是诗，却是有着历史研究意义的作品。和林碑有过十几种，包括了从突厥、回纥直至蒙古各时代的碑。日本西本愿寺[①]的人曾拓有拓本，其中大部分我手上都有。此外，由于盛昱还得到了以往一直成为问题的蒙文《元朝秘史》，从而促成了李文田、文廷式等人对此书的研究。李文田注释了《元朝秘史》，虽然从此书来看，好像他见到蒙文《元朝秘史》之后作了注本，但是如那珂博士所说，此注本的内容基本看不出有受益于蒙文本的痕迹。本来，《元朝秘史》有两种：一种出自《永乐大典》，有十五卷；还有一种出自明初誊写本的十二卷本。十五卷本虽收入了《连筠簃丛书》，但其中没有蒙古文而只有作为翻译的汉文。今日世上通行的李文田的注本也是十五卷，与出自《永乐大典》的版本相同。蒙文本中有的部分在《永乐大典》本中被省略了，可是李文田的注中，就连这种省略的部分也没能用蒙文原本予以补订。所以说李文田的注本，恐怕在未见到蒙文《元朝秘史》之前已经大部分完成了，所以他后来见到蒙文《元朝秘史》时，看来并没有完全重新再做一遍。此书的余白处有文廷式

① 西本愿寺，设于日本京都的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寺院。20世纪前半期的门主为大谷光瑞（参见后面“大谷探险队”注释）。

的眉批，此外还有未署名的眉批，看来这应该是李文田记入的。文廷式记入的多是读蒙文《元朝秘史》之后的内容，与此相反，李文田本人却很少采用蒙文《秘史》的内容。但是无论如何，由于李文田注本的出现，以至出现了各种对此进行研究的著作。施世杰的《元朝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宝铨《元秘史李注补正》等均属此。李文田另外还就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写有札记。这些都是复兴道光以来西北地理研究的著作。文廷式虽然没有著作的出版，但是他研究过蒙文《元朝秘史》是毫无疑问的。蒙文《元朝秘史》传入日本，就是由文廷式寄给我的，然后由那珂博士进行研究的。文廷式仅仅在二十年之前去世的，此外于近年去世的还有沈曾植。文廷式生前就说过沈曾植是当时中国史学的第一人。沈曾植因为是个非常懒惰的人所以没有著述，但是对《圣武亲征录》在何秋涛的校正之外，进一步作了校正，李文田也同样校正过《圣武亲征录》，广东人龙凤镳的《知服斋丛书》曾将这三人的校正一并收入予以出版。龙凤镳由于是李文田的同乡，所以受到李文田感化而予以出版的。此龙氏的《丛书》中还收入了作为元史材料的耶律铸《双溪醉隐集》，以及其他元代书籍，如元代汪大渊关于南洋诸岛的《岛夷志略》也是在此一起出版的。而且这些人的感化对当时的各种出版都有着影响。此间，他们还有一位同伙袁昶，此人在西太后引入义和团时因进谏而被杀。他不仅出版了李文田的《元朝秘史》，还出版了关于满洲的书籍，如《吉林外记》、《宁古塔纪略》、《黑龙江外记》，以及有关西藏的书籍，如《卫藏通志》等。以盛昱为中心的这个团体的学者，多少都对塞外方面有所研究。李文田除了上述著述之外，还向世人介绍了《黑鞑事略》，此书是宋朝派往蒙古使者在朔北时的见闻录，《问影楼舆地丛书》所收此书中有着李文田的眉批。这些人中夭亡者多，盛昱殁于光绪二十五年，才五十岁；李文田也于四十余岁去世；文廷式亡于光绪三十一年，不到五十岁，所以他们皆未留下很多著作，很可惜。

这些人还主要是利用中国材料进行研究的。中国人也有致力于利用欧洲材料做塞外研究的，洪钧就是这样的人物，著有《元史译文证补》。此人曾以进士及第状元，近年的西北地理研究者皆是进士中优秀人物，文廷式为第二名，李文田为第三名中举。洪钧作为公使曾居住俄国、德国，

那时，他已有志于使用外国的材料研究元史，知道了波斯人 Rashid eddin（拉施德 - 埃丁）著作（Djami ut - Tévarikh）的存在。但是由于不懂波斯文，于是努力寻找译文，终于找到著名的 D'Ohsson 的《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①] 后来虽然又见到英国人 Howorth[②] 的《蒙古史》，但此书并不是拉施德书原本的翻译。知道对拉施德的书来说，最为正确的译本是俄国 Berezin[③] 的翻译。于德国书见到了 Erdmann[④] 的著作。据文廷式说，这些书的翻译考订曾得到了德国在华传教士金楷理的大力协助。如此，他对欧洲人关于蒙古史的著作大都见到过。结果，他通过研究发现，拉施德关于成吉思汗的记载，主要是取自于和《圣武亲征录》为同一书籍的材料。那珂博士之所以急于见到《圣武亲征录》，就是因为他读了《元史译文证补》。钱大昕以来，学者最重视的一直是《元朝秘史》，至洪钧书一出，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圣武亲征录》的价值。但是，那珂博士也指出了《秘史》有胜过《亲征录》的地方。无论如何，《元史译文证补》不论对中国或日本的蒙古史研究来说，都是一部划时代的名著。洪钧并不长寿，儿子也死得早。但是由于将草稿委托了沈曾植、陆润庠（此人也是以状元及第的），所以此书是经此二人之手得以出版的。这是作为中国人著述中最能够利用西方材料，尤其与以往中国人引用西方的东西，如杰苏伊特传教士的中文译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不同，的确是直接引用欧洲人著述的著作，作为中国人的著作应该说是空前的。唯一遗憾的是，此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并未完成。他虽然翻译了拉施德书，但是遗漏了其中不可缺少的五、六个传。此草稿本虽大多散乱，但据沈曾植本人对我说，大多保存他那里。但是直至沈曾植去世，也未能将其完成并予以出版。

作为沈曾植自己的书，他著有《蒙古源流事证》，我从明治三十二年

---

① 瑞典人多桑（C. d. Ohsson）著，冯承钧译为《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有重印本（2004 年）。

② 中文译为霍沃尔特。

③ 中文译为贝勒津。

④ 中文译为哀德蛮。

以来就一直希望他能送我一部抄本,但最终没有寄来,也没有出版。据沈曾植及其门人陈毅说:沈氏《蒙古源流事证》的原书由于曾经被盗,所以陈氏依照已经写好的部分又抄了一部。但沈氏作为底本的《蒙古源流》与现在流传的本子同样都是恶本,是来自西湖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抄本。陈毅手里虽有此书的校正本,但沈氏是否见过值得怀疑。明治三十九年我在奉天时以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本与清朝的官板本相校正,并带回了日本;归途中在神户见到沈氏时,因为沈氏希望得到我的校本的抄本,所以我就重抄了一部送给了沈氏。但是,看来《事证》的订正本最终也未能问世。(校者[①]曰:其后此书作为《蒙古源流笺证》得以出版。)总之,沈曾植具有比洪钧更加广泛的历史知识,在西北地理学方面是洪钧以后中国第一流的人物。他与那珂通世博士同年。

目前,元史研究方面的名人是撰著《新元史》的柯劭忞。此人的元史研究看来也是受到了盛昱的感召。《新元史》是徐世昌为大总统时出资出版的,当时还发出了将此列入正史,变以往的二十四史为二十五史的大总统令。柯劭忞的研究,当然多有赖于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的地方,但看来也是意在补《元史译文证补》之缺,他曾经撰著并出版有《盖略图传》。以此对照今日的《新元史》的列传来看,多有不同之处。前者仅是对多桑书的翻译,后者则似为对前者的订正。在最初制定《新元史》出版计划时,每卷末尾拟附有考证,列出自己新写部分的证据。因此,以这种体例,开始时仅对本纪中的六卷以木版刻出,后来又用活字版全部出齐,继而出了大总统刻板本,以后的两种版本中都省去了考证部分。因此,在撰著中所依据的材料已不清楚了。但是,由于他所依据的考证底本应该是存在的,所以虽然曾劝说他将其出版却尚未问世。此人的研究当然也参考了西方书籍,他的方法是让人作出汉文翻译后再予以利用,但是此人利用的丰富材料大多是中国的材料,他见过在中国有关元史的所有材料。尤其是利用了选自《永乐大典》的材料,以及元人的文集。因此,此书比迄今所有关于元史的材料都更加精确。不过,对其在材料使用上的判断

① 此校者即日文版《中国史学史》的整理者内藤乾吉与神田喜一郎二氏。

方法是有些议论纷纷的。例如从最初出版的附有考证的版本中所记的出典来看，他与拉施德书的观点同样，认为蒙古出自突厥，对其错误我已在《蒙古开国的传说》中予以指出。总之，从钱大昕着手的基础研究以来，或进一步而言可以说从顾炎武指摘《元史》之杜撰以来，随着《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的出现，元史研究在逐渐发展，其结果是出现了今日柯劭忞《新元史》这种几乎接近完成的著作。洪钧、柯劭忞、那珂博士是蒙古史研究的东方三大家。

此外，近年的元史研究中还有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此人也使用了外国的材料，并参考了那珂博士的《成吉思汗实录》和多桑的著作。但是，此人有一种只要是外国人的材料，即便不一定正确也胡乱采用的倾向，所以在史料的判断方法上有粗杂之处。在熟悉中国材料方面不及柯劭忞。此书作为现代元史研究者的著作或是应该参看的，虽有其便于利用的特点，但不是什么非常有价值的著作。此人本是江南人，但因为长期居住黑龙江，所以他绘制的黑龙江地图非常精密，而且他是以此成名的人物。日本学者中虽有见过此人而且很敬佩他的人，其实际学力则并不那么深厚。

钱大昕以来的史学，即考证学派史学开始了从中国内部向西北地理，即塞外的发展，祁韵士、张穆、徐松、何秋涛一派相继不断地传承着这一研究，终于发展到洪钧的阶段，此间中国史学出现了从中国史逐渐向东方史方向发展的倾向。这正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倾向。最近继李文田、洪钧之后，又有柯劭忞、沈曾植等人，然而其后则后继乏人，作为中国学问来说近来的史学是最差的。但是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另有一派史学得以兴起，即开始了对明清交替之际的历史研究。本来，这一研究由于清朝的压制而见不到充分的材料，但是伴随着清末朝廷的衰运，明末的材料多有披露，清朝灭亡之后这种趋势益发显著，以至珍贵材料得以发现，但是其中也有不可信者。这方面目前虽然尚未出现有系统的研究，但是即便出现的话，这也只是一时的风潮，因此尚不至于动摇钱大昕以来的史学研究的方针。只是钱大昕以来，中国史向东方史发展的基础研究，尚未出现有能将其继承并予以扩大发展的学者。

随着钱大昕以来塞外史研究成为中国史学的中心问题，相伴随还发生了其他一些研究现象。由于西北地理研究以蒙古为中心，这就不仅溯源于突厥、回纥，还有涉及到了满洲的研究。这是因为发生了与俄国的关系而引起的，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这方面最初的成果。这其中有一个有关国境的问题，满洲地方本是中国的土地，由于后来成为了俄国的领土，所以有人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另外，在满洲从同治中期开始至清朝末年，有过一次政治上的改革，即将以往满洲与其他各省不同的军政组织改变为了普通的行政组织。这是由于在太平军之乱时，清朝已无暇顾及满洲时所发生的变化。总之，以往的满洲封禁地，从某个时期开始涌入了很多直隶山东的流民，并进行了秘密的开垦，政府得知当地实情时，无论如何也已无法挽回了，所以朝廷也一改以往地采取了开垦政策，也改变了行政方式，实施了与其他省同样的行政组织。于此相关地兴起了满洲地理的研究。另外，就是在光绪年间，西太后全盛的时期，出于肃清中国总体政治的考虑，曾有意重新编纂《大清会典》。这是嘉庆《会典》改编以来所没有过的计划，为此由于是从各省汇集材料，对满洲各省也通过地图制作等工作了解到了以往所不清楚的情况。由此，还出现了一位有实力的满洲历史地理学者，即曹廷杰，他是湖北人。此人是在中国将沿海各州转让俄国之后，受清朝政府派遣去勘查沿海州境与满洲境界及其内情的，作为勘查的结果他撰著了《西伯利东偏纪要》。这虽是实地观察的记录，但勘查时在黑龙江下流发现了明代永宁寺碑。这对黑龙江附近历史的研究有着很大影响。后来，此人赴任吉林地方为官时，又勘查了那里所有的地方，发现了金元以来的许多史料。因此，此人作为吉林历史地理研究家是当代第一人。今日《吉林通志》地方志是中国地方志中质量最好的，其中关于历史的部分因就采用曹廷杰的观点。对比奉天开发晚的吉林地理历史研究之所以反而先出成果，实乃曹氏之功。

其次，还有一位在实际上到底有多大影响虽然不太清楚的人物，即接受西方新地理知识的邹代钧。此人作为公使馆随员逗留欧洲时，感慨中国的地图之不完整，就希望绘制亚洲东部地图，于是多以铜版制作。在他的地图中，摒弃了以往作方眼格的形式，而使用了经纬度。然而，由于他

后来转而致力于教科书方面，所以没有完成这一远大抱负就去世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为改良中国地图做出了贡献。

如上所述，出于中国与俄国的边境关系，有人还翻译了两国的边境图，并作出了解说。此人即钱恂，他也作为公使馆随员去过西方。其结果是使得近年中国在外交上，也能够注意到历史地理的问题了。与日本交涉间岛问题时，在中国方面的调查文件中还载入了新型西洋式的地图，报告书中也使用了以新式调查方法所做的历史地理研究。这些研究或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或是纯粹学术上的研究，但都可以视为继承了钱大昕以来学风的结果。此外，还有一位在乡下独立进行古代塞外问题研究的人物，即丁谦。此人在《浙江图书馆丛书》的第一集作了《正史外国传地理考证》，在第二集对杂著地理方面进行了记载。虽然见过前人的著作，但毕竟由于是出身乡村而且是通过自学的研究，所以有着既没有继承钱氏的系统，也有没能利用西方新材料的缺点，也有尽管用力但又未获得特别成绩之处，但其努力还是获得了一些评价的。曾经在北京大学的叶翰就很重视他的成果，将其作为近代地理学家的一个人物。此人虽然也注意了以往学者对《元朝秘史》之地理，以及《圣武亲征录》之地理的研究，但由于对中国书籍的见闻有限，而没有达到其努力所应得的成绩。

另外，还有一位稍早于丁谦的广东人，即写《汉西域图考》的李光廷。其书是对汉以后西域的考察，出版于同治年间。这是以魏源、徐继畬著作为基础而撰述的，虽曾一度流行于世，但与丁谦同属乡下学者的著作，在今日说不上是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的著述。最近，那种仅仅依据以往材料的研究已经变得落后于时代了，而且以西方材料做研究的人又未见出现，目前是史学最衰微的时期。而在沈曾植、柯劭忞没世之后，能够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学者看来业已殆尽。

十七、金石之学

至清朝，最兴盛的学问之一是金石之学。金石之学在宋代虽曾一度兴盛过，而在元明时期又相对衰弱了。然而，清朝从最初开始金石之学就

出现了得以极盛发展的征兆，像顾炎武的《金文字记》可说是这一领域的先声。顾炎武对利用金石作为经史的旁证进行了研究，而于小学方面他也利用了金石，这在《唐韵正》中可以看出。不过，顾炎武对金石的利用，主要还是在经学方面。继之，朱彝尊注意了金石，全祖望也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这在二人的文集中都收有各种题跋一类的文章，而作为专著较早问世的则是吴玉搢的《金石存》。但是，大体而言，直至乾隆时期的金石学尚未摆脱宋明以来学风，因此研究石文者多，研究金文者少。

这个时代关于金文的著作，有《钦定西清古鉴》，这是有意继承宋代宣和《博古图》，经计划而出版的。但出版的只是正编。此外还有续编，且又分甲乙二编，其中只有甲编在近年出版了石印本；乙编藏于奉天翔凤阁但未得出版。乙编所著录的器物本藏于奉天飞龙阁，前些年移送了北京（校者曰：乙编亦出版于民国二十年）。后来还出版了钦定本《宁寿鉴古》，书中著录了清廷最为精品的铜器，近年出版了石印本。由于此时尚处于以把玩古董为主时代，所以尚非真正研究的著作，其鉴识亦无所发展。虽然《西清古鉴续编》序中说续编比之正编有所进展，但毕竟不是纯粹作为学问材料而对铜器的研究。关于金文，虽有上述帝室的编纂，但民间学者之中直至乾隆时期并没有出现著述。关于石刻方面的著述，仍然还是以把玩为主的。其中最受重视的唐碑，就其目的也是以研究书法为主。例如康熙、雍正年间王澍（虚舟）就是从书法方面研究碑文的人，所以其题跋也是以论书法为主的。至于乾隆年间，翁方纲著《两汉金石记》开始研究汉碑，使得宋人洪适《隶释》、《隶续》以来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毕竟翁方纲所致力的还是以唐碑为中心的书法研究，的确是细致入微，一点一画的研究，但其成果并未超出书法研究范围。与翁方纲志同道合的还有一位黄易，他专心研究汉碑，逐一进行了探索。有名的武梁石阙据说就是由此人保存下来的。其对汉碑的研究虽然功绩卓越，但是毕竟也是以把玩古碑为主的。不过，在此之外翁方纲、黄易二人也确实都是进入了汉代石经的研究，与经学有着很大的关系，但当时作为一般风潮来说，毕竟是以书法与古玩爱好为主，其核心人物是翁方纲。

使此种旧式研究法得以面貌一新的是钱大昕。他虽然是与翁方纲同

时期的人，却有着新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他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可谓金石学之划时代的著作。不过，此书虽名为金石文，但毕竟金文有限而以石文为多。然而无论如何从钱大昕开始以金石作为史料进行研究的风气兴盛起来。由于此人能以其丰富的史学知识，认识到了金石作为史料的价值，以致金石之学有着特别的进步。当时，与此具有同样旨趣的著作还有毕沅的《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这些虽说只是有关一个地方的著述，但那些地方毕竟是金石材料最为丰富的地区，况且其研究又是摆脱了以往的书法本位，而转为史料本位的研究。大体上说，毕沅幕中的孙星衍、洪亮吉皆与此研究有关，特别是洪亮吉还从地理学上研究了金石。大体而言，由于像毕沅那样当时学者的领袖人物也注意到了这一方面的研究，致使这一学问的进步就更加显著。继毕沅之后成为学者领袖的阮元，在与毕沅同在山东任职时，二人还合著了有名的《山左金石志》，此书作为地方金石志是当时的代表性作品。此书与关中、中州两《金石记》一样，也不是单纯地揭示金石研究的情况，列举各碑本文也是其一大特色。后来阮元所著《两浙金石志》采用的也是这一体例。大体上，古金石文的存在以北方为多：关中即陕西，因为有长安所以金石很多；中州就是河南，而且由于有洛阳所以金石很多；山东也是古代遗物众多的地方，所以关中、中州、山左的《金石志》很有名。山西虽也有古物，但此地在金石方面当时没有专著，至近年才出现了胡聘之的《山右石刻丛编》，说是可以与《山左金石志》对抗，但是材料还是不及山东。如此，对于陕西、河南、山东这种金石最多的地方，有像毕沅、阮元这样代表性学者进行了著述，因此同时又有多数学者的金石研究，于是迎来了金石学的隆盛。不过，由于这些著述大部分出自幕客中学者之手，所以并不能认为仅仅是毕沅、阮元其人努力的成果。而且，其幕客等也各自有所著述。孙星衍与邢澍合著有《寰宇访碑录》，这是中国全部石碑的目录，载入石碑达八千余种，记录了碑名、地点、年代、书写者。此后又有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罗振玉的《再续寰宇访碑录》。而金石目录之集大成者是近年成书之吴式芬的《攈古录》，包括了金石两文。另有缪荃孙的《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是他自己所有藏书的目录，其中将有关碑文汇集一处，很是方便。

这些都是作为金石总目录而编著的。

另外,作为研究金石文内容的,无论作为史料还是其他各方面都很便于利用的,集大成之作的是王昶的《金石萃编》。这是大部头的著作,汇集内容自上古至辽金。不过说是"金石",也还是石文多而金文少。后来作为此书的续编又有了陆耀遹的《金石续编》和方履钱的《金石萃编补正》。近年罗振玉氏发现并出版了汇集元代金石的《金石萃编》草稿。此草稿看来是王昶因为没有将元代金石充分汇齐而未予以出版的,即便如此也是有着相当汇集了,比方履籛的《金石萃编补正》要多。此《金石萃编》是很注意编次的,例如在篆隶中所记汉碑那样,将其篆隶原文载为本文,再附以释文。然后,在考证中汇集以往所有人所做的考证,再在后面写出自己的意见。不过此书由于是王昶老年时的著述,而多数成于其门下人之手,所以也有错误。用隶书所书汉碑文字中,以及其他采录六朝唐碑本文中都不能说完全没有不可信的内容。有时对好的拓本中可以释读者亦有脱落。但是作为集大成之作,这的确是一部力作。近年在此书的石印本出版时,对原本中未曾释读的部分是有所补充的。由于这种金石学隆盛的机运,乾隆、嘉庆以后的实力派学者有关地方金石的著作越发多了起来。另外,撰写方志的人也开始将《金石志》列入其中。某些地方志中作为一部分内容的《金石志》,可以说作为专门的著述来看也是相当有价值的。

这些著作都是受到钱大昕学风影响的产物,对于金石在书法、把玩之外,已经注意到了其可作为史料使用的价值,而且可以说此学风至今仍在延续。甚至此间关于书法也由于考据学的影响而迎来了新时代的风潮。从阮元时代开始以往尊尚唐碑之风已有所改变,六朝尤其是北朝造像类已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由于这些材料数量庞大,所以学者有着各种各样的新发现,对于扩大他们的学问领域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像阮元,就是能够提出新派观点的一人,他著有《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认为书法以北碑为善。这一看法延续至嘉庆、道光年间,包世臣也是从书法上崇尚北碑,而著有《书论》,由此压倒了以往的帖学。这些虽然说与作为史料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作为材料对碑文的广泛收集,对金石之学的

发展则是有益的。又由于造像众多，也为人们竞相探索收集新材料提供了便利条件。像阮元的观点那样，作为书法虽不免僻论，但于金石学则是一种贡献。

阮元的时代是金石学问有着一大进步的时期。当然其中有着钱大昕学风的影响，不过阮元也注意到了钱大昕所尚未着手涉及的金文方面。在钱大昕的时代，有关金文的材料和研究都还很少，仅仅只有焦山对无专鼎所做的那种极少的研究。毕沅虽然得到了曶鼎那样贵重的铜器，却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然而，至阮元则极为重视金文，其门下还出现了朱为弼那样懂得金文的优秀学者。阮元虽覆刻了宋人薛尚功的《钟鼎款识法帖》、王复斋的《钟鼎款识》，但仍不满足，进而自己撰著并出版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这对当时的金文研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此书是收集当时所有金文所进行的研究，不论是从体例，还是学问价值上说，都比《薛氏钟鼎款识》又进了一步。虽是嘉庆初年出版的书籍，却反映了乾隆末年以至嘉庆初年金石之学显著发展的情况。对此书最为倾注精力的是朱为弼，其次，与其相并列的还有当时的名人孙星衍、赵魏、何元锡、钱坫、张廷济等。《积古斋钟鼎款识》虽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撰述，但是当时对金石，尤其是对金器的一般认识，却并非所有人都在进步，像张廷济就仍然有着把玩古物的倾向。此人收集在清仪阁中的古物囊括了所有种类，但他尚未脱去把玩之风。在此前后成书的金石著作中著名者还有张燕昌的《金石契》、冯云鹏的《金石索》。《金石契》乃半是把玩，半是学问的著作。因为是乾隆中期的著作，不免有着古物把玩的风格。相比之下后来成书的《金石索》是有学问倾向的，不过由于著者没有学识，所以编辑杂乱，作为学问的材料也不够洗炼。当然，由于包括了各种材料，仅在记录方式上与当时将金石作为学问的潮流不合拍而已，而作为研究材料又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在日本这部《金石索》虽受到使用者的欢迎，但这只是由于此书适合于日本人驳杂的口味而已。总之，对个体的器物也许有些出色的观点，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全般的体系。

此后，金石之学逐渐出现分科，专门领域的研究出现了盛况。在金器方面例如《积古斋钟鼎款识》时期所注意的主要还只是鼎彝、兵器类，此

后出现了致力于镜鉴的人物,钱坫对此进行了研究,尤其对镜鉴年代的确定用力最多。古泉的学问也是这时兴盛起来的。乾隆年间与《西清古鉴》一同作为钦定书籍出版的还有《钱录》,但是并没有学术价值。古泉学的发展是从道光年间开始的,《积古斋钟鼎款识》之后,随着鼎彝研究的兴盛,出现了盛大士的《泉史》、倪模的《古今钱略》等,其中特别在文字研究方面,马昂的《货布文字考》被认为最为上乘。道光、咸丰年间戴熙的《古泉丛话》、刘喜海的《论泉绝句》又将上述古泉研究推进了一步。另外,古泉研究的成熟之作还有稍早于此的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咸丰、同治年间有古泉学者鲍康,由此至《古泉汇》著者李佐贤,古泉研究有着非常大的进步。不过,此间已不限于古泉,其他方面的金文研究也有着显著的发展。

在金文研究方面继阮元时代之后,又迎来了道光年间刘喜海的时代,而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将此研究进一步推向发展的是陈介祺、藩祖荫、吴式芬、吴大澂等人。这些人是将收藏、鉴赏、研究三者兼顾的。此时期对解释金文特别用力者有徐同柏、刘心源、孙诒让。这一时期比之阮元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金文学发展的时代。此后,虽然有现代的罗振玉等少数人,但是实际上三四十年前是最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珍贵的器物,像由陈介祺手转让给收藏家端方的有名的毛公鼎,其字数多达四百七十余,具有如此文字数的铜器迄今尚未有过,这是一件使金文研究家竭尽全力的器物。

这个时代正是鼎彝与古泉的研究都得到了发展,继其后兴盛的还有印鈢之学。印鈢研究从宋代开始虽多少已经出现,但尚不足为道,至明代虽稍有发展,而基本是出于把玩的目的并非研究,所以极其古旧而具有史料价值的篆刻与现代人的篆刻是不加区别的,甚至有人竟将二者收入同一部书中。而且撰著印谱也同样,从明代直至乾隆年间,大体上还是对印进行模刻而制谱的。像汪启淑的《飞鸿堂印谱》就是因为出于把玩之目的,所以只是对印进行模刻而已。然而,最近人们已不满足于此,要求使用原印制作印谱,另外研究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吴云的《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就是出自这种新研究法的作品。如此,除了有时利用古印作

为小学研究的材料之外，进而出现了利用官印进行官制、地理研究的情况。还有利用私印作为姓氏研究材料的，这种研究是从吴大澂开始的。最近四五十年以来成书的印谱，使用了原印制谱，在把玩以外出现了以此作为史料进行研究的情况。

其次，近年还开始了对封泥的研究。最初封泥出于蜀地，后来在山东又多有发现，西域也有所发现。当初连那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近年知道其实就是封泥，此研究就这样得以发展。从封泥中有时甚至可以得到比印章更有价值的材料，对此作专门研究的著作有吴式芬、陈介祺二人所著《封泥考略》。最初是将封泥拓片以石版印出，后来采用了由封泥直接拓出的形式，一方面确有把玩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当时没有今日之照相技术的情况下，这已是最为接近原物的方法了。大体上，这一倾向在刘喜海的《金石苑》已有所表现了，书中已经有一部分的金石文是以其原形出版的。近年叶昌炽的《邠州石室录》看来也是以原形出版的。以往中国对碑文的抄写仅限于文字，近年来亦致力于对原物的摹写。于是，实现了对碑的缩刻。乾隆时褚峻的《金石图》在对金石全形摹写的同时，还对部分文字作了勾勒，后来这种缩刻方法在杨守敬的《寰宇贞石图》时更有了进步。这样就减少了金石文的误读。印鉢、封泥之外，符牌、度量衡、造像等也不断有所发现，不仅作为把玩收藏，也被用于史料研究。

近四五十年以来，虽然金文研究比石文研究更为发展，但这是因为石文至今该发现的也都发现了，现在已进入了整理的时代，只是还有些稀少的发现而已。但是，最近石文研究又兴起了墓志的研究，这是因为最初在河南铁路施工挖掘北邙山时，因拆毁墓地而有人用发掘墓葬做生意，这才出现了大量的墓志。此洛阳墓起于后汉，在后汉墓志少而墓砖多，自北魏至唐宋出土的墓志就很多了，尤以北魏的墓志为多，这些都是具有史料价值的。罗振玉氏将其汇集而作《芒洛冢墓遗文》。罗氏还根据魏宗室墓志，作有《魏书宗室传注》。唐墓志中也出现了可用于补充百济、高句丽古史的材料。这些墓志不仅于学问，即便在书法上也有着值得注意的材料。以往所称的北朝书法仅仅依据了造像，根据近年所发现的墓志已经知道北朝书法不必就仅限于造像上那些粗朴奇怪的文字。最近甚至有墓

志的覆刻出版。

伴随着石文的研究,还有一门虽然起步稍晚,却在近年有着特别发展的瓦当以及砖的研究。瓦当的研究较早有乾隆时期程敦的《秦汉瓦当文字》,古砖的著录虽起自宋代,而最近又有陆心源的《千甓亭古砖图释》及《千甓亭砖录》中汇集了很多古砖。砖多出于墓葬。乾隆的《金石契》中虽载有少许,但最近出现的砖很多。无论瓦当还是古砖,以往没有发现过秦汉以前的实物,陈介祺却发现了周代的砖,另外周代的半瓦也被发现了。

清末金石学上有两大发现:其一是殷墟遗物的发现。殷墟这一地名早在秦汉时代已经存在,而且很早就在该地有过古器物的发现,清末光绪二十五年(明治三十二年),这里又发现了古时龟卜用的龟板兽骨。最初的发现地点是河南彰德府安阳县一个叫做小屯的地方,其龟板最初为王懿荣所获。由于王懿荣于北清事变时殉难,那些遗物散逸了,但又多落入刘铁云手中。我在明治三十五年造访刘铁云时第一次见到那些龟板,其后不久他出版了《铁云藏龟》。率先研究这些龟板兽骨文字的有孙诒让、罗振玉。特别是罗氏还派人发掘了殷墟,并得到了很多资料,除龟板兽骨之外,那里还出土了各种器物。罗氏关于殷墟有着很多著作。而且,在此感召之下还出现了许多研究者。另外,刘铁云与《藏龟》一同还出版了《藏陶》,是汇集了三代陶器文字的著述。大体上,周代的东西很多,汉代陶器上的文字越来越少了。这是古时陶官所制作的,在日本即由土师职掌的。另一个大发现是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大谷①探险队在西域的发现。其中,作为史料最重要的是简牍,即木简、竹简。关于汉代的木简,对于宋代黄伯思的研究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但这是那以来的重大发现。多数是书简,还有各种官文书。由这些材料,有关汉代的文书状态已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对此,有着斯坦因的著作以及法国沙畹的研究(*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罗振玉氏根据沙畹的书进行

① 大谷探险队,日本京都西本原寺门主大谷光瑞所率中亚考古调查队。1902 年开始作为宗教活动,为了西域探险而赴印度,发掘调查佛教古迹。调查活动至 1914 年共进行过三次。大谷光瑞由于积极从事海外传道,还曾于 1913 年出任孙中山中华民国政府的最高顾问。

了覆刻研究,著有《流沙坠简》,其中亦有王国维氏的研究。

金石之学就是这样在研究目的上,与从前的研究已经有所不同了,随着不同学问分野的形成,种类的分科也多了起来,近年更是有着兴盛的倾向。由钱大昕发起的西北地理之学虽然出现了衰微的倾向,但是在钱大昕影响下的金石研究至今仍在发展。现在中国史学的中心,无论怎么说看来是朝着更为古代研究的方向发展的。另外,中国人的研究在某一时代方面,也是有着研究范围之扩张的,像徐松等在中亚发现了唐代碑文,不仅将其载入了《西域水道记》,还由此注意到了西域金石的情况;又如刘喜海的时候由于与朝鲜学者的接触,将古碑的研究扩展至了朝鲜,著有《海东金石苑》八卷。此书刘喜海生前未得出版,在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入京时,稿本曾一度遗失。后来张德容出版了副本中仅存的前四卷。再往后由于八卷全部稿本的发现,罗振玉将其校订再次出版。盛昱曾派拓工人拓印过高丽《好太王碑》,李文田、沈曾植等的研究也曾涉及西域蒙古等古碑。但是,后来并没有很大的进展。在满洲方面,曹廷杰曾发现元代的碑文。西藏碑文也逐渐得到研究,罗振玉所著《西陲石刻录》汇集了西藏及中亚的碑文,甚至网罗了且渠安周等的碑文。关于日本有傅云龙的《日本金石志》,汇集整理了日本的金石。不过,对于日本的金石,杨守敬在以前已经有所研究。

此外,随着金石之学的发展,又兴起了关于金石义例的研究。就金石义例而言,元代已有潘昂霄所著《金石例》,是研究撰写碑文义例的著作,按照韩退之古文义法进行了著述。这是对新作金石文义例的研究,并非对古金石义例的研究。明代有王行的《墓铭举例》,黄宗羲的《金石例》。三书并列有着"金石三例"之称。但是,这些都不是对唐以前金石义例的研究。至清朝,随着金石学的盛行,才出现了对唐以前金石义例的研究。

如此,最后又出现了自觉研究金石学的各种金石总录的书籍,即道光年间李遇孙的《金石学录》。此书对于古时研究了经书等古书是如何利用古金石文的,还对后代金石学者四百余人的传进行了研究,因此可以说是金石学史的最初著述。陆心源对此书进行补充,著有《金石学录补》,褚德彝在其后对直至现存人物进行了研究,著有《金石学录续补》。在总

论金石学的著作中，关于石的研究有叶昌炽的《语石》，此书对碑的年代、地方，碑的文体、书法以及碑的保存，甚至拓本商人的情况都有所涉及，是关于碑的著作中最上乘者，总结了金石学方面中国人的思想。关于金文还有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收集了金文一千三百余种。另外，吴大澂著有《愙斋集古录》，这是对金文作总释的著作。尤其是吴大澂还提出了将金文应用于经学的研究的崭新意见。

这些金文的研究成果，又是如何为中国历史学所利用的呢？吴大澂的《字说》、孙诒让的《名原》都是这方面的概括性著作，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说虽可谓有可能开启大变化先端的著作，但又都尚未完成。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也是汇编分类进行利用的，出于同样目的的著作。另外，罗振玉还有《俑庐日札》这种总论金石学的有用著作。以上都是关于金石学总论的著述。

另外，陈介祺写有《传古别录》，其中甚至注意到了拓本的制作方法、金石的保存法等方面。但是，中国金石学的缺点在于不具备西域、蒙古以及其他地区如突厥、回纥、西藏、西夏、女真、蒙古、满洲、契丹、八思巴字（蒙古字的一派）、朝鲜吏吐等文字的知识。清朝灭亡之后的年轻学者，对此虽已开始注意，但仍不及欧洲、日本的学者。

十八、校勘之学

在清朝，有助于学问进步的一个因素是校勘学的发展。校勘学大体是与书籍的收藏、出版相伴随的学问，自明末及清初开始在南方颇为发展并流传。明末清初的收藏家有钱谦益、毛晋等人，都是常熟人士。钱谦益主要是收藏家，并不出版，可以说是对珍品书籍吝惜而贪婪的那种人，很少以书示人。此人的有名藏书都放置于绛云楼，因失火而全部烧毁，但是其后又收集了相当多的书籍。而且其一族人又继续收藏，即钱曾，此人著有《读书敏求记》，作为古书目录是很有名的。总之，这些人主要是致力于收藏，时常用心于收集古板本的宋元版以至明代写本。此时期虽然看来也应该做些校勘，但尚未有何发展。毛晋是个不但收藏而又大量出版

的人物,出版了很多诸如《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等大部头书籍。这些书世称汲古阁本,对读书人有莫大的裨益。毛晋虽也从事于校勘,但并没有反映其成果的著述。其后,作为江南藏书家还有季振宜。这些藏书家的藏书,直至近代顺次相传,其间或有亡失,但由于他们都非常谨慎地经营,所以能够比较多的保留了下来。

康熙时代由于世间太平,藏书家也多了起来。像徐乾学的传是楼,不仅收藏颇丰,而且还有了《通志堂经解》的出版。当时由于竞相收藏,以至逐渐形成了校勘。朱彝尊等应召进北京编纂《明史》时,曾带笔耕者入官署尽抄写些稀有书籍而遭弹劾,竟至失官。但是此人所做出的成果确实为校勘学奠定了基础。不过,《通志堂经解》并未见有校勘的痕迹,徐乾学、朱彝尊都不过是写了题跋而已,但像朱彝尊的《经义考》虽是目录学书籍却含有校勘的成分。当时的校勘与考证之间是难以区别的,校勘即考证,考证亦即校勘,二者逐渐分离是进入乾隆期以后的事了。

清朝的学问在康熙与乾隆之间学风是有很大不同的。日本某位学者认为当时的代表作是钦定的书籍,康熙时代的钦定书多为类书体例,与此相对乾隆时则多为丛书体例,类书的代表是《古今图书集成》,丛书的代表是《四库全书》。但是,这还只是一种表面性观察的结果。康熙时代书籍如果说是类书体例的话还是事实,因为其编纂目的是为着实用,是那种为了应付需要以备引用的辞书之类;乾隆时代则不能仅仅说是丛书体例,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中加进了校勘考证这一点。即如同《四库全书》那样,不但在书的整体上加有解题和提要,还另外撰有《四库全书考证》。当然这是就极为代表性的大部头书籍而言的,不过乾隆时代的其他书籍也都是以考证为主的,例如《二十二史》(即后来的《二十四史》)的出版,也是一一加以考证的。这时期的考证与校勘不分,大部分都是校勘。这不单纯是出自天子的意向,而是由当时一般学风所形成的倾向。乾隆前半期的学者全祖望等也是居住北京期间,为了抄写《永乐大典》而忍受了非常的贫苦。大体而言,校勘考证的主旨就是来自于顾炎武等学问的趣旨,即以不妄改古书为原则。这成为了清朝校勘学的主义。乾隆时代对《四库全书》的编纂,还影响了考证校勘机运的发动,使其越发兴盛起来。在

《四库全书》的编纂中，朱筠所主张的，与《永乐大典》中书籍相互对照，用以校勘今日现行书籍实际已成为了当时的主要工作。

此时，由南方的藏书家献上了种种书籍。因此天子非常重视对这些书籍的处理规则，对所有献上来的书都做成抄本，主要书籍都是将原本送还藏书家的。江浙有范懋柱、汪汝瑮、汪启淑、鲍士恭四大藏书家，他们献上了很多书籍。第一位的范氏有宁波的天一阁，自明代就是有名的藏书之家，其藏书在十年前尚存。第二位汪氏有振绮堂，他也是活跃至近年的有名藏书家。第三位汪氏有飞鸿堂。第四位鲍氏即《知不足斋丛书》作者鲍廷博的后代，存续至近年。以上是乾隆时代的四大藏书家。《四库全书》总纂纪昀也是藏书家，而且对校勘亦有其功劳。《四库全书》之以校勘为基础，撰著成古来最完整之解题，实乃纪昀之功。《四库全书》成书于乾隆后半期，从那时起校勘学开始发展，以至逐渐从一般考证之学分离出来。考证虽说主要是对内容的研究，而校勘之学是对古板本、古写本异同的翻检，但这是进行考证的基础。校勘学一方面又与目录之学越来越互相交织，此时已经很发展的目录之学，并非古时宋人郑樵、近时章学诚所谓总括大体、论述书籍源流的目录之学，而是从追究极其琐碎异同出发，追溯源流的学问。总之，祖述宋代收藏家有名的晁氏《郡斋读书志》、陈氏《书录解题》的目录学，与宋代目录学相比，兴起了书籍艺术化的风气，坦率地说是将书籍作为骨董而予以对待了，兼有了把玩的性质。而此风气又以嘉庆年间为中心有着很大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黄丕烈，当时与他相并列的还有几位藏书家。如周锡瓒、袁廷梼、顾士达，世称嘉庆时代的江浙四大藏书家。他们并非一定是非常的富家而搞收藏的，但由于非常喜好书籍，是些不分昼夜、爱不释手的收集家。其中以黄丕烈最负盛名，他出版的《士礼居丛书》很有名。黄丕烈的藏书处叫做“百宋一廛”。此人殁于道光初年，此前已将书籍散卖，临死之年他自己开设了书肆。由此可知有些人并非富裕，只是出于爱好而收集书籍的。

在另一方面，此时复制古书，即影刻很流行。藏书人将自己引以自豪的书籍自行影刻，黄丕烈就是这种人物的典型。虽说有袁廷梼那种不以自己藏书示人的情况，但一般的人还是喜欢向他人夸示自己所藏名本。

这种影刻的确比起明末清初有了进步。乾隆四大藏书家当然大多都是兼顾藏书与出版的,那个时代的人有一种只要有了罕为世人所知的书籍就予以出版的风气,当时虽然并不考虑按照原书体例进行覆刻,但是到了嘉庆年间则不论何种书籍,都希望按原本原貌刻印了。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例。当时积极从事影刻的一群人中有秦恩复、张敦仁、吴鼒、胡克家、孙星衍等,这些人竞相从事着古版本的影刻。而这些人中虽然自身不具备影刻资力,却又最富古书的鉴识,长于校勘学的是顾广圻,由这些人出版的书籍,可以说几乎大部分都是经过顾广圻一人校勘的。

到了顾广圻,校勘完全成为了一门独立的专业。在此之前也曾有过致力于古书出版的人,也有过奠定了校勘学基础的人,如卢文弨就是其中的名人,但是这些人都还没有达到古版本影刻的程度。至顾广圻,校勘学已经与古书影刻相伴而至。无论如何此时已是校勘学的全盛时期。当时甚至有些人具有相当资产,但为着从事校勘学和出版而倾家荡产。收集古书进行校勘的人,有的在自己一代中破产,有的至子女一代破产。黄丕烈就在晚年卖掉了藏书,而买黄丕烈藏书的汪士钟,也是至下一代就无法持续又再次出手。今日藏书家之间就流传着经汪士钟之手的黄丕烈的藏书。这些藏书家中最晦气的是张金吾。此人据说收集了八万卷书籍,而且著有《爱日精庐藏书志》,此书成书于道光年间,这时其藏书已经为了偿还借款而让人拿走了,为他的学问而骄傲的妻子也死去,自己也在此一年之后结束了四十三岁年轻的一生。像张金吾实在可以说是校勘学的牺牲者。

从这种校勘学与史学的关系来看,在用校勘学整理的书籍中史部书很少。这是因为史部书籍分量虽很多,但种类很少,珍本书也很少,而且在藏书家手里的也很少。因此,即便经过校勘学者整理的书中,正史也是最少的,与古版本有关系的就更少。即便像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那种完全是校勘的著作,也并非读过宋元版廿二史的产物。至今日,由于史学的发展而出现了研究正史的著作,一般来说这些书即便有校勘,也不一定利用了古版本和古写本,多是在读书时根据著者的考虑而进行校勘的。

主要不是像其他经书、诗文集、诸子类那样依据古版本、古写本进行校勘的。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史部书籍毕竟很多，而那些竞相收藏、校勘的人又不一定都很有财力，以致未能顾及得到。嘉庆时代的藏书家中，只有像胡克家那样官至巡抚的人物，才能做到出版元版《通鉴》这种大部头的书籍，而这毕竟是很少见的例子。然而，此间也有个别以往基本不为人知的好书，确实是经这些人之手得以出版的，例如张金吾就出版了《续通鉴长编》。

最近中国又出现了四大藏书家，即杭州丁氏、常熟瞿氏、湖州陆氏、聊城杨氏。其中湖州陆氏的藏书即现存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的书籍；丁氏藏书大多送至南京图书馆；瞿氏、杨氏藏书仍保持着原状。其后，虽然也渐次出现过一些现代藏书家，但尚未见有能与此四大藏书家媲美者。

道光以后，古版影刻多少有些衰退，其模刻技术也在降低。最近以个人力量的出版虽已经没有，但是大的出版社以股份制组织汇集大量资金，可以出版大部头书籍了。史部书籍的大量出版今后也应该是很可观的。

大体而言，在太平军之乱以后即便江南地方，学问也多少呈现后退的倾向。此时，像建有军功的曾国藩虽有志恢复学问，但因为本是一介湖南出身的乡下汉，而且又是持宋学学风的人物，所以不曾考虑校勘学这种学问中最为奢侈，又需要注重细微之处的学问，而只是致力于一般性读物的出版，所以同治、光绪年间在南方的官书局，出版的多是些普通书籍。杭州丁氏、湖州陆氏等收藏家虽也出版书籍，但毕竟受此风气的影响，也仅限于出版一些普通而可供广泛阅读的粗制书籍。不过，从这时起开始注意了史部书的出版，各省官书局联合出版了殿版二十四史。另外，像丁氏出版的《武林掌故丛编》也是属于史部的一大出版物。同光以后这种出版史部书的势头上升，加之近来由于大公司的不断诞生，虽然出现了大部头的史部书出版的发展，但是嘉庆道光时代在影刻等技术上下了很大功夫的佳本尚未见出版。近年的四大藏书家中，陆心源等自己也从事校勘，幕下的李宗莲亦致力于校勘，因而对发展校勘学颇有裨益。目前在上海出版业的刘承幹，还曾起用最近去世的名人缪荃孙为顾问从事出版。因此，影刻虽没有达到以往的盛况，但史部书的出版在近年却有着不断的发展。

十九、野史、别史与掌故之书

进入清朝以后，在前代一直不断发展的野史衰退了，《四库》将其分类列入了“杂史”。直至清初，由于受到明末余风的影响还出现过相当多的野史。《明季稗史汇编》中所收大都是野史，其中收载了十六种野史，内容大体都是明季事实，也有一些清初事情。其中有些部分在日本也很早就以《八家集》为名流传下来。其多数是以写本形式流传的，一部分在日本有着木板印刷本。日本较早了解明末清初情况的，多是通过这部《八家集》传来的。后来更多地汇集了明末清初野史的是《荆驼逸史》。另外，近年清朝灭亡时还有《痛史》的出现，其中收集了明末清初的野史，尤其是在清代未能公开的野史。这一类书中还有关于明末清初南方残存的明朝廷，即汇集了弘光、隆武、永历三代事情的《南疆逸史》。此书，本来是温睿临所编纂的，后来经过订正而改称《南疆绎史》，增补了相当多的内容。这是明末清初野史之集大成者。后来，在嘉庆年间的杨凤苞以《南疆逸史》为中心，研究了明末清初的野史。此人著有诗文集《秋室集》，撰有十二篇文章，作为《南疆逸史》的跋，其中列举了很多明末清初野史的名称。也许他未见到这些书籍的全部，总之，明末清初野史之丰富由此可略见一斑。不过，在日本出版的这类书籍中，有时也有在中国不太流行的，例如康熙年间邹漪所著《明季遗闻》、冯梦龙所著《中兴伟略》一类。据说由乾隆帝发现而有名之明末史可法与清初摄政睿亲王之间的《赠答书》，在日本就是从《明季遗闻》才知道的。这些书中亦有假托的内容，如《明季逸史》的著者虽署名顾炎武，我看可能是假托的。大体上，直至康熙年间野史还有成书，看来乾隆以后就灭绝了。当然还有些《南疆绎史》、《秋室集》等乾隆以后的著作，但那些是汇集野史而进行的研究，像见闻记录那种野史已不见于康熙以后了。不过，这些野史记事中的确真伪莫测者颇多。

还有一位叫金堡的人物，此人是个明朝遗民，出家作了僧人，号今释。入清朝之后，在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这所谓三藩中的尚可喜幕中，著有

《元功垂范》一书，是一本记录尚可喜功绩的书。这是很少显露于世的书，因为三藩是对清朝的谋叛，况且金堡又是被视为不逞之徒的。然而，近年来这类为清朝所厌恶的人物的著书也开始流入世间了。又如记述永历事迹的广东诗人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也是这种著作。与清朝灭亡的同时，清初野史多有问世，难以确信者亦多。相比之下以往已为人知的著作则大体是可信的。在清朝所谓"三藩"，有前后两个：前三藩是指明末的弘光、隆武、永历三帝；后三藩即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关于三藩，尤其是有关前三藩的著作，直至康熙时期还有很多。康熙末年成书的杨陆荣的《三藩纪事本末》记述了前三藩之事，乾隆时期又有赵翼的《皇朝武功纪盛》，其中有着后三藩的记事。但是，这些都是以官府记录为主的简单记事，并非野史体例，真正的野史此时已经绝灭了。

就这样，雍正、乾隆以后野史衰败了，代之而起并能够传达当时情况的，是政府公布史料的兴盛，《方略》就是这种史料。其他还有一些虽不公布，但也是由政府编纂的史料，即国史的《本纪》、《列传》、《实录》等的编纂，一般是不公布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可作为野史的替代而向世人发表的著作，即仅仅国史的《列传》看来是被允许抄录的，做翰林的那些人由此抄写而出版有《满汉名臣传》。近年来，将此又加上另外的材料而进行著述的有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那种大部头著作。这些都非野史而是掌故一类的著书。另外，至乾隆年间又有了蒋良骐的《东华录》，是从清初到雍正的记事，虽然简单但比较适合那些见不到《实录》的读者。后来王先谦继而撰著此书以后的部分，对蒋本的内容亦有所增补，比前者更为详细了，成为了可以替代《实录》的著作。不过，作为代价它失去了别史所具有的趣味性。如此，野史衰败了，官书又无趣味，而且私人著述也没有什么生动的作品，所以道光年间魏源的《圣武记》一出，立刻受到世间广泛地赞誉。虽然这主要是写有关清朝武功的内容，但作为直至嘉庆、道光的现代史，毕竟笔法较为生动。《东华录》属于《实录》的系统，《圣武记》则是野史的系统。《圣武记》的材料由于采用了野史，与官书相比虽有事实不准确之处，但读来生动，宛如读小说一般。这是与清朝统一涣散，思想自由的风潮合拍的著述。由于《圣武记》采取了纪事本末体的表述，所以被收入了清朝纪事本末之

中,但就其精神而言则是属于野史的。

以上虽是乾隆至道光年间的基本倾向,但在道光以后野史又再度出现流行的趋势。既然连《圣武记》也已经是以野史精神撰述了,所以此后属于野史的著作越发多了起来。《圣武记》最后的版本中还记载了鸦片战争,关于这次战争有过几种著作,较为流行的著作有《中西纪事》,此书被认为是夏燮的著述。但是,叙事最为确实的是梁廷枏所著《夷氛闻记》,梁廷枏本人就是与鸦片战争有着实际关系的人物。其后,还出现了各种议论鸦片战争的著书。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以诗为本文,在注中记述了鸦片战争的始末。其他关于这次战争的书还有几部。其中,流传至日本的而在中国反而亡佚的书中,有作者不详的《英夷(夷匪)犯疆见闻录》,早在江户时代已经在日本出版,还出现了以《海外新话》为题的日文译本,对于告诫幕府末年日本人应当如何注意欧美人是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此书看来是对实际文书的汇集,没有一定的著述体例,很难阅读,对此日本人努力阅读从中甚至受到了超出中国人的影响。《海外新话》由属于梁川星岩①的门人岭田枫江(丹后②国田边藩的武士)翻译,枫江由于这一翻译还被判处了"江户拂"③刑,尽管此书曾成为了禁书,还是有着广泛的读者。日本人在美国舰队渡来以前之所以已经注意了欧美人,就是由于读了此书。还有《溃痈流毒》一书,这是以抄本流传于日本的,内容也是有关鸦片战争的。但是未能像《英夷犯疆见闻录》那样受到广泛地阅读。幕府末年的日本人得到鸦片战争的消息以后变得神经过敏了。在中国还有一部《乍浦集咏》,这虽然只是对宁波地方人诗歌的汇集,却是编纂成书于鸦片战争当时,收载有与此战争相关的诗歌。对此,在日本仅从其中抽出关于鸦片战争的诗歌予以出版。尾张的植物学家伊藤锦窠(圭介)刻印出版的叫做《乍川纪事诗》,诗人小野(横山)湖山刻印版称为《乍浦集咏抄》。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因为邻家的疝气自

---

① 梁川星岩(1789—1858),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汉诗诗人。名卯,字伯兎,号星岩。现在岐阜县人。与汉诗女诗人红兰结婚。二人曾周游日本全国,回到江户后成立了玉池吟社。

② 丹后,日本旧时地方封国名。位于今京都府北部。

③ 江户拂,江湖时代的一种流放刑罚。不允许居住江户市(今日东京都的一部分)内。

己却患上了头痛，日本人比中国人对这些书反响还大。

另外还有许多有关鸦片战争的著述。其中有属于野史的也有不属于野史的。总之，从这时开始，清朝再次出现了野史类的萌芽，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就更多地出现了野史。关于鸦片战争的《方略》虽未见披露，不过作为有关太平天国的《平定粤匪方略》是见得到的，是多达千余卷的大部头书，所以除此《方略》另外还出版有根据官书而简要编纂的《平定粤匪纪略》。这是编年体的记述，虽不如《圣武记》那么有趣味性，但比《方略》简洁而易于阅读。关于太平军，出版的别史体之中有王闿运的《湘军志》，作为著述质量是非常好的。无论内容的准确程度还是文章的写作技法，都在《圣武记》之上，在中国被称为司马迁《史记》以来的佳作。由于王闿运本人是与当时时局有关系的人物，所以能写出这部揭露自己熟知的湘军内幕的佳作。他并没有凭感情用事，由于其记事的内容与《平定粤匪纪略》十分吻合，可见其记载的正确性。此书一出，由于湘军内情被揭露，曾国荃很不愉快，以致向王闿运诉苦，所以王闿运将印刷的版木交给了曾国荃。于是，同情王闿运的人又另作了版木，近年王闿运又出了再刻版。曾国荃不满于王闿运的《湘军志》，命其御用学者王定安另外撰写了一部《湘军记》。王定安虽然也是有名的文人，但由于其书仅取《湘军志》中有利于曾氏的内容，再填补以其他内容，沦为一种很不体面的作品。故而《湘军志》至今仍有读者，而很少有人读《湘军记》。

另一方面作为纯粹野史体例的还有一本《盾鼻随闻录》。虽是关于太平军的野史，但被认为是出于宣泄私恨的写作，即出于对道州何氏（有名的文人何绍基家）的憎恨，而记述了何家蒙受太平军侮辱的内容，被认为内容不属实。另有一部可信之书，即同情太平军的《满清纪事》。此书仅传到了日本，内容虽少但是根据确实史料的撰著。最近清朝灭亡，还出了一部《太平天国野史》，是掌握了太平军一侧史料的著述，与大英博物馆的戈登①文书亦相吻合。还有一部关于太平军，但是从第三者立场上

①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英国军人。1860 年（咸丰十年）派往中国，同年参加英法联军掠夺圆明园。后在 1862 年又统领洋枪队（“常胜军”）镇压太平军。

撰写的王韬(紫铨)的《瓮牖余谈》。此人是上海有名的《申报》的记者,曾帮助里雅各[①]将儒家经书翻译为英文,也曾帮助过朱立安[②]的研究。去过英国,也到过日本,作为日本纪行著有《扶桑游记》。虽然大体是属于说部家的人物,但其《瓮牖余谈》应该说是可信的。太平军甚至一度试图任用此人,以致一时难以在中国居住而移居英国,可见其对太平军是十分了解的。他来日本是在明治十一年。

与中央政府势力衰微的同时出版的野史,还有一些关于日清战事、拳匪(团匪)的著述,但都不如鸦片战争、太平军的记述有可读性。其中关于拳匪的书中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读性。在清朝末年至清朝灭亡之际,虽然出现了许多有关革命的野史,但是其中相当都是没有可信依据的内容。即便现代,中国人也是很喜欢野史的,每有事件发生总有野史出现。无论如何,可以说近年来说部类书籍达到了全盛的时期。

多少与野史有相似之处的是清朝目录学家收入杂史的掌故类,虽说不比明代更为发展,但与野史相比是相当盛行的,而且还出现了相当有名的著述。最初主要是那些明代遗老中有人写一些明代的掌故,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就记述了有关北京的明代掌故。康熙时代的掌故学者中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诗人王士禛,此人撰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等。这些书虽然通常属于说部,但其内容有一半以上是掌故,对了解清初故事是很方便的。著名诗人查慎行(初白)著有《人海记》,作者虽是康熙年间人士,出版则在咸丰初年。作为掌故书确是一部佳作,只因长期被埋没而未流行,所以其学问影响很小。同时期作为掌故书而为人所知的还有王应奎的《柳南随笔》,虽比不上王士祯书有价值,但这个时期

---

① 里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英国传教士,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长期逗留马来西亚、香港。英译众多经书、诸子书籍。

② 朱利安(又称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9—1873,一说出生于1797年),法国籍犹太汉学家。从巴黎皇家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至法兰西学院教授。汉学造诣颇深,著有《汉学指南》,译作丰富,从《孟子》到《天工开物》等中国典籍均有翻译。精通梵文,翻译《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法国金石文艺院(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为纪念其功绩,特设"朱利安奖",授予国际上优秀的汉学家。关野贞、羽田亨、神田喜一郎等日本学者曾获该奖。

因为没有其他名著而权以此书置于其次。大体上康熙年间有关掌故的书,其体例尚属于说部,其中包括了丰富的掌故材料。而从乾隆开始由于学问在总体上发生了变迁,分别出现了许多部门,所以真正专门收集掌故材料的书籍亦多有出现。

康熙乾隆时期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举措,即博学鸿词科的开设,这是在普通的科举以外,为采用那些未能及第进士的知名学者文人开设的特科,入得此科的人是很有名誉的。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掌故看来也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杭世骏就著有《词科掌录》、《词科余话》。此后,又有李富孙的《鹤征录》、《鹤征后录》,前者记述了康熙年间的博学鸿词科,后者是有关乾隆年间的内容。也有收集一般科举考试的掌故的书籍,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槐庭载笔》就属于此类,内容只是绵密地举出了有关科名的事实,对于有趣的逸话一概未加采用,非常枯燥无味。考试及第后被认为最为名誉的地位是翰林院和詹事府,收集了与此相关掌故的著作有乾隆末年吴鼎雯的《翰詹源流编年》,此书还附录了《馆选爵里谥法考》。其他,像官署比如六部、都察院之类,虽说大体也都有其故事可言,但多数官署都没有像翰詹这样文雅的事例,而因为那里多是些簿书之类,即胥吏为了处理事务而利用的文书虽很多,而作为学问则无法列入掌故。这些不过是写些单纯性吏务的、实用的文书而已,而掌故是不采用这类煞风景的材料的。在掌故中列入文雅职官里有内阁中书,这是过去中书省名称的残余,是内阁中的低官,虽比不得大学士那种高官,但由于要处理诏敕等草案,所以在大学士与中书之间,虽有先辈与晚辈之差,但中书并不是所谓的属僚。因此,关于中书有王正功所著、赵辑宁补作的《中书典故汇纪》。后来,从雍正年间开始军机处成为了最重要的职官,对此作出记载的书中有道光年间梁章钜撰著的《枢垣记略》。其后,恭亲王让出入军机处的人增补此书内容。六部中被认为只有礼部属文雅职官,对其写掌故的书籍有梁章钜的《南省公余录》。梁章钜以掌故学者著称,他的著书多是与此有关的作品,即便是文学作品也多涉及掌故。例如《制义丛话》(有关八股文的内容)、《楹联丛话》(是为便于读书人使用的有关对句的书,掌故较少)、《试律丛话》(关于考试的五言十二律的排律的内容,有一半是关

于掌故的)等都属于这类著述。

如此从乾隆至道光年间,逐渐兴起了对各部掌故的记述,而其间从嘉庆、道光开始,又有着像王士禛所著的成熟掌故的复活,其中著名者有礼亲王的《啸亭杂录》。礼亲王有清朝掌故学者第一人之称,魏源等也认为此人所记述的内容大致无错误而可信。此书中虽有些类似说部的内容,但由于此书中清朝掌故占了八九成,所以大体还应该说是掌故的书。与此类似的著作还有嘉庆年间余金的《熙朝新语》,这是有关于学者文人的内容,基本也应该是掌故的著作。近年还有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这是纯粹记述掌故的书。作为以人物为主的故事书是《啸亭杂录》,以官府宫廷为主的记述则以《养吉斋丛录》为代表作。进而仅仅希望详细了解宫廷掌故的话,则一定要读《国朝宫史》。此书是载入《四库全书》而以往未得流传的书,不过近年得到了出版,是官撰之书,乾隆七年初撰,三十四年重修。内容包括了《训谕》四卷、《典礼》六卷、《宫殿》六卷、《经费》三卷、《官制》二卷、《书籍》十五卷,凡三十六卷。《啸亭杂录》、《养吉斋丛录》是以作者自己见闻为材料的撰述,而在抄录他人书为材料的著作中,光绪年间成书的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则是以人物为中心而且是掌故之集大成者,材料的丰富程度在上述二书之上,但是由于汇纂时未注明引用的出典,所以材料的信用程度并不很高。道光以后世道骚然不安,仅仅以文雅为主已经行不通了,于是出现了经国济世方面的掌故,形成了重视实用掌故的情况。王庆云的《石渠余纪》(一名《熙朝纪政》)就是适应这一要求之经世掌故的代表作。希望了解清朝掌故的话,可以读上述之《啸亭杂录》、《养吉斋丛录》、《国朝宫史》和这本《石渠余纪》,还应该参考《郎潜纪闻》。最近出书的杨钟义所著《雪桥诗话》,书名虽为《诗话》,实际是写掌故内容的。此人是现今第一流的掌故学者,虽说出身于汉军八旗,但因为是宗室盛昱的姻戚,所以特别精通旗人掌故。

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出现了一种介乎掌故与野史之间的书。如陈其元的《庸间斋笔记》和薛福成的《庸盦笔记》之类属于这种书籍。此二书完全出于不同的主张,前者袒护左宗棠,后者偏袒曾国藩而贬低左宗棠,

大部分内容多取自传闻，作为事实多不可信，毕竟带有说部习气。这类书中还有黄钧宰的《金壶七墨》。随着近代的到来，掌故与野史合为了一体，虽说很有可读性，但是在事实上可信者却越来越少了。

除了以上这些关于人物或官署事务所见事实的掌故之外，在道光年间还出现了收集有关掌故文章，提供参考实例的著作。像李兆洛的《皇朝文典》、鲍康的《内阁撰拟文字》就属于这一类书籍。另外，最近曹元忠的《礼议》亦与此相近。掌故之书是提供人们了解宫廷、官府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或了解那里的官吏是如何生活的书籍。虽说这在明代已经有着相当的发展，但是清朝掌故之学的发展也并不亚于明代。

二十、官　书

明代焦竑的《国史经籍志》中有《制书类》，其中记载了明代天子皇后的御制、敕修、记注时政等。与这种明代的制书相类似的书籍，在清朝也有存在，其中还有一些明代所没有的种类，而且大部分都已经载入了《国朝宫史》之中。但是《国朝宫史》没有乾隆以后的部分。其中与史学相关书籍有以下这些：

（一）《实录》。这包括了历朝的《实录》，其中大部分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清朝的敕撰书一般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但也有加入蒙文的情况，太祖的《实录》就由满蒙汉三体写成，后来就都是满汉两体了。《实录》是一朝结束之后在《实录》馆进行记录的。但是对初修的《实录》，也有经过后代修改的。在日本以写本流传的《清三朝实录》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实录》，这与现存于中国内廷的《实录》就有不同之处。不仅在满洲、蒙古的人名、地名、职名在对音上的变化，关于事实亦有出入。但是并没有明代《实录》那种由于朝廷事件而进行改写的情况。日本的传抄本是康熙年间的纂修本，中国的则是乾隆年间经过修订的，所以有所不同。大体上，清代在编纂的方法上比明代要绵密，卷数也增多了。太祖《实录》十卷、太宗六十五卷、世祖一百四十六卷、圣祖三百卷、世宗一百五十九卷，此后的部头就更大了。明代的《实录》，延续了唐以来的风格，

其记事体例就像日本《六国史》①中的《实录》那种撰写方法，大体是对官符的汇集，其中再插入大臣的传。清朝《实录》是对官符的编缀，作为史料是很重要的，也是了解清朝史所必要的书籍。摘录此《实录》的又撰著有《东华录》，蒋良骐的《东华录》是对乾隆重修以前《实录》的摘录，王先谦的《东华录》则是对乾隆重修以后《实录》的摘录。

（二）《圣训》。这相当于明代《宝训》，即将诏敕之中可作为后世范文者予以类聚的书籍，这种书籍是出版发行的。虽然这是在《实录》中收录的，但在今日见不到《实录》的情况下，②能见到的也只有《圣训》了。

（三）《御制集》。明代只有太祖、仁宗、宣宗有《御制集》，而清朝的各朝都有。而且清朝是无须臣下代笔的，善长文章的天子很多。清朝在康熙以后由于不立皇太子，所有皇子皆须作学问，因此都相当有学问，所以代代天子都有文笔之才。尤其是康熙以后直至道光年间，重要的诏敕都是天子亲自执笔，或口授让臣下记录。像雍正帝甚至还写过与臣下争论的文章。如此的天子《御制》，与《圣训》、《实录》一样，都是很重要的史料。要想了解康熙帝喜好西方算术，雍正帝好禅这类私生活的话，是有必要查阅《御制集》的。

（四）《方略》。这是清朝才开始出现的史料编纂体例，是关于征伐的著述。根据魏源的观点，《方略》形成于乾隆以前，主要是记载天子上谕，而不载臣下奏疏的，所以不能反映事件的详细情况；但是至乾隆时期则既载上谕又载奏疏，体例逐渐完备。因此，乾隆以后的《方略》分量也非常之大。那么到底有过怎样的方略呢，若以所载事件的年代顺序而论，则首推《皇朝开国方略》。但是，这并非当年开国时期的编纂，而是在各种《方略》问世之后才根据追溯撰著的，是依据《实录》等的著述。作为康熙时代的著述有《平定三逆方略》，是关于后三藩的内容，这是第一部当

---

① 《六国史》，古代日本律令国家所编纂的一系列六种的正史。虽吸收了一定的纪传体要素，但主要是编年体体例。包括《日本书纪》（？—697）、《续日本纪》（697—791）、《日本后纪》（792—833）、《续日本后纪》（833—850）、《日本文德天皇实录》（850—858）、《日本三代实录》（858—887）等。

② 谷川道雄先生提示：《清实录》最初在1938年由“满洲国”国务院印行影印本（奉天所藏本），但内藤湖南已于1934年去世，此所谓《清实录》可能是湖南在奉天所见实物。

时人编纂当时事的《方略》。其次,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这是有关康熙帝征伐准噶尔之噶尔旦的记录。但是其中未载奏疏。在此《方略》之前已经先有了简单的著作,然后编为《方略》的。乾隆以后出现了很多《方略》。举例的话,如《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也有命名为《纪略》的。最后还有关于太平军的《剿平粤匪方略》,有《剿平捻匪方略》,还有《剿平回匪方略》是关于回教徒的。《粤匪方略》、《捻匪方略》成书于同治年间。这是用西方人传授的全新的活字法在总理衙门制作的活字出版的书籍。

(五)典则。典则中既有一般性的,也有关于一时、一事的内容。一般性内容的如《大清会典》。最初成书于康熙年间,一百六十二卷,后来在雍正时重编为二百五十卷。乾隆年间在《会典》的一百卷上又加上了《则例》一百八十卷予以出版。嘉庆的《会典》八十卷、《事例》九百二十卷,附加《图》一百三十二卷为《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年的《会典》一百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图》二百七十卷。《会典》是记载那些制度上不变的内容,《事例》则汇集了那些因为有所变化,所以只能根据先例进行处理的事例。《明会典》有二百余卷,至清朝则已经发展为千卷以上了。其他还有《大清通礼》,是关于礼仪的著作。明代就有《大明集礼》,《大清通礼》是与之相对应的产物。作为清朝特殊的著述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清朝实行着满洲特有的土俗祭典,即在中国固有的南郊天坛之外另有"堂子",这是与此相关的礼仪。这还只是一般性的典则。其他还有一些例如有关学校、选举方面的《钦定学政全书》,以及《南巡盛典》这种关于天子南巡的典则。

(六)史志。这是在国史馆编纂的国史。已经是编纂成为了《本纪》、《志》、《列传》的形式。这些与其说是史料,毋宁说是已经成形的史书。其他方面还有一些记载特别事项的著述。例如,清朝采用了西方天文学,关于仪象有《灵台仪象志》。另外,在地志方面有《大清一统志》,在局部方面还有关于盛京的、关于热河的、关于西域等地区的著述。其他还有一些清朝特有的内容,如有关八旗、王公的《八旗通志》、《宗室王公表》及其《传》,《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及其《传》。

（七）系谱。宗室、觉罗每十年要提出一次谱系，并在朝廷制成玉牒。宗室立为黄档，觉罗立为红档。做成纵与横两种样式。其他，关于八旗还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八）谱录。这是宫廷所汇集之书画、古器物的目录。书画方面有《石渠宝笈》、《秘殿珠林》；铜器方面有《西清古鉴》；砚台方面有《西清研谱》，都是有关艺术方面的内容。

（九）目录。这是书籍的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复兴了断绝许久的目录学。采用了《崇文总目》的体例，但又胜于《崇文总目》，是空前的著作。《天禄琳琅书目》是关于古版本、古写本的书目。

清朝的官书中与史学有关者，大体不外以上诸种。

二十一、史　评

史事　王夫之（《正统论》）

史体　（纪昀、邵晋涵）《四库提要》　《国史经籍志》（焦竑）

史法　方苞（义法之学）

史意　章学诚　龚自珍　张尔田　孙德谦

　　　梁启超（不知其意而妄作者）

校者曰：著者在《浙东学派史学》中讲道章学诚的时候曾说："章学诚最擅长的是史法，史法即便在清朝史学中也是很特别的，而且由于在章氏以前也有，所以我将另外论述。"但是大正十年（1921）度听课学生的笔记中却见不到"史法"一项。也许是由于授课时间的关系，而没能讲授。后来在大正十四年（1925）度再次讲授清朝史学时，看来确实是讲授了此项内容。但是校者手头收集到的同年度的听课笔记中的这一项内容，却极为简略而且不完整。很难据此成文。因此，虽然是不得已的办法，也只好暂时将著者的这一项内容按听课笔记照登于此，并期待将来能得到更加完整的听课笔记。



附　　录



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

近来我一直蛰居乡下，难得有机会与大家一见，这次中国学会要求我在大会上讲些什么，然而毕竟日渐衰老，重新考察某个课题进行演讲那样吃力的事情已经做不动了，所以就说如果能想出什么重新研究的问题，就接受邀请。之后，就在家里找了找，十几年前因为曾在大学讲授过中国史学史，所以翻找到了也许当时尚未讲过的两三页纸的内容，这应该是后来在订正学生课堂笔记时打算补上的内容。况且斗转星移，时代变化，现在在大学读书的都是些年轻人了，所以即使是我在当时已经讲过的内容，想必这里也没有知道的人了。因为是旧内容所以没有一点新的研究。如果是当年没有讲过的内容的话，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作为我个人也是比较方便的。总之，就这一部分来说，我手头没有任何授课笔记之类的东西，由于只写过一些纲要似的东西还保存着，所以虽说有些偷懒，但是听说在这里讲述的内容还有人给记笔记，这很方便，所以权当对当年授课时遗留部分的一种补充吧。但是毕竟因为有着这种纲要留了下来，万一我在什么地方讲过这一话题，而且今天又恰好有哪位已经听过这一内容的话，一定请您原谅。不过，即便以前听过的话，也可能现在已经忘记了。

因此，所谓“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不论如何作为目前的演讲题目来说，实在是相当不讨人喜欢的题目。现在这种幼稚的题目是不时兴的，只有那些大家都下功夫的题目才流行，一看而不太明白内容的题目也许是最流行的，但这却是个极为浅显的题目。

实际上我讲授中国史学史，最初开始于大正三年（译者注：1914 年），距今已是十九、二十年前的事了。其中经过订正，重复地讲过两次。即使是第二次也是在十几年前，大约在大正八、九年开始的两年或三年连续开

设的。其后略作了订正。大正十二年,我在大病之后暂居有马。当时虽然仅仅对听课笔记作了订正,但是如果作能够出版程度的订正,则尚需时日,所以最终还是搁置下来,至今未得付梓。

如此说来若作为研究的话,也已经是相当陈旧的研究了。当时基本上对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做了各种研究。其中,对于我先着手做的某些研究,后来王国维也进行了研究,而且某些部分在今日还成为了王国维的创说。总之,当时对于历史的起源问题大略进行了研究。当时授课中讲到的历史起源,因为讲的大概是史料的起源和记录的起源,但基本没有涉及历史思想方面的起源。后来大概是考虑到这一部分的阙如,而仅仅写了这个纲要夹在了学生听课笔记中。人老了记忆也在减退,也可能有记得不对的地方。

虽说是“起源”,但实际上“起源”这一表述也许不够准确,因为其中还涉及历史思想所逐渐发展的途径,所以表述为历史思想的发展也许更好一些。总之,对于这样问题进行了各种材料的考察。

第一,比较正确可信的记录中所见到的历史思想。中国古老的记录,虽然像经书这类著作,很难说是绝对正确的,最多只能说比较正确的。其中,像《尚书》等只是相对来说是最为可信的记录,而在《尚书》中又只有某些部分是相对最为可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周初,一般认为以周公为中心的记录相对来说是最为可信的。今日的《尚书》中被认为准确的《今文尚书》中,我认为特别是关于周公的记录比较可信。如果叙述其可信的理由的话需要很多时间,今天暂不予涉及。至于有关周公的记载,如《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这是所谓的“五诰”,这“五诰”或再加上与此相接续的《无逸》、《君奭》、《多士》、《多方》、《立政》诸篇,都是与周公有关的内容。这些基本上被认为是《尚书》中比较可信的。但是,如果对这些材料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几乎没有纯粹作为记录保存下来的内容,一部分是记录,一部分则是传诵的形式。而其中许多被认为保存了记录的部分则是今日的“五诰”一类,与此相比较的话,像《无逸》、《君奭》等篇中那些看来作为传说传下来的内容就比较多了。不过,即便多少有些传说的材料,那

些传说也不是在某一新时代载入简策的内容,而很可能是相当古老时代就记载下来的内容。在这些有关周公的记载中,最后出现的是《立政篇》,对其中所使用的文字,我偶然想到其中助词“矣”字的使用。就使用助词“矣”的篇章来说,与周公有关的诸篇中只有《立政》一篇。而且从《诗经》的用例来看,“矣”字使用的逐渐增多,我认为大体是在西周末至东周初之间[1],所以很可能《立政》等篇关于周公的内容至少也是东周初之前所记载下来的。于是,由于这一篇是有关周公诸篇的最后一篇,所以此外的各篇大体可认为是在此以前的记载,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推测,还说不上是极为严密的研究。

无论如何,由此可以说,其中的“五诰”作为传世的中国记录看来是最准确可信的。另外,作为证明“五诰”中《召诰》、《洛诰》相当古老的证据是《洛诰》的结构非常奇异,即这一篇的最后记有年月。就是在《洛诰》的最后书有“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这句话之前记有“在十有二月”。《召诰》、《洛诰》这两篇在内容上是相互连续的记事,而且基本是同时记述的内容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如果将《洛诰》末尾的这种纪年的方式与铜器铭文做比较的话,可知铜器名中最古老的记录方式就是这样的。大盂鼎、小盂鼎铜器在今日存世铜器之中不仅制作最为美观,而且铭文内容也相当淳古,就其铜器的纪年方式来说,大盂鼎也是在最后纪年,然后记有“隹(惟)王廿又三祀”。而小盂鼎记有“隹(惟)王廿又五祀”,这也是在最后。此外,我当年考察这一问题的时候,查过《攈古录金文》等书,《攈古录金文》中所录铜器“鮽尊”也是最后记有岁月。而且是非常奇怪的记录方法,用了“隹(惟)王十祀有五日”这样的纪年方式。另外还有一件“庚申父丁角”,此器可能现存住友家,或称“宰椃角”,写有“在六月隹(惟)王廿祀”。还有一件也是收于《攈古录金文》的“戊辰彝”,写的是“在十月隹(惟)王廿祀”。另外,还有一件最近郭沫若氏的《金文辞大系》所收的“趞尊”,也是记为“隹(惟)王二祀”。以上都是在铭文的最后记年份的用例。

所以,这种在篇末的纪年方式,大体只限于所谓西周的铜器,几乎不见于东周以后的铜器。可以认为这是非常古老的纪年方式,而且这与

《洛诰》纪年方式又是一样的。只是《洛诰》用了“七年”而不是“七祀”，这是因为记录在流传之中，可能是在逐渐改写为后出的容易读懂的文字所造成的，例如司马迁《史记》中对《尚书》的引用，就有各种改易原文的文字。虽说这是以训诂字所做的改易，但毕竟在传授古老记录时，出于简单易懂的需要，才有必要如此进行文字改动的。

无论如何，《召诰》、《洛诰》在《尚书》中的确可以说是记录年代最古老的篇章，在《召诰》中还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历史的思想。大体而言，中国的历代中最古的时代从夏代一变至殷代，又从殷代一变至周代，从夏至殷时代的确实记录毕竟今日还是不得而知，《尚书》中虽有殷汤征伐夏时的《汤誓》、《汤诰》这类誓诰，但这些大体是作为传说传承下来的，可以认为是在以后某个时代被写入记录的，而不能认为是从一开始就予以记录并保存下来的。不仅如此，夏以前中国历代的情况到底如何虽然不得而知，但由夏至殷，殷至周的情况，在中国看作是古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像夏至殷这种仅仅由一个朝廷转变为另一个朝廷的情况，对历史观点还没有显著的影响，然而，经过两次王朝的交替之后，看来这种王朝变化的现象就引起了一般人相当痛切的思考，在中国对于夏殷周三代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到了后代，甚至对此还赋予了“三统说”那样的理论，论及了各个时代的特色。总之，可以认为由于出现了“三代”，所以这“三代”之间的变化曾给予人类知识以极大的冲击。因此，《召诰》中所反映的就是对夏殷周三代之间革命的思考。夏失去天命而一变为殷，殷又失天命而变为周，所以出现了“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样的语言[2]。以前代的事情为范本，或引以为戒地进行反思，像三代这样连续不断地更替代换在古代思想上被认为是十分重大的事情。除《召诰》以外，同样的思想在《多士篇》之中也有存在[3]。另外，虽然没有对整体时代之间革命的观点，但在《无逸》、《君奭》诸篇中也多少都有着可称之为历史思想的体现，又如《多方》以及前面提到的《立政》诸篇等，也都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历史的思想。其中有一种思想读一读今天的《尚书》就可以知道，即作为胜利者的周人，对于虽说是失败者但是仍然非常有实力殷人说：你们的国家殷不也是因为其前代的夏政衰败了，才予以取代的

吗？你们的国家失掉了天命，而我们的国家得到了天命，因此予以取代是理所当然的。这被认为可能是当时对殷人讲清原委的某种政策，但是无论如何也可以说这种三代之间的变化，在历史思想来说在当时也是相当重要的内容。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即比较正确可信的古老记录中所体现出的历史思想。

下面我想谈谈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从古代开辟中国国土的人物直至自己所处时代之间，世间的变化、王朝的变化的思想。作为古代国土的开辟者，在《诗经》或《书经》中最早出现的人物是夏的禹。关于夏禹，《书经》中也有大量的记载，《诗经·大雅·荡》篇中亦有世人皆知的名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仅仅两句就表达了三代的变迁。又如《大雅·文王有声》篇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反映此时对禹平治水土往事的看法。又如《大雅·韩奕》篇曰："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此外又如《鲁颂·閟宫篇》曰："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商颂·长发篇》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商颂·殷武篇》曰："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都是关于禹的记述。这些诗到底是何时的作品，虽说其中有的可知，有的不清楚，像《商颂》等诗写作的时代虽颇为不详，但其中写作时代最清楚的是《鲁颂》。这主要是关于鲁僖公时代的作品，而且可以肯定是僖公以后作成的[4]，甚至作者名字也流传了下来。如此，这些关于禹的传说可以认为都不晚于《鲁颂》，至少在是《鲁颂》产生之前的就有了。其他的《大雅》的两篇也至少也是在西周末与东周初之间产生的诗篇。另外，《尚书》中关于禹的记述，有《虞书》、《夏书》中特别记载尧、舜、禹的部分，还有《洪范》中关于禹的特别记载的部分且另当别论，仅就周人关于禹的文字表述来说，则是上述《立政篇》的记述了。如"陟禹之迹"一句与《诗经》中的文句就十分相似。此"迹"字在《诗经》中写为"绩"，也许这是古时候因为同音而意亦同的字。同样的例子还有《鲁颂》中的"缵禹之绪"一句，这在著名的齐侯镈的金文铭文中记为："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此"堵"字也许与"绪"字本来是同一字。总之，由此可以认为禹开辟水土的传说盛行于世的时期应该是在西周末至东周初。如此，那种认为《商颂》的制作年代也在这一期间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

再有就是刚刚提到的齐侯镈，这是以金文对禹之业绩的表述。这一齐侯镈载于宋代的《博古图》，亦载于南宋薛尚功的《钟鼎款识》。近代以后对此进行的研究，以孙诒让的《古籀拾遗》最为精确。钟文是说：殷汤在伊尹的辅佐下讨伐夏桀，然后全部占有了九州，也居于了禹的土地。即上面引述的两句。这是金文中对夏殷之间革命的叙述。这一齐侯镈钟被认为大体铸成于鲁成公时期，因为钟文所记齐侯即齐灵公，所以由此可知其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大体在东周初年，也就是说这是与《鲁颂》的年代没有太大的差异时期的金文。虽然今天这一铜器的实物已经不存，但是与此为同时代的另外一种齐侯镈，据说今日在中国仍然存在，即苏州潘氏、潘祖荫家的收藏品，所以应该说这是可信的。其中叙述了有关禹的情况，并涉及了在此以后的殷周革命，这些可以说都是非常确实的将禹作为开辟者的历史思想材料。不过，这种关于禹的传说，与商的玄鸟堕卵、周之姜嫄履巨人足迹那种原始图腾主义的神话还有所不同，即使认为它最早也是一种图腾的话，其对全体国土开辟者的认识也已经是很发达的了，反映出这已经是一种由历史思想所构成的观点了。

第三，谈谈我称之为"缘起谭"①中所体现出的历史思想。所谓缘起谭，是存在于任何国家的古史、故事、记录之中的。在日本也一样，在《日本纪》或其他古史中缘起谭都非常多。尤其是像《风土记》的那些著述，可以说全部都出自缘起谭，在《日本纪》等的缘起谭中所记载的内容，也就是世人所云"缘（原由、事由）也"。例如《日本纪》在《神代》卷中记述有"天稚彦"的情况曰："此世人所谓反矢可畏之缘也。"还在记述"伊弉诺"、"伊弉冉尊"时曰："世人恶以生误死，此其缘也。"这类的表达在《日本纪》中非常多。《神武天皇纪》中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向人传递秘密时使用一种倒语，此记载说：使用倒语起于斯。另外，《日本纪》中有很多记事也是在记载各种家世时，或写其先祖，或写其墓葬，还有写古人事迹而以今日某家为其苗裔，对某种事情总是从今日现在之事开始予以追溯，寻求因缘的内容。这就是缘起谭，这种缘起谭在中国的古书中，例如《左

① 缘起谭：日本佛教话本中一种追溯起源的写作体例。

传》中也有着大量的记载。不仅《左传》,此外在《公羊传》也是这样的。对于这种现象,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中也予以了注意。《困学纪闻》的最后一篇的《杂识》中就举出了许多这类情况,其主要依据的是《礼记》、《左传》的记述。指出:《左传》中有使用的"始"字,必定是用来表示某种情况的开始,因为"始"字非常重要,所以凡遇新情况都一定用这个"始"字。例如隐公五年,对于祭祀音乐使用了六佾一事记载曰:"始用六佾也。"类似这种"始于某事"的表达方式在《左传》多有出现,而且都是以这种"始"为头等重要的事情,也由于这可以作为事物变化的证据,所以对于这种情况都用"始"字表达。《困学纪闻》卷二十中论及了这一情况,说不仅《左传》,《礼记》中也记述了很多类似的情况,认为"《礼记》于礼之变皆曰'始'"。而且举出了许多例子。在《礼记》的《檀弓》、《曾子问》、《玉藻》、《杂记》、《郊特牲》诸篇中,都是就礼的变化而记为"何种情况由何事开始"的,他首先举出了的例子是《檀弓》中"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接着,还列举了许多类似的例子。当然,这并非由王应麟才开始发现的问题,王应麟不过是对宋人陆佃所注意到的问题予以了补充。总之,是王应麟和其他人注意到了用"始"字来表达礼的变化这种现象的[5]。王应麟此外还在《困学纪闻》卷五中指出:"《礼记·曾子问篇》于变礼无不讲。"①又在《困学纪闻》卷六中提到上述的使用"六佾"一事,但这里主要是出于《公羊传》的观点的记述,其实是献六羽之事。另外,还有对"税亩"之事指出:由于是按亩收税的起源,所以都书以"初"字,注意到这个"初"字是用于对世上事物变化的重要表达[6]。此外,王应麟除了前面提到的"始"以外,他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犹"字[7]。这在《左传》闵公元年条中有"犹秉周礼"一句,即记述了鲁国仍在使用周礼。另如僖公三十三年条中有"齐犹有礼"一句。对此王应麟认为使用此"犹"字,意在表达虽然礼已经长久荒废,但只有鲁、齐对礼仍有所保存。是说虽然世间已经变化,但在此仍有遗存的意思。前述的"始"的现象讲的是在某一

---

① 《困学纪闻》卷五:"《曾子问》于变礼无不讲,《天圆篇》言天地万物之理,曾子之学,博而约者也。"

时期逐渐开始,然后又逐渐盛行的情况。总之,这些都是作为缘起谭,表现的都是某一时期有了某种事物的起源,或从古时开始流传的事情发生了变化的情况,这就是缘起谭的历史思想。由此形成了将前代之事与现代之事进行比较,而且是以着眼于转折点从而对有关历史问题所做的探索。这同样也是历史思想的一个重大的起源。尤其是如果我们也从《日本书纪》那种记载来考虑的话,便可知缘起谭在古代传说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幸好像《公羊传》、《左传》中也同样有着缘起谭的存在,由此我们得以了解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及其对古代史的认识。这是我要谈的一个问题。

此外,中国学者中研究《左传》的汪中还注意到:《左传》的记述不仅限于人事,还记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等五事,他还一一举出了例子,而其中与历史思想有关的主要有灾祥、卜筮、梦等三事[8]。这些与历史思想的产生都有着各种各样深刻的关系,而且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卜筮方面。对《左传》、《国语》中有关卜筮的记事,在日本也有人从卜法上予以了注意,谷川龙山甚至著有《〈左〉〈国〉〈易〉一家言》一书,而且对《左传》、《国语》中关于卜筮的记事大多予以了汇集。看一看这些记事便可知,大体这种关于卜巫的记事,当然都是仅记载那些应验的八卦,而不载那些不应验的八卦。恐怕这是以卜筮家记录为原本的吧。作为卜筮家,从自家职业的角度,对于那些不应验的事例本无记载的必要;而仅仅记载那些应验者,才是自家职业的光彩。由于这种原因,当然仅仅记载应验的八卦了。汪中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指出"史之于祸福,举其已验者也"。《四库全书提要》甚至说:"《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但是像日本安井息轩先生那样,更郑重地予以考虑的话,应该看到出于道德劝诫的目的而仅仅记载那些正确的内容,而像《提要》的作者和汪中那样,虽说从奚落的眼光,但毕竟注意到了其记载仅限于应验八卦的现象。而其中最大的应验八卦,已经成为当时时代问题,而且这或许还关系到《左传》其书的价值、真伪的问题。意外的是在中国七百年前朱子对此事也是个相当的讽刺家,他提出了一种有趣的评论。他在论及这

种重大关系时，一是谈到了齐国田氏，田氏虽然夺取了齐国，但田氏的先祖是陈敬仲，是从陈国来齐国做官的，其后裔相当强盛，最终夺取了齐国。这个陈敬仲最初赴任齐国之事见于《左传》鲁庄公二十二年，记载说当时有占卜预言其家将逐渐兴盛，八代之后当为更大家族。对此，朱子认为这是见到其家在八代之后成为大族而记载的，这是后来记载的前代的占卜。朱子认为《左传》中多有后来人记载的内容。因为见到了后来兴旺的家势，于是追溯其家开始兴起时的情况，因此当然可以写出占卦灵验了。这样看的话，齐国之变为田氏是在战国初期，而由于是知道这时期情况的人撰写了《左传》，所以这也可以成为《左传》所记录的时代的一个证据。

又如晋国后来为韩、魏、赵三家所篡夺，而且成为了小国，魏国最初的人物是毕万，他为晋所起用时也有占卜的记载。这个毕万被分封于魏地。"魏"是表示大的名称，而"万"又是极度的数字，所以占卜说此家族应该繁荣昌盛。这种占卜按照朱子的观点应该是魏国强盛后与韩、赵一起分晋时记载的。因为，魏国的兴盛当在魏文侯、武侯和梁惠王的时候，所以朱子认为《左传》应该就是成书于这一期间。王应麟虽然也根据《朱子语类》在《困学纪闻》中写了同样的意思，但他的观点没有朱子那么极端，他认为这些后来载入的记事并非《左传》的旧文，而是后人加上了本来《左传》所没有的内容[9]。总之，关于《左传》成书的问题姑且不论，那种由于子孙的繁荣昌盛而追溯其起源，希望从有关其起源的记事写起的观念，这本身就是相当重要的历史思想。看一看日本的《神皇正统记》等（或许以前的记录也有这种说法），就可以知道其中都含有一种思想，即认为：由于藤原家古时的先祖天儿屋根命曾经辅助过天照大神，①所以其子孙后代家族繁荣，而且成为了历代摄政关白之家。这毕竟是藤原②家繁荣之后才出现的思想，再从这种时代思想出发追溯古代之事所作出的记载，而这种思想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关于卜筮的认识，进而成为了一种历史

---

① 天儿屋根命、天照大神，均为日本神话中出现的神，供奉于神社。

② 藤原，日本古代至近世的贵族。

思想。

其次,像梦、灾祥等记载毕竟也是同样性质的内容。所谓灾祥,大体就是《尚书·洪范》中的"休征"、"咎征"一类,即吉庆的征兆或凶恶的征兆之出现及其结果,《洪范·五行传》全部都是这类内容,《洪范·五行传》的五行思想虽然是极为荒唐不稽的,但是其间由于涉及了天象时令与人事之关系、显示了有何原因则会出现何种结果的意义,所以这是一种因果思想,即古代历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上述思想就儒教来说,至孔子的时代,或孔子以后比较淡薄了,在孔子那里对于这种古代思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反叛之意。在墨子那里则相当多地保留了这种古代思想,墨子的书中有着相当多的怪诞思想,即鬼神方面的思想。《墨子·明鬼》中这类内容很多,可见这种思想在春秋以后还是广泛存在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又是一种历史思想。而且就《春秋》三传而论,《左传》中这种思想最多,而《公羊传》就没有《左传》那么多了。因此,朱子等认为《公羊》是经学,而《左传》是史学,大概就是因为《左传》中有着更多的因果思想吧。不过《公羊传》其实又有着其他的历史思想,对此,我将放到后面去讲。大体而言,卜筮、梦、灾祥等内容,虽说多少与缘起谭相似,但毕竟又是与缘起谭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思想,总之可以说是宗教的缘起谭。

其次,出现了从上述原始历史思想而形成了更为洗练的综合史学思想。《孟子》中有《滕文公》一篇,其中"孟子好辩"一章中对一治一乱有着相当的论述。孟子论述曰:自古以来世间一治一乱,尧舜以来逐渐出现了国家治理一段时期之后,就会陷入混乱。随后出现有能治理混乱的人物,又迎来一治。之后又是一乱,一治一乱反反复复。这种一治一乱的论述,是一种对古代以来之事予以了相当综合的历史思想,这已经与后世杰出的史学思想没有太大差距了。大体而言,我认为《孟子》与《公羊传》有着相当的关系,所以二者往往有着相同的主张。例如在对于孔子作《春秋》的议论中,《孟子》与《公羊传》甚至在表达语言上都十分相似[10]。又如前面提到的税亩的情况,在《公羊传》的论述中以十分之一为理想的租税额,重于十分之一称为"大桀"、"小桀",轻于十分之一称为"大貉"、

“小貉”,而《孟子》中也有着大体相同的表述[11]。就这一点而言,究竟《孟子》在先还是《公羊传》在先虽然不清楚,但是至少可以认为二者在时代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总之,可以说二书有着相同的思想。不过《公羊传》中又有着更加独特的历史思想,即所谓“三世”(当然不是佛教的“三世”)思想,叫做“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并由此将春秋时代划分为三,由乱世逐渐至升平之世,再至泰平之世的发展思想。这是一种杰出的理想的历史思想。这在后来逐渐形成为了一种综合的历史思想,而在《公羊传》中记载了许多关于谶语即预言的看法,因此有人将《春秋》中出现的原因作为了一种预言,而这一方面虽可以说有着宗教的认识,另一方面却又是有着理想的、且非常进步的历史思想。这种三世思想可说是最为进步的历史思想。

如此看来,中国的历史思想的起源及其逐渐发展的进程,首先是从实际的事实中认识了王朝相继三代的变化,而且认识到了禹的平治水土进而建立国家以来经过三代变化,然后在社会方面认识到了礼俗的变化;在宗教方面认识到灾祥、卜筮、梦与人事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如此各式各样的思想就成为了一种起源,最后出现了综合的史学思想,即孟子的“一治一乱”以及公羊的“三世”等思想。当然,将这些历史思想与反映于这些思想中的事实相结合,从而创造了杰出史学的,是汉代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的赞中叙述了自己作史的由来,并谈到了汇集古来的历史思想以及材料的方法。我所要讲的大致就是这样一种过程。今日有幸在此演讲,就讲以上这些内容吧。

注①:

[1]《诗经》中出现“矣”字的有如下诸篇:

《周南》的《卷耳》、《汉广》。

《召南》的《何彼襛矣》。

《邶风》的《绿衣》、《雄雉》、《谷风》。

《鄘风》的《桑中》、《定中之方》。

---

① 此“注”乃日文版原文。

《卫风》的《氓》、《有狐》。

《王风》的《中谷有蓷》。

《魏风》的《园有桃》。

《唐风》的《山有枢》。

《陈风》的《墓门》。

《小雅》的《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车》、《鱼丽》、《六月》、《沔水》、《斯干》、《无羊》、《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弁》、《巧言》、《蓼莪》、《小明》、《楚茨》、《瞻彼洛矣》、《裳裳者华》、《采菽》、《都人士》、《隰桑》、《渐渐之石》、《苕之华》。

《大雅》的《绵》、《皇矣》、《生民》、《卷阿》、《瞻卬》、《召旻》。

[2]《尚书·召诰篇》云：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

[3]《尚书·多士篇》云：

"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

[4]《毛诗·鲁颂》云：

"《駉》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

[5]《困学纪闻》卷二十《杂识篇》云：

"《礼记》于礼之变皆曰'始'。'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诔，自此始也。''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鲁妇人之髽而吊也，自败于台骀始也。''帷殡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以上《檀弓篇》）'庙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以上《曾子问篇》）'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赵文子始也。''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

也，由三桓始也。’（以上《郊特牲篇》）‘玄冠紫緌，自鲁桓公始也。’‘朝服之缟也，自季康子始也。’（以上《玉藻篇》）‘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宦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以上《杂记篇》）《左氏传》：‘始用六佾。’（隐五年）‘晋于是始墨。’（僖三十三年）‘始厚葬。’（成五年）‘始用殉。’（成二年）‘鲁于是乎始髽。’（襄四年）‘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襄十一年）‘始用人于亳社。’（昭十年）‘鲁于是始尚羔。’（定八年）亦记礼之始变也。”

又，《困学纪闻》有翁元圻注本，最便阅览。

［6］《困学纪闻》卷六云：

“礼乐自天子出，而献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税亩焉，故皆书曰‘初’。”参见《公羊传》隐公五年“初献六羽”条及《左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条。

［7］同书同卷又云：

“‘犹秉周礼。’（闵元年）‘齐犹有礼。’（僖三十三年）观‘犹’之一字。则礼废久矣。”参见《左传》所载该年纪事。

［8］参见《述学内篇》卷二、《左氏春秋释疑》。

［9］《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云：

“问：‘《左传》载卜筮，有能先知数世后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尔。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陈胜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为符瑞。’”

又云：

“《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

《困学纪闻》卷六云：

“‘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庄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闵元年），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文十三年），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

［10］参见《孟子·离娄章句下》之《王者迹熄而诗亡章》、《公羊传》昭公十二年条。

［11］参见《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条、《孟子·告子章句下》之《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章》。

章学诚的史学[1]

在清朝的乾隆、嘉庆时期，考据之学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经学领域当然不用说，即便史学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等一批考据学大家，因此，当时史学的发展可说已完全倾倒于考据学风了。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年代，浙江绍兴府出了一位不合潮流的学者。他独立于时代风气之外，治史不遵循考据之法，完全从理论方法入手进行研究。此人即章学诚。

此人自幼就有些与一般学者不同，童年极为迟钝，记忆力很差。十五、六岁时，父亲任地方知县，为他请来家庭教师传授学问，虽仅仅数百字的文章背诵起来，亦显得非常吃力。然而，他却是总有些主见：文章写得虽不漂亮，却能提出一己之见，听不进家庭教师的意见，总之属于那种不驯服的学生。到了二十一、二岁，他的学问长处开始崭露头角，对于著述一己之创见抱有特别的兴趣。进士及第虽说圆满成功，但由于学风、为人皆与众不同，而终未出仕为官，一生不遇。然而，他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即使在尚未付梓出版之时，就备受有识之士青睐，其崇拜程度甚至达到章氏每有一文写就，必为人们相互传抄的程度。后来，在他去世后由其儿子将其著作出版，几经再版，数年前还有人为其出版了《全集》。如今，他的学问更是大放异彩，甚至开始赢得了那些钻研西方新式学问之学者的特别尊重。

我本人最初读到《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是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由于当时深感其寓意深刻，就于杭州购得两部，并将其中一部送

---

① 据本书日文版"例言"可知，《章学诚的史学》之所以收为本书附录，其目的在于以此作为对《支那史学史》中《史评》部分的拾遗补缺。本文原为内藤湖南于昭和三年（1928）十月六日，在日本大阪怀德堂的演讲，曾刊载于《怀德》第八号。

给了当时在中国留学的狩野博士。[①] 那以后我又在大学等场合对章学诚的学问颇为鼓吹,致使其著作在日本也拥有了相当的读者。十几年前又意外地得到了其《全集》的未刊本,通读这部《全集》,我编写了他的年谱并予以发表。中国有一位叫胡适的人还将我所作的年谱予以增订出版,由此章氏的学问亦引起了中国新派学者的注意。在此之前,中国治旧学的学者,如张尔田、孙德谦等人出于对章氏学风的仰慕也曾特别进行过钻研;而最近除胡适之外,又有出身于精华学堂的姚名达,以及四川学者刘咸炘等人,都能发挥章氏之学,各有著述公开发表。现在,对于此人的学问虽已不再有特别鼓吹之必要,但在此之前由于学界对其学问所具有之卓越特色尚未给以应有的重视,或者说即便多少有所注意,也未能了解其学问真意的学者确实不在少数。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当时我对章氏的学问给予了极力的鼓吹。

如此卓越的学问,虽说产生于乾隆、嘉庆时期,但其价值可说至今不减。若论及章氏学问的渊源,不用说应当追溯至汉代的刘向、刘歆,唐代的刘知幾,宋代的郑樵等人。但是,章学诚亦有其独到的,极透彻之发前人所未发的认识;特别是其标榜史学,对一切学问从方法论原理上的研究,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卓越见解。此人的学问在理论构筑上是颇为严密的,若不从其所建立之方法上予以研究,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予以说明也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我仍希望在此仅对作为其学问根本的原则略作说明,试图对其学风之一端有所介绍。

通常,学者们是将章学诚作为史学家来看待的,而他本人的看法则正如其著作之标题所示,毋宁说是更侧重有关文史原则的研究;而所谓文史,又大体涉及了所有的著述。《唐书·艺文志》中的"文史类"一词即作为广义之文学评论的意义而使用的。[②] "文史通义"的意思,用今天的话

① 据狩野直祯《狩野直喜》(参见江上波夫编《东洋学的系谱》1993年大修馆书店)可知,此狩野博士即狩野直喜(1868—1947),亦为京都学派主要创始人之一,京都大学教授,日本著名中国学家。

② 《新唐书·艺文志》序曰:"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又跋曰:"凡文史类四家,四部,十八卷。"内藤湖南所云,当指此而言。

来说，即著述评论的根本理论。不用说，这种著述所表达的第一对象就是所谓“道”。在《文史通义》的《原道》篇，章氏对“道”做了如下的说明：“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所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章氏是由道所产生的过程顺序入手考察的，道生于天，天地生人，由此有道也，然而仅仅如此，道尚处于无形的状态。道之形状的显露是从三人居室开始的，若三人居一室，才有了分任；用今天的话说，即产生了分工，或曰各司其职，或曰交替工作。由此，出现了均平、秩序的意识。由于平等、秩序等会发生紊乱，这就需要年长者来主持公平，于是有了裁判的出现。随后又有了长幼尊卑的分别，又有了什伍千百等数的增加，随后出现了各个组织的划分，而在各种组织之上又出现了才能非凡的领导人物，进而又推举那些德高望重者来进行统治，于是有了君主和师长的诞生。

“道”就是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所谓法积美备都是在唐虞时代而达到尽善尽美阶段的。殷因于夏，周鉴于殷，至周公而集大成。所谓周公之集大成，固然有其作为圣人的一面，然而能够做到集大成其实并不在于周公个人的智慧和能力，而是那个时代的机会使之然也。自古以来，由圣人来集大成的事例，虽然仅有周公一例，但那是机遇驱使了周公，而周公本人也是在不自知其然中实现集大成的。然而，在中国孟子认为集大成者乃孔子，章氏现在说周公是集大成者，有人以为其与孟子之说相悖，其实亦不尽然；因为孔子当然也是集大成者，不过周公所集之大成者为道，而孔子所集之大成则在于其对周公之道的传授。

而若欲进一步理解以上由来的话，道与器之区别就非追究不可了。《易》虽有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但道其实是无法脱离器而存在的。而记载孔子之教的所谓《六经》，虽说无疑是载道之书，但是由《六经》记载的内容，其实仍然都是器。所谓《六经》即古来圣人之“前言往行”，[2]而且这些“前言往行”又都只能是凭借器来体现的；而作

---

① 《周易·系辞上》。

② 《周易·噬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为记载工具的又是《六经》,可见《六经》所以能体现道,是由器来实现的。然而,在古代是由器而立教的,即所谓治教,那时政与教不分,官与师合一。也就是说,由于政治与教育在当时的一致性,教育、学问其实都是由政治这一实际中的器而体现的。正因为那时学习者可以由器而直接接触道的,所以即便不在器之外指出尚有道之存在的话,也可以由自然之器去领会道的存在。但是,自周世衰微之后,由于政教分离,官师脱节,孔子将器予以著述以便教学,至此才出现了以文字进行著述的情况。孔子曰:"予欲无言。"[①]这就是说世上所有的器都在自然而然地体现着道,至于《六经》中所载的内容是不可能将其尽言的。但另一方面,孟子又说过"予岂好辩哉"[②]的话。也就说,道与器是分离开来的,道并非由器来体现,而是由人命名的;由于此之道与彼之道有着种种分歧,自然需要论辩,于是只有不得已而论辩了。

然而,孔子之道绝非纯粹托于空言,而主要是将其体现为行事,由于所谓行事即古往今来的前言往行,又由于表现前言往行者乃史也,所以按章学诚的观点,凡是可称之为学问者,即史学也。不存在非史学的学问。

章学诚又写了《原学》篇:关于学问,他引用《周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③]认为学问可谓模仿,成道可谓成象;又依孔子"下学而上达"[④]之语,认为这种通过对形而下之器的学习,以达到理解形上之道者,乃学习之目的与方法。若论应当怎样了解成象,且欲进一步模仿的话,他认为只需追究前言往行的种种变化,知晓漫长年代间发生的事情,自然就会得到其中的所谓成象了;而所谓模仿,即教育之道,按照道的规范进行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只能得出一切学问都不过是史学的结论了。只不过这种情况到了后世,随着有关道与器的观念,产生了种种的分歧:即

---

① 《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周易·系辞上》。

④ 《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又皇侃《义疏》云:"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

像儒者等那样，尽管通过古来所存在之器进行学习，却不努力由器达到获得道的认识，只是单纯地背诵前言往行，成为不求有所发明的一类愚昧学者。也就是孔子所谓学而不思者。另外还有一类，不依据古来之前言往行，即不根据载器之六经，仅凭自己的主观臆造，而自以为是的学者。这些即圣人所谓思而不学者，亦即诸子百家杂学的由来。

以上所述，是章学诚从根本上对道与学之关系由来所作的说明。他就这样站在原理的高度，对所有古来之著述进行了判断。他的观点在许多论文中都有所阐述，《言公》论就是其中的名篇之一。

章学诚有言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①古人立言，即著述是出于公的目的，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私有物、自己财产来对待的。本来是为了明道，用言语阐明目的，为了充分地言表才使用了文章的形式；而用文章达到了目的，就不必作为自己的学说而使之成为一种私有主张了。最早，在还没有出现著述的时代，所谓体道之器仅仅体现为政治及其他世上所有的机关而已，后来才出现对此有所表达的著述。而最初的著述因为只是为了载器而明道的著述，所以尚不是那种为树立一己之见所作的著述。如有一个立言传道者，传道之后的人们若出于对前人所立之言的推进、弘扬的目的，即便又有所补充则无不可；后来的立言者与前面的立言者保持一致，如是继续传及后世则亦无妨。然而，后世之学者却不是这样，他们见到那些古人的著述时，就认为其中最初立言者的著述是真的，而有所补充者皆是后人的伪作。这种判断是不正确的。总之，后来的继承者是对最早的立言者有所扩充而著述的，所以二者之间本不存在辨别真伪的问题。而是应该从立言者及其继承者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看到其议论的发展。

以上所述，大体即《言公》论的主旨。章学诚就这样针对《六经》及其他的著述，逐一列出实事，提出了自己对古代著述的评论。这种对古代著述的评论方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途径，其在经学、史学的研究法中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观点。

---

① 《文史通义·公言上》。

章学诚所提出的“六经皆史”口号,对一般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关于“六经皆史”,有时会招致经学者的误解,甚至引起反感的情况也不少。经学者认为所谓“经”是高耸于所有著述之上的,所以将其视为“史”的话是对经的玷污,误认为是将圣人所立言之经与后世学者文人所书之史置于了同等地位。其实,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认为:由于《六经》都是对古来前言往行的记录,因此《六经》所体现的只不过是记载圣人之道的器而已。例如,在《易教》篇中,章学诚认为《易》乃周礼之器,其之所以具有宝贵价值,就在于古代圣人曾将其作为一种礼制的工具而使用,而《易》就是将这种遗法传授下来的书。像《易》这种古代圣人实际使用过的记载器的书籍,就是因为其有来历,亦即具有历史,才显出其宝贵价值。后人虽亦有模仿《易》而著述者,如扬雄之《太玄》、司马光之《潜虚》等书,都不过是些仅依靠个人智慧而并无任何古代所实行过的真凭实据的虚妄杜撰。由于这些书毫无来历,所以是些不值得尊重,而只可称之为妄作的著述。

此外,章学诚还著有《书教》篇,其中论述了有关记录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这是有关记录方法的论述,尤其是将史学作为著述来理解的观点,可说是极为重要的观察。本来所谓记注只不过是为了防止忘却前言往行的一种做法,在那种记注中有一个原则,即必须将发生过的实事原原本本地如实记录,而且还必须毫无遗漏地予以传达。这些都作为材料记录而且传承下来,这种材料即便成为著述时,也是撰述无定名:仅从记录中选择自己需要的题目,由此尽量著述就是了。按照这样的目的,例如《尚书》之《召诰》、《洛诰》,所要写的是周朝奠都的内容,于是就从记录中,抽出有关奠都的必要事实来,然后以最为适当的方法予以著述就可以了。或者像《康诰》那样,天子欲将分封亲族为诸侯之事作为教训保存下来,于是就从记录中抽出记载分封始末的资料,予以著述即可。著述虽说不计体裁,但作为根本性的记录却一定要有正确根据。这是古时候的做法,而到了后世所谓历史学,例如自从《史记》那种历史体裁问世以来,写历史就都用同一种体裁了。可是,后代作为这种体

裁之根据的记录,却不具有足够的准确性。然而,没有准确的记录为依据,仅仅希望遵循一种既定的体裁的撰写,则只能是些非常不确切的、不足凭信的著述而已。这也正是章氏所云之“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的情况。他指出:因为记注无成法,所以取材就有困难;正因为取材不佳,所以动辄以伪乱真。但是由于撰述有定名,体裁均有既定之规则,所以著述就比较容易。这些著述往往文优于质,而且越来越多地出现些不确切的记述。他还认为三代以下的著述,凡被称为上乘之作的,都是些不遵循体裁惯例的作品。例如《通典》,本是作为对礼制变迁的著述,其中又穿插了关于礼的议论,但也无妨;又如司马迁的《史记》,在他自己所撰本文之后,尚存录了所使用资料的原文,而这些均对他们的著述无所损害。

然而,他认为就著述的变迁过程来说,毕竟最初的《尚书》是最为理想的著述。那不仅是以有成法之记注为根本,而且是根据自己认为有必要的题目手法自如地予以著述。而后来《尚书》体裁一变为《左氏春秋》体。《尚书》中并没有一定的体裁,而《左传》中却有了定例,即出现了编年体裁。《左传》又一变而为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左传》是按照年月排列事实,而司马迁则改为依照类别编纂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又变为班固的《汉书》。《史记》是将古代到近代作为一部历史,贯通而记述其变迁过程的;班固则是对汉代给予了断代史的描述。但是,无论如何,直至汉代古来之法虽有变化,形式有所不同,而精神实质还是一样的。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是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等不同体例予以撰述的,但那仅仅是外形上的区别,就其内容的记载而言,则可说落笔自在,而不拘泥于体裁。例如,司马迁写《伯夷列传》,并不仅仅在于要为伯夷立传,而是作为所有《列传》的一篇总序写在前面的;不论题目为何,都不妨碍他对内容作出游刃有余的记述。其后,从班固开始的是纪传体断代史书的不断记述,至宋代司马光才又出现了与《左传》同样的编年体之《通鉴》。此后,至南宋又有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问世。史书的体裁就是如此变化演进的,《通鉴纪事本末》体史学的最终出现,亦可说回到了最早的《尚书》体裁。当然袁枢并未见的抱着一种非凡

之见识而进行创作的,他只不过是为了便于记忆而将《通鉴》的记事按照一个个事件作了一次再编辑而已。但作为历史学发展顺序的一环,如此微不足道之人物的著述,也很自然地与古代最高著述的旨趣相互吻合了。章学诚对对纪事本末体的这一观点,与现在的史学体裁也自然地形成了一致。因为即便是今日西方的名著,也无一不是以这种纪事本末来体撰述的。历史书势必发展成为这样的著作,章学诚在一百五十年前早已提出了这一论断。

章学诚还撰有《诗教》一篇,认为所有的著述都是从战国时代开始兴盛发展而来的。按他的见解,论战国之文,其渊源虽有出于《六艺》者,但最多者则出自"《诗》教"。后世之文体,可说皆已完备于战国,所谓著述是在战国时代才开始成为专业的。"《诗》教"并不仅指所谓的押韵,其他诸如《诗》的精神,因为是随着论事、描述而自由自在地流露,任何手法都可以表现思想,所以任何可称之为著述者,可说都是由"《诗》教"出发的。因此,章学诚以《易教》、《诗教》、《书教》三篇论述了古来著述的源流。此外,他还著有《礼教》一篇,但是没有收入初版《文史通义》中。这是由于与《易教》、《诗教》、《书教》相比,此篇论文有欠力度。曾有友人劝说章氏写一篇《春秋教》,未果。这是因为章学诚的《书教》论中已经包括了《春秋》的内容,所以写了《书教》就无另写《春秋教》之必要了。总之,章学诚在中国原有经书的分类中,总结了古来的著述,论述了所有的应用方法。

此外,在一些小型论文中,此人的真知灼见也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在《史德》一篇中他指出:自古以来认为治史者应具备才、学、识之所谓三长的资格,并特别对其中著述的真实性,即正直地予以著述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著述当以《诗》教之"思无邪"为精神。另外,他还就有关历史材料的使用,写了《史释》、《史注》两篇论文。他还论述了应如何区别对待历史中有一代之史、一国之史、一家之史、一人之史的问题。此外,《申郑》篇也是十分精彩的,这是一篇赞扬宋代郑樵的文章。在中国有称为《三通》的《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其中以《通典》为优秀著述,是没有异议的;若论《通志》、《文献通考》的话,二者皆为宋末之著述,由于其在撰述方法上的不同,屡屡有人发出比较的议论。就一般评价来说,多认

为马端临《文献通考》结构严整,而郑樵《通志》则略逊一筹。章学诚的看法则与之相反,他认为虽然《通志》在编排上确属不佳,但在史论上堪称上乘,是有著述精神的优秀之作,而在这一方面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则有所不及。就在这一点而言,章学诚是站在与乾隆时期普遍学风完全相反之立场的。

按照章学诚的观点,历史研究中虽然既有整辑排比的“史纂”方法,又有参互搜讨的“史考”方法,但是二者都还不能称之为史学。当然,这种整辑排比、参互搜讨的史书并不是没有价值。为了写出优秀的著述,就要善于从那些史料堆积的无聊著述中提取所需,无聊之作也是有其作用的。但什么叫“史学”,仅仅对史料进行整辑排比、参互搜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只有对史料作出某些处理才称得上为史学。由此,章学诚还十分推崇所谓“独断”之学。这里所说的独断,并非不考虑材料的空淡空论,而作为对材料的处理方法,应该是经过自己头脑思考的产物。这是章氏反复主张的独断的学问。章学诚对中国古来正史之中的《史记》、《汉书》,以及其他一些史书特别尊重:因为他认为这些书均出自家学,由父子相传承,是些知道如何处理众多史料,对其慎重选择之后而形成的著述。他指出,从唐代开始则有所不同,修史是将大批学者一次性集中起来,分派以各种工作,然后有一个总括其成的人,按照一定的纂辑方法来编订史书。章氏认为这种做法使著述失去了一以贯之的精神,是史学的一种衰败。

在章学诚的学问中,除以上所述之外其对各类问题的见解还有很多,其中之一个就是对于作为史学一重要分支的方志学,即地方志学问的主张。对于方志学,章学诚具有其发前人所未发的系统性看法。对此,他与当时著名经学家戴震的立场完全不同,并提出过论难。章氏认为修纂地方志应当包括有三种体裁,即按纪传体作志,记载掌故即律令典例,记载有关文艺事项。[①] 由此,他主张地方志有必要写成为一般史之材料那样的著述。他与当时许多人那种仅仅以沿革地理为主来修地方志的做法不

---

① 《文史通义·外篇·方志立三书议》。

同,而提出将方志作为古今史料来撰修的意见,可谓与沿革地理主张别出一格的主张,是极为耐人寻味的观点。

此外,章氏最出色的研究还在于他的校雠学。他的校雠学主要体现在《校雠通义》一书中。这是探讨著述源流的学问,从一个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有关书籍目录的学问,然而所谓目录学,并非单纯书籍目录的排比、分类,而是对书籍作出著述意义、问世经过等考察之后,所建立的分类法。章氏并不认为古代的分类法就一定好,近代分类法就一定不好,没有那种全盘赞美古代的论调。当然,他论述了优秀的古代分类,像刘向、刘歆等出色的分类法,认为刘向、刘歆了解学问的流派,熟悉著述产生的经过。进而明确指出:在他们的时代出现了书籍的六部分类法,再到后世出现四部分类法,都是顺应当时的自然之势不得不如是而已。基于这种认识,他对书籍分类的方法问题,给予了根本上的研究阐述。他的这些研究,即使对今日目录学来说仍是非常有益的观点。

章学诚的学说大体如以上所述,若按今天的说法而言,他认为史学并不是单纯记录事实的学问,并对此从根本上给以了原理、原则的思考。虽然他的思考方式是哲学的,但是在章学诚看来,作为一切学问的根本不是哲学而是史学。所有的学问无非史学,从不存在没有史学背景之学问的认识出发去试图评价一切著述,则是他的理论特征。对于章氏的这些观点,只要通读《文史通义》,并认真分析其构思的话,本是不难做出判断的;然而,如果只是泛泛浏览而不做细心体味的话,唯此精密构思是难以判然明了的。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即使是崇拜章氏的学者,也很难发现其理论的真意。直至最近才有些治西方学问的人,开始认识到章学诚史学的真价。

不仅史学,即便对整体学问的见解而言,我认为章学诚的学风在今天也仍然是有其生命力的。这就是我本人之所以要向今日之学界介绍章学诚史学的本意。

中国史学史概要[1]

——从《史记》至清初

自《史记》成书以后，继之其后的虽有《汉书》，但是二者之间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史记》是通史而《汉书》是断代史。其后修史，特别是在中国修正史的人，都出于编纂上的方便而效仿《汉书》的断代史，因此一个时期内没有效仿《史记》的著作问世。这在后代成为了一个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史书就应该撰写通史，而断代史并非真正的历史，不过这已经是到了南宋时期的事了，在那以前就连史论家也是赞成断代史的。

在《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种类不断增加。《史记》问世不久就有了刘向、刘歆所编纂的全部书籍目录，这一目录载于今天的《汉书・艺文志》，从中可知当时的书籍目录中还没有"史部"这一分类。后来到了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时，史书的种类已有增加，出现了"史部"这一部类，《隋书・经籍志》的"史部"又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隋书・经籍志》把全部书籍分为了经、史、子、集四部，史部占有很大的分量。从那以后直至今日，《隋书・经籍志》一直都是书目分类的蓝本。上述的"正史"是记载一朝一代的断代史；"古史"是编年史；"杂史"是对那些不入"正史"、"古史"的特殊事情的自由记录；"霸史"是南北朝时期各国各自撰写的史书，由于不被承认为正统的朝代故名；"起居注"是在天子左右的人所作的日

---

① 据本书《例言》可知，此《中国史学史概要》乃内藤湖南先生在大正 14 年(1925)讲授《清朝的史学》(即本书的第十二章)时的绪论部分，标题为日文版编者所加。

记;“旧事”与“仪注”类似,记载了有关仪式的古来惯例;“职官”是关于官制的记载;“仪注”记录了现行仪式的程序,相对而言“旧事”所记为“仪注”的来历;“刑法”是法律;“杂传”是传记或特殊事情的记录;“簿录”是目录的学问。如此众多类别的建立,正标志着汉唐之间史书体例逐渐向复杂化发展了。相应地还出现了内容以及编纂方法上的变化。

当初,在《史记》、《汉书》、《三国志》撰述的时代作为史书的编纂方法,对于材料的处理是有一定主张的,是一种将众多原始材料录入史书的方法。不过,所谓采用原始材料,也都是在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材料才予以采用的。其中像作为《史记》的材料,从今天来看传说占了大部分,也有难说是正确的史料。但是,认为不正确也是从今日取舍材料的角度,即所谓归纳史实材料的观点出发的认识。至中古时代才由于文书已经完全形成,所以归纳史实比较容易了,但是在完全没有文书的时代,即对仅凭口述传承的时代,如果完全摒弃口述的话史实必定丧失,那时只能从口述中通过判断而采用那些正确的材料。所以,《史记》在采用那些材料时,主要是采用其中“雅驯”内容的。这是在记录传说时代内容时,作为治史方法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总之,《史记》是如此形成的,而《史记》以外的《汉书》、《三国志》对于材料的取舍,则是尽量保存其原文的。将原文予以某些改写的做法是从范晔《后汉书》开始的,这因为一方面虽然材料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增加,但是用这些材料编纂史书时,史书的在分量上与从前却没有什么变化,这就自然地出现了省略的必要;另一方面由于范晔本人是当时有名的文章家,所以尽可能地希望在自己的史书中展现文章才华而对史料有所改写。另外就是在范晔的时候,毕竟以前已经有过一些史书的编纂了,所以可以不直接编纂基本史料,而为了对那些已经一度编纂过的史料予以再编,逐渐出现了改写文章的必要。不过在当时也利用原始史料写作的沈约的《宋书》,对原文基本是不太予以改写的。总之,这种对原文进行改写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编纂法中的一种变化,而最为显著的变化又表现在唐初依照唐太宗命令编纂《晋书》的时期。当时,在此之前已经有过十八家的《晋书》,因为是将其收集而编纂的,所以距离原文已经越来越远了。而几乎出于同时代的李延寿的《南史》、《北史》,

则因为是对有关南北朝的多种史书删节而成的，所以亦越加远离了原文。如此逐渐形成了无法维持原文的变化，尤其是南北朝所有的文章都使用骈体文，所以从《南史》、《北史》就开始了将原文的骈体改写为接近古文的编纂。但是，尽管如此毕竟唐代是骈体文的时代，所以在五代成书的《旧唐书》还是维持了当时的体例，但是到了宋代的宋祁、欧阳修二人写《新唐书》时，对原文又有了极大的改写。宋祁由于自己好古文而厌恶骈体文，所以采用唐代文章时，将骈文都改写为了散文。如此又出现了远离原文情况，甚至还出现了几乎读不通的地方。这成为了当时史学的风气，但是在《新唐书》之后不久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由于对史料他厌恶《新唐书》而采取《旧唐书》，但是其修史的体例不得不采用近似《新唐书》的体例。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学者有崇尚写文章讲究简洁的风尚，由此产生了修史满足于远离原文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虽然直至唐代的历史著述还大多是私家著作，即是作为一家之学的产物，但是从唐代开始已经变为召集众人的编纂。《史记》写作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是史官之职，所以《史记》是史官之家的著述。《汉书》是班固之父班彪出于续写《史记》的动念而逐渐著述，又由班固继承，进而由其妹班昭拾遗补缺的。还有着类似口头传承形式的学问，所以当时人对《汉书》有不懂得地方还要去向班昭请教。后来到了六朝时期，史家也多是父子相承治史的。《梁书》、《陈书》的作者是姚察、姚思廉父子，《北齐书》作者是李德林、李百药父子，《南史》、《北史》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的著述。如此虽说不是这种两代相传，也都是一家之学的著述。所以当时著史都是有一己之见的，是按照一定的主张撰写的，因而在历史的论断方面都是很有工夫的。像《史记》、《汉书》那样有编纂者《自叙》的，当然叙述了著述的趣旨；即便没有《自叙》的史书，也都是有自己一家见识的著作。这种方法的全面瓦解是从唐太宗时期《晋书》开始的。《晋书》中已经没有了任何主张，也并非聚集专业史家的传著，而是聚集众多学者文人，按照历史分纂法的著述。当时的《隋书》也是以同样方法撰著的，从那时开始实行了分纂法。所以，出于统一的必要而出现了《序例》的写作，主要编纂者撰写《序例》，再据此

由各自进行分纂。于是,作者仅仅是各自机械地按照《序例》撰写,不再是对一代历史有着自己特别感受的写作,也无法发挥编纂者自身特有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历史编纂的精神。

另一方面,由于史书编纂成为了官府的工作,于是产生了名义上的监修国史。大体在唐代这是作为修史的职务设在秘书省的著作官职,后来逐渐地成为了天子直属的部门,史家也就无法自由褒贬了。监修国史这一职务,是个实际上与史书编纂无关,仅仅徒具虚名的高官,没有负责著述的人物却在主要位置上署名,于是史学越发成为了单纯的官府工作,已不再具有史官的精神了。这一点是至唐代所发生的最大变化。

随着历史编纂方法的变化,其意义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司马迁时代,历史的编纂是希望通过这种编纂建立一家之言,意在自己有所创作,后来这种意义变化了,成为了对别人记录的单纯编纂。尤其《史记》中的八《书》,虽然相当于后来的《志》,但是《史记》八《书》的创作意义与《汉书》以后《志》的意义是不同的。八《书》虽写的也是礼乐制度,但并不写制定仪式、典礼方面的具体事情,因为那些在官府中都是有记录的,所要写的只是所制定的制度典礼等在实际中是如何实行的那种精神。《汉书》记载汉代制度时虽然追溯记入了汉以前的起源,但没能写出其中变迁的精神。后来的《志》当然更未超出《汉书》以上,《史记》八《书》的精神被丧失了,单纯地变为了官府的记录那样的内容。又如《史记》写有《列传》,后世也都予以仿效,但是《史记》的《列传》并非单纯为了某一个人而记载其事迹的,其中使用了一种可以阐明那个时代情形的记述方法。看一看《货殖传》、《儒林传》、《游侠传》等就可以知道,那并非单纯为了有钱人、学者个人而立传的,其意义在于揭示这些人与当时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而《汉书》以后就逐渐丧失了这种意义,沦为单纯个人事迹的记载。如此,史书的体例虽然逐渐完备,但在另一方面,治史的精神却在衰弱。然而,无论如何在唐初以前,以往的史学编纂方法还有所传承,以史学为家学之风也还多少有所存在。

唐初兴起了历史评论。当然关于史学的评论,自《史记》以来多少已经有所出现,其中虽有过《后汉书》著者范晔那种在自己的著书中对自己

进行评论的情况，但一般来说对史学进行通论是从梁朝刘勰《文心雕龙》开始的，至唐初刘知幾《史通》的问世，则更是对当时所有史学所进行的评论了。《史通》的评论，其影响波及当时、后世，被认为是古来历史评论中最为有力的著作。此书不仅限于对前代史学的评论，有时还能指出后世史学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一点可以说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尤其是论述了《志》，认为在以往的《志》以外，还应该创建《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都邑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氏族是出于对六朝隋唐间氏族兴盛所引起的注意，方物是各地的物产。近代以后对《史通》有所批评，像纪昀就对其删繁就简地著有《史通削繁》，其中删去了刘知幾应该创建此三《志》的主张，其实有证据表明在《史通》以后的治史者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新唐书》中有《宰相世系表》，这就是《氏族志》观点的产物。又如宋代郑樵《通志》中有《二十略》，这是相当于各代史书中《志》的部分，其中就有《都邑略》、《氏族略》，也有相当于《方物志》的《昆虫草木略》。像这些都是刘知幾观点在后世的影响。刘知幾有着喜欢骂人的作风，虽然被认为批评过于严酷，但是这部能够通论古来史学，指出将来道路的著述确实不能不说是非常的杰作。《史通》一出，《史记》以来至唐代的史学也有了个总论。此后史学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其间又有着《隋书·经籍志》、《史通》等所没有注意到的，但又是史学史上所应该注意的事情。

一是对于历史事实的记载，在纪传、编年体之外采取了类书的体例。这是汉代开始已经有的倾向，即其大部分是为了让帝王了解历史事实而创作了备忘录的。例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等就是这类著作。由于这种方法很方便，所以逐渐流行起来，六朝时代看来也有着各种这类著述。其中，就材料而言还有不仅为着历史，而且是为着所有事物的记忆的著述。于是在后来，于帝王备忘录以外，又出现了为了历代词臣写作四六文、美化文章而提供材料的类书，其中有汇集历史上记事的，是与史书的志类相关的著作，其中有称为杰作的杜佑的《通典》。当然，这些书只是出于备忘录目的而编纂的，但是其中一旦由那些有史学意识的人编纂的话，就出现了非常的杰作。像《通典》那样的著作，一方面虽然是类书，但另一方面在对事情的分类撰述之间，还能够对认识其沿革、了解

事情原因结果、领会其如何进展的原理等作出阐述。中国史学家虽然许多都是以古代为标准,具有复古思想的,但是《通典》却不同,是基于现代比古代更进步的这一观点的著述。以这种类书体例撰著的史书有时会被史家忽视,认为某些著作完全就是类书,或作为史书看待的话也更多是作为政书,认为是关于政治的著述。其实类书并不仅仅限于政治,其价值即便予以最小估计的话,也应该视其为历史备忘录,更何况最上乘者还有像《通典》那种重视所有事物沿革,而且认识其进步的撰著。

还有一个情况是史注。对古书加注释虽然早在汉代已经盛行,但是史书的注最早见于《汉书》。《汉书》编纂的当时,书中对那些非编纂者本人而不得而知的情况加了注释。后来,形成了一旦某一史书问世,就会有人为其撰写参考材料的风气。南朝宋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就是这种情况。《三国志》的作者面对各种材料只选择其中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部分载入本文,而后人又希望参考那些与正文不同的材料,所以加上了注释。《三国志》的注,向以材料丰富而广为后世所参考。后来,以此体例作注的书中虽然正史很少,但著名的有《世说》的注。还有《文选》的李善注,这虽是文学作品,但注中汇集了很多历史材料。这类注中还有唐初颜师古对《汉书》的注、章怀太子的《后汉书》注等。这些注并没有像《三国志》注那样汇集异说,而仅仅是以解释本文为主,不过也加入一些不同的材料,有些对后人的研究是很有用的。这种风格的注释仅限于唐初,以后就没有了。

在接下来的时代中,史书的体例出现了全新的情况,这种情况开始于宋代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成书。记载唐代历史的有五代时成书的《旧唐书》,直至《旧唐书》的时代还是沿用唐代的历史编纂法,尽可能地仿照原有材料予以撰述的。然而,《新唐书》则从最初就有其主张的,而且有了"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的目的,当然这也是由于有着试图增加叙述内容的目的所造成的。如前所述,简洁撰著史书之风虽说从《南史》、《北史》开始已经流行,但是此时更加走向了极端。因此几乎不再照原样采用原始文章。唐代三百年各代的《本纪》中,竟然不载任何诏敕。而在当时的诏敕中,有一篇相当鼓动人心,且与形势相关的诏敕,

即德宗逃离首都时由陆贽代笔的“罪己诏”，就连这一在当时鼓舞军民，迅速光复的著名诏敕也完全未加记载。但是也有人为《新唐书》辩护，认为随着时代的推移，事实也越加繁杂，如果像古来史书那样篇幅记载的话，就必须做到简略，一切从简对于后代史书是必要的。然而，将后代繁杂的事实勉强与古代同样篇幅地予以记载，这本身也许就是个错误。总之，为了在编纂时简化事实而改写材料原文的情况虽说遭到过非难，但是《新唐书》最终还是被当作了后代修史的蓝本。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随着时代的向后推移，公文体的出现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雅气，而中国史学家出于将其写成与古时候同样雅文的目的，自然就有必要予以改写。尤其是编纂《新唐书》的宋祁、欧阳修二人，因为喜好古文，而且在古文之中尤为偏好韩柳文章，所以一方面将所有材料都予以改写，以致不再考虑保持材料的原形；一方面只要是韩柳之文就尽量予以载入。在这种喜好古文之风，例如从韩退之可见，不外是学习《史记》、《汉书》的笔法，主要为了使事实得以跃然纸上，犹如后世的小说。出于这种考虑，对那些四六文形式的材料是无法使其生动化的。尤其是官府文章都是四六文，所以无法作为生动的材料使用。于是考虑到了采用野史、小说那些传闻类的材料。这在今日来说一方面是官报、一方面是新闻报道，都成为了修史的材料。这在修史的意义上是一大变化。《旧唐书》以前还是以官府记录为材料的，但是从《新唐书》开始野史、小说也被作为材料载入了史书。

与此同时，《新唐书》、《新五代史》还使用了《春秋》笔法。《新唐书》虽然也只是试图凭借直笔的方法取《春秋》之义，但尚不太明显。到了《新五代史》则试图作到一字一句皆有含义，严密地予以区别，以效法《春秋》笔法。因此，对于《新五代史》在当时已经有人作注，而且注释中多是对其笔法所作的解释。总之，可以说自《新唐书》问世以后，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对《明史》的编纂。

另一方面，改变历史材料形式的做法也有不得已的情况。中国的史书主要任务是以天子为中心，进而对其周围事情的记载，但这样的记载在唐以后已经变得非常不完全了。在中国有记录《起居注》的职官，此职究竟出现于何时虽然不清楚，至少在司马晋的时候已经有了。称这是三代

以来的史官之法的遗存，是直接记录天子言行的职官，官位虽低但立于天子座席之下，对所见所闻的天子言行作出原始记录，而且自古以来有着不受天子束缚的古老惯例。本来这一官职是由可以自由批评天子言行的职官兼任的。这种情况多少是受到了六朝至唐代贵族政治的影响，即便天子也并不具有万能的权力，臣下对天子的言行还可以自由地批评。至唐代这被认为是对天子不利的事情，唐太宗曾想要看一看《起居注》，谏议大夫朱子奢却说天子不必看《起居注》，如果开此风气的话必将引起凡庸君主的从中做手脚，以致史官无法实现直笔。太宗在褚遂良为谏议大夫掌管《起居注》时也问到过是否可以看《起居注》的事，回答也是不可以看。据说后来唐文宗曾见过《起居注》。至宋代有了很大的变化，《起居注》编好之后先要让天子过目，然后才可以让著作官传阅。因此就出现了记录《起居注》无法直笔的情况，其结果又出现了不得不相信野史、小说的倾向。这种《起居注》职官的方法在朝鲜虽曾稍稍正确地保留过，怎奈在二百年之前由于党派之争，而将以往史书全部予以了改写，所以今日所见者亦不可信。总之，宋以后伴随着君主专制的形成，史书的记述也发生了变化。

《新唐书》虽然使史体发生了变化，但使史体发生更大变化的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本来此书是为天子治世而撰述的，但是此时为天子著史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一变。在宋代真宗时期撰著了有关历史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当然这是为了让天子了解历史事实的撰著，将所有史实予以了分类的编纂。这虽然对于了解事实是很方便的，但也仅仅是对事实的排列，而没有注入著述者的精神。在今日对于查找史料是非常方便的，但在当时则完全是作为天子备忘录而编纂的。《通鉴》则并非单纯的备忘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通史的复兴。以前自《史记》问世，编年体史书就不再流行，《隋书·经籍志》称此为“古史”，是说这是《史记》以前《左传》的体例。不过，此间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通史，有一部现在虽已不存，但据说是梁武帝指示撰著的通史。纪传体史书的《志》类之中也往往保留有通史体例。例如沈约《宋书》的《志》就是贯通后汉以后的体例。又如《隋书》的《志》本来称为《五代史志》，将北朝的北齐、北周、隋，

南朝的梁、陈等各朝予以了贯通的编纂。这些虽然是通史体例，但对全部历史予以通史体例编纂的情况已经断绝了。是《通鉴》复兴了通史，上起战国下至五代予以了编年体的编纂，并且写出了此间时势的沿革、君主应有的心得。不再为着让君主单纯地了解事情，已经是为了了解历史的治乱兴亡，这是帝王学的变化。认为在帝王来说，比了解具体事实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治乱兴亡的状态。总之，进入君主专制时代以后，时代要求君主尽可能地成为近乎伟大圣贤人物，所以才出现这样的著作。

这对当时的历史学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此以后依据《通鉴》体撰述的史书非常之多。当然，此外《通鉴》的影响还有很多。其中之一是《通鉴》在编纂方法上的影响，另一个是《通鉴》成书以后还引出了一些附属的著述。首先，以《通鉴》编纂方法为蓝本，出现了《长编》的编著。即在编纂史书之前，以先编制《长编》为宜的方法。就是将所有材料按照年代抄出，每一年一总括地进行排列，再对其按照各自目的进行删节。今日《大日本史料》也是采取了这种《长编》的方法。中国在此后仅仅作为《长编》的著作就有大量的出现。此外，在材料取舍的方针上，《通鉴》也与《新唐书》一样有采用小说的地方，因此作为结果虽说有败笔之处，但那也是当时的一般学风，由于流行效仿《史记》的那种古文，所以《通鉴》也是取小说为材料的。其次，是作为《通鉴》附属著作的成书的《目录》、《考异》等著述。由于《通鉴》是一部长年的史书，没有索引的话是难以检索的。所以《目录》大体是作为一种年表而做成，而且有着索引的作用。所谓《考异》是因为《通鉴》采用了许多材料，如果不讲清楚材料的取舍过程的话便会产生怀疑，所以在此写出了取舍的理由。如此，在编纂自己的史书的同时，又重视如何进行材料的选择，这的确是在作为学问编纂史书上的一大进步。虽然说如果单纯为着帝王著史的话这是不必要的，但是由于编纂人都是一些杰出的学者，所以才能够留下这样一部堪称后世楷模的著作。

自《通鉴》问世，记载《通鉴》所载时代以前和以后的书、为《通鉴》作长编体例的书等有很多都在《通鉴》的影响下问世了，宋代史学由此受到很大的推动。其中还有一部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由于《通鉴》

是编年体,将连绵若干年的事情分割截断地予以记载,很不方便,所以出现了这种以事件连续为主记述的《通鉴纪事本末》,将《通鉴》中的记事抽出,按事件重新编纂。这在后来成为了中国史学体例的重要部分,以往只有纪传、编年二体,加上这纪事本末就成为了三体。虽然袁枢当时仅仅是抽出记事重新编纂以求方便,并没有更多的考虑,但是就其结果来说却是重大的,此书被中国史论家评价为创出了史学中最为方便、最为进步的体例。

被认为受到《通鉴》这种编年体通史影响的,还有一部南宋时代以纪传体写作的通史的问世,这就是郑樵的《通志》。郑樵是一位伟大的史论家,他认为史书必须是通史,像班固那样的断代史是史书的堕落,所以他写了《通志》。在《纪传》之外设有《二十略》,是类似《志》那样的内容,还制有年表而名之为《谱》。作为史论家他是很伟大的,但是《通志》的成书与其史论相比,却因其写作计划过重而结果并不理想。《通志》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序论》。

如此地重视通史,虽可谓史学在宋代的复活的结果,但此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正统论的再度兴盛。中国是革命的国家,各种天子姓氏不断地更换着,有时无法统一而造成国家的分裂;有时虽然统一,却又像秦始皇、隋朝那样年数过短,尚未将制度、文化普及全国就已经灭亡。对于这样的朝代是否应该承认其为正统呢?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观点认为正统不必非要连续,也不妨存在正统断绝的时代;也有观点认为如果承认断绝时代的话,就不得言其为统,例如对三国中应该确定何为正统的问题就争论不休的。总之,考虑到前后贯通为一部通史时,这种讨论就自然出现了。对这种正统论以《春秋》之法应用于《通鉴》的是朱子的《通鉴纲目》。以《春秋》义法应用于史学的虽数《新五代史》最为显著,但却与正统论没有关系,虽然《新五代史》也作了局部的褒贬,但朱子的《通鉴纲目》才是以《春秋》重点的大一统主张为根本撰著的史书。当然也有着字字褒贬,但由于是出于大一统的主张,所以全部都应用了《通鉴》的事实。司马光著《通鉴》,认为是未加褒贬地撰述事实,那么于自然之中流露评价,采用《左传》体例。但朱子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进行仿效

《春秋》本文的复古。这是宋代史学主张上的显著发展。

在宋代作为史学的辅助学的已发展的有金石学。将金石应用于历史考证的事例早已有之,以秦权考证《史记》中文字之误的例子在《颜氏家训》中已有所闻。继之,在唐至五代期间也逐渐有着这种倾向,郭忠恕著《汗简》时,就引用过金石中的古文。但是,收集众多金石作为史料的情况,不妨说开始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金文方面接下来还有《考古图》、《博古图》,在金石特别侧重碑文的有赵明诚的《金石录》。至南宋,出现了很多金文方面的考证著作。这些都与经学一同对史学起着促进作用。后来在清朝兴起的金石学之基础,大体在此得以开创。

其他方面,对史学有着促进之功的是目录学,将此作为学问对待的是郑樵。他在《通志》中撰有《校雠略》,这完全是将目录作为学问予以对待的著述。他所写的《艺文略》就是根据《校雠略》的原则撰写的。目录学在当时虽说并没有立即对史学产生促进作用,但郑樵发起的这一学问,后来成为了以目录学促进史学的基础。

这些就是宋代史学的大体情况,宋末至元初之间引人注目的是王应麟的《玉海》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些著作当初虽然并非为史学而作,但其结果却作用于了史学。本来,从唐至宋都有替天子代笔起草诏敕的官员,称为内制、外制。起草诏敕的官有必要了解大量故事,所以从唐代开始为此编纂了很多的类书;宋代以后又称此为辞学或词学。《玉海》基本就是为了这种辞学而撰著的。王应麟的学问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了后来清朝学问的起点,此人对辞学的研究也涉及到各个方面,在目录学方面也有其特殊的方法,即他提出了如果将以往目录中所载而现在亡佚的书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复原的话,便可大体得知其书内容的方法。就是从众多古书中抄出有关某书的事情来,由此便可以了解原书的大体面貌,这种方法与清朝的学问有着很大关系。他不仅限于对佚书内容,同时也对该书成书的由来,以及以往关于该书的评价予以了汇集。本来的目的虽然为的是辞学,其结果却成为有利于史学的方法。

《文献通考》与王应麟《玉海》之为词学而作不同,是为了当时的策学而撰著的。所谓策学,是从王安石改变科举之法,在考试中要求写论策以

来出现的，出于了解古今政治及其他沿革的需要，马端临之前已有过为了策学而撰述的著作。马氏虽说基本是仿效《通典》，而且为着有用于策学的撰述，但是从其成书的成果上看，却远远超出了单纯为着策学的目的，从而与《通典》共同作用于后来的史学，成为一种类似文化史的著述。这两部著作虽说其目的并不一定是为着史学，却不失为史学的重要著述。

由宋至元，还出现了一种特别的著述。因为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所以出现了各种有关南洋交通的书籍。从南宋时期开始，与南洋的贸易发展了起来，为此关于南洋风土物产的单行本书籍也得以大量问世。近年有名气的是赵汝适的《诸蕃志》。不过，如此注意南洋的情况，开始于唐代的阿拉伯贸易的发达。就这样，在元代末年虽有着汪大渊《岛夷志略》的问世，但在此之前就曾经有过种种的著述。最近西方学者对阿拉伯贸易，以及印度洋方面进行研究时，开始将这些著述作为研究史料运用，从而使这方面的著述变得更为引人注目了。

元代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变化。但是，元代在领土扩大的同时，朝廷也企图编纂大部头著作，曾经编纂过《经世大典》这种八百余卷的著作，今日已经残缺不齐。此书网罗了元代关于制度、文化方面的所有材料，而且在编纂制度时还记述了由来以及相关的事实，所以今日虽然仅仅留下了部分的残存，但作为史料有很多仍是很有利用价值的。特别是今日的《元史》，大部分应该就是依据《经世大典》编纂的。今天我们对元代的了解，恐怕主要是根据了这部《经世大典》。至清朝搜寻元代旧著时，甚至曾经从《经世大典》中抄出部分内容，有各种各样的作为特别的著述问世的。就其他民间编纂物而言，当时丛书又有所发展。这是一种网罗旧书为一体的方法，今日尚存者中以宋代的《百川学海》为最古。其中收入了各种书籍，虽然未必仅有史书，但很多都是可以作为史料的。像宋代官府的那些旧事，很多都是由于这部《百川学海》才得以了解的。这是由南宋的左圭所编纂的。至元末，陶宗仪著有《辍耕录》，收集了元代的故事杂说。此人还编纂了《说郛》这部大型丛书。现存《说郛》据说已非原著，所以无法由此了解其原著的体例，但无论如何此书收集了相当多的书籍是肯定的，而且其中包括了很多史料，因为即便在这部并非原著的

《说郛》中,也多少能见到一些可以作为史料的著述。

此时,有关地理方面著述在南洋以外,又出现了许多关于蒙古、西域的纪行一类著述。这些当然是由于元朝有了横跨欧亚的大版图,所以出现了有关创业征伐,以及儒者、道士应当时天子之召的纪行等各种著述,这些即便在今日也是有关蒙古、中亚的有力史料。

至明代出版了《元史》,但是《元史》是历代正史中评价最低的史书。这是因为编纂时间过短所造成的,同一人的传甚至出现重复撰写的粗杂情况。另外,最不成体例的是由于文牍不加任何修正就予以载入,致使文章恶劣,不合史书体例。元代是以蒙古语下达诏敕的,由于翻译为汉语时未使用古文,而是译作当时俗语的,而且被原样载入了史书。这些虽然都是受到攻击的地方,但也仅此一代而已,以后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照用原始史料的做法,相反却是唐以前史书编纂的原则,不妨视其为一种偶然复活旧原则的现象。不过,对于六朝的四六文,即便照原样载入史书,文章虽嫌过于华丽,但不会感觉粗杂。由于元代史料都是俗语材料,所以才受到如此的攻击。大体,《元史》作为一部完整的史书,虽然体例不佳,但作为史料是有其利用价值的。

《元史》出版于明代初年,大体上明初继承元代风气,也流行编纂大型著作。作为朝廷编纂的大型著作有《永乐大典》,这是网罗古今书籍的类书,后来从中发现了大量的史料。在清朝学问兴盛,敕命作撰的《四库全书》中载入了从《永乐大典》抽出的数百部书籍,其中包含很多史料。《永乐大典》虽然对当时的史学没有什么帮助,却多有益于后世的史学。此外,在历史著作方面还有《历代名臣奏议》的编纂,这是非常庞大的著作,不仅限于当时,即便在今日作为史料也是有价值的。

明代初年,宋元以来继续不断的南洋贸易有了进一步的扩张,已经延伸至了非洲沿岸,那一地区当时被称作西洋。当时的东洋、西洋,是将今天的南洋予以东西划分的名称。当时出现了许多对这一西洋的纪行和其他的记事,这对今日了解该地史实是很有帮助的。不过,那些记事在明代以及清代都被认为是荒诞不稽的。永乐年间太监(宦官)郑和受派遣,到过这些地方。此事后来成为了《三保太监下西洋》这类戏剧的题目,也形

成了小说，书中虽说完全是《西游记》那类荒唐的内容，但实际上是有确信的事实的，十四五年前在锡兰岛发现了郑和的碑，记录了郑和向佛堂捐款一事，用汉文和泰米尔语、阿拉伯语记载的，为当时的史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大体上说，明代的史学的一个特点在于其继承了宋元以来的史学，明中叶以前不妨称为是野史的时代。在民间野史很盛行，其中不乏真伪混淆的著述。明初有着各种各样的朝廷秘闻，永乐帝取代侄儿建文帝而篡位，建文帝又去向不明，于是出现了与此相关的许多野史。此外，宋以来出于官吏的习惯，撰著了许多对自身见闻的记录，所以也有以此为材料的野史。因此，在明中叶以后，还出现了围绕在野史和朝廷记录之间以何为主的争论，这在后来还成为了中国近代史学变化的一个契机。那时，王世贞、焦竑等人不信野史，开启了重视朝廷掌故的学风。当然野史中也是有掌故的，但那是不重视内容正确性，仅仅为了趣味性而有意将其保存下来的，而掌故则是即便没有趣味只要是可信的材料就予以保存的。这一发展变化影响了中国史学。《新唐书》、《通鉴》为了生动地表述历史事实而使用了野史材料，自从这成为了当时历史编纂标准以来，此风盛行，明代的野史则是这种风气的末流，史书变得有些像报刊那种倾向了，而王世贞、焦竑等人改变了这种趋势。这在后来清朝编纂《明史》时，也有过相关的议论，最终《明史》以掌故之学为基础撰著而成，当时的议论还留在了《明史稿》的《凡例》之中。尤其是建文帝的问题成为了当时议论的中心，《明史》对于建文帝的记载最终没有采用野史。这对宋以来史学虽说是一个变化，但在当时又是由特殊事情而引起了关于史书必须依据正规史料编纂的议论，出现了应当照载史料的观点。围绕《新唐书》、《旧唐书》也有过类似的议论，明中叶的杨慎在比较此二书之后，就指出了《旧唐书》的正确性。其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更是最相信《旧唐书》的人物。这不仅限于《新唐书》、《旧唐书》的问题，还形成了史书应当尽可能地照用史料的议论，总之，照载史料为宜的观点是《明史》编纂时期的认识。

明代末年出现了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李贽（卓吾），是王阳明学派的人物，由于其学风、行动都不同寻常，所以既有崇拜者也有很多反对

者,结局不太好。他的学问大体属于禅学一类,不仅仅治史学,还主张破除中国历代的风俗习惯。对自古以孔子为道德标准的理由提出质疑,主张没有永远以孔子为标准之理,并由此撰写史书,其书名为《藏书》。此书虽说对史实穿凿附会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但不妨读一读他的总论。他认为从来以《春秋》为史法之根本,只因为那是孔子的撰著,但是,这并非永远的理想,于是从根本上予以推翻。他对人物也都予以了重新的评价。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过激的耸人听闻的主张。焦竑是支持其主张的。当时焦竑是个博学人士,由于颇得世人信任,所以也成为李贽博得世人信任的支持力量。但是,李贽的主张在当时却基本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顾炎武非常反对此人。他的著述曾经一度被世人遗忘,最近进入民国以来又出现了他的信仰者。

焦竑的著述有些还成为了后世的蓝本。他的目录学很有见识,所撰《国史经籍志》以前在日本也有翻刻。另外,关于掌故之学他与王世贞在方法上多少有所不同,王世贞重视收集制度文化,他侧重收集关于传记的史实。清朝学者多有仿效其著述的。

在明末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即沿革地理学的出现,虽说并没有出现学问上的名著,但在地图绘制方面,使用了将古代与现代对照,朱墨套印的方法。王光鲁的《阅史约书》就使用了这一方法。清朝以后这种风格的沿革地图多了起来。

清朝初年的史学完全是明末遗老的学问。自康熙帝平定三藩稳定了统治中国的形势之后,为了编纂《明史》而将大批学者聚集北京,这是清朝史学得以隆盛的基础。当时公认的学者是黄宗羲(浙江余姚)与顾炎武(江苏昆山),前者为浙东学派的鼻祖,后者乃浙西学派的开山。清朝的史学就是以此二人为中心而兴起的。但是,由于二人都是明代遗老,所以并未露出表面,而是由那些与此二人相关者为中心人物的,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成为了《明史》编纂的第一个中心人物。《明史》的成书花费六十年,虽然很多人参与了这项编纂,但事实上是以万斯同为中心的,他在北京成为了众多学者的中心。顾炎武一方成为中心人物的是他的外甥徐乾学,此人得宠于康熙帝,因此晚年获准归南方太湖的洞庭山聚集学者编

纂《清一统志》，在那里又聚集了众多学者。此人虽然并非直接继承顾炎武的学问，但因为徐乾学与顾炎武的亲戚关系，聚集在这里的学者多为浙西派人物。他们虽多治经学，但由于目的是地理的编纂，所以其中有如顾祖禹，著有《读史方舆纪要》。总之，这两个学者集团与清朝的所有学者都有关系，并由此产生了清朝前半期的学派。万斯同记忆超群，甚至能记住什么事情在哪一本书的哪一页；由于非常博学，他一边编纂《明史》，一边又对一般史学进行撰著，留下了著名的《历代史表》。大体上此人的方法是补古来史书之缺，不妨称之为修补旧史的学问。在徐乾学一方聚集的人中，如阎若璩喜欢校订。所以由这一派产生了可称为考订旧史的学问。不过，这种考订以前在王应麟那里已奠定了基础，杨慎也是这种学风，至顾炎武而确定了这种考订的方法，他那一派学者又予以了继承。此间虽然还有沿革地理学，以及以金石所进行的历史考证，这是顾炎武为之奠定基础的学问，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出现了以上两个主要的目的。后来，至乾隆以后出现了章学诚那种史论家，他甚至说清朝前期的史学并非史学。作为史学全体的主义来说，以《明史》那种尊重史料的方法对《新唐书》以来学风的改变，虽然是明中叶以后兴起的主义，但是明末遗老所发起的则是这种修补旧史与考订旧史的两种倾向。

跋

内藤先生授课或讲演是决不带讲稿的，偶尔带上一张备忘似的小便条已经是极为罕见的了。总之，讲稿都装在先生的脑袋里了。不过，先生总是用包袱带来一大包参考书，多是些大小厚薄的各种汉籍书，而且数量很多，一次就带来数十册书亦非罕见。然后先生总是一本一本、这里那里地一边翻阅一边绵延不断、一丝不苟地进行讲述。这可以说是先生那种聪明强记天才学者才能够具有的绝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由于先生的授课、讲演的这种风格，对于听讲者来说，不管是用速记法或怎样的，如不记录的话，以致留不下任何记录，于是造成先生的讲述全部消失殆尽的遗憾。现在回想起来，对于先生的几次讲演，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为什么那时没能更多做些记录。

而且，即便侥幸有着某种笔记保存了下来，一般来说笔记中也不免有记录者的误解或误记。对于这部《中国史学史》原稿的整理，始终是我帮助内藤先生的令嗣内藤乾吉氏做的。我二人对几种听课笔记作了相互核对，对于这些笔记的繁简精粗尚可忍受，而对于不同笔记之间所出现之完全相反的记录究竟应当如何裁定，另外对于各种笔记都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空白又当如何进行填补，类似的棘手问题屡有出现，疑义百出，有几次甚至都想放弃了。不管怎样，今天终于整理完成而且有了付梓的机会，应该说这是乾吉氏所付出莫大辛苦和努力的结果。而且，今天深有感触的是，自从内藤先生去世以来，将其遗著不断进行整理刊行的乾吉氏的这项工作，的确是一项相当不易的困难工作。而且又完全是由于乾吉氏笃孝至情所发起，才得以完成的事业。

《中国史学史》与《中国上古史》一样，都是内藤先生晚年最为倾注心

血的著作。先生在世时就曾为了出版此书,征集听课学生的笔记而亲自进行过修改,曾集中精力整理原稿,可惜尚未实现目的人已仙逝。然而,先有《中国上古史》于前些年的刊行,[①]现在又迎来了《中国史学史》的付梓。最终出版之后想必乾吉氏也可以去鹿谷法然院的先生墓前,供奉一册作出汇报了。那时,我也一定去拜谒先生。相信先生于地下也会感到欣慰的。至今年6月,先生已经逝世整十五年了,在此时出版此书我个人亦倍感欢欣。

昭和二十四年(1949)4月26日

神田喜一郎

① 《中国上古史》刊行于昭和十九年(1944)。

后　记

《中国史学史》是根据著者在京都大学授课内容整理而成，并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5月由弘文堂出版的。关于当时整理编纂的始末经过已在《例言》中有过交待了。此书收入本卷（指《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译者）时，订正了既刊本中文字的误脱，并且根据神田博士的意见改正了两三处不恰当的表达，内容方面并无增删。只是增加《索引》部分，《索引》是由伊藤道治氏（神户大学副教授）编成的。伊藤氏是在听说本书尚需一《索引》时，主动承担此事并予以完成的，对其笃志在此谨致以编者深深的感谢。

课程末尾的"史评"一项，在整理的当时由于编者手上得以参考的听课笔记过于简略，而没能再现授课的原貌，不得已而仅仅录入了著者的备忘提纲，并期望将来得到完全的听课笔记之后再行改写，遗憾的是由于编者的怠慢，此愿望至今尚未实现。不过，根据听课笔记推测的话，著者的这一项授课内容很可能是由于时间的不足而删去了提纲中所记"史事"、"史体"、"史法"各条，径直地集中讲授了章学诚的"史论"，关于龚自珍、张尔田、孙德谦、梁启超，也只是在最后稍加数语附言而已。而且关于章学诚的内容应该与本书附载之《章学诚的史学》的内容大体相同。所以也可以说当年未得再现的授课内容的十之八九已由这一篇予以了补足。

内藤乾吉记

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

—— 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译后

来日本以前我曾注意到欧美汉学家的论文中经常引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中国学者虽然还比较注意欧美学者的研究,但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却了解不够。比如,我个人早就读过曾经留学日本京都大学的迈克尔·鲁惟一(Michael Loewe)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却不知道京都大学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的《中国上古史》、《中国史学史》;更不知道第一个在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的人是日本学者。无论如何,我是到了日本以后才开始接触《中国上古史》、《中国史学史》这两部大作的。前者已经由夏应元先生监译的《中国史通论》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与我国读者见面了,今天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把后者作为海外汉学经典著作予以出版。作为人类第一部《中国史学史》的翻译者,我很希望以此书译后感的形式就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的问题谈几点认识,以就教于各位读者。

一、大师笔记与东西方史学的不同

众所周知,哲学大师黑格尔的著作中很多都是他在柏林大学等的讲课笔记,如《美学讲义》、《历史哲学讲义》、《哲学史讲义》、《宗教哲学讲义》等。其实,内藤湖南的史学著作也有这样的特点,很多都是当年他在京都大学授课时的学生笔记,如《中国上古史》、《中国史学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等。而且,记录、整理这些讲义的弟子中还涌

现了一批大师级学者,像内藤湖南的学生中有森鹿三、贝塚茂树、神田喜一郎、宫崎市定等。

然而,无论东西方大师们在治学方法上有着多少惊人的相似之点,以内藤湖南开创的东方史学京都学派与黑格尔开创的欧洲近代历史主义学派相比的话,又不能不说二者虽有共同点,但更有相异、甚至对立之处。比如,“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无真正的历史”,从黑格尔到欧洲历史主义学派,就是如此妄下结论的。即使在西方历史主义发生危机以后,东方的史学家中相信这一西方咒语者仍为数不少。从黑格尔到欧洲历史主义的成熟,虽然其中有过所谓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之间的近代史学思想争鸣,但是在轻视东方史学不过与阿拉伯小说等同这一点却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近代欧洲的思想家们相信:由于近代欧美有着最发达的文明,所以与这种文明相应的,当然也是最好的文化(思想、学术等精神产物)。且不论物质文明发达了是否就意味着精神文化也一定发达的命题是否成立,至少近代的欧美思想家通过宗教改革,从否定欧洲中世基督教文化的立场出发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亘古绵延发展至今之中国史学就是个大问题。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代表着欧洲历史哲学的诞生。从此欧洲史学从《圣经》和基督教起源时代的历史记述的那些神话故事中解放了出来,最终成为了历史科学。历史主义学派学者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在他们以前的历史学不过是“历史记述”,而不是“历史科学”。比如,20 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晚期的名家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就明确地说:历史哲学这样的概念,对欧洲以外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在阿拉伯、中国所见到的那些历史记述,无论如何没有超越故事叙述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记述中,即便让人感到有了某种对事实的批判,但仍然未能进入分析的阶段。(《历史主义及其诸问题》)。从黑格尔到特洛尔奇就是如此看待中国史学的。今天不仅是东方学者,即便西方学者也承认这是一种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而且制造如此偏见的“历史主义”也已经在危机之后成为了历史的遗产。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历史的遗产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呢?中国史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历史主义”那样的危机呢?中国史学的前景究竟如何呢?一句话,中国

史学的生命力到底何在?

二、清代考证学的“近代科学性”

“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强调真实事物的“个别性”、“一次性”的特征。这是针对18世纪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启蒙主义学说的批判,这种观点反对将人类及其思维简单地赋予动物界那样地自然化,认为那是对人类历史的概念化,所以应该强调生动的人类历史是在个性中发展的,而且强调发展虽然是变化,但并不一定就是进化。出于这种对历史事实个别性的追求,自然出现了繁琐考证的“历史主义”学风,而这在后来成为了毁灭“历史主义”的一大危机。无论如何,强调历史个性而重视考证的学风,曾经是欧洲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欧洲学者认为他们所达到的这种历史科学的水平在欧洲以外是不存在的。

提到考证学风,在中国史学界没有人不称赞乾嘉学风的,可是有几个学者站出来说过乾嘉考据不亚于欧洲的历史科学呢?内藤湖南说出了这句话,他说:“这种方法与欧罗巴近世科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新支那论》,《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湖南的这一结论是来自他对中国史学史,特别是清代史学史的认真考察。他认为清朝考据学之所以产生,除了有着当时厌倦了明末宋学空论学风而提倡“实事求是”[①]之汉学的学术史背景之外,清朝文化、特别是经学的发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史考”本来自于经学考据的影响。当时经学发展形成了义理、考据、词章,才出现了义理哲学、考据方法、词章语言学这些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术分野,由此酿成了乾嘉史学的考据之实事求是、博览多识、精密治学等特征。他还借用王鸣盛关于“饴”与“甘”的比喻,指出清朝的史考就是为通过研究“饴”这样的个体史实,以求了解“甘”这类抽象的历史规律,为此学者们放弃世俗的名利追求,把自己每日关在书斋里拼命钻书本,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于“实事”之中“求是”。内藤湖南在清代的汉学复兴之中,敏锐地

① 《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

看到了考据学“近世科学的方法”的产生来自于“实事求是”的实学研究。

三、章学诚史论的近代学术价值

“历史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人间的事象无非都是历史”的观点。这可以说是与18世纪合理主义相对立提出的认识至上的、典型的历史主义认识。这一观点又大体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包括过去、现在、思维在内的人间所有事物无不是历史的事物。特洛尔奇说过:人类及其有关文化、价值的所有思维在根本上都是历史化的存在(《历史主义及其诸问题》)。第二,只有历史学才是最高、最根本的学问。历史主义史学的终结者迈纳克(Friedrich Meinecke)曾曰:历史学在作为通常学问的同时,又是一般学问以上的学问(《历史主义的立场》)。

然而,根据内藤湖南的研究,在清代章学诚的史学中已经出现了与上述历史主义史学十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在经学、考据学极盛的清代后期(比欧洲历史主义早100多年),已经产生了章学诚那种“所有的学问无非史学”的思想;并追溯这一思想来源,指出这是一种既非汉学亦非纯宋学的“独断”的新史论。章学诚经过对以往所有思想,特别是经学思想的整理、批判之后,提出了在当时振聋发聩的“六经皆史”主张。他说孔子的六经本身并不是“道”,而只是载道即能够体现“道”之“器”,无非“前言往行”之“史”而已。

内藤湖南极为赞赏章学诚史学思想,指出:“若按今天的说法而言,他(指章学诚)认为史学并不是单纯记录事实的学问,并对此从根本上给以了原理、原则的思考。虽然他的思考方式是哲学的,但是在章学诚看来,作为一切学问的根本不是哲学而是史学,所有的学问无非史学。从不存在没有史学背景之学问的认识出发去试图评价一切著述,则是他的理论特征。对于章氏的这些观点,只要通读《文史通义》,并认真分析其构思的话,本是不难做出判断的;然而,如果只是泛泛浏览而不做细心体味的话,唯此精密构思是难以判然明了的。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即使是崇拜章氏的学者,也很难发现其理论的真意。直至最近才有些治西方学问的

人,开始认识到章学诚史学的真价。不仅史学,即便对整体学问的见解而言,我认为章学诚的学风在今天也仍然是有其生命力的。这就是我本人之所以要向今日之学界介绍章学诚史学的本意。"①

四、中国史学的生命力到底何在

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不断总结史学发展的沿革,从而展望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那么,对于中国史学为何能够亘古不衰、绵延至今的原因,或者说中国史学的生命力到底何在的问题就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了。换言之,比之纠正西方的偏见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借鉴历史主义危机的教训,认真总结并提出史学研究到底应该具备怎样特质的问题。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历史主义,的确是一种历史意识的觉醒和思维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是很快它由于自身存在的缺陷而出现了危机,并走向了终结。这一危机主要出自两个方面:第一,过分地强调历史那种"个体性"、"一次性"的特征,使得研究视野变得狭窄,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和相关性。第二,将所有事物一概予以"历史化"的认识,抹煞了人类与他物,过去与现实的区别,影响了人类追求未来的热情。

那么,如上所述中国既然也出现过类似欧洲近代历史主义学派的思想,为什么没有出现同样的危机呢?通过阅读这部《中国史学史》,我想读者对此问题会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而我个人认为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史学自身所存在着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和史学传统,这正是维持中国史学长久不衰的生命力。

如果认真总结清代学者,特别是钱大昕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话,我们是不难把握中国史学之真谛的。而谈到总结钱大昕史学,内藤湖南对清代学者误解的纠正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他认为"在乾隆以后的学风中,核心人物是钱大昕。钱大昕看来并不认为仅仅在史料学问上下功夫就可以完成学问了。在他的文集中的'答问'中就记有一般史论的内容,

---

① 本书附录之《章学诚的史学》。

由此可知与顾炎武同样，他是准备研究各时期制度及其沿革之大势变迁的。如果他的设想得以实现的话，则已经就是今日历史学的学问了。他是个治学严谨的人，而且由于对于著述不急于求成，所在在精选材料的准备上花费自己的一生。而这一特点又受到了误解，那些认为仅仅进行材料选择就是学问的他的追随者中，还因此出现了以那种单纯考证为学问的风潮”。①

从内藤湖南的分析可知，清代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史学的极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像顾炎武、钱大昕这些各个时期的“核心人物”，他们不但能够继承中国史学那种研究“沿革之大势变迁”的优秀传统，还能将这一传统推向了成熟。② 内藤湖南在这部《中国史学史》中是经常强调这种探索“沿革之大势变迁”的中国史学精神的。所以，在中国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上虽然经常会出现一部分人偏重考据，另一部分人偏重义理；一个时期出现宋学风潮，另一个时期又流行汉学风气的情况，但是两千年以来司马迁所开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学思想不但没有改变，而且经《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等的继承发展，更是形成为了一种以“阐明历史古今变迁原因结果”③为治史目的史学传统。

传统是一种经过千年、数千年酿就的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史思想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史学的精神，这是中国史学绵延不衰的生命源泉，这是中国人对全人类的重要贡献。其贡献在于：人类由此可以在不断探求人与自然，昨天与今天的关系中，把握自身奔赴将来的方向，从而获得创造未来世界的勇气！这就是我在学习、翻译这部《中国史学史》过程中的切身感受。

最后，请允许我向始终关心、支持这部《中国史学史》中译本出版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道雄先生④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兴康社长，谷

---

① 本书第十二章《清朝的史学》。
② 参考拙作《“内藤史学”与清代“大势论”史论》，载于《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
③ 本书第八章《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
④ 谷川道雄先生对此书的中文稿进行了逐字的校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玉、王淳编辑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没有他们的信任和鼓励就没有我与人类第一部《中国史学史》之间这段学缘！

此外，本书中的注释除说明者外，均为译者所加，如有不妥之处，当由译者负责。

马 彪

2007年10月



索　　引

凡　　例

1. 此索引包括本书中所有的人名、书名。

2. 书名之中包括有论文、金石文、甲骨文。

3. 此外,为了有助于对本书的理解,还列入了《古文尚书》、《宋实录》这类不甚严密的书名。

4. 人名之外的字或号,一般加括号表示;但是在本书中像黄山谷直接使用山谷的号,刘铁云直接使用了铁云的字,所以加括号的是本名。

5. 原则上,人名、书名按照姓氏笔画排序,但是同一书的篇名则按照原书中的篇名顺序排列。

6. 西文书名、欧洲人名同时列出原人名、原书名。

7. 人名、书名之后的阿拉伯数字表示索引页码。

8. →表示另见某项,(→)表示另参见某项。

人 名 索 引

五画

六画

七画

八画

九画

十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四画

十五画

十七画

十八画

日本人

欧洲人

书名索引

一画

二画

三画

四画

五画

六画

七画

八画

九画

十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四画

十五画

十六画

十七画

十八画

十九画

二十二画

日文书

西文书